

『日本学术文库』

#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 著  
陈力卫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日本学术文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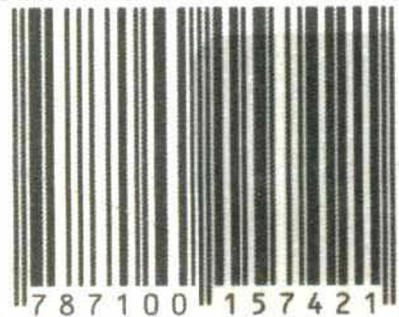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是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的代表著作之一，收录了作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约十年间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问题的主要论文。丸山被称为日本战后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哲学家，他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基本构成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也由此诞生出“丸山学派”。

<http://www.cp.com.cn>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ISBN 978-7-100-15742-1



9 787100 157421 >

定价：58.00 元



『日本学术文库』

#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 著  
陈力卫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日)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日本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15742 - 1

I. ①现… II. ①丸… ②陈… III. ①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02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日本学术文库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日〕丸山真男 著

陈力卫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742 - 1

---

2018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frac{3}{4}$

定价:58.00元



丸山 眞男

新装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 2006 by Yukari Maruyama

First edition 1956-1957. Enlarged edition 1964. New edition 2006.

First published by Mirai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Miraisha Publishers Ltd. .

中译本据日本未来社 1964 年版本译出



## 国内编委会

主编 王仲涛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晓秋 卞崇道 叶渭渠 刘德有 汤重南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克申 何培忠 张明国 周维宏 谢跃 翟新

## 国外编委会

主编 刘迪

顾问

加藤周一 大西健夫 小口彦太

编委

陈力卫 林少阳 吴卫峰 崔保国

## 编者序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日本尚未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人们的眼界，中国史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就予以记载，不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文字资料。其时，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光耀世界，领袖东亚。古代日本举国一致，倾力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文字、宗教及典章制度等，曾几何时，便为一文明国家，故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并非过言。中世纪时日本仍旧关注中国，继续吸取中国文明，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却很少学习、研究日本，及至江户幕府，日本行闭关锁国之策，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几至中断。

千余年来，两国的交流与相互研究的这种不均衡，固然与中国为东亚文明中心，而日本处于边缘的位置有关，但也和两国朝代更迭，对外政策变化频繁不无关系，此可为前车之鉴。

19世纪以降，西力东渐，近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传到亚洲，日本得风气之先，仿效西方，断行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东亚最初的近代化国家。同时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参以本土文化，成就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日本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日本败亡，日本的思想、学术摆脱了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桎梏，焕然一新，百花齐放，硕



果累累,并涌现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学者或思想家,为世界所瞩目。

反观清末以来的中国,列强肆虐,国将不国,仁人志士痛定思痛,欲效仿日本,实现近代化,救国于危亡之中,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留学,攻读近代法政、科学等课目,归国后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图变的新风。虽然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近代科学,但也将日人的社会科学、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而对日本的研究则出现了黄遵宪这样的大家。但当时中国形势动荡,加之战祸频仍,故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既未能形成规模,也没有构成体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方兴未艾,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空前昌盛,蔚然大观。但与译介欧美著作相比,对东方各国,包括日本的学术著作的译介相对薄弱,这是中国对日本整体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其研究远不及欧美的原因之一。中国是最先知道日本的国家,而今却落人之后,不能不使有识之士为之扼腕。

商务印书馆自开馆以来,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百年来倾力移译各国学术著作,积累丰厚。其中,所译日本各类书籍不下百余种。但囿于时代与环境条件等,许多名著未能译出,尤其是日本古代的思想学术著作少之又少。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欲翻译出版日本古往今来之社会科学经典名著 150 种,尽其所能将日本学术精萃尽收网罗,差可弥补往日翻译之不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次大量翻译、引进日本学术名著不仅可借鉴其理论及方法论,开拓我国学人之识见,且可较为深刻、系统地了解日本历史、国家、社会、民族及目前的学术状况,俾使中日两

国人民加深互相理解。

本丛书所选原书皆为经典名著,且译者也为各相应领域中的专家,每种书前均有专家导读,注释亦求详备,一般读者当会因此获益。

本丛书虽规划为 150 种,但随着学术进步及今人眼光改变,难免再做补充。我们志在使这套丛书尽善尽美,少留或不留遗憾,为此呕心沥血,在所不辞。然自谓才疏学浅,汲深绠短,不免疏漏错讹,如蒙方家指正,则不胜荣幸。

王仲涛

刘 迪

2005 年 12 月



# 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

——序中文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柄谷行人

丸山真男作为一个学者，在日本思想史和政治史方面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家，终身投入到活生生的政治舆论场上。上述这两个方面互不可分，本书内容也充分显示了这点：它汇集了作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约十年间发表在杂志上的有重大反响的论文和评论，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意识，虽然并没有那么系统地组合在一起，而丸山自己，则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之、追求探索之。

这些论文的写作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51年，当时日本正处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占领统治之下，当然实际上是由美国来占领接管的。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到处都在赞扬美国的民主主义，而同时日本共产党也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但这一状态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苏对立的日益加深而销声匿迹了。第二阶段是日本从占领统治下获得新的独立并迅速恢复了经济生产，随之民族主义也开始复兴。

比如，曾列为战犯的岸信介当上了首相，他所推进的政策正是要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为军事同盟。所以，1960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成了空前高涨的市民运动。

丸山的各篇论文正是应对这一政治状况而写的。因此，在第一阶段，他主要考察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第二阶段则主要论述了战后美苏对立下显露出来的政治及文学问题。这些论述在当时分别给予人们以强烈的印象，展示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意见的可能性。

第一阶段里之所以就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批判是因为战后开始的一系列审判和反思。我们知道不仅在日本国内，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军”在德国和日本都开设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战争犯罪，即著名的德国纽伦堡大审判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这些情况相互交织，烘托出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战前的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对此，当时的意见大体分为两种：一是从美国式的民主主义的观点来批判法西斯主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相互勾结的产物。

但是，丸山的看法明显不同于这些观点，比如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一文中，他首先注意到德国法西斯与日本法西斯（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不同之处。丸山认为纳粹主义是从魏玛民主主义中“自下而上”的革命。与此相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亦即是由天皇制和军队及国家官僚组建的绝对主义体制所导致的，也就是由于民主主义欠缺的结果所产生的。这一分析并不是说要赞赏纳粹主义，将之视为民主主义的产物。丸山只是想要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以免其被掩盖在



一般的法西斯主义批判之中。

在“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一文中，丸山关注到以下几点：德国纽伦堡大审判中纳粹领导人都对其行为承认自己所负的责任，而且申诉自己的正当性；但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本的战争领导人从不主张自己的正当性，当然也就不承认自己的责任，只是强调一点：听从了天皇旨令而已。而天皇也说，受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立宪君主制的制约，自己所处的地位没有直接下命令的可能。天皇得以免除东京审判的理由正在于此。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日本的那场战争就谁也不去担负责任了。丸山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制”。

如果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这样的话，那么将之单纯地解释为出自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或者当作封建制的残留所引发的问题都是无法解释得通的。应该将之作为更为根深蒂固的日本社会的特性，从思想传统上来审视之。实际上，丸山在本书里阐述的各种问题，之后又从历史的角度更为深入地再次加以追问。反过来说，丸山后来就日本思想史所展开的论述，许多问题都是由这本书中他自己考察的问题作为出发点引发出来的。

第二阶段，也就是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美苏对立和日本经济复苏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状况和问题，丸山将视点倾注到大众社会的一些现象上来。迄今为止，他一贯是在共同体与市民社会这一对比上，即人们是属于某一共同体，还是作为一个自律的个人(individual)，在这一比较上来考虑问题的。这可以说是他的基本出发点，在追究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同之处时也是如此。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他就法西斯主义问题开始导入了新的视点。

那就是,他观察到了另一个侧面:在大众社会,亦即个人既不属于共同体也不属于市民社会时,法西斯主义是由四分五裂的原子化状态产生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国魏玛时代尽管有民主主义,但还是产生了希特勒独裁体制,那可以说是因为已经是大众社会了。而且这一点也可以对应战前的日本。尽管当时实际上还处于半封建的社会,但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扩大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也已经呈现出大众社会的种种现象了。

在大众社会里,原子化的个人是无法自律的,他们不断要受到媒体的影响和操纵,而且原子化的个人也不能仅仅躲进自己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不时地还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后来丸山这样写道:

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也就是说他们为摆脱孤独和不安而焦虑,正因为此,这种人才会全面归依权威主义的领导,会全身投入那种国民共同体、人种文化之永存这一观念所表现出的神秘的“集体”中去。

(“种种个人类型的析出”,《丸山真男集》第九卷)

从农村共同体出来的人们,在城市里不是作为市民,即一个有自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浮游于其中。工人阶级也基本相同。这便是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hotbed)。而这种状态,不光是在丸山写这本书的当时,而且现在也仍然处在进行之中。即使达不到战前法西斯主义那种程度,类似的现象随时随地



都可能发生。

一般来说,市民是指城市居民,或不属于劳动阶层的中产阶级。所以,提倡市民运动的丸山的想法曾被人视为基于西方个人主义的市民主义,也被批评为知识精英主义。但是,丸山所说的市民不单是指城市居民或个人主义者,他说的市民是指可以与他者自主地构成一种社会关系(结社)的个人。

在欧洲,自立的城市都是始自各种工商业者之间结成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不单是原子的个人的集合,而是始于个人之间结成的组合。由此才能产生民主主义。在日本,城市是原子的个人的聚合,也就是说,那里没有市民社会,也就产生不了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并不单单建立在议会选举上,或集会的喝彩之中,它只有以每个人的自主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换言之,民主主义并非是由一定的制度和某种状态所保证的,它实际上是通过“不断革命”的过程得以实现的,即要不断地更新个人之间结成的自主的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民主主义并非只终结于议会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主主义在某种制度上的表现而已。但是,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看到一个完全体现民主主义的制度,人们至多只能谈论某种程度的民主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不断革命”才是真正符合民主主义这个词的。

(丸山“追记”,《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  
1964年,第574页)

1960年的反安保斗争中，丸山用以鼓舞市民运动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顺便插一句，我在那年刚刚进入丸山执教的东京大学，也参加了这场斗争。）但是，当时丸山被学生运动组织者们轻视为“市民主义者”，在这之前也被旧左翼批判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到了60年代末，他又成为新左翼攻击的对象，被说成是具有特权的进步的自由主义派教授。更有甚者，到了80年代又遭到后殖民主义者的攻击，说他是民族主义者。但是，那些批判没有一条是看清了丸山所处的背景，以及所经历过的体验来说的。

丸山实际上所从事的研究，并不是市民主义或自由主义之类，而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早在他1934年进入大学时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分为两派，一派称作讲座派——政治上属于共产党（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另一派称作劳农派——政治上属于劳农党（战后成为社会党左派）。前者的名称缘于他们刊行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1932—1933年）。

劳农派将明治维新视为资产阶级革命，维新以后的日本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主张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的共产党系的讲座派则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绝对主义国家，在先于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必须要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以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也就是要打倒天皇制、地主制。即所谓的二次革命发展阶段论。

讲座派的观点只不过是將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生搬硬套到日本，亦即对共产国际理论的一种盲从。在1927年时，立宪君主制已经形成，而且普通选举法也已成立，不去针对当时紧迫的社会问题，反而首先高喊“打倒君主制”的口号，简直是愚劣之举。由此招

来的只是镇压,而且被广大群众所孤立,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思想转向者。对此,劳农派倒是在议会政治中从事合法活动。两派并非敌对关系,非合法化的共产党员也有作为劳农党员参加选举获胜后当选议员的例子。

劳农派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某种意义上又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天皇制、地主制等封建残余的制度会自然消灭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从日本社会的“政治、观念的上层建筑”来进行考察。之后,劳农派中虽然也产生了以宇野弘藏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是,除了经济学领域之外,特别是在历史学和文学领域倒是讲座派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共产党遭到破坏并出现了大量的转向者,但讲座派提出的问题反倒在以后一直是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留下来了。

丸山一直对讲座派抱有关注。哪怕是他们被镇压被消灭,这种关注依然未变。讲座派的理论中,值得瞩目的是关于以天皇制为首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残留的各种“封建残余”,他们试图从地主制等经济基础来对其加以说明,但以受挫告终。但是,他们的失败可以说再次给人以契机追问:天皇制到底是什么?说得再通俗一点,那就是留给我们了这样一个课题:观念、政治的上层建筑的维度虽然根本上受制于经济基础,但它本身也具有相对自立的构造,所以必须阐明这一点。

比如,历史唯物论认为,国家就是统治阶级所持有的一个暴力装置,但仅靠暴力又无法维护持续性统治。权力在基于暴力的同时,也基于服从者的积极同意。所以,其固有的问题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无法还原到经济基础上来。丸山努力在思考这一点,对他

来说“政治学”就是从经济基础上来观察分析相对自立的政治上的层面。而且,那是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也就是与思想史的问题意识相重合。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丸山一直在思考讲座派引发出来的问题。本书的各篇论文都是先导入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卡尔·施密特,以及美国的政治学、心理学来加以阐述,所以,丸山也被视为只是倚仗西方得来的新知识的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被批判为以西方为典范来寻找日本的缺点的那类近代主义者。但是,这些批判实际上都没有说到点子上。他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出自对讲座派的关注,他在同法西斯的斗争中一直独自思考着这一问题。

我们看丸山的工作,应该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比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埃里希·弗洛姆)等做一比较,他们在马克思主义运动败给纳粹后,从其体验和反省开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他们为了阐明败给纳粹主义不是靠经济基础能够说明的那一部分因素,导入了迄今为止被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遭排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丸山当时无缘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关注弗洛伊德。但是,他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考察正可以说是应对了下面这段弗洛伊德的话: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不在于它对历史的见解,也不在于它的以此见解对未来的预测,而在于它深刻理解了人类的经济状况对学术、伦理及艺术反应的影响。因此,它乃发现了从前完全为人忽略的整个因果关系。然而我们不能假定经济的动机是决定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不同的个人、种族及

国家在相同的经济状况下有不同的行为,足见经济的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原因。我们不能理解的是研究活人的行为如何能忽略心理的因素呢?不仅这种因素与经济基础的建设有关,而且即使人受这些条件控制时,也只能动员其原始的本能冲动——如自存本能、攻击本能、爱的需要、求乐避苦冲动等。前次演讲曾侧重超我的地位,因为超我代表古代的风尚及理想,并有时抵抗新的经济情境的压迫。<sup>①</sup>

但是,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丸山在日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被视为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问题上,只是被认为单纯地吸收了欧美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新动态。然而,丸山的真髓并不在此,我们只要看看下面两点就一清二楚。第一,他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论述鲁迅的竹内好和写过司马迁的武田泰淳这些文学家,这也意味着丸山始终是把中国挂在心上的。第二,当那些批判他的左翼们统统转向后,或者1990年,随着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理念遭到根本质疑的时候,丸山的姿态都没有过一丝动摇。他一贯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但他将之称为“民主主义”。那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也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前面讲到过,那是要创造出一个自主的、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的联合体。而且,那是要在“继续革命”中完成的,丸山真男是毕其生涯都在探索思考之的思想家。

---

<sup>①</sup>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译文据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4页。



# 目 录

## 第一卷 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

第一章	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3
第二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	25
第三章	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	83
第四章	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	129
第五章	日本的民族主义·····	149
第六章	“现实”主义的陷阱·····	169
第七章	战前日本的右翼运动·····	202

## 第二卷 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与共产主义的抗争·····	217
第二章	拉斯基的俄国革命观及其变化过程·····	244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诸问题·····	266
第四章	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291
第五章	“斯大林批判”背后的政治理论·····	327

### 第三卷 “政治性的内容”及其界限

第一章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	381
第二章	人与政治·····	403
第三章	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	422
第四章	权力与道德·····	446
第五章	支配与服从·····	466
第六章	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	477
第七章	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	500
第八章	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	512
原版后记	·····	550
增补版后记	·····	554
译后记	·····	559

# 第一卷

## 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



# 第一章 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 1

长期以来迫使日本民众处于压抑状态之下，并向世界发动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其根源究竟在何处？同盟国方面常用超国家主义或极端国家主义<sup>①</sup>这一概念来笼统地加以表述。但究竟其内容和实质是什么，似乎尚未得到阐明。现在大家关心的问题则多集中在造成这种极端国家主义的社会原因及经济背景上，而对其思想结构及心理基础，无论国内外，都还没有作为专题来研究分析。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过于简单，反过来也可以说是过于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它不具备概念性的框架，只是以空喊“八纮为宇”“天业恢宏”<sup>②</sup>等口号的形式出现，似乎根本不值

---

① 原文用片假名标注：超国家主义(ウルトラ・ナショナリズム)、极端国家主义(エクストリーム・ナショナリズム)，即英文的 ultra nationalism 和 extreme nationalism，本译文中为了避免误解，多采用极端国家主义一词来表述。——译者

② “八纮为宇”为日莲宗信者田中智学在大正二年三月十一日的国柱新闻上发表的“神武天皇的建国”一文中首先使用，后理解为由天皇来统一和征服世界之意。“天业恢宏”即弘扬天皇的大业。这两句一般多用于赞美天皇，奉行皇道。——译者



#### 4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得去认真理睬。纳粹德国好歹还有《我的奋斗》《20世纪之神话》这类反映其世界观的体系之作，日本在这点上相形见绌，但是并不因缺少这类公之于世的权威基础，我们的极端国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就显得很薄弱。正相反，这种意识犹如一张无形的网，牢牢地套在我们民众的头上，至今人们仍未完全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如今，民众的政治意识之低绝不单纯是外部权力机构所造成的，问题在于一种心理机制渗透到这种权力机构，并将民众的内心及行动疏通到一定渠道上来。它并不具备明确的理论框架，思想体系也是纷繁杂乱，因而很难把握其全貌。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八纮为宇”式的口号只是蛊惑宣传而不予理睬，恰恰应该要通过这些只言片语和实际表露出来的形态来探讨其潜伏在深层的共同意识。这么做绝不是出于什么好事者的自虐，非要刨根问底地去追究我们本已惨痛的过去。然而，“要拉开新时代的帷幕，总是要对既存现实本身究竟如何展开争论”（拉萨尔）<sup>①</sup>，不愿做此努力，民众精神的真正变革便无法实现。因此，只有来一场精神革命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革命。

以下所述与其说是对上述问题的解答，莫不如说是提示出问题的所在及其所涉及范围的广度，也就是提供出一个大的思考框架吧。

---

<sup>①</sup> 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1825—1864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译者

## 2

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为何我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前要冠以形容词“超”或“极端”呢?正如近代国家被称为国民国家一样,国家主义是其本质上的属性。而近代国家所共同具有的这种国家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该如何区别呢?人们会立刻举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这些特征,但在国民国家形成的初期阶段,凡是信奉绝对主义的国家,哪个不是赤裸裸地进行对外侵略?19世纪末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武力扩张和膨胀不断激发民族主义的内在冲动。如果说我们的国家主义仅表现为这种冲动更为强烈,表达方式更为露骨的话,那么只有在这种对外扩张和对内压制的精神动力中找出其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才能真正赋予其超级的含义。

欧洲的近代国家,如卡尔·施密特<sup>①</sup>所说,最大的特色是中性国家(Ein neutraler Staat),换言之,就是对真理、道德的价值判断持中立的立场,这种价值取向和判断本应专由其他的社会团体(如教会)乃至凭个人的良心去做。而国家主权的基础本应置于不受这种价值取向影响的、纯粹形式上的法律机构。众所周知,近代国家是在继宗教改革后,经16、17世纪漫长的宗教战争逐步形成的。围绕着信仰和神学的无休止的论争,使各宗派逐步放弃了从政治上来贯彻自己信念的道路;另一方面,绝对君主们打着神授王权的旗号想从内容上标榜自我统治的内容多么正统,面对顽强的抵抗,

---

<sup>①</sup>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年),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译者

## 6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也不得不将其统治的依据转移到维持公共秩序这一表层上来。因而,在形式与内容、内部与外部、公与私这些关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思想、信仰、道德层面的问题被当作私事得以保障其主观的内在性,而公权则被纳入带有技术层面的法律体系中去。

然而,日本在明治以后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从未显示过这种国家主权的、技术上的中立性。其结果是,日本的国家主义无处不将自己的统治依据强加于某种内容价值的实体之上。江户幕府末期,来日本的外国人无一不指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精神上的君主——天皇和政治上的实权派——将军这一双重统治下,明治维新后的主权国家成功地将后者及其他封建势力的多元统治归纳到前者的一元化统治之中,因此,也不存在要求掌握内心世界的教会势力。不久,自由民权运动澎湃兴起,这种民权论与当政者之间的抗争,如政府主张:“以陆军及警力之威来震慑左右,以凜然之态度对付下面,使民心颤栗。”(岩仓<sup>①</sup>建议),这并非围绕着由谁来决定真理与正义的价值判断的问题,而只是就个人乃至民众的外部活动范围和界限在争斗,即上定君权,下限民权。于是,作为现代人前提的道德的内在化问题,便在自由民权论者那里被轻描淡写地打发掉了。这一点在那位自由党干将河野广中谈自己的思想革命之动机一文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约

---

<sup>①</sup> 岩仓具视(1828—1883年),日本政治家,“王政复古”的推动者之一,即将权力从幕府手中交还给天皇。对日本皇室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影响明治维新的发展。对国政国宪提有很多建议,统称岩仓建议。明治四年(1871年)率使节团出国考察各国文物,史称岩仓考察团。——译者

翰·密尔的《自由论》，他说：

在马背上读到这本书时，至今所养成的汉学国学式的思维——那种动辄就提倡攘夷的思想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变，除了忠孝道统外，其他过去所有的思想被击得粉碎，同时也知道了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利之可贵。

（《河野磐州传》上卷，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在确立主体自由的过程中，最先应遭到抨击的“忠孝”观念，在这里却毫无疑问地首先从其脑中轻易地“剔除”了。这种“民权”论必然会被埋没在最初萦绕着的“国权”论之中。在这一论争中，个人的自由终究未能伴以良心之介，所以，国家权力本身未能意识到形式上的妥当性。因此，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集之前颁布的《教育敕语》<sup>①</sup>，即可以说是公然宣称一种理念：日本国家作为伦理的载体，是唯一具有价值判断的决定者。

果然，没多久，贯穿明治思想界的基督教便与国家教育发生了冲突，那正是围绕着《教育敕语》而惹出的一场喧嚣之争，其深远意义在于，国家主义从此开始频频登场。这场论争虽然随着日清、日俄两场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欢腾振奋的热潮而不知不觉地烟消云散，但其中潜在的问题却丝毫未得到解决，对峙看似偃旗息鼓了，其实不过是基督教方面一直在回避。在日本，信仰自由本是没有

---

① 由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于1890年10月30日颁布。它是日本明治政权表达自己教育理念的经典之作，其主要目的在于重视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为日本所固有，故成为国家主义的一个支撑点。——译者

存在空间的,直到今年(1946年)年初天皇下诏,否定了自身的神性为止。不光是信仰的问题,当国家在“国体”中垄断了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时,学术、艺术的自由自然亦无从谈起,除非依附于这种价值判断的实体,而且这种依附绝不是外表的附随,而是偏于内在的。主张为国家的艺术、为国家的学术,其意义不单是出于国家的实用性所需,核心部分在于判断什么是为国?而且这一判断的最终决定者是那些尽忠于“天皇陛下及其政府”(官吏服务纪律)的官员们。黑格尔曾说过:“内在自由、主观存在的要素是不能进到法律层次上来的。”与这种尊重主观内在的观念相悖,在我国,国法只要是从具有绝对价值的“国体”中衍变出来的话,那么即可将自身的妥当性建立在内容的正当性上,由此便可以毫无阻碍地渗透到任何一个精神领域。

所以,在尚未自觉到国家秩序的形式特征时,本来概不存在国家秩序所捕捉不到的任何私有领域。在日本,个人从未被明确地承认过。就这一点,《臣民之道》的作者说:“通常我们称作私生活的一面,毕竟是臣民之道的实践,臣民所赞誉的天皇大业其本身具有公的意义……(略),所以我们在私生活中也要归终于天皇,不忘为国效劳之念。”这种意识形态并不是随着集权主义的流行而出现的,而是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日本的国家构造之中。因此,私即恶,或近于恶,它总是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负疚感。营利或恋爱等更是如此。这么一来,个人的私事得不到明确的认可,人们便想方设法将其与国家意义相联系,以便从那种负疚心理中得到拯救。夏目漱石的《从今以后》中有一段代助和其嫂子的对话:



“今天为什么又挨训了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也算是服了，爸爸那种尽忠国家的劲儿，居然从18岁到现在一直如此。”

“所以才会那么有作为呀！”

“为国为社会效力，要是都能像爸爸那样赚钱，我也愿意。”

（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这里，遭到夏目漱石辛辣讽刺的代助之父不正是日本资本家的样板吗？这种“荣华之道”（野间清治）与国家主义联起手来将近代日本推向发展的同时，也侵蚀腐蛀了日本。“个人”的伦理不存于自己的内部，而是与国家合为一体，这一逻辑反过来说就是国家体制的内部，会无限地侵入私人的利害关系。

3

国家主权在垄断了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后，国家行为（作为国体）便拥有了维护其正统性的独有准绳。因此，国家的内政外交就可以不受超越国家意志的那种道义上的制约。这样说来，人们也许会立刻想起霍布斯之流的绝对主义，但实际上，彼此截然不同。“不是靠真理，而是靠权威来制定法律”，霍布斯的命题中的权威是纯粹的现实判断，不包含任何规范的价值取向。只有掌权者才能决定是非善恶，而他们似乎不是要实现以往存在的真理和正义，这是一种海中巨兽式的国家（源出《旧约》），也就是说只要将法的妥当性与掌权者的命令这一形式相结合，就能开拓近代法的实证主

义之路。例如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家也是霍布斯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嫡系，在那里，正统性（Legitimitat）最终是消融于合法性（Legalitat）之中的。

然而，如上所述，我们的国家主权绝不甘于这种形式上的妥协，国家行为之所以不服从超越国家意志的道义准则，是因为当权者的决策并非是从“无”做起的，当权者自身便体现着绝对价值。由于这一价值取向常被称为“古往今来真善美的极致”<sup>①</sup>，所以，道义只有在这一国体的精髓自中心波纹状地向世界扩展时才可能存在。所谓“施大义于世界”的大义，既非存于国家行为之前，又非其后所定，它总是与国家行为同步存在的。本来国家应该是为实现大义而行动的，但其同时的行为本身却被视为正义。“胜者为王”的意识形态与“正义必胜”的意识形态相互微妙地交错之处，正暴露出日本国家主义的逻辑特征：日本帝国本身便是“真善美的极致”，本质上不可能从恶，所以，任何暴虐的行径、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这一立场也可以从伦理与权力的相互渗透的角度来说明。国家主权是伦理及权力的最终源泉，两者的交融统一之处在于伦理的内在性无法施展时，便不断会产生向往权力的冲动。伦理不是出自个性的深层，而是直截了当地从表层的运动咄咄逼来。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正是这类运动的典范模式罢了。

从前面提到过的基督教和《教育敕语》的问题，到神道祭天古

---

<sup>①</sup> 荒木贞夫：《皇国的军人精神》，第8页。

俗说，尾崎<sup>①</sup>的共和演说乃至天皇机关说<sup>②</sup>等问题，一旦议论到国体，便立刻演变为政治问题，动辄形成某种政治上的对立。“明徵国体”不是自我批评，几乎总是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手段。对此，纯粹的内在的伦理总是被宣告“无力”，继而因无力而被视为无价值。无力在物理上是指没有鼓动人的能力，在伦理上理想上也是一样的。而且，对伦理的评价并非基于其内容的价值取向，而在于其有无实力。换言之，是看其有无权力背景。说到底，这种倾向就意味着伦理的最终判断在于国家一方，这一点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让我们来看下面一段文章：

我国的决心和武威使得它们（主要指国际联盟，丸山注）无法做出任何制裁的决定，我国一旦脱离之，国际联盟的真面目就将暴露于世，德国同年秋天也追随我们脱离了，其后，意大利趁埃塞俄比亚问题，抓住时机发出了脱离的通告，国际联盟完全成了徒有虚名的组织。因此，我国自昭和六年以来，始终迈步走在世界维新的最前列。

（《臣民之道》，着重号由丸山所加）

这篇文章的基调，一方面是露骨地嘲笑国际联盟的无力制裁，同时对意大利会巧妙地“抓住时机”隐含赞赏。国际联盟的“真面

① 尾崎<sup>①</sup>（1858—1954年），政治家，日本宪政史上重要人物之一。——译者

② 天皇机关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美浓部达吉提出的一种企图削弱天皇权力、提高议会作用的主张，认为天皇只是国家机关之一，天皇并不等于国家，国家主权不属于天皇个人，天皇只是依据宪法行使国家主权。——译者

目”也好，意大利的行为也好，作者均未依据其内在价值来做判断，而只是从其实力及策略的巧拙来加以评价。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类“教学”的大本营——文部官僚们的道义观。这样一来，在伦理为权力所替代的同时，权力的显现也不断为伦理一方所中和。那种公然宣称马基雅维利主义，大胆蹂躏小市民道德的言论，尚未从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嘴里冒出。这也说明，政治权力只要将其基础构建在极端的伦理实体上，那么政治所附带的恶魔般的性质就不会以上述形式直截了当地得到默许。

这一点在东西方表现得截然不同。托马斯<sup>①</sup>早就指出，德国人中潜在的看法是：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残忍的。而日本人是达不到这种透彻的认识的。我们这里既缺乏那种对真理和正义坚贞不渝地追求的理想主义政治家，同时也找不出像恺撒·博尔吉亚<sup>②</sup>那样具有某种无敌气概的英雄。既没有温文尔雅的内在气质，又没有咄咄逼人的权力欲。所有一切看似喧嚣不已，同时却又小心翼翼。从这一意义上看，东条英机可以说是日本政治的象征。这种所谓权力的矮小化不仅反映在政治权力上，大凡所有以国家为背景的一切权力的支配都具有这一特征。

比如，我们来看看这次战争中的虐待俘虏问题（战场上的残暴行为且当别论，后面再谈）。在读到有关收容所里殴打俘虏的审判报告时，我感到奇怪的是被告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诉说他们是如何

---

① 托马斯·曼(Paul Thomas Mann, 1875—1955年)，德国小说家。以小说《布登勃鲁克一家》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

② 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 1475—1507年)，15世纪至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活跃的军人、政治家。——译者

致力于改善收容所的设施等,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为了苟且偷生而做的诡辩,肯定在他们主观意识中,确实是相信自己努力改善了俘虏的待遇,他们只是在改善的同时还加上了拳打脚踢。慈善举动与暴虐行径不经意间并存,由此可见伦理与权力的微妙交叉。经历过军队内务生活的人都会体察到这类事例,在他们那里,权力的行使并非基于心理上强烈的自我意识,而是基于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因此,当他们失去了对权威的倚仗,返回到具体的个人时,他们竟是那么脆弱、那么令人悲哀!所以,在对战犯的审判中,土屋脸色煞白、古岛<sup>①</sup>当众号泣,而赫尔曼·戈林的表现却是哄笑。关押在巢鸭监狱里的赫赫有名的战犯中,又有几个能表现出后者那种傲然不逊的态度来呢?同样是虐待,德国则更冷酷更“客观”,他们将俘虏的生命当作医学实验的材料来全面利用。这种虐待至少不是我国的“典范”。他们的行为当然也是以国家为后盾的。然而,他们与被虐待者之间,不如说是一种近似“自由”的主体与某件东西(Sache)间的关系。日本则与之不同,归根结底是一种优越感的问题,也就是有一种认为自己相对地更接近天皇这一极端价值意识的存在。

而且,正是这种与极端存在(天皇)的距离感,成了运转整个国家机构的精神动力,也构成了各自之间的权力支配。不管是官僚,还是军人,制约其行为的至少首先不是合不合法的意识,而是一种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更为接近绝对价值的存在。国家秩序若认

---

<sup>①</sup> 土屋,据查当时为一中尉,长野县人。古岛,不明身份,疑指古岛一雄(1865—1952年),明治大正期的政治家。此处拿二人与纳粹头目相比照,遭到后人的诟病。——译者



识不到自身的形式,就谈不上合法性的意识,从而也就认识不到法律是以抽象的普遍性来一视同仁地制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在以天皇为巅峰的权威等级制度下,法律只是一种具体的统治手段而已。所以,遵纪守法只是上对下的要求。军队内务条令规则繁缛,地位越高适用得越松,越往下越严格。众所周知,正是帝国官吏们最为肆无忌惮地践踏刑事诉讼法的检举、拘留、预审等制度,他们只着眼如何加强和保持具体的支配关系,为此,别说是遵纪守法,他们对检察当局反复训示的就是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的“细枝末节”。所以,这个国家社会地位的价值标准与其说是在社会职能上,莫如说是在对天皇的距离远近上。尼采曾用“距离的激情”(pathos der Distanz)来说明所有贵族的道德特征,而在我国,只要有与“卑贱”的人民相隔距的意识,仅此一点就等于与最高价值的天皇拉近了距离。由此更强化了与人民隔距的意识。

这样看来,华族<sup>①</sup>的矜持之处只是作为“皇室的藩屏”,而天皇亲自领导的军队统帅权的独立则是军队的生命线。因而,制约统治阶层日常道德的既不是抽象的法的意识,也不是内心的赎罪感,更不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观念,而是对天皇的一种具体的、感性上的亲近感。其结果当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倾向:将自己的利益与天皇的利益一体化,将反对自己的立马看作是对天皇的侵害者。这种意识过去确实潜在于藩阀政府对民权运动的憎恶乃至恐怖之中,而且,至今仍在所有特权阶层中一脉相承了下来。

---

<sup>①</sup> 日本华族是明治二年(1869年)以后为了安抚各藩的藩主及旧臣所设的贵族制度,后又将对国家有勋者列入新华族,将已经降为臣籍的旧皇族称为皇亲华族。二战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取消了这一制度。——译者

## 4

对本职工作的自豪感与其说是基于横向的社会分工意识，莫如说是出于对纵向的绝对价值的一种直属意识，由此产生的种种病态在日本的军队里几乎表露无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可以说军队竭尽了所有的教育方针来集中培养出此类自豪感。比如，首先就说“军人是国民的精华，是其主干部分”（军队教育令），将军们被安置在国家的中枢部门，军人对“地方”人的那种优越感不是别的，正是基于那种皇军意识，因为直接归属天皇，所以理所当然地不单是在地位上的优越，而且保持着一切价值取向的优越性。

例如，据荒木贞夫男爵说，社会上认为军队出身的人往往过于正直，“这种评价反过来说就是社会上的道德水准与军队相比有着相当的差距，对军队出身的人来说，当今的社会生活倒有许多难以适应的地方”（《皇国的军人精神》51页，着重号为丸山所加），所以要求军人去净化社会上的风气，努力使之与军人的精神融为一体。然而，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国民看到的军队道德水准与一般社会的“相当差距”却与荒木贞夫男爵所说的完全相反。另外，据我的一位友人说，他是作为大尉军医长期服役的，几乎所有专职军医都认为军医的学术水平要比所有“地方”医院、包括大学的水平高得多。可这位秉性淳厚认真的病理学家却说，事实完全相反。这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的膨胀，不仅存于军队与“地方”之间，军队内部也一样存在。例如，“作战要令”中有这样的话：“步兵是军队的主力，是

诸军种协同作战的核心。”我在朝鲜接受新兵训练时，几乎每天都要背诵这些，至今，当时一个上等兵训斥我们的话还留在耳边：“知道吗？步兵是军队的主力，在军队里是最伟大的，要不然咋叫‘军队的主力’呢？你知道军队不光是陆军，还包括海军呢！”当然，也许他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但从这一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有一种心理倾向贯穿在军队教育之中：它煽动部队与部队之间、中队与其他中队之间、内务班与其他班之间的优越意识。同时，它既要求下级士官摆脱“士兵根性”，又要求将校军官超越“低级士官习气”。

这次战争使军队声名狼藉，那种无可救药的唯我独尊和本位主义正是出自这一土壤。不光是军队，贯通于整个国家机关的本位主义常常被打上“封建的”烙印。其实不仅仅如此，封建的割据源自一种使人自我满足的封闭世界，这种本位主义在各自领域里又分别与绝对权威保持着纵向联系，以给自己增添附加价值。于是，其内心不断有一种冲动：要将自己与最绝对的实体融为一体，这样便带上了较之封建性更为激烈的“侵略”性。军部的动向正是最有力的证明，他们自己只是盘踞在统帅部的城堡内，却以全民总动员之名义干涉国家的所有领域。

如此，整个国家秩序便呈现以天皇这一绝对的价值存在为中心的连锁式结构，自上而下的统治依据是跟天·皇·的·距·离·成·正·比·的，在价值逐步稀薄淡化的地方，独·裁·观·念反倒难以滋生，因为独裁观念本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那里却从上到下都不存在这种无拘无束的个人。所有人以及社会集团的关系都是不断地受另一方的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另一方。人们常常指出战时军部官僚的独裁及其专横霸道的行径，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将作为事实

或社会结果的独裁与意识中的独裁混为一谈。意识中的独裁必然要与责任的自觉相联系,但这一自觉却鲜见于军部及其官僚身上。

无论起因如何,纳粹的头头们对决定二次大战的开战有着明确的认识。然而,我国发动了这么一场大战,却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发起了这场战争。大家都觉得是被什么东西鬼使神差,不由自主地举国卷入到了战争的漩涡中去。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意味着什么呢?我国的不幸不单是因寡头势力左右着国家政治,更为不幸的是,这些寡头势力丝毫没有这种意识和自觉。各类寡头均由只会唯命是从的个人所组成,同时,这些势力本身即便成不了极端的权力,却依附在绝对实体下各自相互依托,构成一种并存的状态——像一个德国人所说的并立国(Das Land der Nebeneinander)一样——不容否定的是,这使得主体的责任感更难以确立。

在第八十一届议会众议院战时行政特例法委员会上,喜多壮一郎<sup>①</sup>就首相的指挥权问题质问东条英机:“是否可以解释成独裁?”对此,东条首相回答道:

人们常说独裁政治,请将这一概念明确一下……(略),我东条只是一介草莽之臣,和您毫无不同,只是我被授权总理大臣,这点不一样,这是受天皇陛下的光照才会闪亮的,没有陛下的光芒则近乎石头一般,有了陛下的信任,身居此位才能发

---

① 喜多壮一郎(1894—1968年),大正、昭和时期的法学家、政治家。大正十一年任早稻田大学教授。专攻国际法。昭和十一年由民政党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译者

光闪亮。这和被称为独裁者的欧洲诸公迥然不同。

(昭和十八年(1943年)二月六日朝日新闻速记,着重号为丸山所加)

作为大权在握的首相的发言,这段话极富有暗示意义。它坦陈了一个小心谨慎的臣子的心境:既有上述那种因亲近最高权威而沾沾自喜的得意和优越感,同时又最为直接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威下的精神重压。

于是,因为缺乏那种自由的主体意识,于各自的良心中又不制约自己的行动,只听任上一级(即距绝对价值更近的领导)的摆布,便出现了这种现象:独裁观念难以形成,取而代之的是靠转嫁压抑来保持精神上的平衡,这种压抑自上而下依次转嫁,愈演愈烈,构成一个维持整体平衡的体系。可以说这正是近代日本从封建社会继承下来的最大“遗产”之一。“自开天辟地之始,此国所奉行的人际关系的标准”就是对权力的偏重。福泽谕吉的下面一段话巧妙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他认为:

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利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而又骄矜于彼。(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略)这恰如借钱给西邻而向东邻索还一样。<sup>①</sup>

---

<sup>①</sup>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译文据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1页。——译者

这里，人们会立刻联想到军队生活，而实际上这是遍布于日本国家秩序中每个角落的行动法则，只不过在军队中更为集中地体现出来而已。近代日本靠着权威和权力的一统化，把封建社会的权力偏重重新组织得井然有序。而现在，当日本登上世界舞台的同时，这种“转移压抑”的原理便沿用到了国际事务中，明治维新刚结束就冒出了征韩论，紧接着就是出兵台湾等，这些都是幕府末期以来身感重压的日本趁国家统一之机，跃跃欲试地尽快模仿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小小的尝试。不能否定这里面有“借钱给西邻而向东邻索还”的心理。具有启示意义的是明治以后至今的外交活动中，对外强硬论肯定是由民间提出的。而且，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的惨痛的事实是，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在中国、菲律宾的残暴行为，直接下手的都是一般士兵。其责任所在姑且不论，在国内他们可都是“卑贱”的人民，而在军队里，即便是二等兵，一旦奔赴战场，就作为皇军与绝对价值保持了联系，处于一种无比优越的地位。这些在军营或市民生活中无处转嫁压抑的人们，一旦处于优越地位上，其重压就会一举迸发，仿佛为某种爆发性的冲动所驱使一般。这本不足为奇，他们的野蛮行径不正是这种乱舞下一个可悲的纪念碑吗？（当然，战争末期出自战败心理及复仇心理的暴举又当别论）

从极端国家主义来看，天皇是权威的中心实体、道德的源泉之一。那么这种仰仗上级的价值取向的体系中，天皇不就成了唯一具有主体性自由之存在吗？近世初期欧洲的绝对君主从中世自然

法所定的支配性契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将自己从秩序的拥护者上升为执行者时,正是作为近世史上最初始的“自由”人格而出现的。而明治维新时期,则是将精神上的权威与政治上的权力相结合,结果造成了一种朝着“神武创业之祖绩”的返祖现象。天皇自身是一绝对价值的实体的话,那么天皇就绝不是从无到有的价值创造者。天皇承万世一系的皇统,靠皇祖皇宗来统治,连钦定宪法也不是由天皇的主体性来制定,只是在诏示一种“统治的洪范”。于是,天皇的背后便具备了一种可以上溯远古的传统权威。天皇的存在与这种祖宗的传统不可分割,皇祖皇宗整个形成一体才是内容价值的绝对体现。如果以天皇为中心划一个同心圆的话,在其周围每一等距离上便会呈现一幅万民翊赞的景象。但这个中心不是一个点,而应该是一条垂直贯穿的纵轴。由中心无止境地向外辐射的价值取向,正是由这一纵轴的无限性(天壤无穷的皇运)来保障的。

至此,我们所描述的极端国家主义的构造就逐渐展露出其全貌了。离中心实体的距离是价值判断的准绳,当把这一逻辑推向世界时,便催生出“万邦各得其所”的世界政策,由“万国宗主”的日本来确定各个国家所处的身份秩序才会实现世界和平,“天皇的威光照遍世界才具有世界史上的意义,其光芒无疑是以皇国武德之显露而得以实现的”<sup>①②</sup>。所以,旨在一视同仁地制约万国的国际法之类,在这绝对的、中心实体存在的世界上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

① 佐藤通次《皇国哲学》。

② 佐藤通次(1901—1990年),德国文学专家,编有《德日辞典》并译有多种文学作品,曾任亚细亚大学教授和皇学馆大学校长。丸山此处所引《皇国哲学》当是《皇道哲学》之误,该书由朝仓书店于1941年出版。——译者



“遵循御国之道，皇威光照世界时，国际法之类将不复存在。”<sup>①</sup>山田孝雄博士在讲到肇国神话的现代意义时说：

如果将两千六百年前的事实切成大树的断面来看，那肯定是在中心年轮上……所以神武天皇的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现实存在的。<sup>②</sup>

这种说法真可谓是“纵轴(时间)的延长即圆(空间)的扩大”这一极端国家主义逻辑的巧妙表现。

“天壤无穷”保障了价值取向的范围不断扩大，反过来说，“皇威武德”的扩张又加强了中心价值的绝对性——这种循环往返的过程自日清、日俄战争以来，经过满洲事变、卢沟桥事变<sup>③</sup>，直至太平洋战争为止，一直呈螺旋状上升之势。所以，1945年8月15日这天，不仅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了句号，同时将新的命运交给了日本国民。只有在以极端国家主义为一切基础的国体丧失了其绝对性的今天，国民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由的主体。

(1946年)

### 追记：

该文执笔于1946年，即战败翌年的3月；发表在当年创刊的《世界》杂志5月号上，在收入本书的论文中属最早期的作品。这

---

① 《中央公论》昭和十八年十二月，座谈会“赴难之学”。

② 《中央公论》昭和十八年九月，“神国日本的使命和国民的觉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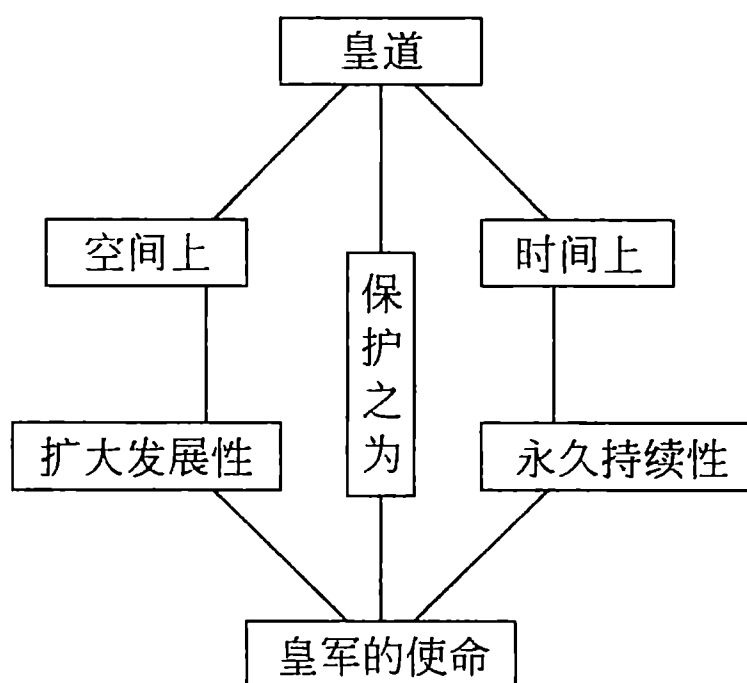
③ 原文为“支那事变”。——译者

次虽改为新式假名表记,但文章及风格还是颇显陈旧,且将问题点极度压缩后呈现给大家,因此,怎么看都不是一篇容易懂的论文。尽管如此,该文一经发表立刻有评论登载于当时还仅是单张的《朝日新闻》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这可能与当时国民精神上的紧张气氛以及读者积极的精神状态有关吧。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战争结束后涌现出的对天皇制国家构造的批判大多是站在共产主义,至少是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展开的,自然多聚焦在经济基础的问题上,或是仅止于“政治上”的揭露。这类文章泛滥且给人以千篇一律之感,而本文从精神结构角度的分析在当时显得格外新颖罢了。这一角度的尝试于我来说并无任何“范本”(我当时对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象征论以及媒体论全然不知),经过各种尝试后,最终不过“铸造”出了一些不太完美的表达和范畴。这种视角和文中所举的资料现在看来虽已毫不稀奇,但就我个人来说,这篇论文仍留下了值得怀念的记忆。

当然,本文描述的日本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构造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抽象,我着眼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发展到极限的这一形态,试图将其产生的各种契机尽量有机地定位在明治以后的国家体制之中。所以,一概舍去了诸如日本天皇制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立宪主义的要素和绝对主义的要素之间的关联等问题。我的图示是否过于出自个人的想象,这有待读者批评指正,但这种“抽象”本身对我后面写的关于检测战后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分化现象的论述绝非没有意义。

另外,后来我才发现:昭和八年(1933年)每日新闻社协助陆

军省制作的电影《非常时期的日本》(十二卷)中,以荒木陆军大臣的演说为背景,展示出一幅皇道构造图来,这恰好是与本文结尾部分所说的“理论”完全一致,列在此处仅供参考(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纪录第四十一号)。



不过,我还是期望读者不要仅以这篇论文就断定我是个无视明治以后日本国家的发展,乃至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思想中的进步因素和世界共性,而仅凭“前近代性”和“特殊性”来覆盖一切的论客。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十月在历史研究所主办的讲习会上我做的题为“明治国家的思想”的讲演(收录于《日本社会的历史探讨》,岩波书店),以及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二月号《中央公论》上刊载的“陆羯南——其人及思想”一文,虽仍不够充分,但都阐述了这一时代的积极因素。

如果说本文的“抽象”过于片面,那我虚心接受,但对有些人(比如以津田左右吉博士为代表)认为天皇制精神构造的病理不过是“非常时期”的狂乱所带来的例外现象这类主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苟同。就这一重大问题,这里权且引用黑格尔《历

史哲学》中的一段话来替我作答吧：

那种(中世教会)腐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并不是单纯地滥用力量和权威。一种腐败的局面常常被指称为一种“滥用”；它的意思仿佛是说，事物本身是没有缺点的，但是那种热情、那种主观的兴趣，简单地说来，就是人类那种偶然的意志已经利用了那种在本身是好的东西，来推广它自己的自私目的，因此，对症下药，只要把这些贪求私图的因素消除干净，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在这种看法之下，那个事物本身就避免了责备，那种玷污它的罪恶也显得只是外在的。但是假如一件好事情当真是偶然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也只限于个别方面。至于一种广大普遍的腐败风气，影响到一个规模宏大的事物如像基督教会，那就又当别论了。<sup>①</sup>

---

<sup>①</sup> 中译文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中译本，王造时译，第 408 页。——译者

## 第二章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

### 1. 序说

今天我的讲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及运动”。我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就这一问题做结论，事先声明，要想从我下面讲的内容得到一个大的轮廓，一下子就能把握住法西斯的本质，那肯定是会失望的。在有限的时间里讨论这么大的问题，为了避免话说得武断，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先把问题限定一下。首先在分析法西斯主义时，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组织机构上的，即作为国家机构的法西斯主义；另一种是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我下面要谈的主要是后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及其思想。当然要想全面了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必须具体地、从组织上分析军部和官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基础，还有这一势力与日本的垄断资本是如何沟通一气的。这些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楚的，在此我们不去讲它。当然会跟这些问题有关联的，我们重点讲一下法西斯主义运动，所谓思想也是讲与其运动直接有关的，不准备泛泛地谈那些关系不大的法西斯主义式的思想。比如学术界、新闻界的法西斯

式的言论我们不予考虑，只谈谈法西斯主义运动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思想问题。

我们还得事先讲一下方法论的问题。一提起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马上就会问：什么叫法西斯主义？人们会问：“你张口就说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到底有没有纯粹的法西斯主义？日本有的应该是绝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你所说的法西斯主义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我当然是准备了答案，但这里不想早早披露。这话头一开，就容易说到整个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法西斯主义有各种定义，但这里没工夫去翻抖出来。虽说这样不甚严谨，我们还是从常识概念上谈起吧。

过去十几年我们称为法西斯时代，拿这种通常使用的常识性概念和内容分析现实时，会逐渐明确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内涵，反正我们这里不去对法西斯主义做抽象的定义。那么也许又会冒出这样的疑问：“你所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及思想的研究，怎么看都是次要的，最关键的不是应该分析国家机构及社会构造中的法西斯主义吗？”的确如此，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剖析法西斯主义的整体结构，但为此，我们不光要分析制度上的问题，对形成整体结构之契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我们也不能不加以分析。特别是作为国家机构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虽然已于8月15日崩溃瓦解了，但谁也不敢以此断定将来我国不会发生法西斯主义运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过去，与将来的问题加以比较之后，认真地去剖析之。

## 2. 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时代划分

前言说得有点太长了，首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进展过程呢？如果大体地划一下时代的话，我想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期，大约从大正八、九年（1919—1920年），正好是一次大战结束时到满洲事变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称作“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

第二阶段是成熟期，从昭和六年（1931年）的满洲事变前后到昭和十一年（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事件为止。这段时期，原只停留在民间运动上的活动，开始具体地与一部分军部势力勾结在一起，军部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推动力，逐步占据了国家的中枢部位。这期间还有被埋没了的三月事件、锦旗事件等，再有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士官学校事件、相泽事件，最后是震撼日本的二二六事件。这一时期法西斯的恐怖主义不断发生，可以称之为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的全盛期。

第三期比较长，以二二六以后的肃军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8月15日），这一时期可称作“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完成期”，军部作为来自上面的法西斯主义的打手，一方面与官僚、重臣等半封建势力，另一方面与垄断资本及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不稳定，却也建立起一个联合支配的体制。

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发生以及发展的事实经过。大家可以参看其他论著，如木下半治



的《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或最近《中央公论》上连载的岩渊辰雄的《军阀的系谱》等。<sup>1</sup> 这里我只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对上述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

首先第一期，一般常认为是以满洲事变为转折点，日本开始进入法西斯主义的时代，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满洲事变以前有一段相当长的准备期。比如我们看所谓右翼团体的形成过程就会知道，明治初年成立的“玄洋社”和承其脉络的“黑龙会”姑当别论，到了大正八、九年左右，接近法西斯主义的团体急剧增多起来。刚好是一次大战后主张民主的时潮兴起之时，同时也是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其主张变得过激之际，以大战后经济界的变动为契机，各种劳动纷争、农民纷争急剧高涨。在这一背景下，大正末期频频掀起了所谓对抗赤化的运动。比如大正七年（1918年）的“大正赤心团”“皇道义会”，大正八年的“大日本国粹会”“关东国粹会”，大正十一年的“赤化防止团”，十四年的“大日本正义团”纷纷出笼。这些团体虽各自有别，但每家都是针对左翼运动而挑起直接对抗，他们与黑龙会和其支流的浪人会等一起，主要对频发的罢工进行干扰破坏，或对左翼工会、农民组织以及水平社进行暴力袭击。不过这类团体对国内改造没有什么积极的计划，所以，说他们是法西斯组织，倒不如说是更单纯的反动团体。有很多既成政党的外围组织也加入其成员中，有趣的是其中心人物多是来自建筑行业，比如大和民劳会的创始人河合德三郎、大正赤心团的森健二等都是土木建设的头头，联想起现在建筑行业的动向，这倒是颇具暗示意义的。他们所高举的纲领纯封建性的色彩极为浓厚，比如大日本国粹会说：“本会是以意气而立、以仁侠为本领的集团”，大日本正义

团则高唱什么“头要有头样，卒要有卒样，小卒们本是一家兄弟，头头所指之处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兄弟相亲相扶又不忘礼让。”

当然更接近法西斯本色的运动也是起源于这一时期，比如堪称日本法西斯主义教祖的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创办“犹存社”就是在大正八年。而且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后来成为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也可以算作是犹存社的《我的斗争》。其纲领中打着“建设革命的日本”“联手改造运动”“解放亚细亚民族”等旗号，不像以前的团体那样只停留在单纯的反赤化运动上，而是将国内改造与国际主张连接在一起，明确显露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不久，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开始与北一辉对立，另与安冈正笃、西田税等于大正十三年组织了“行地社”。以后的许多右翼团体都是从“犹存社”“行地社”系统衍生出来的。右翼团体中势力雄厚的“建国会”也是于大正十五年由中心人物赤尾敏以及津久井龙雄、渥美胜等组织起来的，后来又加上神兵队事件的天野辰夫和前田虎雄。会长是上衫慎吾，顾问是头山满、平沼骥一郎。“建国会”的纲领中主张国家统治产业，某种程度上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是第一、二期的右翼团体的共同特征，相比之下“建国会”倒有点倾向资本主义。要问实际活动都干了些什么，无非是倾全力与无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当时共产党当然是处于地下活动，于是主要对象是与共产党只一线之差的劳动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专搞粉碎五一集会等活动。还有算不上重要团体的“经纶学盟”，也是这个时候由上衫慎吾博士和高畠素之结成。该团体与其说搞政治运动倒不如说带有浓厚的研究团体的色彩。反正在当时很引人注目，因为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办的。除此之外，还

不能忽视岩田富美夫的大化会(大正九年)。所以说早在大正七、八年时,就明显可见右翼团体的抬头。不仅如此,还应当注意满洲事变后频发的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动向,在事变前已经相当具体化了。昭和五年(1930年)在东京站暗杀浜口首相的佐乡屋留雄就是血盟团的成员,对这一事件也应与事变后的血盟团事件联系起来考察。还有以青年将校为中心的政变也发生在满洲事变的半年前,即所谓的三月事件——虽被湮没得黯淡不清,这是由当时的革新将校小矶、建川、永田(铁山)等为中心制订计划,由秘密结社组织“樱会”所聚结的陆军激进派和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组织一起行动,准备拥立宇垣大将成立军政府。——这一阴谋虽未得逞,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sup>2</sup> 满洲事变无疑是促发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决定性契机,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绝不是满洲事变后骤然兴起的。

接着是第二期,从满洲事变到二二六事件。不用说,在时代上这是一个完整的阶段。法西斯主义的急进势力于准备期间所蓄积的能量,在这一期间由于国内外的两方压力而一举爆发,在国内搞恐怖活动,在国外挑起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以及脱离国际联盟而引起的国际危机。法西斯主义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极为醒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对考察法西斯主义运动也是最重要的时期。所以用的材料最多的也是这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右翼运动尚未完全褪去凑热闹的好事者色彩,到这一时期则与军部特别是年轻将校勾结在一起,迅速膨胀,开始发挥其政治实践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在右翼运动史上开创新世纪的是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和大日本生产党的诞生。时值昭和六年

(1931年),满洲事变前不久。这时候才开始将零散的右翼运动汇集成一股更统一的政治势力,在这种动向以明确的形式出台时,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开始从那种消极的、单纯的反左翼活动中脱离出来,显露出一种社会运动的趋向。前者不用细说,是一心想把过去的犹存社系统、经纶学系统与老一派的玄洋社系统拧成一团,其命不长,但大方向不久又被昭和七年成立的神武会所继承。大家知道,神武会是以大川周明为会头,靠关西财界的石原广一郎的资金广泛吸收右翼分子,还得到军部的支持,搞得轰轰烈烈。后来的大日本生产党是以黑龙会为核心,主要网罗了关西的右翼团体,特别是在其基层组织拥有工会这点上,要比过去那种浪人的右翼运动更进一步。神兵队事件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党系统的人们所挑起的,说明了该党的实践性。第二期法西斯主义比较带有来自最“底层”的要素。从前面提到的“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这一偏左的命名可窥其一斑,再如其纲领也是明确高喊“我们掌握产业大权,打倒资本主义”;日本生产党纲领也是举着“根本改变亡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国家统管金融机关”“保障劳动权利”“确保耕作权”等旗帜。当然,这些主张与其运动的社会意义完全是两回事,恰好与好战的法西斯及纳粹党初期阶段所奉行的反资本主义纲领有着同样的意义。总之,这种过激的条文和口号到了第三期即便是条文也寻不见了,反过来也说明这正是第二期法西斯运动的特征。

与之相关联,这一时期第二显著的现象是出自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法西斯运动。首开其端的是社会民众党内部赤松克磨等掀起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久昭和七年四月赤松一派又与社民党

的片山哲、松冈驹吉等社会民主主义派分裂，与小池四郎、平野力三等共同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党准备会。与此同时，全国工农大众党中，松谷与二郎等也表示积极支持满洲事变，不久待安芸盛、今村等老斗士们离党后便与赤松、平野合流，结成日本国家社会党。另外与这些行动相并行却又稍有对立的是下中弥三郎的动向，他和佐佐井一晃、近藤荣藏、天野辰夫等共同组织新日本国民同盟，拜权藤成卿、鹿子木员等为顾问。纯右翼系统与社会主义系统的合流反映在这些成员上。合法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反对这种极端的法西斯化的人打着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法西斯、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统一战线，大同团结在社会大众党周围。但不久其内部又出现麻生久、龟井贯一郎等接近军部的动向，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浪潮逐渐渗透到无产阶级运动中去。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第三种动向是以在乡军人和官僚为主体结成的政治势力，对此没有时间详述。前者的动向最明显的是昭和七年以田中国重大将为中心结成的明伦会，在有名的美浓部博士的机关说问题时极为活跃，另外，等等力中将等与平野力三率领的农民协会于昭和八年结成的皇道会，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团体。

后者即以官僚们为中心的举动，当首推平沼男的国本社、安冈正笃的金鸡学院及新官僚为主的国维会等。这些团体虽然自身并不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但其中聚集了军部、官僚、财界等占领导地位的人物，所以自然而然地强化了一种统治阶级内部的横向联系，为准备第三期自上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全面铺开起了不小的作用，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

那么，我们看这一时期，右翼团体纷纷接踵登场，其中不少人

参与了神兵队事件、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引得社会注目，但结果是，这些右翼运动最终没能成功地聚结在一条强有力的战线上。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打开国难联合协议会（昭和七年）——拥护国体联合会（同年底）——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全国协议会（昭和八年）——爱国运动一致协议会（昭和八年）等等，右翼运动大同团结的尝试反反复复了几次，都不长久。有那么有利的客观形势，经几度离合聚散，最后还是没完没了的互相攻击。从意识形态看，也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向与纯日本主义的动向之分裂。如果从实践运动组织论上的分歧来看，那也可以视为大众组织论与少数精英论的对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更根源之处。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下面是第三期，从二二六事件到太平洋战争结束。

大家也许会认为把这一时期归在一起未免太长，太茫然不清。的确，在考虑作为国家机构的法西斯主义时，这一时期最为重要，日华事变、欧洲大战、日苏条约、日德意军事同盟、太平洋战争等决定日本命运的国际大事件对国内体制的法西斯化开创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元。这期间像近卫新体制运动、东条翼赞选举等作为标志来说，其意义当然是十分重大的了。尽管如此，着重考察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时，二二六事件仍是最大的分水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以二二六事件为转机，以往的那种自下而起的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至此宣告终结，日本法西斯化的路程已成定局，开始像德国、意大利那样不再采取法西斯革命或政变的形式。所以，以后的进程虽有各种曲折，但归根结底是既存的政治体制内部的再编，也可以说是一味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的过程。不过新体制

运动在这点上有点问题,作为重建国民组织它似乎多少代表了来自下面的要素。但这只是成立当初的昙花一现,马上遇到旧势力的反击,被改组为翼赞会,完全成为一种官方的、形式上的组织了。因此,太平洋战争以后的所谓东条独裁在剥夺政治自由这点上,其露骨的程度可以说真是空前的时代,但形成这一时代的条件已经在这之前充分准备,法西斯主义化的进展只是量的发展,与这之前的时期相比,在质上没有什么不同。<sup>3</sup> 东条独裁的记忆于我们都太清晰、太活现,所以容易陷入一种危险,过重地评价其历史阶段的意义。不注意这点,战后,当那些只声称反对过东条的、铁杆的法西斯分子,摇身一变以民主主义者的面孔出现时,只会蒙骗民众批判的眼睛。

下面我们将要进入对这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分析。首先看上层建筑的问题,即从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特征着手,然后逐步探究其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问题。

### 3. 意识形态上的特征

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为高涨的时期是刚才谈到的第一及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法西斯主义与现实的国家机构合为一体,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已无法成为主流。也就是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要求“革新”主要出现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其代表性的文献也多出自这一时期。所以下面自然要将主要考察对象放在这一时期法西斯主义运动所信奉的意识形态上。但这里,由于时间关系,我

们没法将这种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一一涉及。因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当然具有与世界共通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比如,排除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议会政治中的自由主义政治表现,主张对外膨胀,对军备扩张和战争的赞美倾向,强调民族神话和国粹主义,排斥全体主义下的阶级斗争,特别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这些举动都是与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所以我想没有必要就此意义论究。再如就这些具体主张的根底里所通用的方法论上的依据,东西方的法西斯主义也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大川周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施的以下批判: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是主义之争,而是站在同一主义上,只就其主义的实现范围所争。什么叫实现范围之争,纯粹的资本主义一方是要将物质财富的所有限于少数人,即被称为资本家阶级的少数人之间;而社会主义一方则要将物质财富分配给劳动者。一方是狭范围,另一方是广范围,都是要让他们获得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正是因为物质上置以重要价值,在经济上置以最大的价值,所以物质享受成了人的真正幸福,也就是人的目的在于拥有更多的物质,在这点上两者的想法是相同的。

（《日本及日本人的道路》）

所以,“不改变将物质置于人格之上的思想,即便推倒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也不可能期待有任何改善。”(出处同上)这种批判的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站在物



质主义的同一基盘上，所以社会主义也无法真正改变现代文明之弊病。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这种批判方式与纳粹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异口同声所说之处极为相似。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对物质主义高唱的“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实际上正是要将大众的目光从社会结构的根本矛盾上转移开来，别去要求现实结构的改革，只在人们脑子里变革、想法上变革就行了。所以法西斯主义最初登台时带有若干反资本主义的色彩，而最终是起着为垄断资本服务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潜伏在这里，但这一点又说不上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往下探讨。在此，我们排除法西斯主义一般所具有的性质后，再来看看哪一点是特别突出地表现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这里我们想举两三点来看。

首先第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家族主义的倾向。——家族主义这一口号特别在作为国家构成的原理上被高唱。日本国家构造的根本特质是家族的延长体，也就是表现为作为家长的、国民的“大本营”的皇室与其“子孙”构成的家族国家。而且不是单纯用于比喻，如社会有机体之说等，是以更实体性意义来考虑的。不单是作为理念、作为抽象的观念，而是在现实中告诉人们：日本国家作为历史事实一直保持着古代的血族社会。这一点特别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特征。家族国家这一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忠孝一致的思想早就是明治以后绝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并非法西斯运动所独有的。<sup>4</sup> 然而作为政治运动的口号强调“国体”的法西斯运动中，这一意识形态一贯是表现得最强烈。这一特征无论如何不是见于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主义中的，它是框范日本法西

斯主义的社会方式的重要一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的具体例子，比如日本村治派同盟的书记长津田光造说：

在日本的家族主义中，不是像近代西方文明诸国那样，将社会的基调置于个人权利的主张上，而是置于对整个家族的服务上。家族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或作为生活体其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而个人只是这一完整细胞的一部分或一要素。……这种家族主义的延长扩大即是我们的国家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也就是这种家族的民族结合体。而作为这种民族结合体的国家元首，其家长、其中心、其总代表就是天皇。

（《日本法西斯的现状》）

这个村治派同盟本来乡土色彩、农本意识就很浓，所以有其理由特别强调家族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中央集权色彩最强，且欧洲国家主义气味最浓的、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中竟也说什么日本是“有机的、不可分的一大家族”，所以这一点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处。的确，纳粹也有类似的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但绝不认为那是家族原理的单纯延长。称“血与土”(Blut und Boden)也不是什么家族观念，而是明确的公共的政治观念。所以，作为领导人的希特勒也不是什么家长、族长，而是公认的 Öffentlich(国家的)领袖。这样特别强调家族主义不能不说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日本法西斯主义作为“自下而起”的运动之所以未能直接成功也跟这点有关。

接着我们要指出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特征是农

本主义思想占极大的优势。由于着眼于地方农村的自治，抑制城市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所以，本来法西斯主义内在的倾向，即强化国家权力、由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权力向产业文化思想等所有领域施加强力统治的动向反倒受到牵制。这也是一大特色。比如，尽管大川周明在右翼中是西欧教养最深、所谓洋气十足的人，其与北一辉分裂后组织的行地社的纲领中也主张：

应该排除由崇外病模仿而来的工商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树立农业主义的产业立国政策。”“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由议会中心到自治中心、由偏重城市到振兴农村。

一方面的动向是日益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增强国家权限；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内在的倾向则是日本这一观念的中心不在国家而在乡土中。右翼中也因此分为两派：一派肯定工业的高度发展，主张加强国家的统制；一派则针锋相对地否定之，主张以农村为中心的纯农本主义。而且多数右翼团体中这两者杂然混在。其中最纯粹地代表乡土性的恐怕是权藤成卿，他因五一五事件而一跃成名后，于昭和七、八年开始搞农村自救运动，他的“自治民范”“农村自救论”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彻底的乡土主义，甚至表露出反国家主义的态度。

国家的统治自古以来有两种方针。其一是任其生活自治，王者只示以仪范与之感化而已。其二是王者亲掌一切，总理万机。前者可名曰自治主义，后者则名曰国家主义。我国

的宗旨完全依照前者，故古代东洋圣贤的理想全在此中。

国家主义是什么？其目的是划分一块以国家为集团的地盘，防御来自其他地方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或以其集团区域内的经济军事力量来凌驾于其他地区。所以为了掩饰其国家集团的权威，以民众为土木、为公费制造机械，将其所有组织置于统治上的便利，打着秩序法规下铸制民众的幌子，统治者掌握绝对的权威，将所有公吏置于特殊地位，以牺牲为最高道德，以堵塞所有思想的冒头。详尽地推究起其事理来，所谓国家主义与自治主义两者本质上迥然不同。

（《自治民范·后编第二讲》）

明治以来农村成了这一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主义的牺牲品，现在仍挣扎在景气停滞的最底层。“在这种不安的现状中，最为深刻的是农村。在我国，农村是国家的基础，是风俗习惯的根源。现在我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一半，且国土的大部分为其利用，国民的主食不用说，工业原料、商业物资的大多数也是靠农民的力量来创出的。”所以“以东京为首各地方城市的扩张打破了与农村的比例，高楼大厦再宏伟壮观，随着工商业的衰退，到处都收不付支，大多处于贫困交加的状况，这是什么征兆呢？”“从我们现在的地方自治的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明白政党政治的变迁、文武官的风纪等，再细回首过去，则完全是那种以普鲁士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官僚统治制度的僵化造出这种奇怪现象。”《农村自救论》

之所以引得稍详细了点儿是因为这里最能鲜明地代表立足于乡土农本主义立场的，反官僚、反城市化、反大工业的倾向。<sup>5</sup> 对

此，权藤成卿所树立的理想国家是与普鲁士的国家主义相反的，以乡土为基础的、自下而起的阶层秩序化的国家结构。因此，他对于“国家”观念，拿“社稷”来与之抗衡。这里甚至可以感觉到一种“农本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例如“世界如都归于日本的版图的话，日本国家这一观念也就不必要了。但是‘社稷’这一观念则不能排除。国家这个词是用于与其他国家共存的场合，是世界地图的颜色分配。而社稷则是应每个人的共存所需，先为乡邑集团，再为郡为城市，进而构成一国。各国可以撤去国境线，而人类只要存在就不可能减消社稷的概念。”（《自治民范》）这是最纯粹的农本主义，尽管不至如此，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或多或少都内在有反城市、反工业、反中央集权的倾向。而且这也可以说是明治以来日本主义乃至国粹主义运动的一贯传统。早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日本最初的国粹主义运动——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的日本主义中也表现出完全相同的想法。比如志贺重昂在明治二十一年他们的机关报《日本人》上刊登了致黑田首相的一封信。他说：

就你的施政方针没什么好冀求的，所谓日本前途的方针制定为《国粹保存旨义》正是如此。想来这种事你是最熟悉的，只是我等所希冀的是，在公务闲暇或公退后，你能带着猎犬游玩山野间的话，从莲田或古河车站下来，视察一下地方人民的惨状才是。至此你的感想有何？日本全国的财力能力都集中在东京，东京愈来愈极尽繁华，而地方日益匮乏，是东京的日本而非日本的东京。离开这些地方再去宇都宫福岛等县长官们所在地看看，那又是一个小东京，其县下或州内的财力

能力尽凑于此处。所以日本国除了一个大东京和几个小东京成立外,其他则不复为日本。呜呼,东京之繁华与地方之衰颓竟成如此。整个地方的民富而国始富,国富而兵强,穷尽地方民力之极,而冀望国富,国不富而兵强的这类宿愿可以说是本末颠倒矣。

如上,他们尖锐地指出了中央与地方发展不平衡,反对藩阀政府的普鲁士式的国家主义,高唱振兴农村和蓄养民力的口号。请注意他们攻击的“欧化主义”的实体内容正是来自国家权力的急进的资本主义化,其立论字字句句都是与权藤的论点相照应。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牺牲农业部分的基础之上,而且又与国权相结合的优惠资本为枢轴延伸而去,故工业的发展也是明显地不平衡。因此,明治以后,相对于中央的飞速发展,那些代表地方利益的思想,不断抵抗来自上面的现代化。重要的是这一传统也流入到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中去。这一点与俄国的人本主义者的思想比较一定很有趣。当然这种农本主义的倾向在右翼中也有种种调子,其中这种色彩最淡的、最彻底地强调中央集权式国家统治的,恐怕是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他主张纯粹的中央集权制,以强大的天皇权力为中心强力推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内容很多,如天皇发动大权一时停止宪法、解散议会、在国家改造内阁下进行政变,将个人私有财产限在百万元,其超过额没收归国家。土地所有也以时价十万元为上限,将资本金一千万元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将其各自归属于银行省、航海省、产业省、农业省、工业省、商业省、铁道省等所管经营。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社会主

义色彩最浓的方案,这在右翼思想中倒是例外的。与权藤成卿一起成为五一五事件思想背景的橘孝三郎的思想,反映在其“日本爱国革新本义”上。“众所周知,现今的世上,说白了也就是东京的世上,不幸的是那东京在我眼里只像是世界大都会伦敦的一个分店。反正随着东京的那种异常膨大,农村则步步被摧残,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而且从未有过今天这般歧视农民、忘掉农民的价值的时候。”这里面也同样流露出一种与权藤相同的,强烈的反中央、反都市的心情。橘孝三郎赞颂与土地结合的生活:“头顶暖洋洋的太阳,脚不离开大地,人世则永存,人类同胞相互团结,人世才和平,所以,土地的勤劳生活,不是人生最初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事实上,‘亡土则亡一切’,只有以农为本,国才能保以永在,对日本,这一大事更是特别不得不如此。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离开土地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爱国革新本义》)

这里展示出一种类似托尔斯泰主义的田园赞美。当然,橘的立场没有权藤那么彻底反城市化、反工商业主义,他一方面还认可大重型机械工业。“我绝不是说忽视大型机械工业或大商业,我只是主张要在厚生经济原则上,为建设国民共同自治社会的新日本这一大目的而统制、管理大型机械工业,同时不能让其机械地延伸扩大,使其生产力狂增至世界规模,由此立刻制造出我们所期待的新社会、振兴新文化、梦想世界史的大回转这种最危险最错误的境地。”(出处同前)

最后这点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对此,橘所主张的理想社会是“王道的国民协同自治组织”。即以地方分权为基础的共同体国民组织来控制产业。可以说是北一辉型与权藤成卿型的

折中。这种折中态度是与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之点，这点把法西斯主义的主张从理论上弄得支离破碎，同时又弄成一种空想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大日本生产党”的建设纲领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方针是由否定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组织从而树立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组织。其差异是站在资本主义上，还是社会主义上，但其内容无疑是中央集权。相信在这意义上贯彻大日本生产党的政策的建设大方向在于彻底的自治主义。说是自治主义绝不是意味着国家中央机关的全然无力化。既重视国家统制，又不想采取因为统制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形态。自治主义的奥妙（？——丸山）正在此处。……而且大日本生产党对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历来的态度是断然否定。所以大日本生产党在采用自治主义的同时，又采用与之不完全矛盾程度的国家统制。”（《改造战线》第八号）这种似懂非懂的说明正是日本法西斯的标准形式。也就是说，世界共有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高度的权力集中和强化国家统制，这种倾向到了日本，被农本意识所歪曲，呈现出这样一种复杂的形态。但是，这种农本意识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中处于优势，决不单纯停留在法西斯的观念上的浪漫主义，不能忘记其具有极为切实的社会基础。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如前所述，昭和五、六（1930—1931年）年急剧变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原因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恐慌，在日本首当其冲的是以农业恐慌席卷全国。袭向日本资本主义的恐慌所形成的最大压力，当然体现在构造上最为单薄的农业部门。昭和五年是所谓的丰收饥荒年，十月的大米市场下落至16日元，生丝同年六月跌到670日元，成了明治三十年来的最低值。东北



农民不堪言状的苦境每天登载于报刊,对我们来说,记忆犹存。法西斯运动的激进化、昭和六年后连接不断的右翼恐怖主义活动,其背景也正是与农村这种困境有着直接关系。

比如开其先河的血盟团事件中,小沼正在暗杀井上藏相(财政大臣)后,对审讯官申述说:“农村的状况惨不忍睹,这都怪前藏相的做法不好。”(东京朝日昭和七年二月十四日)在五一五事件的辩论中,谈到被告思想时,也说道:“属于统治阶级的现政党、财阀及一部分特权阶级均已腐败堕落,互相勾结,谋求私利私欲,埋头于党利党略,轻视国防,紊乱国政,使国家威望失坠,国民精神颓废,并导致农村经济的疲敝,中小工商业者的穷困。”作为国内问题,他首先举出农村的疲敝。特别是这点成为陆军青年将校激进化的直接动机,因为他们多出身于中小地主或农民,而且士兵的精髓正是农民,特别是东北农民。从这点看就比较容易理解。五一五事件的陆军方面被告后藤映范在法庭中陈述道:

“农村疲敝是有人心心病的病根,渔村一样,中小工商业者也一样……军队中也是农村兵素质好,东北农村兵是皇军的模范。出征士兵在生死关头,其父老却饥荒,有后顾之忧,是十分危险的。财阀拥有巨富却不顾东北穷困的人民,肥私欲。而东北人民的小学子弟则连早饭都没有吃就去学校,家里吃烂了的马铃薯。这种状况,如果一日舍之不顾,军队就一日置于危险之中。”这最清楚地说明了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真是如苏峰所云:“农村是陆军的选举区”,所以,农村的贫困,正好给陆军以重大的口实向政治领域进发。

然而,这种农本意识占优势的日本法西斯主义与现实的要求

明显有矛盾,现实中的法西斯主义要扩充军需生产,改成以军需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随着法西斯主义从观念上降回到现实地盘上来,农本意识也就化作一种幻影。这正是右翼势力,特别是军部意识形态上的悲剧的命运。比如,第六十九次议会上村松久义议员这样提问:“从广义的国防所需来观察之,无疑是要急切解决农村问题。……为应付非常时局而引起的军费膨胀,吾等本来也应在其必要的限度上予以认可。而且,我们也一直常赞助的。但问题是其结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军品的性质要大大依赖重工业,所以,经费主要流出于工商业方面,一方面大兴军需工业,进而又使经济跛行,形成财富与资本的大城市偏重和大工商业主偏重的原因。今天考虑到将来国防费还要增加,在认识到军需费带来财富的城市集中这一事实后,若不施以手段矫正之,军费将益发膨胀,农村将更为疲敝,必将陷入削弱广义国防的矛盾。军方首先是否认识到这一事实:军费助长了财富及资本的大城市偏向。如果认识到这点,该如何矫正之,以达成广义的国防。为此希望予以确切的答辩。”

寺内陆相对此答辩道:

就农村的惨状,从广义国防的观点来看,军方当然是十分关注的,……现在部队所在地,或军需品制造厂所在地等关系上,军费的使用多集中于城市,这点我承认,但基于工业发展的现状,这又是不得已之事。但从军方来说,只有在执行预算时,即使多少忍受些不便(受点委屈)也努力致力于农村贫苦救济、中小企业的发展。

答辩得很勉强,尽管军部有这种主观希望,但现实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军需工业的发展,其负担进一步压到农村,而且对提供优秀壮丁的农村这么过度地重压,作为现实问题军方不能置之不理。对这一矛盾的难以掩盖的不安——直接影响到东条时代,一直到昭和十八年(1943年),在第八十届议会的“战时行政特别法案”的委员会上,羽田武嗣委员提问:“由于军需工厂而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皇国农村岂不危如累卵吗?”对此,东条首相的答辩如下:

我就此问题也正苦虑。站在农业本位的立场来说,一方面无论如何要保障四成的农村人口,这是我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特别是以战争为中心工业必然发展……这一协调实在难办。再难办我还是要坚持确保农村的四成人口,但是,还必须要提高生产,要保持这一协调,而且,尽可能不破坏日本的家族制度,又适当地取得双方的调和,我想这是必要的。然而,现在并非进行得很理想,因为必须加速扩大生产,要在各处建大工厂,所以当然要专职工人,而这些人不得不脱离农业到这儿来,所以没能照理想上进展,但我们会逐步地按照日本式地适当调和之,我想不是没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

在这苦心惨淡的答辩中,集中表现出了统治阶层的苦恼和焦虑:日本资本主义构造上的疾病与扩大生产力的绝对要求之间的矛盾,要将日本家族制度的地盘——农村,从这未曾有的全民总动员的怒涛中保护到底。这个问题当然与日本的农业经营方式、农

业生产力的问题相关联,重要的是农本意识随着历史毫不留情的进展在积极的意义上看已成幻影;另一方面在消极意义上看,随着与现实的渐渐脱节,扮演的角色是不断检点对工业劳动者的福利设施的关照。这是非常重要之点,纳粹也有“血与土”(Blut und Boden)这种说法,非常重视农民,制定世袭农地法想让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但再怎么说明纳粹如其名所示是劳动者党(Arbeiterpartei),纳粹最集中精力从事的是如何将工人阶级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势力影响中切分出来并将之纳粹化。在这一意义上,农民本来是形成纳粹运动的一翼的,但使工人纳粹化非常困难,对纳粹来说,最费心、最努力做的是把工人组织成劳动战线(Arbeitsfront),靠所谓的怀柔政策(Kraft durch Freude),使之成为纳粹的接班人(组成部分)。但在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中,工人始终比小工业者和农民要受轻视。来自比较“底层”的激进法西斯主义运动已是如此。上面引用的五一五事件的论告中也只有“农民的疲敝、中小商业者的穷困”而不提及工人。典型地反映第二期军部意识形态的小册子《提倡国防的本义及其强化》(昭和九年十月)——开头就是“战斗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这一著名的句子——在议会上成了争议问题的小册子,我们翻翻看,里面说“对国民生活来说眼下最大的问题是拯救农村山林渔村”,这完全是以“城市与农村的对立”这种图式来提出问题的。当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并非故意不言及工人,在说国民生活的穷困时,当然是包括了工人,但都一齐只提及农民和中小商业者,说明他们的意识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之低。二二六事件的指挥者村中幸次的手记中说:“必须下定决心,昭和维新也是以士兵、农民、工人的力量,不粉碎军阀官僚是实现

不了的。”(无题录)这是具体地言及变革主题的少有之例,而在此也是工人处于最后位。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世界既然如此,何况在现实政治体制中这种倾向更露骨地表现出来。在战争时期,工人的福利设施即使比起纳粹德国也是无以比拟的匮乏,这点众所周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日本法西斯的领导层里,对工人的评价,及精神上、肉体上的向上的可能性始终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悲观论。比如,在上述的战时行政特别法案委员会(第八十一届议会)上,河上丈太郎委员质问道:“农村是强兵之源泉,这点我亦不反对,但如果说工厂不是强兵之源泉,如果这样说有缺陷的话,我当然改正……,过去说起农村和城市一直认为是对立的想法,这一点必须破除;农村可以出强兵,工厂也可以出强兵,这样的态度我想今后是必要的。”对此,东条陆相做了很长的答辩,其中,“农村的强兵,工厂的强兵,从理想上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说很遗憾,至今的现状,从体格上来说,(工厂的)比不上农村的子弟,这样说或许招人生气,可从精神状态来说,也是农村的要坚强得多。我想这是不容争执的,日本工厂的工人就现在的事态下我想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农村要强兵,工厂也要强兵,以此为目标来讲,所有的施策的确正如你所说,我当然也想这样进行下去,但鉴于现状,遗憾的是还有一段距离,我想这是事实。”这一答辩的基本调子是对产业劳动者的一种悲观的见解。这里我们知道是农本意识在作怪,没能积极地把握住产业工人。这一点进而在征工的方式、宿舍、惊人的低劣工资,对此事的漠不关心等方面表现出来。这样不久便明显地带来了征工的大量的不良化。最后只能用观念性的激励演说和严肃主义的结合来庇护之。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德国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具体而清楚地表现在日本的“产报运动”和纳粹的 *Kraft durch Freude* 之别上。<sup>6</sup> 当然纳粹也并不是将工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作为其根本的想法。给工人的休假,让他们高高兴兴地一年一次汽车旅行,其意义归根结底是想靠这种做法让他们不去正视现实的压迫机构。这且不论,反正对工人阶级的关心程度和福利设施上,日德法西斯主义的差距之大是无法比较而论的。当然这也与彼此的资本蓄积程度有关,想多发工资遗憾的是没有东西,但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对工人表达得不那么痛切,特别是招工时,那种恶劣的待遇似乎是理所当然似的。这正可视为农本意识的一种反映。当然要注意的是绝不是农本主义独自的原因,更根本的是两国间存在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差异。在法西斯主义体制的民主的粉饰程度方面,纳粹不管怎样是有十一月革命的经验,已经接受过魏玛(宪法)(1919年)民主主义的洗礼,这一点带来了决定性的差异。

日本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特征,是基于所谓大亚洲主义的亚洲各民族的解放这一问题。就此我们不去深入探讨。日本法西斯主义中,从自由民权运动时代就争论的课题是解放亚洲民族,并一直强烈地有着要从欧洲的压力下解放东亚的动向。这一点几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取代欧洲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的思想相交织在一起(参见“从东亚协同体论到东亚新秩序论的展开”)。日本是在东洋首先达成的近代国家,而且是可以制止“欧洲东渐”的国家。从这一历史地位来看,日本的大陆发展的意识形态始终带有解放东亚的侧面。当然越往后,这一侧面只是强化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单纯粉饰这一意义。这一方面并非完全消失,只要我们注

意一下现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正发生的事，就会明白。我想这作为将来的问题是必须认真考虑之处。<sup>7</sup>

#### 4. 其运动形态上的特征

比起纳粹或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举出以上的特点。下面我们想谈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形态有何特征。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法西斯进展的推动力是军部及官僚之中既存的国家机构的内部的政治力，而所谓民间的右翼势力不是靠其自身的力量而扩张，而是前述的第二期，军部及官僚势力相结合才能成为日本政治的有力因子。这一点，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当然也是受到各自国家军部的支援，但总之，从国家机构的外面，主要靠民间力量的动员来占据国家机构这一点上有着显著的区别。这方面，我们在后面讲日本法西斯主义进展的历史特征时再细说，这里我们想谈谈所谓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从血盟团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的运动形态里所见的显著特征，即这种运动的实际承担者始终不具备大众组织，而且对组织大众不感兴趣，始终坚持少数的“志士”运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伴随着一种英雄主义，也就是“志士”意识在制约着其运动的大众化。例如橘孝三郎在《日本爱国革新主义》中这样说：“在此要大书特书，让大家铭刻心肝的事是这种国民社会革新是由遵天意走救国济民之路的志士们所开拓的。这种大事仅以一死来开拓之的志士们毋庸赘言，在任何时候于数量上不可多求，然而由天意而选出的得以执行天意的志士散在于各个阶层，这也是事实。”“呼吁革

新者应首先献身于国民而立。只有以死来奉献于救国济民之大道的志士们才能起来率领国民进行革新运动；国民大众也只有跟随这些志士。然而，在诉诸日本的现状时，首先你们这些军人要率先找出这种志士，而且响应其号召的首当其冲的是农民……这里故请大家深思并显示铁一般的决心。”橘就是这样煽动本来就是“短距离的激情”强烈的军人层的志士意识。

由于这种想法铺底，其自身的运动也是作为少数观念的理想主义运动来展开，并不采取动员、组织广大群众的运动方向。于是这同时又与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极为空幻性、观念性和无计划性等特征相结合。志士一马当先起来搞破坏活动，然后都好办，这种所谓神话般的乐观主义总是不断支配着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比如，血盟团的中心人物井上日召的思想，判决理由书上认为“废弃旧的组织制度是破坏，要立即否定；树立新的组织制度是建设，给以肯定，而且没有破坏也就不存在建设，极端的否定马上就是真的肯定，所以破坏就是建设，二者本是一体。”日召自己也在审判时说：“我认为没有体系化的思想较好，我超越条理全凭直感在活动。”他有意识地否定具有破坏后的建设的理论。而且，五一五事件是最初的比较有组织的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暴动。对起义的过程有过周密的计划。比如看海军方面第一期计划：首先第一组袭击首相官邸及牧野伯爵后，拥东乡元帅下戒严令；第二组袭击工业俱乐部和华联会馆后，拥权藤成卿入首相官邸进行国家改造；第三组袭击政友会、民政党本部后，打开监狱营救血盟团成员。计划订得如此周详，但具体进行什么改造，除了以权藤成卿为智囊以外什么都不明了。这一点，古贺中尉在法庭陈述中说：



我们首先想着破坏,我们没想做建设者,反正只要破坏掉,总会有人来建设的。所以指导理论也没什么,只想着下戒严令树立军政府。(中略)昭和五年十二月,与已故藤井少佑一起造访熊本的荒木中将时,荒木说必须用大和魂来打开国运。那时,我们信赖和敬佩荒木中将。到昭和七年陆军人事调整,当局的枢要机关如宪兵司令官、警备司令官等都换上了荒木系统的人,我们如果布下戒严令,成立以荒木陆相为首的军政府,就会进入改造的阶段。

(昭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东朝夕刊》)

这里仍然是基于“我们只管破坏,随后怎么都好办,总会有人来建设”的想法,所以至多只能计划到成立军政府。

而且就此海军方面的被告和陆军被告见解上有分歧,陆军根本没有想到靠海军的戒严令来树立军政府。例如石关荣雄补充说:“海军预想到戒严了,我们做好了讨死的准备,没想到海军那种结局。”此处,观念性的程度愈发增大,同一特征也反映在神兵队事件中。这是由爱国勤劳党的天野辰夫、前田虎雄,以及大日本生产党的影山正治、铃木善一为主,加上陆军方面的安田鍬之助中佐,海军方面的第二航空司令山口三郎策划的一场暴动,结果了于未遂。但我们看其第一次计划,很明显就战斗过程有详细的计划性。如,昭和八年七月七日上午11点起,动员3600名参与者,首先由空袭承担人(山口中佐)从飞机上对准首相官邸、牧野内府邸、警视厅投下炸弹,散发檄文,呼应地上部队袭击警视厅后,在皇宫前着陆,与地上部队合流。地上部队分为几队:一队持短枪、日本刀袭

击首相官邸；一队袭击牧野内府邸；一队袭向铃木政友会总裁及若槻民政党总裁；一队袭击日本工业俱乐部、社会大众党本部；一队闯入市内的弹药库夺取武器弹药。主力部队在袭击警视厅后，占领日本劝业银行，在此固守并做宣传，然后与全市的警察交战直至战死。这么周密的计划，最后仍以战死为结局。突出之处只是在战斗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计划性。

最后是“二二六”事件——这是在日本暴动史中少见的，规模最大、计划最周密、最有组织的一场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据后来的审讯和审判得知，这次暴动是想实现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的计划，但起义将校们异口同声否认之，例如村中孝次的《册心录》（狱中手记）中，站在“我们认为维新是以国民的精神革命为第一义，而物质改造次之，我们要坚持精神主义”这一立场，“我们同志岂能抱政治野心，甚至妄想自己心中描述的形而下的制度机构而铤而走险呢？”对“无建设的破坏不是太鲁莽了吗？”这种质问，他说“说什么建设，什么破坏，……破邪即是显正，破邪显正总是不可分的，是事物的表里，讨奸与维新怎能两立呢？”这又归结于前面井土日召的“理论”。而且，“苟且明大义正人心，无患皇道不兴”这种藤田东湖的“回天史诗”也多被二二六事件的被告们作为起义目的来引用。在与维新志士精神的对比中，三月事件以后的军政府树立计划和国家改造计划，乃至永田、东条等统制派的希特勒式、德意志式统制，均遭到泼口痛骂。<sup>8</sup>激进的法西斯运动形态就是这种空想的观念性的。在二二六事件中，动用 1600 名士兵，结果也只不过是斩了几个家伙的头就了了，这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点日德法西斯主义又有显著不同。意识形态上幕末志士那种，云井龙雄

之流的中世主义尚顽固存在,其结果也反映到运动形态上来。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全面否定民主主义的,但纳粹并非如此。魏玛式的民主主义遭到了否定,但一般的民主主义并不否定。且纳粹看来魏玛式的民主主义及英美的民主主义是犹太式的金权主义,而自己才是真正的德意志民主主义。诚然,这种说法借宫泽教授的话来表达的话,是“独裁政治理论的民主装扮”,也就是说在不得不装扮成民主主义之处,已说明民主主义在德国国民中已根深蒂固。希特勒坚决反对封建领主贵族的王政主义,是彻底的共和主义者。《我的斗争》之中将王朝式的爱国主义与爱祖国爱人民的爱国主义区别开来,嘲笑那种崇拜国家权力的人如同狗一样的崇拜,说“国家是为人民的,人民不是为国家的”,这种认识不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是不会成为理所当然的。这也从最初赋予纳粹运动以显著的大众特征。同样在《我的斗争》中,他说:“以往所说的泛日耳曼主义尽管作为意识形态是杰出的,但因不具备大众组织而遭失败。”纳粹正是这样将大众组织起来,靠其组织的力量夺取了政治权力。而日本“自下而发”的法西斯运动最终完于少数志士的运动,且甚为观念性、空想性、无计划性。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形态所见的显著倾向。当然,神话的要素和少数精英的思想是共通于法西斯主义的,但其程度的差异上几乎又有质的问题。

## 5. 其承担者的社会特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在社会上的承担者这点上有什么特征。——军部官僚是法西斯主义的推动力,这毋庸

置疑,这里问题不是指狭义的,而是指更为广泛的国民层次上,哪种社会阶层积极地赞赏并对法西斯主义的进展表示同情。

法西斯主义运动无论在何处都是以小资产阶级阶层为地盘,德国和意大利是典型的中间阶层的运动——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也是积极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支持者。当然亦有例外。日本法西斯运动大体上也可以说是中间阶层承担的,但对此要进一步做细微的分析。我国的中间阶层或小市民阶层必须区别下列两种类型:第一种阶层是小工厂主,街道工厂的头头、土木建设的承包人、小商店店主、木匠头头、小地主乃至中上农,学校教员,特别是小学、青年学校的教员,村政府的职员、干部,及其他一般的低级职员,僧侣、神官等;第二种阶层是城市的薪水阶层,所谓文化人或新闻界人士及其他自由知识职业人士(比如教授或律师等)及学生层——学生非常复杂,可分入第一第二两类中,暂且放入第二类。我们分析法西斯运动时必须区别这两类。

成为我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的正是前者。如果我们将后者称为(真正的)知识阶层的话,那么前者就可以称为假知识阶层或亚知识阶层。所谓造成国民之声势的是这种亚知识阶层。我们都是属于后一阶层的,但在日本知识分子中积极地表明,并明确地将反法西斯的态度贯彻到底的人其实比较少,多数是适应或追随了法西斯主义,但另一方面又绝不是积极的运动主张者和推动者,从总的看倒是对法西斯运动抱着厌恶的感情,甚至消极抵抗之。<sup>9</sup>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中非常显见的特征。翼壮组织最终也未能成功地笼络住薪水阶层。战时的文化主义的流行亦可视作第二类型的知识阶层对法西斯主义的消极抵抗。在德国和意大利,知识阶

层积极地高举法西斯主义旗帜，特别是大学生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日本有无这种情况呢？当然学生也参加了右翼运动，但那些学生在教养意识上倒不如说是属于第一类型的为多（大家知道，很少有日本这种地方，称为大学生的人实质上从头至尾有各种层次）。在这一意义上，知识阶层的知识阶层始终没有成为法西斯运动的承担者。这一点，与被卷入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旋风的程度相比，有天壤之别。东京大学一时也成立了学生会之类的组织，在运动形态上酷似纳粹的学生运动，尽管有那么多的客观形势所帮助，却几无发展，大部分学生持不关心或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之。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知识阶层的教养本是出自欧洲，没能像德国那样从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发现足以吸收知识阶层的東西。德国高唱国粹主义实际上是在颂赞巴赫、贝多芬、歌德、席勒的传统，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知识阶层的教养内容。日本没有这种情况。日本知识分子的欧洲素养是从头顶灌输的知识，也就是表层的教养，未能扎根于肉体或生活情感之中。所以这类的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缺乏挺身而出地捍卫自己内在个性的智慧和勇气。但不管怎样他们有欧洲式的教养，所以最终不能对法西斯运动的不振、文化性之低表示共鸣。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分裂与知识分子具有的散漫性、孤立性相辅相成，使得日本的知识阶层变得软弱无力。对此，前面所述的第一类型则实质上形成了骨干阶层，更富于实践性、活动性。而且他们在自己所属的工作单位，或商店、机关、农会、学校等地方小集团中都占据着领导地位。由于日本的家长制社会，制约了他们本来的“大众”思想和人格。正是这

些人对待下属——即其成员：店员、掌柜的、工人、工匠、泥瓦匠、佣人、小农等——爱摆出一副家长的权威来，这些人从日本的整体政治社会机构来看，显然是处于被统治阶层，生活水平不怎么高，生活方式也与其“部下”相差无几。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小宇宙”中，理所当然的是统治者，具有小天皇般的权威。亦即最小最可怜的压迫者。所以对一切进步倾向，即大众具有对社会、政治的发言权，由此而组织起来的方向，这一阶层是最顽固的抵抗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生活方式上与他们的隶属者最为接近，生活内容也非常相近，所以这些人直接掌握着大众，正如此，国家的所有统制以及来自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不是直接波及民众，而是要先通过这一层次，由他们再以翻译的形态传达给最底层的民众，即必须靠第一类层次为媒介。另外，这些“头头”“老板”们又兼任街道委员会、村会、农会或各种组织、青年团、在乡军人会的干部，是这些场所发酵的舆论的代理人。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说过：“任何专制政治其基础是人的意见。”的确如此，再专制的政治，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最低限度的自发性协助是无法存在的。于是在军国日本，正是这种第一意义上的中间层起着保证被统治者最低限度自发性协作的作用。实际推动社会的舆论也正在此层次，绝不是报纸的社论和杂志论文。新闻界的论调在日本动辄与国民相分离，追究其故，是因为它总是由第二类型的中间层来编辑，也就是过分夸大其动向。<sup>10</sup> 例如我们看昭和十年初的天皇机关说问题——这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进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差点儿断送了冈田内阁的命运。——那件事之所以弄成那么大的政治社会问题是因为成了第一阶层的舆论。在贵族院成问题

后,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的是因为在乡军人会抓住此事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运动。政府的态度甚至连军部的高层人士开始也只将此看成学术上的一种见解。其证据是当贵族院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大角海相说:“我国体之尊尚无此,议论本身就是诚惶诚恐的。但这不是有关学说的答辩,是作为信念来说的,请谅解。”而林陆相也断言道:“美浓部博士的学说已经年月,不会给军队带来坏影响。”军部和首脑们都没当回事。之所以成了重大政治问题是政友会利用其进行倒阁运动,与蓑田胸喜等民间法西斯一道鼓吹国体明徵,波及整个社会是凭借全国的在乡军人会的活动之力。在专家学者和文化人之间本不成问题,在官僚和法官之间也多半视而不怪、习以为常的学说,在社会上却被视为毫无道理的、不该有的想法,——再没有比这事件更能尖锐暴露知识阶层与一般国民之间的知识层次的隔阂。

总之,第一种阶层的中间层扮演的角色,正类似军队中下层军官的角色。他们实质上属于兵员,却带着将校的意识。利用这一意识去统率士兵是日本军队的巧妙之处。他们与士兵同生活,实际掌握着士兵。而将校则脱离“内务”。所以中队长掌握士兵必须先掌握这些下级军官。与此相同,不掌握第一阶层的中间层就无法掌握大众。这些地方的“小宇宙”的主人公,由何人、何种政治势力掌握则决定日本的政治方向。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一样。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阶层的中间层的知识、文化水平与第二阶层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水平有相当的差距。外国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这么大的差距恐怕是日本的一大特色。英国也好,美国也好,甚至连德国也该是更为密切相连的吧。——这两种阶层的教养之

差甚大,而第一阶层的中间层在教养上与他们部下的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连续性,大众的言论、感情、伦理与他们血肉相连,比起知识分子他们更能抓住大众。我把他们称为疑似知识分子,或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自己总是以一介知识分子自居。虽然是片段的、零碎的,他们凭着道听途说成了地方的博闻多识之士,特别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各种问题均持有己见,这一点与一般大众不同。理发店、澡堂或火车里,我们都会碰见这种人,对通货膨胀,或对美苏问题对周围的人高谈阔论。那些都是疑似知识分子,一问职业大体都是属于前述第一阶层的中间层。

对此,日本第二阶层的中间层在知识上、文化上是与一般社会相隔离的存在,比如什么综合杂志这种刊物,纯文学这一奇特的名称,岩波文化等,这些东西的产生都象征着知识分子的封闭性。比如《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同时登有非常通俗的话题和高级的政治评论之类,而那种杂志为何日本出不来呢?说是有岩波文化,可社会的“低层士官”们仍是属于讲谈社文化。这里就有问题。<sup>11</sup>于是乎,以这种层次的人来积极承担日本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当然比起德国和意大利来说就更低级、更带有荒唐无稽的内容。这种情况反倒成为使第二阶层的知识分子愈发消极的理由。德国等不用说,都是一流学者教授为纳粹打下理论基础。而日本呢?当然也有学者为法西斯当爪牙,但通常表面上虽不说,心理似乎总感到毫无意义、滑稽可笑。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最底层极为盲目狂热,大概是因为以这种层次为媒介的缘故,比如,竹枪主义的实际旗手就是这种地方领袖。军队的上层再无知也不会真相信拿着竹枪能对抗高度的武器。这再清楚不过了,靠强调这种竹枪精神来弥补物



质上的不足，首脑们当然是想拿此高招当策略来用的。但是，这一精神向下渗透到那些“小宇宙”的头头们时，便成了真格的了。真的用竹枪精神来指导，防空演习时不知干过多少滑稽可笑的事，我们仍记忆犹新，在某种程度上，有不少是因为这种中间层次出来的班长或组长太迂腐了。日本的战争指导中许多荒唐事都是出自这一地方（关东大地震时的自卫团也具有同样意义）。激进的法西斯暴动的关连者，乃至右翼团体干部中有多少都是出自小学教员、僧侣、神官、小工厂的头头、小地主，这点我们不一一例举了。总之，这关系到我们刚才说过的问题：法西斯意识里，较之工人更重视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不光是农村的领导阶层，就连城市的小老板们也大多是农村出身，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农本主义是他们的共同利害关系，而且，向中央提出“地方自治”要求也正适合这一层次的要求。所谓自治，是他们要求排除中央权力（官僚）对掌握地方霸权的小宇宙的干涉，对官僚主义和巨大财阀的反感，在这一中间层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与此同时，日本的国际地位，也就是日本在国际上感到总是一边头上压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一边又想在东洋社会以先进国家的面孔出现，处于一种既受人欺负，又欺负别人的立场。日本的这种地位酷似国内这一层次的社会地位。由此他们对日本的大陆进军有种内在的共感。感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压迫正如同国内巨大资本的压力一样。东亚各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令他们产生同样的心理作用，如同他们店里、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统治下的集团内的手下和部下的反抗一样，所以他们成了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的强烈的支持者。

## 6.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发展

最后我想说一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进展的方式上有何特殊性这一问题。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不像德国、意大利那样带有法西斯“革命”的性质。前面提到过,以大众组织形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从外面占领国家机构的方式到底也没有实现。——反倒是军部、官僚、政党等既存的政治势力从国家机构内部逐步酿就法西斯主义体制。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以为我们刚才讲到的那种民间右翼和激进的青年将校的动向在历史上无多大意义。来自下面的法西斯的动向——即激进的法西斯运动的每一次痉挛般的发作反倒成为一种契机,更加促进了来自上层的法西斯化。由统治阶层内部进行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军部官僚为中枢,以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能动力为跳板,一步一步地确立了自己的霸权。这点很重要,比如满洲事变后不久,发生了十月事件,这前后既成政党内部也开始法西斯化——安达内相的协作内阁运动的动静更为显著。当然,翌年的五一五事件给日本政治的短暂历史打下终止符,在斋藤内阁开始第一次出现军部、官僚的合同协作。而且,昭和八年的神兵队事件前后,军部的政治发言权更加增大;十一月,借九州陆军大演习之机,后藤文夫农相、荒木陆相和总参某部的主要将校组织起“农村对策联合协议会”,军部开始积极讨论农村问题。自昭和九年十一月所谓的十一月士官学校事件,经相泽中佐事件,到昭和十一年的二二六事件,这一连串的青年将校的革新运动,每发生一起,不管

当事者们的原意图如何,其结果总是导致军部上层的政治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其中最重要的转机就是二二六事件,这是多年来相继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暴动中,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从此以后,这种来自下面的青年将校和民间激进右翼组织为中心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后退,与所谓的开始肃军同时,军队内的“皇道派”势力竟被“统制派”或反皇道派联合<sup>12</sup>一举压倒,梅津、东条、杉山、小矶等取代真崎、柳川、小畑等获得权力的中心。这种新形成的陆军首脑层,其后在军队内进行了彻底的肃清,在镇压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同时,并以其威胁为借口对军外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并贯彻军部的政治要求。二二六事件后寺田大将入广田内阁时,从一开始就订下条件,拒绝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物入阁。同时,寺田陆相就任伊始,便发出露骨的法西斯声明:“庶民一新,打击自由主义,走向集体主义体制。”并修改选举法,限制选举,否定立法权的行政支配,提出将议会架空的政治要求。这种由上而来的法西斯化迅速扩展,压抑住自下而起的法西斯。北一辉、西田税或二二六事件的青年将校正是“狡兔死而走狗烹”的命运。这点只要比较一下五一五和二二六事件的处罚轻重就知道。五一五事件的军方被告都判刑较轻,陆军方面有后藤映范以下 11 名都是判 4 年徒刑,随后还有恩赦,昭和十一年全部出狱。海军方面被告处领导地位的古贺清志和三上卓判刑最重为 15 年,其他 13 年一名,10 年三名,2 年一名,1 年一名,也都逢恩赦于昭和十五年为止全部恢复自由。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结成团伙暗杀一国之首相,欲使帝都化为黑暗的这一事件的处理。而且五一五事件后,荒木陆相发表讲话,说:“这些纯真的青年做出这种举措,念其心情,不能不落泪,

不是为名誉私欲又不是卖国行为，而是坚信为皇国之利而干的。所以在处理本案时，不能单纯以小乘的观念来做事务处理。”同样，大角海相也说：“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纯真的年轻人犯下这种错误，每想至此便不由地肃然三思。”

由此可见，整个军部是多么同情这一事件。可是相比之下，二二六事件中香田清贞以下主谋者 17 名（只限军方）一律判为死刑。而且，在此事件前发生的相泽中佐刺杀永田军务局长事件——这完全是相泽中佐的单独行动——但也在数月后被判为死刑。可见军方对这类事件的看法态度剧变。另外再加几句，值得纪念的是，逢这种事件时，民间的被告总是比军方被告要判得重得多。例如五一五事件军人最高判 15 年，而民间的橘孝三郎则为无期徒刑。二二六事件中并未参与什么实际行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也被判死刑。这姑且不论，在二二六事件后的特别会议上，寺内陆相就事件做了以下演说：

作为本事件的原因动机，综合一下他们的起义纲领和其陈述等，似乎是说要显现国体以达到现实昭和维新的企图，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国家的现状导致他们至此，有许多需要改正刷新的地方。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无视发展到反叛行为的他们的指导精神的根基处，存在着的国家革新思想，是一部分与我国国体绝对不相容的极端激进的局外者所抱有的。

（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一部分局外人所持有的国家革新的思想”恐怕指的是北一辉

的思想,反正将之明确判定为反国体的行动之点,可以看出陆军军方首脑的想法较之前面的五一五事件时,变化之大。而且二二六事件以后掌握实权的所谓新统制派,过去均是樱花会时代的革新将校,他们一旦掌握实权就发出“肃清军队”的号令,通过陆军大臣排挤其他军人的政治干预,压制激进派动向。皇道派大多都是反东条的,所以战争结束后颇受注目,但皇道派与统制派之争不是那种简单的绝对正义派对阴谋派,而是有浓厚的个人派系争斗色彩。我们可以断言二二六事件只不过是给新统制派的契机,镇压以激进将校为后台的皇道派而确立自己的实权。所以寺内陆军大臣认为二二六事件是反国体的行动,但青年将校则说“改造法案(指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才是符合日本国体。我国国体本身作为国家组织,政经机构表现出来的正是日本改造法案”。(前述日本青年将校之遗书)在他们看来统制派的一帮家伙口口声声说国体国体,实际上是为了贯彻自己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惜利用天皇的权威。他们居然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只要天皇陛下不允许,就以短刀相胁迫其服从”,这一点的确是有趣的问题。从实际行动的发挥之处来看皇道派系统的动向非常激进,可其内在的意识形态却是非常观念性的,天皇绝对主义——即承诏必谨主义。如前所述,在掀起暴动为止时是有计划的,可不考虑其后事,我们不能放过这点,因为其根底里含有天皇绝对主义,认为谋划那种内容的事变是有谋篡大权之嫌的。所以总是局限于除君侧之奸——只有除去笼罩在天皇头上的暗云,太阳自然会光耀大地。这又成了神话般的乐观主义,至此统制派的人物们则往好里说是更合理的,往坏里说是利用天皇由上而下地实现自己的计划。<sup>13</sup>所以说,二二六事件以

后的过程,日本法西斯主义不是所谓“合理的”激进的崛起形式,而是从统治机构内部中一步步合法地扩展。利用激进的法西斯主义的重重压力,并以此为武器强化由上而下的自我统治。第七十届议会上,浜田国松质问寺内陆相——这一质问成为一契机,故两者之间才有所谓“剖腹问答”——“随着肃军的进展,被肃正的军部的政治推动力抬头,我们为这一政治上的弊害的重新抬头不禁感到遗憾。”此话正击中“肃军”隐藏下的真义。

这样,在镇压了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后不久,军部和官僚、财阀的勾通一气的体制得以强化,开始走向正规、完善的法西斯主义。广田内阁的马场推行的财政政策提倡“广义国防”,在当时二二六事件后社会不安的气氛中,预算又超出,将失业救济费和农民救济费编入预算,加上军费的增大,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财政,给财政界以巨大危机。因此,接其后肩负金融界厚望的结城藏相,马上转成军费一边倒的“狭义国防”预算,由马场编入预算的农村经济更生费等统统被削除,地方财政资金也被迫停下。这时结城吐了句名言:“从今以后要和军部抱成一团儿”——抱团财政之名正缘于此。反映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是,昭和十二年三月三日日本经济联盟的常任委员会上做出以下建议:“综观最近国内外形势,以军费为主的国费膨胀不可避免,而且急剧的财政膨胀之矛盾表现在国内生产力不足以及与其相关连的物价上涨上,为了避免这一矛盾,除当前必不可少之经费外,只有限制岁出。在此意义上,除了军事费以外,应尽可能控制其他行政费的增加。今后两三年要在优先国防费的方针下编成预算。”

这是当时经济界的代表性意见。于是乎财界和军界利害关系

接近，垄断资本与军部抱成了一团儿。其结果是由下而起的法西斯运动被吸收到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中去。此后，由于日华事变的爆发，日本的国际地位愈发摇摇欲坠，从而更要求绝对的“举国一致”。本来就没有国民基础的官僚和自称革新的“推动力”，却又绝不主动负政治责任的军部，再加上只会附庸早已失去斗志与法西斯势力决一死战的政党，这三方在举国一致的名目下鼎力协作。从广田内阁到东条内阁，经过了林、第一次近卫、平沼、阿部、米内、第二次近卫内阁频繁交替，这正因为内阁是建立在上述三者的力量之平衡上，所以牵一发而动全局。而且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化的停滞不前，这期间不能忘记法西斯化的几步重要之棋：昭和十二年底至十三年初对劳农派、全评、日无、教授团的一举逮捕、搜查，同年下达的五一劳动节永久禁止命令。国家总动员法的公布，昭和十四年三月从国际劳动机关的脱离，昭和十五年社会大众党以下各政党的解体，劳动总同盟的解散，大政翼赞会、产业报国会的成立，日德军事同盟的成立等。罗马非一日而成，东条独裁也绝非忽然形成的。我们无暇去具体地追述其间的过程，但务必想就近卫新体制运动加上几句。因为其认识的出发点正是上述所说的政治不稳定在于缺乏国民基础，所以要强化国民组织下的政治势力。新体制运动的动机错综复杂难以简单概括，但至少当初的意图如此。众所周知，它又碰上绝对主义的天皇制这一岩壁，被国体派疑为幕府式的存在，最后还是被架空成一种形式上的官僚机构。这就是所谓翼赞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当时，常说上意下达，下意上通之类，有人批评说，“下意”不该置于我国体之上，便改为下情上通。由此可知，任何来自“下面”的一丝色彩都遭到讨厌。翌

年十七年一月，在辅佐翼赞会形式化意义上，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这最终也不是政治结社，形式上是翼赞会的下级组织，所以不能积极开展活动，有些地方甚至于两者之间生出不少棘手的问题。十七年四月举行了所谓翼赞选举，其年五月结成“翼赞政治会”，成了唯一的政治结社组织。但该会杂居着各种政治势力，从激进的法西斯团体到既成的政党派系，观念右翼系统、无产阶级党派等都被网罗其中，因此，作为政治运动反而是内容空洞的了。

以上的曲折经过，是努力想方设法将日本的政治体制置于德国、意大利那种国民大众组织化之上。这种运动归根结底都被官僚体制完全吸收了。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最终也没能具有一定的有组织的国民基础。与翼赞运动同时设立的中央协力会议，也只是纯粹的咨询机关，即“下情上通”的机关。这里阐述的意见、提案于法律上无任何约束力。政府只是“听听”而已。当时，翼赞会曾出过一个“关于协作会议”的小册子，其中写道：

这个会议上提出的所有问题，政府及翼赞会都会倾听，并马上慎重取舍之，果断地反映在决策中去。其关系靠这种家庭式的亲密协作来敏捷处理。……也就是说，此会议通融不碍，在无法制、无权势之处含有政治性价值，正如此，看上去软弱、单薄的体制之处反倒有极大的兴味所在。

（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想法。而且不久随着大东亚战争的爆发迎来了东条独裁时代。到这一步说不上什么皇道派、



统制派,凡是阻碍东条的势力全部统统粉碎,“(临时取缔)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法”和“战时刑事特别法”的修改,压制所有反对派,将具有光荣传统的右翼各团体也强制般地融汇于翼政和兴亚同盟之中,无疑作为首相东条亲自兼任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和总参谋长,掌握了空前的权利,至此才出现了近似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强大独裁政治。而且成为此“强力”基础的只是撒遍全国的宪兵网。这样,不像德、意那样具有独自の国民组织,日本法西斯主义维持着明治以来的官僚统治体制和假立宪制(Scheinkonstitutionalismus)迎来了八一五这一天。因此,其结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确定自上而来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而被适当利用的民间右翼势力到了战争末期却以批判者的面孔出现,对东条独裁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在最后阶段,最令东条棘手的正是这些传统右翼势力。例如昭和十八年第八十一届议会的战时刑事特别法案委员会上,那个赤尾敏委员——自建国会开始的领袖——就翼赞会说了下面一段话:

看今天翼赞会的思想内容,既有维持现状的自由主义者,又有许多国家社会主义者;既有日本主义者,又有激进的恐怖主义的日本主义者……还有许多浑水摸鱼派也在其中。这种杂乱的指导精神,是想奔向何处去?……大家聚在一起,光弄出个形式和组织,而至今有功绩的一心一意的日本主义团体统统都倒了,弄上这么一伙既无信念又无理想的浑水摸鱼派和官僚们,靠吃政府的钱来搞什么精神运动,简直是没个主心骨。

在同一委员会上，中野正刚派的三田村武委员也做了以下质疑：

“今日日本政治的特征实际上是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的政治，别名官僚政治，也就是没有批判的政治。……一批判就说成自由主义，若如此，我倒想问一下什么叫自由主义……无批判就是没有商量讨论，没有商量讨论就没有进步。”

“对政府和官僚的不利之处，并不等于是对国家的不利之处。”

“如今献殷勤拍马屁者繁殖过多充斥于世，社会对国家来说，并非良好的状况。”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条独裁的实质，无批判之处便没有商量讨论，无商量讨论之处便无进步，这真是正统的自由主义的口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日本法西斯的最后阶段，在议会中站在最反政府的立场、最具批判言论的是日本法西斯的急先锋——民间右翼各团体。二战结束后皇道派势力得以复活，甚至仅仅以反东条为理由，那些铁杆的右翼分子们居然以民主主义者出现。其根据正在于此。正所谓是历史的一个循环。

为什么在日本，来自下面的国民的法西斯主义——民间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没能取得实权？为什么没能实现法西斯主义革命？这是极为重大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不能就此问题详细讲，但至少下面的事是确实的，即法西斯主义进行过程中，“来自下面”的要素的强弱是由其国内的民主主义的强弱而决定的。

换言之,不经过民主主义革命之处,就不可能产生自下而起的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运动。<sup>14</sup>德国和意大利,都是在一次大战后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意大利,大家知道,“罗马进军”前的社会形势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工人占领工厂和生产管理的风潮四起。议会里也是社会党为第一党。在德国,更不用说,纳粹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势力是多么强大。1933年3月的大选,——当时希特勒已篡得政权,以国会放火事件为借口,全面镇压共产党,使之几乎陷入地下活动之时,共产党还获得六百万票。为了扑灭这一强大的无产阶级势力,可以想象该需要多么激进的巨大力量,而以往的民主主义政治机构又需要进行多么激烈的革变。同时,为了将民众从这种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的影响下夺取过来并在法西斯体制下重新组织,又很有必要对之进行巧妙的民主主义伪装。纳粹认为自身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不显示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不会吸引民众。这一点正反映了在德国,甚至在意大利,自下而起的民众力量是多么强大。而此处也正是法西斯主义组织内部不得不保留某种程度的“自下而来的要素”的理由,哪怕只是为了欺人耳目也好。但日本怎么样呢?当然在日本,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劳动运动空前蓬勃,而且由于农业危机农民争议年年剧增。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正是在这一形势的背景下,为对抗日益兴起的左翼运动而出现的。这一点上面提过,可以说是必走的一着棋。但这种左翼运动在今天看来究竟是否渗透到现实的工人农民中去了,至少与德国和意大利无法相比是确实的。将马克思主义的风靡视为论坛或舆论界,以及支持之的一般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现

象,无疑是有点过失的论调,但所谓“赤化”的威胁是否如当时的统治者宣传的那样具有现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sup>15</sup>在德国和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是实际迫在眉睫的问题,垄断资本在“赤化”还是“纳粹”这种迫切的形势下,仓促决定将希特勒拉入政权。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的发展是渐进的,没有那种1933年1月30日“罗马进军”,换言之来自下面的抵抗也不是那么强,即不存在那种足以交上一战的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一点从日本资本主义的构造本身上很容易理解。<sup>16</sup>

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迅速膨胀的满洲事变前——1930年的人口比例是:在五人以上的工厂就业的工人数量为203.2万,临时打短工的196.3万。相比之下,商业服务业人数是220万人,国际机关公司职员是180万,小店主是150万人。可见真正的无产阶级较之中小工商业者及薪金阶层人数要少得多。比如,我们看1926年国际联盟统计年鉴,工业人口(含家庭工业)占全人口的19.4%,比起英国占39.7%、法国占33.9%、比利时占39.5%、荷兰36.1%;再比起德国的35.1%,大日本帝国的工业化较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明显地落后。大家知道,日本的社会结构,最上层耸立着最高度合理化的垄断资本,而其底层则是一片与封建时代几无变化的生产方式——小农小户,以及依存于家族劳动的家庭工业。也就是最高度的技术与最简朴的技术在产业结构中重叠并存。这种历史上不同阶级的生产方式相互重叠,相互弥补,在政治上却注定要阻碍日本民主主义力量生长。这种一方面是封建的绝对主义支配,另一方面是资本的垄断扩张,两者绝不相悖反倒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点可以说决定了上述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

的命运,也同时显示出日本自下而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内部的脆弱性。日本的右翼从最先进的纳粹型到几乎纯封建的、往上能联系到玄洋社的浪人型,系谱驳杂。几乎找不出受过“近代”洗礼的成分。与其说法西斯式,倒不如说幕末浪人式占主要地位。乌特莱女士的《日本黏土之足》(*Japan's Feet of Clay*, 1937)中有一句至理名言:称右翼领袖们是“封建时代的浪人和芝加哥的地痞之结合(cross)”,比如右翼运动的主要头目,就是头山满这样的人物,其本身就象征着右翼运动的特征。比较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生活方式,头山满恐怕没有那种生活的计划性。例如,有一本《头山满翁的真面目》,其中有许多头山满的谈话记录。举一例看,在谈到年轻时说:“那是血气方刚的二十六七岁时,来到东京和五六个伙伴借了一家房子,刚开始时还有伞有木屐,过一阵就都没了。被子也没了,可光身子过日子只有我能行,其他人靠光身子过不去。订盒饭吃,不付钱,于是盒饭店的小姑娘来催,我赤条条地从壁柜里一出来,女孩顿时吓得魂消飞跑。两三天我什么也不吃也能过得去。”

借钱不还,竟用这种手段来抗拒,为此还感到自豪,据说还用此法来对付过高利贷,怎么看都不属于“近代人的类型”,而且没有一丝近代的合理性。右翼分子中不光头山满,都可见这种共性。而且看看右翼团体的内部结构,也都大多是一种头头加小混混式的组织。前面谈过,有那么有利的客观形势,而右翼运动的统一战线却一次也没能成功。几次都高唱统一,一旦团结在一起马上又分裂,互相臭骂。因为是小头目为主的结合,规模有限,且各自摆出自己的神龛相抗拒。在战后出现过无数的政党乱立的现象也一

样。出现许多以小老板为中心的团体,其中有冠冕堂皇的暴力团。纳粹里的突击队也具有浓厚的暴力团色彩,可它有组织、训练有素,不像日本那样离合聚散。这种前近代性不仅见于右翼团体,也同样见诸与其勾结一起扮演重要角色的革新将校身上。他们策划计谋的地方几乎总是情人幽会处和小酒店儿。他们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悲愤慷慨激昂,时尔在他们的胸中恐怕又暗暗怀念着幕末志士的形象:“醉伏美人膝,醒握天下权”。也就是说,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欠缺,限定了法西斯运动的这一性质。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的“政党政治”时代和法西斯主义时代有着显著的连续性。上面提到的右翼领袖及组织所见的前近代性,可以说也同样见于日本的既成政党中,虽然程度有所不同。日本的政党不是民主主义的冠军,它早早便与极权主义体制相妥协、相吻合,甘为“外表的立宪制”下的产物。所以日本才不需要来自下面的法西斯主义革命,明治以来的极权主义即寡头体制摇身一变就想走法西斯主义体制。纳粹在篡夺政权后,别说是社会主义政党,连中央党及其他一切既成议会势力均一扫而空。可在日本,新生势力的登台并非要扫除至今掌权的势力。旧势力大多都稀里糊涂地被吸收到法西斯主义体制中去。刚才说到的既成党派绝大多数都被吸收到翼赞政治会中去了。这也正是战争结束后为什么会从既成党派和官僚等旧的政治势力中出现大量的被开除公职者的原因。说不清法西斯时代开始于何时,反正是一步一步地、渐进地、完成于明治宪法规定的国家体制范围内。日本的既成党派没有勇气和意志与法西斯化的动向做彻底的斗争,反倒在这种情况下,起着有力推动法西斯主义的作用。

例如，田中义一大将率领的政友会内阁，从昭和二年四月到四年七月，名义上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可对内，通过三一五和四一六事件彻底镇压左翼运动，靠发布紧急赦令修改治安维持法，变本加厉地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对外，打着所谓田中积极外交的幌子，以济南事件为机出兵中国，最终牵连到所谓满洲某重大事件——以炸死张作霖的问题而倒台，其足迹简直差不多跟法西斯主义政权一样。这一时期，于国内外播下的种子对后来的法西斯主义者当霸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友会在这以后，对浜口内阁泼口攻击，提到伦敦军缩条约所关联的干涉侵犯统帅权问题。再后来，说到前述的天皇机关说问题时，众议院铃木总裁亲自站在国体徵明运动的阵头，说他对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不过分。干涉统帅权问题是如何激发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机关说问题在如前所述的形势下，其意义在于否定政党政治的理论根据，所以，政党率先走在前面，则名副其实地是自杀行为。此处正是既成政党的悲剧或喜剧性作用所在。

继田中内阁的浜口及若槻两民政党内阁，在最近的政治史中比较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色彩。但其结局，在满洲事变后不久，被安达内相一派的所谓协作内阁运动这一来自内部的法西斯动向所推倒。民主党本身不用说在政友会和反法西斯立场上，也不具备与之划清界限的区别。实际上田中内阁时代，在批准停战条约时，民政党作为在野党，抓住其中的一句“在人民的名义下”，与右翼团体一起激烈地攻击政府，认为与我们国体不相容，而政友会就拿伦敦条约问题来报此仇。双方都为了政治斗争而不择手段，为打倒反对党政府什么样的势力都可以联手结盟。这一点反

倒更促进了从议会中独立出来的种种半封建政治势力的抬头。恰如德国、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及社会党右翼所扮演的角色,在日本则由政友会和民主党所扮演着。当然,日本也有来自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法西斯化——前面提到过的社会民众党的赤松、龟井一派和日劳系,例如麻生一派就是如此——虽然也不能忽视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但总的来说,从掌握议会势力霸权的政治实力这一观点来看,日本比意、德更错位一圈。这一点日本随着政党政治的没落,构成“议院外围团体”的社会分子多跑到右翼团体中去了。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多是以无政府主义乃至工会至上主义的参与者为中心运行的,这是与日本的不同之处。这样看来就会明白,日本法西斯主义化的渐进特征——与前一时代的连续性,是其主要特征。

就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还应从各方面深入讨论一下,我还有许多重要的方面没有谈及,比如法西斯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有和日本农业构造的关联问题,需要再收集点资料才能解决,对这类问题笼统地概述不是我能胜任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去深谈法西斯的机构论,只着重谈了一下作为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如何影响战前的日本,而且解剖它的特征是什么。

(1947年)

追记:

此文是东洋文化研究所饭冢浩二教授策划的连续讲座之一,以昭和二十二年(1947年)六月在东京大学举办的讲演为母本,后来收入东洋文化讲座第二卷《尊攘思想和绝对主义》。其后,日本



学术会议第二部会又将之节译为“*The Ideology and Movement of Japanese Fascism*”刊登在面向海外介绍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杂志 *The Japan Annual of Law and Politics* 上。众所周知,有关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在近十年来有了惊人的发展,资料也愈发完善。就我自己来说,这篇文章和下一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写就之后,最为关注的课题仍是剖析阐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过程,但因久卧病床,缺乏收集资料和取材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健康条件,没能发表什么值得一看的成果,甚为遗憾。因为上述东洋文化讲座已绝版,很多人都说难以找到,参照困难,故收录此稿纯粹是考虑到研究上的方便。只是由于受原来讲座形式的制约,整篇显得有些冗长,也有不少表述和引用不够贴切之处,此次收录时对原文做了若干删改和修正,并就不足之处订正和追加了注释,总算像个论文的样子了,可不打破原型仍然无法让我满意,只好半途而废了。本来,未来社的出版预定就是以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为主的,乞读者海涵。

### 补注:

1 有关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文献,现在最为详尽的是刊登在《思想》杂志 1953 年 8—9 月号上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文献目录(日文)》。

2 我们可以注意到昭和五年(1930 年)参谋本部所做的形势判断中首次加进了国家改造的问题,而不是限于狭义的作战问题了。这是秉承了供职二部的桥本欣五郎和根本博等樱会骨干成员的意向。(田中少佐手记)

另外,樱会成立之前,在陆军里尚有西田税创办的“天剑党”;海军里有藤井斋指导下的“王师会”等秘密结社组织,后来主张改革的将校军官从中辈出。

3 这里的时代划分是着眼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形态,故以二二六事件

为界分为前后期。但如果着重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整体结构的话,尚需要更为详尽的阶段划分。特别是就“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应该像本书第二卷有关法西斯主义描述中所说的那样,一步步追究 fascization 的具体进展,锁定法西斯主义是何时全面笼罩在体制上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第三期内的细微观察至关重要。尤其是 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前后的各个政党及工会组织的解散,和大政翼赞会(10 月 12 日)、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1 月 23 日)的成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消极地看是失去了反体制得以发酵的渠道,积极地看则是与翼赞体制同为一体。这一过程先是东条内阁成立后颁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临时取缔令(1941 年 12 月 19 日),紧接着举行的翼赞选举得以“完结”。另外,第二次近卫内阁所缔结的日德意军事同盟将至今为止延绵残喘地围绕对外政策的抉择所进行的种种议论彻底封死,为国内舆论的铁板一块化所起的作用甚大。

4 由于军部及右翼活动可以打着这种“国体”思想作为旗帜,除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共产党员外,所有势力、所有阶层等于都被剥夺了正面对抗这一运动的正统性依据。但是,其意识形态正因为是内在于体制本身(参照前章论文)的,反倒在一定限度内成了制约日本右翼运动发展的重大的思想根源。“国体”的诅咒,作为意识形态或作为组织原理正是处在超政治的政治力量中,所以硬是要把这一国体的所谓气体特征强行固体化之处,呈现出右翼的各种悲喜剧。从法西斯的发展过程来看,作为悖论或许可以与战后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势力过程做一比较,后者正是拉着“反共”的大旗在冷战气氛下猛烈兴起,随着反共成为体制本身的理论而一般化后,原有的势头反倒呈凋落趋势。

5 在权藤派系的农民活动家及其理论倡导者举办的名为“对权藤学说批判的再批判”座谈会上,针对来自左翼的批判,他们反驳说:“很滑稽的是那些家伙们把农村问题当成地主与小作农的问题,如果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英国,可以说是地主与小作农的问题,可当今我国地主的地位全然不同。……因为我国的地主只是法律条文上所有权的问题,其实际的经济地位与一般农民可以说没甚大差别,也就是说动不动就想靠阶级斗争之类的运动来解决农村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其中含有更为根本的重大问题。即整个农村的问题。”这种说法充分显示出农村自救的意识形态。其反面当然是表现为对工人的看法:“我们绝不是要否定当今城市所拥有的文明,……但是我们只不过是作为当今统治阶级的社会存在的一个机构而已,……像这样的城市模式必

须绝对予以否定排除。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一排除运动中,城市无产阶级等具有充分的要素出于其经济理由来为统治阶级做嫁衣。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会因为信奉单纯的阶级斗争而与城市无产阶级携手合作。”(伊福部隆辉《对于山川均氏的新农村运动的认识及其误谬》与上述座谈会纪要一同收入权藤成卿的《君民共治论》一书的附录中)

6 这一点,可以参考约瑟夫·格鲁《在日十年》下卷,就1941年2月前后的日本所描述的情形(虽然不是仅针对工人而言的):“极度制约娱乐抑或人生所有的愉悦,其结果,便是日本人变得有些放荡不羁了,纳粹德国的那个口号,在日本应该改为 Kraft durch Unreude(变痛苦为力量)。”

7 所谓日本近代的“崛起”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关联,其特殊的表现为玄洋社——即黑龙会系统的大陆浪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一步而言“大东亚”战争对东南亚民族运动的影响。这类问题从各自的历史来看,或者是从当今的意义来看,无疑是极为重大的、值得关注的课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暗示一下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的第三个特征,因为问题太过于巨大的缘故。当然,其原因之一是在当时(1947年)占领军政策下言论管控严厉,而且事实上,半生不熟的议论反倒会产生许多误解。就这一问题,特别是就日本对东南亚的民族运动所起的作用来说,今后更是需要具体的资料来加以分析。眼下只有 W. H. Elsbree 的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5—195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一书资料还比较充实。战后日本的右翼活动正是夹在这种传统的亚洲连带意识和来自西欧的“反共”要求之间摇摆不定。

8 当然,二二六事件中反叛将校们的行动在客观意义上正是与他们的主观意识相反,是企图以武力为背景驱动“大权”将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朝着他们期望的方向来加以“革新”,这如果说不是政治变革则纯粹为自我欺骗,但至少他们的上述“理论”并非为事后的正当化所出。他们愤然“皇军沦为私兵”,不等命令便动用军队,至少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据的是陆军《作战要务令》中的“独断专行”这一点。因此,他们抗议:自己在这一点上受到惩处的话,那么满洲事变时本庄军司令官的措施不也是干犯大权吗?他们的主观想法是首尾一致的。

9 以上就知识阶层所起的作用,其叙述过于拘泥于对法西斯运动的精神层面,以致引导出对所谓“消极抵抗”的过高评价。当然作为当今的课题还是应该更为细致地微观地追究这一过程:即当时的知识阶层尽管各自的行动

模式不同却如何随大流一致地走向对体制的默从。只是在对比纳粹型的法西斯主义时,我们相信本文的分析未必有错。二二六事件的被告安田优在其狱中日记里分析日本现状时,“论中间阶级的思想败退”处说道:“知识阶层当反思其误国之举,他们只是卑躬屈膝地一味躲在功利主义名下,没有勇气贯彻自己的信念,而且只是沉浸在马克思的福音之中,或者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始终沉溺于享乐主义的桃色温柔乡中。”这种观点在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者中或多或少是共通的。据昭和十八年(1943年)由“东京都思想对策研究会”所做的问卷调查《东京都教员及中学生思想调查概况》可知,针对战时的学校教育体制,教员的態度基本分为两种:总体上对现状的肯定和对现状的批判。后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者对时局的认识不足,或应该积极推进战时教育体制(该调查称此为“激进态度”);另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训练管控太严,陷于形式主义,或杂事太多没法研究等,是一种反对整个局势“走火入魔”的态度(该调查称之为“保守态度”)。除去现状肯定派即顺应大势派(约占调查人数的一半)以外,持批评态度的人中,“激进派”比较多的是师范学院教师,而且是较为年轻的层次(55%以上);而“保守派”多是中学教师,且同样是年轻人最多(37%以上),青年学校的教师最少。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一般“激进派”很少具体例举批判的事项,只是多举一些观念的、一般事项,比如“抹杀自由主义”啦,“决战气氛不够彻底”等;对此,“保守派”的批判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比较多地指出来自经验的、具体观察到的过火行为和缺陷。这大体上与本文指出的第一和第二的中间层团体的行动模式相对应。同样是作为教师,青年学校和师范院校的教师则倾向于法西斯主义以及“翼壮”式的意识形态,而旧制中学的教师倒是偏于知识阶层或工薪阶层的思想意识。

10 这类事例由于战前固有的知识阶层在战后开始变质和解体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至少大报都一起开始向美国那种“被均衡”了的大众社会的媒体传播方式靠近,战前的《朝日新闻》对其他大报所保持的那种独特性在相对减少,正是这一现象的确凿表现。

11 这一点与前注10相关,在战后显然变得流动起来,两种阶层的文化断层在相当程度上得以连续。大学毕业的工薪阶层等于知识阶层这一等式被打破,一方面伴随着工薪阶层的大众化,而另一方面没有学历的工人们也通过工会活动等实质上得到了知识长进。而且战前的传媒界的知识分子战后被“文化人”这一更为广泛的范畴所吸纳;而那些“艺能人”反倒升格为文化人,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人的艺能人化(即媒体依赖的程度增大)。《文艺

春秋》成为“国民杂志”以及周刊杂志的泛滥都可以说是象征着这种新的流动性倾向。与大报的保守性相比,综合杂志的进步色彩看上去像是战前以来的传统持续现象——当然也不能说没有这一面——但是,如果与其读者层的变化相关联来看,其社会意义未必相同。

12 军队内的各派因为这两派的名称最为流行,所以动不动就将所有的对立图示化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或加上肃军派)两派,现实实际上要复杂而含混不清。这两者的对立开始比较显露的是在荒木就任犬养内阁的陆相之后,到二二六事件为止。二二六事件以后构成军部首脑的势力未必是之前的统制派的延长(故也称新统制派)。但皇道派倒是自始而终有所一贯。这种为了使用方便而保留的语词,也用于二二六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

13 被誉为统制派智谋将领的永田铁山屡次扬言要“完整地”成为推动国家改造的力量。接近重臣和新官僚正是出自他的这种宏大构想。皇道派意识形态十分观念性,但其中只有一点是具体的,就是对外政策以对苏作战为第一要义,那不光是战略上的选择,也是他们的国体至上主义的“理论性”反射。这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在二二六事件前就决定的,起义后对陆相的要求事项中就有“因苏联威压,应将荒木大将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他们或多或少有一种危机感是相通的,即“日苏一战果真有胜算吗?内外受敌该如何是好,彻底清算了右翼不就只剩下中立(所谓无能力者)和左翼了吗?遗憾万千,可又能说些什么呢?”(中桥基明遗书)所以,皇道派青年将校的手段之激进只有以这种对苏作战的迫切意识为前提才能得到理解。而且,不管青年将校如何为现实的社会组织矛盾所触发,其根本思想只要还拘泥于“国体显现”的乐观主义,“君侧之奸”这一个人意识作为体制和组织问题提出来本身,其想法肯定是要被执着地排除掉的。进一步而言,只要不是在天皇牵头的所有体制改革中,一旦他们察觉到反国体性的东西(青年将校对“幕僚法西斯”的攻击的根据就在于此),“承诏必谨”的理论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容易作为绝对的保守主义发挥作用。后来,柳川、小畑等皇道派系的将军与财界元老齐声在官僚统制机构中随处都找出“赤色魔手”,为弱化“新体制”做出贡献,这当然是皇道派意识形态的归结之处,其理论与青年将校的三月、十月事件以及对“幕僚法西斯”的猛烈攻击如出一辙。看不到这种激进性与保守性的逆反结合,就不可能将青年将校的意识形态定为“国体加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来重新定义。这不光是所谓的主观与客观作用的背反,而是意识形态本身(因为其激进性最多被限定为非法行动这一形式性上)内所存在的制约,难以

积极而具体地提出体制内的问题。这一点极为重要。

14 决定法西斯主义进行过程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起”的类型要因并不仅限于此，可参照第二卷的“法西斯主义诸问题”。

15 所谓“赤化”问题对日本帝国来说是极为深刻的威胁，为统治阶层所意识到也是事实，只不过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提上日程，其主体的或客观的条件是否存在另当别论。对于“赤化”的过敏反应首先是和邻国俄国势力的浸透这一表象相结合的，（在这一意义上“间接侵略”的象征早就先于杜勒斯国务卿而使用的名誉应该归于日本统治阶层。青年将校尽管有那么强烈的反财阀意识，而更为深层的反共也是跟前面所说的国体观一道，从他们的本能的职业意识来看，共产主义的问题无法与对俄军事战略的观点切割来看。）其次，是基于这么一种判断：“赤化”正在侵蚀名士之子和知识分子及学生等这些本来是构成、或将来要构成日本帝国的精英阶层。内务省警保局编辑的《诸事件概要》就引发右翼恐怖袭击的原因时说：“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输入，到关东大地震后，高等专门学校以上的毕业生即所谓的知识阶层最为接受这一赤化思想的洗礼，并终于出现了不少日本共产党员要主张改变我光辉国体，甚至发现在我皇军内部亦有其事实。”工人农民的组织化几乎不成问题，而知识阶层的“赤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宗旨来看完全是一种变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种变态让日本的统治阶层感到威胁。正如有名的“近卫上奏文”所显示的那样，让日本统治者最终如噩梦般恐怖不安的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是来自国家机构内部的自我崩溃。而且所谓的“知识阶层”乃至“良家子弟”的赤化从整体上看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那么问题进而要联系到的是日本帝国的精神和结构，即对意识形态的异化现象立刻所引起的过敏反应。这一点可以参照第一篇论文和下面的补注 16。

16 这里的说明当然甚为不足，正如服部之总氏早就批判的那样（“日本型法西斯主义的特征问题”收入其著作集第七卷）过于经济主义。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天皇制政治结构的特征，和那种强烈的同质化=非政治化作用带来的愚忠的帝国臣民的形成过程的构造。最近的研究可以参照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构造的研究》。日本帝国将社会底层的非政治化（作为“淳风美俗”的发源地的名望家族以及保障其的地方自治）和顶层的超政治化（超越所有政治上对立的天皇及天皇的官吏）作为体制安定的支柱，而将那些打破临时的调和（和的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化本身视作危险。这一倾

向与体制的危机意识的亢进成正比。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温床”这类成为法西斯及国体主义者们的口头禅的命题,在日本正是有其特殊的妥当性。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法则总是在其时时的状况之下集中攻击有界限的意识形态,通常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优先课题是破坏革命的先锋组织,在日本已经早在政党内阁下实施了,所以,日本的右翼活动和国体明徴运动在早期就将其主要攻击目标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本身转到其“温床”的自由主义上来。这一特点在回溯昭和七、八年以后的日本政治及社会过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第三章 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

### 1. 问题所在

日本天皇和希特勒总统及墨索里尼首相为何在莫斯科前沿的安德烈·日丹诺夫反击正取得胜利之时对美国启开战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狂热主义者以及患有夸大妄想症的狂人们不顾死活做出的选择不能再归入外交、战略之类的问题,而把它们作为精神病理学方面的问题来解释会比较容易些。

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政治学者舒曼(Frederick Lewis Schuman)教授在其最近的著作<sup>①</sup>中分析袭击珍珠港前后的国际形势时是这么论述的。我们能把它简单地处理为该教授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

---

<sup>①</sup> F. Schuman, *Soviet Politics at Home and Abroad*, 1946年,第438页。另外,舒曼写作该书时,由于日、德、意三国在对美宣战上究竟取得了何种程度的理解及协定尚未公开,所以他只平等地排列了这三个国家,但是至少在奇袭珍珠港一事中,总是受德国指使的日本当时则少见地采取了主动。据说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收到此报告时“狂喜”万分。



而产生的芝加哥学派的措辞吗？不，在东京审判中已昭示了巨细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动向正历历清楚地告诉人们开战决定是在何种超越合理理解的状态下下达的。对美宣战不是根据对世界形势、生产力状况以及其他国内条件的细致分析与考虑得出的结论，相反毋宁说是由那些连慕尼黑协定与集中营都不知道<sup>①</sup>、对国际知识惊人缺乏的实权人物们在极不一致的心境下决定实行的，这在东条的话语中表现得十分明白，他说：“人有时候必须要有闭着眼睛从清水舞台往下跳的决心。”<sup>②③</sup>所以这就难怪让来日的联合国官员随着对实情的了解而越发惊呆了，因为他们开始都以为日本既然面对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国挑起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想来它必定拥有基于某种明确推测的组织与计划吧。“日本一边负担着尚未结束的对华战争，而且还准备对苏联发起进攻，可他们又是如何能够决定同时进攻美国和英国的呢？也有相当多的聪明人认识到了其中的根据并为之惊奇不已，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了日本的统治者阶层尤其是军阀头子们对于德国威力及其必胜预测的盲信，那么这一疑惑就无法解开了，他们是……指望着德国承诺的苏联的瓦解会不日就到来的。”这是苏联的 S. A. 高隆斯基检察官的话，它暗示了即便在东京审判的检察团面前，这个“谜”也显得如

---

① 东条证人针对季南检察官所做的答复。

② 近卫文麿：《失落的政治》，第 131 页。

③ 这是日语的一句成语，表示要下很大的决心。清水舞台是京都清水寺内架在悬崖上的舞台，故有比喻。——译者

此扑朔难解。<sup>①</sup>所以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J. B. 季南检察官也说：“要把它分析成共谋犯罪会遇到的困难之一是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很难将其考虑为是一伙人的企图和策划。”(No. 371)他直率地承认了用共谋犯罪来定性的困难。更何况美国方面的辩护人把他们内心里多少与联合国官员同感的惊奇百分之百地用作了辩护的根据。布列尼克辩护律师列举了开战前的陆军空运飞机的年度制造实数，反驳了检察团提出的“极度扩大军备”的主张，他说：“在来自年产五万多架飞机的美国的辩护人看来，在关系到许多公职人员生死的场合中，上述数字表示的并非喜剧，而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像今日这种时代，以如此少数的飞机欲征服全世界大概非唐吉珂德莫能实行的行为吧。”(最终论辩 No. 391)这也许正是美国人的真实感想。日本帝国是被作为同德国比肩的典型“全体主义”国家来宣传的，可是与纳粹主义相比，它战争体制中组织性的贫弱、领导势力间的分裂以及政局的不安定性又让他们惊讶不已。“出列于被告席上的被告之间既不存在可能匹敌于现代史上这一悲剧时代其他列强所做出的巨大战争的努力或者做出超过之的协调，也不具有任何政治理念的统一和合作。”(布伦南(G. G. Brennan)辩护律师，No. 255)“对日本政府本身来说何为真正证据？它正是在本起诉书期间在日本前后有十五代内阁成立并瓦解

---

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速记记录第 85 号(着重号均由笔者添加)，并且由于本论文多处引用该速记记录，故在正文中一概采用行间小注形式，只标明号数。例如(No. 100)表示速记记录第 100 号。不过遗憾的是该速记记录中文字误排较多，故在引用之际凡有注意到的均已订正，且假名使用不统一，正文中则全部统一为新假名。作为本论文主要资料的该速记记录是在戒能通孝教授的盛情之下才得以利用的，在此对借我以该珍贵资料长达一年以上的教授深表谢忱。

的事实。……通过构成日本政府的这十几代内阁的成立与瓦解，一共产生了 13 名首相、30 名外交大臣、28 名内务大臣、19 名陆军大臣、15 名海军大臣、23 名财政大臣。……证据明确显示……这难以确证是共同策划或共同谋划……反过来不如说是领导力的欠缺……”(出处同上, No. 386)。与联合国不同, 日本的“盟国”纳粹具有更多从内部目睹日本战争体制的机会, 它早就对这种来自于政治力量多元性的动摇的外交政策感到头疼。1940 年(昭和十五年)7 月, 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外相与佐藤、来栖大使以及河合公使会谈时说:“本人对于德国何所欲有十分明确的认识, 然而至于日本的企图何在, 遗憾的是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两国间的合作也是必要的, 但首先想知道日本到底抱有何种具体的希望。”<sup>①</sup>这可正是军事同盟缔结之前仅仅两个月时候的事情! 另外还有个驻日的德国武官对于日本陆海军间的尖锐对立惊骇万分甚至自己出面调停。<sup>②</sup>我们必须注意在论证经过满洲事变至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时由于操之过急而给不合理的现实牵强地套上符合目的的解释。的确, 日本帝国主义走到的末路从宏观来看具有一贯始终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越是微观的角度来观察就越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合理决断的庞大堆积。问题不在于忽视或抹杀日本政治的这种非合理性与盲目性, 而是必须考虑在能将它利用到何种程度, 以及如何通过宏观眼光, 把它与历史的理性长远地结合起来。东京审判中, 上述检察团一

---

① 根据 1940 年 7 月 10 日来栖大使发给有田外相的电报。(No. 106)

② 根据保罗·温内克(Paul Wenneker)海军上将于东京审判中的证言。(No. 256)

方提出的“共谋”观点与辩护一方的“非策划性”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在法学理论上恐怕也是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然而在对现实的历史观分析中却未必如此。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八纮一宇的新秩序、向世界宣布皇道毫无疑问是被告们共同的愿望。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指出这是唐吉诃德式的梦想。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尚注意气质修养，他们会对露骨地表白这种梦想感觉难为情，而其他人则坚信梦想的实现并寄希望于更遥远的未来，即便是他们当中最狂热的人物，当他渐渐靠近风车并将其庞大气势与自己的手中枪两相比较，也会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sup>①</sup>可是他们又都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哆嗦，同时又闭上眼睛勇往直前。如果说他们渴望战争，此言不假；如果说他们想要回避战争，又不由地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是事实的真相。他们不顾政治权力中所有的非计划性和非组织性，毫不犹豫地对准了战争的方向。不，如果不妨采用逆说表现，那正

---

<sup>①</sup> 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关于“根据外交谈判，若至10月上旬我要求尚无途径得以贯彻则决定立即对美(英、荷)开战”的问题期限日益迎近之际，在荻外庄召开了近卫首相与陆相(东条)、海相(及川)、外相(丰田)及铃木企划院总裁之间的会谈，会谈上当时政府和军部的态度均完整地要约在铃木贞一的口供上。这在近卫手记及其他资料上也能得到证实。

“海军内部判断日美战争为不可能但不希望在公开席上言明，陆军未必要求战争，但反对从中国撤兵，而且只要外相不同意从中国撤兵，日美谈判就不会成功。因此，首相能够回避战争的途径只有两条，要么让海军表明其潜藏着的意向，要么让陆军默认海军内心的判断，并令其同意日美谈判成功的前提条件，即从中国撤兵。”

也就是说此时三者的立场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僵局。东条在此坚决反对撤兵结果导致内阁解散，但即便在此时际，他对依靠皇族(东久迩宫内阁)势力抑制军部内强硬论的可能性也还是不免有几分动心。

是这种非计划性才推动了“共同谋划”的进行。这里存在着日本“体制”最深刻的病理。东京审判的庞大记录毫无遗漏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一逆说的真理。<sup>1</sup> 在法庭上,不光是所谓一级战争罪犯的人们,还有构成当时政治权力的宫廷、重臣、军部、政党等的代表人物由于检察团与辩护人方面上逾数百次的证人传讯也几乎一个不漏地登场,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阐明了日本政治无比复杂的状貌。不仅从这些人们提供的事实内容中,而且他们在法庭上答辩的方式本身就鲜明地反映出了日本统治阶层的精神及行动风格。以此为线索来理出日本战争机构内在的精神气质正是下面要进行的尝试。当然问题实在过于庞大,本论稿只能提供其若干侧面。而且从中提取出来的各条原则又极为平凡无奇,也许对于我们来说毋宁属于日常的见闻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便更不该忘记面对这种平凡事实引起如此巨大结果时经常产生的新鲜的惊诧感和强烈的戒备心了。

## 2. 与纳粹领袖的比较

无须等待弗洛伊德学派的诞生,法西斯本身就随处体现着变态的精神状况,并多少伴随有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一点在东西法西斯身上并无多大区别。但是这种异常心理的构造及发现形态在纳粹德国与军国日本之间却是相当——或者说是显著不同的。最明显的是纳粹领袖的出身与我国战犯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许多纳粹的最高层干部都没有学历,而且在掌握权力之前也几乎没

有像样的地位。<sup>①</sup> 然而站立在市谷法庭的被告们，无论哪一个都是最高学府或陆军大学出身的“高材生”，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毕业之后经过一帆风顺的出世道路成为占据日本帝国显位要职的高官。不仅如此，纳粹领袖还是吗啡中毒者（戈林）、男色恋慕者（希姆莱）和爱耍酒疯者（罗伯特·莱伊）等这些被正常社会意识所排斥的“异常人物”的集合，可以说他们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人”（Outlaw）。我国的被告当中也有像大川（周明）、白鸟（敏夫）这样的正式精神病人，也有像松冈那样被看作处于临界状态的人物，但是从整体来看，不管其政治判断力与行为显得多么难以理喻或者违背常识，人们也很难把他们视为天生的精神异常者。他们非但不在受正常社会意识排斥者之列，而且其中的许多人还是年纪轻轻就有望任未来的大臣、大将，或者原本就受祖先荣耀的荫庇，具有令周围羡慕的门第出身。从人性的类型上言，他们中没有纯粹的“无法无天者”。军阀，尤其在陆军被告身上或者多少带有这种因素（例如满洲事变当时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在当地的行为了以及三月、十月事件中的桥本等等），但他们一半是属于小心翼翼

---

<sup>①</sup> 在这点上拥有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Ph. D）头衔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便属于“稍显异类”的知识分子。对许多纳粹领袖而言，莫如说没有这样的地位或学历更加光荣，他们可以借此引起大众的亲近感，而且事实上他们也成功地做到了。获得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在柏林的某个工场作了如下演说：“德意志同胞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德国的各位工人！今天我在各位及各位以外数百万工人前面演说，我想我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具有这一正当权利。我自身正是来自于你们诸位的阶级的。……我今天是在向我自己所属的你们这个阶级进行呼吁……我正在率领一场战争，为了我们勤劳勇敢的工人以及我们的劳动人民、数百万大众……我不需要任何头衔。我凭自身力量得到的我的名声即是我的头衔。”（F. Schuman, *Nazi Dictatorship*, 1936, 第 259 页）这样的演讲东条就是心里想做也办不到。

翼的俗吏,特别是随着地位上升后这一面显得越发强烈了。“无法者”类型也在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他们正如“浪人”这一别名所示,其特点在于不登权力地位;与此相反,他们不断出入于权力者的门庭,作为令权力者们稍觉可怕的属下,还从那里拿着不定数的收入,<sup>2</sup>活跃在舞台后面。<sup>①</sup>那些站在法庭上的被告们不如说是受了远在其地位脚下的、官民中大小“无法者”摆布的机器人,这样说可能毫不为过。东西法西斯权力的相异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东西领导人的这一反差对比也引起了检察团一方的注意。故塔文纳检察官以如下话语结束了最后总结发言:

眼前这些人不像站在纽伦堡审判台上的那些战争罪犯,那些人是犯罪手段老练齐备,且除了犯罪之外一无所知的所谓犯罪环境的渣滓,而这些人原本则不是无赖恶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精英,被委任了国家的命运,是受国民坚定信赖的正真的领袖人物。这些人人都知道善恶之别。可他们尽管十分了解这种分别,却自动选择了恶,无视其义务……选择了必然给数百万人带来死与伤害……带来破坏与仇恨的战争之路。……对于这种选择他们必须负罪。(No. 416)

如果想把被告们的心理及行动作为法西斯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在他们的受国内及国际精神异常者的影响感染这一点上,

---

<sup>①</sup> 所以虽然同样是“无法者”,但与纳粹类型有别,参照本书第一卷第二章“日本法西斯的思想与运动”。最生动地揭示我国法西斯运动中活跃的无法者类型的有《日召自传》(后改题为《一人一杀》并进行了增补)。

是成立的。他们正是受了汹涌澎湃的纳粹潮流的感染。然而对他们来说其本性并非纳粹，而是易受感染的素材。这一相异的社会经济基础已正由众多杰出学者解明。笔者只想通过比较他我两种战争领导人的言行来接近问题。

尽管日德法西斯给世界留下了大致相同的破坏、混乱和穷乏的足迹，但是与他们在那方面观念行动的完全一贯性相对，两者在这方面的惊人乖离形成了显著的对照。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即正当决定入侵波兰之前对军司令官做了如下讲述：“我在此要为宣传家提供战端开始的理由——这一讨论是否言之成理则无关紧要。胜者一方到后来大概不会被责问我们是否说了真话吧。战争一旦开始，一旦遂行，正义之类便不成为问题，关键在于胜利。”<sup>①</sup>这是何等不留情面的判断。那里体现的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所言的“能动的虚无主义”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像这种说绝了的言语在这个国家里是无论怎样的军国主义者也不敢搬到口头上来的。不管“胜者为王”的想法在内心有多么膨胀，但他们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判断原则公然表述。相反是要想方设法来隐藏它，给它披上道德的外衣。<sup>3</sup>所以，日本对其他民族施加的武力镇压往往被看作皇道的宣扬，是对其他民族的施惠行为。这种想法最终一旦被戏剧化，便如有人说“无须多言皇军的精神在于宣扬皇道、布昭国德。即，哪怕一颗子弹也必须带有皇道，任何一杆刺刀尖上必须铸有国德。谁如果反对皇道国德，那么就会被

---

① 依据纽伦堡军事裁判录中的引用。另外，关于同判决录的英语版由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的吉野事务官提供方便得以阅览。



这颗子弹、这杆刺刀穿射”(荒木贞夫 1933 年的演讲, No. 270) 一样, 只要“皇道”还没有渗透到每一个具体杀戮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 他们便绝不甘心。然而纳粹是另一种情形, 他们的党卫队队长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说:“至于一个俄罗斯人或一个捷克人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出现什么问题, 我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关心其他民族的繁荣或饥荒, 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德国的文化需要他们做奴隶的时候。”<sup>①</sup>这话又说得过绝, 让人没有回旋的余地。当然在对国内国外散布种种冠冕堂皇的标语这点上, 纳粹也毫不逊色。不过, 纳粹的领袖在运用这一手段时似乎相当清楚它到何处是单纯的标语, 到何处又是现实的区分。与此相反, 我们的军国主义者则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散布的标语搞懵了脑袋, 失去了对现实的清晰认识。且看原朝鲜总督南次郎大将的如下答辩。(No. 1935)

法官: 你为什么把它称作“圣战”?

南: “圣战”是当时一般的说法, 所以我就这么称呼了。

A. S. 科明斯·卡尔(Arthur Strettell Comyns Carr) 检察官:

这所谓“圣”字, 在对华战争中使用在哪些情况呢?

南: 没有这样详细地考虑过, 由于当时一般都叫“圣战”, 所以就自然使用了这种称谓。我们当时认为这不是侵略性的战争, 而是迫于形势的战争。

---

① 同第 91 页页下注。

再可以看一看原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的供词。他在口供书上对日华事变作了如下定性：

余历来相信。日华两国之战抑或所谓“亚细亚之家”内部的兄弟吵架……正如一家之内，兄长忍之又忍而弟犹乱暴不止故责打之一般，非为恶之，而乃疼爱之余促其反省的手段……

这似乎未必是后来添加的理由。他在被派遣上海之际于大亚细亚协会有志送别会的席上也致词说：“虽言赴战，其实我是怀着调教兄弟的心情前往的。”（下中弥三郎氏的证言）疼爱之余施行责打的结果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惨不忍睹的南京事件。统治权力不仅如此利用道德外衣欺瞒了国民欺瞒了世界，更重要的是它连自己也欺瞒了。许多人对于这种自我欺瞒和缺乏现实认识深感惊诧，与我国上层社会有广泛交际的原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Clark Grew）也是其中之一。他说：

我怀疑一百个日本人当中是否哪怕有一个真正相信日本事实上已经毁弃了《巴黎非战公约》（*Pact of Paris*）、九国条约和联盟协约。只有相对少数一部分会思考的人能够坦率地承认事实，有个日本人对我这样说——“是的，日本把这些条约全部撕毁了。日本公然发动了战争，什么满洲自卫，什么民族自决等都是胡说八道。但是日本需要满洲，总之只能如此。”但是像这样的人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日本人真的具有

惊人的自我欺骗能力。……日本人未必不认真。这样的义务（国际的），一旦日本人认为它有违于自己的利益，那么他就会对此做出偏向自己的合理解释，从他的见解及心理状态来考虑，他只不过全然诚实地做了如此的解释而已。

并且大使下结论道：“这样的心理状态要比他虽然厚着脸皮却知道自己不对的情形叫人棘手得多。”<sup>①</sup>也就是说，这正是纳粹头子与我们的军国主义头子之间的对照，前者无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意味和结果并付诸实行，而后者则在自己的现实行动不断违背主观意图的过程中行进。哪一方都没有犯罪意识。但是一方是通过从正面挑战犯罪意识来克服它的，与此相对，另一方则是不断地给自己的行动罩上伦理的烟雾以图回避。与地狱魔王美菲斯特·费雷斯正相反，日本的统治权力是“欲善而常为恶”，究竟哪一方更难对付不是能够轻易判断得出的。我们只能够万无一失地说，一方的精神较强，另一方的精神较弱。较弱的精神受较强的精神感染，想一想便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即便在同样呈现歇斯底里症状、出现绝望行动的场合，日本给人以神经衰弱得厉害的感觉，可以说劣等感往往构成其基调。“从强烈的劣等感中产生，却裹着同等强烈的优等感外衣的日本人的这种超敏感性，伴随着由虚张声势、盲目爱国及嫌恶外国人组织起来的国家宣传，把处理某种争执的手段和方法过分地夸大

---

<sup>①</sup> 约瑟夫·格鲁：《在日十年》，石川欣一译，上卷第114页。（不过，若干译文有改动）

和重要化,以致使其与争执本身相比显得不相协调。”这还是约瑟夫·格鲁的观察<sup>①</sup>,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依据明确的目的意识来控制手段,作为手段的武力行使就一点点糊里糊涂地扩大开来,直到把自身也目的化,这正是前述的无计划与指导力欠缺为何显著突出的原因。事实上,在纳粹的勃兴过程中,魏玛时代下层中产阶级的劣等感意识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那里,劣等意识仅见于支持纳粹权力者的阶层中,领导者自身则是完全相反的“权力意志”的代表,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现代版。然而在这里,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能力本身在表面的威容之下不断颤抖着其敏感且纤弱的神经。

要说领导者里面这种“软弱精神”的集中表现,恐怕谁都会立刻想到近卫(文麿)。事实上,无论第一次近卫内阁扩大日华事变,还是大政辅弼运动的变质经过,乃至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的始末等,里面都有他软弱的性格在起着致命的作用。木户(幸一)的证言说他是“一有事件发生就宣称想卸任的人”(No. 298);1941年10月上旬正当日美谈判的重要关头,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日期逐渐迫近的时候,他也对铃木贞一流露了“从政界隐退出家为僧”之类的念头。(铃木口供书)他在荻外庄日夜接待像井上日召这样的典型精神无法者也正是出于心理补全目的。然而软弱的只有近卫一人么?我在这里所指的“软弱精神”绝非专指像近卫那种即所谓性格上的软弱。作为其他例子,可举担任了东条内阁与铃木内阁的外务大臣的东乡(茂德)来看。他是战争结束时与军

---

<sup>①</sup> 约瑟夫·格鲁:《在日十年》,石川欣一译,上卷第195—196页。

部对抗主张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要角色之一，那时候他的态度举止中绝对看不到像近卫那样的软弱性格。然而在开战的12月8日晨，他作为外务大臣召唤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亲手递交帝国政府的对美谈判中止备忘录时，他只是表述了对会谈期间大使的通力合作的感谢之意，关于宣战及珍珠港的事情只字未提。格鲁大使是回到大使馆后才知道开战事实的。法庭上，当布莱肯尼(Ben Bruce Blakeney, 1908—1963)辩护律师讯问他为何在会见时只字不提战争状态的存在时，他所举的理由正是问题所在：第一，他料想格鲁大使通过那日早晨的广播可能已了解到开战——这姑且算说得通；第二，他认为宣战诏赦还未下达到内地时就不应该在没有必要的场合提及——这已经有些奇怪了。但是令法庭惊诧之甚的是第三条理由。他说：“我与格鲁大使是长年的知交，所以那个时候不太想把战争的事情提到话题上来。因为如果谈到战争即意味着告诉他两国关系到了这种地步，非常遗憾我们要分别了。”(No. 342)

这是什么话？也就是说，尴尬、不好意思这些私人感情上的顾虑在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外相与大使的正式会谈，而且是最重要时期的会谈之际控制了东乡，使他顾忌直截了当地表述眼前既发的明白事态。再说东乡当时的态度背后可能还交织着对偷袭珍珠港的内疚之意。不管怎样说，照顾对方心情到了这一步便不亚于对对方的最大耻辱。把这与美国国务卿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最后会见野村(吉三郎)、来栖(三郎)大使时的态度相比较，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与此十分相似的情况在国内政治中也存在。它发生在米内内阁在缔结三国同盟问题上与陆军发生冲突并

提呈总辞职的时候。那时候处境最微妙的不用说自是畑(俊六)陆相。他强行摆到首相面前的备忘录结果导致了内阁解散,可是他的行动中又有几分出自他的主动意志呢,或者正如辩护一方在法庭上申辩的那样,他受了闲院宫参谋长与阿南次官下面军务局内部意向的强迫呢,这中间的区别不易究明。总之,对于此米内(光政)讲述过如下一段插曲:(No. 391)

内阁总辞职后,我把畑叫到办公室,我记得对他说过这些话:“你的处境我非常理解,一定很苦恼吧。不过我可一点都不在乎哦。明白了?放松点,不用担心。”我握了握他的手。畑神情凄凉地笑了笑。这种笑是日本人特有的表示断念的笑。他的处境真是十分让人同情。

这简直就像“苹果之歌”里面的问题,但在此起支配作用的并非公的原则,而是一种私的相互的揣摩。畑作为陆相的行动不管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在米内的接见中他采取的态度大概与这里所讲的相去不远吧。这样看来,这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以第二军总司令官身份叱咤三军,并位列元帅府的将军在这里也显得够弱小可怜的了。

像这种矮小性构成了日本统治阶层的特色,而把这一特色最分明地暴露给世界看的便是战犯们对战争责任的异口同声的否认。这无须一一引用被告的态度也已是众所周知的,故在此用季南检察官的最后发言来作一个总结:(No. 371)

通过由元首相、阁僚、高级外交官、宣传家、陆军将军、元帅、海军提督及内大臣等组成的现存全部 25 名被告的答辩，我们听到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即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欲引起这场战争。同样，这历时 14 年从无间断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如入侵满洲、对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中任何一件都与上述情况相似。……他们无法否定自己所就地位的权威性、权利及责任，而且因此他们也无法否定把这些侵略战争继续扩大到震撼全世界的政策，他们泰然无事般地表示在他们面前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路途了。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东西方战犯在法庭上的态度之差别了。比如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就吞并奥地利一事如是说：“我必须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我甚至拒绝了总统的反对意见，把一切引向最后的发展阶段。”<sup>①</sup>他对于入侵挪威表现得相当“愤怒”，这是因为他事先没接到告知，而最终同意进攻时，他自认“我的态度完全是积极的”。对苏作战也遭到了他的反对，这说到底也是关系到时局的问题，即他的看法是应把对苏作战延期到征服英国之后。他确信“我的观点只根据政治及军事的理由来决定”。这是何等明快的态度。这才是向欧洲传统精神主动挑战的虚无主义者的明快，是怙“恶”不悛的无法无天者口齿锋利的叫骂。与此相比，东京审判中的被告与众多证人的答辩则一律像鳗鱼一般滑溜，像雾霭一般暧昧。他们要么避

---

① 同第 91 页下注。

开话头不从正面直接回答检察官和法官的问题，要么神经质地事先预测好问题的真意，抢先回答。米内党政证人始终假装糊涂的回答让首席法官急得发脾气，指责说：“自己听过的所有证人当中要数这位总理大臣最愚钝”，这自然成了新闻报道的消息材料。“这些不成为回答，用 Yes 或 No 准确回答”，像这样的话在公判的全过程中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从职业特点而言，军人该是最能对答明快的，可实际上他们属于暧昧类型。像原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中将是其中的突出例子。比如，关于 1938 年三国同盟建立的经过，他与塔文纳检察官有如下一段回答：(No. 322)

检察官：请回答我的提问。关于我刚才提到的同盟（指德英战争爆发时，规定日本有义务参加的军事同盟——丸山）你在当时是主张建立的，还是不主张建立？

大岛：我不主张建立（此前的问答中他已被屡次提醒应以是或否来回答——丸山）……（中略）

检察官：你是反对里宾特洛甫外相关于缔结这种同盟的提案的吗？

大岛：从日本方面来反对的。

检察官：请回答我的提问。

大岛：我并不是想逃避问题，可像这样复杂的事情很难用是或否来回答。

然后当检察官继续讯问“就通过缔结防共协定日本得到诸种利益一事，若彬中佐的陈述是否就代表大岛自身的意见”，并追究



防共协定的目的时,对此大岛只谈到协定的利益数起来有好几种,而协定的目的都已在口供上云云,想掩饰过去。于是,

检察官:我问你的是……正如刚才的提问中出现的若彬的见解是否也就是你的见解?如果你同意这种说法,你就说是的,如果不同意你就说不是。

大岛:在附带利益上面,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

其他还有一些颇具特色的答辩例子,因说来话长在此省略不提。言而总之,这样的暧昧而复杂的停顿由于日语——特别是汉语式词汇——所特有的微妙语感显得更加复杂暧昧,难住了法庭,这是不可忽视的。到底是因辞藻的神力带来好运的国家,诸如“拥戴陛下”“皇室的安泰”“内奏”“常时辅弼”“积极论者”等内容含混的言辞——尤其应该注意它们多与皇室相关——不知如何地给审判员与检察官的理解带来困难。依靠这种语言魔术,主体的责任意识就渐渐模糊化了。当“大亚细亚主义”的语义引起争论时,难怪法官一方会说:“我们关心的是行动的问题,对语言没有兴趣。”(No. 176)因为正如辩护人一方所言,八纮一字表示“Universal Brotherhood”的意思,皇道“与民主的本质概念相一致”,像这样转换自如的理念怎么让人接受得了呢?

不过,我们不能光认为那些战犯们只是利用语言来蒙混、敷衍一时。在这场战争中包括被告在内的统治阶层普遍地主体责任意识淡薄的原因,要比把它归为恬不知耻的狡辩、卑鄙下流的保身术等道德的层面更加深刻。这可以说无关个人的堕落问题,而是后

文可见的“体制”本身的颓废象征。若要探究这一点，首先应去看一看被告们总结了自己过去的行动之后是引用何种根据来替自己辩解的，这将是最好的着手方法。因为那里最清晰地反映着被告们的生活环境的内在精神气质。

### 3. 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一)

若对被告们千差万别的自我辩护进行区分，最后能发现两支大的逻辑矿脉。若问那是什么，其一是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其二是对权限的逃避。

下面先从第一点开始进行讨论。

何谓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即现实既已形成这一点成为最终承认现实的根据。几乎所有被告的答辩词中都有个共同的论据，即他们不得不遵从已经决定的政策，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支持已经开始的战争等。例如白鸟在巢鸭受讯之际，针对“你大概对在1931年至战争结束期间侵略满洲及中国的军阀抱有好感，与他们是朋友关系吧”一问，他回答说：“我与他们不是朋友。……我并不想袒护他们，但是在表面上我必须认为……他们所作所为的一切是合理的。”另外，当萨达西斯基检察官问及“你对所谓的日中事变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说“我考虑的是要尽早解决该事变，至于反对或赞成这样的表述我认为是不适用于既发事实的。”(No. 332)大岛也在被问及是否赞成三国同盟时辩白说：“那已是作为国策决定下来的事，再说大众也支持，我当然也就支持了。”(No. 297)关键的不是这种辩解在实质上是否成立的问题。众所周知，大岛之类在三

国同盟当中也算是最积极主动的人物了。这里形成问题的是他们的态度本身：一方面主动地制造着事实，而一旦事实被制造出来，又反过来想依靠周围及大众舆论。

接下来以木户为例。这也是有关三国同盟的。(No. 297)

检察官：下面这个问题，我想你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我的提问是，在平沼内阁期间，你是否一直采取了反对德国军事同盟的立场？

木户：我作为个人，是反对这个同盟的。但是五相会议对该问题研究了很长时间，我从总理处听说此事已到了三月份。因此，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我认为那是绝对难以抗拒的。

同样，当东乡被问及他在就任东条内阁的外相时对三国同盟赞成还是反对时，他也回答说：“我的个人意见是反对，但所有的事情都有经过。……即前面既已决定的政策一旦变成既成事实，再想改变它并非那么容易的”云云（在口供书上他亦宣称自己为反对加强同德国的关系尽了全力）。另外，在第八十一次议会上发表三国同盟礼赞一事被进一步追究时，他说：“那时候的公开演说中没有包含个人感情的可能及余地。……我当时作为日本的外务大臣应该是那番话，地位决定我不得不说那些话。我想这么说应该是最准确的。”(No. 340)在此也是，木户与东乡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真心地反对三国同盟，又采取了何种反对行动的疑问可姑且不论，而他们面对重大国策不能忠实坚持自己的观点，相反把它当作“私情”加以扼制且选择服从周围作为指导准则的“精神”才是问题。

如果我们读一读被告陈述了对关于满洲事变以后不断续起的政治事件及国际协定几乎全部反对的口供书，简直会让人觉得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是超出了人们能力之外的天灾人祸。费克塞尔检察官针对小矶(国昭)被告的口供书用下列话语痛快淋漓地抨击了这种漫画式的辩解：

……你反对了 1931 年即昭和六年的三月事件，你又想阻止满洲事件的爆发，另外你还曾反对日本在中国的冒险，你还反对三国同盟，你还表示反对加入对美作战，甚至在充任首相时你为解决支那事件做了努力。可是……你说你在所有方面的努力都被完全粉碎了，而且你的思想及希望的实现受到了阻碍，可如果你真的从良心上不同意这些事件、这些政策，并且对于这些从实际上进行了反对，那么为何你还一次又一次地自动接受并占据政府部门中的要职，而且……还自动成为你说自己竭力反对的那些至关重要事项的领导者之一呢？

对此小矶的回答也如前例，他说：“作为我们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自己的意见只是意见，讨论只是讨论，假如国策已经决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按国策办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也是被尊重的行为方式。”

通过上面事例可以得出结论，即这里所说的“事实”经常不是被看作正在制造出来的事件或者将被制造出来的事件，他是指已经制造出来了的，不，说得清楚些是指不知从何处发生起来的事件。所以，所谓“现实”行动便是指生存在过去的束缚当中，并且现

实因此经常被理解成由过去而来的盲目的必然性,而并非趋向未来的主体形成。在这种意义上,1940年7月26日,格鲁大使与松冈外相在初次会谈中进行的对话可以说是极富暗示性的:

松冈氏认为,在历史发生激变的世界里,难以控制的盲目力量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我(格鲁)说我承认盲目性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外交与政治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把这种力量导入到健全的渠道中来,在不久的将来,如果我们两人坚信自己是带着正确的精神去接近、去摸索日美关系现状的话,这将会对有效控制他所顾虑的盲目力量做出很大贡献。<sup>①</sup>

丧失了主体性,唯受盲目的外力牵着鼻子走的日本军国主义“精神”与不断考虑着目的及手段的平衡关系的实用主义精神在此不正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吗?<sup>②</sup>那么在纳粹方面这一点又如何呢?1939年5月23日关于波兰问题希特勒已作过如下发言:

解决本问题需要勇气。通过让自己迎合既成形势以回避问题的解决,像这样的原则是不允许的。反过来我们应该叫形势适应自己。要做到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侵入外国或进

① 约瑟夫·格鲁:《在日十年》,石川欣一译,下卷,第49页。

② 另外,松冈在1940年关于缔结三国同盟的枢密院会议上也声称“日美战争是命中注定的”,(No. 76)次年5月,就日苏中立条约与三国同盟关系与德国驻日大使欧根·奥特(Eugen Ott)会谈时他也认为:“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时,日本无论哪个总理大臣或外务大臣都绝无法让日本保持中立。那种情况下,日本将自然必然地站到德国一侧攻击苏联。”(奥特致德国外相的电报, No. 107)大放必然性宿命论的厥词。

攻外国领土。<sup>①</sup>

这是又同格鲁发言有着不同意思的，即属于马基雅维里派的主体性，它也明确表现了政治指导作用。入侵波兰正是纳粹领袖在充分的战略讨论与主动性之上积极选择出的方法。不过该时期纳粹的形势判断也未必正确，而且事实上，特别在欧洲战场，越到后半期，冷静充分的计算已逐渐让位给了众说不一的决断。但即便这样，跟始终被“客观形势”拖着一步步陷入泥潭的军国日本的领导人还是终究不可相提并论的，这点在后文中也有涉及，毋宁说它可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意志帝国及沙皇俄国的情况相比较。

前面已述，日本的最高掌权者是他们下属官僚的木偶，那些下属又受派出地的军部以及与之勾结的右翼浪人、流氓无赖的摆布，所以他们为何不得不气喘吁吁地追随由这股匿名势力制造的“既成事实”，其心理根据也就不言自明了吧。从战前以及战争时期，为了决定最高国策方针，诸如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等这类名称赫赫的会议就召开了好几次，可是一读其记录，谁都会为讨论内容之空洞大吃一惊。<sup>②</sup> 实际上，这些讨

---

① 引用自纽伦堡的审判记录。

② 这种最高会议的空洞特点一方面来自上述各人均以口号式言辞逞强的“软弱精神”。会议内容被军队当席出席者当即泄露给下属“无法者”们的可能性，不，甚至是现实性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1945年（昭和二十年）4月5日关于推荐继任内阁的重臣会议上几名成员的发言实可谓意思“含蓄”。这正反映出所谓的重臣之间是如何地缺乏意见沟通，于是便相互试探来了解彼此的想法。可试举木户口供书中所陈述的一例。——休战那年的6月13日，木户与铃木（首相）谈论结束战争一事时，木户告诉铃木说：米内海相说“首相的态度似乎还相当强硬”，铃木笑了，他说：“我倒觉得米内还很强硬，不是吗？”于是木户便“恍然大悟，没想到此二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可见连米内与铃木之间都是这种情况。

论内容早已由会议的干事们(武藤等说他们只是单纯的书记员或者联络员)即陆海军军务局长、参谋本部军令部次长等准备妥当了。更有甚者,这些干事下面的军务局员、参谋本部科员也以干事助理的身份来决定实质性方案。而且,出入军务局中的正是右翼亦即舒曼所说的狂热主义者和夸大幻想症患者,他们与半为官僚半为无法者的校官级科员一起点燃了嚣张气焰。但是就连他们也控制不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更何况那些内阁与重臣,他们只有茫然看着事态发展,一边嘟嘟囔囔地服从“必然性”的结果了。就这样,柳条沟与卢沟桥的一发枪响漫无边际地扩大开来,“无法者”的阴谋便逐个地由金字塔式的上级组织追认为既成事实并将它上升到了最高国策的地位。<sup>4</sup>

另外众所周知的还有,以军部为核心的反民主主义的权威主义意识思潮开始总进军时,军队内部被称作“下剋上”的逆说现象正与之平行发生并激化了。三月事件与十月事件连个像样的处罚都没实行而告终,这促使后来恐怖主义活动频发的事实毕竟是无法否定的。像十月事件中,近步一、近步三的士兵被动员出来,从霞浦出动了轰炸机,首相官邸的内阁会议受到袭击,阁僚全部遭枪击,参谋本部与陆军省被包围,其上司被强迫要求发布军令,这是一次由恐怖主义者发起的大规模“政变”计划。然而此时南(次郎)陆相、杉山(元)次官等已经失去控制暴徒的力量,而只得求助于在该次计划中预推为首相的荒木(贞夫)来镇抚。所以,后来虽然对主谋者进行了保护拘留,但最终没有严加惩罚,结果不了

了之。<sup>①</sup>次年三月，当永田军部局长被木户、近卫问及事件始末时，他回答说：“本来应依陆军刑法加以裁决，但鉴于其动机精神，且考虑到国军威信等，最后以行政处分给予了解决。”（木户日记）军队丧失“威信”的实情在这里暴露无遗，而且这并非因为对暴徒的处罚，相反是由于与他们的妥协以致不得不承认那些不法的既成事实。<sup>5</sup>

不过，这种军队纵向指导性的丧失反过来在横向关系上被利用作了贯彻自我主张的手段。陆军大臣在内阁会议或御前会议上反对某一措施，或坚决要求采用某一措施时依靠的根据必定是“那样一来我部内就不好控制了”，或者“那样的话我就无法保证军队的统治”等。例如，1940年（昭和十五年）初阿部内阁辞任时，军部主张推出近卫，而强烈反对宇垣（一成）和池田（成彬）。于是近卫对畑（俊六）说：“认为宇垣不行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有一段经过，尚可以了解，而连池田都不行就令人纳闷了。陆相您能干涉一下吗？”然而畑的回答让近卫大吃一惊，他说：“凭我的微薄力量是根本无法干涉的。如果勉强推出池田，我担忧难免会发生二二六那样的事态。”<sup>②</sup>这一插曲在反映二二六事件以后的“肃军”真相的意义上，是耐人寻味的。而且这种逻辑在前述金字塔式组织中一层

---

① 在该事件中积极活动的桥本欣五郎、长勇等人自满洲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开始几乎连日连夜地起居在东京各地的酒肆妓馆，并时不时地集合尉官级将校摆开“以鼓舞士气为目的的宴会”。（田中清少佐手记·岩渊辰雄《军阀系谱》第67页）要问长勇等将校都是些什么人，其实都是动辄拔刀的狂热无法者，但在该事件的计划中他居然被预定为夺取政权以后的警视总监。假如这一旦成功，首先日本也许也会出现类似纳粹的法西斯。

② 参见近卫手记《朝着和平的努力》，第137—138页。



层向下面传递转嫁。从军务局长无法控制——军务科员无法控制——派出地的军部无法控制<sup>6</sup>，一直到最后说国民无法控制。所谓“国民”该是指前面已提到的出入于军务科等地的右翼分子，还有构成背景势力的在乡军人及其他地方上的指导阶层。军部往往利用右翼或报道机关在这些阶层中煽动散布排外主义和狂热的天皇崇拜思想，但同时又反过来受到蔓延开来的“舆论”的束缚，从而不得不一点点地把事态推向危机。在从缔结三国同盟到日美谈判破裂的过程中这一点体现尤甚。1941年（昭和十六年）10月中，军部自身面对“国民”已陷入了下不来台的局面。日美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从中国撤兵的问题，这正表明既成事实的压力有多大了。东条在派遣来栖大使前往美国之际还反复强调只有这一项上绝对不能让步，他说如果在这点上让步，那么就“无法面向靖国神社安眠”（来栖三郎《泡沫般的三十五年》第72页）。松井石根也在《大亚细亚主义》杂志上大肆鼓吹：“如今若还打算同英美妥协，与盎格鲁-撒克逊合作共同处理善后之类，这叫人如何面对十万英灵？盖以十·万·英·灵·之·名，我·们·坚·决·反·对·对·美·妥·协。”可见，国民无法控制的逻辑再次飞跃到了“英灵”无以抚慰的地步，受·过·去·的·束·缚至此已臻极点。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笔者曾经指出：“转嫁压抑”是日本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构造之一。<sup>①</sup> 这意味着这一种体系，即日常生活中的上位者把压抑依次顺位转嫁给下位者，借此保持全体的精神平衡。这种原理究竟与上述的日本法西斯体制中的“下剋上”现

---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一章“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

象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两者是矛盾的吗？并非如此。“下剋上”是转嫁压抑这面盾的另半面，是转嫁压抑委让的病理现象。下剋上毕竟是不负责的匿名势力的不合理发作，它只发生在下层力量没有公然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它可以说是倒错的民主。只要民主权力还真正拥有在制度上从下层公开选出的尊严，它反而会发挥强有力的政治指导作用。与此相反，由上层权威专门统治的社会如果统治者矮小化，其结果便是上层总是战战兢兢地顾虑部下或其他被统治阶层的动向，实质上便被下位者中的无法分子或无责任的街头闲人的意向拖得团团转。在抑压委让原理通行的世界里，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的不满已经没有可委让的地方，所以必然要向外爆发。这就是为何非民主主义国家的民众容易陷入狂热的排外主义的原因。他们的排外主义与期待战争的心情中注入有对日常生活的不满。这样，为了防止不满的逆流，统治阶层便自动出面煽动这一倾向，反过来又在危机阶段屈从于那种无责任的“舆论”，从而丧失了决策的自主性。<sup>7</sup> 在日本军队内部的“下剋上”倾向以及与此相结合的无法者们的猖獗活动在军备减缩与满洲问题等国际性契机之下激化并非偶然。德国历史学家 F. 迈涅克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曾经指出，随着机械文明大众的登场与军事技术的发展，本来属于政治手段的军备机构演变成狂暴势力开始自我运动，同时政治家再也控制不了大众的动向；他还论述了从 19 世纪后半期开始，明晰的“国家需要” (Staatsnotwendigkeit) 概念取代模糊的“国民需要” (Volksnotwendigkeit) 概念的主旨，并称之为国家理性的“危机”。<sup>①</sup> 在此，他始终考虑着第一次大战中德

<sup>①</sup> F. Meinecke, *Die Idee der Staatsrai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1924, S. 527-529.

国的例子,然而他的断定果真能那样地一般化吗?我们认为军事机构脱离政治的自我运动以及国民中间不负责任的强硬论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国与这次的日本之间能发现的显著近似性,而该近似性与两帝国都具有权威性的、金字塔式的国家及社会结构,以及其中的政治领导人都趋于矮小的这一事实是分不开的。

#### 4. 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二)

下面是东京审判中的战犯们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第二个基本相同的论点,即他们认为被起诉的事项不属于官制上的形式权限范围。辩护一方的申诉在这一点上与之步调十分一致。诸如贺屋、星野之类官僚中的官僚把“单纯作为行政官的事实”“毕生为一介官吏”等作为根据自不必论,其他比如大岛的辩护人指出“被告人大岛被控告的行为其实是他作为主权独立国家代表合法地行使职务”,“他只是单纯承担通过外交事务机构传达指令及翻译暗号的任务”。(康宁汉姆(O. Cunningham)辩护律师在公诉被驳回的申述, No. 161) 冈(原海军省军务局长)的辩护人也申辩道:“关于被告被提及的所有证据表明他经常处于秘书官以及联络官的地位,他还未曾上升到决策层内。由他传达,以及由他或他的下属立案的诸通牒都是包含着上司的种种意思决定的”(沃伦(F. N. Warren)辩护人, No. 161)。对于武藤(原陆军省军务局长)也有辩护说:“他作为军人的大部分经历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是已经清楚地证实了的。……即决定政策的是他的上司,他的任务正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承认的军人概念所示,只把上司的命令付诸实践而

已。”(No. 161)这些辩护正是各被告自身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例如,翻开武藤章的问讯调查书可以看到,他被问及日本军在南京、马尼拉的大屠杀事件时,交待了这些不光彩的行为开始于西伯利亚出兵之际,以及为提高军队素质将校中间展开了关于教育方式的讨论,还有他自己因长期在教育总监部就职,因此对真正的军队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等,之后针对提问他还做出了如下回答:(No. 159)

问:1918年西伯利亚出兵后出现的这些弊病你说你注意到了,那么为了匡正,你在对即将加入陆军的青年施行训导教育方面采取了怎样的改革呢?

答:日本派军前往西伯利亚时我还只是一名少尉,所以即便知道这种情况也根本无能为力的。

问:但是,当你具有了与担当军队训练的高级副官职务相称的实力之后,你对自1918年以来一直耿耿于怀的那个弱点进行过怎样的改善吗?

答:后来我虽然担任了陆军中将,可因为不属于师团长,所以还是无能为力。不管想实行什么事情,一般非要到师团级别才行。

问:你当军务局局长时又怎么样呢?

答:军务局局长只不过是陆军大臣手下一属员而已。而且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发布命令的权能。

问:假如你曾任师团长或者假定你担当了学校教育及训导,你必定会对学校施发命令以改善并加强那些你自1915年就认识了弱点吧?

答：是的。（证人笑）

肯定最后的提问时武藤发笑大概是由于不好意思吧。但是不仅仅关于被告们在中央政府中的行动，而且关于第一线上司令官的行动，“法规”与“权能”也往往被当作防塞。这又可通过 H. G. 诺兰（Henry Grattan Nolan, 1893—1957）检察官与松井石根原大将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问答来看，下面将加以稍长的引用。（No. 320）

检察官：刚才前面你说了军纪、风纪是你下属司令官的责任，对吧？

松井：是师团长的责任。

检察官：你是中支方面军的司令官吧？

松井：是方面军的司令官。

检察官：这么说，你是想表明因这样，中支方面军司令官一职连维持你麾下部队的军纪、风纪的权限都没有，是这个意思吗？

松井：我作为方面军司令官对部下各军是有作战指挥权的，但是没有直接监督各军内部军队纪律、风纪的责任。

检察官：但是你总有监督你麾下的部队维持军纪、风纪的权限吧？

松井：与其说是权限，还不如说义务来得正确。……  
（中略）

检察官：这样说是由于你所指挥的军队中还有军司令官的存在吧。并且你通过这些军司令官实行了种种有关军纪军

风政策措施,对吧?当然还包括惩罚。

松井:我本身是没有惩罚或审判的权利的。这些都在军司令官、师团长手中。

检察官:但是你能够命令在军团或者师团召开军法会议吧。

松井:法规上没有规定我有命令的权利。

检察官:那么,你说针对在南京发动的暴行你欲施予严惩,且为此做了非常的努力,这又如何解释?

松井:作为全盘上的指挥官我只有希望下属的军司令官及师团长去这么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权限。(!)

检察官:但是我认为指挥军团的将官对下属表明希望时一般都以命令的形式……

证人:这一点在法规上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读了这段回答,简直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比起检察官所属的国家,松井的祖国有更多近代的“法制”特色。把“上官的命令及朕之命令”这条敕谕奉为 *ultima ratio*(最终依据)的“皇军”现地总军司令在此变成了小心翼翼的属吏,他们战战兢兢地恪守法规,对于直接权限以外的事务就是对部下也只表明希望而已。

这些被告的态度也决不是只在那个时候才想出来的责任逃避。大部分被告是实际上的帝国官吏,在政治上不管他们如何表现,其灵魂深处总是潜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官僚精神”的。所以,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在法律严格规定的职务权限内行动的专门官吏。尤其因为这道

“机关”而被百分之百利用了的是旧宪法规定的统帅大权与编成大权的区别，还有国务大臣的单独辅弼制度以及国务、行政大臣的重复制。军队通过军务局这一统帅与国务的联络窗口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这点已无须重述。在这个意义上，武藤陈述军务局作用的下面这段话实在含蓄：

陆军大臣必须实行内阁会议决定的事项。为此必须要有政治事务机关。军务处正是担当这一政治事务的机关。军务局的所为是这一政治事务，而并非政治本身。〔口供书(No. 313)〕

这是武藤用来把军务局局长这一显著的政治活动角色正当化的根据。他的工作因为是政治事务所以对政治有过问的份儿，又因为是政治事务所以是被解除了政治责任的。军政系统的陆(海)军大臣——次官——军务局这一系统与部署作战用兵的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次长——参谋本部(军令部)各科这一系统之间在所管事项上当然也有许多重合交错的地方，所以东京审判中常常能看到两者互相推卸责任。(如俘虏的待遇规定之类)尤其就国防计划的决定和现地战争扩大对当时的陆(海)军大臣追究责任时，必然被举出的理由是对统帅大权无容置疑。可是，如果让统帅部一方来说，那么便是“一国的作战计划是以该国国策为根据形成的。但是陆军省一般担当这一国防政策。而且有关国防大纲的事也是陆军省所主管的。但是参谋总长所担任的是有关国防用兵的事项……作战计划的决定完全独立于国策和国防政策之外，这不但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也不曾有过。”(田中新一证人

的证词, No. 159)其结果是责任主体就没有了着落。<sup>8</sup>

我国的旧内阁制是如何妨碍政治体制一元化的, 出于遂行战争的需要它又是如何企图去克服或使之合理化的, 并且是如何不获成功的, 等等。在这项共同研究中, 辻教授的论稿里有明确的解说。<sup>①</sup> 在此只想用塔文纳检察官的总结发言中概括的被告主张来表明在强化政治力量目的上建立起来的核心内阁(inner cabinet)式的组织也最终没能转变国务大臣的“精神”这一事实。

广田、平沼、板垣、贺屋等有实力的四相会议成员或五相会议的成员认为, 他们如果得不到其他阁僚的同意或承认实际上是没有权力的。而且如果没有其他阁僚的承认, 任何一项重要事务都无法进行。可另一方面, 像荒木、木户等不属于上述会议成员的阁僚则以那些事项的実施中他们没有接到报告为理由, 或者以即使接到报告, 他们也只是根据上述会议出席者的专门意见点头同意而已的理由, 认为自己不应受到责问。这样一来, 出现了对于实施该共同计划中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 内阁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的局面。

总而言之, 像这样的“官僚精神”不管积淀有多深, 那里却体现不出词语本来的政治统合的意义(Political integration), 代之出现的是如山般的文书与通牒, 频频颁发的法令和新设的官制。关于

---

<sup>①</sup> 辻清明《为割据而苦恼的统治机构》(《潮流》昭和二十四年五月, 后收入《日本官僚制研究》)。



这一点,就 1940 年按照敕令第六四八号条令创办的总体战略研究所一事在法庭上展开的论争极有意思。该研究所打着“总体战研究所隶属内阁总理大臣管理,掌握有关国家总体战的教育训练”(第一条)的堂堂目的,吸收陆军大学、各省部乃至实业界的代表为学生,轰轰烈烈地创办起来。在那里以设想日美战争爆发为前提,学生们被布置研究从纯军事的作战直到国内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总动员体制的种种规划,所以检察团重视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它的实态又如何呢?当时的学生堀场证人的发言说:(No. 100)

该研究所的官制的确是在总理管辖之下,但总理一般也只是在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露面,没有任何指导和指示。我们确实在研究所里待过一年,而且还希望它能更受到一点重视,可事实上总的说来该研究所成立之后就没人管了。于是作为研究所这边就像先开店后再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该怎样来装点门面一样,被任命为职员的人们首先要从当时碰到的事情开始着手。这是研究所的第一步。……职员虽然集合起来了……可是究竟教点什么好呢,由于一味钻在这个问题上了,结果关于调查研究方面丝毫没有动手进行。而在此期间政府也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和指导。

这一表现也许有点夸张。但是知道所谓的“官府办公”一词的我们日本人大概会从直感上领会其中包含的真实性吧。对于此,兰伯特(J. G. Lambart)检察官反驳道:“我们能相信 1940 年 9 月日本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在办这所学校上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吗……在那种时期,为了一项实际上毫无目的并不重要的工作把这一重要人物<sup>①</sup>招至东京去浪费时间,这能让人认真接受吗?”(No. 379)也难怪他提出这种疑问,因为用民主主义国家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理解的非合理性在这个世界里是通行无阻的。关于这点还值得一提的是星野、铃木、木村等被追问作为该研究所“参赞”的责任时,清濑辩护人做出的反驳讯问的结语和堀场证人对此的回答。(No. 100)

清濑:最后只提一点,你有长达25年的官吏生活经历,其中有无只拥有参赞、顾问这些在我国有时属于有名无实身份的情况?

堀场:除掉特别的例外,顾问、参赞之类一般都是有名无实的装饰品的代名词。……我认为自己在很多场合都是有名无实的存在。

此外,“以权限为借口的逃避”分别由于与天皇权威的纵向关系,各自的“权限”转为绝对化,于是权限之间便产生了无休止纠缠不清的葛藤,官僚身上没有一贯始终的立场和思想意识,而且作为专门官吏也不允许这么做。迫水久常氏某个时候曾口吐名言:“官僚必须是有计划的机会主义者。”乍一看似乎有着某种思想,实际上那也并非与他的“人格”相关联,不如说是与他的“地位”相连接着的。众所周知,军部法西斯的兴起是以海军内部的军政派与军

---

<sup>①</sup> 指由关东军参谋长调任研究所所长的饭村中将。

令派围绕《伦敦裁军条约》的兵力决定产生矛盾为开端的,关于这一矛盾对立水野广德说过如下一段话,真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军政系也好,军令系也好,都不是人员的问题,而是椅子的问题。假如末次为海军次官,山梨是军令部次长,那么卖国的罪名或许就得由末次来担负了。”(“新台湾总督小林济造”《中央公论》,昭和十一年,10号)这多少与军部官僚内部各种“思想”的对立是相符的。不过,说是思想对立,并没有一点表示内部的抗争对立相对缓和的意思。其实恰恰相反。同举国一致与一亿人一条心的口号越发狂热成正比,舞台后面统治权力之间的横向分裂也日益激化。而且只要这种分裂源自秘书长的意向,那么它就会无限地进行原子式分裂。人们以为可能是文官武官间的对立,可实际上其下面的陆海军也对立着;就是陆军内部也有对立,比如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更甚者有陆军省内部的军务局与兵务局之间。……企划院官僚与满洲官僚、内务官僚间的互相争斗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并且处于最终统合这些多元政治势力地位的天皇则始终坚守着立宪君主的“权限”,直到终战的最后关头也根本不下达主动的“圣断”,让人几乎看到了模拟立宪制濒死时的样子。就是这样,日本帝国的命运要为其内部的暗斗一直苦恼到其崩溃之日。这里的原因当然一个是天皇的软弱性,另外恐怕还与那些惧怕革命甚于惧怕战败,宁可选择对外战争也不选择阶级斗争的贴身重臣们<sup>9</sup>的辅弼力有关吧。但是更要紧的是那里体观着绝对君主制尤其是颓废期的这一制度所共有的运动规律,这一点不能疏漏过去。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官僚制度的政治机能中如是说:<sup>①</sup>

---

<sup>①</sup>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kap VI. S. 672.

职务秘密这一概念是官僚制的特殊发明，简直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这种态度那样得到官僚制的狂热拥护。尤其在许可范围以外，它决不是出自纯粹即事动机的态度。当官僚制与议会对立时，针对议会通过自己特有的手段（比如所谓的调查权）从当事者那里得到专门情报的所有谋划，官僚制会凭其坚实的权力本能与之抗衡。所以，过于不通事理故而力量薄弱的议会对于官僚制而言自然是最理想不过的对手……即便是绝对君主，不，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于官僚们掌握着专门情报的优势，绝对君主才真正是最无力的……只要立宪君主在社会生活中与一部分重要的被统治阶级保持意见一致……同把情报信息全部依赖官僚制的绝对君主相比，他更能够给行政事务带来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极为常见的。例如俄罗斯帝国的沙皇基本上办不到他的官僚反对的事，或者不断与官僚的权力利害产生冲突。直属于沙皇这一绝对统治者的大臣们……使尽浑身解数铺张着个人的阴谋之网勾心斗角，特别还通过不断提呈大量“奏议”来相互攻击，可是对此，沙皇这个门外汉完完全全地不知所措了。

一般在君主制下，能够确立政治统一，并防止上述的那种君主的直属官僚滥施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统治层原子式分裂的可能性只有两种，或者至多只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君主真的具有所谓的神授资质和伟大人格时（或者君主的直属官僚有这种特性时，即他已不再是个单纯的官僚），另一种情况是存在有像民主主义国家那样实质性的强大议会时。可是第一种情况不用多说是极为稀有

的,而第二种情况也除非在十分特殊的历史条件(如英国)之下才有可能。由于纠集在君主周围的贵族阶层出于权力利害关系会本能地抑制那种民主立法政府的兴起,因此近代君主制威严的统一表象背后其实是由不负责任的匿名势力在乱舞权棒,可以说它具有有一种内在倾向。俄罗斯帝国的情况已如前面所示。德意志帝国在威廉一世与俾斯麦的联合失谐后也走过了相似的经历。“外交巨匠俾斯麦留下的内治遗产是一批既没有任何政治素养也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只一味依靠并期待着伟大的政治家来替自己安排一切的国民。他击破了强有力的各个政党。他不容许有人具有自主的政治性格。他那强大威仪的消极产物就是水平低得可怕且卑屈无力的议会。那么其结果如何呢?——这就是官僚制的无限度统治。”<sup>①</sup>

作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日本帝国,其路程也毕竟是受这种规律支配的。明治的藩阀政府通过一切手段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并模仿普鲁士制作了明治宪法这片绝对主义的无花果之叶时,导致今天破落的因素已经在逐步形成了。因“官员大人”的统治及其内部的腐败,还有文武官僚的明争暗斗及军部的策动引起的内阁解散等决不是昭和时代忽然冒出来的现象。(例如明治二十五年第一次松方内阁改革之际,大山仁礼、川上等军队首脑部发起的联合抵制,或者如大正元年上原陆相就增设二师团问题采取的单独帷幄上奏等成为后来军部政治常套手法中的出色典范。)另一方面,帝国议会正如众所周知始终没能成为最终实行政治统一的场所。不

---

<sup>①</sup>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1926, S. 596.

仅如此，议会开设之后的政党本来就不具备俾斯麦式的铁腕，即为了“击破”障碍所必须的斗志和实力。政治力量的多元并存就是这样像“原罪”一样成为近代日本的宿命。尽管如此，那时候也没有出现破落的危机状态，而且政治指导和统一反而要比最近的时代良好得多，这里面有不少要归功于明治天皇具备的与辅佐他的藩阀官僚们进行特殊的人事合作的神授能力以及他们相对丰富的“政治家”资质。伊藤博文模仿俾斯麦的样子的确有点滑稽，但是他也好，其他藩阀权力也好，都曾经披浴着革命的浪花凭着自身力量确立了政权。他们成为官僚之前都是“政治家”。他们大都远离民主主义的范畴，但与此相对却具有寡头政治的自信和责任意识。桦山资纪在第二次议会上有名的狂言，即“我国之有今日岂非萨长之力吗？”这正是其内心的自负向外的爆发。这种矜持一旦失去，权力便径直走上矮小化的道路。政治家出身的官僚不久就变成官僚出身的政治家，最后便导致官僚式政治家（其实并非政治家）泛滥成灾。独裁的责任意识退缩了，可是民主主义的责任意识没有勃发。尾崎弔堂由于使用了“第三代”的表现在战争中被问成不敬之罪，可其实处于第三代的并不只是天皇。而且由于具有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这种像雅努斯式脑袋的天皇在矮小化的同时被神格化了，于是其底下小心翼翼的“臣下”意识便越发蔓延开来。伊索寓言中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有两个情人，一个比他年轻一个比他年长；年轻的女子不喜欢自己的恋人是个老头，于是每次约会她总要一点点地拔去男子的白发；而年长的情人则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男友比自己年轻，于是相反她便不断地拔去男子的黑发；这样到最后男子成了秃头。日本的“重臣”以及其他上层

的“自由主义者”们惧怕人们把政治责任归结于天皇和他们自身，便努力拔去天皇绝对主义的一面；而与之相反，军部和右翼势力“拥护”天皇的权威以图自己的恣意妄为，他们便大肆宣扬神权论。这样一来，天皇一方面既丧失了作为绝对君主的神授君权，另一方面作为立宪君主的国民亲近性又趋向稀薄。把天皇制变成秃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它的忠臣爱卿们。

## 5. 结语

以上大致是对日本法西斯统治庞大的无责任体系的素描。如今再回顾一下在其中上蹿下跳的政治人物形象，就会发现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神舆”，第二种是“官员”，第三种是“蛮横者”（或者称为“浪人”）。此三者中，神舆代表“权威”，官员代表“权力”，浪人代表“暴力”。从国家的秩序地位和合法权力上来讲，“神舆”处于最上位，“蛮横者”处于最底层。但是这个体系中的行动是由最底层发生再渐次上升的。“神舆”经常只是傀儡，“无为而治”。直接“拥戴”“神舆”且发挥实权的是文武百官，他们恃凭“神舆”下放的正统权力统治着没有权力的人民，可是另一方面对于蛮横者，只好任其抓住尾巴恣意摆布。<sup>10</sup>但实际上蛮横者也并没有真正想“问鼎权力”。他们只是想在下层无责任地横冲直撞以惊世人，然后大叫快哉获得满足。所以他们的政治热情就会轻而易举地被酒色享乐溶解掉。当然这三种类型并非固定不变，很多具体的个人身上往往有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类型混合存在着。所以曾经的蛮横者一旦“发迹”，也会变得更像个小官吏，越发地“稳健”起来；如

果继续飞黄腾达,甚至有可能转为神舆式的存在反过来由人担抬。而且,有些人对上一副蛮横者的姿态,对下又以“官员”面孔临之,而另一些人则对下俨然“神舆”式存在专门由人抬供,对上又是忠实克己的下官,侍奉不离其左右。可以说正是犹如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事物存在与运动变化的相互关系,而构成的整个金字塔结构。只是,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神舆——官员——蛮横者这一形式上的价值序列本身是极其牢固的,因此蛮横者若经过向官员式乃至神舆式存在的自动改变,他便绝对爬不到高位上层。这里就体现出这边的蛮横者与那边以蛮横者的身份大模大样地掌握国家政权的“卍”徽王国之间的明显差异。<sup>11</sup>

这些并非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某个国家里的童话故事。

(1949年)

### 追记:

此文发表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潮流》杂志五月号上,是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共同研究”连载中的一篇。该期主要旨在阐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过程,大家分别承担的是以下课题:中村哲教授的既成政党的崩溃过程;辻清明教授的以官僚制为中心的统治机构问题;我则描述的是统治阶层人格结构及行动模式。在这一共同研究中,就一般性的问题多次进行过讨论和听取意见,但并不要求视角和解释上的同一见解,所以实质上是各位执笔者就其关心的课题所写的单独论文。



## 补注：

1 在这篇论文里,为了解析军国领导层的意识形态和其行动模式的特点,我用了很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供词及陈述作为资料,这样做是否妥当,我想今天恐怕会引起不少疑问。有两点至为重要,第一个问题是不去检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本身的政治意义,而对其提出的资料和审判记录到底能相信到何种程度?进而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要被判死刑的法庭上,被告的供词或答辩都是产生在极为特殊的状况下,由此难以提炼出被告的日常的行动模式。一般而论,这两个问题都很在理。但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有关1930年以后的日本政治经济及社会过程的庞大资料多是被掩盖的,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将之一举公开这点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即便是1956年的今天,也没有这么完备整套的资料)。所以,对我来说,有极大的冲动想要利用之。而且,记录的可靠性上,如果说要全面把握政治结构和经济过程,或者为了确认一些极为细微的事实,对此不加批评地全面依赖是危险的。但就我当前的问题视点而言,探讨领导层的精神结构和其行动模式,这一审判的政治特性所带来的“证据”的偏向,并不会构成什么障碍。特别是第二个问题,由于被告身份这一特殊情况所带来的制约,从这一观点来看也未必是决定性的。说到底,问题就是我所剖析出的行动模式的特征是否是专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被告所得出的特殊的、一次性现象这一点上。我倒愿意这样解释:在这场审判的强烈的镁光灯下,那些平常过于普通的、不太为人们注意的日常行为模式下的政治机能反被凸显出来。

2 他们究竟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渠道获得多少生活费是因人而异的,具体很难把握,但借用某一“浪人”的直接表述的话,不能否定“右翼言行绝大部分直接连着食道(好吃好喝)”。二二六事件的审讯中,三井公司的常务理事池田成彬招供说,他随时提供金钱的名单中,以北一辉为首,中野正刚、松井空华、岩田富美夫、秋山定辅、赤松克磨、津久井龙雄、桥本彻马等都赫赫在列。靠吃陆军机密费的当然多,所以“打鸡血”的多少与他们活动的猖獗和沉滞是基本成正比的。

3 这点请参照本书第一章第12页以下的部分。这是精神结构一般的倾向性比较,如果拿每个人来做比较的话,彼此之间当然会有相反的情况。日本所谓的无法者类型中,比较常见这种嘲讽般的现实主义,而且在一些“秘闻”里这种与正统相左的热嘲冷讽也得以充分发挥。据一位在陆军省会计局工作的上校说,在讨论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时,针对参谋部主张的武力进

驻,军务部则主张“和平”进驻,有一军务部员说:“强盗判刑有点重,这次还是按诈骗犯来办吧”。但是这种“其实是……”的话只限于私人会话,一到正式的会议或对“外部”说明时,则马上就变成“正儿八经的话”了。

4 尽管这么说,这种由“下属”或“派出地”所造成的既定事实,如果与最高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利害关系,乃至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向相悖的话,绝对不会上升到“国策”的层面。在这一意义上,将国内政治的“翼赞化”和发起对外战争视为垄断资本稳步实现的谋略有些不合历史。同样,将“昭和精神史”视为军部和右翼等极权主义排除重臣或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一个过程,反过来说也是一种公式化的看法,倒莫如说其“自由主义”的内涵与历史的文脉更成问题。这里没工夫详细论述这一问题,作为参考可以举出财界重镇、后出任枢密顾问官并被誉为最值得高层信赖的“自由主义者”深井英五所谓的“立国三原则”:

(1) 个人应将其所属的国家作为至上之存在并服务之。

(2) 政治上、社会上的机构以及个人对之的心态应该因时代而变化,不应墨守成规。

(3) 对外要以弘扬我国国运为目标不断策划,乘机勇往直前,必要时以武力贯彻我们的主张。

特别是只要看看(1)和(3),就知道其国家观与真正的自由主义信条相差得何等遥远,而与国体主义者的主张在根本上又是多么地接近。

5 同时,木户在三月事件后与近卫、原田、白鸟等交换情报时,在日记里写道:“自昭和二年左右就有计划打破政党,由一种‘专政’来处理国政,但这计划实行起来并非容易。……总之,此计划也尽可能不伤害国家的根基,且又不要成累赘,还要循循善诱,真够难的。”(木户日记,着重点为丸山所加)重要的是这近乎标准地反映了后来列为重臣的一帮人对军队内革新动向的处置方法。一方面是要把这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善诱”到既有的天皇制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如上篇文章所述,“激进派”的界限——也就是要被“善诱”的成分,两者相辅相成,尽管经历着木户所预测的那种“困难”,但还是逐渐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基本形态。

6 这里也可举一例,昭和十四年(1939年)五月,就强化日德意防共协定问题,小矶拓相对原田熊雄说:“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不结成日德意同盟不行。前线的将士对英法的援蒋非常不满,所以至少要和德意联手干,才能多少缓解其不满情绪,然后再使用英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最好。不这样做前线的

将士如何能听得进去。”而原田则评之为：“这是陆军的老一套。”（《西园寺公与政局》第7卷，第364—365页，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7 格鲁大使1941年（昭和十六年）11月3日送交国务院的报告中有如下内容：“日本的政治思想包含很杂，有中世纪式的，也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因此社会舆论具有不定性。日本国外发生的事件和局势的冲击有时会在一定时期内决定其某个思想派别占据优势”。格鲁还在后面加注说明：“在民主主义国家里，由于影响并指挥外交政策的一组原则是同种同质的，而且引起意见分歧的也毋宁是方法问题，所以社会舆论通常是由别的方法来构成的。”这里简洁地表明了外交政策之所以在民主主义国家里反倒相对稳定地实现一元化的原因。

但是，在格鲁的祖国，战后也随着冷战的激化和国内蔓延的麦卡锡主义的“剿共”及忠诚审查所带来的恐怖气氛，同时，考虑到罗斯福时代的那种强有力的领导能力已经减退，这个问题其实更为广泛地看是大众社会中的领导能力的机能，进而应该与政治状况和政策决定过程相关联来加以考察，但是，至少在这里作为考察对象的时代里，日美两国在这点上的对比是那么鲜明，而一般来说，大众社会的发展和民主主义的发展之间的落差过大，或后者已经名存实亡，才容易产生本文所说的这种病理现象。

8 国务大臣与行政大臣的区分成为回避责任的典型事例，可以举昭和十四年（1939年）五大臣会议上板垣陆军大臣的态度为例。《原田日记》里这样写道：“结果陆军的主张还是局势的变化需要（日德意）攻守同盟。但第一阶段按既定方针办，不行的话再按第二阶段来，即缔结攻守同盟。总理（平沼）问陆军大臣：‘到底陆军大臣本人是怎么想的？’大臣回话说：‘我自己一方面身为国务大臣，同时另一方面又是陆军大臣，作为国务大臣当然是赞成按既定方针办；但另一方面在代表整个陆军的意向这一意义上，自己也赞成按第二阶段办。’”（《西园寺公与政局》第8卷，第42—43页）

9 对所谓重臣思想的分析具有单列论述的价值和重要性，然而论述重臣、军部等各股政治势力的思想内容并非本稿的主旨，故在此不做深入探究。

冈田启介在战后回想时是这么说的：“没能阻止二二六事件以后的战争车轮，是我们这些作为重臣应该感到耻辱的，但的确没那么容易。……要想阻止，只有用武力，那就引起内乱。一旦内乱，会动摇国家的基础，至少会在明治以来创造的日本的根本之处产生裂痕。不光是我，当时身处一定地位的责任人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这点。……同样是战败，日本没有被一分为二仍

是一个日本,这种不幸与艰辛能够同时忍受过来至少有一点幸运吧。想到这点,我还是认为幸亏没有发生内乱,或没使之内乱。”(“二二六那天”《中央公论》,昭和二十四年二月,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哪怕是遭到战争的毁灭也要避免“内乱”的危机(即有损国体的危机),正是这种想法成为内心支撑的有力的道德依据,犹如一根红线贯穿着日本统治阶层的历程。它使得上述既成事实不断地被认可,一直到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时,维护国体也是向联合国提出的最低底线。

10 比如井上日昭和近卫,或桥本彻马(紫云庄首领)、松井空华与木户之间的“奇妙关系”一般。经常以宫内某重大事件来进行恐吓的宅野田夫(政教社同人)被逮捕时,木户日记写道:“感到脚底下粘着的一颗饭粒样的东西”被甩掉了(昭和八年三月三日)。这极为精确地表现出统治阶层对下面的“蛮横者”的感情和关系。

11 上述三种类型及其构造关联不仅各自出现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而且是日本帝国政治世界中的分子式。所以就既成的政党内部结构来看,总裁就像是被众人抬起的“神舆”一般,而总务部和干事长(相当于秘书长)才是掌握实权的,议会外围团体就起着蛮横者的作用。右翼活动在整体结构中是处于蛮横者的地位,其内部也存在着三者间的地位高低,比如,头山满当然是一种“神舆”式存在。既成政党没能打造出与此三种类型不同的政治人物形象,也反映出其民主主义特征的淡薄。森恪之类在党内位置属于最高官僚了,但观其政治足迹及所作所为倒不如说是接近蛮横者。他在临死之前说:“这辈子中能够对世界二分有所贡献是我平生所愿”,这话将蛮横者的思考方式表达得淋漓尽致(《森恪》第846页)。

“蛮横者”具有两种特征:既是特定的社会反叛者,同时也是寄生虫,一方面因其生长的环境及文化差异——这里不仅是指国民之间的差异,而且也包括一国之内的城乡差别、“上流”子弟与底层出身这类差别——决定了各自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上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又可以观察到超越这些差异的显著的共同之处。就这种蛮横者的“理念型态”虽然很难界定,但我们暂且可以举出以下的指标:

(1) 缺乏持久从事一定职业的意志和能力,也就是对常规的、例行的市民生活的忍耐力明显不足;

(2) 对人的关心要比对物(Sache)的执着更强,在此意义上,蛮横者原则上成不了专家。如果是,也大多是哈罗德·拉斯韦尔说的所谓“暴力的行家”;

(3) 作为上述两点的反面,即不断追求非日常的冒险和破天荒的“创举”;

(4) 而且,与其在乎这种“创举”的目的和意义,莫如对这一过程中惹起的纠纷和起伏跌宕更感兴趣,更为兴奋;

(5) 公私不分,特别缺乏公共(或公平的)责任意识,取而代之的是私德,或对特定的人的义务感(仁义)异常发达;

(6) 对规律的定期的按劳取酬不感兴趣且轻蔑之,习惯靠献金、要挟、提成等经济外的手法获得不定期收入或通过毒品交易等非正常的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

(7) 非常时期或最坏状态下的思考模式及价值观成了判断事务的日常准则。由此产生出的瞬间判断来决定善恶和正义与邪恶,喜欢那种“一不做二不休”的表达法;

(8) 性生活的放纵。

当然,这些要素化合反应的比例和程度可以有无限多的样态,就现实的人来说,无法绝对辨别清楚,顶多只能指出其蛮横者特征的多寡。但是,尝试着梳理出这种理念型态,在将第二卷所述的法西斯主义的一般原动力适用于特定国家的特定的政治状况时是有效的。比如,共产党的党员构成,流氓无产者及各社会层的落伍者所占的比例较之组织工人和专业知识分子越多,一般来说蛮横者的要素就越浓厚,其现实政治的活动模式就越发难以与法西斯相区别。

## 第四章 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

### 1

K 君：

前几天接到你的长信，非常高兴。许久没有听到你的侃侃而谈，看着来信想起过去在高中宿舍里的蜡烛光下嚼着花生彻夜讨论的情形，备感亲切。战时还与君有过几次见面的机会，战后你我都忙得一塌糊涂，反倒连从容交谈的时间都没了，有时想起来会觉得一种难以言状的惆怅。所以前几天拿着厚厚的信，看到你那略略右下斜的熟悉的字体，不禁反射般地叫了一声，还把坐在旁边的内人吓了一跳。

读你的信最为高兴的是你的直率表述与过去一样一点也没变。不管过去多么亲近的朋友，一旦长久没有往来，突然见面写信，很难恢复到过去那种气氛下交谈的语气，这一点，你倒是一点儿没变，还是和在学校朝夕相处时一样直言不讳。的确，我读你的信感到很痛快，就像是浑身被瀑布冲刷一般，感受到你的严厉批评。这可不是什么先挂免战牌，那种一眼便可揭穿的奉承以及格杀勿论的谩骂到处可见，但对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展开认真的全

面的批判,却是求之不得的。本来这类批判应该在学会上出现得多些,可大家却都显得很绅士似的(当然底下说坏话的很多),正面直接互相批判的并不多见,而舆论界的争论又被其特有的规则所支配,马上转化为一种虚张恐吓。结果只是在相互信赖无话不谈的少数人中才有可能展开真正的相互批判,这正是我们国家的可悲的现状。所以知识分子之间也是充斥着猜疑和嫉妒,且根深蒂固,到处可见的是相互摸底、试探。知识分子之间遵守共同规则在其内部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都无法实现的话,哪儿还谈得上什么捍卫思想自由呢?

至今我学的是广义上的政治学,就当前的政治及社会问题多少有过一些想法,但几乎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为何这么做是有我的理由,这里就不详述了。至今我仍认为自己的理由没错。但是从去年(1949年)秋到最近,一直关注着环绕日本的内外局势的变化和报纸的论调,我有点坐不住了,不能再就此问题保持沉默了。这倒不是说我要发出什么警世之言,只是作为我个人的心情,不仅是心理上,而且在肉体上也感到痛苦了。正是在我有所心动时接到了你的来信。于是,我借这机会给你回信,就如何判断现在日本和世界的政治状况,将我的态度和想法和盘托出,“决心”把这胸中的疑团郁闷一吐而快。当然我自己尽可能戒备着无论什么场合下都不要为悲壮感所主导。我很喜欢美国人说的一句话“Let's go whistling under any circumstance”(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吹着口哨),二战期间出征的后学和学生拿着太阳旗来找我签名时,我总是将这句话(当然是日语)做赠言,这恐怕也是出自那个时代要说给自己听的心情。这封信我也是抑制着不要流露出那种悲壮

感和感伤主义,尽量做到不去迷失马克斯·韦伯说的那种“清醒”的灵魂。但就我的经验来说,这实在太困难了,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本人吹着口哨的脸马上会丑陋得变形。要是从这封信里可以窥见这一扭曲的状态的话,请在责备我的同时,也一并替我想想:战败后不出几年,再次让我,不仅是我还有不少我信赖尊敬的人们,唤醒那个时代的心情和表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 2

你对我的批判有许多,归纳起来说就是像你我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一愈发加剧的政治思想的对立中,不要只是抽象地念什么思想学术自由之经,那些都没意义。针对否定思想自由的暴力,应该更为积极地、不分左右展开斗争。因此,我们要跟对付法西斯一样,对那种左的极权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也应该划清界限,坚持自己的主体立场。你对我这种在学术立场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性格上反倒像一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却对现代典型的极权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不去展开坚决的斗争表示出不满。

你提出的这类疑问相当广泛地指向我乃至与我立场相似的人,这点我当然清楚,特别是最近趁着潮涌般的内外反共思潮,政治家和报刊媒体都大写特写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前不久这些人还在叫嚣着说什么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温床,是一丘之貉。像检察官一样的态度来训斥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此祭出共产主义这面旗帜。没有高举反共旗帜的



自由主义者都是机会主义者,或者是被当作巧妙隐藏着的共产主义者。好像现有的政治家和媒体从来没有一次是机会主义的似的!宛如只要高举出反共的大旗就是民主主义的象征!(若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弗兰克、东条英机乃至其亚流都是最大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最近的学生运动令外界震动,对于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更是遭到一波漫骂。其中最多的批判就是那种类似宫中女人勾心斗角相互陷害般的猜忌:比如说教师只不过是想让人认为是“进步的”所以对学生献媚。日本人的批判为何总是立马表现为这种动机的批判,作为学术问题还真是饶为有趣的课题,这里姑且不论。如果从大学教师的处世来说,战争刚结束时暂不提,现在的局势下,让那些掌握全学联的部分学生来认定为“进步的”而所得到的好处,与被大学内外认为有“赤色”嫌疑而带来的有形无形的不利与不快相比,我倒觉得取前者的首先都是些缺乏算计能力的人,你觉得呢?

但是,除了这类不足为取的流言蜚语外,对你这样善意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报的疑问,我们还是感到有义务从正面回答。我也和你一样认为现在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否情愿,都面临着不得不明确表明自己思想上的根本立场。有些人以权力为后盾自己处于绝对安全的位置,反过来质问你这家伙属于哪派?我并不是说必须回答这类质问。我是说:在真正祈求伸张自由和确保和平的人之间尽可能地保持广泛而坚固的连带意识,这是一个前提。那种在谁都无法反驳的和平自由的“字眼”下将各自居心叵测的人聚集起来、表面上联合起来的“共同战线”已经过时了。持有各自思想的人们并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想法,在尽可能之处阐述自己的见

解——我这里没用到“发表”，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制约。大家聚到一起才能各自知道和什么人、什么团伙在哪一点上一致，哪一点上有分歧。这样面对不断出现的现实政治问题才能有一个预测：在多大程度的广度和深度上得以携手共斗。然而，至少在我们知识分子之间，除了一小部分标签色彩极为鲜明的人以外，基本上没有这种可测性：说着同样的话，但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猜疑总是难以消除。这使得我们更为孤立、更为隐遁。也就是我想说的是那些以自由人自称的无党派知识分子为了不失去其主体性，也应从其立场上对现实政治有个根本态度以及基于此的战略战术，已经到了该自觉意识到的阶段了。说到战略战术，听上去有些邪乎，可是没必要把罢工和策略视为共产党的专卖吧。人都喜欢在小圈子里活动，不管是否有此意识。我只是说要将之运用到更大的舞台、更为公共的问题上。否则，共产党一说个什么，哪怕是对于事理清晰的提案也只是萎缩不前，或者相反，凡是共产党说的做的不管什么都“先天地”辩护，沦为“同伴者”，其结果，这些都会丧失知识分子的生命——自由的批判精神。

自由主义者应对共产主义势力划清界限，我不太清楚你的这一主张果真如我刚才说过的意思，即是作为你对政治现实的一种展望和由此做出的战略战术呢？还只是原则性的抽象的心态问题呢？但是我想换个角度，与通常的政治论文不同，谈谈我自己对日本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现状分析。如果由此能理解我的“战略战术”论的根据就很知足了。

最初我想强调的是，在议论日本社会及政治问题时，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图式先设框架再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很遗憾你也没能避免这一倾向。现在成问题的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作为思想都是舶来货，并不是日本人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民主主义对美国人来说如同“way of life”，而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样式不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还都并存着，各不相关。这一点常常被提起，可日本的知识分子或貌似知识分子到了判断当前形势之时，总是忘掉这一基本事实，或者故意蒙住自己的眼睛，宛如美国的民主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在斗争，用这一图式化的格局来就日本的政治现实作分析。但让我来说的话，现实社会关系总是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而现实中促动具体人物的行动原理是由其整个生活环境——包括家庭、工作单位、会议、旅行、娱乐场所等的全部行动模式中凭经验考察所发现的，并非他有意识地尊奉什么“主义”而演绎过来的。但是在日本却不幸的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和客观的行动原理之间的鸿沟很深。有些人就因为美国的民主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之斗这么一句话就什么也不做了，而实际上不是别的，正是自认为是(美国的)民主主义者的个人(乃至集团)和自认为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者的个人(乃至集团)在斗争。而且事实上里面形形色色，掺杂着自认为是英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或自认为是修正资本主义者的个人，各种成分相互搅和在一起。于是，除了这些

或多或少带有自我欺骗的政治上的“自觉”分子外，压倒多数的、政治上“非自觉”的人们多封闭在非政治性的私匿环境（例如家庭内）或工作单位及其他生活领域中，他们主要关心自己和家庭生活的琐事：家务的分担啦，赚钱的方法啦，下周的电影体育活动啦，或者强奸杀人案的进展等。对政治状况只是在投票和工会大会等号召的场合——对重大政治事件看上去很关注的场合——表示出积极的反应，结果也是和赛马拳击摔跤等同视之。的确，这些人或许“意识很低”，但比较前面的“自觉”分子和知识分子或貌似知识分子来说，其主观意识形态（能不能算得上姑且不论）与客观的行动样式之间的鸿沟没有那么深。而且这种“非政治的”大众对现实政治状况形成并不是多么重要的要素，反倒是直接在非政治领域里他们的无数的日常行动经过复杂的曲折反映在表面的政治舞台上。反过来看，这一政治舞台上所展示的每个决定又经过复杂的折射下降到日常生活领域中去。这两种无数的交错中产生出现实政治的能量来。正因为如此，现实分析非常困难，政治方向容易仅凭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国会讨论啦，街头演讲啦，或游行、学生运动、署名活动等来判断，在小范围的知识阶层里出现的倾向俨然认定为是主导性的动向，这样会遭到现实的惨痛的报复。概念性的意识形态的图示化的危险性正在于此。日本的左翼运动的领导人过去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现在也一样，看上去像是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很容易陷入自我欺骗的圈套内。（我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绝对主义的唯一的直接对立面而与启蒙的合理主义相重合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总是将大众的“革命热情”评价过高而失败。但是，公式主义或图式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独占物，美国的民主主义也好，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也

好,或其他名为主义的思潮,一到了日本就全都公式化了。

在我看来,反共论者抨击共产主义者的“公式”,其现状观察总是较其敌手更为概念化,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自我欺骗之中。他们也容易被那些引人注目的绚丽的政治现象所吸引,不愿去观察深处盘根错节的线路结构。其结果,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的认识相合拍,看见游行罢工就立刻害怕革命形势的高涨,看到知识阶层读者的阅读倾向,就似乎有种错觉,认为日本的出版界都被左翼势力所垄断,其实被忽视的一点是这些出版物的普及程度远不及那些评弹本、色情、古怪、体育、电影、杂志类。大众参加左翼工人运动被视为“雷同”,较之更为根深蒂固的就是传统上对“赤色”的厌恶,可这到底是否为理性判断的结果,却是不为人们所意识的问题。这种自我隐瞒的结果,那些出自善意的反共自由主义者的言论,恐怕与他们的意图相反,等于是为日本强大的旧的社会关系和盘踞之上的反动势力的强化所服务。

西欧民主主义的根本原则或范畴都在冠冕堂皇的表面政治的装置里的配线中不知被歪曲了多少其本来的面目。没有这种现实的认识,很难对日本的政治状况做出真正的判断。比如(自由)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由自由讨论来决定,或换句话说是一种说服和被说服的关系。人们爱拿这一点与暴力及权力强制下的决定作对比,无疑前者是民主的方法,后者是非民主的方法,事情明摆着。但是,一旦将这一抽象的标准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去,马上就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困难,区分二者需要多方面的考察。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巴克<sup>①</sup>将说服的原理归纳为以下三点(参照《世

---

① 厄奈斯特·巴克(Sir Ernest Barker,1874—1960年),英国政治学家。——译者

界》1949年11月号“政治中的说服”)：一、说服必须得多种多样。换言之，垄断性的说服不是说服而是强制。二、说服必须是理性的。三、说服必须是可以拒绝的。因此以权力为后盾的不是说服，而且给对方带来恐怖的威胁或者通过贿赂及其他直接的权益来施加诱饵的说服仍然是失去了其本质。……仅此就可知道靠说服来做出决定是一般人想得太简单，实际上它是伴随着困难的前提条件。如果照这个尺度来仔细观察我们的政治及非政治的社会关系的话，不难发现当今日本靠纯粹的说服来做出决定是几近绝望般的匮乏。所谓靠“商谈”来决定事，有百分之几是符合这一尺度的呢？从形式上看是在进行民主的讨论，但观其成员的具体人事关系和行动方式，那种远离畅所欲言地相互说服的“会议”在日本的各种团体里每天都开有几百次，由此做出的决定便作为“民主的”决定而通用，这难道不正是现实又是什么呢？特别是成员构成之间有身份上的上下关系时，只要上级没有极大的自我控制力和洞察的眼光的话，由于各种非常识性的强制作用，自由讨论马上会变成跟耍把戏一般。

正如你所知，通过自由讨论及说服来做出决定，这种想法当然要将由此制定的规则一视同仁地约束所有成员，亦即和所谓的“法的支配”这一观念有着理论上的牵连。而且在其背后，尚有一重大的前提，即执行这一规则的人及机关对其团体的所有成员并不具有什么实质上的优越性，而且也并不独自垄断真理或正义等价值判断。即便给予他执行的强制力，这一强制力的妥当性也是经过一定的合法的手续所赋予的，并不是说其本身就含有正义。而什么是实质上的正当，这一判断则完全置于各自内面的良心，这样通

过自由讨论做出的决定才具有意义。巴克所强调的是,政府自身不应是说服的主体,说服应该在个人或自由的团体,也即是国民相互之间的横向关系中得以实施,这只是表明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当然的常识。但是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距这一“常识”有多远!在我们这里,最为把持强制力的领导作为实质的价值体现者或决定者出现,不仅使得“自由讨论”的原则,乃至“法的支配”都被架空了。也就是说,领导对成员不是一种“权限”,而是以“权威”居高临下。正因为如此,对于其行动及主张的批评很容易打上“反叛”的烙印。“犯上不慎至极”这本是德川时代惯用的判刑语词,到了现在,我国大大小小所有社会集团的“领导”或“干部”中有多少人敢断言已经完全将这种感觉从自己的无意识中驱逐出去了。如果其“领导”越是知识分子则越发伪善,自我欺骗的危险性就越大。他正是在脑子里对自由讨论或民主主义等“概念”有所理解,才对于其意识形态和现实行动的乖戾更容易盲目。将这种复杂的现实情况,用他脑里所描绘的说服与暴力、自由与强制的两极对立的图式来加以解释的话,在具体的结果上总是对自由讨论的形式化反应迟钝,反倒对下属和被领导的人们的集体行动特别敏感,从中嗅出“暴力”的气息。

这种自我欺骗当然不光是日本的知识阶层仅有的。莱茵霍尔德·尼布尔<sup>①</sup>在其《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1932, 第 233

---

<sup>①</sup>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年), 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 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 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中译本由蒋庆等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年。——译者

页)里尖锐地指出:通常的道德家认为针对显露的强制力来说,隐密的强制力自身在道德上更为优越,在这种思维下,其结果是服务于维持社会现有的状况。统治阶级可以自由地运用经济力量、传统、传媒等“高级的”强制力,所以实质上将非正义强加于大众,却比较容易赢得其社会道德上的支持。但在日本,尼布尔的警告在双重意义上要加以说明。第一,如上所述,本来自由民主主义不是出自日本人的体验,而是从脑子里灌输而来的,所以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差异甚大。第二,日本的人事关系中具有极为强大的前近代的影响,上司的权威是无形的压力,“嗔目而视”的实质上的暴力性被隐蔽起来,对其内心的恐惧带来的服从容易伪装成当代的同意态度。

对于日本社会的民主化,谁都看得很清楚,比起那些显著的独裁型的领导人更要警惕的是那种“当头儿”的人,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诉说这种必要也正是出自这一理由。独裁者对民主主义从外面公然地破坏;而当头儿的则从内部悄然地腐蚀。有脸面的、师傅、掌柜的、理事、老师等,不管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当头儿的都是利用模拟家庭关系及成员的心理惰性来加以支配,那种露骨的权力性的强制反倒可以作为传家的宝刀隐藏在背后。而且,头儿的支配为社会日常的传统价值观和习惯性思考模式所支撑,不需要特别的“宣传”“鼓动”。部下及被支配者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指使的话,独裁者便会毫不留情地直接压制,当头儿的会不停地搞些小动作来欺负你,或者总爱给人“穿小鞋”。这种情况下,由于压抑的时间放长,固然其聚焦性亦减弱,所以不像那种直接的压抑容易激起下面人的强烈反感。如此看来,当头儿的支配一方面强力地阻



挠了人民自由批判能力的增长,另一方面,其腐蚀性又容易忽视,由底下有效地控制其权力该是多么困难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说来恐怕会遭到批评:难道说阻挠各色社会的上下关系,或领导人与群众之间“和和气气”的自由讨论的反倒是那些没教养的粗暴言行吗?从现象上看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更为深入观察的话,不正是这一言行抑制住自己平时的公开主张,使得郁积的愤懑不正常地爆发出来的吗?前几天我外出旅行在一家小旅馆吃饭时,女招待唠唠叨叨地给我讲述了工作辛苦的情形。(你也知道,对这类和式小旅馆来说,劳动基准法等于一纸空文。)我问她你们是否将这些不满都强忍着不说,她回答道:“平常都不作声,等有时机一气道出,这样不至于总是跟自己过不去……”你认为这现象只存在一家旅馆内吗?由此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具体的人物关系正是以日本的家族为原型,遍布于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公司、工会、学校以及工作单位等。而且,我听了刚才那女招待的话笑不出来的是,偶尔会察觉到这种快要“爆发”的气氛时,店主人或老板娘就会态度一变,笑容满面地给所有员工都买上冰激凌之类来犒赏。这样一来,你看奇怪不奇怪?大家都闷不作声了。结果第二天则又是新一轮苦工的开始。我真是觉得触摸到了日本社会表面变化万千之下像泥沼般沉淀着的一面,心境顿然黯淡下来。

## 4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证实众人皆知的《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命题,日本的“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们要千方百计地将历史事实都视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的历史,甚至出现些“实证”的历史书用以证明人民对压迫的勇敢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但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尝试未必成功。听上去或许有些冷言相讥,照我说的话,欧洲美国姑且不论,单说日本的历史,比起阶级斗争史更多的是被压迫者在背后怨声载道,最终却只能是低声下气熬过来的历史。口说无凭,我们知道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尚武之国,战争不断,却从没有真正发生过一次来自底层的革命。仅这一点就可知道那种倡导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和”的精神为日本统治的美好传统的所谓国体史观也不过是反映出历史现实的一个层面。但是,这个“和”并非人人平等的“友爱”,而是以随处都有的纵向权威关系为根本前提的“和”,所以如果自不量力地挑战这一权威,或让权威者感到有挑战的威胁,那么他立刻会作为“忘恩负义”的家伙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奖章的背面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之处才正是这一史观的意识形态上的特征。这种“和”与“恩”的精神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遍布在所有社会集团之中,通过把这种福泽谕吉所说的“权力偏重关系”加以合理化,便使得各个社会中的支配者或长者陷入漫无边际的伪善和自我欺骗之中。统治者常常是“和”的精神化身,其性质上难以成为“先天的”纷争之因。纷争经常是服从者被邪恶分子煽动的结果。所以,过早地给这些智能低级的人们赋予“权利”不知道会惹出什么乱子来。不然的话,就耐心地徐徐渐进地教育民众,等其成熟以后再慢慢地赋予其权利——这就是明治维新以来至今为止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反对普及民主主义时所用的共同理论。比如,加藤弘之的开设议会为时尚早论说:“人民知识未开,先得自由之权,不知行

使之正道，因此反倒容易自暴自弃，最终会损害国家治安，岂能不担忧？”<sup>①</sup>这作为当今反对政治自由扩充的根据也完全通用。昭和五年（1930年）由内务省社会局立案的《工会组织法》，连当时无产政党中最右翼的社会民众党都评论说太慈悲手软了。尽管如此，说它无视“以劳资之间的情谊为基础，亦可视为家族制度之延长的我国固有的雇佣关系”“肆意诱发工人的阶级斗争意识”“正可谓给幼儿以名刀矣！危害极大毫无益处。”<sup>②</sup>结果该法案还是流产了。我国资本家的光荣传统就是这样延绵不断地盘桓在他们的继承人的心头上。大众的自发的能动性被想方设法地阻止，反倒说其水平低自暴自弃，进而这又成了开放民主为时尚早的根据。这种恶性循环至今仍然切之不断。真正要彻底斩除这一恶性循环，无论何种形式都不是来自外部的或上层的恩准，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来自内部的一场大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以上，我主要通过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动准则阐述了要将日本各社会关系的民主化停下脚步并将传统的思维结构固定下来的势力是多么强大，已经有各行专家学者从正面论及日本的天皇制、官僚机构以及地方自治等广义的统治机构和其物质、社会的基础，并指出其广泛残存的前近代要素。如果采用这种问题的剖析法，我担心你会在脑里说都知道了就不去管它了，所以才尽量想诉之于你的身体感觉。如果你说那种行动模式论我也知道，那么用英美的民主主义对苏联的共产主义这一斗争图式来理解国

---

① “就设立民选议院的疑问”《日新真事志》，明治七年（1874年）二月三日。

② 引自日本工业俱乐部调查科编《实业团体就工会组织法的一些意见》。

内的政治社会问题，必须从后者来保卫前者究竟具体地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也会在感觉上加以理解的吧。日本社会哪儿有什么值得让你“保卫”的成熟的民主主义。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也好，对于广大的国民大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扩大也好，当前的问题不是保卫已经存在的民主主义，而是要从今发展壮大刚刚生根的民主主义。这并不是指什么“苏联型的民主主义”，而正是指西欧市民的民主主义。这一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仍是课题而不是现实。那些变形金刚般的形式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完善民主主义的宪法及法律，马上就会连实体的社会关系也变得民主起来；要不然就是那些满足于大日本帝国下的“自由”的“立宪主义者”，他们代表了重臣、既成政党、资本家之流，认为没有劳动法也行，但取而代之(!)的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则不能没有。再不然就是那些伪装巧妙的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只有对这些人来说，“民主主义”才是针对新的“极权主义”所必须捍卫的既存现实。这些与八一五<sup>①</sup>以前直接相连的各种势力正是在“保卫民主主义”的幌子下，不出几年就把宪法及法律保障的勤劳大众的组织行动一一加以限制。我前面说过，基于日本政治的力学，政治电流的传播作用对于一定的组织(比如全官公劳)活动所施加的一定的法的限制马上会波及整个装置，实质上表现为对于不特定多数的组织的范围模糊的制约。五三〇事件<sup>②</sup>后政治集会的禁令居然波及大学

---

① 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之日，以此划分战前与战后。——译者

② 1950 年 5 月 30 日，支持日本共产党的游行队伍与美国占领军在东京的皇居前广场上发生的首次冲突事件，亦称“人民广场事件”。详参见文后补记。——译者

内的相声表演和音乐会,这是最近典型的实例。于是,我国的权利构造和人事关系中那些与“英美的”民主主义原理相反的前近代的各种要素正是在捍卫“英美式”民主主义的名义下得到复活和强化。你对这一惨痛的悖论难道无动于衷吗?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我对现在的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和其他一般组织的群众运动本身之中的,还有我刚才说的日本社会历史上所背负的前近代的各种条件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内在的事实惨不忍睹。其中还有老板式即权威式支配、和的精神、讨论的儿戏化等都包含在里面,这是昭然若揭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说什么都一样全都是灰色,这种看法作为一种认识其实是无视历史的具体动态、陷入另一图式化的看法,作为实践,则是忘记了社会及政治问题不是总在最善与最恶之间的选择,而是还有更为妥当的选择这一态度。一般旧的社会构造的稳定性更为强固的地方,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对于既存的秩序和支配的挑战同时具有本质上的特征,即不去打破其统治秩序内在的价值体系或精神构造的话,便无法有效地展开。中国革命在巨大的规模上实证了这一点。好啊,你看短时间利用旧的意识 and 人的关系似乎来得快些,可不久会发现它对运动(特别是随着运动进入转折期)会反过来倒打一耙的。为什么呢?人的意识与行动中惰性的力量较之急进势力,更容易为保守反动势力所动员起来。因为他们拥有支配大众心理的土壤和地盘。社会党及其势力下的各团体在战后迅速膨胀时,没有少利用各自自治体的大小头目,正是这一点后来对该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共产党最近的惨痛败退和内部分裂当然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警察的镇压有关,但同时仍旧是该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

组织在过去五年里的运动方法上造成的后果：当客观形势稍稍有利时马上就采取强硬的战术推进，陶醉于形式上外表上“大团结”的成功，结果忽视了扎扎实实地培养内部力量。但是，比如说共产党就是专门利用这种封建的非现代的要素发展起来的这一见解，其滑稽之处在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日本的社会结构政治意识落后的地方应该是共产党最为发展的地方，也就是说农村要比城市更为有利，特别是东北农村更应该是势力发展迅速的地方。可事实完全相反。一般而论，政府机构和经营单位的工会组织越牢靠，其中的职员或雇员的态度表情越发明朗快活，畅所欲言；而工会势力越弱的地方，那种特有的卑屈的表情和猜疑嫉妒自私等表现得越突出，这点难以否定。（当然，对你说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有点不好意思，遗憾的是日本的现状逼得人不得不强调这一点。）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课题不是通过背诵现代的学理得以完成的，首先要现实地认识到在各个阶级、各个势力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内部，相对地最大程度地发现在历史的具体情况下将现代化实质推动下去的力量，反对欲将这一力量削弱的方向，赞成加强之的方向，只有通过这些努力才能完成，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 5

我想你大体明白了我对现实日本政治状况的判断方法，至少在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我想做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者。所以，无论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也好，政治及社会的各势力也好，我都不会容忍其内在的先天的绝对真理，靠其具体政治状况下的具体作用来做

出是非判断。无论何种意识形态,对其教条化的倾向我几乎身体力行地抵制。你知道我对左右任何狂热主义都出自本能地反驳。你说我是左翼绝对主义的先锋,拥护狂热的革命主义者。叫我说,一半是真,一半是谬,至少是不正确。你说很奇怪我对共产党过于宽容,从形式理论上或许如此,但我想强烈指出的是像日本这样的社会,在现状下如果承认共产党与社会党并肩担负起实现西欧意义上的民主化重担的话,那么,用权力镇压之削弱之,这一方向正是包含着实质的极权主义化的危险。正因为我完全是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将来自底层的集体的暴力危险性与统治阶层强化实质的镇压机构做比较——后者亦是靠伪善乃至自我欺骗下的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将大众的民主解放“过剩泛滥”的危险性和其不足满月濒临流产的危险性做比较,那我做出的判断是后者较前者更为严重。我当然是尊重秩序反对无秩序的,但同时我又对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梅里亚姆的下面一段话感到共鸣:

秩序只是一个目的,其不会孤立存在的,因为仅依赖秩序的话或许意味着隶属,意味着监狱或收容所,再进一步看,秩序或许意味着少数人有效地控制多数人、强者合理地压榨弱者。秩序是对力量的崇拜,也是对正义的污辱。秩序只有在成为社会共同的福利工具时,才值得尊重和服从。<sup>①</sup>

有一次,西奥多·罗斯福问梅里亚姆:“如果在秩序和正义之间要做选择的话,我会总站在秩序一方的,你呢?”梅里亚姆回答

---

<sup>①</sup> *Systematic Politics*, 1945, p. 45.

道：“我恐怕正相反，我是属于‘美国革命的儿子’。”(op. cit., p. 64)人类在其历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面临这种二择一的选择是惨痛的悲剧。我们应尽所有的努力来防止这一事态的到来。但是万一不幸不得不要站在这一选择面前时，那我会站在梅里亚姆一边选择正义。但那是因为我的祖国与梅里亚姆不同，没有革命的传统，只有警察国家的传统：从集会条例、报刊条例到治安维持法、战时言论集会结社取缔法等。

但是，最后我或许要反问你，今天日本的政治局势和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甚至后者从根本上在制约着前者。“英美民主主义对苏联极权主义”这种对立，仅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的确如你所说，但放在世界规模来看，不正是其对立中的一环吗？这一要素或许更强些。我以为日本的问题最终是要由日本人来解决，而来自外部的制约和出自内部的反应这一关系上会有一些程度的变化，所以动辄将国内的什么问题都放到世界大环境下随意诠释，我对这一风潮甚不赞同。作为一般论来说确实将日本的政治与世界局势孤立起来说三道四也没什么用。其实有关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我准备今后做总的归纳来探讨，这里有意没有讨论之。但这封信也写得太长了，就此打住，这些问题下次写信再谈。酷暑时节让你读这么冗长的信，真是难为你了。请原谅！

(1950年)

### 追记：

本文之前的三篇都是以战前的日本帝国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和行动模式为专门的分析对象，而本篇以后则是讨论战后的问题，



或是战前与战后的关联。所以本篇以后的论文与前面论文的视角虽然有所相关,但是以当前的现实问题为对象,所以不少议论是基于执笔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氛围的,本篇刊登在《世界》杂志的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9月号上,同年5月30日在皇宫前广场上发生了工人和占领军的冲突事件,之后占领军便展开一系列对“左翼”的镇压:6月2日颁发集会游行禁制令;6月3日军事法庭对“五三〇”事件做出判决(重劳动5-10年);6月6日驱逐24名共产党中央委员。紧接着是朝鲜战争爆发(6月25日)后国内政治及思想的恐慌(麦克阿瑟指令组建七万五千人的警察预备队;针对共产党干部的逮捕证;7月28日以后先从报刊广播人员着手,进而开始在政府机构、民间企业、教育机关掀起大规模的反共、反民主的政治狂潮),正是这一形势背景下,决定了本文的论调。但就自己来说,与其说是写时事论文,莫如说是想通过时事问题针对现代日本政治,或更为广泛的一般政治过程提出一种基本的问题切入法。只是遗憾的是,本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说好要写出一篇与此对应的、就国际政治现状的基本思索,但却未果。恰好为了对应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我所属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在该年的下半年开过几次共同研究会,我将其成果以“三论和平问题”为题发表在12月号的《世界》上了。其中有关国际政治部分的原案起草花去了我很大的精力,而且不久第二年(1951年)一早我就因肺病不得不进入长期疗养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上述报告中的第一章“我们就和平问题的基本想法”及第二章“所谓两个世界的对立及其调和的问题”)

## 第五章 日本的民族主义

### ——其思想背景与展望

#### 1

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考察具有特殊的困难性。这来源于日本的民族主义那种极为独特的发展形态。如果再往深层追究，最终可归结到日本跨入近代国家行列时其自身发展的特异性上面。人们很难在世界史上给它定位。事实上，政治家们以及学者专家们对过去、今日、未来日本的政治、社会进化的方向及形态尚未确立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说明了这种困难。这绝不是光凭日本的思想意识形态对立范围太宽这一问题就能解决的。作为其证据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连按照最明确的世界观及理论制定了战略战术的日本共产党，内部对于天皇制帝国主义的历史规律或农村的阶级关系等根本问题，不也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吗？自展开批判国际共产党情报局以来，屡次论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正是日本共产党再三暴露了他们对日本革命的形式缺乏统一把握。这绝不只是共产党的事情，而是其中还潜藏着更深刻的问题。上面已提及的我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分歧性、多样性反过来也正是因为日本在世界史

上地位尚还混沌导致的结果。日本的民族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归根到底也是由此产生的。

在把握日本的民族主义时正面遭遇的困难,暂且可归结为其构成内容与它随时间发生波动的特性这两点(两者间当然也有相互关系)。在第一点即构成内容上面,由于首先受社会组织、政治构造乃至文化形态的制约,日本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有别于欧洲的古典民族主义,在该种意义上它便具有亚洲型民族主义的共性;但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与中国、印度、东南亚式民族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异性质,不妨说它具有可视为欧洲民族主义之变种形态的一面;由此便形成了它的复杂性。第二点即随时间发生波动的特性则指什么呢?这是说由于1945年8月15日这一引人注目的高潮点前后的舞台及背景的变换过于剧烈,使我们对问题的一贯连续的考察变得极为麻烦。由此又产生出日本民族主义今后的特性与其他远东诸国之间的微妙的关联。今日亚洲的民族主义动向,尤其在朝鲜事件以来,可以说已成为全世界最瞩目的焦点。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民族运动作为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那里不光投入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大赌注,即人们需要面对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而且无论选择哪个方向(战争还是和平),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政治恐怕都会以亚洲的民族主义兴起为主轴进行运转。那时候,日本的民族主义会具有何种内容和方向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从8月15日的高潮点开始,日本的民族主义便担负了同那些很早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远东地区的民族主义大致相同的课题。“民族独立”至少在表面上成为从自由党直到共产党的所有政党共有的标语,这正反映了上述

新事态被多少具有政治自觉性的国民本能地直觉到了。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姑且不论，即便在日本内部，人们把日本今后的民族主义与其他远东各地的民族主义一概而论时尚见踌躇，这是为何呢？自然是因为日本在 8 月 15 日之前是用“极端”一词来形容的最高程度的民族主义而后又一下子跌入了惨淡可怜的结局。在亚洲各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民族主义上已经失去处女性的国家。在其他的远东地区，民族主义还朝气蓬勃精力旺盛，内部包孕着青年期伟大的混沌性；与此相对，唯独日本早早完成了其勃兴—烂熟—没落的周期。历史上既然不存在完全的断绝，那么我们便无法抛开先前的民族主义来思考其今后的发展。新的民族主义总是会带有自身的过去的印迹，不管它是作为旧民族主义的逆反产生的，还是与之妥协后或者作为它的再生发展起来的。而且无论它以上述哪种形态出现，大而言之在世界格局上，小而言之在远东形势上其结果将发生显著变化。如此，由于在极端民族主义这一已知数与今后亚洲民族主义的共性这一未知数间具有很多可能的结合方式，所以只能说我们现在想要一眼纵览其前景还很困难。

因此，我将在下面给问题做出限定，首先把材料选在明治维新以后，抓住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几点特性加以关注，并把它们作为考察今后发展形态的最初线索。这些特性在精神构造方面对战前战后的关系产生有重要意义。当然论述也仅仅是极为粗线条的概观而已。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究其发生,自不待言当归于幕末欧洲势力的冲击。这种情况在远东各地区是大致相同的。在这样的产生状况下,不仅形成了与西欧特质相异的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胚胎,而且对该冲击做出的反应方式的不同,使日本面临了一个与其他远东各国,特别与中国明显有别的历史课题。

欧洲在近代民族国家生成之前已经拥有一个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最初是罗马帝国建立了这一基础,后来由以罗马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为象征的欧洲共同体(corpus christianum)继承下来了。始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近世民族国家的发展正是这个本为一体的世界内部发生的多元分裂。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意识的勃兴,自从一开始便是以国际的(international)社会意识为后台背景的。主权国家的争斗即该国际社会的独立成员之间的争斗,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正由于此,格劳秀斯<sup>①</sup>以来,战争便逐渐在国际法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卢梭说:“欧洲诸国在相互之间结成了一个无形的国家”;芬乃伦<sup>②</sup>说:“彼此相邻且结成了商业关系的所有国家是一个大团体,它们形成一种共同体。比如,形

---

①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年),出生于荷兰,基督教护教学者,亦为国际法及海洋法鼻祖。其《海洋自由论》主张公海可以自由航行,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如荷兰、英国提供了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以突破当时西班牙和英国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并反对炮舰外交。——译者

② 弗朗索瓦·芬乃伦(Fénelon, 1651—1715年),法国天主教神学家、诗人。——译者

成了一种出于基督教影响从而具有共同利益、普遍恐怖意识和警惕心的共和国。”<sup>①</sup>这些话语正指出了欧洲分裂为若干主权国家以后其普遍主义传统还连绵相承的特点。那么，所谓的亚洲世界又如何呢？关于“东洋”是否存在的争论已是众所周知，且不管它的结果如何，印度、中国、日本这三个在历史与传统上分别拥有高度自足性的文化圈则是并立存在的；而且也不管它们之间有过如何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它们没有构成欧洲式的共同体或者一个国际社会则是相当明白的事实。不仅如此，甚至不如说对于这些程度不同的闭锁世界，是“国际社会”抱成一团强迫其“开国”的。换句话说，东洋诸国并非在国际社会的内部自我觉醒的，而不妨说它们是在“国际社会”的武力或武力威胁之下——被强迫拉入的。于是，东方各国朴素的民族感情到处首先表现为对外来欧洲势力压迫的反抗。在中国和日本最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的都是旧国家的特权统治阶层。他们的“民族意识”所带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要防卫传统政治即社会体制免遭欧洲基督教和产业主义的浸润。（这与欧洲正好形成对照，因为在欧洲作为旧统治阶级的贵族恰恰是世界主义的，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相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军。）我们如果姑且把该种第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相区别，称之为“前期”民族主义，那么它的典型表现就是“攘夷”思想。这种攘夷思想究竟有何特征？当我们讨论清末和幕末的攘夷现象时便会发现以下几点共性格外突出。第一点，它的产生与统治阶级要求维持其特权身份的欲望是分不开的。因此其中的国民

---

① 引自 M.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1949, pp. 160-161.

连带意识稀薄,反之毋宁说它对占了国民多数的庶民采取的是排斥疏远,甚至敌视的态度,幕末水户学之类的文献中就经常出现“奸民狡夷”的说法。也就是说,这一称呼本身便表现了统治者猜疑恐惧百姓民众私通敌方的心理。在此,重要的一点是“奸民”被视作了与“狡夷”有相同性质的问题。第二,“攘夷”中不存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等意识,相反由于人们是以国内阶级统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的,因此从一开始那便是二者择一的问题,即不是自己征服吞并对方就是被对方击败控制。像这样,从更高的层次上约束国际关系的规范意识一旦稀薄,那么昨日基于权力关系存在的消极防卫意识到了明天就会立刻转化成无限制的扩张主义。在那里,面对全然未知事物时的原始恐惧感和妄自尊大相交织的特殊复杂心理自然会成为支配力量。当然以上只是极为一般化了的说法,具体到个别国家时还会有种种微妙的差别,而且它们又是与大多数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源泉,即自民族中心主义多少有相通之处的因素。但是同最初便发自一个共同规范意识的欧洲民族主义相比,东洋各国的民族主义要达到合理性,尤其要达到与国际主义保持基本平衡,必须克服十分巨大的困难。这其中,有一点是无可否定的,即像上述各国民族主义产生条件的不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不过,担任前期民族主义主力军的旧特权阶层,实际上在直面正视欧洲世界在产业、技术及军备上的压倒优势之后,已经被迫认识到:就是为了达到防御新世界保卫旧世界的目的,他们也必须采用“敌人”的文明来武装自己。可实际上那里潜含着一个异常困难的问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事实上统治阶级如果不吸收

欧洲文明已经难以维持其原来的世界，可是一旦全面吸收，其结果便是旧体制的根本变革，从而招致他们自身权力的丧失。想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即对欧洲文明的引进吸收只限于产业、技术、军备等所谓的“物质文明”，而对于基督教、个人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思想政治原理方面的各种渗透，则要遏制到最低程度。这种区分对待，若用古风来形容，便是桥本左内所谓的“取彼器械艺术，存我仁义忠孝”，或者佐久间象山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此处艺术自然是指技术之意）。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区分对待里面也显而易见存在着不易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所谓的物质文明并非轻易地能够同孕育了它的近代精神相分离的，更何况就算实现了分离，而想要阻止物质生活环境的近代化对思想意识产生反作用也是困难至极的。中国与日本在历史的命运道路上的分歧，以及因此形成的两国民族主义发展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正是源自于两国的旧统治阶级针对那一段历史的考验做出的不同反应。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统治阶级中的相对进步分子们为“区分对待”所做的奋力尝试，都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之下进行的。而且，在日本，正如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促使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无论如何总算建立了东方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它不但顶回了欧洲势力的浸润，而且还以令世人震惊的速度发展起来，并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伍。然而在中国，自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至康有为的“维新变法”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尝试，最终都屈服在清朝内部强大保守势力面前，从而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被帝国主义列强集中蚕食瓜分，陷入半殖民地，或者如孙文



所言的“次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当然，围绕中国与日本的这种命运差异还可以列举出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如两国的地理位置，“开国”时间的早晚，旧社会解体过程中的相异，统治阶级的不同历史性格等等。不过在此，这些成因论并不是主要问题，重要之处在于，这些出发点的相异最终给两国的民族主义打上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印记，并且还给今日的局势带来关键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由于未能通过改组统治阶层的内部结构以实现近代化，中国于是便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长期深入的渗透，但是这反过来又不容分辩地给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布置了一项从根本上变革旧社会及旧的政治体制的任务。旧的社会统治阶层为避免灭亡，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与外国帝国主义相勾结，走上所谓的“买办化”道路，所以他们当中不可能兴起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旧统治机构与帝国主义的媾和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民族主义与社会革命的结合。在此恐怕没有必要追溯从孙文开始经过蒋介石直到毛泽东的一系列革命过程。不过，这种民族主义与革命的内在结合在今日的中国自然显得最为典型，而其实它也出现在印度、法属印度支那、马来、印度尼西亚、朝鲜等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主义当中，可以说构成了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多少相通的历史特质。

只是唯有远东的日本帝国走了与此正相反的道路。在那里，打倒德川政治体制掌握了统一国家权力的“维新”政权自身就是旧统治阶级的组成分子，他们的欲望只不过是一味专心于要把日本的地位提高到“与万国对峙”“同海外诸国相并列”，从而迅速地瓦解了国内多方的封建势力，而把它们统一在天皇的权威之下。正

是他们极其巧妙地一边实施上述的“区分对待”，一边实现“富国强兵”政策的。在此基础上取得的近代化成功的确是相当惊人的。就这样，日本不但在保全主权独立的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而且在开国半个世纪后便已取得“列强”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近代化是从属于“富国强兵”这一至上目的，并且是以惊人速度得以实现的，因此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产生了倾斜或者不平衡。并且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在其初期还曾显现出要纠正这种倾向的动向，后来渐渐放弃了尝试，原因上尽管有种种不同，但根本意义都在于为了日本向帝国方向发展的正当化。因此，它非但不会与社会革命从内部相结合，而且正如从玄洋社——黑龙会——大日本生产党这一系列发展经过所示，对于革命——甚至不妨说对于革命的潜在可能性，它在某些时候进行直接镇压，而其他时候又始终发挥着革命力量转换器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民族主义对于西欧的古典民族主义那种与人民主权或者一般资产阶级民主的诸原则相结合的“美满婚姻史”也了解甚少。不如说它是一边听凭上述的“前期”民族主义的诸特性浓厚地残留着，一边便同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到末期的变质形态，即帝国主义，一拍即合地勾结上了。这样，日本的民族主义从早期开始就同国民解放的原理诀别了，并且反过来还常以国家统一之名牵制后者。这种情况还使得这个国家的“民主主义”运动或者工人运动中关于“民族意识”“爱国心”等问题的严肃讨论长期弛懈，甚至将它们视作挑战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此外，它还导致了统治阶层或反动分子垄断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的恶性循环。

日本的民族主义早早地放弃了国民解放的任务,并把国民主义上升为国家主义,甚至极端国家主义,但是这不只是制约了狭义的民主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活动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深关国民精神构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都知道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因为上述“区分对待”的成功运用发展得十分迅速,于是令国民大众的一般基础生活的近代化无论在速度上还是程度上都显得明显落后,但是这又给民族主义的思想构造乃至意识内容打上了决定性的烙印。顶端经常竞争于世界的最先进行列,底边则被传统方式顽固地占据着,这种不平衡的日本社会的构造规律也贯穿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身当中。日本帝国惊人的飞跃发展因其内部包含着不易解决的矛盾从而为其同样惊人的急速没落做了准备,而简直与此同步一致的是,在世界上名噪一时的日本民族主义因其放弃与民主化的合作,表面上显得十分强劲有力,实际上最终那将是它难以克服的弱点。曾经那样名噪世界的日本人的爱国意识到了战后迅速地从表面上消失了。正当邻近的东亚各民族纷纷迸发其奔腾的民族热情时,日本国民们则相反显露出病恹恹的娼妓根性或者一味追求露骨的个人主义,以致令激进阵营和保守主义的道学家双方都灰心丧气。导致这一态势的秘密实际上早已扎根于战前民族主义的构造之中。下面就来概观一下其主要的因素。

首先第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在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构造中,国家多倾向于表现为个人自我埋没的第一群体(家庭和部落)的直接延长,爱国热情特别体现为一种热爱环境的乡土感情。这本来是一切民族主义的起源,即“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共同要素。但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尤其像被称作“法兰西革命之子”(乔治·皮博

迪·古奇(G. P. Gooch)语)的爱国热情绝不是对环境的单纯的情绪依存,它正如厄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的名言“国民的存在是每天的一般投票”所表征的那样,是伴随着高度自发性和主体性的。这才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原理相结合后得到的最宝贵的历史收获。(所以在日本主导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民族主义上也表现出了这一侧面,尽管很不彻底。)由于日本的维新改革是那样的形式,所以明治政府的指导者不可能依存民众间自发成长的能动的国民连带意识,但是他们从不断的对外危机感中认识到唤起民众爱国心的急迫性,故必然会通过国家教育来自上而下完成这个课题。该过程的有组织实行是到了文部大臣森有礼之后,那时日本的“近代化”已经在对自由民权运动的残酷镇压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了。因此,对第一群体的非合理性的热爱,特别是那种传统的、封建的乃至家长制式的忠诚被大大地动员起来并集中到作为国家统一具体象征的天皇身上,国家意识就是这样得到一味灌输的。在这里,诸如“忠君爱国”观念(忠君为爱国之前提)、以天皇为国民总本家的家族国家观等等大概已无须重复了。对于这样的思想教育,亲历了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就有不少人指出如今的人们过于夸大其效果,他们认为,像那种“国体”教育的贯彻是最近的极端民族主义阶段才有的现象,明治时代要远远显得自由,更有“启蒙”特征。可是这样一来,论者们对于前面提到的顶端与底边不均衡问题的看法反过来说岂不有过于缩小的倾向么?自然,在论者自身所属的知识层中间,国体思想的浸透的确并非那样彻底。这正与沙皇俄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同,他们的知识教养中西欧式部分占着压倒多数。然而生息在阴暗窒闷的社

会底边上的庶民大众——尽管福泽坚定决心要把“让全体人民心中存在国家的思想”作为毕生的课题，结果还是远离“国家观念”的大众——则正是通过这样的“义务”国体教育，兼备了对国家的忠诚精神和最小限度上必须的产业及军事技术知识，成长为佛兰斯·哈尔斯(Frans Hals)所谓的“魔术实践与科学实践”兼备的一代帝国臣民。而且就是这样，高效促成的国家意识在连续相继的对外战胜和帝国膨胀下不断地得到加强。实为自我感情投射的日本帝国的这种膨胀自然地作为自我的扩张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市民自由的狭隘和经济生活的窘迫所产生的失意则不妨视为国家对外发展过程中的心理代价。不断鼓吹着对外危机感——而正好19世纪末以来的帝国主义时代为其提供了合适的土壤——统治阶层运用史上少见的巧妙的国家术数，成功地动员了本国国民的感情，对社会分裂的一切苗头都防遏在未然之中。以至于外国几乎所有的日本研究著书的第一页中都要对“日本国民的团结精神”大书特书一番。

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忘记看看奖牌的背面。首先要清楚国家意识并非对传统社会意识的克服，其通过有组织的动员得到灌输之后的结果，正如经常被指出的那样，即生成了大量忠实而卑屈的仆从，他们只会万事托付给“上级”，至于方向选择便完全依赖权威的决断，由此可见作为政治责任主体的近代公民并没有产生。其次，家族及乡党意识我行我素，并未延长到国家意识上，相反有不少场合它那占山为王划地称大的根性蔓延开来，难免会破坏国民的连带性，于是家族个人主义便成为“国策实行”的桎梏。众所周知，征兵制实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尊重家族

制度实行了长男不入伍的方针，这后来就被下面反其道而用，出现了次子以下的男丁入嗣他家以逃避征兵的倾向。晶子的《君请勿死》一首诗，与其说是语言意义上的反战诗，毋宁说是对第一群体的执着爱情的朴素表现，是国民感情“公然秘密”的大胆表明，正因如此它才给人巨大的震撼。还有苏峰在“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中指出的“我国民之爱国心是一旦危机时的爱国心，而非行往坐卧间之常物”也并不稀奇了。这可以说是国家意识不存在于市民生活之内，而是在其外部表现为自我感情的投射或补偿的当然结果。日本民族主义“前期”特性中的这一负面，在不久前就是到了要全面推进战争的阶段，甚至要求国民生活实行全面组织化时，与那些叫嚣式口号成反比地暴露出来了。人们只要想想疏散计划的强制实施、劳动力征用配制以及工业生产力的扩充正是由于家族主义“农本思想”或“爱乡意识”的存在从而遭到多么顽固的心理抗拒就足矣。在从前的东条辅佐选举之际，由大政辅佐会巡演于各地的活剧中再三地重复强调了“要坚决废除投关系票、人情票的恶弊，从国家公众的立场出发选择候补者”为宗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居然与近代选举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些都是因日本帝国的统治阶层不注重民族主义的合理化，相反却热衷于利用民族主义的非合理起源，于是不久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在情况发展至国家总动员阶段才注意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昂代价，然而为时已晚。

## 3

曾经一度完全控制了半个中国和东南亚以及西南太平洋的日本帝国随着战败一下子又缩回到维新之初的渺小岛国中。“国体”

披浴着国内外的痛彻批判不得不进行变革,而附着于其上的诸象征物(如神社、太阳旗、君之代等)的价值便一落千丈。于是,集中在这些帝国象征物上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就失去了中心支柱而急剧地退潮下去。战败尽管常常会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如拿破仑征服后的普鲁士、普法战争后的法兰西、日清战争后的清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等),但在日本,却出现了前述那种令外人惊诧的沉滞,或者不如说一种虚脱感支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一事态的原因要素当然有许多种。但是,就是光想一想上述日本民族主义的成长过程,尤其是大众的国家意识构造,也便知道那决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异。大凡发展的民族主义必定伴随有一定的国民使命感(mission idea)。所谓宣扬皇道,所谓布大义于宇内,或所谓八纮一宇都是该种使命感的表现。在知识阶层看来不管这种使命感显得多么荒唐,但其深层存在着的非逻辑的逻辑却在过去的日本国民大众中间一直发挥着强大而神秘的支配作用。关于其精神构造前面曾做过论述(本书第一卷第一章“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在此则不再重复,但总而言之,它把国内以天皇为中心的金字塔式等级关系构造的观念往横向延长为国际关系了。这种皇国观念与中国的中华意识的世界形象貌相似而实迥异。这表现在,后者以文化优越性为中心观念,而前者则始终把武力优越性作为正如后文所述的虽非唯一却必不可缺的契机。在中华意识看来,自己即使被夷狄在武力上征服,但并未蒙受本质上的打击,而(日本)的“金瓯无缺”观念一直是得到皇军必胜和国土从未遭到侵犯的“历史事实”(!)来支持印证的,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理解战败带来皇国象征物决定性的价值跌落。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前述

的桥本左内的图式与使命感的关系。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把使命感划分为全体使命(Integralmissionsbegriff)与部分使命(Teilmissionsbegriff)两种概念——后者如强调本国使命在艺术、政治或产业等某种特殊领域内<sup>①</sup>,在这一点上日本正是一个典型,因为它在维新后把东洋的“精神文明”与西洋的“技术物质文明”综合起来并在其上加入日本固有的“尚武文化”,由此发展了典型的全体使命感。“国体”无外乎所有这些价值的统合体。假如是部分使命感,它便有可能在遇到心理挫折或触礁之后转变成其他领域的使命感重新发展。然而日本的使命感是全体的,就因为此,其崩溃导致的精神真空便越发显大。战后,在新宪法制定的同时登场了装饰一新的“和平文化国家”这一使命观念,可是尽管它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根据,对于国民却丝毫没有牵引力,视其为战败后无奈中打出的口号,诚然是难以抹去的印象,不过反过来看它却比任何事物都清楚地说明了旧日本帝国使命感的全体性。关于资源匮乏、人口过剩且全无军备的日本今后在世界上究竟还具有什么存在价值的问题,国民中的大多数至今尚不知答案何在。不管今后新的民族主义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只要在上述疑问上鼓吹不出一种可与旧帝国民族主义相匹敌的、具有新鲜吸引力的使命感,那么就无须指望它作为独自力量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另外需加以注目的是从前就有的民族主义意识的社会分散现象。在地方乡党感情、家长制式的忠诚心等传统道德乃至对社会风习的组织动员的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国家意识,一俟

---

① *Der Patriotismus*, S. 38-39.



中央集权力量松弛,就会马上自动分解,自然还流回它的老巢,即构成社会构造底边的家族、村落等地方小集团中去。这一可称作国家意识的动员解除过程发生得也极为迅速。比如战争刚结束后,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混乱,像“江湖贩子”、黑市商人之类的集团遍地丛生,在各地还大量形成或复兴了命名为某某帮、某某系的半暴力集团,这些可通过新宿的尾津帮、新桥的松田帮的例子来看。当时这些集团代行地方警察职能的现象是人所共知的,而这样的集团中许多复员军人都被吸收进来了。由于这些所谓的“反社会集团”中大都存在着师徒式的忠诚关系并进行了类似军队的组织训练活动,所以十分适于填补因中心象征的崩溃而产生的大众心理的空白。通过服从其等级秩序和集团统制,人们在社会混乱中产生的孤立感和无力感便得到了抚慰。另外,战后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政党的出现多得惊人,也同这种回流现象有点关系吧。其中也有不少可以看得出是从前右翼团体的直接继承或者伪饰。它们都是对天皇及皇国的忠诚心发生“转移”的例子,但多少带有异常,不过本来,因为日本社会的基层总多多少少具有同族团体的结构,所以在更加“正经”的工作空间或社会集团中便会有国民的精神复员在大规模地无形地进行着。右翼团体成员、旧军官等等转而投入粮食增产运动或开荒运动,或者加入地方金融机关、归国者团体、神社清扫服务团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前面两种情况的中间形态。如果继续从微观上观察,便会发现今日在大众间极为流行的赛马、赛车及其他体育娱乐活动中,军国主义的胜败观念在广泛地干着“自读”的勾当。奥的斯·凯里氏去观看日本与三藩海豹队(San Francisco Seals)的日美棒球赛时最初希望日本获胜,但是看

了观众及选手的态度之后便觉得不如三藩海豹队的胜利更叫人高兴。后来,在进一步更看到广播报纸对古桥远征的报道,不,应该说目睹了全日本的沸腾样子后,他说:“我寻思这样下去能行吗?和平的道具中体现出来的却是‘敌前登陆’的气势。”<sup>①</sup>这里他直接坦率地表达了某种担忧。也就是说,过去的民族主义与其认为其精神构造已经消灭或者发生了质的变化,还不如说它只是从量上被分子化后散落分布在底边上,只是从政治表面上消失了身姿而已。

那么,像这种传统民族主义感情的分散潜在对今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呢?第一点相当明白的是,这种传统民族主义的情形若照旧不变,则决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与新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支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只有通过破坏其发酵的温床,即坚固的同族团体式社会构成及其思想意识,深入至日本社会根底的民主化才会成为可能。假如进步阵营稍稍为那些并不完整的表象所眩惑,把它错看成将来民族意识的萌芽,或者尽管了解其前期型的性格却因眼前的政治目的而迷住心窍,妄想把它动员起来,那么不用多久它必将演变成沉重的反作用回击到进步者自己身上。如上述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会经过微分化栖息于非政治的日常现象中的情况本身就首先证明了: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只高高地停留在国家机构制度,即法制改革的阶段,而没有渗入到社会构造以及国民生活的方式中去,更罔论影响到国民精神构造的内面改革。“民主”只要还是一种高尚的理论或者可贵的说教,那么

---

<sup>①</sup> 《日本的年轻一代》,第 283 页。

它依然难脱舶来品的身份，而与民族主义从内部的结合便不可企望。为了达成这一结合便需要一种稍稍奇特的表现，即在进行民族主义合理化的同时要相应地对民主进行非合理化。

然后第二点是，回流到社会底边的旧民族主义的感情是否会再次现形于政治表面，再次被调动发展为旧帝国主义的象征？如果有人从政治上来动员它的话，那么从其构造原理出发它就像沟渠中的水一样会逆着原来的方向反流而上。从这种意味上看，最近升挂太阳旗、复活国歌《君之代》，甚至参拜神社的倾向，特别是国民教育上旧象征物的抬头成为议论喧哗之的也是理所当然。有些便在嘲笑从这种个别现象里立刻读出极端民族主义或法西斯复活征兆是神经质。的确，把三藩海豹队棒球赛、日美水上竞技中观众的狂热态度与军国主义精神的抬头直接挂钩只能说是滑稽可笑的，因为在那里正如前面所述，问题显然属于非政治的、个人的领域。凯里氏恐怕也并非从那样直接单纯的意义上来“担忧”的吧。但是政治的动力学经常告诉人们，正是那种乍一看与政治毫不相干的日常行动方式，会在蓄积的瞬间突然转换成巨大的政治能量。因为它在政治世界中现形的过程形态是极为微妙的。太阳旗、君之代的复活也是如此，当将它们一个个分开来看时，便觉得并非什么大事，可是若把它们放到与设置警察预备队、加强海上保安队，以及日本再武装的问题等进行关联来考虑时，那么认识到其中存在的政治动向的萌芽也未必都属于杞人忧天的了。

不过，这种政治动向也不能简单地看成战前民族主义原封不动的复活，它还具有复杂的貌相。最主要的原因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日本在殖民地帝国时代曾经拥有过的实力和威信，在

如今的国际社会中都不可能复活了。思想意识方面也一样,今后天皇、君之代、太阳旗的象征价值不管恢复到什么程度,像战前那种“冠于万国的国体”已经不可能再有了。这样一来,尽管传统象征被抬出来,现在尚未定形而如一盘散沙的国民感情也许今后会被再一次努力组织起来凝聚到这些象征底下,然而受到动员的民族主义本身已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我们毋宁认为它将与更高一层的政治势力——恐怕是国际的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后者达致一定政治目的——比如世界冷战战略——的手段。只有具备了这一利用价值,它的存在才能得到承认。日本的旧民族主义最醒目的作用正如前所述,体现在它会隐藏或压抑一切社会对立,遏制大众自治组织的成长,并把大众的不满转化成对特定的国内外替罪羊的憎恶上。如果在今后,国民的爱国心被再度因为那些外来的政治目的而调动,那么它便会放弃国民独立这一几乎所有民族主义都奉为至上的命题,而只会继承同反革命结合这一过去最丑恶的遗产,这是否也还称为民族主义便归各人的自由了。只是在那时,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日本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去,它便将必定迎来一个与其他亚洲民族主义背道而驰的命运。

(1951年)

### 补记:

本文登载于《中央公论》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新年号上,该号的特辑是有关日本的民族主义(战后代表性的舆论杂志就这一问题展开比较全面的探讨,恐怕属于最早的尝试)。这篇稿子最先

是提交给“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50年在印度勒克瑙举办的“亚洲的民族主义”为题的国际会议的,后来与尼赫鲁、麦克马洪·保尔等其他演说和报告一同收入《亚洲的民族主义》(岩波书店)一书。这是经过日本的调查会研究会上的几次讨论后由我来执笔的,特别是有关战后部分,所包含的叙述有研究会木下半治等其他委员提供的资料。本稿则是将这类叙述部分删去后,整体上主要以我的观点进行分析重新改写的。

## 第六章 “现实”主义的陷阱

——致一位编辑

来信拜读多遍。关于那种重大问题如果让我重新写的话，我希望能针对反对意见展开充分论证，光说结论非我所愿。但由于目前健康状况欠佳，上封信回绝了您的稿约。此次来信说这回就跟投票选举一样，到了该表态的时候。我从您看似轻描淡写的表述中感受到了很强的危机意识，正因为如此才觉得更不好下笔。当然，现在要是让我就重整军备问题投票的话，我无疑是投否决票的。不管是现政府想要搞的“不露声色”的重整军备也好，还是改进党等其他派别所主张的以修改宪法为前提的所谓堂而皇之的重整军备也好，我的态度都一样。作为和平问题谈话会<sup>①</sup>数次宣言和声明的署名者之一，我要是坚持己见的话，原则上当然是反对现在提倡的重整军备的。综观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再听听社会上的众说纷纭，也依然找不出什么特别依据非要改变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观察到舆论界从讲和论调突然转变到重整军备论，以及人们对此所做出的种种反应，我还是禁不住有所感慨。那么，在正式

---

<sup>①</sup> 1948年秋由日本学界的代表人物(丸山真男亦是成员之一)所结成的组织，主张世界和平，1950年1月15日就讲和问题发表声明，强调自主、中立、全面讲和，反对美军基地。——译者

讨论重整军备问题之前,我今天想先就两三个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谈一下。较之重整军备论争的具体内容,这些应该属于潜在于议论深层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态度问题的范畴。我想就此坦率地披露一下自己的感想,权且以偿稿债。但出于身体原因,如果中途实在感到疲劳的话,那么哪怕成了虎头蛇尾之文,恐怕我也只能潦草搁笔,这一点敬请事先谅解。

## 1

无论在讲和论兴盛之际,还是此次重整军备的主张广受争议之时,社会上常常指责和平问题谈话会的观点“不现实”。我感到有必要借此机会认真追究一下,我们日本人常说的现实或不现实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认为“现实”含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特征是现实的被赋予性。

现实本身一方面是被赋予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是每天创造出来的。通常说的“现实”,主要是全面强调前者而忽视了现实的可塑性一面。换言之,在这个国度里所谓现实完全等同于既成事实。“放现实点”,就是要求你屈服既成事实。如果仅仅从被赋予性和过去的角度来考虑现实的话,那就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悲观情绪:“这就是现实,没办法。”现实总是一种“没办法”的过去。我曾分析过这种思维方式是如何渗透到战前战时的领导层中的,又是如何使日本的“现实”一步步陷到泥沼中去的(参照前文“军国统治者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从内部瓦解不也正

是这种“现实”观作怪的结果吗？“国体”的现实，军部的现实，统帅权的现实，满洲国的现实，退出国际联盟的现实，日华事变<sup>①</sup>的现实，日·德·意军事同盟的现实，大政翼赞会<sup>②</sup>的现实……最后一直到太平洋战争这个现实，这一个又一个让人记忆犹新的被赋予的事实牢牢地笼罩着我们的观念，封杀了我们的自由想象和行动。不，说起来甚至连战后的民主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建立在“战败的现实”上，不得已才加以肯定的。记得战后不久的美国《新闻周刊》上登载过一篇讽刺日本的报道，说民主主义对日本人来说只是“*It can't be helped 'democracy'*”，正因为是这种“无可奈何的民主主义”，所以使之就范的压力一旦减弱，就又会自动地反弹回相反的方向。因而，从无可奈何地放弃战争到此次无可奈何地重整军备——呜呼，我们这种不断屈服于既成事实的举动究竟要走到何处才会打上一个终止符呢？

构成日本人“现实”观的第二个特征，可以说是现实的一元化倾向。毋庸置疑，社会的现实本身是由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各种现象立体构筑而成的，这种现实的多元结构在所谓“正视现实”或“站在现实的立场上”这类斥责声中，大多被轻易抹杀，而被强调的只是现实的某一个侧面。再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当时，提倡自由主

---

① 即指 1937 年 7 月 7 日的“卢沟桥事变”。——译者

② 大政翼赞会成立于 1940 年 10 月，其宗旨是“实践翼赞大政的臣道，上意下达，下情上通，密切配合政府”。总理大臣近卫亲任总裁，各地支部长由都道府县知事兼任。在中央和地方分设大政翼赞协议会，开展法西斯精神总动员。大政翼赞会还把产业报国会和日本妇女组织纳入体制，甚至在东亚的侵略地区亦有组织。日本战败后，大政翼赞会于 1946 年 6 月解散。第 178 页注释①。——译者



义和民主主义、主张与英美协调、反对工会组织参与产业报国会<sup>①</sup>、掀起反战运动等等，这一系列活动均被打上了“非现实”的烙印，甚至被定为叛国罪。换言之，只有沿着法西斯化的方向才是“现实”的，稍有逆反的动向则被视为“非现实”的。但是，毫无疑问，当时的世界各地到处都在展开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斗争，不光是国际关系上的轴心国对民主主义国家，而且各国国内也同样都有这种矛盾对立的动向，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认定法西斯主义的动向是现实，除此之外都是“非现实”，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否则，1945年世界史的转折就可解释成一种奇妙的现象：在响晴勃日的一天，“轴心”的现实突然烟消云散，而“民主主义”的现实则兀自浮现出来。事实上，战时的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一直都只是从多方面的现实中挑选出其中一面来报道，仿佛那就是唯一的“现实”一般。而国民就像被蒙上眼睛的驮马一样，只有一线“现实”之光射入视野，所以对当时突变的局势自然是毫无准备，完全将其视为一种“突然变异”。即便是到了战后，比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麦克阿瑟<sup>②</sup>的罢免等，对我们日本国民来说也都成了晴天霹雳。而实际上，导致这些事件的“现实”在以前就已逐

---

① 即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940年11月23日结成的一种全国性联合组织。由于全国劳动工会同盟和日本劳动总同盟的解散，在内务、厚生两省指导下，将工会纳入伞下，使工人统合到战时体制内。1942年5月，归由大政翼赞会监督之下，二战后的1945年9月解散。——译者

②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美国著名军事家，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远东军司令，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战后出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1951年4月，麦克阿瑟因战争失利和所谓“未能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而被解除一切职务。——译者

步形成了,只是日本的报刊、广播故意不报或根本没把它们当回事。战后的美苏对立日益激化,无疑是连小孩子都知晓的“现实”。但实际上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现实”是:不光邻国,连美苏两国的首脑们也曾尽各种努力想方设法避免关系破裂。再加上世界各地的反战和平运动——尽管其中包含各种倾向目的——也日益高涨,这难道不也是难以否认的“现实”吗?在这错综复杂的现实里,所谓“放现实点儿”究竟指的是哪一种呢?其实,那时人们已经选择了期望现实的某一面,而不是另一面。这当然是基于一种价值判断,讲和问题也好,重整军备问题也好,决不是现实与非现实之争,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种选择而争。尽管如此,我们听见的“现实论”只是片面讲和论,或向美国一边倒,或(正式或非正式的)重整军备论。一般人当然不用说,甚至连反对派稍不小心也会被诱上圈套,倒退到同样的想法中去:“啊,现实如此,理想只不过是……”这又是为何呢?

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就触及了形成我国人民“现实”观的第三个要素。那就是,每一时期当权者所选择的方向总是正确的、被视为“现实”的,而反对派所选择的方向常常被扣上“观念性的”或“非现实的”的帽子。这一点很明确,无须再重复举出战前战后的例子。根深蒂固地盘缠在我们身上的趋炎附势及权威主义在这里暴露无遗。当然,这种想法和第二种情况一样,有其成立的实际基础,即民众对权力的监控减弱。当然,这正是当权者希冀的方向——至少在某一时期——在率领国家阔步向前时,作为实际问题,也就是统治者的决策必须压倒其他一切,尽可能地将自己抬高到唯一的“现实”地位上去。古典的民主政治的变质,在世界上表

现出的一致倾向即是削弱民众对政治权力的监控能力。所以上述想法实际上颇具普遍性,在我国这种自古以来信奉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国家,更是有肥沃土壤,更易将统治阶层的现实视作一般现实,并尽可能地把我们的判断纳入其中,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

比如,即使是关于西欧的重整军备问题,光看日本的报纸,给人的印象是所谓“以实力寻求和平”,这一观点在西欧诸国中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问题只在于重整军备的具体技术上的方法而已。然而,这些报道主要都是各国政府的动态,民众的动向所表现出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现实”。西德的民众绝大多数反对重整军备,这一点连大报也不得不频频报道,有报告说:法国大约50%以上的国民反对政府的政策,特别是重整军备政策;25%的人虽持有不满但不知如何是从;只有剩下的25%的人是明确表示站在美国一边的。<sup>①</sup> 英国也同样,众所周知,工党内反对重整军备的巨头比万<sup>②</sup>的声望越来越高,比万派的克罗斯曼<sup>③</sup>在斯卡伯勒(Scarborough)工党大会上,与多数议员谈话的印象是,他们对宣传俄国的侵略意图持怀疑态度,认为英国的重整军备“与其说是与莫斯科之间的问题,莫如说是与华盛顿之间的问题”,并且遗憾地表示,“美国人自己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却要求我们再降低生活水准”。而且,据《纽约时报》特派员报道:“这种对美国政策的厌

---

①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1951年11月号。

② 安奈林·比万(Bevan, Aneurin, 1897—1960年),英国工党左派领袖,曾出任劳动大臣。——译者

③ 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Howard Stafford Crossman, 1907—1974年),英国工党左派政治家,议员。——译者

恶情绪，不光是工党左派，包括保守党在内，已渗透在许多人中间，只要是较之丘吉尔和艾登<sup>①</sup>稍左的人”。然而，上述这种西欧的形势，一经浸入“统治者的观点即一般现实”这种显像液后，呈现出的“现实”却只是西欧世界正掀起重整军备的浪潮，于是我国便随之产生了一股“别赶不上趟”的劲头并愈发高涨。当然，正如西欧报道的那样，即便“政府与国民之间的隔阂在扩大”是事实，但仍值得怀疑，而当前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向对各国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究竟能监督到何种程度？美国现行的对外政策愈发直接受对苏战略的观念所支配，其必然的结果是无暇顾及民心向背，只好到处凭借强大的政府来拉大旗、作虎皮，这种通过政府来迅速实行“封锁政策”，更显得“自上而下”的活动强劲有力。但我们若因此便以为这是“现实”的全部，那就错了，在将来的日子里，会遭到来自现实本身惨痛而猛烈的报复。民众间的运动不如当权者方面那么有组织，而且也未必能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所以表面看来总不会显得那么轰轰烈烈，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推动现实变化的最终力量正在于此。这是历史的常识。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依然可以归结到该如何相对地选择“强大而短暂”的现实和“弱小而漫长”的现实。

只要稍加思索便能明白，现在舆论界盛行的“现实”观有着这种极为特殊的意义和色彩。只要不对这种现实观的构造加以批判，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会阻碍我们国民的自发性思考和行动，

---

<sup>①</sup>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年)，英国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首相。——译者

只会起到埋没这种思考与行动的作用吧。那么，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少女一样，穿上红舞鞋的国民只有不停地跳舞，自己也无法控制地一直跳到死。我们不必担心被指责成观念论而畏缩不前，而必须要挑战这种特殊的“现实”观，不能再屈服于这种既成事实的“现实”了。这种“决然”的态度哪怕是个别的，即使力量再小，也能使我们选择的现实更加推进，更加牢固。不相信这一点的就是不相信人类历史的人。

## 2

当然，尽管如此，形势在急转直下，昨天还是选择与否的问题，今天已变成了既成事实；今天还是势均力敌的势力之一，到了明天则可能变成绝对优势。很遗憾，不容否定，从讲和论到中国认识的问题，再到重整军备问题，这一年多来我国走过的诸多历程，使我们应该相应做出的各种选择转眼间从眼前一一掠过。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我们必须竭力戒备一点，不能因总是过于拘泥于昨日的选择问题，而削弱了对现在或将来尚蕴涵有多种可能性问题的发言权。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该竭尽全力去应付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而不知不觉改变我们的基本立场，这反而是更为危险的。其结局，提出问题的主动权总是掌握在权力支配阶层手里，而我们只能陷于一种被牵着鼻子走的被动状态。“讲和议论已经是了结的问题，不要总是重翻旧账”，如果单方面推行这种想法，结果将会怎样？安保条约和讲和条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行政协定又是以安保条约为依据的。不管从时间上还是理

论上看,在讲和条约—安保条约—行政协定这一链条中,很明显,从美国政府的意图和愿望来说,只有有了行政协定才能有安保条约,然后才能确保讲和条约,美国上院是在看到冈崎与腊斯克会谈<sup>①</sup>的行政协定有可能缔结后才批准讲和条约的。大报纸当时兴奋地欢呼“独立了!独立了!”到了现在却摆出一副满不是那么回事的面孔,不是糊弄人就是毫无远见,这才是“非现实”的最典型的例子吧。关于重整军备问题,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会议的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日本应渐增防卫义务,所以,问题仍在于那种片面讲和本身的性质。如果说这已是过去的事了,那么只能说,重整军备的是非本身也只能说是没有必要纳入讨论的问题。某一事件是否了结决不是性急的舆论界人士和心怀叵测的政治家所说的那样轻快明了的问题。是全面和谈还是单独和谈,如将其视同为赛马来看的话,确实胜负已定。但其间主张全面讲和的人们所忧虑的问题本身不但并未消失,反而愈发凸显。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忘却和抛弃过去的争执点,而是要在新的局面中将它不断地具体化。倘若不能摆正这一基本态度,结果便会不知不觉地摔跟头,当你察觉到时已站在与自己原本立场相去甚远的地方了。这不正是悲剧性的重蹈覆辙吗?满洲事变后,不正是成千上万充满善意的知识分子最终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吗?

与此相关,我不得不特别提到知识分子特有的弱点。那是什

---

<sup>①</sup> 冈崎胜男(1897—1965年),昭和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任外相,在吉田茂所推行的对美协调外交中与美国特使戴维·迪安·腊斯克(David Dean Rusk)频频举行会谈,后者曾任肯尼迪及约翰逊政权时的国务卿(1961—1969年)。——译者

么呢？正因为知识分子们都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所以即使对不合自己意图的“现实”，也会想方设法寻求一些理由，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将之合理化、正当化，从而满足自己的良心。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在尚能意识到这一点时还好，至少在这时还存在着自己的立场与既成事实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然而，本来就性格孱弱的知识分子不久便忍耐不住这种紧张关系，自己开始主动走近“现实”来填补这种沟壑。此时，其擅长的思想及学问便被动员起来，而且凭借人类所秉持的无止境的自我欺骗能力，他们绝不会将这种实际上的屈服看作屈服，而只当作是自己原本立场的一种“发展”，颇为顺理成章地与昨天的自己接轨。曾有不少自由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这样将日华事变、新体制运动<sup>①</sup>、翼赞会、大东亚共荣圈、太平洋战争一个个合理化起来，这该算是一种悲剧吧。如果知识分子再犯这种错误的话，那就只能说是瞎胡闹了。

拿我们眼前的重整军备问题来说也是如此，不管是出自善意还是恶意，像上面那种先发制人的危险想法已早就表现出来了。比如，问题已不是在预备队是否相当于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战斗力”等这类“学究式”的讨论阶段，而是在将要实施的重整军备上如何防止旧帝国军队的再现，或如何确保文官统治的原则——这类议论已见诸各处，它们不以主张者的意志为转移，实质上的结果

---

<sup>①</sup>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益内外交困。为摆脱困境，近卫内阁试图仿照德、意法西斯体制，在日本国内以达成“国防国家”为目标，解散现有政党，推行舆论划一、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1940年6月，发起这场运动。7、8月间，社会大众党、政友会、民政党等先后宣告解散。8月23日，近卫成立新体制筹备会，吸收桥本欣五郎、绪方竹虎、武藤章等军政界要人参加活动。10月12日，新体制的具体成果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参见第171页注释<sup>②</sup>。——译者

是朝向了上面所要引导的方向。虽然尚未成为主要动向,但已大幅让出了阵地。文官统治的问题本身不仅限于这一议论,但只想说一句,那就是在日本看似耳目一新、为统帅权的独立和军部大臣武官制所困扰的文官统治问题,实际上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瓦解后世界各文明国家都已确立的原则。当然这种确立也是自由主义所需求的,同时也是现代战争中最行之有效的战争指挥体制。这一点因为已被历史所证明,所以,并不因为文官统治制度的确立,战争的危險就会明显减少,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完全可以说是对现代战争的直接原因认识不足。当然,从现代战争的整体性质上来看,形式制度上不管文官武官哪方优越,政治家与军人(或政治策略与战略)的融合一体是一种趋势。例如,在日本以惊叹和诧异的眼光被看待的麦克阿瑟元帅的罢免是美国文官统治最为显著的例子,但它丝毫不妨碍美国的政治、经济机构的军事体制化。甚至还有一种有力的看法认为,该事件是马歇尔、布莱德雷派对麦克阿瑟的胜利,由此,反倒实质上加强了国防部首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总之,现在似乎把重整军备的问题归结为文官统治上,这客观上起到了将真正的论点从国民的视线中引开的作用。我们在问题意识上应始终保持冷静而执着,即便是为急转直下的事态所目眩神迷,也不能陷入思想上那种“购买期货”的心态。

还有一点,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都认为是否重整军备应由国民自己来决定——这本身是言之有理的——但却出现了一种苗头,即拿这种议论作为烟幕,隐晦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其中当然有着各种意图,实际上自己内心的立场已定,但现在还不宜表明,所以要等“舆论”转向自己后再说——或是更积极地操纵“舆论”将



其诱导到自己的立场方向来之后再说。既有战略战术，又是名副其实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对形势的观望中顺应着大势所趋的方向而动。这些暂且不论，重整军备问题会是下次选举的最大争议之一，所以因其结果理所当然要由国民投票来最终裁决围绕宪法第九条的修改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对于这个问题，国民要做出公正的判断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通讯、报道的资讯源不能偏颇；第二，不同意见须公平地展示在国民——而不是部分知识分子——面前；第三，不存在妨碍或有可能阻碍以上条件成立的法规。所以，主张要将重整军备问题交给国民来抉择的人们，若真是出于纯洁动机的话，他们一定应该感到自己有种道德上的义务，大声呼吁上述条件在国内得以最大限度地成立。倘若他们无视这些条件的存在与否或具备程度，或漠不关心地放手让国民任意去做判断，就像现在这样，报纸、广播的新闻消息来源过于偏向一方（虽说未必在造假），不同意见在报章和讲解中绝对受不到公正的待遇，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味批判，而对美国和军事基地的批评，则因 325 号政令等取缔法规的存在人们只能提心吊胆地评述——这些都可归纳为言论公平自由的各种障碍——对此不做任何斗争，而只是将舆论和国民判断搬出来的话，我们实在无法从这些人的议论中看到任何真诚之意。即便是与几千万国民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些人也是一副高高在上、隔岸观火般的旁观者姿态。他们不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来炫耀聪明的伪贤人，就是明知现有媒体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却反倒想利用这点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精于算计的政治家，两者必居其一。

## 3

无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评论家，竟然第二天就能若无其事地对昨日的言行矢口否认，如此行径还有哪儿能像我国这样常见呢？我并非像思想检察官那样爱抓辫子整人——你某日某时不是这样说了吗？然而，观察最近各界知名人士的动向，就算仅限战后的范围内，着实让我禁不住想制作一份详细的个人语录。也许不太可能涉及所有问题，可哪怕就限定到新宪法问题上呢。让我们大家都好好看看、想想，不管是在国会上、典礼上、宪法普及会等全国各地的讲演会上，还是在报纸上、杂志上、广播上，对于新宪法的颁布那些人都说过些什么，不如帮着一起来调查一下吧。然后再比较一下，当事人现在又在说什么，今后还会怎样说。不这样做的话，到什么时候在日本都无法养成对自己言论负责的习惯。当然，改变观点本身并非坏事——倒不是模仿吉田首相的说法，“笨人一条大道走到黑”不是值得敬佩的吧。（依我说，时兴的“真空说”<sup>①</sup>倒正是一根筋的典范了）——但是，改变观点当然得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且论者本人也应对其有明确解释。阿谀奉承的见风使舵和诡辩家是最卑劣的。例如，之前百分之百地赞扬并宣传新宪法

---

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表面上为了日本的自立而实际上想让日本重整军备以成为共产主义的堤防，美国决定早日和谈，而这种和谈是将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的，而且和谈后仍允许美军驻留日本，将日本作为永久基地。其理由是因为如果由于非武装而出现实力的真空状态的话，共产主义就会乘虚而入。吉田茂内阁与美国步调一致，主张单独和谈及美军驻留。而朝鲜战争正是制造出这么一种氛围，让国民接受这种“真空说”。——译者

精神的学者,到现在竟能改口说什么那是被占领下被迫制定的宪法,没有必要去那么尊重;主动支持放弃战争的政治家,也在两三年后人前人后地议论那些条款的不是,看到这些,谁都会觉得奇怪吧。姑且不论那些对国际形势不甚关心也认识不够的知识分子,至少比一般人更精通此事的政治家、学者、评论家等都拿“彼时美苏尚未决裂”这一理由来说明当时放弃战争条款的合理性,并将此归结为“依据实际情况转变”的原则而埋下修改宪法的伏笔,不禁令人无语。与民主主义相提并论的那一条款,难道能被说成是只有几年有效的轻率决定吗?倘果真如此,那么当初轻率地加上这一条款的当局以及那些无条件赞赏的学者、评论家们首先必须要为自己的缺乏远见谢罪天下。说起来,“冷战”真的是那么突然而降的现象吗?暂且按年代顺序来看,我们先不去谈冷战的根源是如何早在二次大战中就已滋生的,1945年8月18日,在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性的日子过后仅仅第三天,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就发表声明表示不满:“现在的保加利亚临时政府没能充分代表民主舆论的主要部分”。两天后,英国的贝文外相也在下院的首场演说中说:“我们必须防止拿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来代替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的动向发出了警告。也就是说,几乎是第二次大战甫一结束,就开始了冷战。次年(1946年)1月的第一次安理会上就讨论起苏联与伊朗的纠纷。然后,苏联代表猛烈抨击英国在希腊、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活动,并首次行使了否决权。3月在纽约召开的理事会上,围绕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问题,苏联第二次行使了否决权。因此,早早就有人开始怀疑安理会运营的前景了。丘吉尔于1946年3月5日发表了著

名的富尔顿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明确提倡以英美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1946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倡导在互不干涉原则上对苏协调，与伯恩斯国务卿对立，最终导致其辞职。（同一天，全美退伍军人会长在新奥尔良说：“我们应给莫斯科送上一颗原子弹。”）然后，1947年3月杜鲁门就援助希腊、土耳其问题在国会发表的历史性外交咨文中指出：“支持所有世界自由人民与极权主义作斗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宪法草案纲要由内阁发表是在1946年3月6日，上交众议院是6月25日，整整用了一个夏天来审议修改的结果，于8月24日才通过众议院；提交贵族院后，经过几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学者和政府当局的论战后，10月7日正式获贵族院通过；当天，众议院同意再次修改，于是11月3日公布；第二年（1947年）5月举行了隆重的新宪法颁布典礼。那些为普及宪法的各种活动、讲演会、解说书等是从这以后开始泛滥的。只要比较一下这一极为简单的事实年编，不就很明白吗？那种“没想到当时美苏的对立”“国际关系尚稳定”之类的辩解，实在不该出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和学者之口。我们日本国民“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生存与安全。”放弃一切武力，“誓为国家名誉竭尽全力以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和目的”（宪法前言）这种说法决不是出现在风平浪静的乌托邦世界，尽管美苏抗争尚没有今天这么激烈，但至少是出现在可以预见到世界范围内对峙的形势之下。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敢于作为一个非武装国家重新起步，这才是新宪法的划时代意义。至少我是这么认为，这么理解的。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

似乎越是对历史健忘的人越爱言过其实。所以,即便我详细回顾了这些历史事实,也许到头来还是会遭人呵斥:把这些考证留给历史学家来做好了。

走笔至此,不觉已超出了原定的篇幅。以上所述对稍有头脑的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想法,反而是极为平常的观点。然而我认为,身处现在的时代,与其说些什么中听的话,倒不如把理所当然的观点反复强调上百遍更为有效,故斗胆进言。如有言辞过激之处,就当作病中之人常见的症状吧,望海涵。请多保重。

(1952年)

### 追记:

本文“现实主义的陷阱”(《世界》1952年5月号),我只能说是在病榻上写就的。(另外,在本书的旧版里面,几乎是同期写的文章“恐怖时代”和“关于讲和问题”原来列在第一卷里了,但在增补版中考虑到论文的收录标准和全书的平衡,将其略去。)

在那些论文里,特别是“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发表后立即引起种种反响,以林健太郎的“非批判的批判”(该作者语——刊于《世界》1959年10月号)为开端,陆续有松村一人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人间》1950年12月号),高桑纯夫的“一席自由将导致败北”发表,分别对我和林氏的见解进行了评价和批判。这些批评当中有许多宝贵的启示。虽然为时甚迟,我还是想对诸位表示深深的谢意。不过,对蒙受批判的诸问题中,有一些由于表达得不够完善而造成的误解,还有一些没能理解我从行为模式来探讨分析问题的意义,所以,(至少对我来说)似乎有些失之准确的解读。尽

管如此,时至今日再翻起这些老账会给各位平添麻烦,而且容易造成的结果是把我现在持有的观点不当地划归为我当时的观点。因此,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便于读者把上面的各篇论文尽量跟我在其他场合表明的观点联系起来,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也是为了多少弥补一下第一卷中战后部分的篇幅过小之嫌,对各篇论文中具有重要关联的若干问题,摘录一些我过去同时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加以补充。

第一,在我的论文“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本书第一卷第四章)中指出了一种模式,即人们爱用共产主义和(英美的)民主主义的对抗图式来理解现代日本的政治状况。我提出的以下悖论式说法引起了诸多议论,也就是应该把政治力学作为分析的中心课题,因为它推进或者监察人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的民主化。特别是大众规模的个人自主的确立,比较西欧社会,我们这里要通过相对“左”的集团的动力来推进。这里所谓民主化是指西欧的、市民意义上的,而不是指苏联式的,是因为我们的课题就是如何从行为方式和道德(人际关系)中包含的共同体(包括虚拟的家庭主义和宗族体)的制约中得以解放,在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把民主主义的西欧制度和机构作为问题来讨论,也不是主张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西欧的近代一切都必须经过一遍。同年(1950年)11月号的《基督教文化》刊有我在“尼布尔的问题点和日本的现实”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当时也是这样说的:

西欧式的自由这一理想体现在西欧社会,与之完全对立的理想体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这样观念性的看法是否合适,……

在亚洲社会,比如在中国,这可能是非常矛盾的说法,难道不可以说,就跟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确立了西欧式自由一样,共产主义把同样的能量在亚洲的现实中实现了吗?当然,我不是图解式地说,它创造了与西欧自由同样的东西,或者不经过某个阶段就不能进入下个阶段。我绝非相信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会以莫斯科为中心向世界波及。但是在像亚洲这样所谓的落后地区,西方民主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的,由西欧式民主解放人格的这一历史过程,担负此任的力量比在西欧要“左”得多,或不得不由其进行。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状态下。

就是说,是现代结社的力量创造了从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独立人格。其过程,东方和西方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结社的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基础东方和西方则完全不同。这就是我的认识。当然,虽都叫东方,但日本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在同一座谈会上,我曾说“中共掌握了政权就什么都中共中共的,日本和中国的社会进化不同,或阶级结构上能多大程度把中国(革命)模式类推到日本呢?就此我们基本没有什么深入的反省。”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比较单纯。作为现实问题,除了中共以外,没有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体力量,而且中共有这样的实力。但是,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条件不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与中国不同,已经具有达到一定世界水准的垄断资本,技术水平也相当高。但与此同时,另一面还残存着诸如农业那样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日本跟中国不同,它有与欧洲基本相近的封建制度,从历史发展阶

段上看,也更与欧洲社会相近。问题就是这么复杂。”因此,“我说在东方社会靠共产主义力量反而能实现现代化的意思,并不是说共产主义或共产党必定会取得主导权实行共产党专政政权,完全由它作为主体进行现代化,而是说共产党成为一种推动力。其推动力的程度如何,因东亚社会各民族的不同而迥然不同。就像中国和俄国不同那样,中国和日本不正是在这点上不同吗?即使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形态是联合政府吧。若得不到相当广泛的社会组织参加,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我想日本比中国可以说更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成为现代化的一个要素,而且这个要素是不可或缺的。在日本若没有这个要素,比如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正如尼布尔所言,将陷入无底的机会主义和妥协中去。所以我认为作为不断鞭打批评它的力量,共产主义还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另外,由于中国革命推翻了乡绅统治和宗族主义,“犹如爆炸了原子弹”那样,囚禁了数百年的巨大的社会能量首次被释放出来。对此,当时的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研究中日现代化差异的竹内好也分别给予了种种提示,在此存志。

这种日本在世界上的特殊位置,是与“日本的民族主义”(第一卷第五章)中也提到的日本进化类型相关的。还是在1950年8月《展望》杂志举办的“被占领的心理”的座谈会上,就日本的历史定位,我说:“从政治上说,美国这个国家没有经过封建社会,一开始就从近代社会起程了。然而,苏联呢,说得极粗略点,就是未经过西欧的市民社会一步就跨进社会主义了。(所谓封建社会当然不是说它是一个严密的社会结构,而是说它几乎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式样。——杂志后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有动



辄把现代社会绝对化、永久化的倾向,对现代社会具有的危机和矛盾容易盲目对待。与此相对,苏维埃的倾向是,基本把市民社会性质的东西认为是西欧的、资产阶级的,而将其从大脑中驱除。因此,两雄正面对峙的话,一种思想的绝对主义跟另一种绝对主义冲突的危险非常之大。为此,夹在两国之间,日本被迫同时要解决近代化和现代化两个问题,这在世界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不是吗?”当然,对以上见解会有种种疑问,要把它展开来谈过于庞大,仅谈这些又丝毫未做回答。但至少从以上的发言可以理解到,我并未把“前近代性”和“封建性”当作阐明日本社会的“神丹妙药”(deus ex machina<sup>①</sup>)。像第四章论文中论述的那样,传统型的行为方式也由于战后巨大的大众化的冲击和地方政治结构的变化,失去了与以往统治关系的对应性,其政治功能也多样化了。没有追踪其过程是这篇论文的缺点。但是,传统型的解体不意味着会立即向新型的行为方式转化(乍看像新的自我意识,其实也有不少是构成部落共同体行为模式的一个侧面,亦即自我意识膨胀的现象)之处仍然留下很大的讨论空间。所以,不应把它跟来自体制论和机构论所规定的近代还是前近代(或曰垄断资本还是封建遗留制度)这类问题混淆。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日本的民族主义”末尾论及的战后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具有战前那种结构和功能的民族主义由日本统治阶层大规模复活的条件和可能性有多大?对于这个问题,我在1953年10月的《世界》中“民主主义名义下的法西斯”的讨论里比

---

① 拉丁语,意思是解围之神。

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和预测。

在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化的关联上,经常被人问起的是今后民族主义动向的问题,即刚才都留先生提出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力量的出现,从日本的追随美国政策来看,是不是反映了由于这种从属政策而得不到利益的那些资本的要求和不满。我判断,就日本整体形势来看,民族主义而且是保守的民族主义今后确实会抬头,但其结构会跟战前有很大不同。首先,我们结论先行,就是今后的保守民族主义将把国内消费置于第一位,战前那种对外出口方面将会缩小。其顶层是不得不跟国际势力相联手。在此意义上,我认为跟过去的日本帝国主义不同,日本拥有独自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并打着一套独自的意识形态旗号向外扩张发展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八纮一字式的民族主义不得不走到尽头,因为它不得不被对美从属这一严峻的事实所制约。而且,美国出于政策需要必须考虑,在把日本编入反共防共体制的过程中,要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等对日本的战前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复活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戒心的国家与日本之间搞平衡。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对外的民族主义复活也被套上了枷锁。因此,作为今后日本的保守民族主义的构造来看,将会形成其顶层是国际性的、底层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吧。底层的民族主义自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而是战前民族主义的变种,将家长式或者长老式统治扩大到一般国民的规模上,并以此来汇集国民的尚未组织化的朦胧的民族感情。而且必

须防止它走向危险的反美方向。为此，保守势力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呢？——这当然是一种预测，比如，现在出现的旧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中，就是直接积极地把没有政治意义的象征大大地加以复活。像村里的祭祀节呀神社信仰的复活呀等等。神社若是国家神道形式的话，就会直接关联到政治了。但他们只重新组建城镇乡村的神社和神轿，或者把祭礼和仪式活动搞得更热闹些，是采取这种方式。我认为修身和道德教育也是其中一环。此时那些露骨的国体思想和神道思想被去掉，以最日常的忠孝仁义形式鼓吹所谓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即家庭道德和上下服从的伦理。还从艺术娱乐方面搞复古形式，比如从插花和茶道到歌舞伎和浪花曲等不一而足。这些现象都没有直接的政治意义，但是，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发挥间接的、消极的、不正常的政治效果，都将引起对战前日本的怀旧情绪；其反面就是，对战后民主主义运动和大众自下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起到很大的镇静剂和催眠剂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把大众的关注囚禁在狭窄的私人圈里，通过非政治化来达到其政治效果。将其单个拿出来看都不是什么值得尖锐追究的重大问题，而且也不能说每个事项本身本质上是反动的。但是，若跟更大的背景关联起来看的话，其每一步都有可能具有阻碍民主化的功能。而且，他们还会瞪着眼说祭祀活动搞得热闹点儿有什么不好？敬老尊长难道不是美好的道德吗？他们将其与整体和周围加以切割，一个一个渗透下去。结果就是，通过捐助祭祀活动这一过程反倒形成了头面人物固定的组织，以敬拜祖先的形式强化宗族统治

和家长统治,在学习插花等妇道过程中,纺织女工的组织化反受到阻碍。我们再来看皇太子的登场露面,本来就是主要面向国内活动的,而且作为不具直接的积极的政治意义象征,皇太子处于接近临界点的地位:因为是皇太子,所以再怎么着也构不成天皇崇拜;而且至少根红苗正没做过坏事,所以对外也不会有强烈的刺激。用崇举皇太子替代崇举天皇的手法,处于政治和非政治的界限上,尽管有些敏感,但若成功,则可发挥最大限度的效果。还有,在仅限于国内运作的话,反美情绪某种程度上也要利用吧。特别是它采取的形式是纠正占领政策的过火行为,比如指责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制度典章不合日本的习俗,只要在国内范围基本允许。不过问题是,在煽动反苏、反共这点上,今后的保守民族主义会具有对外输出的一面吧。我认为这是自然的。但是这样做,就必须向大众说明国际上的各种问题,结果是把民族主义感情扩展到国际上去。若是这样,它究竟会不会如统治者所望止于反苏反共呢?就跟双刃剑一样,倒是变为反美情绪的危险性更大吧。因此,他们当然会煽动反苏反共感情,但与其说是直接反苏反共,倒不如说是以国内的反共和反工人运动为第一目标,即假借间接侵略“逻辑”的间接形式。我认为,对统治阶层来说,以非常直接露骨的方式煽动反苏反共能走多远是有限度的。国内有七百处美军基地,众所周知,在基地周边频频发生问题。在这样的状况下,要把民族主义感情扩展到国际上去,而且单冲着反苏反共方向引导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说,政治上的统治势力对国际条件的依存度要比战前大多了,国际上稍有点事件,

国内的政治经济动向就会敏感反应,不能不受到冲击。只要看看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停战报道的冲击是多么强烈,就会明白。由于这些和日本的统治体系自身的战后变动,统治阶层和保守势力使用的政治象征丧失了以往那样的整合性。战前公共的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和私的家族制度的意识形态相交于万世一系和忠孝一致的神话。而且,国内统治和世界政策是以把国内的阶层秩序推向世界的形式结合起来的。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即便是其根基的使命感,战前也是将东洋的精神文明和西洋的物质文明结合到日本国体上,具有其综合的整体结构。当然先要说明一下,这种统一不是说战前的皇国意识形态具有逻辑性的统一,而是说它在情绪上有其统一性。然而,战后没有办法谋求这样的整合体,因此统治阶层和其理论家所使用的政治象征极度片断化、碎片化了。冈崎外交被称为随机外交,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随机的象征,因此也就不能不成为随机民族主义。具体地说,就是一旦发生某些具体事情,为应对它所暂且需要的象征无论新旧,毫无统一地被动员出来,所以自相矛盾随处可见。“民主主义”也好,日本自古以来的淳风美俗也好,英国的绅士风度也好,美国的开拓者精神也好,只要需要就搬出来。正像由武道的达人率领的作为“新国军的基础”的保安队那样,他们身着跟 GI 一模一样的服装,手持跟 GI 一模一样的武器,干部也到美国接受训练,其所象征的那种讽刺意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随处可见。比如,大肆提倡恢复家庭制度的保守议员也不得不加注说:“只是不要跟个人尊严和男女平等相矛盾”。前

面说过,底层是旧民族主义,这旧民族主义都已失去了自古以来统一性,变成一种非常奇妙而复杂的形态。

那么接下来,有人会问:“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纳粹运动那样,以所谓新的、把大众自下组织起来的法西斯主义是否会出现?”关于这点,我认为:“即便现在右翼运动当中具有反美反苏的两面性,还有打着社会主义纲领的民族主义呢。而且,工人运动当中也有反美反苏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动向(所谓第三势力论中,持有两体制共存的和以两体制冲突为前提而提倡第三势力的,两者混在一起。这里说的是后者)。但是,将来说不准,作为当前不确切的预测,这样的运动成长发展是有一定界限的,大到某种程度会解体的。而且,因为国际上对美依存,国内只反共,所以他们或会成为瓦解工人战线的法西斯帮手,或与亚洲民族主义更为相像,或者明确与共产主义运动合并,总之早晚逃不出解体的命运。我认为仅以反美反苏来急速壮大的新兴政治团体像纳粹那样推翻现有政治力量掌握政权的条件一时还不会有。在此意义上,日本的法西斯化基本上会是自上而下地,以自由党、改进党这些既有的政治权力为主要执行者来进行的。”

由上面煽动的保守民族主义主要是限于国内的运作,这一点在讨论会上也受到来自都留和辻两位先生的集中提问和质疑。当然,国内运作,仅是就保守民族主义的用途和目的而言,并不意味着不包含国际问题。因为把围绕日本的国际政治形势利用在保守民族主义的标语口号中的时候,在国内教育政策和劳动政策里对“赤(共产主义)”的封杀和向体制统合本身都成为当时的主要目的

(与此相反,战前为止的国内统合是以对外侵略为前提的)。

对于都留先生提出的问题:会不会用战争夺回失地的口号与反共结合,要夺回被苏联以及中国抢去的领土进而成为行动而出现呢?我大致是这样回答的:

某种程度是这样的,绝不可以轻视。但是如先前所说,这样具有明显国际政治意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在现实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都不得不碰壁。比如,提出千岛和桦太问题的话,反而要扯出冲绳问题。再追溯的话,如果说日清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那么连台湾的领土主权问题或又会被提出来。这可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首先,关注人家的领土之前,人家说内地无数的治外法权的地方会怎样呢?仅靠口号不是很没有说服力吗?若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巨大帝国的话则另当别论,只要不是,基本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从属于美国。所以,在对外方面,不能只对一方适用民族主义,对其他的就不适用。以这样的形态或许有所发展,但它是不完全的民族主义,我认为还是有其自身的界限。……MSA问题,通过NHK的街头录音听了改进党议员的讲话,那是在说,把MSA当作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进一步追溯就是当作给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对日本国民犯下滔天罪行的赔偿不行吗?某种程度可以接受这种看法。可MSA“援助”的用途若不是日本自由支配的话,正如都留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用它建立的军备基本上也是从属美国的战略目的的。然而,国内宣传却是从美国那里拿到巨款,日本强大了就好了。在这个意义上,

民族主义还是国内运作，从国际规模来想，完全不可能有自主性。李承晚线的问题上，被韩国人看扁是因为没有军备之类的话语被到处利用来煽动再军备。但日韩关系紧张到一定程度，美国就不得不出来调停吧。所以对外高举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行为总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顶。

可是作为意识形态，或作为运动虽然触顶了，但是因为国内经济上的困难，人口问题的压力等等，日本在美国的诱惑下开始向海外（主要是亚洲大陆）进军的危险性如何呢？此类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对此我的回答是：

假设发生刚才所说的事态，美国会有条件地让你出兵，这谁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按民族主义的逻辑搞国民精神动员很难，因为下层的民族主义话语是矛盾的。关于国民被广泛卷入到保守体制当中去，我倒认为最重要的是，现实是日本经济的军事产业再编，很多国民靠军需生产，保安队需要人力物力，还有那些靠服务基地过活的人。就是说，保守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层面有如前所述的种种脆弱性，无论怎样通过教育和媒体灌输，曾经的日本帝国教化根本不会成功。因此动员国民自发主动的协作比过去要困难得多。不过，在此前的经济学者座谈会上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作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手段开始的兵器生产又变成了既得权益，反而导致国民经济依赖兵器。保安队扩大了，相应地作为农村相对过剩的人口出路的意义也就变得重要了，靠基地挣钱生活的人



也会增加。若是这样,这些既成事实的叠加结果就是把许多国民拖拽进去。此时,象征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就会减弱,所以不是自告奋勇的追随,而是拧不过现实没法子的心态吧。因而其中少不了带有浓重的虚无和颓废情绪。

结论就是,从统治阶层的体制掌控能力来观察战后日本政治的精神状态,我在此次讨论提出的一般图式就是“一方面权力像战前那样由多元化向统合性推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失去了战前的统合性,越来越碎片化。权力和象征在制造一种所谓剪刀差”。据此,当时我指出统治阶级的保守化方向为:(1)通过封杀国民日常的政治活动以及人为地改正选举法使议会政治趋于形式化。(2)通过“民主自由”概念的再定义搞一体化。(3)警察以及“军队”转向虚无主义的暴力机关。关于(1),尤其是议会主义还是暴力革命这种二选一的问题提出,无论是作为现状认识还是作为处方都不妥当。就此我做了如下陈述:

我认为轻视议会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同时,是议会主义还是暴力革命这样问题的提出也是唯心的。议会政治,通过民主程序做出决定这一原则作为社会基础存在,它作为上层建筑才有意义。只是仅仅作为制度的议会,本身也有可能起到实质性的压迫民主自由的作用。比如,乖离于本来意义的多数决定主义,即多数决定万能,就有虽然存在议会和政党却使之划一化和辅佐化的可能。从“自由世界的招牌”方面来说,剥夺几年一次选举的投票权在议会政治原则上当然不可

能。若是这样,保守势力正是反用卢梭的名言,以国民政治权力的行使仅限于投票日那天去投票,而其他的政治权利都不应该置于议会政治下面的“暴力”思维封杀国民的政治活动。他们会用一方面保存着形式上选举机制,一方面用将其结果与国民意志划上等号的虚拟手法推进对体制的默从。尽管如此,由于反对现体制的政治势力壮大,相当多的人进入议会的可能性出现时,而且他们有不但不反对还要改革现体制的危险性时,保守势力会像法国和意大利正在做的那样,采取人为操作选举法的手段。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考虑怎样才能让议会起到最大限度的吸收国民各种意见和要求的作用,如何把仍然没有充分反映在议会上的能量合理地组织起来。这才是不让议会政治游离于国民的途径吧。否则,只看表面就会陷入这样一种错觉和幻觉中去:自由讨论和说服的原则似乎正在上至中央下至基层的政治过程中执行着。国会且不说,越往跟国民生活密切的底层去,实际情况就越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欺诈的决定跟大众的不关心加在一起,以“协议政治”的形式通过。这就是现状。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这些现状,不让大众的自发行动和能动批判的通道堵住。所以说,是议会主义还是不是议会主义这样的非此即彼在日本现实存在的观点很可笑。

这里预测的“操作选举法”很快没出几年便以小选举区制来改划选区的尝试出现了。

关于(2)的自由再定义,我认为:“在占卜统治阶层今后动向上

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对普通大众,他们限制个人生活以及用碎片化了的旧标志引导。但是对具有较高政治意识的阶层,还是不得不打着‘民主主义’旗号来压制。这些标志旗号都被限定在特定的意义上推行而决定其方向。这些现在美国正处在进行过程中,今后在日本也会被不断推进吧。这就是逐步限制‘民主主义自由’的思想,把国民的意识及思想规格化、统一化。原本英美式的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尊重思想、言论的多样性,通过多样性达到统一。然而‘民主主义’不是往积极实现自我的方向推进,而是假‘民主主义’之名排除‘民主主义’的敌人,并以此为第一要务。他们认为排除异端即民主主义自由。通过排除异端的过程,比如以排除左右独裁为名,其实是消除多样性往正统化统一思想。即使允许批判每个政治家和每个政党,但批判体制却是禁忌。它是一种只允许对现体制自由赞美的‘自由’和同质化了的思考的言论自由,是自由的同义反复。这样的自由‘再定义’的目标在麦卡锡主义里最为露骨。即使不那么露骨,在美国和日本多多少少在向那个方向发展。”也就是还有,一方面把自由限制在个人领域,同时另一方面把‘政治自由’本身正统化的问题。本来正统这种观点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相反,然而,忠诚审查却站在把正统的东西事先定好了再进行的观念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所谓形式上的自由,什么正确呢,是通过言论思想的市场上的公平自由竞争来决定的思想。然而,比如他们用这种形式排除异端:自由的内容是‘自由企业’,自由企业才是民主主义的精髓,用诸如此类的说法来限定自由的内容。反对它就是反对普遍的自由。而且对大众采取的是把自由限定在非政治性自由上的做法,即非常狭隘的私生活享受”。

还有,关于一般现代自由主义“正统主义化”的问题,我在1948年9月的杂志《思想》里“思想的火花”栏里论及。另外,就“囿于私生活”与现代型的冷淡照应这点,参照本书第三卷“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

为了慎重起见,这里加段附言。自由的私化(privatization)问题,不能与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中论述的近代国家中的个人自治(Privatautonomie)原则混淆。思想、信仰、言论等的自由作为“私事”,其不可侵犯被国家权力承认,这是近代国家的公民参与“公事”的前提条件。公权力的具体行使是助长还是压抑私的自治成为市民监视权力的基本视点,这是普通的市民民主的存在方式。(在此意义上,不以“私”的关心为基础的灭私奉公政治“协赞”完全不是本来的民主主义公事参与。)对此,这里所说的自由“私化”指的是市民的关心集中在狭窄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消费享受方面,而这样的私生活享受没有提高到对社会的政治的关心,还阻碍这种关心的提高。市民的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跟政治权力专制化不矛盾,倒是常常互补。这点在托克维尔的古典著作《美国的民主主义》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经尖锐指出过。

关于(3)的警察等军事机构的“纯粹暴力”化倾向,我就保安队(自卫队前身)的精神支柱问题在同一讨论中做了如下发言:

今后的战争是高度机械化的,与此同时心理战的要素也会越来越加大。所以意识形态和象征的作用未必会低下。看看朝鲜战争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吧。纯粹的机械力量和纯粹的物质力量是有限的。引起朝鲜战争的是地理环境的

关系,虽然还有讨论的余地,但对军队来说,意识形态是重要因素这点没有变。意识形态临时灌输是不行的。眼下美国那么巨大的变化,仍离不开多年传统背景下的“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现在的保安队会怎样?看看某旧军人说的话,他还是在诉说“保卫家乡”的乡土爱,“民主主义”似乎较弱。然而,谈及乡土爱就会直接触及遍布全国的美军基地,其象征就会削弱,就要把枪口对准自己国民的反对基地的运动,从而陷入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困境走到极端,它恐怕就将变成丧失了高度机械化组织中支柱的人的集团,成为虚无主义的暴力组织。不仅保安队问题,一般来说,今后的法西斯主义就连一直以来硬性统一的象征都将消失。所以我认为,作为其脆弱性的补强,直接暴力要素出现的可能性要大于以往。相应的,被统治者去诉说内面精神的要素就将稀薄化。为了削弱国民的抵抗只有把大众囿于私生活的无度享受里,使之冷淡逃避。所以跟战前比较一下,国民意识非政治化和强化直接镇压将成为法西斯化的一个特征。但表面上被大大强化,可内部却非常脆弱。

当然以上的议论是,从跟统合手段和象征操作面的战前不同的视点,讨论民族主义保守化乃至日本统治阶层法西斯化时的政治诸条件,绝不是说日本政治会一直走向那样的方向。另外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和“法西斯化”的意思,参照第二卷的第四章。

**增补版附记：**

本书旧版出版前后，我再次把精力集中到有关日本思想史方面的工作，所以，逐渐疏离了能成为第一卷的后续那样的，以最近的日本政治状况为对象的分析研究。在此意义上，就安保斗争高潮期的时事问题集中写的和谈论（第三卷的追记里也有论及），不是我学术关心方向的自然“流露”，倒是一种心理的逆反——斗胆使用贬义词的话——和作为一个市民被“逼上梁山”不得已的行动的一部分。（因此，我觉得现在正适合把我的政治学理论——有没有且不说——作为“付诸实践”的一个好机会而如鱼得水般地活跃一番，我是这么一种印象，所以，当我的言行受到批判或被吹捧的时候，再没有比这更感到奇异了。）正因为这样，在所用的素材方面，或执笔的时期方面，以现代日本作为主要对象的第一卷在本书里也显得特别“陈旧”。如在旧版的追记里尝试过的那样，想把在那以后的讲演和座谈会上的发言等插入到本书来。可要描述日本这眼花缭乱的气候变化，还是远远跟不上。只是，旧版出版后，就现代日本的政治文化，让我拿出陈述我观点的文章的话，请参考“败战十五周年”（与都留重人、加藤周一的座谈会，《朝日月刊》1959年8月9日），“非西欧世界的现代化”（与开高健的对谈，《朝日月刊》1951年6月11日）两篇。关于制约战后“第三次开国”的各种条件，以及天下太平的背后散发着的精神空虚感，和非武装国家的意义这些问题，在那里谈的意见至今不变。

## 第七章 战前日本的右翼运动

### ——序莫里斯博士的大作

我想从讲述大约一个月前我亲眼目睹的一件“小事”来开始这篇序文。那是发生在最近结成的“宪法问题研究会”于东京学士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时的事情。“宪法问题研究会”是一个学者团体，我也参加其中。该团体由大学校长、前校长、教授、前最高法官等不足五十名成员组成，是一个定期集会，是以就现在的宪法修改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和自由交换意见为目的的民间团体，当然与任何政党都没有瓜葛。只是由于那些成员中有不少是战争前就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另外其中还包括一些从前曾受政府设立的“宪法调查会”之邀请，却以其设立动机及过程过于偏向保守党系的宪法修正论为理由拒绝参加的实力派法律学教授，所以报纸及电台等新闻传媒对此十分关注，他们对研究会的色彩以及今后的方向做了种种推测。就在会议即将开始之前，学士会馆的入口突然被十几个手持“旗幡”和大鼓的男子堵住了。“旗幡”上面用大字写着“立即废除美国制定的宪法！”“埋葬曲学阿世的容共学者！”等标语。不久他们便冲破会馆管理人员的阻止进入场内，占据了准备作为会场的二楼大厅，在那里击鼓震天，到处散发传单。其中有个60岁左右秃顶而目光锐利的男子似乎是首领，他强行要求与研究

会的代表们见面，并与紧急赶来的警察发生了争吵。他的声音仿佛破钟一样回响在会馆里。因为这阵骚乱，我们的会议不得不改变房间，延迟三十分钟后才终于开始了。率领这伙不速之客的首领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在莫里斯博士的研究中也经常登场的主角之一——赤尾敏，一个老资格的右翼人物。

听了这些话，外国的读者可能会想象，也许三四十年代笼罩着日本的那种阴郁瘳人的气氛至今还依然构成日本的底流吧。当然这种想象与现实是相去甚远的。诚然研究会场上的情形使我在一瞬间回忆起那个时代骚然的世相。不断涌上前来的那伙人的性格特征、携带的工具、怒吼的口气几乎都与他们的“黄金时代”没有两样。然而他们身边的环境以及周围注视他们的眼光却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因为一旦放到像现在这种状况和精神气候中，他们那些杀气腾腾的旗帜、大鼓以及粗暴的行为显得与周围极为不相协调，结果与其说是恐吓、威慑了围观的人，倒不如说给人以滑稽荒唐的感觉。那天与会的成员们也如此认为，虽然大家都讨厌这种妨碍，但没有一个人会担心因为这些家伙的“威胁”，今后研究会会有继续的困难。那日席间有许多新闻报道方面的人员，于是我就询问其中认识的二三人：“该‘事件’会否成为明天的新闻。”不管怎么说，这次骚乱都引来了警察出动，并拘捕了人，所以成为报道材料也是极其自然的。可谁料记者们做了如下回答：

不，这不会被报道的。说得清楚点，我们会故意不报道它。他们的手段已经明白了。他们干那些粗暴蛮横的事也就因为想让别人来报道他。就算记者的笔对他们有多么不利，



但只要报道就等于为他们做了广告，所以他们压根儿不在乎。再加上他们搅起的骚乱一旦登上报纸，走卒喽啰们便能从“头目”处领到一包赏钱。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他们还屡次去国会、羽田机场制造今天这样的场面。有时候次日的报纸上要是看不见有关他们的任何话题，于是这帮家伙便会上报社来责问：“为什么不把我们昨天干的事情登在报上？”这样我们反而就了解他们的骚乱动机了。对付那些家伙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加理睬，为他们宣传简直是愚蠢透顶。

正如这些记者所言，尽管第二天一些主要报纸对“宪法问题研究会”的初次会议做了相当大量的报道，但关于那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狂想曲之伴奏，除了二三家报纸只短短地报道“某右翼团体进行了妨碍示威”之外，什么赤尾敏，什么建国会的名称，以及传单的内容统统没被提及。总而言之，该事实正象征性地告诉人们，今日具有代表性的大众传媒是带着何种程度的关心和评价来对待那些战前就以“光辉传统”而自居的右翼团体的。

我举出这些身边近旁的例子并非意味着我以为现在日本已经完全脱离了“右”倾全体主义的危险而获得了自由，或者说我主张战后日本的“右翼”研究除了作为学术课题之外已失去了意义。下这种简单的结论同前面言及的仅看从战前状况连续面的判断一样，难免会受到性急的非难。只是至少仅现在这个时点上，战前型的右翼分子越是需要千方百计地上窜下跳来“推销”自己，便越让人明白他们只是影响浅淡的社会存在，更甚者不妨说，他们尚不能设计出与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十分相符的新型组织形态和象

征，——像这类程度的事实仅从上述的小插曲来推知也未必不当吧。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着这一“传统”右翼去适应新的事态呢？其答案是能通过莫里斯博士绵密细致的全面研究来找到的。

在这篇序文中，我的任务是尝试着对“右翼”运动在战前的日本政治社会构造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做一简短概括，并把它引向以莫里斯博士的研究为主要对象的战后时代。

左或右之类的用语本身就只有相对的意义，既然如此，要在具体的政治状况下辨清何为右翼未必总那么容易。而且尤其在战前的政治体制下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使得人们很难确定右翼国家主义的实质推动力究竟在何处。“黑龙会”的名字从过去就一直在国外要比日本国内更响亮——其中正如众所周知 Black Dragon Society 的误译产生了很大的煽情效果——在西欧曾经相当广泛地流行过一种假想，以为黑龙会就是在幕后自由自在地操纵了近代日本政治过程的秘密结社。这样的误解归根结底不仅仅因为西欧人的日本观过于单纯，毋宁说是由于战前日本的政治决定过程过于复杂离奇，超出了合理的理解力范围才引起的。

现代世界的右翼国家主义大致共通的思想意识或者说精神倾向能举出哪些，我将在此试作一罗列：(1)对国家的忠诚优先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忠诚；(2)对平等和强调国际连带的思想及宗教的憎恶；(3)对反战和平运动的抵抗情绪和对“武德”的赞美；(4)对国家“使命”的讴歌；(5)呼吁保护国民的传统和文化免遭外部势力的邪恶影响；(6)一般重视义务胜于权利，强调秩序超过自由；(7)重视作为社会结合基本纽带的家族和乡土；(8)把一切人际关系用权威

主义方式来编成的倾向；(9)“正统”国民宗教以及道德的确立；(10)对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抱有警戒心和猜疑心的倾向，其理由是这些人容易变成破坏性思想倾向的普及者。

如果这样归纳的一般特征并没有原理真实，那么不妨用它来考察从明治初期直到这次战争为止的日本的精神状况。究竟谁是右翼？除了极少数异端者以外所有人都是！前文列举的主张和倾向在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种领域的党派和团体中广泛地蔓延，尤其为他们的领导者所信奉。所谓的国粹，或者那些“右翼”团体及其运动，其实只不过在相对角度上以最显著的形式代表了这一思想意识而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何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项目中的每一个自明治以来原本就包含在日本帝国的实力精英们对国民实行的有组织的忠君爱国教育中了，或者至少有许多带有从那里派生出来的概然性。这里正是日本的所谓“右翼”运动的特殊优点，而同时又是其弱点。首先讲有利点。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紧张给他们“右翼”势力带来了发展参与的绝好机会，此时他们几乎无须付出辛苦就能把自己的思想意识焕然一新地宣传、灌输、渗透到国民当中去。他们只要像闹钟那样不停地响铃，把那些一味沉湎于“个人主义”的享乐、陶醉在“社会主义”的想象乐园中的人们从“梦”中叫醒，令其恢复“神志”就可以了。当他们要揭起“国体”这面锦旗时，除了少数宗教家、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外，几乎所有的党派集团自身一侧都不具备能从正面来反对它对抗它的思想根据。面对“右翼”的攻击，无论基督教徒、“自由主义者”，还是“民主主义者”首先必须从辨明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绝不与“国体”相矛盾这点出发，这样一来在论争中他们总是容易陷于被

动。像这一类情况若不加以考虑,那么诸如 1935 年如疾风一般席卷日本的“天皇机关说”之类的事件,就根本难以理解了。

美浓部达吉关于宪法的学说在几十年间一直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课堂讲义,其著书也历来被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人们奉为必读文献,然而一旦当他遭到右翼势力的集中攻击,其著书就突然禁止发行了。而以美浓部为首,与他同属一个学派的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和法制局长官金森德次郎等人也都被套上“学匪”“国贼”的污名,陷入被迫退出一切公职的倒霉境地。那时候不光以学术研究和自由主义为信条的新闻界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而且,尽管受害者们与政界、官界、财界的上层有着不浅的交往,也有不少朋辈,可居然没有出现一次公开活动来拥护、支持他们。众议院的第一政党友会的总裁甚至还首先站出来提出弹劾该立宪主义基础学说决议案的先头位置。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体”正是日本帝国的信条体系,这就不仅使“右翼团体”对其思想意识的垄断成为不可能,而且它还通过双重手段成为制约他们政治运动的重要契机。第一,“国体”不是单纯的天皇崇拜观念,它还具有作为特定统治构造的侧面(即所谓的天皇制)。一切国家机关是天皇的机关,一切官吏的权限都是天皇神圣性的分与。仅就此而言,以拥护“国体”为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概念中便从来就包含着很大的矛盾了。因此,右翼势力的国家改造主张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直面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若始终尊重如上所述的“国体”侧面,那么就必然要打消向统治机构正面挑战的念头,充其量发挥一下“激励”上层部的作用。只甘于这样呢?还是敢冒有可能被当作“赤”色的危险,坚持贯彻其作

为自主的大众运动之性格呢？——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北一辉以及二二六事变中的青年军官们的悲剧便是这一两难困境的象征表现。而且大多数“右翼”运动选择的道路不用说都是前者。

还有，“右翼团体”的运动急进性还受到日本“国体”的另一个传统侧面的牵制。一般地，政治思想总是在有了具体的“敌方”或者“对立者”的前提下才成立的。因此，运动受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时，它便具有在全体形势中限定自我位置的意义。然而日本的“国体”观念自古以来就同存在于一切政治彼岸的“和”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神话式的表里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它由于超越了所有的对立，于是被认为是“无限绝对”的。日本的国家是大写的家族，或者是部落共同体，反过来后者则是小写的“国体”。在对外危机感紧迫时，这个神话的效果是容易让人们把自我与国家在情绪上同一化，可是其反面，由于“国体”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非政治化（entpolitizieren）便导致出令激进右翼想要彻底实行纳粹式“划一整序”的所有企图遭到挫折的结果。在“新体制”的名下以及激昂的助威声中起步的日本的“全体主义”，只要关系到国内改组一事，便往往转化成几乎原封不动地包含既成势力和集团的“拥抱主义”而告终，其秘密正潜藏在这里。

像这样一路考察过来，再看到日本的“右翼”运动依靠权力的传统寄生性格之强也就不足为怪了。不用说，大多数国家的大众右翼运动都并非完全自立的，他们在国家机构或实业界的上层都拥有资助者和支援者。但是在我国，民间的“右翼团体”与统治机构内部更正式地代表“皇道”的势力的比重明显倾向于后者，从整体上看，说前者为后者的分担承包关系也不为过。这些民间右翼

的运动资金的大半是通过以下几条途径获得的。第一,陆军的机密费;第二,宫廷重臣或实业领导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而作的必要性投资;还有,他们怀着用来收集情报的目的,尽管内心不情愿却时不时给右翼们一些零用钱。但是统治阶层内部有着传统而复杂的派阀关系,正因为它们之间的抗争和讨价还价不允许表现为公开的权力斗争形式,便越发带上了阴谋色彩。于是那些附带条件的民间右翼便得到不少好机会,可以让那些精英再承认自己的存在理由。不过正是这一相同的情况让附带条件各不相同的右翼团体实现彼此间的团结和统一格外困难。以“和”为特征的帝国日本的右翼运动史较之一般的政治,即社会运动史更甚,它由无限止的内部分裂和抗争连缀而成,不过它与其说完全是基本理念和政策上的对立,其实当然也可以说是围绕着师徒上下人际关系的争斗。而且,由于一方面“左”的威胁消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的战争不断扩大,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总动员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此时,权力阶层已渐渐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必要来豢养民间右翼了。这样,在日本的国内体制达到“法西斯化”的顶点,并迎来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居然也是传统的右翼运动遭逢从未有过的恶劣条件之时,这是颇具讽刺的。在臭名昭著的东条的辅佐选举中(1942年),赤尾敏、中野正刚、满开佐吉等老经验的右翼运动分子被统统排除在推荐候补名单之外的事实该是值得—记的。

那么,明治以来在日本的国家主义运动中反复出现的激进主义和反政府因素,究竟是发酵自何种社会原因,又沿着怎样的途径上升的呢?这个问题必须从两个侧面来切入,即形势状况和主要行动者两面。作为客观条件首先不得不举出,由于日本在维新以

后的急速发展正如众所周知一般是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资本积蓄和财政支出,极端照顾重点而取得成功的,其结果便是早早导致了国内的中央与地方、工业与农业、大城市与小城市、巨大资本与中小企业之间明显的不平衡,即它们之间出现了技术、文化及生活水准方面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农村,不但在近代日本“惊人的飞跃”中被甩在了后面,而且还因为它一手承担了“飞跃”的代价,结果便成了庞大的产业预备军的蓄水池,并因其农业的低生产力和恶劣的生产条件在不知不觉中被一遍遍地再生产着。地方农民乃至小企业家、小店主对于作为近代化代理人的中央政府官僚和大财阀,或者更进一步说对于一般城市人一贯抱有反感和愤懑,因为这种反感和愤懑是自主的,并且因为缺乏日常的表现方式或组织,于是便郁积在内部,待机要作非合理的间歇性爆发。他们的出身多为失业士族,在维新中被剥夺了俸禄,又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被视为右翼团体鼻祖的玄洋社当初正是有着那般遭遇于是对明治政府心怀怨恨的不平士族的结社。不过明治政权倒是发挥了惊人巧妙的统治术,它一方面抑制着要求政治体制民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大胆破坏横亘在教育资格取得和社会身份提高前面的传统的贵族障壁,早日形成了不问门第贫富的种种人才选拔机制,把全国的优秀子弟吸收到寡头政治的内部中来。这使垂直型的社会流动性变成可能,而后者正是使近代日本体制安定的重要因素。不过,如再从反面来看,这又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经过激烈的考试角逐从帝国大学或陆海军学校毕业,然后沿着社会阶梯顺利上攀的“秀才”“能人”,与那些在上述竞争途中受挫,或者从一开始便死心断念了的“钝才”“庸人”之间的显著反差,是随处可见的。后

者中的大部分人都顺从自己的命运,安心埋头到一成不变的地方生活那种平凡日常中去了;但是行动性更强、更有野心的少数人则不满足于就此做一个顺从的帝国臣民过一生,他们或者在各地方共同体内自居为“田园侠勇”,或者为求惊天动地而冒险走上“大陆浪人”之路。无论怎样,他们的叛逆精神渐次把他们塑造成一种法外分子,这样的分子则又成为日本国家主义运动的第二个母体。也就是说,在这里对“中央”与“官僚制”的反感与“钝才”对依附前二者的“秀才”怀有的自卑感重合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令右翼运动发生激进式倾斜的契机。

日本右翼运动“前卫”分子的第三种类型即所谓的青年军官。关于他们似乎已无须多费言语了。按照通常,他们这个阶层是已经确保了未来精英地位的。不过在昭和初期的那种形势中,他们之所以也对既成秩序抱有怨恨,是有点儿理由的。第一,他们当中极大部分出身自农村,再者中小队长的身份使他们有很多机会直接接触到下级士官和士兵,并由此了解到部下们留在乡里的家族都面临无法形容的贫困,便不由地会动摇信念。第二,政党内阁裁军计划的不断实行给他们的地位、前途投上阴影,这促使军人常有的过度忧国情绪亢进。第三,军部内也存在着一一般军官对所谓的天保钱组(陆军大学毕业生之称,因为他们垄断了参谋之职)自称秀才的作风和特权地位怀有的传统反感,而这一反感到了若干带队青年军官那里,便会结合青年人固有的洁癖,蔑视个人的升官,使对军队幕僚的批判态度越发变强,不过这些青年军官的激进行为之所以不属于“左”而在“右”的方向上,其理由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的职业,即因为他们碰巧当了军人。如果他们是普通大学或



专门学校出来的,那么在当时的气候下恐怕被左翼化的可能性就相当大了。

右翼前卫分子的最后一个类型是知识分子。话虽如此,但正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参加“右”翼运动的知识分子或者大学生,与参加左翼运动的相比真是少之又少,更何况这些人中大多数还是从社会主义方面过来的转向者。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及其世界观和有关终结目标的理念,但是却把“革命”的煽动战术、进攻构想等按其原来的样子带入了“右”的阵营,所以在国家主义运动内部他们便也理所当然地代表了激进主义的倾向。而且,由于他们不断受到来自同伴和“当局”的怀疑,即怀疑其转向可能是伪装,所以精神上的不安与懊恼便把他们从思想上变成百分之二百的“国体”主义者,随之他们还逐渐对“亲英派”及自由主义者展开了疯狂攻击。但是,正如前所述,日本右翼运动自下调动大众的做法从一开始便是有限度的(像中国的合作社运动之类的特殊例子则另当别论),所以可以断言,新的运动组织中提供他们这些转向者发挥其“左翼”经验的余地并不那么大。

就结论而言,右翼运动当中如此这般促使激进主义发酵活跃的各种条件总是蕴藏着的。但它们一次都不曾压倒寄生者一方而发展成能支配国家主义运动的强大势力,而顶多只是给统治机构的上层部一个“震动”,其作用仅止于推动自上而下的全体主义化而已。过激分子奋力拼命“扫清”道路之后,静静地驱车前来的总是身穿礼服、勋章挂满胸的绅士高管。

作为促使战前日本的政治过程发生急剧右转的契机,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自然不能忽略无视,同时,也不该忘记国际关系

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以及他们露骨的、在国际上获得权力政治的一时成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对战后的考察与展望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明治时期著名的日本研究者西德尼·吉利克(Sidney Lewis Gulick)曾举出“对环境的善感”(sensitiveness to environment)作为日本人的一个国民性格。我们日本人的本质属性中是否真有这种倾向尚是疑问，这姑且不论，而认为近代日本对觉察国际政治气候变化的神经异常敏感，则是不足为怪的。毕竟自维新以来，日本面临欧洲列强争先入侵亚洲，便不断保持着紧张感和危机意识，一门心思以“先进国”为榜样沿着“富国强兵”之路走来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际政治形势的冲击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影响程度在战后都增大了，不过从“列强”椅子上跌落下来的日本，其战前战后的差别并不很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曾经降服了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并教训以国际民主主义的、尊重他国主权的“先进”西欧诸国如果打着“国防生命线”“排除红色威胁”“保护在留本国国民的生命权益”等在满洲事变以后的日本已经听惯了的陈腐逻辑，以种种方式竞相把殖民地主主义正当化，像这样的事态今后万一发展下去，不断地制造出既成事实，那么“对环境的敏感性”将会表现为何种模样呢？——那时候，现在正因受到战争打击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右”翼极端分子以及在民主主义的外衣下依然心怀日本帝国主义“精神”的反动政治家们，会微微笑着从容地直起腰来，在带着迷茫表情观望情势的国民耳边像梅菲斯特那样开始低语：“看吧，哪个家伙不都是一样？在那点上我们才是先进国家呢，没必要为过去后悔了，我们只是手段稍稍笨拙了点儿罢了。”他们未必不会这么做。

(1958年)

**追记：**

这是为增补版新加的一篇，本来是应作者莫里斯（Ivan Morris）博士之邀，为其大著 *Nationalism and the Right Wing in Japan—A Study of Post-war Tren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写的一篇序文，征得作者和出版社的同意后转载于此。但英文开头部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会开会时的花絮（本文开头部分）因篇幅有限被删去了。这次日文转载时又将这段文字重新刊出。莫里斯博士的著述主要是以战后为研究对象的，为帮助读者的理解，作者及出版社希望能在序言执笔时，先就战前的右翼民族主义做一简略概括，因为这点，还有要考虑让西方的读者更容易接受，这两个因素多少制约了本文的描述和展开。因此，其内容，特别是有关事实的叙述对日本的读者来说，当然有些都是常识性的可以省去，但主题与本卷前半部分的各论文密切关联，而且不光考虑到最近年轻人的体验和关心，仅从知识这点来看，本文所涉及的时代及事件（哪怕谈不上与西方读者层同等程度！）愈发变得遥远，这种概括或许也并非没有意义。当然，说是概括，分析的视角与评价都与前面的论文相通，也就是说文责当然是我个人所负，未必能就战前派的见解达到一种最大公约数。

## 第二卷

# 意识形态的政治学



# 第一章 西方文化与共产主义的抗争

## ——拉斯基的《信仰、理性、文明》<sup>①</sup>

### 1

“法西斯分子沉浸在狂热的胜利喜悦之中。但在这个空虚的荣光中，我们已看出他们对即将面临的命运十分恐怖”。这是拉斯基<sup>②</sup>于 1937 年敦促进步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新的黑暗时代”要有最后的钢铁般的意志。七年之后，拉斯基在伦敦大学任政治学教授，作为英国工党公认的理论界领袖，他一边观察到“轴心国正在走向不可抗拒的败北之路”，同时针对现代世界政治面临的根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本仅仅 203 页篇幅不长的小册子里，包含着巨大的命题。的确，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说，除了撰写学术方面的著作以外，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目前战争之际，应该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各种义务，而在努力履行教师繁忙的工作之余，尚有许多

---

① *Faith, Reason, and Civilisation*, 1944. ——译者

② 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 1893—1950 年)，20 世纪上半期英国工党著名政治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大学任教，1920 年以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1926 年起任教授直至去世。——译者

问题未能予以充分的阐述。所以,他申明其作品无外乎是杂文小册子,谈不上是什么学术专著。相比系统性专著,其实拉斯基最擅长的是写杂文。他的学术专著代表作《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 1925)的理论结构也并非是非常严谨、滴水不漏的,但书中极其丰富的具体事例,以及贯穿其敏锐的观察力之文笔,足以吸引读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文可称得上是代表拉斯基特色的上乘之作。当年,在倾向马克思主义以后所著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Democracy in Crisis*, 1933)之时,正值世界反动势力高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剖析现实政治之中,所以其文间飘溢着一些悲观主义的气氛。与此相比,这部新作里虽然依旧保持着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但对已出现的朦胧的自由曙光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希望与兴奋。如同他在《政治典范》中所显示的理想主义热情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 2

本书内容的主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谓的两次大战间的年代(*inter-war years*)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等文化领域进行了综合的批判。第二,对基督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从历史上进行比较对照。这两个主题犹如交响乐曲相互交错地展开,并引导读者朝着一个目标展望未来。拉斯基认为,现代正如罗马帝国的末期一样,所有的旧的文明价值体系已经崩溃瓦解,开始走向没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落入肆意牟利的特权阶级手中,财

富集中,官僚腐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皆丧失自信,文化穷途末路,民众既无希望又无光明,无奈地沉湎于空虚颓废之中。要使这个时代复苏过来,只能重新构建新的价值系统,重新树立新的信仰,让人民从绝望中苏醒,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对建设社会和文化抱着憧憬的心态迈步向前,创造人类历史的新时代。基督教从古代文明之中经过漫长的三个世纪的苦难斗争,成功地实现了重新塑人(remaking of man)和人类精神的复兴(revitalization of the human mind)。所以,苏维埃原理,在现代文明走向颓废之中,作为人类新的信仰而诞生,将起到与基督教同样的作用。这就是拉斯基向读者所展示的基本蓝图。为证实自己的基本蓝图具有其正当性,拉斯基分析了基督教兴盛时期的背景和社会心理,指出与围绕布尔什维克的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之间具有类似性。此外,还探讨了包括基督教的现代主要的意识形态,缕述唯有苏维埃原理具备新的信仰之条件,除此别无他途。

以下我将依循这一条基本的线路概观本书内容。在此想事先申明一下,因本书是由16节相对独立的文章组成,前后内容亦有重复,所以进行整理时并未依照原文顺序,而是尽量突出作者的理论思想。

### 3

“世界上无论何处,现代青年都站在死亡的门口前。数百万青年正在为自由贡献出生气活泼的青春。数百万青年已经为实现自由之梦想而失去了生命。当战争结束之时,至少又有数百万的青



年将丧失视力、听力，或身体残疾，他们将要无缘于人生至高的美感而度过余生。”

拉斯基以此揭开全文，强调世界上无数青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付出的代价及莫大的牺牲，而活下来的人们应承担许多重大责任。这个责任指的是什么呢？它并非是仅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是要打败轴心国，并挫败其拥护的反革命势力。同盟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马上能获得自由与解放，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任何人都明白这点。仅1939年，就由于恶劣的卫生条件而在波兰重现了流行性斑疹伤寒，美国也又一次涌入了400多万几乎一字不识的缺衣短食的移民。我们不能被政治家们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单纯的和平主义或国际主义的愿望是何等空洞，只要看看这世界史上未曾有过的“两次大战间的年代”泛滥着多少和平主义论调下的会议、条约和调查就可知道。慕尼黑会议（1938年9月）的时候，欧洲各国首府听不到一声叫嚷战争的声音，到处充满着战争是可避免的某种幸运情绪。但仅仅一年之后，战争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拉斯基特意在此时此刻要强调的理由在于，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是消极的，与其说是友爱相结合的同志，莫如说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憎恶的对象。因此提出疑问：“胜利之后，丘吉尔所描绘的世界，究竟是否是对斯大林宣扬的那种世界？”从威尔逊的“14点原则”所遭遇的命运来看，拉斯基警告说：大西洋宪章以及所谓“四大自由”的豪言壮语般的许诺也是不能令人放心的。进而他尖锐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治家怠惰无力、放置推诿，未及时提出更具积极意义的努力目标。比如，他揭露了美国的哈定、柯立治、胡佛时代，白宫只不过是华尔街的延续，而在世界经济

恐慌时期,美国也不再是希望的乐土(land of promise),它与旧世界并无差异。在英国,保守党依然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而工党也丝毫无力对抗。工党两次组阁,从未考虑过任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等问题。而在野之时,又拼命在国民之间渲染“社会主义的失败直接关系到国民利益,只有相信工党才会得到安全感、健全感”。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组织除了苏联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了,尽管如此,在反动派的进攻下,竟显得极为脆弱,迅速崩溃。“1919年至少还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1933年时,德国民众还在时时刻刻期盼着领袖们的召唤,但这一期待终归落空。”法国民主制度的活力,早在1940年军事上败于德国之前,已被一帮重财产轻自由的政治家毁掉了。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出现了巴黎公社,而70年后法国再次失败后又出现维希政府。对照两个时代,其间的国民精神发生了巨大变化。维希政府的法国是由来已久的资产阶级颓废派在理论上的最终归结,从1848年6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到路易·拿破仑政变(1851年),再经过博兰格尔运动(1888—1889年)和德雷福斯事件(1898年),然后到1934年2月6日的极右骚乱。于是,“1914年的大战中相互交战的主要列强,除了俄国没有一个真正从战争中学到有益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发挥的优势才得以发现,现代的政治家们终于对苏联革命的意义有了普遍的理解。”那些一直痛恨苏联理念的人们不得不转变思想开始评价苏维埃革命的意义了,拉斯基将这一变化过程,比拟为罗马市民怎样逐渐把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导入自身的思维方式的过程来加以叙述。

政治领域里所见到的这种“中间期”的颓废性(墨索里尼或希

特勒重新登上“权力政治”的舞台不过是最露骨的表现),也不能不覆盖到思想与文化方面。这20年(1919—1939年)里没有出现一位准备创新的思想家或作家。虽然有怀海德、柏格森或卡西勒以及桑塔雅纳这类卓越的哲学家,但他们的对象不是大众,而是理论专家。他们不是像英国的卡莱尔、穆勒、拉斯金,法国的密舒勒、卢南,或美国的马克吐温那样,直接面向各自国家的民众。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大众,对于同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斗争超然置身于其外,甚至保持着孤高的矜持。作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拉斯基特别详细地批评的对象是英美诗坛占绝对权威的诗人艾略特。他那无与伦比的才能、学识、造句能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民众抱有恐惧之感,避免与大众接触,凡是民主一类的,他都断定其为丑恶的、野蛮的,本质上是属于低下的。正是由于他对民众的置之不理,使民众沦为黑暗势力的囚犯。而且艾略特不断倡导回归基督教理念,但这一理念所呼吁的对象与其相反,不正是面向贫困低贱受侮辱的民众吗?由此,拉斯基认为,不论艾略特的主观愿望如何,这都属于一种背叛知识的表现。而且,拉斯基还在小说家中,列举了乔埃斯与赫胥黎,从中指出现代文明的精神破产的显著症状。这类文学作品大致相同,缺乏新的信仰与勇气,虽已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日益颓废以及世界末日的即将到来,但他们不能决然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反而在未来世界面前胆怯退缩。

拉斯基把这种锋利刺骨的批判进而推向到学术界。他援引托洛斯基“不能跟历史开玩笑”之言,弹劾这20年间的学术界恰恰是在与历史开玩笑的事实。指出学术界依然固守旧巢,缺乏睿智。

其原因在于学术界过度的专业化以及学者崇尚中立(cult of impartiality)的态度。16世纪有迪卡尔、霍布斯、斯宾塞、洛克这样的哲学家,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那样的科学家,时代的精神气氛在他们的学术里得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来。18世纪末期有卢梭、伏尔泰;19世纪有潘恩、葛德文、边沁、圣西门、拉普拉斯、康德、黑格尔、尼布尔、萨维尼等学者,都在各个领域开创了一个时代,在世界都是具有领导意义的存在。但最近50年,特别是这20年间,学术与实际生活完全脱离开来,学者只面对专家诉说,学者的专业极度分化,学者的著述对于掌握一般知识的人来说全无意义。学者致力于选择更大的题目,必然要投入到根本性论争,所以他尽可能地回避决定自己社会观的题目,或有损于权力者威信的。其实岂止无损于权力者,他们甚至要迎合权力者,以维持自己稳定的地位。这种倾向在历史学界尤其显著。拉斯基梳理了那些被认定为是代表英美历史学界的著作及其作者在19世纪以后是如何演变的,以及在其变迁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价值观的转变。

总之,19世纪的杰出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拜伦,还是狄更斯、斯科特、巴尔扎克等,他们都紧紧抓住了与大众生活有着切实关系的课题,并对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给予决定性的影响。正是基于此,民众对拜伦的去世感到人类精神的损失,虔诚地承认狄更斯的巨大的身影如同天空的星斗。这正是民主主义的勃兴时期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完美结合。但最近的知识分子逃避社会斗争,“他们在切尔西优雅的工作室里或牛津大学光环的照耀中,认为大众的生活是多么丑恶,他们沉浸在只相信自己才会有审美意识的理念之中。”

大众生活中内在的丑恶、陋室、半饥饿状态，以及时刻伴随着失业的不安、低工薪、长时间劳动等，所有这些环境都把普通民众对艺术的兴趣挤压于低劣的水准之下。故而，那些知识分子们互相议论说：这些民众的偏好与我们不同，比起贝多芬更喜欢爵士乐，比起塞尚的自画像更喜好 W. P. 弗里斯的《赛马日》，比起《安娜卡列尼娜》更爱看《飘》。

以上述这种不可避免的差异为前提，他们停止了向大众的召唤，打消了对社会革新的关心，逐渐堕落为统治阶级的附庸 (appendage)。这一行为背叛了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这一职责的怠慢招致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悲剧。拉斯基认为，说英美还不太一样，那也纯粹是自欺欺人。当然，这么说，著者并不是要“让伟大的作家乃至伟大的学者必须在自己的党委会议室里从写信封开始做自己的学术艺术训练”。他强调的是应多一些更为实在的 (less dramatic) 议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同时应该是社会上的一个市民，如果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对民众面临的生死问题置之不理的话，那么，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学绝不可能拯救时代，也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

相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这种内在文化的颓废，取而代之的是在体育、舞蹈和电影中表露出来的所谓“有组织的娱乐外向化”(organized externalization of pleasures)倾向。凡尔赛条约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丧失了不少上一代人孕育出的知识环境。他们大都通过好莱坞的电影知道了狄更斯或奥斯丁的名字，却很少直接接触过原作。他们的世界波澜起伏，充满怀疑且动荡不定，没有任何确切的因素，若不能尽快捕捉到万花筒般变化多端的欢乐，

则被认为是蠢货。自凡尔赛条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20 年间,这个由理性、规则,或有计划预测能力所运行的世界急速坠落到一个非理性、充满暴力、不断变换价值观、不可预测未来的浮动不安的世界。“在柏林,1933 年以后,莫斯科一直被说成是所有邪恶的根源。而 1939 年夏到 1941 年夏的这段期间,这个曾是万物罪恶的根源却变成了永久的朋友。1941 年 6 月 22 日,这朋友又被颠倒过来,再次成为罪恶的根源。”德苏关系的几次转变伴随着价值观的变化,作为颓废派的一例来看是极具讽刺意味的。回顾这一切,拉斯基对威廉·莫理斯<sup>①</sup>的大胆宣言深有同感:“我们现在所知的文明必将灭亡,啊,一想到这点该是多么的喜悦!”

## 4

在这个文明即将崩溃之时,人们再次渴望着像罗马帝国末期一样,树立一种新的道德意识,从失败中拯救人类,以积极向前、直面未来的勇气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那么,我们应该在哪里去寻找这种新的信仰之源泉呢?可以说首先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对人的激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在今天它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发生矛盾的只有文化领域(拉斯基承认国民文化的多样性),而民族主义鼓吹的爱国主义对外会带来战争的威胁,对内则伴随着抹杀个人人格的危险,所以它不适合。其次,还有历史宗教,它在

---

<sup>①</sup> 威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 年),19 世纪后半期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译者

过去的确唤醒了人类的精神,指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凭借超自然的信仰的再生,是否能适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且不仅拯救个人的灵魂,还要满足现代文明社会中各个群体的要求,拉斯基对此表示怀疑。在这一点上,最终的问题还是基督教。拉斯基在承认基督教对复苏人类精神做出的贡献这一前提下,详细论述了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将要进行现代最大的较量和对决。拉斯基认为,罗马帝国末期日趋悬殊的贫富差距,使基督教在阶级的对立之中勃兴而起。基督教一边向贫穷低贱者诉说来世会有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劝导富人为了来世得到拯救,只有通过救济贫者,方可缓解当今经济世界的痛苦。它为富人指出了一条救济慈善之路,以此缓和了社会上的阶级对立。这一态度我们不但需要谴责,莫如说,这也是文明社会必经之路。毕竟人类还处于对自然控制的初级阶段,在无法避免民众贫困的时代,基督教起到了相应的社会机能的作用。然而,宗教改革以后,生产力飞跃发展,生产方式不断扩大,此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世俗化的人们不再关心或努力做慈善救济事业,他们专心致力于如何获得新的财富。教会与新兴的民族国家结盟,逐渐成为保护富人利益的工具。特别是法国革命以后,社会问题急剧深刻,近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神学的基础,以上诸般要素使无产贫困的大众纷纷离开了教会。当然,教会顺应新的形势,开始倡导“社会理论”,但教会主要关心的毕竟是拯救人类灵魂的问题。所以,对于真正涉及社会问题、主张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个人自我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必须让位。为证实以上的论点,拉斯基依次探讨了罗马、英国国家教会、非国家教派,以及各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美国宗教界的种种

动向。特别是逐一反驳了杜松的主张,他认为宗教改革导致近代价值崩溃,企图在天主教自然法中寻找重建时代的指南。拉斯基对梵蒂冈的批评很是犀利。

由此可见,重新构建文明价值体系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显然别无其他选择。既然如此,接着的问题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理作为新的信仰是否具备充分的条件。为此,拉斯基反复强调了俄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尽管他从各个层面加以说明,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属于常识性的论述,并无特别新颖的见解。比如,首次颠覆了获得盈利的动机的普遍性或不可变性;完全废除了对体力劳动者的歧视;否定人剥削人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从组织上将大众与精英加以结合,创造了个人利益与社会福利一致可行的体制,禁止追求无组织的个人利益等等。于是,苏联的体制比其他任何体制都成功地在广泛深入的范围内解放了一般民众的个性。相比制度的改变本身,拉斯基特别重视的是,俄国革命的理想使国民的精神得以再生。“俄国革命的灵感渗透到全国各个阶层,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参加实验的有男女老少,不仅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还有那些无名的百姓、店员、街道清扫工,甚至监狱里的囚犯。他们的生活充满欢乐和自信,无论各自处于多么小的职场,但都可以为这个伟大的使命做出贡献。”正是这样的理想,与基督教一样曾经给予人类以新的拯救希望,唤醒了文明的中枢神经,重新构建日益走向颓废崩溃的现代文化。

因此,从基督教与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共同作用来看,围绕两者的社会心理也有着惊人的类似之处。“受过日益颓废的异教文化熏陶的贵族,从狂热的基督教信徒那里听到早



期基督教义的粗略说明时的感觉，恰恰同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出身的、老成持重的校长们通过书本知道使自己一生充实的、享受优雅的物质生活的文明世界的诸种原则正遭到共产主义者的猛烈攻击时受到的冲击一样。”“耶稣的教诲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有一点是一致的，双方都强调在以盈利为中心的社会，阻碍家庭成为男女结合的纽带这一危险性，这绝非是偶然的。但是，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分奴隶与自由民，这正是福音书和社会主义共同的核心信仰。”“对信奉革命的人来说，就如同基督教对最初的信徒一样，具有魔术般的吸引力。”“其鼓吹者正如初期的基督教信徒一样，对不同意见者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上的优越感。……他们因为严格区分使用同志内部之间的道德水准和与自己不同信仰的人的道德水准，往往招来对方的愤怒……他们感情冲动地把持反对意见者视为罪恶，看作是极为危险的。这种激情与初期基督教文学所反映的情况似有相同之处。”

除了以上正面的共通之处以外，还表现在负的层面上。比如领导者的残忍，或在教义上单方面的夸张等。拉斯基充分认识到俄国革命中所犯下的过错以及愚蠢行为，并且承认列宁所追求的理想与苏联革命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的差距。但是，拉斯基又反问：这丝毫不影响俄国革命内在的理想之正确性。难道信奉基督教的信徒不以为，在基督教历史上的种种污点，如宗教迫害、追求教会的私利权势等，可以作为教义本身谬误的证据吗？尽管福音书的信仰与教会实际所做的事业之间存在差距，不是也不能否认人类从异端转向信仰基督教以来，文明社会始得新生了吗？

拉斯基列举了几乎所有对俄国革命乃至苏联现实的批判，并

逐一进行反驳。比如,说到苏联的文化事业,最多不过在电影与戏剧方面,却没有产生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俄国革命的残忍性,法西斯与布尔什维克在一党独裁、否定言论思想自由上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等等。针对这类人所共知的且根深蒂固的批判言说,拉斯基自如地运用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将其言说的前提一一推翻,强烈的说服力可谓切肤入骨。特别是针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说,可以看出,作为对西方式自由主义深信入骨的英国人,他极力避免概括性的断言,而采取周密、谨慎的阐释态度。

作者虽表明自己对苏维埃原理的狂热倾倒,但他相信,苏联要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认,其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人没有比拒绝新思想更固执的。何况这个思想明明是要强烈改变他们传统的社会习惯的。”希腊罗马文明社会在相当长久的时期,认为基督教的要求会埋没了自古以来不言自明的价值优越性。正如史学家吉本所说,这是一场“野蛮与宗教称霸的胜利”。英国的政治家在真正习惯自由的美国、自由的爱尔兰或自由的印度这些概念之前,经过了一段很痛苦的过程。所以他们对诞生不到四分之一世纪的“俄罗斯的概念”没能冷静客观地将其作为一个讨论对象,而只是陷于感情上的激动与愤怒,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在十月革命还未结束时,全世界的反动势力已经组织起来了,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统治特权阶级成功地树立了反动的独裁体制,他们没有受到西欧民主国家的任何一句抗议。谁也不以为因此对英美构成什么危险。因为没有几个人预测到在这些国家自由民主得以维持的是从批判的自由(freedom to criticize)发展到变革的自由(freedom to change)的。“当看到这个危险出

现在水平线时,其速度已经是惊人的了,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一类的出现,制止了这种自由。”在英国和法国,仅社会主义者出任政府大臣,且并无期待出台什么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不是就足以引起世界证券交易所的恐慌了吗?罗斯福总统在议会试行通过的法案,充其量不过是西欧民主主义国家近乎常识的立法,便使得纽约公园大路上的人们大为惊讶,他们简直快要把总统看作是被莫斯科的斯大林操纵的爪牙了。这些旧势力把俄国革命视为渎神与阴谋的态度,酷似罗马帝国遭遇基督教时的态度。于是,拉斯基断言:“说老实话,我们的统治者与其与列宁或斯大林合拍,倒莫如说与佛朗哥乃至像萨拉查<sup>①</sup>之徒更臭气相同。”作为证据,拉斯基把作为战时首相最有人气的丘吉尔拉了出来。1917年丘吉尔任财政大臣时曾对墨索里尼“稳重且不加修饰的态度”赞赏不已,说:“如果我是意大利人,一定会以满腔的热情始终一贯地协助阁下与列宁主义禽兽般的欲望作斗争,直到取得胜利。”据拉斯基的分析,丘吉尔当时如此吹捧墨索里尼,早已具备了今天他的各种要素。丘吉尔后来厌恶墨索里尼,并非是由于他的反动性,不过是墨索里尼能量危害到了英国的利益。一旦知道“苏联对英国来说有战略意义的利用价值时,丘吉尔马上认为有必要与苏联进行协调。……所谓列宁主义的禽兽般的欲望与激情,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著者一方面承认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的伟大功绩,甚至说取代张伯伦就任首相的丘吉尔给英国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复兴,

---

<sup>①</sup> 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 1889—1970年),1921年,作为“天主教中心”的右翼代表当选为议员。1932年任葡萄牙总理,作为葡萄牙的独裁领导者统治葡萄牙达三十年之久。——译者

但与此同时,著者始终没有放松追究这位大英帝国的首领隐藏在内心的反革命情绪。时下,轰动世界的英美反苏同盟由丘吉尔倡议,想是拉斯基教授也一定会看到的吧。

著者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恰如基督教从各种迫害侮辱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直到三世纪后逐渐唤醒世界和人类一样,他也坚信和期待着社会主义将产生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战后世界直面的问题有其他什么解决的方法(拉斯基对战后美英苏关系的展望和分析与现在的形势对照来看颇有趣味)。如何排除一切障碍,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正是赋予我们这些战后幸存者严峻的课题。“我们这一代对进入未来的王国不敢抱有任何期待。我们的努力最多能让下一代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进入有保证的王国。而只有努力争取自由充满世界,我们才能原谅自己凭什么在一代期间居然两次将全世界的年轻人召集到死亡的危险线上。为了我们的后人,我们要完成争取自由的事业,而且只有做到与他们所付出的牺牲相对等的努力,我们才可能在历史的法庭上接受免罪的判决。”拉斯基以这段富有多重意义的话语与本文开篇的“青年之命运”相呼应,结束了这部充满雄心大志的小册子。

## 5

综观这本书,可明显看出拉斯基教授较前更向“左”靠近了。如果说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势力扩张,促使其由三部作(《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国家的理论与实践》(1935

年),《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1936年)中的多元国家论急剧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不能否定此次大战中苏联所扮演的重大角色是激起拉斯基执笔著述的心理背景。我们可看到书中对斯大林“英雄史诗”般的叙述,对昂然决心牺牲第聂伯河水电站<sup>①</sup>时充满激情的描述。在当年著述三部作时,拉斯基对未来的俄罗斯革命持有相当激烈的批判态度,且时而要向第三国际发出攻击。但在这本书中拉斯基已经是以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者面貌出现。比如,在《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说,德国之所以允许了法西斯主义的称霸,一方面是由于魏玛革命的不彻底,同时德国共产党猛烈攻击社会民主主义也是一个因素。而在本书中,则主要是弹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幽柔寡断。对英国工党的批判也相当激烈。所谓“得过且过”的政策(“muddling-through” policy)战后必然要破产,而作为工党若不坚持纯粹的哲学道路,注定要重走1918年后自由党的分裂道路。面对目前英苏关系处于极端对立之下的世界形势,工党的中央执行会议议长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关注自由党出身的外相斐文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之间的激烈辩论的?的确有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但是,在此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拉斯基始终是把共产主义看作一种“信仰”,他是从理念的角度来看待之。这里他一字不提什么“铁一般的必然性”这类人的意志之外的物质性过程。他强烈主张的全是“重新构建价值体系”的问题,“渴望在精神上得到拯救”,

---

<sup>①</sup> 第聂伯河水电站 1927 年至 1939 年建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其电力直接供应新建的扎波罗热钢铁联合企业。1941 年 6 月,卫国战争爆发,9 月底基辅沦陷前夕,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炸毁电站,使纳粹不能获得电力。——译者

“实现个人的自我”，“宣扬人类内心至高的向往”。

保证民众在物质上的福利，只有以实现他们人格保障为前提才有意义。所以，社会主义是始终一贯的目的论，比起生产力，更强调消费与需求方面。这不正说明了拉斯基依然深受着英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吗？从多元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虽然显示了他的政治立场，对现实的理论分析方法上有所变化，但决定他心态的理念基本没有变化。他说：“尽可能在广大范围满足人们的需要即是善，基于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的社会制度基础上的即是善德社会。”这与“所谓社会的善，就是说我们的各种冲动得到充分的表现，我们的本性达到统一”的定义有多大差别呢？他在《政治典范》里曾说过的、“不被任何事物所吸收的人性内部”与“自主的判断”正是人要誓死坚守的“个人主义”。在本书中他依然保持的态度是：“我们除了有对集团要尽的义务以外，还有对我们内部的自我的义务。把遵守其义务托付于他人，就相当于我们停止了忠于作为人的尊严。”拉斯基虽然责难工党摆脱不了费边哲学的不彻底性，但他本人难道就完全可以摆脱得了吗？恐怕也是难免的。著者虽然在序言中特意声明，他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力求解决问题，但读者还是能发现其中夹杂着很多问题至少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无法论述的。我即使不看此书，也能想起安德烈·纪德<sup>①</sup>的共产主义观。使纪德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是共产主

---

<sup>①</sup> 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年), 法国作家、评论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梵蒂冈的地窖》《窄门》《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1947年作品《田园交响曲》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中这样陈述：“为了他广泛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译者

义内在的理念,而它的媒介正是基督教。纪德在1933年6月的日记里写道:“将我引向共产主义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福音书。”1937年夏天,那时他已经去苏联旅行过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按诸位的说法,唯一具有价值的共产主义只能依靠理论才能到达。……的确,理论是有益的,但是既无热情又无爱的理论,反倒会伤害需要这个理论拯救的人们。……只有爱,追求博大的爱来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我才能感受到兄弟之情。”纪德与拉斯基同样看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俄国革命有相似之处。“我认为,共产党人问我是否拥护基督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只是要让牧师、神父等认为我是拥护基督的。……诸位共产党员,你们正因为不承认基督教的神性,才要将基督作为人来批判。所以,当然,基督有足够的资格要被诸位最仇恨的敌人们,要被诸位斗争的当权者们,要被财富和罗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所告发、所处刑。诸位应该确认并承认这一点。因此,基督实际上是站在诸位一方的。”(1933年7月4日日记)由此,我不能不感到西欧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接近共产主义的方式也可以说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引导他们走向共产主义的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的博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需求,不论多么痛苦也要在地球上打造出一个神的国家。而且,未使他们单纯地冲向共产主义的原因也是因他们对基督教所教导的尊重人格个性所持有的坚定信念。“不管是什么样的宣言,只要不是我自己认可的,当然是要拒绝的。……我也懂得,这种情况结为团体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至今我好像还没有碰到一份能让我全面同意的宣言,或是在某个问题上与我本人的看法不相违背的这类宣言。”纪德的这种甚至有些极端的个人主义使

他不能不敏感地觉察到苏联现实中无处不有的“全盘一律主义”的危险性。就这一点来看,他与拉斯基不同,后者最初就承认“新的信仰”所具有的集团特性,毕竟艺术家与政治学家还是不一样。纪德带有几分不安的、愿望性的观察,他说:“充分得到理解的共产主义和充分理解的个人主义在本质上也不是完全不能融合的”。这不也是拉斯基所预想的吗?本书中拉斯基极力为布尔什维克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他与内心潜在的“个人主义”在进行着一场殊死的格斗。这当然也可以简单地看作是拉斯基与小资产阶级本性进行的斗争。但至少不应该否定这一事实: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才是形成西方世界所有宝贵的精神遗产的核心之处。其中所包含的问题,都迫切地要求我们在今天现实的世界中给予解决。

这绝不是事不关己的局外事。

后记:

本文中所引的纪德日记,主要依据的是新庄嘉章翻译的新潮社版《安德烈·纪德日记》第6卷。

(1946年)

追记:

这篇文章和下一篇都是研究拉斯基的论文,与第五章“‘斯大林批判’背后的政治理论”相关,都是探讨苏维埃共产主义的问题。本篇“西方文化与共产主义的抗争”是登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年)八月创刊的《思想之科学》第二号上,主要是拉斯基的《信仰、理性、



文明》的书评。从执笔的时间维度上看,是紧接着第一卷的第一章“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后的。当时很难买到外文书,凑巧都留重人手头有一本,很爽快地借给我了。下一篇“拉斯基的俄国革命观及其变化过程”则是登在已经停刊的《世界社会科学》(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号)上。《信仰、理性、文明》和《现代革命的考察》后来由中野好夫和笠原美子分别译为日文。这两篇论文介绍的原著部分,今天看来已经意义不大了,但问题是“斯大林批判”展开以后愈发带有实际意义了,特别是第二篇不光止于介绍,故收到此书内(引用的页数因不堪一一与译文对照,这里我们标出的都是原文的页码)。哈罗德·拉斯基是我学生时代唤起我对政治学兴趣的最给力的学者之一。我进大学的时候,德国已经建立了纳粹政权,日本也相继发生了天皇机关说的问题、相泽中校事件和二二六事件,激进的法西斯化的风暴正从东西两面席卷世界。犹如政治学界,一方面,卡尔·施密特反过来拿起政治多元论这一本来属于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开始验证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统一的崩溃过程,而另一方面,正是拉斯基开始从多元论发展到阶级国家论,这期间开始寻求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理论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也正是日本思想界的时尚,也就在这时,这种骨髓里就存在的西欧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鲜明靠近,不能不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在十分溽热的教研室学生阅览室里,读到《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和《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时的感慨终身难忘。战后复员不久,在教研室和同学开始读书会时,首选的也是拉斯基的《政治典范》。

我认为在政治学的方法论上拉斯基对我的影响并不大,尽管

如此,回想起来,任何政治学家恐怕都没有比拉斯基对我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了。正文里我也提及,拉斯基在学术界方面的杰出成就主要集中于初期,或者最晚到《政治典范》(1925年初版)时,而30年代以后逐渐倾向启蒙性的评论,以至晚期甚至被公认为其具有煽动性的气味压倒了学术性。我也不全然否认这种评价,但多少还是感到有些抵触。当然,拉斯基本人也很明白其后期的论文受到人们的批判。多产人物拉斯基在不到35年期间,出版30部著作以及数百篇论文——拉斯基的雄辩之词如同不断喷发的泉水,皆是一气呵成,即成著作。其中不免夹杂了些较差的文章或冗长反复的现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就我个人的印象来说,相比其初期,倒不如说其后期的论文,也就是在学术上受到众人批判的拉斯基更有魅力。就多元化的国家论来看,比起拉斯基,福来特(M. P. Follett)所著的《新国家》更具有锐意的独创性。拉斯基最初开始把法学的国家论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他的制度论的视点比起福来特来说,依然未走出传统。反过来,从《服从危机》直到遗著《我们时代的难题》(*The Dilemma of Our Times*)都贯穿着他的问题意识——而不是结论——的思索,这于今天依然充满着新鲜的独创性。实际上,拉斯基的著作与论文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年轻一代都给予了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贝洛夫<sup>①</sup>甚至把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这一时代称为“拉斯基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名英国工党党员拉斯基四处奔波活动,显示了其卓越的

---

<sup>①</sup> 马克思·贝洛夫(Max Beloff, 1913—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保守党所属的一代贵族。著有 *The Age of Laski*, *Fortnightly*, June, 1950。——译者

辩论口才,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最危急的时刻,学者们纷纷回避危险的主题或政治敏感的问题,而进入建构严谨的理论的安全地带。或者是,依存于既成体制或党派的先天合法性,对目前的现实状况予以正当合理的解说。在这样的学者泛滥成灾之时,正是拉斯基在追求学术探讨与实际课题之间、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在保持知识水准与说服大众之间的二律相背中(这每一方又如何能轻易扬弃呢!)不断努力,可以说他是一位面对时代的根本问题毫不动摇地向前挺进的极为罕见的思想家。

所以,像最近 H. A. 迪恩(H. A. Deane)出版的研究拉斯基的著作《拉斯基的政治理想》(*The political ideas of H. J. Laski*, 1955)那样,将自由、政治权利、国家的本质,以及议会政治等所谓拉斯基的定义抽出来加以指责其“理论上”的矛盾或不确切性,这种方式的“批评”实在太容易了。但同时,以这种方式受到批判,拉斯基实际上是最不合适的了(像这种形式逻辑教科书一样的研究居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了什么奖,这本身似乎也象征着现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学术风气)。金斯利·马丁<sup>①</sup>写的《拉斯基评传》(*Harold Laski. A biographical memoir*, 1953)在深度上尚有不足,但在整体把握拉斯基的“精神”上比前面那本不知要强多少倍。

的确,与其说拉斯基是所谓的学者,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位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研究里,有关思想史方面的论说尤为杰出。也

---

<sup>①</sup> 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 1897—1969年),社会主义者,《新政治家》杂志主编。——译者

有人说作为思想家来看他有些浅薄,是的,如果说不去论及神呀死呀或实存等问题的思想家浅薄的话,那他还是名副其实的。但是,比起再怎么擅长所谓“深远”思索,却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以及本国未来几年的命运都无所展望的思想家或哲学家,我们很难低估拉斯基的思想意义。关于拉斯基晚年全力诉说的“同意的革命”(revolution by consent),我在给《读卖新闻》(1950年10月18日)写的《现代革命的考察》书评中,涉及他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态度:

在这本书中,拉斯基用各种词汇表述了自己的根本理念。……但是他的语言或抽象的定义本身并没有多少新奇的地方。……我认为拉斯基的特点其实在于他不是单纯地像教科书一样,或从天而降式的说教方式,他总是采取力求在现代政治的动向和与之反动的力学当中探索其内在因素。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他的思考就不得不总是就极端状况而展开。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会感到他的立场似乎不太稳定,还有人会觉得他很冒险,而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是机会主义。

……人们可以批评他的这种“动摇”。但是问题在于他在受到“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和“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两面攻击之时,为什么直到最后都没有停止他那铤而走险的步伐?我由此不能不感受到他在现代文明的苦恼中极尽全力惨烈挣扎的斗志。

拉斯基清楚地认识到宗教革命以后的近代世界患上了重病,今天已经到了不能不彻底解除其病灶的地步。而且要踏

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之时，他又对传统的西方民主主义抱有极深的感情。他一方面不带偏见地承认俄罗斯革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样的革命方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就其目的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本书所主张的“同意的革命”也是在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留下来的唯一出路。根据至今社会民主主义所经历的现实，他没有停滞于“同意的改良”，而是试图避免“暴力革命”的道路，如何维持民主主义的方式以达到“革命”这样巨大的根本性社会转折。他比谁都清楚这一课题所包含着的巨大困难，但他毅然决然地朝着这个方向拼命摸索。

他孤注一掷的并不简单地限于狭义的国内社会体制的问题。因为，如果实现不了“同意的革命”，那将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席卷全球的恐怖的大规模杀戮。若真是认真思考这种二者择一的巨大意义的人，对拉斯基晚年试图要在西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拼命努力，恐怕不会去轻易嘲笑吧。

这里说的在西欧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架桥”的意思，往往被人误解。它不是简单的两者折中，也不是预先把两者固定起来然后自己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进行调停，而是通过对西欧民主主义的自我批判再来批判共产主义，通过转变前者来使后者进行转变，这才是拉斯基真正发挥本领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与拉斯基同样对西欧内部自身促生了法西斯而倍受冲击、转向共产主义阵

营的30年代的知识分子里,例如,纪德、西洛内<sup>①</sup>、库斯勒<sup>②</sup>、斯彭德等那些给克罗斯曼<sup>③</sup>编辑的 *The God that failed* 写稿的人,他们和拉斯基的转向,一方面有本文阐述过的共同的主导动机,同时,又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们内心对所体验的西方价值观产生了“绝望”,或感到了极度的孤独(*terrible loneliness*);这在拉斯基身上没有。所以,当他们再次转向时所出现的“真正的前共产主义者无法重新获得自己的全部人格”那种悲剧,当然也没发生在拉斯基身上。确实,拉斯基晚年的言辞里带有较强的悲观论调。他说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革命有很大的危险性,革命的目的本身也会遭到背叛,反倒使独裁权利永久化,又很有可能转化为国际战争,所以他确信实施“同意的革命”是挽救世界性毁灭的唯一可行的折中案。但是他也十分清楚,统治阶级主动地大规模让步,从历史上看是极为罕见的。正是因为如此,拉斯基认为通过对法西斯战争所产生的紧张感使整个社会有了接受变革的精神准备,此时,借用安德烈的话说:“连生命都被征用了,那当然也要征用财产了。”当统

---

① 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 1900—1978年),意大利作家和政治家。原系社会党人,后为共产党人,1930年与共产国际关系破裂。1931年流亡瑞士。1944年回国,成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社会党内占有重要职位,领导《前进报》和主持意大利笔会。其长篇小说《丰塔马拉》,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译者

② 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年),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勒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后来成为一位亲共产主义的记者。“大清洗”使他幻想破灭。1940年他逃往英国,参加英国军队,后成为英国公民。他的作品《中午的黑暗》(1941年),是一部对抗共产主义的小说,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受欢迎的作品。——译者

③ 克罗斯曼(Crossman, Richard Howard Stafford),英国工党的一位极重要的知识分子,著有题为《社会主义与新专制主义》(*Socialism and the New Despotism*)的小册子。——译者

治阶级也被这样的情绪笼罩时，这正是用和平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一无二的绝好机会。他同时警告说：这种紧张感随着恢复到和平时期的同时将会让位给惰性和姑息的情绪。战争刚一结束，马上就出现的工党组阁以及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对拉斯基来说，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它仅仅是向社会主义靠近了一步而已。最终它果然还是停滞不前，反而与苏联的激烈对立反弹到国内，在各方面出现了反动的征兆。不过，直到最后不管是对革命还是对和平，拉斯基都从没有绝望过。当罗素 1950 年发表论文说“不能相信与克里姆林宫有真正的理解”时，拉斯基立即针对与俄国沟通的具体基础写就一文说：“罗素是在绝望的基础上抛出他的政策，我是在希望的基础上树立我的政策。”该文发表时，拉斯基已经去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拉斯基是个不怕被人认为幼稚的思想家。

拉斯基没有亲眼看到之后的世界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亚洲和阿拉伯各国的国际发言权有了显著的增加，二是共产圈内部批判斯大林的动向。如果把这两个变化看作是世界潮流的重要方向，毫无疑问，这是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在变化。他在遗著《我们时代的难题》最后写到一半的页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在波兰，拉依克·拉斯洛<sup>①</sup>被处以绞刑，他的死，谁也没站出来说一句：那该是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冷战战术的一种表现。”在该书里，他比较了共产圈内的大清洗的现实与西方世界，比如美国对阿尔杰·希斯事件的处理方式，对这两种不宽容都进行了弹劾，但更

---

<sup>①</sup> 拉依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 1909—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1949年被以铁托分子、间谍特务、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判处死刑。——译者

严厉地批判了前者无视法律程序的问题。这不正是象征性的“未完”之作吗？

关于拉斯基的学问和思想对亚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给予的影响，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教授的下面一段话值得一听：“在唤起殖民地区民族主义感情方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 S. E)所做的贡献比起世界上任何一所教育机关都更为显著。在这所学校里，已故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所起的作用最大。他鼓舞那些来自殖民地的学生，让学生们知道西欧自由主义学派所占的重要地位，是支持他们的政治热情的。”<sup>①</sup>另外，Harry J. Benda 也说：“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像最初不是建在西欧，而是建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有其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假如哈罗德·拉斯基的肖像建在新德里、哥伦布或巴格达，也都会为广场增添光彩的，这情景同样也该是多么相衬的啊。”<sup>②</sup>拉斯基在西方政治学界几乎被忘却，或被看作旧时代的人物，而就在这同一时刻，拉斯基却活在从中近东到东南亚这一带非西方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的中心，这讽刺意义够足了吧。（最后这一节是增补本时加写的）

---

①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② Harry J. Benda, *Non-Western intelligentsias as political elites*, 收入 *Political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d. by John H. Kautsky, 1962.



## 第二章 拉斯基的俄国革命观 及其变化过程

### 引 言

拉斯基的名字在我国广为人知。在世界学术前沿活跃的政治学家中,他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其名声之大,恐怕倒也未必是基于其作为政治学家的客观评价。其他的政治学家与拉斯基相比,国人所知的程度更是有限。仅此来看,对拉斯基的评价是否客观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其活动引起我国新闻界特别关注的原因在于拉斯基不但在伦敦大学担任政治学讲座,同时作为工党的智囊也非常活跃。在英美政治学界,对拉斯基最近的著作似乎评价不高,有不少人指责其著作注重于启蒙性的时事评论而缺乏学术性的研究。但另一方面,滑稽的是他又被抬到世界第一的政治学家位置,实际上他的著作在古旧书店里以出奇的高价被炒作拍卖。与此同时,近来也有人把拉斯基列入通俗作家之列,这又未免有定论过早之嫌。拉斯基在1944年所著的《信仰、理性、文明》一书中严厉地指责说:在所谓的“两次大战间的年代”(inter-war years)里,由于过分注重学术专业的划分,造成学者与民众的截然断裂,

他们所做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且都是脱离现代社会的切实问题的。其结果便是把民众引向到黑暗的势力。由此可看出,拉斯基最近的著述活动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有意识地纠正这一方向。

关于前一章所举的《信仰、理性、文明》一书,我已在去年的《思想科学》杂志第2号上做了介绍和评论(请参考本书第二卷第一章)。最近我有机会阅读了他在战争时代写下的大作《论当代革命》。按出版的顺序看,这本书比前者(以下简称《文明论》)要早一年,序言说是欧洲战争爆发后两个月开始写的。由本书的书名可令人立即联想到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现代即是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相同,是世界动乱和变革的时代,由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社会体制以及价值体系正在被新的文明与理念所取代。拉斯基恰如150年前的柏克一样,站在同一地点隔着多佛海峡观察着席卷对面欧洲大陆的狂风;但他与柏克的立场完全不同,他要面对的是现实世界的自由民主政体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这三大势力鼎立的局面。

我本来想按照前一章介绍《文明论》的方法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全书的内容,但又感到,本书与《文明论》不同,它以大战初期的英国政治形势作为直接的时代背景着墨颇多,亦对当时国内外战争的施行方针论及不少。在今天,就这一点来看稍有些不合时宜之感。但有幸的是这本书的第2节“俄国革命”最集中地代表了他最近的布尔什维克观,以此为重点介绍,可追溯拉斯基的思想发展轨迹。当然,俄国革命所涵盖的问题正是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课题,同时,对拉斯基来说,这也是继1921年纂写了《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An Essay*)以后,其思想与学术不断进行对决的问题。<sup>①</sup>

## 1

拉斯基对俄国革命的研究方法可以说集中表现在以下简短的叙述中:“不管怎么看,俄国革命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但与此同时,不能否认为了取得莫大的收获,它也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准确地公正地测定这个莫大的收获(*immense gains*)与莫大的代价(*immense price*)是极为困难的。因此,几乎没有人尝试对现代俄国革命加以认识和评价。对某些人来说,俄国革命所取得的业绩过于伟大,甚至连想也不想其付出的代价一面。与此相反,一些人被其付出的巨大代价所压倒,而对革命带来的利益或成绩,以及观念本身一概加以排斥。而且这两种极端的看法不单单是出自对过去历史认识的不同,而是与俄国革命所诱发的活生生的心理感情相关。换言之,俄国革命对现存秩序的巨大挑战之突然、之尖锐超乎人们的想象,其结果是到处弥漫着极度的希望或极度的恐怖。那么极度的希望是什么呢?因为布尔什维克比较容易地成功夺取了政权,世界上的极端势力(*extremists*)大都易低估问题的复杂性,即他们若使用与布尔什维克同样的手法时所遇到的抵抗,以及

---

<sup>①</sup> 拉斯基的文章叙述重复,有较多反复,论点也有时跳跃,所以以下我适当加以整理,未必按照他的叙述顺序,但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其表述,尽量避免加进我个人的观点。当然为了避免与前一章所介绍的《信仰、理性、文明》重复,期望阅读本章的读者结合前一章一起来读。否则的话,这里省去的论点比重就与原文差得远了。

在取得政权后该如何巩固权力等。革命的乐观主义者通常夸口可轻易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habits),随意采取强制手段忽视人们的心理因素。那另一方面的极度恐怖是什么呢?由于受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人们,不去吸取教训设想适当的改革方法,反而认为必须马上保护自己,防止革命的危险性。在极度希望与极度恐怖发生冲突之处,人们失去了宽容与说服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如法国革命一样,俄国革命的问题就不是冷静思索与观察的对象了,而是首先成为或归依或憎恶的对象。只有绝对的歌颂者或彻底的贬损者,而无第三者。“俄国革命最紧要的问题是,在对之褒贬之前,须对之有所理解,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在此,拉斯基极力阐述的是,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为什么要伴随那么巨大的牺牲这一认识。在拉斯基看来,俄国革命的过错乃至罪恶之巨大,皆是因为最高设计师列宁比其他任何人都自觉承认之。而尽管有这些错误乃至丑恶和残忍,我们不能无视俄国革命是宗教革命以来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它是从根本上变革西欧文明社会原理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基本认识,则无法把握俄国革命的性质。

在讨论俄国革命的“代价”时,我们不能忘记“时间”的要素。在英国广泛接受宗教宽容的观念,用了150多年。判断革命不到30年的苏联历史,若以我们经过长时间达到的成熟的政治状态下获得的标准来衡量显然是不对的。人们在议论苏联没有言论自由或不够宽容或不是法制时,往往忽视了时间的要素。而且还忘记了革命以来,各国政府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

拉斯基认为,俄国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以及罪恶实际上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政策产物,这是“令人痛心的无可争议的事实”。

对于俄国革命,人们议论的最多的,首先是暴力革命,即是民众采取了武装起义的“革命”形式;其二,是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态。所以拉斯基把“理解”的焦点集中于此过程也是理所当然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拉斯基对待暴力革命的态度始终在强调俄国的特殊条件。也就是说处于沙皇帝制之下,除了革命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道路。而且,通过那种方式使革命成功的条件在1917年的俄国已经具备。通过提出消极和积极这两个命题,拉斯基告诫人们不要轻易陷入两种谬误:一是无视历史环境从道义上指责革命的谬误;另一则是要赋予俄国革命的经验以普遍性意义的谬误。这也是拉斯基在此之前的著作中屡次提到的问题,故《论当代革命》中未加赘述。关于这个问题,我仅想指出,1926年提倡多元国家论的拉斯基,对马克思主义还是持全面批判的态度,在那个时期的著作《共产主义论》<sup>①</sup>(*Communism*, 1927)中他所表明的那种看法,之后也是贯穿一致的。在《论当代革命》一书中,以及其后的《文明论》中他主要论述的是第二个问题,即共产党独裁的问题。可以说拉斯基最近的立场转移最明显的是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说明十月革命后,到革命政权基本确立了其统治基础的这段时期,为什么会出现高度的权力集中以及残酷镇压反动势力的问题,再者就是斯大林当权时为什么

---

<sup>①</sup> 此书最早由黄肇年译出,上海新月书店1930年出版,译名为《共产主义论》。1961年由齐力译为《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读物发行。——译者

么迟迟没有从独裁走向民主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分别进行考察。可以看得出,拉斯基对前期的独裁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而对后期的独裁则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拉斯基认为,革命刚成功时采用的极为残酷的独裁政策,是为了确保革命成果,防止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推翻新政权,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对待破坏革命的基本目的的那些因素,如果予以其古典的政治自由,就等于拱手把革命成果交到敌人的手中。魏玛政府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

拉斯基在《国家的理论与实践》(*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935)中对俄国革命的成功与德国 11 月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比较研究,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其内容。因军事上的失败导致政治上的崩溃,这是俄国与德国共同所处的条件。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一旦获得政权,便彻底推翻了沙俄帝国的司法机构。他们把不可信用的官僚一一罢免,重新组建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并镇压了所有的反革命组织。他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革命不是闹着玩的”这一重要的教训。与此相反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获得权力后,根本没有准备进行革命,新政权对掌握经济大权的大财阀放任自流,且过于尊重公务员的中立性,所以维持保存了帝国时代的官僚机构。军队的大多数将领依然由“封建领主贵族”所占据。对教会这一德国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也是丝毫未动。这些反动势力把魏玛政权宪法下的政治自由权百分之百地运用到反革命的目的上来。“德国的民主主义不是 1933 年败在希特勒手中,而是在 15 年前就被魏玛政权自己破坏了。”从以上两个事例来看,拉斯基明确地告诉人们,革命势力掌握政权后首先应该做什么,或是不能

做什么。因此，拉斯基在这一点不惜赞美之词，一再称赞列宁天才的洞察力与意志。但他又强调不管出自怎样的考虑，以第二国际的腐败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为由，列宁为了实现世界革命所创建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造成世界工人阶级势力分裂这点上，都是一个致命的失败。据拉斯基的分析，自第三国际之后出现了以下这些恶果。首先，各国共产党把俄国革命的特殊经验作为模式和榜样，而不管其他国家的历史完全不同。其结果是，在缺乏战术的正统主义（rigid orthodoxy）支配下，同时其方向又带上了阴谋诡计的色彩。其次，苏联以外的各国共产党的行动步骤不是根据各自所面临的局势来决定，而只是要按苏联外交政策上的要求来决定。于是，第三，面对法西斯势力，反倒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够自封为爱国与维护秩序的代表。第四，共产党的组织都根据俄国的模式，采取牢靠的中央集权主义，故在党员之间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蔑视感。“他们不假思索盲目地为抽象的无产阶级者的未来做工作，却对人性的真实意义一窍不通。”

总而言之，革命政权在国内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强硬严厉的措施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如果苏联革命的设计师是一群软弱的人，那早就被国内外的敌人摧毁了（参照《信仰、理性、文明》62页）。但是，在那以后，持续实施的独裁政策不但没有缓和，到了斯大林政权，反倒更加强化了。拉斯基认为其理由还应该从其他方面来说明。就此拉斯基举出以下几个观点。他首先重视的是，苏联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状态，所以他们必须独自进行基本建设。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都是文盲，不依靠外国资本进行工业化，就必须削减消费部门的生产，而且那就需要进行农业经

营的集体化。为了强迫人们做出惨烈的牺牲,不可避免地要施行独裁。甚至在美国,这种工业化接受了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投资,还用了一个半世纪。这一过程要缩短在仅仅 30 年里完成,历史上未曾有的这一试验,除了独裁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进行。于是为了让那些水平很低的民众领会苏联政权面临的巨大课题,集中式的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所有一切都极端简单化、极端戏剧化。领导人不是英雄就是恶棍。”工业化既然是政治的主题,那么所有的经济问题就总是政治问题。五年计划的至高命令,使斯大林的党徒把所有的问题都化为政治问题,把所有的批评者都看作是敌人。消极怠工当然意味着是反革命行为。不管它让西欧民主国家感到多么厌恶,但其罪恶的一半责任应由西欧诸国的政治家们来承担,是他们把苏联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仅是孤立苏联,而且一旦有机会,便勾结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或暗中或公开地千方百计地试图颠覆革命政权。从十月革命后到慕尼黑会议这一期间,欧美的领导人对墨索里尼、希特勒、佛朗哥等反动势力是如何宽容,而对苏联又是如何憎恨,这种鲜明的对照,拉斯基在《论当代革命》与《文明论》中都描述得极为透彻。换言之,苏联领导人对所有的政策批判都归结于是国内反革命与国外反革命的相互勾结,对于他们这种深刻的怀疑心,应该相对于西欧诸国对苏联根深蒂固的强烈的反感之上来加以批评。

但是,拉斯基认为,即便把这些因素都计算在内,事实上也无法对苏联的独裁统治进行辩解。那是在 1924 年,特别是 1927 年以后,共产党明显地出现官僚化倾向。列宁去世后,党的独裁迅速扩展为党的官僚机构的独裁。他指出列宁在世时的共产党与斯大



林领导下的共产党的气氛完全不同。列宁对反对派并非默认，但在他的时代，有人针对他的意见提出根本上的批判，也有过激烈的讨论。批判者没有被流放驱逐，也没有被处刑。但是，斯大林在夺取领导权后，党的气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概不容许持有与斯大林意见不同者。众所周知，那场不顾 1936 年的宪法所进行的选举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不符合“党的路线”的人不可能成为候选人。迁移的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凡与外国人接触都施以涉嫌的眼光；长时期被关押或处刑也不需经过法庭审判；动用人质系统，奖励儿女揭发父母等等。这种党的官僚化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达到顶峰。简直是把斯大林当作神来崇拜的。斯大林若是教皇的话，那么政治局则是枢机主教，秘密警察就是维护布尔什维克教皇的宗教审判官。一旦偏离了教义，战斗的宗教总是将之关进监狱或处以死刑。韦伯夫妇<sup>①</sup>所说的“正统病”(disease of orthodoxy)已在社会各地蔓延开来。

拉斯基认为，斯大林政权带来的如此深刻的猜疑心和恐怖心，独裁总是其最主要的根源。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国家诸国对此也应付重大的责任，而要缓和这种独裁，首先是国际条件的改善，即

---

<sup>①</sup> 韦伯夫妇(S. J. Webb, 1859—1947; B. P. Webb, 1858—1943)，英国社会活动家，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韦伯先后在陆军、殖民等部任职员和文官。1885 年加入费边社并成为该社主要领导人之一。比丽阿斯特于 1887 年开始从事社会活动，曾在有关妇女和工人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里工作。1892 年二人结婚。此后，夫妇二人密切合作从事社会和科学活动。1895 年共同建立伦敦经济学院。1913 年共同创办《新政治家》杂志。1914 年夫妇参加英国工党。韦伯在工党政府中任贸易大臣和殖民地大臣，长期担任伦敦郡议会议员和下院工党议员。1929 年被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进入上院。40 年代后期双双逝世。——译者

保证苏联在国际上的安全。但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与习惯如果不进行根本的变革”，仅凭这第一个条件，是否能在短时期恢复民主，拉斯基对此颇表怀疑。毕竟，像斯大林一派那样，那些习惯独断专行的人若不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决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且，在巨大的官僚机构的成员通过服务于这种习惯而登上了特权阶层的现在，要打破这一机构实为困难之极。对此，拉斯基意味深长地总结说：“政治力学如自然界的动力学一样，动与反动之力总是相对等的。苏联要从集体主义经济走向政治民主主义，远比他们的创造者的预想艰难得多。这是因为苏联试验的规模之大，且要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急速施行，故必然要付出代价。但同时无论如何那些不择手段、不惜成本为了追求最大目的的人，他们迟早是要偿还这一代价的。”

拉斯基的分析进一步转向阐明支配苏联的这种强硬的中央集权主义(centralism)的精神史。如上所述，它本来是俄国革命面对无政府的混乱状况下，不得已而实施的对症疗法。其思想谱系可从列宁远远追溯到卢梭。卢梭在《民约论》中提出“立法者”这一概念。卢梭的所谓“强迫的自由”之理论被法国革命时期的巴布夫(Babeuf)等所利用，后经由布奥那洛蒂再传到马克思，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拉斯基考察，这一理论是与黑格尔辩证法中暧昧的形而上学相结合的产物，与其说是整个共产党，不如说由此把党的官僚机构拔高到正统的历史叙述者的地位。据他们的解释，无产阶级不是企图表明事实，而是一旦真正懂得什么是最有利于自己的，无产者就必须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无产者表面上所要求的，若与对其有利的场合相抵触时，那就应该优先后者的“真

正的意图”。根据辩证法理论,历史决定了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们蔑视那些犹豫不定还没有下决心与他们一同走向目的的人们。出于这种蔑视感,无产阶级很容易相信,为了胜利必须打破所有他们控制不了的社会势力。为了这个目的他们甚至随时准备与不共戴天的敌人结盟。德国共产党一度就曾与希特勒合作,一起攻击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以及魏玛共和国。

与此相关联,拉斯基认为如果不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对西欧民主主义所抱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就不可能理解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主义。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所成长的环境是一个既没有非国教教会,也没有行业协会、地方自治、工会组织的世界,是一个远离民主主义的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传统社会。他们只是从外界窥视民主这个事物,尤其是列宁,总是目睹着马克思、恩格斯迫切期待的革命屡屡遭到背叛的事实,对民主深感失望。绝不能重蹈巴黎公社的失败这一决心确定了他们的一切看法。他们不愿看到马克思之后民主主义的生命力。但在两次大战间的年代里,布尔什维克只是强调西欧民主主义的耻辱部分并非完全无理。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1918年底轻易地错过一次革命的机会,的确是一种重大失败。其结果是让苏联确信: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彻底腐烂到骨髓,他们必须与腐烂的西欧切割不可。从以后的历史中也更加暴露出西欧民主主义的弱点,是他们容许了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如果希特勒的爪牙伸向苏联时,西欧的政治家们不是随时准备同他们握手吗?拉斯基强调说:西欧民主主义在这一点如果不反省自己的话,那么就不能谴责苏联对西欧的不信任。

## 2

拉斯基努力从内部来理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与行动,如上所述,在探索中央集权主义理念的历史背景的同时,他还试图捕捉住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心理结构。正是后者,使拉斯基发挥了他最擅长的历史类比法。前面我已介绍过拉斯基在《文明论》中的主要课题就是比较分析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原始基督教,在《论当代革命》里,他特别尝试着详细比较了布尔什维克与清教徒主义,将两者结构的共同之处归纳如下:

(1) 都有自己被选中的意识,他们蔑视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确信历史决定了他们的胜利,因此对来自世界上所有的迫害都具有坚韧的抵抗力;

(2) 那些否定自己的中心价值观(真理)的人,都是恶魔所为,必须迅速地消灭。(列宁对考茨基的态度近似于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对罗德主教的弹劾)

(3) 布尔什维克对中产阶级教养的蔑视与清教徒对一般世俗学术的怀疑。

(4) 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视作万能的做法与清教徒依靠援引圣经的态度。

(5) 无视个人的危险和殉教的自豪感。德国国会纵火案后,1934年季米特洛夫在法庭的陈述令人想起约翰·班扬<sup>①</sup>的证言。

---

<sup>①</sup> 约翰·班扬,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当局借口未经许可而传教,把他逮捕入狱两次,分别监禁十二年、六个月。狱中写就《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内容讲述基督徒及其妻子先后寻找天国的经历,语言简洁平易,被誉为“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译者

两者都坚信只要忠诚于福音必然会获得拯救。

(6) 一方面猛烈攻击别人对自己的不宽容,但一旦自己获得权力也一概拒绝对反对者施以宽容。在这一点上两者都一样。因坚信自己掌握绝对真理,便认为强制性地施加之是应尽的义务。唯一的罪过是软弱(weakness),认为对不同意见的宽容会导致行动的混乱。

(7) 对提倡“中庸”者表示烦躁与轻蔑。其中含有的意识是“或求全,否则宁可求无”,因而出现一种倾向,对待中间分子比对待公开的敌人更加严厉。

(8) 出于一种被排除在拯救之外的恐惧感,而产生一些逢场作戏的伪善之徒。这一点两者都很类似。

把布尔什维克与历史上的宗教相比较,是拉斯基曾在前著《共产主义论》中做过的尝试。他把共产国际组织比作罗马天主教教会,受命散布于世界的布尔什维克,相当于耶稣会士被赋予的宣教任务。为什么拉斯基常常要用这种类比?恐怕不会是单纯的喜好或一时的念头。可以理解为一般的英国人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革命实践始终抱着一种距离感,拉斯基是以此为前提的。对于英国人来说,自由、宽容、个性独立的生活态度已深入骨髓,而苏联所实施的教条主义、正统主义、铁的纪律、英雄主义、血的肃清,以及对所有的这一切只有唯诺是从的大众,这类现象几乎都超出了正常人的理解范围,好像完全是发生在另一世界的事情。于是,在产生厌恶或同情心之前,就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所以,拉斯基为了消除这一距离感,把原始的基督教徒和耶稣会士,甚至路德、克伦威尔、皮雷纳、班扬等西欧国民的精神先驱统统拉出来,通过

唤起西欧人的历史体验,使他们多少能切身地感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世界。对我们来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拉斯基通过这种比较论说,逐渐地将其价值观的重心转变过来。也就是说,最初这种比较主要是从共产主义内部的心理来理解,而没有价值观的立场,甚至是对所有好战的宗教信徒所共有的偏执、独断、狂热表露出他自身的反感。但最近以来,他明显地表明了自己倾向:处于伟大的文明变革时期,“新的信仰”将会从根本上颠覆古老的价值体系。“共产主义不是靠其现实主义,而是靠其理想主义,并非通过其唯物论的客观展望,而是通过精神上的高度统一而得以发展。”<sup>①</sup>“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它超越了一切,在民众之间燃起了希望和一股新的力量。……这种希望也点燃了西欧无产阶级追求向上的精神火花。”<sup>②</sup>我们虽然早在1927年的著作中即可发现他的这种表述,然而,他的共产主义观正以新的面貌迅速呈现出来。继《论当代革命》之后的《文明论》中,这一倾向终于全面爆发了。“在俄国革命的思想扎根之地,共产主义者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在精神上得到拯救。”<sup>③</sup>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向权力进军的新的原理,它正是一种新的信仰。而这个信仰又总是伴随着种种诱惑和困难。追随这一信仰的不论是男是女,他们的信念比历史上任何信仰都要深厚,而且孕育着更宏大的希望与高扬的精神,在真正的意义上使他们得以

---

① 《共产主义论》,第245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信仰、理性、文明》,第52页。

新生。”<sup>①</sup>

“希望才是信仰的源泉。而正是信仰才有可能赋予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伟大的目标。”<sup>②</sup>“革命的信仰是唤起人们崇高理想的号角。”<sup>③</sup>

拉斯基要彻底横扫现代文明所陷入的颓废与腐败,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民众的失意、绝望和孤独,他期待布尔什维克能承担起“复苏人类精神”“重构价值体系”“弘扬精神”的历史任务(详见第二卷第一章)。当然,他没有忘记新的信仰所伴随着的危险性,严厉警告出现以下的倾向:比如,区别使用同志之间的道德与对反对意见的道德;欢迎不怀诚意的支持者(*insincere supporter*)甚于值得尊敬的反对者(*honourable opponent*)。不过,拉斯基的重点显然还是放在其正面上。在尝试这种与宗教的类比中,拉斯基的价值观的重心有了显著的转移,实际上贯穿整个《文明论》的基调显然不同于包括《论当代革命》以及之前的著作。例如,在《论当代革命》中他站在西欧民主主义的立场强调对斯大林政权的批判,而在《文明论》中却有所倒退,反倒使人感到他始终在为“独裁”进行辩解。如上述就苏联选举不过是一场儿戏这一问题,在该书中拉斯基做了如下辩解:在否定社会主义的观点蔓延成风的环境里,苏联共产党不会将其信仰的主要观念任由选举人来偶然决定。西欧的民主主义之所以容许批判的自由,是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批判的自由会发展到变革的自由(*freedom to change*),而一旦这种安全感

---

① 《信仰、理性、文明》,第 201 页。

② 同上书,第 163 页。

③ 同上书,第 57 页。

发生动摇,统治阶级会马上明目张胆地要求动用国家权力,这是由诸多的实例早已证明的。苏联的试验归根结底是要“改造人类”(remaking of man),是向以获取利润为主的全世界挑战。如果回想一下,曾经引起人们互相残杀的原因,竟是那些对现在的学者来说已毫无兴趣的、神学方面的细微的意见分歧,就足以想象出苏联的这场试验是一次多么重大的挑战,会激起旧世界的人们多么巨大的愤怒。一方的愤怒可以激起另一方的愤怒。在愤怒和恐怖的心理不断扩大形成连锁反应时,就尚没有可能将新的原理建立在经过说服或同意这样的政治基础上。“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治发言的不自由、大规模的暴力恐怖行为,以及党的一贯正确的这种丑恶的拜占庭主义,即便对以上现象的所有抗议全部是事实,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较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拥有更多的实现自我(self-realization)的机会,这是不可动摇的真理。”<sup>①</sup>这就是拉斯基在衡量了所有正负面以后,对俄国革命做出的最终评价。

## 3

拿拉斯基的如上结论与他 1921 年所著的《卡尔·马克思》做一比较,人们无不惊讶两者之间竟发生了如此的差距。这种差距,如果不考虑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间拉斯基与同时代的人们所经历的巨大的历史事件,便是无法理解的。借用河上肇博士的说法,拉斯基自己也是经受了历史经验的考验,翻山越岭才终于达到了他

---

① 《信仰、理性、文明》,第 62 页。



今天的境界。众所周知,拉斯基作为多元国家论的创始人进入政治学界,可以说已在古典政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著作都是他提倡多元国家论时代的成果。当然,在他的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英国社会主义、西欧民主主义的坚定信念。

促使拉斯基从多元国家论急转向阶级国家论,以至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契机究竟是什么呢?在他的思想急剧转变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三大历史事件是不可忽视的外来的冲击。第一是1931年袭击英国的金融恐慌,各党联合成立麦克唐纳内阁。第二次工党内阁组阁以后,因只有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才占据下院的多数,故其政策屡受牵制,完全不能着手有关社会化的立法。而资本阵营在金融恐慌之时,借财政危机之由,企图削减社会政策费来渡过难关,受此要求,引发麦克唐纳派的“反叛”而迅速瓦解,致使工党在其后的大选中惨遭失败。以此为契机,统治阶级的攻势日渐显露,什么扩大上院的权限,什么恢复国王的否决权来阻止将来社会主义的立法,这些举措在保守党内部日益高涨。相反,工党则更加左倾化,特别是独立工党(I. L. P.)一部分人竟然主张采取非法的革命手段。拉斯基亲眼目睹了这一阶级对立激化的过程,他开始对通过议会实现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他的这种悲观情绪表现在不久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3年)一书中。第二个事件是美国罗斯福总统就任后立即着手的“新政”实施过程。原本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为了摆脱经济恐慌而制定的“新政”诸法,却遭到华尔街的强烈反对与憎恨,其势头之猛令拉斯基大为震惊。特别是发生在1934年7月旧金山的大罢工,似乎导致拉斯基对国家本质的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折。这次大罢工的起因是船

运公司拒绝承认依据“国家产业复兴法”合法成立的交通运输行业的工会,由于国家出动军队镇压,大罢工仅持续4天就以失败结束了。可见国家权力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会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一旦认为阶级关系的平衡出现危机,国家便会立即以维护秩序或法律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拉斯基将此作为暴露国家本质的典型的实例。<sup>①</sup> 第三,确立拉斯基阶级国家论的契机乃是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兴起,尤其是在1933年纳粹掌握了政权之后。正是法西斯主义破坏民主主义机构,企图以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维护阶级统治。这是国家权力百分之百地完全用于压迫劳动阶级的一个最露骨的例证。在1937年再版《政治典范》时,拉斯基附了一篇题为“国家理论的危机”的长文,它最为清晰地表明了拉斯基转变的动机。他说:多元国家论已无法说明最近登场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现在唯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可阐明。多元国家论旨在打破绝对的国家权力,既然国家权力是维持阶级关系不可缺少的手段,那么首先占据这一最高的权力,必须先行通过它来施行生产手段的共有这一过程。于是在这种国家基础理论转变的同时,更加深了拉斯基对俄国革命与苏联体制的亲近感。在1937年《现代国家自由论》鹧鸪版的序言中,他指出:“苏维埃联邦今天已走在文明的最前端”,并断言打破现在的黑暗时代,重建自由的各种原理的,必然是“苏联体制的逻辑”。

如上所述,拉斯基立场的转变印证了最近世界史上发生的巨大变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斯基与教条主义派截然相反,他属于

---

<sup>①</sup> 《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第135页。

从实践中不断修正自身理论的学者。他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感受性极为强烈。《论当代革命》与《信仰、理性、文明》虽然基本上是前后相继发表的,但两者之间对俄国革命乃至苏联体制的评价有着相当大的改变。一方面,是苏联向纳粹妥协和苏联攻打芬兰的印象,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德军凶猛的进攻,红军和苏联民众发挥出的惊人的团结力量,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表现出的英勇抵抗,令拉斯基深受感动。只有了解这两种不同印象的背景才会理解上述的改变。

但是,如果说仅仅对周围发生的事件敏感便是拉斯基的才能,靠这种外界的刺激就能决定他的时代立场的话,那不过可以证明他具有作为一个优秀记者的资格而已,而并不能保证他是一个思想家。当然作为思想家他也会不断积累新的事实和经历,继续修正自己的立场发展进步。不改变自己并非是思想家的荣耀,转向也未必是不光彩的事。问题在于其立场的转变或变化是否出自内在的必然性。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思想家在他的一生中,绝对会有某种不变的因素来制约其变化。例如,像在皈依宗教之刻,会因某个特殊的“不合理的”冲击而突然转向别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至今他的思想和人格会经过一次“死亡”,从而以新的人格获得再生。我们若追溯拉斯基的思想变化过程,根本找不到这种“突然变异”的东西。反而努力按照其著述的年代仔细加以探讨的人就会很容易发现其思想深处贯穿着一条不变的强劲的主旋律。若按着这条主旋律再来分析拉斯基丰富多彩的表述,起初为他20年代与40年代著作之间的差异而惊讶的人,此时反而会为他的连续性大为震惊。

那么,拉斯基思想里的“制约其变化的不变因素”是什么呢?因篇幅的关系,针对这个问题不能作太多的论述。在此仅简单地归纳如下:把人格的自我实现视为最高价值。这一思想来源即是阿克顿<sup>①</sup>《自由与权力》一书的主题“任何权力都可导致腐败”。这是阿克顿判断追求个人内在价值和现实的政治权力的一贯标准。“权力对于行使者来说乃具毒性,这是历史之常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共产主义的独裁者会因此与他人不同。”这是拉斯基在1921年《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所说的。这一基本看法至今没有变化。我们已不厌其烦地多次遇到这一命题。“本质上权力对行使者来说是危险之物。无论必须扩张权力的根据是什么,它同时也成为保证乱用权力所必需的理由。”<sup>②</sup>“在社会上行使权力的人,不管是谁,都会受到乱用权力的诱惑。”<sup>③</sup>等等。他虽从多元国家论发展到马克思主义,但丝毫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以上的看法。他对1937年苏联领导人“被巨大的权力所毒害,在不需要严厉的统治之后,继续拼命抓着权力不肯放开”的危险性发出警告,1943年的《论当代革命》一书依然坚持认为:“在完全不考虑他人意见、呈免疫状态下,必然要产生重大的错误。处在这种情况的国家,无论它属于什么性质都是一样。它会制造出致命的幻想以为没有谬误,而再没有比这种无谬误的神话更加危险了。……一旦陷入这

---

① 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年),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英国理论政治家。廉洁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写的书《自由与权力》,中译本有侯建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译者

② 《政治典范》1925年版,第38—39页。

③ 《现代国家自由论》,第65页。

种幻想,他们就不再把自己视作凡人,更有甚者,把服从自己的人们不视为目的,而只看作是工具。”<sup>①</sup>哪怕是在拉斯基在对布尔什维克的“新信仰”最充满热情为之倾倒之时,也都不会忘记提醒人们:“只有等待新的人际关系以及制度的变化才会出现有效的根本变革,那总要冒着行使权力的内在危险。”<sup>②</sup>拉斯基对苏联的试验寄予极大的关心正是因为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个性”的机会越来越小,而他发现在苏联则有希望解放个性,仅此而已。“我判断一个国家,……是看它用什么方法确保我实现最高的自我(my best self)的权力而决定的。”这一最为基本的语言,至今仍是拉斯基批判现实政治的基准。

就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拉斯基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实用。他议论时的切入点总是着眼于现实的立体性构造,即无论怎样强调某一侧面之时,对相反的一面也决不是采取轻易否定的态度。在他关于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评论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多元视角。所以,在“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看来,当然有些隔靴搔痒之感。在旧著《共产主义论》中,他说:“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错误就是拒绝面对这个世界是复杂的(This is a complex world)这一事实。”听起来这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粗暴的批判,但从现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看,“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的看法也时而浮现出来给他的“信仰”泼点冷水。这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不彻底,莫如说这正反映了他的思想主导动机的彻底性。

---

① 《论当代革命》,第 81-页。

② 《信仰、理性、文明》,第 156 页

对于拉斯基的基本思想,还可以站在各种立场上加以种种评论。而本篇的主题并不在于进行这种评价,就像拉斯基论说俄国革命一样,“在褒贬之前,首先需要理解”其思想,这就是我当下的目的所在。

(1947年)

## 第三章 法西斯主义诸问题

### ——其政治力学的考察

#### 引 言

现在,我桌子上放着两本美国著名的自由派周刊《国家》(*The Nation*),该杂志诞生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旧的一期是1940年2月10号发行的75周年纪念专辑。该号出版之时,欧洲正在卷入激烈的战争漩涡中,希特勒的精锐国防军有一举突破马其诺防线之势。在东亚,日中两国交战已有两年半之多,这场殊死之战毫无任何停止的征兆。自西至东,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残暴势力正在恐吓威胁着唯一和平的美国大陆。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地为《国家》纪念专辑撰文,他引用了法国伏尔泰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杂志创刊以来在漫长的历史中总是保持一枝独秀之地位,却依然坚持代表“少数意见”而且是“极端不受欢迎的少数意见”寄予敬意。似是对此呼应,该刊主笔卡其威在纪念专辑的社论中指出目前民主主义危机的问题所在,他在最后写道:“对我们代表少数意见表示如此真诚的支持,拥

有这样的总统,我们感到幸福。但现在总统本人正受到一伙人的攻击,他们在议会、在地方拥有牢靠的据点企图废除自古以来的民主变革的武器(即各种自由权——丸山)。对于这股势力,《国家》杂志一如既往地坚持多年来的方针,集中自己的所有力量和注意力与其进行斗争。”当时最喜欢读的《国家》杂志里的许多文章,我现在大都忘了。但拿到那期纪念专辑,阅读总统与主笔相互声援的充满欢乐之辞时,如同一股电流激动全身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卡其威言行一致。当时《国家》杂志确实对外猛烈抨击以德意日为首的世界最强大的法西斯势力,同时在国内,对大资本勾结反动势力千方百计抵制“新政”实施进行斗争,可谓美国舆论界的旗手。拉斯基等纷纷给该杂志投稿,多次展开精辟的论争。但随着日美关系的恶化,我们这些日本读者连接触拉斯基锐利笔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起初看着审查后被撕去页码的杂志还气愤不已,没过多久,干脆连杂志也收不到了。待我以旧友重逢之情再次拿到《国家》杂志时,已经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了。经过惨重的牺牲,轴心国被打败了。但并不意味着法西斯势力的终止。卡其威在上面的社论中说:“即使法西斯在战争中失败,也许会在和平时代得势。为了不让法西斯得逞,欧洲不仅要重新修定国境线,还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不幸的是,其忧虑成为现实。《国家》杂志上所争论的课题依然切实存在,不仅如此,轴心国的战败,这股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目前已转移到卡其威的祖国美国。不但是《国家》杂志,对普遍坚守美国自由主义的势力来说,这也意味着将被置于极其困难的处境。信奉伏尔泰格言的总统已经去世,一直攻击总统,



“在地方拥有牢靠的据点企图废除自古以来的民主变革的武器的势力”在全美范围内急剧扩张其网络。在这种局势下,《国家》杂志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它的光荣传统,代表“极不中听的少数意见”斗争到底?现在我手中的《国家》6月号(1953年6月28日)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一期是市民自由专辑,每篇报告都真实地揭露了包括官场、法律界、劳动、科学、教育、出版、电影、戏剧等各个方面遭受麦卡锡主义威胁的实际状况。正如在卷首以“自由如何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为题的社论中卡其威尖锐指责的那样,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却未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只顾及维护即将崩溃的旧世界,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了苏联。社论敦促自由主义者要奋起抵抗“恶意诽谤、肆意迫害与强制性同化”。由此可见《国家》杂志及其主笔的斗志依然健在。但同时该专辑也提醒人们:“自由国家”的自由如何以令人惊悚的速度被扼杀,其规模又是如何广泛。甚至连以《国家》为代表的,显然与共产主义立场有别的人们,与当年庆祝杂志创刊75周年之时相比,现在是处在何等不利的困境之下。各篇报告列举了一系列秘探活动的证据,其中不但有政府的,还有私人的。这些反动团体像螨虫跳蚤一样,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攻击,而一般市民对此进行的抵抗却又是令人吃惊的无力和软弱。看到这里,我禁不住叹息:美国也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这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叹吧。我重新对比了眼前这两期杂志的封面:第一本纪念专辑的封面,是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血气方刚的美国工人,他把手插在腰间,凝视着前方,表现出一副充满自信、极其乐观的表情;而新的一期封面,以自由女神像象征着本期特辑内

容,她的面部以及高高举起的右手占了整个版面。也许是个人的主观想象吧,感觉自由女神脸上流露着无比沉痛的表情,内心似压抑着愤怒的火焰,涂着灰色的面部更是给人一种不祥之兆。对比这两本杂志封面,恰恰反映了这两期所贯穿的内容的不同基调。两者时隔 12 年的岁月,似乎典型地象征着美国乃至西欧民主主义所走过的“翻山越岭”的曲折之路。

## 1

法西斯主义是 20 世纪反革命最尖锐最具有战斗力的一种形态。正如耶稣会会士是 16 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先锋,而梅特涅<sup>①</sup>统治最充分地反映了 19 世纪初反革命势力一样。反革命即是以革命为前提的。毋庸置疑,16 世纪的宗教改革、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地位以及 20 世纪的俄国革命都是其对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国革命是 20 世纪革命的唯一形式,布尔什维克也不是 20 世纪革命的唯一意识形态。20 世纪的革命是现代社会的现代文

---

① 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 1773—1859 年)是他所在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从 1809 年开始任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1821 年开始担任奥地利帝国首相,直至 1848 年革命爆发,被迫下野。他任内首要工作之一是缓和与法国的关系,作为外相推动了奥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代表奥地利签署了枫丹白露条约,并流放拿破仑。他是后拿破仑时代由欧洲列强组成的维也纳会议(1814 年 9 月—1815 年 6 月)的主席。在他的影响之下,“梅特涅体系”延续着奥地利与俄国、普鲁士的联盟十数年之久。这是梅特涅在奥地利外交上的最高峰,此后梅特涅逐渐被国际外交边缘化。在经历了从伦敦到布莱顿再到布鲁塞尔的短暂流亡生涯后,他于 1851 年再一次回到维也纳宫廷,成为费迪南一世的继任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顾问。1859 年梅特涅逝世,享年 86 岁。——译者

明最深刻的地壳变动，俄国革命本身是这一变革在一定的历史状况下所出现的。为了消除法西斯以及其他保守的反动势力（法西斯主义必然是反动的，但保守反动势力未必是法西斯）过去和现在还在散布的流言蜚语，必须反复强调对俄国革命的这一认识。现在有这样一种见解，好像在亚洲、欧洲蓬勃兴起的革命力量，都归罪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发祥地的诱惑或外部的煽动。若拿某个外国评论家的生动比喻来说，就等于是指着赛马中跑得最快的马呼叫：有了那匹马，其他的马就都朝着目的地奔跑。其他的马也的确受到跑在前边的马的激励鼓舞，这种情况当然有。但毕竟参赛的马各有各的跑道，并非被跑在前面的用绳子牵着。20 世纪的革命中，的确俄国走在了前面，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革命采用什么形态，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受复杂的国际形势、历史的或地理的诸条件、文化传统等所约束的。所以法西斯主义作为反革命的集中表现，他们针对的是革命状况，未必都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首要之敌当然是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因为仅通过各国的历史可知，共产党是革命的最有力最具战斗力的组织者，即使不是实际的组织者，也是最有可能的组织者。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社会革命的最先锋时，那么首先会刻不容缓地遭到法西斯主义的全面攻击。法西斯分子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存在到底会宽容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性问题，而是革命的界限问题。只要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判断为革命的温床，那就会遭到排斥，乃至被均一化。相反的是，如果它具有防范革命的机能，那就会容许其放任甚至支持它，仅此而

已。所以,反过来看,在一个国家内如果能够允许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存在,仅此一点丝毫不能保证该国的统治势力没有走向法西斯化,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方式。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对出于政治目的采取沉默态度的自由主义者或标榜反共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实施迫害——且不论他们是否与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之名相符——,掌权者若从经济方面考虑,那实在意义不大。所以,充满斗志的自由主义者往往比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容易成为法西斯攻击和压制的对象。应该说,莫兹考斯卡的定义“法西斯是征伐所有左派的十字军”<sup>①</sup>,仅针对法西斯攻击的对象具有机动性这一点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因此,刚才我们把法西斯说成是反革命最尖锐的一种形态,就是意味着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相对地呈现出最激烈的形态,并非指实际的内容及固定的组织形态。随着具体的革命状况的变化,法西斯主义的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法西斯的统治是伴随着正式停止或废止现代宪法和现代议会制度呢,还是一边继续维持立宪状态一边进行?这其实也并非原则性的问题,应理解为是制度的界限范围之问题。如果议会制成

---

<sup>①</sup> Natalie Moszkowska, *The Resurgence of fascism*, *Monthly Review*, vol. 4, 3, 1952.

为革命的桥头堡,那就会像德国<sup>①</sup>和意大利一样遭到废除的命运。但是,如果议会制(不仅指狭义的议院内阁制,还包括总统制)因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理由,避免了这种危险,反动势力在议会里占据了多数,且可预料暂时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时候,议会制也就不会对法西斯主义的扩展成为障碍<sup>②</sup>。当然,只要在议会制的原则基本

---

① 至今时而有人仍相信这样一种传说:纳粹是在魏玛体制下“合法地”获得权力,因此在这里须提及一下。魏玛体制下的官僚(特别是司法部)怎样公然或暗地打破其政治上的中立原则,援助反动团体,从内部架空“法的统治”,且暂不说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帕彭(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施莱谢尔(Kurt von Schleicher)三届总理的内阁时代是怎样实质上架空魏玛宪法的,只要看看从最初给纳粹独裁提供决定性的法律根据的授权法(Gesetz zur Behebung der Not von Volk und Reich)的成立到其后的经过,就暴露了其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确,这一法案是根据魏玛宪法第76条的规定,通过占出席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员的同意。但是,在此之前共产党已经被阴谋捏造的议会纵火案而宣布为非法组织,于1933年3月议会开院式之前逮捕了共产党议员(81名)和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不仅如此,授权法第5条规定现在的施莱谢尔内阁更换时该法便失效(应该记住刚开始的希特勒内阁的12名阁僚里只有3名纳粹党员,兴登堡总统(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在内阁里特遣心腹人物帕彭、胡根贝格、葛勒克入阁,为防止纳粹独裁化,要求加进第5条)。但不久,胡根贝格辞职,葛勒克因滥用公款之罪被捕。而纳粹党的沃尔特·达里成为农业大臣,赫斯(Rudolf Walter Richard Hess)不是阁僚却出席内阁会议。因此使第5条规定成为空头文件。而且,授权法第2条确定国会的地位不可动摇,保证总统的权力,使临时立法的精神贯穿整部法案。至于授权法这种扩大的委任立法本身是否违背宪法则当属别论。而纳粹独裁政权的建立竟然是肆意践踏这个授权法的。所以最终固执于合法性而容许纳粹政权统治的是社会民主党而并非纳粹。(参照诺伊曼(Franz. Neumann),《巨兽》(*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1944, 第52—54页;舒曼(Frederick Lewis Schuman), *Hitler and Nazi dictatorship*, 1936, 第217—222页)

② 需要说明一下,这个意思并非是说资产阶级政党持久地占据议会多数的国家就是法西斯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将在下面论述,它在自上而下的时候,大都采取渐进的形式,是否能把某个国家整体的政治统治形式定为法西斯主义,是根据其他各种社会特征进行综合性判断的问题。其判断并非容易,也容易产生意见分歧。下面将列举一些主要的特征加以论述并逐一阐明。

得以贯穿,宪法保障下的法制比较纯粹地得以保持的情况下,反革命势力要进行有效的组织化还是常常会遭到许多困难和抵抗的。作为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在基本保持现代立宪制的同时,至少在表面上法西斯主义不可能得以发展,但实际上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把立宪主义架空。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到现代宪法和议会制的存在本身并不能先决地证明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方式。一党专政或各利益联合体的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的状况下,反倒是加大压制迫害革命势力的最为行之有效的组织化形式,不过是披在法西斯主义头上的一张面纱而已。

## 2

显然,法西斯主义根据革命的具体状况采取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绝非是肆意的,其发生与进行的速度以及形式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规律。法西斯主义在某个国家公然出现之时,就是那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内革命的紧迫性某种程度高涨之时。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关系只要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威胁旧统治体制的安定,是不会发生法西斯主义的,或是即便发生也基本上不会发展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至多可看作是广义的反动资产阶级。但是,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判断革命的高涨是否威胁到旧体制的稳定,这不仅是客观事实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观意识层面的问题。即客观上看,革命势力的组织化尚落后于紧迫的革命形势,也就是即使没有马上出现革命的可能性,统治阶级或追随之的小市民阶层也会被恐怖情绪所驱使,过高地评价革命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完全有可能急速地发展。同样,国内的革命形势并没有

那么紧迫,而他们感到非常恐怖,认为邻国进行的革命有“传染”到本国的危险性,这时也会出现法西斯主义。促使战前日本法西斯主义走向成熟是体制的动摇,它当是基于两个“客观的”事实:即国内昭和初期的经济恐慌激化了阶级对立;对外则是作为“生命线”的中国,特别是满洲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当时,上述统治阶层多多少少有些“过度在意”乃至出现“过敏症”,因此,反映在他们眼里的事态,远比实际情况有所扩大。一般来说,生活样式或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受各种社会历史条件影响,越是较高程度地保持之的地方<sup>①</sup>,越是对“异质性”因素的感染或侵蚀会做出极度敏感的反应。在这种地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未必能正确对应“革命形势的紧迫性”。例如考察现在美国的法西斯主义问题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视角。<sup>②</sup> 若以此逆推,在这种社会,当革命势力以及意识形态

---

① 生活样式或意识形态的“同质性”的程度问题与阶级分化的问题原则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虽然阶级的两极分化程度不断加剧,但比较稳定或基本维持其生活样式的“同质性”,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② 所谓“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其实是非常暧昧的。虽不能否定它在保证美国市民的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拉斯基在评述美国人的行为方式类型时说:“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国民那样都看同样的书,玩同样的游戏,人际关系外向友好,且易被说服。也有因与自己的邻居看法不同而感到痛苦的情况,但没有像美国国民那么因此痛感苦楚的。……除了德国人在纳粹的统治下被逼迫地默默接受命令以外,我怀疑至今没见过像美国国民那样,喜欢口号式地思考事物。”(*The American democracy*, 1948, p. 622)拉斯基说的话听起来很激烈,其实,他不过是在新的大众传媒阶段进一步加以确认而已。一百年前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曾指出美国民主主义的单一性:“我不知道还有像美国那样没有真正的独立精神、缺少自由讨论的国家”。为了避免误解,在此补充一点。拉斯基在做了上述的论述后,紧接着他又承认:美国有抵抗同一性这个妖魔的反体制传统,目前,工会、教会、妇女团体等自发性团体开展教育宣传的活动非常活跃,具有对抗勾结大资本的大报纸大广播的力量,所以“总有一些人可能从大众传媒网中逃脱出来。”

因本身“本土化”失败的程度,就会认为革命势力是“外来的”,原本就不适合本国的生活方式。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对立逐渐激化,不仅是统治阶层,就连市民大众的恐惧感也会不断扩大深化,反倒为法西斯的国内强制性一体化开辟道路。“我们这个时代的诱惑,是因过于害怕更糟糕的情况到来,而接受原本不堪忍耐的局面”。被恐怖心理所控制的人总是为自己制造的幻影而恐惧不安。历史上有很多实例证明幻觉制造了现实。所以说,法西斯主义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而且是制造恐怖的“生身父母”。

## 3

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法西斯主义又会以怎样的形态发展下去呢?从和既有的国家构造的关系来看,众所周知,大体有以下两个形态。一是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一是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不管法西斯是好是坏,它都属于一个新的社会新的经济体制,至少是致力于实现之的运动,所以有人称其为一种社会革命。<sup>①</sup>但凡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则认为(不言而喻,我也是其中之一),严格地说,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可能的。诚然,法西斯主义是因革命形势的紧迫性而促生的反革命,所以它不可能仅仅止于单纯的复古或消极的保守,它多少带有类似革命的样子。法西斯不仅高

---

<sup>①</sup> 站在同情法西斯主义立场的学者,或将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绝对化的学者当然基本上是持这种见解的,但显然是站在否定法西斯主义也否定历史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立场的研究学者也有持以上看法的。比如,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1936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唱法西斯的新体制,要把人民从奴隶压迫中解放出来等口号,而且在其最尖锐的形态中连思维方法都有意或无意地吸收了革命阵营的理论。一般在尚未掌权的期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革命倾向较激烈,但未必仅仅如此。例如,《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40年12月15号的社论以《没落的世界》为题主要说到:“为了打倒封建主义,需要建立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但这个使命已经完成。……“在这个世界的内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听到的庄严呼唤”……那就是“生活在没有自由和光明下的民众的呼声。……英国工党丝毫不愿意打倒资产阶级的世界。”

弗朗茨·诺依曼(F. Neumann)在注释中<sup>①</sup>指出,如果让人只读这篇社论文章,几乎谁都会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者写的,可见其理论多么酷似马克思主义。神以自身的形象制造了人,而法西斯主义经常把自己装扮成其敌对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形态可以说也是与之相同。一般说反革命就是革命的反对面,革命势力的组织越坚固,或其组织化越加快,反革命也为了与之相对抗,必然采取激烈的形态,为此,不得不加速大众的组织化,从而相对地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在革命势力弱小的地方,反革命会“自上而下”地顺势一气发展起来。此时,重要的契机是战争危机的问题。<sup>②</sup> 当

---

① 弗朗茨·诺伊曼,前引著作,第191页。

② 人们说20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的确,在当代,“战争是由使革命成为必然的各种条件所催生,反之也促进了革命的成功。”(E. H.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1942, p. 4)就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主义也是与革命诞生一样,作为反革命它与战争是双胞胎。法西斯主义如众人所知,它不管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都是战争最疯狂的推动者。但毋庸置疑,帝国主义战争是法西斯主义发生很久之前就存在着。所以在本稿中,把法西斯主义本质的首要意义界定为反革命,而不是战争。

战争即将爆发,到了燃眉之急时——这里既有客观事实的存在,但更多的是主观意识的问题,自欺欺人的作用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内的革命势力组织化的程度如何,法西斯主义都会自上而下地迅速扩大,因没有充分的余力发展群众组织来对抗革命势力,于是就会代之以军队为主的国家总动员的体制(尽管军队本身属于最不具民主性的组织,而征兵制则具有一定的大众基础,呈现出拟似民主的形式。在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本来的法西斯政党或团体是所谓非正式的军队,反之,军队则可以认为是非正式的法西斯政党)。当然,不管是自上还是自下,革命的紧迫状况处在一定程度以下的情况下,如上所述,反革命不会以法西斯主义的面貌出现,而且下面的群众组织从其反革命的本质来看,终究要选择与上层反革命势力合流的道路,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实际上两者必然要相互依赖向前发展。但在群众性组织依然为法西斯政党主体时,有必要也有可能区别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群众组织是否去掌握权力;另外一种原有的统治机构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是否形成主流。战前的例子不用说,德国和意大利是前一种类型,日本是后者。正如保罗·斯威齐<sup>①</sup>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美国的

---

① 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 1910—2004年), 20世纪美国最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颇有成就。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论》(*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奠定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地位。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并任该刊主编直至辞世。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年)、《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此处观点参照其登在《每月评论》第3卷第2号的 *The Meaning of MacArthur* 一文。——译者

法西斯化的倾向大体是属于后一种类型。

法西斯主义即使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其民间乃至半官半民的团体也都是反革命组织的先锋队,主力部队往往继先锋队扫除障碍之后才向前进军。比如说,战前日本各种右翼团体、暴力团、地方退役预备军团体、青年团、翼赞壮年团等均属此类。所谓的青年将校团在形式上不属此范畴,但就其实际职能上看则是最前卫的尖兵。法西斯主义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不同形式,而把两者的前卫部队比较一下,我们发现,其意识形态或斗争方法甚至到组织成员的性格和行为式样,虽有历史条件不同的一面,但其类似性亦不少:作为反革命的尖兵,他们都直接与敌人针锋相对,最早接触危险状况。比如:日本的法西斯正统的意识形态极力将自己与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相区别,事实上也颇有不同之处。日本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昭和六年(1931年)的三月事件,其动机以及目的,据木户日记<sup>①</sup>记载:“一,近来共产主义的侵入甚为显著,若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将陷入他们手中;二,在吾国任何运动若不拥戴皇室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三,所以,大川一派<sup>②</sup>甚至主张拥护天皇的国家社会主义,以打破既有的政党,实施独裁政治;四,对此,军部与之相呼应,为实现意大利式的法西斯政治,与大川一派共同提携。”至此,明确地显示出两点:一是日本激进的法西斯运动是针

---

① 这是木户所有马说的。事件的当事者大川周明通过大行社的清水行之助怂恿有马参加三月事件,所以知悉当时的内幕。

② 大川周明(1886—1957),日本民族主义者,大亚细亚主义作家,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二战后东京审判的28个甲级战犯之一。因为在法庭上大闹装疯逃脱审判而名噪一时。——译者

对激进的左翼而做出的相应举措；二是其意识形态在此阶段是欧洲法西斯主义（此时纳粹尚未掌权）的日本版。此种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核心大体是落伍的知识阶层、从左翼转向右翼的变节分子、不堪忍受普通市民生活的无赖（浪人），这也与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情况一样。然而，这些要素随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逐渐脱离了主旋律，变成不过是单纯的和声伴奏，最终也有人发出不协调音而退出合奏的舞台。日本不像纳粹党那样，一些“流浪街头的失业人”最后可以晋升到掌权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登场大闹一番，加快了上层阶级的法西斯化而已。在日本，越往金字塔的上层爬，越是绅士型、越是符合标准的官僚型人物占据绝对优势，到了最顶层，则高踞着一个与法西斯式人物相距甚远的所谓“自由主义的”“爱好和平”的宫廷重臣集团。战前的日本依照权威-权力-暴力的“分工”与身份等级制度建构的整个体制，不管是对外还是对内，在运作功能上都丝毫不逊于纳粹的法西斯。若在此基础上做些必要的修正，就成了美国的法西斯化——假定今后美国要走法西斯之路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其大致的前景。在以自由与人权的传统为自豪，市民生活的平稳安定性远比德国、日本等国高出许多的美国，那些站在“讨共”和迫害黑人运动最前线的各种反动团体，以及被动员的小市民的行为方式却出奇地类似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据现场亲眼目睹 1949 年夏天的毕克斯基事件<sup>①</sup>——美国著名的黑人歌手、推动和平运动的活动家保

---

<sup>①</sup> 毕克斯基事件(Peekskill Riots)是 1949 年 8 月 27 日在美国纽约郊外发生的一场反共、反黑人、反犹太主义者的暴动。——译者

罗·罗伯逊举行的音乐会遭到暴力袭击的事件——的作家报道：“这些年轻人成长在既无工作又看不到希望的河岸一带，成了一时误入歧途的极端分子。他们在煤气公司的分店、食品商店、食堂、或消防队以及其他政府的社会服务处工作，或是连工作也不做，就在附近游游荡荡、糊糊涂涂地混日子。他们已经在社会上饱受苦难的折磨，但并不知道这苦难的原因何在，更不知道今后该往哪儿去。他们只对社会抱着憎恶感。于是地方的复员军人会乘虚而入，加上地方工商会议所也顺便利用了他们的憎恶。”<sup>①</sup>（着重点为丸山所加）这些暴徒受到保安警察以及州警察的公开或私下庇护，他们炫耀地各自持手枪，举棍棒，扔乱石，并高喊：“希特勒万岁！这些黑狗贱货，老子要把美国的赤共恶匪斩尽杀绝！”袭击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音乐会听众，甚至再次上演了一场那个使纳粹臭名远扬的纽伦堡焚书<sup>②</sup>闹剧。他们的组织与规模程度还根本不能与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的德国相提并论，但其组织化的对象所属的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和意识形态恰恰与纳粹武装党卫队和冲锋队成员一模一样。他们有着以下共同之处：在往社会阶梯上升的路上感到闭塞，或因经济衰退感到失意与焦躁，由于丧失了积

① 《毕克斯基事件》松本译，第122页。

② 1933年4月，纳粹德国当局在报刊上公布要焚毁的德国和外国作家的目录。马克思、爱因斯坦、杰克·伦敦、纪德、左拉、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弗洛伊德、普鲁斯特……都在目录之中。纳粹宣称：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破坏作用的或者攻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德国人民动力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5月20日，焚书运动开始。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希特勒青年团员、冲锋队员，举着火炬进发，唱着歌点燃广场上焚书的火焰。与此同时，波恩、法兰克福、慕尼黑、纽伦堡都成为焚书的火海。——译者

极的生活目标而感到不安和绝望,或因缺少社会关系而感到孤独。由此容易产生对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憎恶与恐怖,法西斯主义正是以此为跳板成长起来的。“人的生活的积极源泉乃是信念,对现实的生活和意义充满热情。人若没有信念,会对生活产生一种消极的因素,即陷入恐怖。……对今天眼前的一切都感到恐怖。……有谁对社会提示一种新思想的时候,就叫喊他们是布尔什维克。……这些人并不是要证明布尔什维克是愚蠢的错误的。他们也不是在帮助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扩大,而不过是要发散对生活的恐怖感,也就是缺少信念的恐怖。”<sup>①</sup>

但是像毕克斯基事件那样,意志鲜明的法西斯集团可以高喊“我们是希特勒之子,我们要完成他的事业”。但在美国,不管他们有多么迫切的愿望,恐怕都难以像纳粹党一样去完成纳粹的事业。其任务顶多是自告奋勇当那些地方复员军人组织(A. L)、工商业会议所(C. C)、全国制造业联盟(N. A. M)等在现阶段更正统地代表“美利坚主义”的利益团体,或联邦调查局(F. B. I),以及议会中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等正式的思想警察机关的下手而已,在社会底层到处散布恐怖和憎恶,“自下”强制推进意识形态的“同质化”运动。于是,对于上述社会压力,一部分主动推进,一部分则勉强接纳,上层的法西斯化以这种形式进展。正如舒曼<sup>②</sup>具体指出

① 麦慕理:《现代世界的自由》日译本,第289页

约翰·麦慕理(John Macmurray),20世纪中期英国哲学家。——译者

② 舒曼(Frederick Lewis Schuman,1904—1981年),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1948)。——译者

的那样,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过渡过程的显著特点是“政府高级官员的位置被职业军人和银行投资家(这句话未必正确——丸山)拿到手”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表现为所谓的“赚钱专家和战争专家之联合体”。<sup>①</sup>

例如德国法西斯的“自下而上”的形态,反革命的最先锋部队通过所谓的“国民社会主义革命”掌握了权力,所以自始至终贯穿着其先锋的过激主义性格。党的首脑多是变态的狂热分子和冷酷的暴力分子,而资本家则是依靠计算资本追求经济的合理性为生命,所以他们两者未必是气味相投的同志。蒂森<sup>②</sup>与沙赫特<sup>③</sup>的命

---

① 舒曼:《国际政治》,1948年,第208页。

② 奥古斯特·蒂森(1842—1926年),19世纪末经营钢铁业发家,被称为“鲁尔之王”。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年),德国垄断资本家,1926年继承其父产业,将7家公司合并为欧洲最大的联合钢铁公司,任总裁。自20年代初即资助纳粹党,1931年正式加入该党。此后积极安排和组织德国工业巨头在经济上资助和在政治上扶植纳粹党,对1933年希特勒上台起巨大作用。纳粹党掌权后,曾为希姆莱之友会成员和普鲁士联邦政府顾问。30年代后期,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9年逃往瑞士。翌年移居法国。1941年被法国维希政府逮捕,引渡到德国,投入达豪集中营。战后德国非纳粹化法庭审讯,判其交出百分之十五的财产,作为纳粹受害者的赔偿基金。1950年移居阿根廷,著有《我资助了希特勒》。其公司现为世界500强之一的蒂森克虏伯股份公司。——译者

③ 亚尔马·贺拉斯·格里莱·沙赫特博士(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 1877—1970年),德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经济部长,因1922—1923年遏制威胁魏玛共和国生存的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而闻名于世,曾出任希特勒纳粹党政府的经济部长(1934—1937年)。战后宣判无罪,德国民主党的联合创始人。曾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1923—1930年,1933—1939年)、经济部长(1934—1937年)、军事经济全权总办(1935—1937年)和不管部长(1937—1943年)。——译者

运即证明了这一点。<sup>①</sup>“资本”接受了纳粹“革命”，乃是在其与真正的革命之间两者必取其一时所作的无奈选择。当然，纳粹党的“反资本主义”的纲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成熟自然脱落也是事实，在纳粹统治下，资本集中与垄断迅速加剧同样也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是纳粹“融合”了垄断资本<sup>②</sup>。但是这个融合不是出自“资本”的单向意愿，资本主义的利润合理性常常被作为政治军事的非合理性的牺牲品。而日本的法西斯，虽说在本质上属于自上而下的形态，但众所周知，上层对激进的法西斯的暴力性以及反财阀势力也是颇为棘手。日本的统治阶层经过二二六事变后的“整军”和将右翼团体强制性地统合到翼赞体制中去这两个阶段，才成功地驯服了法西斯“先锋队”这匹野马。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西斯先锋队的激进性和逆反性在德国表现得最强烈，在美国最软弱，日本则处于其间。也就是说，在法西斯主义生成期，因革命状况的紧迫程度而决定其“先锋队”的激进程度。同时，大家也知道在法西斯生

---

① 在纳粹的统治下，战争爆发以前，不仅工资，连商品的规格、生产量、价格都被置于政府的严厉统一管制之内。特别是对建筑资材、鞋、肥料工业等部门，下令进行亏损的生产。对企业的投资也经常是强制性的，并限制其分配利润的比例（最初为6%，后为8%），且施行强制购买一定份额的公债。1938年夏季强行动员最优秀的工人修建军事要塞，不仅让工厂的雇主支付工资，还规定必须保留其岗位，以便随时返回工厂继续工作。（参照彼得·德鲁克的《经济人的末日》，1936年，第148—149页）资本家承受了这一约束，但却赢得了禁止一切自由工会的罢工权利。说是纳粹实施垄断资本的暴力管控倒也不完全错，只是有点太笼统。一般的资产阶级毋庸置疑，垄断资本也不总是政策的最终决策者。

② 这一点可参照诺伊曼前著《巨兽》第504页、611—614页。纵观该书，诺伊曼的分析是对以下两人的看法的精辟反证。一是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认为纳粹社会是消解阶级的大众管制；另一是彼得·德鲁克认为是一种国防经济体制（Wehrwirtschaft），已经不甚适用资本主义法则。



成期,战争的紧迫性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其逆反性的程度(如上所述,现阶段的战争都是自上而下推动法西斯化的契机。如果纳粹掌权前的30年代初期围绕德国的战争爆发的话,或者其危险非常紧迫的话,那么德国的法西斯就不会是现在的形式,而应是“自上而下”采取以国防军为核心力量的形式)。

由此看来,今后美国的法西斯化的形态和进程由于相互矛盾的两个契机交错,将处于极为微妙的状态。从垄断资本吸收激进的法西斯主义能量以及军队与产业相结合这点来看,美国的法西斯主义形态会把德国、日本多多少少走过的一些迂回曲折道路终于才到达的地方作为其出发点继续向前,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非常成熟的要素。保罗·斯威齐比较了日本与美国后,也是强调这一契机,日本的军部和官僚侧重垄断资本的相对独立性,而针对这一点,他把美国的法西斯定位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军国主义化(self-militarization)。但就此来看,并不能马上断定美国较之日本或德国更容易法西斯化或其进程更快。先锋队的大众基础较弱这点有利于避免其逆反的可能,反过来,要从底层去破坏工会组织及其他自发性的结社就相当困难了。纳粹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发挥的激进性,虽然也让他们的党首感到棘手,但要想迅速捣毁所有反对派则是最得心应手的力量。不彻底粉碎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所有群众自发性组织,将之解体为碎片散沙,就不能建构起铁板一块的社会:对内可以“消灭”阶级斗争,对外可以发动帝国主义战争。不管美国工会组织的阶级意识再低,要完全剥夺工会的自治,将之“阉割”,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它主要不是依靠自下而上的法西斯群众团体的能量。要迅速达到目的,只能露骨地发动国家权力强行

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实际上若不爆发战争，一般认为美国的统治阶层还不会把这种直接剥夺自由的方法作为主要的统治方式。连希特勒不是都说了嘛：“创立新政权的时候，绝对不可缺少恐怖暴力，……但过分使民众惊讶反倒有害，它会产生憎恶。与其施行恐怖暴力，重要的是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渐改变群众的观念和感情。我们今天有收音机广播，这远比过去容易得多。”<sup>①</sup>何况，美国的大众传媒已被大企业家牢牢地掌握，今后他们一定会主要选择这种不甚粗暴的方法。但是无论怎么说，一边要维持市民的自由，一边想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逐渐改变群众的观念和感情”那还是需要时间的。

其实，美国的法西斯主义现阶段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成为国际反革命的大本营。反革命是革命的反面，革命越是具有国际规模，就越需要在国际范围发展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展开的反革命形态，如同把法西斯主义自上而下的金字塔放倒一样。也就像“自上而下”型的最尖锐的法西斯团体位于社会底层一样，从反革命的国际布局来看，越是革命状况紧迫、直接与革命势力对峙的地方，就越容易建立起法西斯统治的政权。比如远东地区的李承晚、季里诺、保大<sup>②</sup>、蒋介石政权都是此类。日本自由党政权虽然明显地法西斯化，但比以上国家政权更“稳健”一些，

---

① H. Rauschning, *Hitler speaks*, 1939, p. 275.

② 阮福映(1913—1997年)，即保大帝(Bảo Đại)，原名阮福永瑞，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第13任，也是末代君主，称号先后为安南国王(1926—1945年)、越南皇帝(1945年)以及南越国家元首(1949—1955年)，年号保大(Bảo Đại)。他的一生经历深受时代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译者

其原因也正是如此。在杜鲁门咨文的历史性演说中,声称所谓要维护“自由国民”的“自由制度”以对抗极权体制,而首先作为大规模援助对象的希腊土耳其在当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制度存在呢?希腊国王乔治二世是1936年与梅塔克萨将军合谋建立法西斯政权的一方,而继其位的弟弟保罗则曾是“法西斯青年组织”的团长。在土耳其长期是一党独裁,直到1946年才开始容许在野党的民主党参选,且此次选举是在戒严令下,严禁反对党新闻报道之下举行的。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则更不用提了。为了维护杜鲁门总统的名誉,在此想补充说明一下,对世界上如此露骨的法西斯政权,他恐怕并非积极地要承认的。这与华盛顿或五角大楼的政府首脑同样,他们也并不想认可国内的反动团体和复员军人团的活动,何况对“赤色共党”或黑人实施露骨的暴力行为。但是,如前所述,在当前这种国内外的形势下,他们担心局势更为糟糕,就只好连“本来就令人难以忍受”的现状也不得不接受了。更何况对那些意见相左的人。纳粹获得政权一年半之后,劳合·乔治曾在英国下院说过:“不久的将来,恐怕不出一两年,我国的保守分子就会期待德国成为防御共产主义的壁垒。……我们现在不必急着要责难德国。因为不久,我们会把德国当朋友来欢迎的。”正如F.舒曼所说:“西欧民主主义国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阀实施‘绥靖政策’,其真正的理由乃是,西欧诸国主要城市在制定政策时,的确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精英公然或暗中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对付共产主义的‘保险’机制而加以赞美的。”<sup>①</sup>

---

<sup>①</sup> 舒曼《国际政治》,第626—628页。

姑且不论美国政治家那批麦克锡主义分子,就是更具理性,更忠诚于西欧民主主义传统的人,他们究竟从战前的错误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呢?要么,他们被恐怖所笼罩,那就会步 19 世纪法国旧体制的统治者之后尘,“什么也不忘,什么也不学”。这将左右现代以及将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去向。

## 结 语

法西斯主义不是什么新的社会体制,也并非追求这一新的体制。所以它没有什么积极的目标及固定的政策。要说其唯一追求的目标那就是反革命。所以,反共、反犹太等大多只能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现其主张,一旦采取露骨的一党独裁体制,那么其独裁在意识形态上也是被视为恒久不变的。而且,法西斯主义靠政治谎言来笼络所有阶层。但是,在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只要一贯高举积极主动的方针,总是要和某种阶级的利益相抵触。所以,希特勒对资本家发誓说要扑灭工人组织,而对工人们则说要废除资本的剥削;对中小企业说要削弱大百货商店和企业集团托拉斯;对农民说城市的腐败和堕落;对天主教说反宗教运动和镇压无神论,对基督教痛陈天主教会的堕落,等等。在上述任何场合下都高喊打倒布尔什维克和反犹太主义。其奉行的方针和政策相互矛盾也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必然矛盾。德鲁克将亲耳听到的某一纳粹煽动者在农民的聚会上面对欢呼的群众所做的一番讲话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们现在既不去要求降低面包的价格,也不希望其上涨,而且也

不期望其价格不变。我们只是要国民社会主义的面包价格！”<sup>①</sup>这在现实上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它却以漫画的形式凸显出法西斯主义的最为深奥的本质。抽象地、“理论地”说，反革命的总体组织化过程只有在将所有社会异己分子——对现行体制可能的、现实的反对势力——凭借社会强制性的板块运动一扫而光以后才得以完成。但是，这种反对势力的出现是根底里的革命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社会革命的世界史范围的进展本身只要不停止，这种全民同一板块化的完成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这一意义上，法西斯主义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也只能在通向反革命的总体组织化途中，作为无限的运动<sup>②</sup>而存在。

由此，它的最终宿命只能是现代社会中“能动的虚无主义”。

(1952年)

### 追记：

此篇“法西斯主义诸问题”是写给《思想》杂志“法西斯主义”专辑的稿子，这次新加了一个副标题：“其政治力学的考察”。考虑到与专辑其他作者的内容，这篇文章有意识地省去了几个重要方面，期望读者能与下一篇中的“法西斯主义”条目一起来读。因为这两篇涉及的问题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基础或政治机构，或社会心理，也不是特定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发展。有关这些问题，国内外已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我所关心的是，无论战前战后，或东

① 德鲁克，前引著作，第13—14页。

② 纳粹理论家卡尔·施密特将国家、运动、民族作为国民社会主义的三个分支，并将运动(Bewegung)置于其核心，可见这一象征意义是超越他的意图的。

方西方,以各种形态出现的所有反动的政治现象中,我们从中尽可能地抽出“法西斯主义”的普遍形态,探明其政治发展的规律。被称作 20 世纪之妖怪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现象当然具有各种侧面,但毫无疑问的是最集中地表现在政治领域。然而,从理论上考察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动态,比起历史研究以及个别机构的研究要落后得多。无疑,从历史及机构上研究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十分重要,但是,富有政治远见,且就以机会主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的原理性问题,特别是为了避免为其固定的发展形态所迷惑的危险(以及,反过来那种给保守和一般反动势力贴上法西斯主义标签的倾向),就如何识别具体政治状况中的法西斯主义,即其标志如何?或者就法西斯化的进展程度,应该以何种标准来测量的问题,我们不是更应该积极地讨论和主动地发言吗?西方政治学界在从理论上分析法西斯主义时,一般是被吸收到“集权主义”的研究中去。“集权主义”这一层面的设定,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它未必止于宣传用语,不能否定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反倒容易遗漏掉“自由世界”中的法西斯化问题。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虽然是将法西斯主义作为普遍现象来看的,但与其他政治事项一样,其中心还是垄断资本和统治机构这种实体论式的把握,所以就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化方法和阶段,或从法西斯主义之前的状态如何转向法西斯主义这类力学关系的问题,探索得未必很充分。问题在于不单是要就历史上明确表露出的法西斯主义施以正确的叙述和定义,而且关键的是还要从混沌的无形状态中尽可能地寻找法西斯主义凝固的过程的规律。不这么去做的话,已有的理论在今天这一具体的地点上,无法作为状况判断的指针来发挥作用。

诚然，这一方向的研究极为困难，我所做的尝试也还只停留在入口处，特别是这篇论文中谈到的“强制的同质化”和“板块化”的问题，应该再进一步加以阐明。期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另外，虽然说不上是这篇论文的续篇，登载在《福音与世界》（昭和二十八年4月）上的“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动向”是我的一篇讲演速记，主要以现代美国为主要素材，具体讨论了若干同质化的问题。

## 第四章 民族主义·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

### 引 言

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一般以国家、阶级、政党或其他社会集团对国际乃至国内政治所抱有的表象、愿望、信念、希望等诸观念的复合体形式表现出来。通常它具有目的意识和自然成长这两个契机。其强弱浓淡分布为金字塔型，位于顶部的是具有组织性、系统性的理论以及学说，它由位于底部的非合理的、间断的情绪以及行为模式所支撑。意识形态的政治能量由底部上升，而制定政策的方向则是由顶部向下释放。因此，底部支撑不了的顶部，也就是作为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是空洞的；相反，缺乏来自顶部的合理性指导，底部便会是盲目的。但是，由于各种意识形态发生的历史不同，而且，还根据政治状况的作用不同，有较强地向顶部集中的倾向，也有底部具有强劲牵引力的情况，且其程度全然不一。一般来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从思想史上看或多或少具有向理论或哲学收敛的倾向。因这些意识形态的目标乃是要变革封建社会或资本制社会的体制，而且明确的是由该阶



级的优秀者来承担此任。拥护既存的社会体制方面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宣传体制内在形成习惯的生活样式,或惰性的政治意识——几乎是无意识的政治意识——就足够了,因此寻求统一性的意志较弱。相对于此,积极要求变革体制的意识形态要首先针对既存的权力结构、社会制度、文化,有综合性的认识,以及对当前政治状况要有全面的展望,也就是说,有一种内在的强制性要求其理论化。进步的意识形态较容易作为抽象的学说或世界观来把握,而与此相反,保守的反动的意识形态则很难从理论上把握,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然而,随着科技的飞跃发展确立了大众民主的登场,从而引起庞大的非理性情绪及行为的喷泻。意识形态的斗争较之以往,其来自底部的牵引力急剧增大。政治的象征性意义的增大,通过大众媒体宣传煽动的绝对重要性,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煽动宣传倾向都成为其主要的指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面对这种日趋明显的大众社会的问题现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登场原是以大众的自主解决为目标的意识形态,对之却未能做出迅速敏捷的反应,倒是完全被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那些阻止其释放的意识形态百分之百地利用了。其讽刺意义之大、之深刻实为历史所罕见。的确,布尔什维克借助俄国思想史之传统,特别是其最大的理论家列宁的惊人的实用主义政治嗅觉,使之免受西欧民主主义“乐观”的影响,在广阔的区域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但是,尽管遭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革命成功的地区(除去捷克以外)都限于那些科学技术和大众媒体发展得非常落后的国家,也就是没有充分经历过上述的政治结构变化的地方。而

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在这场与反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惨遭失败(就这一点,埃塞克作的明快的解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性:<sup>①</sup>那种认为俄国与中国的广大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主义,其理由与法西斯主义一样,全靠利用权力有效地控制大众媒体的通俗见解在历史上并未得到验证)。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符合 R. 尼布尔<sup>②</sup>所说的“光明之子”,将合理性与人道主义置于其政治行动基础,坚持毫不动摇地信赖群众所具有的可能性,这本身也是很自然的。也正是于此他们在现代社会才具有代表真正的并非虚假的自由与进步的资格。但在机械化时代如果他们对精神状况的现实洞察得不到证实时,一方面,他们依据的思想及理论本身在大众眼里正在化为一种象征,而对这一现实又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状态;同时,另一方面,对在理论性或系统性上较弱的各种意识形态,过低地评价掌握这些意识形态的意义,仅仅把它们归结到底层结构的问题上,或是把它们只看作是“落后认识”的产物来对待处理(反过来就表现为将其理论领域分割开来,只基于现实的政治战术上要求来利用这些意识形态或情绪态度)。

对于政治过程中纷涌而现的各种非合理性要素,既不忽视又不轻视之,更不去将之“合理化”,承认其非合理性的一面,并作为合理的观察对象时,才能找到最大限度地控制掌握其作用的门径。

下面简单的考察,乃是试图举出一个实例,即关于现代一种属于非合理性的——并非反动的——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民族

① 参见日译本《马林科夫以后的俄国》第 14 页后。

② 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年),美国自由主义神学家、哲学家,对政治、社会问题多有发言。——译者

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具有怎样的政治上的相近之处。我完全无意将自己的结论视为唯一正确的,且强加于他人。毋宁我一贯主张,不经实际验证追求这些意识形态所具备的似乎真理性的“定义”,并围绕其展开学术论证本身,就政治分析的观点来看,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基于本书的论文涉及许多日本及世界现实的政治或状况,所以,就民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想谈一些个人的观点,以及采取的研究方法等。就某些暧昧的概念,抱着对读者负责,并有助于理解论点的态度,把之前我为《政治学词典》写的解说进行了若干补充归纳到这里。我的目的是提供观察分析政治现实的工具,而不在于具体的过程叙述本身。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复合现象不仅是政治学的问题,它需要从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各方面的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相互加深综合性的理解。我仅希望能以此对意识形态论多元视角的讨论有点儿刺激,尽微薄之力。

(1956年9月)

## 1.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本来是极具弹性的概念,要下一个抽象的定义实为困难之事。正如它被翻译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或国家主义一样,各自反映了某种程度的正确性或某一个层面。民族主义顺应历史状况,可激起一种憧憬或鼓舞人心,或憎恶乃至厌恶之情绪。同时它也意味着同一个概念既有自由独立的一面,又有压制侵略之意。这绝不单纯是肆意滥用词语,而是说明词语混乱本身刻画出近代世

界史上以政治单位组成的民族国家所走过的多种多样的历史足迹。

若要下定义的话,那就是民族主义乃是立志于推进国家统一、独立、发展的意识形态或运动。所以民族主义概念具有多种意义,它与国家这个范畴的多种意义乃至暧昧性是分不开的。但赋予民族主义生命力的,无疑是被称为国家主体契机的民族意识。民族主义乃是这种民族意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单纯的文化阶段提高到政治阶段,也就是有了预想的敌对意识与行动时始会出现。所以,民族主义最初的目标都表现在统一国家内部的政治,以及针对其他国家,力求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在国际社会获得主权)。根据普遍的规范而缔结的国际社会首先在欧洲建立,由此逐步扩展到全世界。毋庸置疑近代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想还是现实运动,其原型皆出现在19世纪的欧洲。然而,今天民族主义问题主要集中的地方是亚洲非洲这些受近代帝国主义侵蚀的地域。

### 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形成

在欧洲的民族意识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历经长达几个世纪,逐渐趋于成熟,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运动成为显著的历史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其直接的起因在法国革命,主要的舞台在欧洲大陆诸国。英国较早完成国家统一,并先驱性地达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其岛国性地位在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护之下,具备各种特殊的条件。英国的现实的历史足迹显示其一贯追求的是国民利益,尽管如此,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及运动的民族主义反倒较缺乏实体性的凝聚机会。对法国革命的干涉过程,首先使法国市民的爱国心和国民主权的原理结合起来。其次,拿破仑的入侵

一方面破坏了中欧南欧诸国的旧体制,同时也引起各民族广泛的抵抗运动。以此为转机,对内,政治领导权从一少部分的特权贵族阶层独占之中解放出来,扩大为以国民为基础的理想;对外,打破了长期以来通用于国际社会的组织原理即王朝主义(dynastic principle),形成以国民为基础的独立国家意识。这两方面的动向,不久与国民的自我决定(民族自觉)这样一个统一的——其实际内容未必明了——观念相结合。如此,推动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相结合的势力是各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与知识阶层,19世纪欧洲大陆的历史正是以这种中间阶层为主要势力的民族主义一步一步排除正统王朝主义的过程。最后完成这一过程的乃是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地利、匈牙利帝国——被称为诸民族的地狱——的瓦解,在凡尔赛条约里,民族自决终于成为公认的原则。

但是,我们不可机械式地理解19世纪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结合。民族主义特有的力学很快就使之带上了复杂的阴影。法国的王党派——比如思想家杜麦斯德(de Maistre)毫不犹豫地把革命点燃起来的新的国民感情巧妙地用于波旁王朝的反革命中去。由于新兴中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很虚弱,它对工业革命急剧增大的大众压力感到恐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象征,与其说是“自由”“解放”,不如说更易与过去的王朝荣光结合起来,作为国民统一的象征以维护君主的政治生命。1848年,是正统主义的支柱梅特涅没落之年,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布号召国际大团结的历史性宣言的一年,颇具象征性意义。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欣欣日上发展的舞台后,贵族保守主义与市民自由主义双方多少进行了一些互相协调或妥协。集中表现这一倾向的是德国的统一(1871

年)。也正是从那个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踏入帝国主义阶段。巴尔干民族主义运动的悲剧即来源于它与这些先进国家存在的差距。其矛盾很快就表现在它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凡尔赛体制内的自由民族主义观念占据主要势力,事实上,全欧的巴尔干化是理所当然的历史结局。

但另一方面,19世纪后半期,民族主义的火焰也把本“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厚厚地包裹进去。义务教育的普及,选举权的扩大,工会的发展,工人政党进军议会,社会政策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增大了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工人阶级也随之被转化为体制内存在,无形中其阶级意识实际上也倾向于小市民化了。来自殖民地的巨大利润也掉进了这些无产者,特别是处于上层的无产者手中,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国民化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正是因为它露骨地直接表明了这一底层的变化而令人震惊。实际上,除了工人农民被体制彻底地排除在外,并没有均分沾到“国民利益”的半封建的俄国以外,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其表面上的言辞很激进,而实质上,他们已把对阶级的忠诚和对国际社会的连带感从属于对国家的忠诚了。最能说明这种实质性的变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第二国际的突然崩溃。民族主义以中产阶级为枢轴向上层和下层两个方向同时渗透发展,才是19世纪后半期欧洲国家内部相对稳定的重要因素。而且一方面国际秩序出现政治单位的多元化(主权国家的并存),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制的单一性与“基督教文明”具有的共性,使整个欧洲保持均衡,未引起特别重大的混乱动荡。但是这种均衡的状态在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之一变。

### 现代民族主义的状况

19 世纪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由各自独立的国家为政治单位构成的国际社会,而此后发生的三大变化,从根本上动摇震撼了整个世界。其一,美国作为世界强国跨入国际社会;其二,由于俄国的革命催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共产圈);第三,所谓的亚洲崛起。19 世纪中叶由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志尼所描绘的,或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所期待的个人主义、国民主义、国际主义相互协调的美梦被彻底毁灭。两次大战之间的 20 年,社会经济动荡不安,国际社会关系日益紧张,而生产力与交通、新闻报道手段的飞跃发展使世界一体化,也正因如此,这种动荡不安和关系紧张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具极大的冲击。在这个庞大惊人的经济和军事系统发生变化之前,诸多小民族国家丧失了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的意义。国际联盟的“悲剧”其实早已埋下端倪,一方面是因为容忍上述现象,并使其法制化(比如,集团安全保障原理),另一方面,依然固守 19 世纪原子论的国家秩序观,甚至打着国际民主之名将其极端化。新旧大小各自不同的民族国家争先恐后涌现出来,这一矛盾在欧洲暴露无遗。卡尔认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各国都是具有各自古老传统的国家,而他们在被占领地区广泛地协助了轴心国,这一事实说明古典民族主义已出现没落的征兆。《民族主义的发展》极具象征意义的是,今天世界四大强国(美、英、苏、中)都不是古典的民族国家。

当然,因此而宣告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已终结,要将世界联邦、世界国家的问题放到今天的议事日程上,姑且不论体制问题,从理论上说也未免过于超前跨越。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当前会据历

史的地理的或经济方面的近似性,组成若干个超越民族集团的权力单位,且在缓慢的进行过程中逐渐扩大。(例如,西欧圈、拉美圈、东南亚圈、阿拉伯圈)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作为向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既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其否定)以及各种形态的政治权力的推动力或抵抗力仍会维持着其生命力。与此相关联的重要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均衡,反过来会带来民族主义发展的不均衡。在西欧民族主义已衰退失去了其魅力,与此相反的是,亚洲大陆、近东、中南美这些地域,民族主义则充满朝气蓬勃的活力。今天特别吸引世界注目的乃是亚洲的民族主义。

### 亚洲的民族主义

19世纪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以往位于“世界史”波及的彼岸的广大“未开化地区”拉入国际社会之中。这一历史性的变动,给自古以来具有独自的文化传统的远东各国带来极大的冲击。而日本因种种历史条件,主动地最早接受了这一冲击,且成功地建立了欧洲形态的主权民族国家,并于19世纪末迅速与欧洲帝国主义并驾齐驱,挤入瓜分殖民地的竞争之列。但是,其他远东诸民族在受到日本崛起之刺激,开始向民族独立的方向迈进之前,或这一动向还很脆弱之际,已经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但是很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摧毁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交通网的发展或多或少破坏了闭塞的共同体秩序,在残酷的资本和铁蹄践踏之下,进入20世纪之初时,不屈不挠的民族解放运动之火开始在各地燃烧起来。在欧洲,民族自决主义的胜利、俄国革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英、法、德、荷兰等主要殖民地帝国



的势力减弱,以及二次大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经过这一系列的历史进程,现在亚洲、阿拉伯的民族运动成为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按照欧洲式的民族主义范畴究竟能做怎样的分析是一个很大的疑难问题。当然不能否定被称作民族主义的要素在这里依然起着作用。不过,若以亚洲民族主义一语概括,其实其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地域之差。且不论其内部的差异,我们若着眼于区别它与欧洲民族主义的共同特性,会发现首先这些国家及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欧洲具有极为明显的不同之处,即缺少所谓的中产阶级阶层。位于上层的是获取60%—80%超高利的土地税的半封建式的大地主,以及与诸多外国商社相勾结的买办资本。而位于下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几乎都是文盲,此外是大量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的矿工,以及主要从事原材料生产和交通业的工人,或从事各种杂业的半无产者。其中仅有极少数的小规模的民族资本、小商人、受过欧洲式教养的知识界人,所谓的近似中产阶级不过是由这些人形成的。提供民族主义的巨大能量的当然就是这些最下层的赤贫民众,他们生活在非人的生活条件下,与近似中产阶级的不稳定性一起赋予民族主义以极端激进、时而狂热的性格。为了与外国帝国主义取得有利的交换条件,持有财富和权力的少数地方统治阶层利用群众运动,有时还领导群众运动,但一旦遇到决定性的情况,他们经常勾结帝国主义扮演着压制摧毁群众运动的角色。因此,亚洲的民族主义不管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运动上都遭遇到非常曲折的挫折,“激进性”有时带有共产主义,有时又呈现出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激烈的反欧洲主义)的色彩。

与欧洲相比较,一般来说亚洲的民族主义其社会运动的性格

更强烈,其活动纲领亦显示以下共同的要素:由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消灭文盲,培养技术人员和近代工人;土地改革;扩大福利,特别是卫生设备。即使是非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也会对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抱有很大的关心与同情,这些并非属于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想从俄国寻找这一落后地区自主进行近代化的榜样。总之,正如麦可马洪<sup>①</sup>所说:他们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反对贫困、反对西方这三个反抗的结合体。民族运动的领导由谁来掌握,其结合的方法强度则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国家的阶级对立没有典型的劳资关系情况;第二,亚洲因为经历过欧洲帝国主义统治,广泛存在共同的历史命运意识,所以亚洲各地区之间的民族运动相互间有一种不能单纯以各个阶级的性格加以辨别的茫然的连带感(比如尼赫鲁和苏卡诺对中国的态度)。但也不能不承认,要把这种连带性以什么方式组织起来的动向,却由于亚洲内部传统的宗教对立和世界政治的两极化倾向等,面临着许多困难。而日本一方面是唯一在亚洲作为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西方共同发展起来,但同时,在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特征上与亚洲大陆有着近似的要素,特别是战后,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从属于美帝国主义,加深了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问题的共同性。所以,日本的民族主义呈现出西欧型与亚洲型,加之传统的要素互相交错呈现出混沌而复杂的状况。

---

<sup>①</sup> 波尔·麦可马洪(Ball William MacMahon, 1901—1986年),澳大利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国际政治评论家。墨尔本大学教授,原联合国对日理事会英联邦代表。——译者

### 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结构

民族主义本来是主张国民特性的意识形态。其内容,随着历史阶段和民族差别,呈现多种多样也是很自然的。拿民族主义代表性的理论家来看,从卢梭、杜莱齐克,到孙文,他们之间有着无数的微妙的差别。海斯主要根据历史顺序,把他们的意识形态分类为人道主义的、雅各宾派的、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全体的。<sup>①</sup> 具体的相互之间有复杂的移动关系。而亚洲的民族主义并不适于这一分类。所以,这里不去用什么主义的分类,倒是想将民族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切割开来,只专门讨论形成民族主义的必要构成要素的问题。站在这一观点上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由三个契机组成的(这点受到 F. 赫茨(F. Hertz)<sup>②</sup>的著作《历史与政治中的民族主义》(*Nationalit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1944)的启发)。第一,国民的传统(national tradition);第二,国民的利益(national interest);第三,国民的使命(national mission)。传统将民族与过去相连;利益则将之拉回到现代;使命当是面向未来。这三者的结合才能提出国民的个性观念(national character)(英国的“绅士”、日本的“旧武士”,或美国的“普通人”这类人格类型不外乎是其国民个性观念的一种具体的人格化)。

第一,民族主义中主张的国民传统是为了保存和发展国语、习俗、艺术及其他民族文化而出现的,而且强调本国历史中的抗击外

<sup>①</sup> 参看海斯(C. Hayes)的《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1931)。

<sup>②</sup> 赫茨,弗里德里希·奥托(Hertz, Friedrich Otto, 1878—196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人。——译者;

敌的传统,进而通过彰显那些所谓的民族英雄而呈现,他们都是过去提升本国的威信及荣光的领袖或将军。这种对象征的祈求往往超越社会体制和阶级,比如苏联最近的例子(将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搬上银幕)就很说明问题。民族主义以美化传统为媒介贴近浪漫主义。其政治意义或因国情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但至少历史上的保守或反动势力高喊民族主义的话,这一倾向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传统一旦上溯到民族起源的神话(强调建国神话等)就更为突出,它与使命感相结合便会呈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征兆。

第二,国民利益这一观念兼具强烈的现实性与观念性,在国内主要是克服局部的、区域的利害关系;在国际上多表现为维护领土完整和扩张这种权益。民族主义作为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而被认识,或者由上升志向的阶层所主导的话,更是会持续期求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超越阶级对立的国民利益的观念则更具有现实性,生根于广泛的民众之间。与此相反,如果体制呈下坡趋势或越是进入没落期,其观念则越易转化为一种虚伪意识,反倒是其意识形态的作用全面突出,掩盖社会矛盾,压制对各自阶级的忠诚。一般来说,民族主义包含着两种正相反的倾向:一是要均衡国内各阶层,另一种则是要将各阶层固定化。具体情况下要想知道哪种倾向更占主导地位,有效的指标是看“国民利益”这一观念的运作方式。

第三,国民的使命乃至抱负,最为彰显出某一国家的存在理由及将来的行动目标。其作用是在精神上鼓舞人民,或从精神上解除那些潜在的、显在的“人民的敌人”的武装。传统和利益均带有一种限定的、特殊的性质,相比之下,使命感则更带有强烈的普遍

化的欲求,也更为外向(常常与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相结合,多伴随着一种上帝选民的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以及在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战场上的扩大,两者相辅相成更加快使命感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其政治煽动的倾向也更为显著。未开化民族的文明化(美国的“宏大使命”(manifest destiny))也好,正教的保护和宣教(帝政俄国时代的“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也好,解放被压迫民族和阶级(法国、俄国等革命政权)也好,废除世界金权支配(纳粹德国的“新秩序”)也好,为了亚洲人的亚洲建设(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也好,其历史的、政治的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近代国民使命感的著名事例。

### 民族主义的运动形态

由于历史及区域的原因,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运动,其形态呈现得多样而复杂,这里我们仅就其一般特征加以阐述。

首先第一,民族主义运动同一般的政治运动一样,其过程都是以大众不确定的国民感情为基础,领导人将之组织为或多或少带有自觉的意识及行动,但因为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和体系较为薄弱,内在的国民感情未经提炼升华,原始地积蓄起来。这一倾向导致运动的领导人容易被这种内在的非理性的感情所牵制。民族主义运动的异常优势及脆弱都同时存在于此。也就是说,民族主义运动从爱国心的精神结构可窥视一斑:自爱主义(可扩大和投影到自己的“国家”)和爱他主义(为祖国的献身和牺牲)的感情都比较容易动员,在这一点上,它比那些单纯立足于阶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运动显然有利得多。但另一方面,其危险性在于被点燃的大众感情常常作为能源盲目地爆发,连领导人自己也控

制不住,特别是当领导人的权力不是以某种程度安定的社会阶层为基础,而是直接依赖大众的“喝彩”时更为显著。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事例,民族主义运动往往超越当初的领导人意图和目的自发地开始运作。

第二,与此关联,民族主义运动一般很可能为其他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所“利用”,而且大多不是作为独立的运动,而是表现为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意识形态及运动相结合的形式。当以国民统一和独立为将来的单纯目标时,民族主义运动比较容易保持其自身的完整性,发挥其独自的作用。一旦建立近代国家以后,民族主义运动或被卷入大国权力政治的漩涡中的区域的民族主义运动,总是会有其他政治势力及运动复杂介入其中。这一倾向与第一点所说的特性相重叠,因而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性大多并不安定,进步性和反动性同时期存在于同一运动之中,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其作用有时也会逆转。所以,不管是在学术分析上,还是从实践运动的观点来看,为了理解民族主义运动,对孤立的诸现象做孤立的观察和评价都是很危险的,必须要进行高度语境下的、有整体关联的考察。像现在日本这样,战前统一的帝国精神结构已经崩溃瓦解,民族主义的各种象征四分五裂,正以复杂的形式在国民生活的底边蠢蠢欲动之处,故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 2. 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使用时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因此也出现许多议论方面的混乱。虽然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也含有不少

不明确之处,然而毕竟以明确的运动乃至政治体制的形式可发现其特点。与之相比,军国主义更暧昧,“主义”的特点不明显。所以,尽管作为常识性的用语被频繁地使用,但以军国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方面的著作国内外皆贫乏少有。冠以军国主义之名的著作多是针对德国或日本做一些具体的历史实证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从军国主义的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依然是今后的重要课题。以下的论述也绝非是学界通用的见解,不过是希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给军国主义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我在尝试组织自己的概念时,尽量避免那些脱离一般常识的“缜密”定义,尽可能地详细解剖军国主义这个词在历史上及实际使用过程中所包含的意义是怎样形成的,厘清它与其他类似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以及关系。

如果以上面所说的尝试性意义给军国主义下定义的话,那就可以归结于“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社会为了准备战争进行或所需要的打算和制度半永久地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必须服从于这一军事需要的思想以及行动式样”。因此,仅仅是有强大的军部或有好战的对外政策,还不足够具备产生军国主义的条件。如 R. H. 托尼<sup>①</sup>所说,“军国主义不是军队的特性,而是社会的特性”。<sup>②</sup> 其特性可根据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特定的思考方式来测定。不言而喻,它不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那样的社会经济构成体制,也不是像民主主义那样覆

---

① R. H. 托尼(R. H. Tawney, 1880—196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教育家。——译者

② R. H. 托尼,《贪婪的社会》(Aquisitive Society, 1920),第44页。

盖整个社会体制的概念。与其说是“主义”倒不如说是与各种政治体制相结合下的一种倾向性，比如某个社会较多或较少地倾向军国主义。人们通常说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罗马军国主义，或 19 世纪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这倒也无妨。然而近代的军国主义特别是高度资本主义下的军国主义与中世纪虽有共性，但却与之前的形态显然有所不同。

### 近代军国主义的历史前提

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大体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专制主义君主创立的常备军；第二，在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出现的国民军或大众军；第三，即是拿破仑以后走向官僚化的国民军。专制主义的常备军主要是由下级贵族阶层组成的将校团，加上不分国籍招募的雇佣军。贵族本是很孤立的，他们把具有个性的骑士道精神带进常备军组织，由此产生以下各种概念，比如首先是牺牲、忠诚、献身、勇敢诸道德以及特殊名誉的概念；其次，对战斗英雄的崇拜；三是尊敬军刀、军服、军旗等象征。与其相反的是蔑视产业贸易以及生产劳动；依据等级对上层尊重等传统的军队精神在军国主义特点中的诸观念中固定下来。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经验告诉人们，在精神方面需要把处于底层的国民力量聚集起来，在技术方面需要证明大量兵员的压倒战术与少数精英主义相比的优越性，由此而产生了全民皆兵(Nation in arms)的观念。近代军国主义从这种新的国民军队的观念里抽掉了革命的性质，反倒扩大了旧军队的等级身份的意识形态，并在向全国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所以，军国主义在 19 世纪初与反革命相结合在



各国成长起来，特别是发展到各国都拥有巨大的常备军陆战部队，把自下而起的中产阶级革命转换为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强固的封建大地主、贵族的指导下推进近代化的普鲁士形成了典型的成熟的形态。日本的军国主义基本上也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武士阶级长时期的统治和尚武精神的传统更是一块适合军国主义发展的好土壤。一般来说，近代的战争技术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机械性，培养国民军，以国民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水准为前提。另一方面，军国主义必须压制合理性的批判精神的成长，灌输盲目的绝对服从的精神。一般而论，国民的技术知识的普及与政治意识的成长的曲线并不呈现平行状态，而是出现剪刀式的交叉现象，其交叉的角度越大，越容易利于军国主义的成长。就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军国主义是夹在大众国家与民主主义之间产生的畸形儿。

### 近代军国主义的诸种情况

近代军国主义顺应机械时代的要求，改变了前近代的军国主义性质。那些落后于时代的东西竟然奇妙地与现代化结合了起来。这种充满矛盾的结合在世界将进入全面战争的阶段之时，越发显著。军国主义已经不会傲慢地轻视民众了，他们竭尽全力讨好民众，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当今，他们在军事方面的象征，与其说表现为自然发生的名誉心或向外来敌人表示威力，不如说首先是面向国内进行确实有效的宣传工作。潇洒的军服，威严夺目的等级徽章或勋章，辉煌华丽的军乐队，这些都已不是出于实用的战争目的，它是为专门煽动民众的虚荣心，使民众对“我们自己的

军队”有种骄傲与羡慕之感而制定的。把军队式的组织——严格的等级制度、权威主义、绝对服从、坚决执行命令——视为模范的自然的人际关系，并以此为基准构成其他的社会关系如劳资关系。军队式的教育成为一般教育的理念（排斥攻击文弱）。另一方面，一边提倡军队士兵之间的友情友爱，一边又布下特务间谍组织的网络。“德国的人民在探索一种真正的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就是行进中的军队形式，至于这支部队的前进方向在哪里，其目的是什么都不成为问题。今天德国人没有了把自己视为个人的意识，正是德国式生活的象征。”<sup>①</sup>正如纳粹的意识形态所言，我们看到了法西斯的专制主义是军国主义到达的最高形态。两者在政治上和军事手段的盲目崇拜上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

### 军国主义的渗透过程

军国主义最直接的“发电站”当然是所谓的军部。但军部本身是构成国家权力体制部分的特殊职业集团，它并没有国民的基础。于是，军部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向国民以及社会上进行传达的时候，需要纯民间团体或半官半民的团体来宣扬军国主义。这种思想上的鼓吹者们通常最活跃的团体有回乡军人会、超爱国团体、标榜是军人后备或军事研究的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以及青年团、少年团组织。特别是在近代国家，——除了最高领导——原则上是现役军人不参与政治的，而上述的那些团体则取代军部，通过公开的政治运动为扩大军部势力做贡献，并起到打击抵抗军国主义的自

---

<sup>①</sup> A. Rosenberg, *Gestaltung der Idee*, S. 303.

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作用。在他们的背后,有着大大小小的生产军用设备的资本家来提供资金,或直接经营报刊杂志来煽动军国主义。而不直接属于这些“战争贩子的”资本家在面对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反抗时,感到受军事方面的限制反倒有利于处理劳资关系时,就多多少少会倾向于支持军国主义。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战时或准战争体制时,作为个人,即使是反军国主义的资本家也不得不在体制上委身于军国主义。但是,军国主义的渗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民众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具备了接受的姿态。对社会上那些无法改变地位(被剥夺了上升可能)的下层民众来说,军队这个封闭的特权阶层通常是唯一攀登或获得荣誉权力的阶梯和途径。在高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往往得不到城市里象征机械文明的恩惠,对此他们既怀有羡慕之情又有嫉妒之心,而通过编入机械化的军队,他们的挫折感会得到安抚;相反的是城市里的小市民,为了摆脱难以忍受的机械式的单调生活,他们企图在军队生活和军事体制下的国民生活中寻找更多的刺激和变化。通常,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工人阶级,他们长期受工厂倒闭或大量裁员的威胁,而当企业全面编入军事体制时,往往会给工人带来安定或重新寄托以希望,这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说,军国主义虽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要想消除其毒害,单靠高唱反军国主义或和平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够的。

### 军国主义的内在矛盾

军国主义的一个显著特性在于把本应是手段的军事力和军队精神本身作为目的。本来军事力只是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但

它却要压倒其他一切,不断膨胀扩大,以至于将综合“国力”等同于军事力量。在这个意义上,瓦兹(A. Vagts)说军国主义是“失去了均衡感觉”的评论恰到好处<sup>①</sup>。其中最为显著的不均衡是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其实,这与军国主义来源于武士或骑士阶级的精神以及行动方式有着密切关系,他们认为自己对经济没有依存性,反而蔑视生产劳动。在近代文明的高度化的同时,各种国家机能的相互依存性也有了极大增加。然而,就在这一增加的过程中,军事技术日益专业化,随着专业化,军部的本位主义结合了传统的军人精神,军部以及军事组织的为我独尊的意识倾向,直到进入近代国家后依然根深蒂固地遗存着。这种将手段作为自己的目的,导致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呈现出本质性的矛盾。普鲁士名将毛齐(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Moltke)曾说:“战争才是保持神的世界秩序之火炬。战争发挥人所具有的最宝贵的道德。如果没有战争,世界将会堕落到只讲物质主义。”<sup>②</sup>所有的军国主义共同的这种精神主义,由于其内在的矛盾,使它具有完全逆转的可能。也就是高扬的军人精神,在面对军队规范性统一性的要求之时,每个人又将打回到最无精神、最无个性的“一兵卒”上。在这种被扭曲的形态下,出现日本“皇军”的如何戴军衔章、夹衬领、系绑腿、叠毛毯等完全琐碎的形式主义。军国主义所宣传的国家国民的特殊性,基于军事力量的优越性,因此失去了本质性的基准,全部归结到兵力的差距上。一切被涂成咖啡色(国防色)，“军国主义

---

① *History of Militarism*, 1938, p. 135.

② 1880年12月,致J. K. 布伦奇利信函。

国家观的最高点就是战争，同时又是国民之间差异的最低点。”<sup>①</sup>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已丧失均衡的军国主义不管其表面如何辉煌华丽，在坚韧不拔克服危机方面却是很脆弱的。它一旦走上下坡路，就急速崩溃，且看日本与德国即可为证。但是军国主义在本质上与战争、侵略相连，随其崩溃的不仅仅是本国国民，它还会使其他许多国家的国民坠入灭顶之灾。带着“规律性的发疯状态”（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现代军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祸害。

### 3. 法西斯主义

众所周知，法西斯这个词源于意大利语，最早是古代罗马用于仪式的“束棒”名称，后来转化引申为一般“聚集”意义的法西斯（Fascio）。1919年3月墨索里尼组织的“战斗者法西斯”（Fascio di Combattimento）是今天我们称法西斯主义运动这个意义的最先例，它在1921年正式发展为政党的名称“法西斯党”（Partito Fascista）。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曾说“法西斯主义并非是出口货”，但与意大利极其类似的纲领和性质的运动在20—30年代日益高涨，以欧洲为主，波及东亚、南美各国以至几乎全世界，某些国家还成功地掌握了政权。因此法西斯主义广泛地成为这一系列的倾向和运动的总称。但是，各国的法西斯未必承认自己的运动和统治体制属于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强大的国际联盟，所谓的轴心国成立之后，日本、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统治者都强调各

---

<sup>①</sup>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日译本），第301页。

自意识形态的独立性。除了首创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外,几乎鲜有用例。这一事实暗示着其间包含一个本质性的重要意义。但仅此客观地识别法西斯或归纳其普遍性的特征并非易事,同时它又会引起各种意见的相互对立。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它是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斗争的一次大决战。轴心国的战败,暴露出法西斯主义的非法性与残酷性。战后法西斯主义几乎成了罪恶政权的代名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它被当作大骂政敌的一个口号了,因此其概念也越发混乱(比如赤色法西斯)。人们把它限定在社会科学上进行讨论的话,也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极端的定义。狭义的法西斯主义是指“极右”的政党或军部、官僚中的反动分子所掌握的政治独裁,它否认立宪主义和议会制,所以必然导致建立一党专制;在意识形态上排斥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并以高唱极权主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特征;大多数的场合,还伴随着神化独裁者,以及按照领导者,精神在社会上培养权威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易兴起的地区,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如西班牙、葡萄牙、中南美、东欧等),或是高度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近代国家形成较晚,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而社会结构还未改变,特别是农业方面,依然残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式的各种人际关系,在政治上也缺乏民主主义经验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持有这种看法的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反,最广义的定义则认为在本质上,法西斯与现阶段的垄断资本的统治体制是一样的。因此中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差别被降低到最小程度。第三国际的理论家们曾认为,所谓的“社会

法西斯论”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长期是通用的。夹在这两个极端的定义之间尚存在着多种多样不同的定义。倾向于前者的狭义定义的,原则上是否认在美国那样的国家有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有过低评价的危险。倾向于后者的往往容易统统给各种反动资产阶级扣上一顶法西斯主义的帽子。法西斯只要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另外,既然它是集中地出现在政治领域,那么,具体发生或进行的形态速度,都不是由下层建筑可以制约或限制的,它是由复杂的政治文化诸因素的结合关系来决定的。所以,至今的法西斯主义研究在纳粹和法西斯党的个别历史上的研究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从一般的政治力学角度来解释法西斯主义的研究,目前尚未取得重要成果。这也是我们今后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般背景

法西斯主义最广泛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其具体的征兆即是面对蔓延的经济恐慌以及国际性的革命有了一定进展的状况下,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的最反动的部分出现了歇斯底里的抽筋,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所以近代社会的危机都会成为发生法西斯主义的温床。以下可看作是客观的理由或因素:

- (1) 国际间的对立和战争危机的紧迫;
- (2) 国内政治的不稳定,议会和既成政党的腐败、无能、无效率等病理现象蔓延;
- (3) 由于各种社会组织僵化,丧失了其自动恢复的能力;

(4) 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

(5) 大量的失业，并出现大量的从本来的阶级以及职业技能组织中脱落的分子。

这些危机表现在精神方面的有如下几点：

(1) 面对紧张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产生的恐怖感不断扩大；

(2) 农民和城市小市民对无产阶级组织斗争产生嫉妒与反感；

(3) 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的虚无主义和对政治的不关心(冷漠)；

(4) 大众媒体切断了知识的系统性，丧失了方向感；

(5) 总的来说对合理调整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感到怀疑或绝望；

(6) 为了补偿对现实绝望和无力感，期盼出现有绝对威信的超级领袖。

以上种种契机都是很重要的。由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感，破坏了体制的稳定与均衡，统治阶层也知道靠老一套方法不可能恢复，而且这种危机感扩大到大多数国民之间。在社会主义各政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还缺乏自主收拾局面的能力时，法西斯主义的登场起到了弥补这块政治上的真空地带的的作用。就这个意义上说，它虽然没有带来“新体制”，但又不是消极的保守主义或落后时代的复古主义，它恰恰是以高度发展的技术为基础，利用反革命战争的组织化来一举拯救现代社会的诸种矛盾，并大胆地越过了旧世界。

### 发展形态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处在危机之时举起的“国际性的反革命铁拳”。其发生以及进行的速度、规模、形态取决于一定时间地



点下的具体的革命状况。首先是在某个国家内部,或其势力范围内的革命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紧迫性时,以破坏革命先锋为首要目的的好战的反革命组织大都在国家机构内部组成诸多非正式集团,或民间政党或结社。它的领袖大多是现役或预备军官将校、专业的政治流氓、暴力团团长、变节的旧的左翼运动干部,其周围聚集着落伍的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失业的官吏、没落的贵族、小卖店店员、无业人或街上的游民等由于各种原因脱离了正常的社会轨道,对这个“世界”充满愤怒和憎恨的人。这些组织或团体的活动资金由军部官僚的机密费或资本家中反动的好战集团(多数是重工业资本家)提供。这些集团之间经过自然淘汰后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或发展为具有组织性的真正的法西斯政党,或停留在最初的松懈的多元化集团里。但在社会底层,一旦有“讨共”和战争气氛的升级,他们就会起到最先制造恐怖、憎恶气氛的作用。当然,根据各个国家历史社会条件和国内外复杂的政治情况不同,其发展也未必完全一样。作为群众性组织发展起来的政党,既有停留在既存的政治形态之内,成为多个权力主体的一部分,也有全面掌握国家权力,建立一党独裁的情况。后一种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古典的法西斯,一般叫作自下而上的法西斯形态(当然,说是自下并不意味着阶级关系的变革)。

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形态是“从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能与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速度混同起来。因为决定法西斯发展速度的主要是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国际间对立的激化程度和快慢。有了这两个条件,所谓的从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就会急速发展,反之则发展缓慢,而且也不会发生自下而上的法

西斯主义变革。例如，二二六事件前后的日本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都属于前一种情况，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属于后一种（墨索里尼从进军罗马掌握政权，到实质性地建立法西斯独裁用了四年时间）。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基础薄弱的地方，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下层组织越容易出现取代法西斯政党以及法西斯先锋团的倾向。或者在那些社会主义传统较弱的国家，法西斯运动与其建立独立的政治性组织，毋宁采取寄生于资本家地主政党之一隅的形式。总之，法西斯的发展形态与国内国际的革命形式相对应，变化极为机动灵活。如果把它看作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的固定的形态那就极为危险了。具体地识别法西斯主义不仅要看垄断资本或军部或右翼政党这些社会的实体乃至制度，还应注重以下所论述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性机能，要追踪观察这种机能的普遍化过程（即并非 *fascism*，而是 *fascization*）。对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更要特别加以注重。

### 机能

法西斯的首要目标是破坏革命的先锋组织，他们以直接突袭的手段或通过国家权力进行镇压。虽然所有的统治阶级多多少少都镇压过革命势力，但法西斯的特点不仅在于其空前的数量及规模，而且在于其方法上的质的特殊性，即不仅直接镇压革命势力，并且要把革命势力得以成长的社会所有渠道堵塞住。因此，消极地看，他们通过恐吓或暴力来阻碍可能成为抵抗统治体制的据点的、民众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所有自主性团体的形成，同时，积极地大规模地动用媒体将大众统一到法西斯主义“正统”的意识形态

态和生活方式上。法西斯化的过程就是通过排除这种异己分子，强制实行板块化（纳粹的所谓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的过程，其作用可以为帝国主义战争确立国家总动员体制，那时，是否允许既有的议会政党、宗教结社、工会组织及其他压力团体存在，进而多大程度地保留或废止议会内阁制、司法权的独立、大学自治等近代制度和习惯，对法西斯主义来说都不是任何原理上的问题，只是看那些组织和制度对于法西斯主义所企图实施的强制性一体化的制约程度而定。所以，在意识形态划一化过程中，通常是按照共产主义、非正统宗教、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顺序，将每一时期相对最左翼的作为“非国民”加以排斥；但另一方面，对集中精力反共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和工会则放任不管，而自由主义的文化机构和宗教团体反而作为“赤化”的温床成为法西斯主义集中攻击的对象（比如麦卡锡主义）也不罕见。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预测法西斯主义推进的指标，与其看立宪制和自由选举制或多党制形式的存在与否，莫如看思想、言论、集会、结社，以及是否确保团结和民众之间自主交流的程度如何。

法西斯主义的这一机能不仅是针对体制反对的任何现实，而且是连反对势力（注意只是因情况相对而言的）合法出现的可能性也被堵死后才暂告“完成”。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走到这一步，严格的意义上说，才是法西斯统治的确立。它与法西斯取得政权的日期未必一致。“自上而下”的法西斯主义固不用说，“自下而上”的法西斯主义先于法西斯统治确立之前，总是有一段持续期间，即所谓法西斯主义的前期阶段（pre-fascist stage），这期间直接把持政治权力的并非铁杆的法西斯，而多是普通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或

具有反动倾向的军人和官僚(比如德国的布吕宁、巴本、施莱谢尔内阁时代;日本的斋藤内阁到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这期间逐步完善了立法镇压和广泛地委任立法以及思想警察、秘密警察等机构,一步步推进法西斯化的进程。到了这一阶段,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抵抗和心理反驳仍在国民之间以各种形式存在,所以在法西斯统治确立之前,会有不少所谓国民的希望之星和英雄担负着各种相互矛盾的要求粉墨登场,他们虽然也被寄以期待监督法西斯主义的进展,但其历史作用往往因他们的声望反而使一体化的过程更为顺利,结果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开辟了道路(看看德国的兴登堡总统和日本的近卫首相吧,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是否起着同样的作用现在(1953年)尚不可知)。

法西斯主义的强制一体化和板块化机能总是伴随着恐怖及暴力恫吓,用特务、告密制度、忠诚审查等直接间接的所有手法施展“独裁恐怖”,但同时法西斯主义又最大限度地驱使当今最发达的科技和媒体,通过宣传教育和大型集会<sup>△</sup>使“大众<sup>△</sup>的思想和感情系统地发生变化”(希特勒),所谓从内部推行一体化是其最大的特色。它将大众的不满一方面集中到特定的替罪羊(赤色分子、犹太人、黑人、假设敌国)身上,一方面靠体育活动、电影、娱乐、团体旅行等来化解。再者,将失意的小市民吸收到党的官僚组织内,在所有工作单位布下基层组织,煽动他们作为中间层的自负心,又将大量的失业者、穷困的商人、小业主、青年层动员起来作为征兵或义务劳动或军需产业的劳动力,实现一种变态的“全面雇用”。于是,大众把摆脱不安和绝望及孤独感都求助于对法西斯主义统治的盲目服从之中。法西斯主义难以抵抗的原因不仅在于其残暴和狂虐,而

且在于挑动起大众的非理性激情,在民主的幌子下实行强制的板块化,将近代国家的“主权在民”(government by consent)偷梁换柱为“一元化统治”(government by uniformity)。

### 意识形态

从哲学和理论的系统性来看,法西斯主义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类典型的法西斯总是露骨地蔑视理论和体系,其御用文人们所炮制的“理论基础”及思想谱系反倒证明了那是古今所有意识形态的大杂烩。在这一意义上,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说的话:“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大思想家喜欢法西斯”<sup>①</sup>看上去平平凡凡,却一语道破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法西斯主义还是有其意识形态,忽视或轻视这一点都很危险,会犯重大的错误。

第一,法西斯主义高唱的“主义”和口号虽然缺乏体系性,在理论上也常常相互矛盾,但从其政治机能上看却是惊人地一贯而通。也就是一切意识形态都是为了达到反革命和战争动员这一目的,并以此为前提强制国民一体化,“系统地”为之奉献。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根发芽之处,其表现为“国民社会主义”;在自由民主主义传统悠久,或从正面挑战不利的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则打出拥护“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它一方面自认为是基督教文明的守护者,另一方面在对既有宗教不满高涨的地方,它又敢以新宗教

---

<sup>①</sup> *Communism, Fascism or Democracy?* 1938, 日译本第 248 页。

的面孔来夸示自己。不是由意识形态产生政策,而是为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准备好便于利用的意识形态。政治活动中“教条主义”的危险从来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呈现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上的差异。

第二,与此同时,可以指出在变化多端的法西斯主义观念下潜伏着一定的共通的精神倾向和思想模式。例举如下:

(1) 本国或本民族至上主义的倾向(总是喜欢表现为受害妄想,或是挫折感,即被自己小瞧的“敌国”掠取了好处。);

(2) “自然的”优越者支配这一观念(由此产生人种差别和喜欢将人际关系按阶层划分);

(3) 对大众潜在的创造力和理性的思考力抱有极大的怀疑和蔑视(只把大众当作所谓操纵的对象,所以宣传煽动一味地追求低级趣味和欲望的刺激以及感情上的共鸣);

(4) 轻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就是将妇女关在家里生儿育女);

(5) 较之知性和理论,更重视本能、意志、直观、肉体力量;

(6) 对一般的进步观念冷嘲热讽加以否定;

(7) 赞美战争,嘲笑永久和平(与后三点均相关,将社会科学视为无用的或危险的,只“尊重”自然科学,而且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

当然这种精神倾向未必每一个都是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反而法西斯们并不是何时何地都高喊这些主张。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见和行动中都有一种倾斜,越是高度化的法西斯主义,这种倾向就越是激烈,看上去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会不由自主地滑落到这种

思考和感情的沟渠里随波逐流。

第三,最后我们还应该看看与法西斯主义运动和体制中暗中缠绕不休的虚无主义。要是求解法西斯主义主张和口号的公分母的话,那最后一一定是反共反犹太这一否定的、消极的要素。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对于现代的社会矛盾只知道用反革命和战争手段来对应而已。反对势力的镇压机构,其本身即是自我目的,一旦一党专政确立,意识形态上也就永远持续。到最后维持战争体系再生产成了唯一至上的政治目的。某纳粹领袖总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停地口中嘟囔着“我们要斗争”,作为个人的习性,这个段子极为鲜明地说明了法西斯主义“精神”上的极限状态。因此,“为何而斗”这一问题会不知不觉销声匿迹。卡尔·贝克尔说过:“俄国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信奉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事实。民主主义理想在美国、英国及其他所有的民主主义国家也都没被信奉,这也是事实。……但是,就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他们不去为自己的理想目的毕其一生;而对纳粹而言,最糟糕的则是他们信奉自己的理想,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要一干到底。”<sup>①</sup>法西斯主义被赋予这种“无穷动”的宿命,正是虚无主义最为深奥的根源所在。

### 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

国际国内反法西斯主义斗争是包括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阵营的共同利害问题,只有缔结这种广泛的战线才能防止其蔓延,让民主势力痛切认识到这点的是1933年德国纳粹掌握政

---

<sup>①</sup> 《自由与责任》日译本,第140页。

权以后。共产主义者一边高喊反法西斯主义，一边过于相信革命的即将到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破坏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上，有时甚至与纳粹共同组织委员会参与柏林的交通大罢工。（日本也在1931年左右，当以军部为主的极右势力急剧抬头之时，《赤旗》报居然发表荒谬的形势见解说，法西斯主义无疑提高了国民的政治关心，因而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共产主义的影子或“反照”，所以，反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埋没于反共斗争中；或没能理解法西斯的力学关系，固执于“更少的危害”这一命题。资本主义国家里德国拥有最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势力，知识水平也最高，但却没有看到像样的有组织的抵抗，败在希特勒的阵营之下，这给世界进步阵营以强烈的震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提出的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的问题，可要约为：将确保任何倾向的工会组织统一行动优先于其他一切考虑，在此基础上结成广泛的人民战线，包括左的共产党和右的资产阶级立宪政党以及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的各个组织。这一方式是建立在失败的反省之上，其本身至今仍不失原则上的妥当性，但现实中，只有法国、西班牙一时出现人民战线的问题；还有中国在西安事变后结成的国共合作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除此之外，基本上没有获得组织上的成功。综合其原因应该是以下几条：

（1）共产党唯我正确的本位主义，而且在国际上的权力政治的场面，各国共产党都接受苏联的“国家理性”的指导；

（2）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对共产主义的一种“保险”，统治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想要姑息之的倾向根深蒂固；



(3) 人民战线的意识形态基础不够明确,走不出权宜之计、“战术上”联合之域;

(4) 社民党及其系统下的工会组织有着强烈的反共或恐共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被卷进来,这场战争结成了以民主主义为旗帜的国家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联合战线,为各国内部的统一战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依然很脆弱。与其说是出自内部的成熟倒不如说是由于外部战争的压力。当然,轴心国的失败给世界法西斯主义以沉重打击,而战时的抵抗运动的功绩和同盟国的协调,也为战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民主各党派之间维持了联合,但“冷战”的激化迅速反馈到国内,结束了这一蜜月状态,同时成为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条件。战后的法西斯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国际上反革命的大本营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注意不同于麦卡锡个人的势力);

(2) 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用于国内消费的法西斯主义;

(3) 对应过去旧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存在的土著的反动势力(其实体本来具有浓厚的传统型的专制特性,但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行使着法西斯主义机能);

(4) 主要表现在旧轴心国的一部分,继承了排外主义传统的新法西斯主义,它们以种种复杂的形态出现,而且还不得不打着战后世界的公约数“民主主义”的旗号,所以更是难以识别,因而在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斗争的主要目标和力点的置放上引起种种争论。

但是,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机能只要是我们上述的反革命和为

战争的强制性一体化,那么,对之有效的抵抗就不单是政党和工会那样的正式集团间的联合,而是以此为基础,民众间自发的——未必直接与政治有关——小集团的多样化形成,其相互间活泼地展开自主的交流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拥护思想、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成了无论何时何地统一行动的最低同时也是最高的纲领。以大众国家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无不是从民主主义那里窃取“大众参与”这一因素,靠其集团的压力践踏个人所固有的基本人权。大众不可能欢呼自己的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这一单纯的乐观主义,会在法西斯主义制造的“群体的制度化”<sup>①</sup>的魔术前轻而易举地崩溃,可以说这一事实正是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学到的最大教训。

(1954年)

### 追记:

这篇“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主旨基本在前言里说尽了,我在考察这些问题时,主要是从上层建筑出发,而且将重点放在其精神倾向和运动上,并没有去注重政治制度本身。在讲法西斯主义时我们前面已经就此实践了不少。比如像军国主义这一概念,如果纯粹从意识形态和思考模式来抓其特征,当然估计会有不少不同意见,将军国主义界定为某一社会的思考及行为模式的特征,那并不是说没有采取制度的表现,或与经济基础关系不大,而只是意味着不具备与经济基础的单向的对应关系。一般来

<sup>①</sup> 参照 E. Lederer, *The State of the Masses*, N. Y. 1940。

说,经济基础的历史各阶段全面进入某一阶段后,不存在再次返回先前阶段的可逆性。比如,我们无法想象到了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体制会再回归到自由竞争阶段。因此,如果军国主义意味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一阶段所照应的政治制度的话,那么这种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是可逆的。就法西斯主义来说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过去曾存在过一种想法,把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的体制来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过渡到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在历史上是更为高度的阶段,所以,随之而来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了。)而现实中,历史已经证明,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都在资本主义体制上完全是可逆的。而且,如果要想从经济基础上来界定军国主义,它在历史上的脉络比法西斯主义要更模糊,所以很容易陷入一个结果:将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民经济的军事化,笼统地包纳在军国主义的名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的国防体制是不是可以视为军国主义呢?军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手段的目的化,其特征是把军事体制视为一种常态,所以,通过战争而建立的总动员体制,在社会意识之中始终是一种临时的非常态的话,那么无论军部的发言权多么增大,国民生活的军事化多么进展,我的见解还是不能将之称为军国主义的。如果要否定军国主义这一范畴本身,或要想把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加以运用的话,那么,类似的其他概念,比如帝国主义或总动员体制等容易替换的用法,应极力加以回避为好。

## 第五章 “斯大林批判”背后的 政治理论

### 1

因为有真理和利害关系的冲突,将人与人作比较时,总是难以像几何学的圆与线的比较那样有着清晰明确的认识。发出这种感叹的是三百多年前的托马斯·霍布斯<sup>①</sup>,其深远意义在于这一叹声正是发自英国革命酝酿的激情当中。

不是说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变得极不稳定,也不是这样那样的小问题,而是在社会“原理”本身遭到质疑的时代里,挑战与被挑战的利害关系绝不会止于狭义的经济层面,多年来扎根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人们毫不怀疑的价值观,同时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所以,所谓的慢性热病状态正是这种时代的精神特征。眼前的变化过于目不暇接,过于巨大怪异,因而人们对频频发生的事件的意义要放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而这之前,事件的心理冲击

---

<sup>①</sup>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 1588—1679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他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译者

首先就给人以震慑。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是多么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人们指责中世纪末期的宗教审判的荒谬、教皇政治的腐败,以及圣巴塞洛缪节大屠杀<sup>①</sup>的残忍时,都不会立马怒气冲天,拼命辩护吧。或者对于长老派教会的牧师,你说加尔文<sup>②</sup>在日内瓦创立的政治体制为典型的“集权主义”的权威体制,他焚杀塞尔维特的做法怎么看也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他们恐怕也只会坦然承认之。由此我们知道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新教徒都不会拒绝承认英国的历史学家下面一句话里所含有的真实性:“对宗教战争愈加分析就会发现其本来意义上的宗教要素愈发稀薄。”对法国大革命也一样,历史学的解释至今仍争论不休,但这种学术争论直接带有政治意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国大革命及随后外国的干涉战争的过程中犯下过多少暴虐和愚行,可无论再怎么全力指责弹劾之,人们承认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作为当今文明世界的公理而通行,另一方面在这个把攻占巴士底狱之日作为国家纪念日,将马赛曲作为国歌的国度里,能拍摄出让人们为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掬一把泪的电影也不足为奇。

然而,就俄国革命及其种种的连锁反应,遗憾的是当今世界似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间隔从这一革命带来的心理冲击中恢复过来。这当然不是说革命后四十年这一自然时间的经过。四十年可

---

① 英文为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指 1572 年 8 月 24 日法国的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杀戮事件。——译者

② 约翰·加尔文(Jean Chauvin,1509—1564 年),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著有《基督教要义》(徐庆誉,谢秉德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译者

以认为是才四十年,也可以说已经四十年。但问题是对于俄国革命所提出的挑战,当今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当然如此,可就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至今也未能给予一个充分的结论,也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的种种争论今天仍旧带有活生生的现实性,它动摇着我们的所有存在。无论怎么高度评价苏联及中国革命达成的事实,但也不会得出结论说要立刻将他们的模式移植到自己的国家来,反过来倒是一个劲儿地来找其漏洞,但又不会因此丝毫减少每天充斥报刊版面的权利腐败及丑闻以及失业贫困带来的惨事。尽管如此,这一“新世界”所经历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引起阵阵波纹,名副其实的“非他人事”也。拉斯基所说的俄国革命的“莫大成果”与“莫大代价”至今在人们心中尚未找到适当的平衡点,对应利害关系和立场以及局面的冲击,或是正面因素在心理上的增加,或是负面因素加以放大。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政治上越是高度紧张,则言论及批评也越容易归结为敌我两个极端,双方都在将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言行事无巨细地当作宣传材料,而且实际上动员后,对于共产主义及苏维埃制度的所有认识及评价都不是看其真伪,而是先顾忌其社会效果(在敌我方面做出判断),或臆测那些做出认识和判断的人的“背后意图”。于是,一方阵营里增添的见解立刻会招来另一方阵营充满憎恶的反击,所谓出自严肃的客观批判,不少也会受到这种政治磁场的作用,不知不觉地转移了自己的立场。各自阵营内部都出于一种警惕和害怕“被敌人利用”的心情,一半自发地、一半强制性地地进行同化,保持步调一致。随着冷战的深化,美苏两国在国内体制的兵营化上愈发呈现出类似的情形,这一奇观已经被人们屡次指出过,但那也只是上述那种更为广泛更为

长期的危机状况,亦即显著的局面之一。就苏维埃体制和共产主义的根本问题或是全面攻击或是全面拥护,换言之,认识和价值判断的“集权主义化”倾向早就存在于俄国革命以来的世界中。对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足迹,不去从其所肩负的历史条件和所处的社会及政治状况的相互作用来看,把一切都归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其“本质”上的演绎,乃至“必然的”发展,而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旨意——哪怕这是立足于“科学规律”,或等同于“试图征服邪恶世界”——视为万能这一点上,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铁杆的反共主义者的理论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一致反对”,这本身正是现代政治状况和其酿成的精神气候的一种表现。

## 2

从苏共二十大上的“斯大林批判”到中共提倡的“百家争鸣”,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广泛的“自由化”倾向为这种慢性的热病状态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一般革命势力不仅要对抗国家权力,而且要与旧体制作斗争,因为旧体制任何时候都能广泛动员那些非组织的社会势力,诸如社会传统化的习惯和象征,深入人心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形态等。所以革命势力要求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保持牢靠的团结和纪律,从而使领导人的权力和象征更为集中、更为合法化。这种需要当然是随着旧体制的挤压和围剿的程度而愈演愈烈,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也因局势及变化的程度而高涨。在这一意义上,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清教徒主义和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也曾经是“铁板一块”似的,都不亚于共产主义,其生态及病理也极

为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各自的历史社会及思想武装上所带来的不同）。以上情况不光适应于革命政党的组织内部中，也适合于国际革命运动中的集中与分化的关系。对共产国际历史有着严峻批判的研究者弗兰茨·鲍克瑙<sup>①</sup>早在其三十年代的著作里就指出：将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特征单纯地视为“来自莫斯科的指令”的结果，其实是重大的误谬，毋宁说“在俄国以外的地区只要是存在着一定力量的革命势力的话，不管俄国革命的威信多么高，这些运动未必都接受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他以库恩·贝拉<sup>②</sup>、罗莎·卢森堡、保罗·列维<sup>③</sup>和中共的例子来实证这点，饶有趣味的是“实现革命的机会愈加渺茫的地方，才会对已经完成革命的俄国愈发崇拜。”<sup>④</sup>

集团的力量能够产生相应的安定感，这种安定感又能够强化自主性——未必是排他性的——并且祛除内部成员的恐惧感：即个性与自主性是否会危害团结的问题，而且由此还会促进多样化。

---

① 弗兰茨·鲍克瑙(Franz Borkenau, 1900—1957年)，奥地利作家，1921年参加德共，1929年退党，抛弃了共产主义，并开始激烈地批判共产主义，纳粹上台后流亡国外，1947年返回德国。——译者

② 库恩·贝拉(Kun Bela, 1886—1939年)，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犹太人。1919年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侨居奥地利。1922—1923年在乌拉尔做党的宣传工作，后任俄共(布)中央驻共青团中央的特派员。1936年被指控阻挠执行共产国际七大路线而被解除一切职务，并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于狱中。1956年恢复名誉。著有《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库恩文章和讲话选集》等。——译者

③ 保罗·列维(Paul Levi, 1883—1930年)，德国犹太人共产主义政治领袖。他在1919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遇害后担任了德国共产党领袖。——译者

④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38, p. 416 & p. 418.



这一系列的螺旋式发展过程，当然共产主义国家及其运动也概莫能外。苏共第二十次大会昭示了两个重大事实，一个是苏联领导人享受了他们从未体验过的国内外的安泰局面，另一个是提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以斯大林批判为标志的“新路线”。不用说，这两者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斯大林批判的方法与内容，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提出最为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有二，一个是在西欧拥有最强大势力的意大利共产党，另一个则是仅次于苏联的最强大共产主义国家（为方便起见采用通称）中国，这决不是偶然的。当然，在现今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批判”的影响因其自身的政治力学而不断扩大。第二十次党代会再次向世界活生生地展示了上述俄国革命的“巨大收获”与“重大牺牲”的两个方面，因而反苏反共势力立即大肆宣扬苏联领导人自己首度“公开承认”了后者，即负的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拿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6月4日），就是这出戏的高潮。苏联领导人敢行此举，当然是充分考量了“斯大林批判”在政治上的正面和负面效果，然而最终还是为当时国际上的强烈反应所影响，渐次开始强调必须警惕“被敌人所利用”的一面，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的论调也都反映了这一点。

“斯大林批判”的思想意义本来就具有双面效应，一方面不仅仅是给那些将斯大林半神化，并为苏联国内外政策不遗余力地进行辩护的世界共产主义者及其无条件的支持者以铁锤一击，同时也是历史对不少反共者提出的一种批判，这些人将苏维埃和共产主义的某一历史阶段加以固化，或者将所有政治共享的法则或倾向悉数归结于苏联或共产主义的原理或本质属性。然而，前者至

少从一开始就未曾遮蔽，也遮蔽不了其所受的这一冲击（比如，6月24日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发出声明：“我们首先对赫鲁晓夫演说中所揭发的情况大为震惊。……我们是对我们国内自己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负责的，我们向他们坦白承认，我们曾经不加批判地认为苏联的许多外交和内政政策是正确的，而现在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是错误的。”<sup>①</sup>而后者似乎大部分依然坚持本质性的不变论。当然，要理解苏维埃及共产圈国家“自由化”下的所谓“自由企业制”和完全向西欧政治制度的议会制复归，那无疑强人所难。此处不拟探讨此类制度论；重要的毋宁说是其现实效用，即，片面强调这种“不变论”反而强化了共产主义者的“本质不变论”，容易招致双方意识形态各自僵化这一恶性循环。——如下文所述，在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变这一命题下，本文多倾向于尽可能地局限在“斯大林批判”中所包含的问题内。美国的一位大学教授在去印度旅行的途中，偶然于二十次大会前后在莫斯科逗留，广泛接触到了市民和学生，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印象：“有人自由地……谈论，那样子仿佛是说，这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在今天可以谈论种种以前不能置喙之事，倾吐郁积于胸之情了”，但是“其他人却仍然生硬而节制，字斟句酌，危险的和可能被认为是不谨慎的事都刻意避开……活像一国的代表对着另一国的大使讲话”。<sup>②</sup>这或多或少反映了现在各国共产党员中存在的两种类型，而且这两个面向也交错出现于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行动方式上。其中哪一种态度

① *Political Affairs*, July, 1956. 中译文据“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56页。——译者

② Paul Baran, On Soviet themes; *Monthly Review*, July-Aug. 1956.

会成为今后的主导,哪一个方向能得到发展,并不只是共产主义阵营单方面的选择所能决定的。问题既然深深根植于世界政治的最根本之处,那么“斯大林批判”所包含的思想意义能否取得充分的历史性成果,这一岔路口上的选择也与西欧阵营或者非共产主义者的回应方式密切相关。

因此,对“斯大林批判”的任何批判和评价,如果是在俄国革命以来围绕共产主义而生成的思想氛围的单纯延续上做出的,那么必须说,这种批判和评价本身就埋没了“斯大林批判”的本来的历史意义。相反,对于“斯大林批判”的批判,只有通过深入挖掘考察在上述的思想氛围下发酵的思考及行动的模式(pattern),才能在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共通的基础上探讨其中包含的问题,并从中引出共通的学术课题和政治经验教训。若不如此,有关反斯大林化的众声喧嚣的国际性讨论就只是划出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而已,一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福音”之诠释的依然故我的教学式问答,另一条则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全然超越一切的“请君入瓮”式的“批判”。其中流淌的旋律不外乎是僵硬的两极化的新型变奏曲。

我想以这一反省作为前提,同时亦作为结论,根据迄今为止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发表的有关“斯大林批判”的文献材料,来探讨一下其中蕴含着怎样的政治认识的问题。这样做,就自然要对此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政治过程的方式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既不是针对某种立足于实体性意识形态或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不是对苏维埃或人民民主主义体制本身的探讨。当然,就我提出的问题,各位可以从自己的立场上与马克思主义或共产

主义的“本质论”相联系，这是各位的自由，而且我也无意否认我的“批判”中必然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但是，我的尝试是将那种世界观的立场和本质论加上括弧，把共产主义者——而且是国际上顶尖的共产主义者——围绕这一问题的论述，尽可能地置于普遍性的政治法则这一显影液里，以期显现出某种定型化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正如我一再重申的，这种思考及行为模式未必是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所特有的。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体系性及其党派性的见解，在上述两极化的精神状态中发挥作用时，有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要将自身表现为一个封闭的完·结·体，因而即使是受特定政治状况制约的精神倾向或政治手段，也会被纳入其本身的“世界观”之中，或者很容易用“斗争”的必然性将一切都合理化。不容否认，这种倾向迄今为止不仅阻碍了不同学术立场的相互交流，在实践的层面，也使政治手段难以自我控制，结果愈发促进了反共论的“集体主义化”。我们首先要求共产主义者将“政治逻辑”与世界观分离开来，作为他者去认识，其根据就在于此。这才是解放僵化的意识形态的第一步，亦即真正意义上的解冻，而且，这决定性的第一步在关于“斯大林批判”的讨论中已经迈出了，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

## 3

苏联现任领导人初始批判斯大林的方式中，正如各方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只是着重于个人崇拜的一面，从而陷入一种单纯化，即将过去的大清洗、为所欲为的决定、官僚主义以及卫国战争指挥

的失误等负面问题都归罪于斯大林,而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高速发展和对德战争的胜利等好的方面完全归功于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周围的苏联人民的英勇奋斗。一方面力陈创造历史的是大众而不是个人,另一方面却又单单否定大众与历史中罪恶因素产生的关系,这显然是荒唐的。同时其中还隐含着一种循环论证,即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之于集体领导的阙如,反之又从个人崇拜的角度来说明不重视集体领导。

对于这一疑问,首先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其中用个人崇拜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这一含蓄的说法,使问题的解明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特别是由于6月4日美国国务院披露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造成的冲击,以陶里亚蒂为首的世界主要共产党的领导人都不得不将斯大林崇拜的成因作为各自自身的问题来加以探讨。这些探讨都是先从表明不满开始,批评这之前苏联当局的发表或说明。苏联首脑对来自“敌人”的批判从来置之不理,或者揭露其意图予以回击,但对于各兄弟党一起提出的疑问和希望却不得不做出回答,于是,其表现为6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份报告总结了个人崇拜的成因,认为:一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客观的历史条件;二是同斯大林个人品质相关的某些主观因素。这里暂且不拟历史性地探讨报告中所列举出来的各种具体原因,诸如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迫于国内反动派及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不得不采取的集权化、进而制约了另一面的“某些民主主义形式”等等。毋宁说,问题首先是主观

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是通过何种媒介因素联系起来的。实际上，政治上的各种核心问题都介于其中，如：个人性格与客观情况的关联，领导与被领导间机制相互作用的关系，正式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小圈子的意义等。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不仅个人崇拜，连重大的政治事态也将会在以下两个方向被淹没：一是宏观的客观形势论或“体制”论，另一是领导人天生的内在素质论——其极端就是恶人论——比如斯大林被指责为“个人丝毫不具备谦逊品格”（《真理报》3月28日论文）、“缺乏最起码的谦逊态度”（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确实如此吗？我无暇重新分析斯大林的性格，但是种种证据表明，至少如他那样长期掌握最高权力，而且创造了如此历史伟业的政治家，并没有被虚荣心俘获，哪怕与历史上的独裁者相比，其自我克制的能力也并不逊色。托克维尔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评价“他对人民保有抽象的尊敬，但对自由却没有什麼好感”，可以说也适用于斯大林。另外，关于他“病态般的猜疑心”，赫鲁晓夫举出了些例证，然而即使承认那些事实，将之仅仅归于个人属性，也完全解决不了问题。现今世界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在倡导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但在紧张的政治形势下，如何从实质上区分革命的警惕性与猜疑心，是很困难的——当然，反革命的警惕性也一样——只要想想日共的内部分派问题就足矣。事实上，尤金·丹尼斯这样评述1934年以后的大清洗：“搜查‘人民敌人’的工作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使得事实上所有持反对的和重大的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了怀疑”，而且“虚造口供和捏造证据等可怕的现象，成为叶若夫、贝利亚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所利用的疯狂猜疑和歇斯底里气氛的邪恶产品”。（6月18日

美国《工人日报》))

而且,某一紧张的政治形势所造成的心理氛围本身就是自律性运动,其中凸显出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即使在种种客观条件改变以后仍会持续保持其惰性的存留。我们不能忘记,1934年肇端于基洛夫暗杀事件的党内及国家机关的大清洗和恐怖时代,是在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富农,国内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被“解除武装”,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之后,即社会主义巩固了其体制的基础(斯大林宪法就是其在法律上的确证)之后才达到顶峰的。(当然,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日德法西斯的威胁也是斯大林与 OGPU<sup>①</sup> 大权独揽得以合理化的根据)

赫鲁晓夫报告也说:“由于许多党和苏维埃以及经济工作领导人遭到逮捕,我们许多干部开始对工作失去信心,顾虑重重,害怕新鲜事物,甚至连自己的影子都提防,在工作中逐渐消沉下去”,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大清洗造成的心理冲击,而且本身的运转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事实”(姑且不论他自己在怎样的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理论意义)。但是,将此类怀疑、不信任、恐怖等政治力学委过于特定的个人性格和精神是极其严重的问题,而且此类政治力学也未必是某一特定的社会体制和组织所固有的。比如,上述丹尼斯的言论中,如果以“国家公敌”替换“人民公敌”,以“参议员麦卡锡等为台湾政府游说的代理人<sup>②</sup>”替换“贝利亚以及帝国主义的其他代理人”,几乎原封不动地就能适用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

① 全称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译者

② China Lobby,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为台湾代言的游说团体。——译者

美国。

各国共产党以此次“斯大林批判”为契机展开的国际性自我批判,显示了共产主义者在政治行动中的心理倾向上的显著类型性。比如尤金·丹尼斯指出:“我们常常不能容忍许多劳工的发言人和自由主义发言人的批评性意见和看法。我们经常把诚恳的工会工作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当作职业的反共反苏诽谤者的批评”<sup>①</sup>(前引文章)。英国共产党的詹姆斯·克鲁格曼“反省”道:“即使认为其政策是错误的,不,哪怕是毁灭性(disastrous)的,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叛徒。但是这种扣帽子的倾向太过强烈。个人的意图不是事实问题。现在还没有发明正确测量人格诚实程度的诚实测定器(sincerometer)。完全有可能坚持破坏性政策的人作为个人是完全诚实的。”<sup>②</sup>然而,这种给不同意见和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贴标签的倾向,以及立即臆测对方的“险恶用心”的思考模式,大概不会只是美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者独有的现象吧。另外,《真理报》社论(3月28日)所说的“在这里(指斯大林体制下——丸山)发展和推进理论,可以说出某种独创性新东西的人唯有斯大林一个,其他人被认为只应该普及斯大林阐述的思想,解释他树立的方式”,直到最近,这一倾向也仍然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共产主义者共通的事实。因此,将这种“缺陷”仅仅归咎于某一特定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水平低下,或者只是推到单个共产党员的修养不足上,换言之,逃避到特殊性中去,或者用道德主义来消解问题,都不

① 中译文据《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37页。——译者

②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s, *Marxist Quarterly*, July, 1956.



是真正解决问题的途径。——无论是共产主义者的自我批评，还是反共论者的批评——从上文最后的例子中时常总结出来的“教训”就是不应盲从权威。盲从权威不好，这是明摆着的事。那么，不盲从权威，变得更加自主，就完事大吉了吗？个人崇拜不仅是崇拜特定的人格，而是表现为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将斯大林理论绝对化，难道是因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天生具有“权威主义者的性格”吗？正因为斯大林理论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团结的象征而发挥作用，所以同一阵营内对该“理论”的任何质疑都被认为是破坏团结的。凡恐惧和警惕是否偏离了党的路线的地方，就会不断出现思想和言论向上层看齐的倾向。这样各国党员与党干部要保持一致，就不得不上升到党干部与社会主义祖国苏联要保持一致，进而更上升到对苏联共产党最高权威要保持一致。锡德尼·韦布所谓的“正统病”(disease of orthodoxy)就是这样蔓延开来的。当然苏联的正统病也要考虑到其特殊的思想遗产，即在俄国帝制时代希腊正教就是与国家权力合一的，正如日本共产党反而继承了“国体”正统性的思想遗产一般。但是，如本文开篇所暗示的，世界规模的共产主义者的正统病一方面是一种革命团体的心理习性，因其仍然相对地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思考模式的产物，以为政治状况的紧迫性会在相互对抗的两极上同样刻下烙印(在此意义上可类比“自由主义”的忠诚审查等一连串的正统主义化)。于是，对上述这种“异口同声”的势头，反过来就是说“我们拒绝相信任何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严重的不正义的行为的消息，并且认为这是诬蔑”(前引丹尼斯论文)，这也是作为一种共同的倾向显现出来。比如：列宁对斯大林任总书记抱有警惕，

留下了著名的《遗书》；苏联内部集中营的存在；大清洗甚至进行到了无视斯大林宪法规定的程度。一言以蔽之，此次《真理报》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的大部分事实在“资本主义世界”几乎都是已知之事，并不能够称之为“秘密”。只是这些事得到了苏维埃最高领导人的承认时，全世界的共产党也才予以承认。事情不仅仅是新闻界的情报。尽管反复强调也向敌人学习，但经过千锤百炼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出自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学术成果，除了为确证自己的见解，或者为了反驳以外，一般都没有想要“学习”的意欲。同样，这种倾向在国际上也很明显，在关系到苏联和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时，表现得最为显著。此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理论领域，或者已经给出经典定义的问题上，这一倾向尤其强烈。那大概既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气量特别狭窄，也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欠缺自由思考的缘故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而出现，也许未必有其逻辑的必然性，但只要两极化的精神冲击继续存在，那么学术论争的层面与意识形态斗争的层面，实质上就会互相交错。所以无论好坏，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层面上很大程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价值而发挥着作用，其结果，担心堕落为“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总会优先于那种主动而大胆地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成果。这样看来，上述的一系列行动方式的类型都或多或少与现代的政治状况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因而这些行为既不会因马克思主义者的忏悔而消灭，也不是像非马克思主义者自欺欺人地认定的那样，与自己的阵营“毫不相干”（实际上，现在那些西欧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嘲笑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封闭性，在心理上排斥诸如垄断资本之类的术语，并未仔细斟酌

“公式”的正当性,就安居于他们自己的“公式等于误谬”这一“公式主义”之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正因为这种心理倾向有着深厚的基础,所以在意识层面上要不断地将之“隔离”开来加以认识,这点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的研究及大众媒体的报导,无论你说它受偏见左右,或只会中伤诽谤和造谣生事,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己阵营的研究和报道来认识和判断这一课题,其结果就会像这次事件中显露出来的那样,“不知道的就是丈夫一个人”,冷不防面对这种不利的事实,当然会受到强烈的冲击。最为重要的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只会使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嗅觉变得更加敏锐,而根据所有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去积极地辨别真伪的能力却反倒从未得到锻炼。总是以为对于生死攸关的问题提出各种不同见解以及理论解释的多样性会使团结涣散甚至资敌(这种可能性或多或少总会存在),倘若一味助长这种警惕性,那么即使不是先天的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也会渐次养成向上看齐的习性,变得越来越权威主义。上文所说的政治状况与人际关系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模式,绝非命中注定的必然。但是,如果不先将这一层面的问题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条件中剥离出来,使之“规律化”的话,那么依据客观形势,就会说:“那是那个时候的事”,而基于个人品质则会说“所以大家都要成为好人”,这就完了。这么做,就没法指望从公众的角度来管控上述种种负面效果的。

因此,如果回到刚才斯大林的缺点以及大清洗的问题上,首先面临的课题是,既非要区分居心良否,也非求救于“主义”与“世界观”的先天正当性和完结性。仅仅宣称革命的警惕性很好,猜疑心

不好,等于什么都没说。前者在何种状况下会转化为后者,这一微妙的转换点只有根据具体的政治过程加以辨明,才能作为今后的教训积淀下来。领导人的类型和素质的优劣因组织性质而异,而且根据组织化的阶段不同——即获得权利的阶段和安定化的阶段,进攻阶段和防守阶段,危机状况和平常状况——其政治功能也会转变,因而其本身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可是,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虽然也直觉到那种政治人格的动态和组织化过程作为链接宏观的“客观形势”或经济过程,以及具体政治行动的媒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只是将那一层次的问题作为个别而具体的战术来处理,所以复杂的政治状况没有被充分地抽象化为一般的典型。亦即是说,本来应该是最高度政治化的马克思主义却将政治维度的重要问题放到“经验主义”上来了。特别是从唯物论的角度来看,把握个人性情与行为模式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努力容易被斥为本应唾弃的“心理主义”,结果就表现为对具体人物行为的理由,常常只能以粗陋和非现实的“说明”来应付,因为这决不仅限于斯大林的性格论述。比如,正式宣布贝利亚和伊藤律之流是“叛徒”时,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运用“追溯法”式的逻辑,认定他们从当初就带有邪恶的品行和意图混入运动,在组织中稳步实现自己的目的,最终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他们是否是叛徒姑且不论,但是这种“逻辑”显然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问题推进到这里,也就是无论如何必须要将那种只拘于现实的思考方式置于更为普遍的框架下,来考察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他们自觉与否。

如果要挖掘上述那种追溯法得以发起的源头,就必然会遇到“本质显现”这种思维模式。简单地说,就是“终于揭露了其本来面目”。这是坏的方面,反之如果用于大众政治意识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历史过程时,则是“逐渐发现了其本来的性质——扫清了来自外部的阴云”。先天内在的东西显现出来,这种逻辑作为发展观来看是一个有机体,作为规范逻辑则是自然法式的思考,由于外部(状况)的刺激,内部(主体)本身发生变化,然后由于“内部”的运动和作用,“外部”本身也发生变化。没有这样的契机,怎么能称为辩证法式的思考呢?

比如,关于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共产主义者的一套做法是,从当初将美军视为“解放军”的观点急剧转变为“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而且按照上述的追溯法去解释,好像“民主化政策”的一切都是从美国统治阶级的“本质目的”中流溢出来的(最近大部分得到了修正)。当然,有超越学术问题的“政治需要”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但也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方法中存在着这种倾向性,而且即使是“政治需要”,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经常是根据情况而变的机会主义对策,连这些也都被视为围棋名人那样有计划的布局,那就对美国的前瞻性评价得过高了。即使是大众的政治意识,也都缘自本质显现理论的“逐渐革命化”这一长期观察,从而无法充分钩稽出随着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转变而出现的大众意识和行动的高潮及低谷的波动。如果无产阶级“本质上”是革

命的，而且共产党永远是革命的先锋队，那么具体的革命的失败当然就只能用共产党以外的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背叛来解释。从过去就一直反复强调说，不能一下子将过高的设想强加给大众，但在实践上却强加给了大众，这是为什么？有人想强加就强加了吧。此人是打算让大众之中先天内在的革命性显现出来。我不是说共产主义者整体都如此，也不是说这就代表了一切。至少从经验上来看，这种思考倾向执拗而纠缠不休，而且——虽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其中存在着的问题不能仅归咎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幼稚性。

马克思主义者“警惕”人们探究政治意识和人格构成的力学关系，其中还有如下两个缘由。（那种认为此类研究是向颓废的帝国主义的科学俯首称臣的政治性的理由不在我们讨论之列。）第一，那样做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要凸显出人的下意识和行动之非理性，所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的合理主义。第二，是那种可称之为“基础体制还原主义”的思考倾向。第二个问题将在下文联系组织论的问题进行讨论，此处先简单地谈论第一个问题。

一般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总是尊重思想原则，坚持在理论与方针上实施政策与实践。这的确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资产阶级政党所没有的重大特色和长处。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新闻界观察所谓共产圈国家和本国的共产党的事件时，由于只是使用自己手头的那一套方法来进行判断，诸如对虚无的权力野心勃勃、争夺领导权，以及操纵群众等——再加上他们欠缺历史的视点和前瞻——从而也陷入公式主义之中，无法以发展的眼光把握世界的大趋势。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

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原则和方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往往估计过高，并且依凭一种乐观主义：“对我们而言，政治就是将科学运用于现实”，所以将现实中犯的错误和蠢事最终都归咎于对思想和原则的无知或者错误运用，于是没办法从正面考察这一问题：何以依据本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但在现实行动中却背离了它们，或者将问题推到文学领域。

说斯大林蔑视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单一人物的决定经常或者几乎总是片面的。得不到集体的检验和纠正，单一的个人做出的决议百分之九十是片面的。党中央委员会作为领导苏维埃及其党组织的一切事务的领导机构，共有 70 名中央委员，他们各自都能贡献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决定是由个人做出，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sup>①</sup>这正是斯大林经常强调的观点。现在指控斯大林经常不信任别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但是作为原则，他认可“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sup>②</sup>，也认可“谁都承认，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自由的批评，任何科学都是不可能发展，不可能进步的”<sup>③</sup>。斯大林还被诟病“无视”列宁的批评教育的方法，但是读了《列宁主义问题》就可以发现，斯大林是如何反复强调首先是说服，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强制；至少不能断言斯大林与这种做法“完全不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如果说斯

---

① 斯诺：《苏联力量的格局》，日译本，第 247 页。

②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译文据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85 页。——译者

③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中译文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9—30 页。——译者

大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推行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不同”的种种领导和实践,那么反过来说,岂不是说明仅仅信奉完善无误的原则和理论,就能保证正确的行动吗?错误的实践和领导必然与错误的理论和方针相呼应,从这一前提出发,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指控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践踏法律程序的基础,就是斯大林所谓“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命题。诚然,这一命题的确是斯大林驱逐了托洛茨基的国际不断革命论,取而代之以国内不断革命论的根据所在。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那历时多年的悲惨的大清洗和红色恐怖是从这一命题中必然地“流溢”出来的。我本人认为这一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真理。可怕的是科学和原则要支配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设想与政治信条之间的相互勾结。

萨特的戏剧《脏手》中知识分子党员雨果与妻子捷西卡有如下一段对话。

雨 果:那个人“客观上”是背叛了社会而行动的。

捷西卡:(不解地)客观上?

雨 果:是啊。

捷西卡:啊!(停顿)但是那个人如果知道了你想干什么,会认为你是社会的叛徒吗?

雨 果:不知道。

捷西卡:会那么想吗?

雨 果:那怎么说呢?大概会那么想吧。

捷西卡:那么谁占理呢?



雨 果：我呗。

捷西卡：你怎么知道？

雨 果：政治是科学，你可以证明你是对的，别人是错的。

（日译本，第99页，着重号为丸山所加）

剧中原领导人贺德雷被党的执行部门的多数人断定是叛徒，最后死于雨果枪下（他的路线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一次他对雨果说：“那些女人们（指女党员奥尔加）完全接受了教条的思想，将之奉若神明。我们对仅从原则上寻找诱因的做法很怀疑。因为创造思想的就是我们，我们充当着思想的工厂。我们在自己是合乎道理的这一点上没有完全绝对的自信。”并批评雨果：“你爱的不是人，只是原则。”（同前书，第111页）当然，贺德雷不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而是革命家，他有一双诚实地看待社会不合理一面的眼睛和一颗“热爱人类”的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脸谱化了的希加廖夫式的社会主义正是雨果的精神祖先。不能断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全部，当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有的想法与实践比较接近贺德雷，就会明白这一点。然而这里潜在的问题是，既然教条主义经常受到排斥，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实践呢？我们需要联系这一疑问，更为深入地展开考察。

“个人崇拜”及其相关的斯大林独裁的方方面面已被揭露，不仅在政治心理的层面上提出了重要问题，同时，或者说更为重要的

是凸显了组织问题。卢卡奇早在 20 年代的著作中就讨论了对领导方式的错误与缺陷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其观点如下:①

第一,认为事件的发生有其抽象的“必然性”,这一观点容易导致宿命论;第二,假定个人的错误或熟巧是成功或失败的根源,那么这种偶然论最终只是说那人不适合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却不能为未来行动提供任何教训;第三,“即使认可就是这些人占着这些岗位等等,完全有理由研究他们行动的可能性的客观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又再次进入组织领域。”②

这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斯大林批判”这一课题。也就是说,卢卡奇指出,理论只有以组织论为媒介才能转化为实践,将某一理论与组织效应割裂开来而谈论其正确与否,而理论本身就是抽象且暧昧的,所以任何实践也都可以使之正当化。

陶里亚蒂对斯大林独裁的问题,极其慎重但又尖锐地深入挖掘到组织问题的层面。当然,他虽提倡追根问底的分析,但并未给出答案。尽管如此,陶里亚蒂批评那种将所有原因都归咎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且谈到苏维埃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官僚机构的分量过分增长,指出“对民主制度的有害限制和逐渐

---

① Methodisches zur Organisationsfrage in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 S. 303.

② 中译文据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91页。——译者

代以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都是在党本身内部产生的”<sup>①</sup>,断言其危害涉及整个制度,这引起了苏联首脑的敏感反应,他们正不断加强警惕,防止上述批判在国际上扩大影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发出声明说:“不能同意陶里亚蒂同志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提法:苏维埃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退化形式’呢”,强调个人崇拜的祸害与社会制度的本质“无关”,并抬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引为依据:决定社会制度的本质是具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这不但没有发展陶里亚蒂提出的问题,反而完全是开倒车了。

如果用个人崇拜代替集体领导,而不能具体提出集体领导本身的组织论,那么就很难回答从反共立场上齐声提出的问题:“即使领导者从一人增加到一百人,又如何能够保证不出差错呢”。列宁的卓越的政治现实主义将目的意识与自然生长相结合,如果片面地将之固定为“目的意识等于党,自然成长等于无产阶级”的话,那就已经向领导主义堕落跨出了第一步。不是“先有党的存在”,也不是党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先锋队,而是在领导无产阶级的过程中,党通过其组织活动而不断证明自己是先锋队,这才是列宁的辩证法。中国共产党 1943 年确立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思考方法。因此上文引用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也重申了这一决定,强调为了正确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

---

<sup>①</sup> 中译文据《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答记者问》,《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 17 页。——译者

这一观点与“不存在什么个人崇拜的制度性保证。苏维埃人民不懈的努力是其最大的保证”那种以大众阶层(rank and file)的道德主义来化解问题的思考(比如川崎巳三郎氏对《世界》10月号问卷调查的回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即使是上述苏联共产党反驳陶里亚蒂的决议,也承认个人崇拜阻碍了“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且承认,因为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里“需要铁的纪律,需要不懈地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这不能不影响到一些民主形式的发展”。阻碍“民主主义形式”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在执政党、工会、国家机关等的组织活动毫不相干的真空中进行的吧?没有组织化,怎么可能出现领导的过分“中央集权化”呢?尽管如此,一旦讨论到制度和组织的问题,几乎会呈现出一种生理反应,立即就被认为是怀疑最根本的社会主义“本质”,这正是“铁板一块”的观念的典型表现。

此外,其中还有一种一元化的倾向,严格制约着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把所有问题都还原于基本体制——而不是相关联。个别组织的问题“最终”在政治上都成为整个上层建筑的问题,进而更“本质性”地归结于下层结构的问题。这种扩大主义一旦运用于学术立场上,就成为一种还原法:比如,个别科学的学派→实用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哲学→帝国主义的哲学。向基本体制还原与向意识形态还原是一体两面,所以逆向推导这一过程,就成了前面所说的本质显现式的思考。那也许不是辩证法式的,但肯定是“铁板一块式的思维”。而且这种思考方式还时常钻进对历史过程的理解中,表现为所谓的线性历史观。他们观察历史时,只有某些地方万

不得已时才承认复线或复复线的结构,其他部分都尽可能地归纳为本质上的单线(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阶级这一系列)思维。如此一来,就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那些以复线或复复线把握的对象归根结底或者本质上说只是从单线“派生”出来的现象,而且在该领域出现的范畴和概念与基本范畴相比都是次要的——或者科学性更低。处理跨阶级的社会集团,以及基督教文明或伊斯兰教圈这样跨越多种生产方式而存续的问题或范畴时,这种假定更清晰可见。这种思维方式因倚仗“理论”拜物教而高歌猛进,于是原本作为基础学科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成了首要的探究本质的学问,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只是摆弄现象而已,学术领域本身就规定了价值的尺度——恰如中世纪的神学是女王,而其他学科都是婢女那样。当这种线性历史观与进步观相结合时,若存在“共时性=多重性”且相互制约的问题,就被排列于基于本质界定的历史阶段上,于是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倾向,认为属于后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将必然吸收并超越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比如,现代的学术立场经常被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为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但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进化的设想是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体制的对立与进化相呼应的。即使实用主义可以归为现代主义,但是把现代的一大思潮且在学术上拥有极大势力的天主教主义也称为现代主义,这算怎么回事?就算是实用主义,在思想史上也显然是作为反现代主义而产生出来的。

我们把问题似乎扩展得太宽了,但这绝非与“斯大林批判”无关。现在党和国家机关肆意行使权力,本应通过立法对之加以保障,但共产党长期以来轻视这种必要,其思想的基因不仅是革命或

紧急状态的直接要求，而且由立宪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这一单线进化的思考模式带来的乐观主义恐怕也发挥着作用。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认为“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才是个人崇拜的根源，这种认识远比苏联领导人的解释具有现实性，但进而探讨这一“习惯”的根据时，还是未能逃脱上述的思维方式。《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称：“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这样一来，个人崇拜就成了立足于小生产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像法国那样，小生产者人数众多、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习性蔓延的国家，应该流行个人崇拜，但事实上虽然“个人主义”蔓延，不，正因为个人主义蔓延，所以才对个人崇拜的抵触心理非常强烈。个人崇拜确实是一种“落后”的意识，但是甚至连最早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不，正是在苏联，个人崇拜发展的程度令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深入骨髓的西欧社会难以想象，个中原因恐怕不能仅靠还原到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就能解释得了的吧。

与上述的思维模式相关联，他们对处理国际政治中国家理由(Ragione di Stato)的作用，以及技术与官僚化的关系等不同体制所共有的问题也抱有根深蒂固的抵触感。比如，认为国家机关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控制(check)与平衡(balance)”的问题等都

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社会主义体制本来就是人民的国家,所以不需要预防这些问题。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最近盛行的将中央机关的权限下放到地方机关,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又有什么必要呢?当然,这些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内容,而且权力集中本身也不是有害的,但是,如果国家权力“本来”是人民的,共产党“本来”是为人民的政党,那么就可以像边沁主义者那样,“如果权力是为了善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要分割权力?如果权力被用于恶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要让其存续下去?”<sup>①</sup>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就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就是认为立法机关和法院等国家机关以及大众媒体是资产阶级为了阶级统治的目的而“拥有”并操纵的工具,这种观点一旦与体制还原(或者本质呈现)的思考方式相结合,统治阶级与那些机关的关系就会作为实体,亦即属性关系被固定下来,因而在具体情况下难以产生那种认识态度,就是推广那些对工具主人反叛的客观可能性,或者说,很难完全把握所谓目的的改换(Heterogonie der Zwecke)——即本来为目的 A 而产生的事物发展成了 B、C……这种服务于不同目的的现象——其结果是完全无关的两个方向同时并存,一是规定“反正本质上是敌人的东西”,一是完全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利用。像议会制度那样与生俱来就具有统治机关和代表机关的双重性,其“实体”的一面相对受到抑制,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提起了通过议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各国尤其是西欧的共产党议论纷纷,其

<sup>①</sup> Cf. C. Froedrich, *Der Verfassungsstaat der Neuzeit*, 1953, S. 97.

后事实上就少有人问津了。但是作为认识论的问题，比如英国共产党在谈及“英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时提出的“议会是英国的历史斗争的产物”这一观点，与议会是统治阶级工具的观点如何整合，可以说英国共产党未必是始终意识到这一问题的。这一问题基本上也和上述美国占领政策中的“本质目的”流溢说与实力关系的反映这二者的相互关系有关联。

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批判成为一个契机，将此前为马克思主义国家论所忽视的，或者有意识地掩盖起来的制度上的种种横断面主动揭示出来了，尤其是暴力机构和情报部门那种政治手段的施展，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实践性经验教训。比如，关于国家安全局的权力扩张和滥用职权，尤金·丹尼斯主张：“就像我们自己国内有独断独行的权力、藐视宪法，甚至不对国会负责的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秘密情报机构一样，贝利亚和他的同谋显然能够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对人民犯罪。这一切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成果’，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接纳或容忍的、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矛盾和弊病的悲惨产物。”（前引文章，《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第34页）这里承认无关于体制如何，秘密警察机关都具有共通的危险性。

但是丹尼斯的后半段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存在着不足。他认为情报部门与国家结构全无干系，其活动如同蜥蜴切断的尾巴那样，不影响胴体的机能，这种设想完全是非辩证法的观点。这些矛盾和滥用本来就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主义体制，也没有先天地从中产生出来的必然性。但是，第一，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某一阶段的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中容易产生的矛盾；第二，那是在任何体制内



的一定的政治状况下几乎肯定都会出现的矛盾。OGPU 的机构与权限在现实存在的危险中迅速增大,如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在镇压富农的反抗和反革命企图。而且,“即使苏维埃社会很安定,安全部门的活动也没有成比例地相应收缩。尤其是战后,稍微表现得有些与众不同,或者显得思想过于独立的无辜市民都成了安全部门行动的对象。”<sup>①</sup>秘密警察机构要求高度的保密性和机动性,所以一旦产生并膨胀起来,就会开始一种自我运转,极难收缩和停止。这正是所有秘密警察都是对基本人权的最大威胁的原因所在。同样的道理大体也适用于军队。

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人民日报》1945年4月5日),那么正如陶里亚蒂所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必然就可以避免错误和危险。硬说能够避免的人只是证明其幼稚。”因此,笃信“在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国家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代表社会更大的发展与繁荣,那么国家本身就反映了最高的道德原理”<sup>②</sup>,这种对体制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已经不被容许。这对社会主义不是耻辱,而是巨大的进步。无论对人还是对制度,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危险,实际上比时刻敏锐地意识到的危险更危险。对美国而言,自身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惰性化、形式化的危险,比共产主义的危险更甚。同样,对苏联而言,比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恶劣影响所带来的危险,更应该警惕安居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① Bob Davies, The new stage in soviet democracy; *Marxist Quarterly*, July, 1956.

② 沙里亚:《共产主义道德》,日译本,第5页。

所造成的危险。

若是不带偏见地考察“斯大林时代”的历史轨迹，应该会认识到其中并存着伟大与耻辱、巨大与渺小、正确与谬误，而且都是同根生的。斯大林 1931 年 2 月在工业工作人员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帝国主义者）打倒。”<sup>①</sup>于是，在他领导下的苏联与无法想象的困难环境做斗争，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下完成了“跑完这一段距离”的事业。倘非如此，不仅抵挡住并且击退了势如破竹的纳粹德国的攻势，而且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转机的那种能量从何而来？那可是既没有蓝图也没有先例的世界史上最初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验，在此过程中，革命的专政变成了斯大林的专政。但是，构成“斯大林批判”之国内因素的苏维埃社会的变化——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和现代熟练工人及技术人员的大量涌现，正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斯大林面对被拜占庭以及野蛮、懒惰和低效率腐蚀的俄罗斯的落后性，采用适当的手段予以打破，由此而成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掘墓人”。同时，伴随着那些手段——斯大林的对手们也绝非毫无干系——的自我运转，随之而来的暴戾、残虐和野蛮行为也相继发生连锁反应。在“斯大林批判”中，探讨这一过程的《真理报》《人道报》<sup>②</sup>、陶里亚蒂、丹尼斯都直面这一正负两面的历史绞缠，并用“悲剧”一词来形容之，但是这一“悲剧”是俄罗斯的悲剧，革命的悲

---

① 斯大林 1931 年 2 月 4 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译者

② 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译者

剧，“政治性的”悲剧三者的结合，因此不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也不是仅仅属于他们的。问题是，“批判”这一事态时，对悲剧的“悲剧性”有何种程度的思想自觉。与辩证法一词一样，如果漫不经心地使用“悲剧”这一表现，就会丧失内面的紧张感而沦为一个空洞的辞藻。从那里出发的路途，或者通向道德感伤主义，或者通向通俗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道德感伤主义对于出现的事态只是发出抽象的，或者不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道德诘难，不仅很容易产生伪善，而且也没有力量深入到政治活动内部。反之，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思考则是一种将一切都用“不得已”或“别无他法”来直接加以合理化的态度。与“政治性事物”相伴的恶到哪里都是恶，不能用当时的时点和状况将之合理化。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不是天生的宿命。在某一时点上某一范围内存在着避免恶的可能性，因政治领导的错误和政策的失误，到下一个时点就已经无法避免了。相反，在某一状况下不可避免的恶的政治活动，会因面向未来而导出善的结果，由此而获得相对的补偿。另外，在某一语境和层次中的恶在更宽泛的语境中可能具有防止其他恶的作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前一个层次上，恶无论如何还是恶，不会有所改变。在此意义上，借用福泽谕吉的话，政治永远避免不了选择“恶的程度”这一命运。其选择的范围和结果越大，上述内在于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领导——中的二律背反也越大。正如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们在解释斯大林崇拜的历史条件时如同事先商定一般，都要加上一句“上述内容只是说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结果，绝不是要将之正当化”，警惕将历史解释与伦理上的合理化相混淆。这是健康的迹象。法西斯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触犯自己阵营的行为都不

会说：“侵犯法律和使用道德上应该唾弃的违法的预审方法”（陶里亚蒂），也不会向党员提倡：“为了确立那种发现真理所不可或缺的、宽容的基准而进行再教育”（同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从不存在有任何建立于“政治必要”之上的，并对之进行管控的理论和规范……。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理论中道德所占据的地位，无论提出什么样的疑问，只要在共产主义者中间产生这样的紧张感，这种要素就会在实践中壮大，然后反过来影响“思想”，这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革命的进展将革命势力卷入其中，革命者自身在这一过程中被革命，这就是“世界”革命的性质，而且只有这种革命才真正担得起进步之名。

（1956年初稿，1957年修订）

### 追记：

“‘斯大林批判’背后的政治理论”先以“‘斯大林批判’的批判——有关政治认识论的几个问题”为题，刊登于《世界》（昭和三十二年11月号）杂志上，该论文因为迫于截稿日期，论旨未能充分推敲，所以此次收录于本书时以此为蓝本做了大幅度的修改，全文长度增加近倍。但是本书的宗旨是尽量尊重执笔时期以及当时的意图，所以增加的部分基本都是根据当时的底稿而写成的，其他仅限于更为详细地表述原来论文的主旨以及从中内在地演绎出来的论点。因此，（1）从政治的认识方法上重新评论“斯大林批判”是这篇论文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而没有讨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到的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问题、多中心体制，以及集体领导的制度论等题目。我认为，仅限于前一个问题，通过本次增补，论

点大致算是叙述完了,但是对于只关心后一个主题的人,这篇论文看起来也许仍然是有些虎头蛇尾的。(2)写完给《世界》的论文之后就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及东欧的“反斯大林化”迎来了崭新的局面。但是这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和展望并未因为这一新的重大事态而特别修改,毋宁说,文中已经暗示了匈牙利事件和入侵苏伊士问题造成的国际影响及其对共产圈“自由化”做出的和将要做出的反应。围绕匈牙利事件,“斯大林批判”烽火再燃,如果使用相关的铁托、《真理报》论争以及最近《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资料,那么这篇论文的主旨也许会更加具体,但鉴于上述的本文的意图,没有这样做。文中提出的思维方法的问题,如能为读者考察“匈牙利事件背后的政治逻辑”提供些许启示,则幸甚矣。

只是文中对“自由化”的实质性课题未及详论,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问题,我认为,作为著者,表明我的观点是最低限度的义务,所以添加了如下的基本看法。

考察苏联及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自由化”的发展,有必要区别各个国家的国内问题与国际关系,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这一课题及其发展的速度也未必相同。比如,苏联与其他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国际革命运动中分权化(陶里亚蒂所谓多中心体制)的问题,最为敏感地反映了世界政治局势,其挫折或进步,通过本文的描述可以很容易得到了解。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山再起之际,中国立即表示支持和鼓励,并提出要警惕大国主义——据《新政治家与国家》周刊<sup>①</sup> 1月19日号报道,在最危急的

---

<sup>①</sup>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英国周刊, 1931年由锡德尼·詹姆斯·韦布创刊, 初名 *New Statesman*, 1931年与自由党改革派《国家》(*Nation*)合并而更名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1957年恢复原名。——译者

时刻，毛泽东反对苏联武装入侵的通电在华沙被秘密传阅——但是对匈牙利事件，却全面支持苏联的立场，严厉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见解是破坏团结的行为。从去年底到今年，周恩来访问苏联东欧时发出的信息和共同声明，均是着重于以苏联为中心来领导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意大利共产党在不久前的大会上也未就多中心体制的问题进行任何推动——不用说，这一微妙的变化是对波兰十月事件之后到现在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做出的一种函数式的反应。《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沙特派员尼古拉·卡罗尔在1月13日的通讯中写道：“在铁幕的这一侧（东欧方），看到入侵苏伊士和新艾森豪威尔主义（Eisenhower Doctrine）造成的冲击，真是令人震惊。这两个事件鼓舞了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部的高举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并引发了中国及俄罗斯的强硬路线”，这种描述显示了在现场的西方记者也直截了当地认识到上述冷峻的国际政治中的逻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即西方严阵以待，绷紧全部神经关注着，企图利用共产圈内任何微小的动向展开反共运动的时候，这一层面的“自由化”，是绝不可能真正有所进展的。但是，东欧各国动摇的程度和范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测的，如果冷战再次退潮，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政党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多元化和独立化的倾向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战后东欧各国不合理的重工业建设不少都是应苏联基于国家理性的要求而推动的，主导力量是“比苏联还亲苏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的确是事实，但是，波兰和匈牙利已证明，苏联现在已经不能完全掌控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物质的、人的）社会变化。这就是历史的反讽。

现在，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确实存在，东欧各国的

“自由化”就得在以下三个框架内进行：

- (1) 维持华沙条约所确立的与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
- (2) 不变更现在的(对西欧以及东欧各国间的)国境线；
- (3) 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

尽管国际局势趋于紧张,多中心体制的发展遭受到挫折,但包括苏联在内,现在也仍在稳步推行国内的“新路线”。因为,这种国内的“自由化”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内在要求,而未必是因为“斯大林批判”导致的突然变异式的局面转换,更遑论是所谓某一时期的国际姿态。比如,拿苏联来说,第二十次党代会强调的新路线的重要方面几乎都有其“渊源”。以最让人觉得黑暗的苏联司法程序为例,有关生产怠工或延误的刑罚大部分在**1951年**都已废除,**1952年**贝利亚事件以后,苏联决定加强党对苏联内务部(MVD)的控制,并且废除了MVD特别会议,该会议有权不经过通常的审判程序就流放政治犯。1955年《共产主义者》杂志(第二号)强调:“在所有刑事审判中,任何人无权对法官的判决下达命令。政治行政机关的官员、司法部的职员、社会的一切组织都不得干涉各个案件的决定。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的干涉是违反苏联宪法规定的法官独立原则的。”这一连串的过程与第二十次党代会后大量废除革命审判法规,以及将一部分联邦司法权转让给共和国等现象是相互关联的。连西方也承认,马林科夫时期(1953—1955年)强调的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的新方针,因为他的辞职,据传已经被“替换”了,尽管具体的增长比率和速度存在争议,但1951年以后轻工业和粮食生产的增长率几乎快要赶上重工业了,那几年间农民的购买力也迅速提高。关于工会的更为积极

的任务,从第二十次党代会以前就频繁引用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也需要与行政机构导致的官僚主义的歪风作斗争”,倡导管理者与工会之间“有必要时而展开激烈的辩论”<sup>①</sup>,仅在此意义上,第二十次党代会只不过是把从斯大林去世前后就逐渐地或零碎地开始进行的“解冻”正式地或体系化地公之于众而已,因此,其基本方向既不受各领导人之间势力关系的变动所左右,也绝不是暂时的国际形势的恶化所能轻易“逆转”的。著名的苏联研究专家艾萨克·多伊彻说:“俄罗斯的国民生活最近每十年都会发生深刻变化,远比一般国家半个世纪所发生的国民生活的变化都更为彻底。”<sup>②</sup>但是,比如过去五年中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千七百万,急速的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进行为什么没有反映在政治过程中呢?一位美国评论家如是说,在俄罗斯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这一反讽”<sup>③</sup>,这一论断中包含着的意义未必可以仅斥为荒唐无稽而予以抹杀。也就是说,苏维埃体制的新的受益阶层,同时也是产生明日的精英的基础,即技术人员、学生、熟练工人、工厂或集体农庄的领导人等,他们所发出的对国家机构和统治过程的合理性与可预测性的要求,正是来自下面支持“斯大林批判”的因素,因为这种要求可以与历史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原始积累时期后产生的中产阶级(工业资本和知识阶层)的要求相类比。大多数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苏联一样,都必须同时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和产业革命的问题,这些国家今后将要走上的道路,尽

① 《共产主义》杂志,1955年,11号。

② 《俄罗斯——马林科夫之后》,日译本,第64页

③ Marshall Schulman, The meaning of “change”, *New republic*, June. 11, 1956.



管会有种种时期的差异及过程的曲折,但基本上不会不同吧。

这样看来,姑且不论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新路线”的具体而个别的内容,其中“自由”的发展和范围是由整个革命过程中的政治力量所规定的,这一点首先是不言而喻的。

无须多言,一切革命政权掌握权力后首先直面的政治课题,就是破坏传统的统合模式这一支撑旧体制的社会支柱,摧毁构成反革命据点的社会集团,如共同体、地方组织、反动结社等,在社会底层创造出新的国民性。同时,这也是争取新的价值体系与积极迎合这一体系的典型的人(比如法国革命的“市民”、人民民主主义的“人民”)之间的社会协议的过程,这一过程进展是否顺利,或者持续多长时间,会因革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国际关系、旧统治阶层的对应方式等而各不相同。但总之,这一阶段至少在形式上,民主主义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这在历史上也都是未能避免的(比如,创造民主主义之前提条件,在纯粹的民主程序下推动其过程,这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只要看看战后日本以土地改革为首的一系列民主化措施就可以明白。亦即这些民主化措施在毫无约束的自由选举下能进展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说,事先如果未对旧权力关系实施超法规的打击的话——,不能将之混同于“来自外部”和“发自内部”的革命的问题)。民主主义的各种形式只有在这一“国民的和社会的”一致基础上才能顺利运行,后者扩大的同时,前者也可能扩大。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原始契约要求“全体一致”,在此基础上将“多数裁决”合法化,其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随后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装。中国在“百家争鸣”和各政党共存的前提下,也继承了这一理论。首先树

立“在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的原则，容许多数政党以及只有在革命的内部百家争鸣才是可行的。“反革命必须镇压和打倒”，但对于有些人“具有反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害思想，只要不是反动的政治行动，就不仅应该给予他们生存的自由，还应该给予讨论的自由”（6月15日，郭沫若报告），于是，“我们主张在加强人民政权的同时扩大这种自由”（陆定一）。这里区分了敌我，否定了异质的“敌人”的自由，但尽管如此，其前提也是“敌人”是相对的、根据具体情况而转变的。这种思考方式一旦在现实政治的场域变得僵化，或者反之无限制地泛滥成灾，将会引起怎样可怕的后果，苏联已经在“清洗”问题中试验过了。不容忽视的是，其底层的逻辑也是内在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之中的力学，在极限状态下经常被发动起来。欧内斯特·巴克也认为，民主（他所意指的毋宁说是西欧民主主义）的前提条件是物质性和社会性条件中的国民的同质性，以及承认和遵守一定的“公理”，后者的“承认不同意见的自由”是以对根本问题的全体一致为基础的，“在一致犹如空气一般地存在着、无须反省就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的地方，形形色色的差异获得宽容，各种各样的党派出现，嗜好及意见的因人而异得到承认甚至被期待。”<sup>①</sup>西欧国家体制在西方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其传统和惯例深深扎根于广大国民之中，如果这一法则在西欧国家体制中也是适当的，那么很明显，关于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不能迫切地期待进入“一致犹如空气一般地存在着、无须反省就理所当然地被接受”的阶段。根据这种“一致”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扩大的阶段和范

---

<sup>①</sup> *Reflexions on government*, p. 63f.

围,“自由化”也将改变其具体的形态。因此,认为现有形态的“自由化”的极限就是本质的极限而大泼冷水,或者相反,将之全部归属于社会主义本身并加以合理化,都不免操之过急。连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命题,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定义也明显比列宁和斯大林的定义扩展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已经进入了现实的日程,反过来说,“莫斯科路线”独占正统性的态势已被动摇了,因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政治形态——更现实地说,被归属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也不得不推进多样化。伯恩斯坦曾经说资本主义比马克思预想的更能适应现实(Anpassungsöglichkeit),从而引发了争论。现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是共产主义需要证明其能够适应整个世界。

也许是悖论式的观点吧,我认为,共产圈的“自由化”最困难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经济和政治领域,而是在最上层建筑的维度——意识形态上。问题最终将是,要区分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自由与出自社会主义的自由之别,“社会主义不是与某一特定的世界观相联系的。它是缘于众多种类繁杂的世界观的一体化结论。”<sup>①</sup>对这一说法的意义,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们是否真正承认才是问题所在。列宁说:“我们不认为马克思理论是什么已经完成了的、不可侵犯的东西。”同样说法也适用于列宁理论。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被国家权力正统化,成为国家公认的信条,事

---

① 拉德布鲁赫《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日译本,第132页。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年),德国20世纪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哲学家和刑法学家之一,他的法哲学源于新康德主义哲学,是海德堡学派在法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译者

实上就成为君临一切学术与艺术之上的最高真理。当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野的一支反抗科学(oppositionswissenschaft)时,无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在原理上都始终是众多学派中的一支,因此,其真理性必须在思想和学术的自由市场中不断与其他立场相比较量。但是坐上权力宝座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众多方法的一支。至少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坐上权力宝座的思想意义,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或首相碰巧是天主教徒或者是凯恩斯学者完全不同。只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思想根据,那么就带有了“真理专制”的性质,与思想史上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中世纪的罗马“普遍”教会法的政治统治具有内在的类似性。这样一来,进入20世纪大众社会阶段的这一新的“哲学王统治”——大众经济生活的保障另当别论——在文化层面,也与资本主义大众形成鲜明对照,后者由于“自由竞争”趋于“劣币驱逐良币”的无休止的低俗化而日益遭受腐蚀。正是通过这一对照,为解决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实质提升的问题,指出了划时代的方向。但是另一方面,文德尔班批评柏拉图的国家论并发出警告,无论一种学说的真理性有多高,当它作为唯一最高真理而与政治统治相勾结时,实质上就转化为教条的统治,造成强制人们良心趋向确定的“真理”<sup>①</sup>,这一问题在原理上也适用于共产主义国家。可以认为,在东正教长期与国家权力相勾结的俄罗斯,这种危险性最大。这不是说在这样的国家不容许非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也不是说学者和艺术家

① Ders. Palato, S. 177,

感受不到自由。(在此意义上,卡尔·贝克尔<sup>①</sup>说:“中世纪的大学让我们看到明显的悖论。大学看起来不可思议地不受拘束,同时出奇地自由。中世纪的教会对异端严厉镇压,但是几乎所有的伟大学者,从阿伯拉尔<sup>②</sup>到奥康<sup>③</sup>都与教会支援的大学有关。……解开这一谜底的钥匙是,当时无论一般人、已经成名的权威还是学者,都承认基督教信仰……是一切知识、一切有秩序的高尚生活不可或缺的基础。”<sup>④</sup>这一说法仍然富有启示性。)问题是,这样的最高真理的正统化作为一定的思考的模式(pattern)楔入了所有学术和艺术领域,在各个领域,某一理论或学说作为“真理”的具象化,或者某一形式作为“模范”,带有一种被权威化(因为真理被认为只有一个)的倾向性。我每次听奥伊斯特拉赫<sup>⑤</sup>和奥博林<sup>⑥</sup>,或者看到电影中乌兰诺娃<sup>⑦</sup>的舞蹈,都会为其无懈可击的技术、高洁而富于人文精神的表演所打动,但是并不会在这种完美中就意识不到苏联文化目前最大的问题点。苏联国家这一形象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真理的客观具象化,与“模范”的美的客观形式化的

---

① 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 1873—1945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等。——译者

② 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 1079—1142年),法国哲学家、神学家,人称高卢的苏格拉底。——译者

③ 维廉·奥康(William of Ockham, 约1285—约1349年),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译者

④ 卡尔·贝克尔:《自由与责任》,日译本,第83页。

⑤ 大卫·奥伊斯特拉赫(1908—1974年),苏联著名小提琴家。——译者

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奥博林(1907—1974年),苏联著名钢琴家,与奥伊斯特拉赫合作二重奏,是最佳搭档之一。——译者

⑦ 乌兰诺娃(1910—1998年),苏联芭蕾演员。——译者

倾向之间,有没有内在关联呢?

正是在这一点上,最值得瞩目的是上文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提倡的“百家争鸣”。只要共产主义领导人是政治现实主义者,即使在苏联,意识形态上的自由化事实上也从“斯大林批判”之前就开始了。而在个别领域——比如文学——“解冻”的理论根据也创造出来了。但是像“百家争鸣”这样,最高领导层为所有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化”公开在理论上定调,则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运动在革命势力掌权后不过数年的国家开始,着实令人惊叹。此处无意详述百家争鸣的理论,联系到上述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一种学术上的批判与论争的“禁止垄断法”。亦即是说,明确了在文化领域,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地位,不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做自我检讨的义务。而且,“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我们的近代史学工作者,应当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陆定一报告<sup>①</sup>),这大概是吸取了苏联斯大林重写党史的教训,如果将之理解为包含了对权威性和正统性的历史诠释的否定,那么其意义就更为重大了。但是,将政治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功能如此公然明确地加以区分,尽管尚未达到共产主义国家,但是也不能说上述根本问题已经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比如,即使说“在艺术性质的问题上,在学术性质的问题上,在技术性质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同。这种意见上的不同,是完全容许的”(同上),那也只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

---

<sup>①</sup>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怀仁堂举行报告会,陆定一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6月13日,这篇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译者

论和哲学本身的批评吧。尽管说了“在人民内部，……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但是从同一位政府负责人口中还说了：“对人民内部的唯心主义的落后思想，应该进行斗争”，并期待着“唯物主义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义的思想”，即使是通过公开辩论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但双方的论争不能说是互不相让的自由论争。陈伯达说：“从一开始就有结论的地方，学术无法发展”<sup>①</sup>，如果这句话是在原理意义上讲的，那么它也应该适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正当性本身。我既不是吹毛求疵，也无意于对现阶段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事实上不可能的要求。只是要说，利用权力使某一特定的世界观或学说正统化的问题，并未因为“百家争鸣”就圆满解决了。既然承认上述否定革命的“敌人”的自由这一点（也通用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逻辑），那么问题就仍然存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国际大团结的象征正发挥着政治功能，在此期间，世界观的相对化立即就被理解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质疑，而从正统的脱离则被抨击为向资本主义或反革命屈服。事实上我们很难期盼这种倾向消失。要使世界观的基础不那么整齐划一，换言之，当不再被这种单一的世界观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国际上占据了牢靠而有力的地位之时，出于现实的这一存在分量，共产主义领导人才会从心底里承认上述拉德布鲁赫的话吧。

然而，在这一期间，共产圈内基于单一世界观的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也会出现分化，如果政治和经济愈加安定，那么这种现象就会逐渐发展。在现代的交流条件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一国民

---

<sup>①</sup> “与小棕广胜氏的对谈”，《思想》1956年8月号。

众周围修筑起思想和文化的万里长城。苏联年轻一代不仅喜欢阅读世界古典文学,也喜欢阅读格雷厄姆·格林和海明威,痴迷于乔治·格什温的《波吉与贝丝》,他们的教养资源与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已经明显不同。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无论当初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怎样努力去凿通路径(canalization)——以其自身的辩证法在整个政治与社会过程中扩大影响,这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实质上被“解禁”,如今虽然还只是一个事实,但是当陀斯妥耶夫斯基被广泛阅读时,这一事实中潜在的可能性现在谁也无法预料。

共产圈各个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自由化”的具体状况和速度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基本顺序大致有以下三项指标。第一,在人格的内在性中占据位置越重要的题材,从正统世界观的束缚中解放得越早。在此意义上,宗教最早,艺术次之,学术最后。因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关于社会体制的科学,所以越接近内在性的题材,意识形态的统治事实上就越困难。在苏联,随着教会与旧体制的勾结被打破,革命初期的反宗教运动也退入后台。在东欧各国,与天主教的关系之所以成为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无神论与基督教在 worldview 上的对立,毋宁说是天主教会的所有关系或者与政治势力的关联。在艺术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依然占据“正统”地位,但是原本从唯物辩证法上看,就不可能单一地规定某一种创作方法,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具体控制力在逐渐弱化,实际上只不过是存在着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朝向积极进取方向的文学的框框。众所周知,爱伦堡的《作家的工作》为解放作家的内在心理赋予了理论的依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



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任何作家可以用任何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来创作,互相竞赛”(陆定一报告),公然宣称现实主义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但是,如果用历史唯物论或辩证法唯物论替换这段话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用学术方法论替换创作方法,会怎么样呢?似乎在原理上尚未承认到那种地步。

第二,不直接体现思想性或政治意识形态性的领域自由化则实现得更早。比如同是艺术题材,文学的自由化相对较晚的原因就在于此。同理,自然科学也比社会科学更自由。至此,第三项基准就呼之欲出,即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已经存在着权威性理论和成果<sub>的领域</sub>,自由化得更晚。因此,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很难获得对等的市民权。这里的问题不仅是研究发表的自由,而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是否存在基于平等条件的、思想和方法的相互关系。

从正统的世界观的解放,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科学包含的真理性。上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自我限定反而使其中的真理愈发确凿,这听起来似乎是悖论。正如 J. S. 密勒经典地证明的那样,“真理”是通过“谬误”才成为“真理”,“谬误”不是没有才好,它对真理的发现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使认为多样性对政治而言是“必要恶”,但它永远是真理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无论具有怎样恢宏的真理性和历史意义,却并不是人类抵达的最终世界观。不久它将在思想史的一定阶段获得相应的位置。那时,在历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并存的教条与真理将判若黑白,其不朽的思想(提出了克服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历史主体

的问题)以及其中的经验科学的真理将积淀下来,作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流传下去,如同其他所有的经典思想体系一样。

### 增订版附记:

旧版出版以后,众所周知,关于“斯大林批判”问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我本来是认为“非斯大林化”事件中包含着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各自专心研究的共同的学术问题(不是共同的答案!),感到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一事件本身,才写了这篇论文。因而我提起的问题包含着以下两个方面:(1)我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一立场出发所展开的批判;(2)以前的辨析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也是可笑的,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探讨问题的各个方面,实是未中肯綮——也就是说,假设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内在地引导出来的论点。在同一篇论文中同时尝试这两个维度的研究,也许有些困难。但是,如果不触及那些困难,那么重新评论斯大林批判的意义,对我而言就不复存在。如果我只关心输出我自己的“立场”,或者据守现代政治学的“立场”而攻击其他阵营的话,那么我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写法。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越俎代庖,去探讨上述(2)的维度的问题。事实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关在自己的范畴和命题之中自给自足,但若将这些范畴拿到更广阔的学术庭院中加以探讨,如果他们做了这一应做的工作,那么就不需要我在(2)的问题上多管闲事了。但是看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我的论文的反应,其中不少是比如“好,知道了,但是你也沒拿出什么具体的答案嘛”之类的(当然,我知道有少数的

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理解了我提出问题的方式)。在(1)的维度上,我有责任拿出原理性的“答案”,但是在(2)的维度上,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国家消亡”的过程,如果让我给出“答案”或者“解决方法”,那我只能说,那不是诸公的事吗?况且,关于“斯大林主义”中包含的思考方法的实践意义,应该作为现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具有客观可行性的问题来加以探讨,不要简单地说“已经知道了”,便继续“向前”走,我觉得那才是令人接受不了的。

在论文的补记中,主要打算论述(1)的维度,即从我自己的立场展开更详尽的回顾和批判,至今尚未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尤其是他们也尝试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被国家权力“正统化”并成为体制哲学(及科学)时所包含的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现在鏖战正酣的中苏论争的核心问题。无须多言,中苏论争是一个重大事件,堪比本书旧版出版后的“斯大林批判”。为了让第二卷跟上时代,当然必须要写一篇独立的稿子,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我现在的工作实在无暇及此。只是,迄今为止处理中苏论争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围绕国际政治的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来讨论的,否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学来讨论的,中苏论争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其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意义是什么,这一视角却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所以我想就这一点略说几句。

无论宗教也好,还是无神论教义也好,从其在正统性的维度上相争的那一刻起,就不仅是意识形态内容的正当性问题——不管当事人是否意识到——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裁定权和裁定程序的问题,即谁拥有“正确”解释的最终裁定权,通过何种程序裁定某

一解释是“异端”。那时候,说什么“历史”是最好的裁定者,或者说由世界广大的劳动人民来做裁定,这样的观点等于没有回答具体的论点。中国共产党敢于对苏联共产党事实上长期独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解释权提出大胆挑战,在此意义上是划时代的事件。只是将之置于不屈服于苏联或苏联共产党的“权威主义”,或反对第三共产国际的各项具体指令等这些过去事例的延长线上来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行动的意义,必须在判别中苏主张的内容,即有关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等等的理解是否正确的维度上加以认识和评价。因此,有人将之与路德对罗马教皇的基督教真理之裁定权的挑战相比较,或者更向上溯,与东方“正统”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因教义、圣典的解释而发生的“分离”相比较,两者之间所共通的问题,不可仅仅视为比附,或者当作新闻工作者偶尔的想法而轻率处理。对于这些历史上的事例,要考察各个具体的论点最终如何上升和转化为对一般原理的正统性之争的力学关系,以及教义上的争论点 and 现实政治上的利益(包括文化和传统的不同)纠葛缠绕的关系,这将为推断中苏论争的组织上的效果提供宝贵的线索。——或者,为看清两者那微妙的分歧点,即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会趋向“和解”,反之,什么样的契机组合在一起则会使关系“恶化”。

中苏论争的当事双方运用最激烈的形容和言辞,却都在展望“最终的一致”,这种看似奇妙的事态,如果说只是因为对国际关系的现实政治上的考量——不用说这种考量也在作用着——那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我在补记的旧稿中提到的真理观与正统性的问题也纠缠于其中。真理只有一个,所以“正确”的解释也只有一个,只

要确立了这样的原则,那么中苏宣扬的教义如果一方是真理和正统,那么另一方必然是谬误和异端。对唯一正确解释的争夺没有妥协的余地,所以不得不“绝对化”,但同时,正因为依据同样的根据,所以双方都确信最终要“归一”于那个正确解释。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真理观和正统观在共产主义阵营中会永远维持下去。由于沉重的现实,正统性逻辑的松散及解释的多样化虽然几经波折,但事实上在发展。然而,这一事实的意义要在“理论”和“世界观”中找到安定的位置却并不容易。因为,解释的多样化无论如何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内的多样化,而且,在具体的情况下,只要还有必要从政治上来判定某一解释是否越出了框架本身,那么问题又重新回到了谁有裁定权上。

鉴于第二卷的标题“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最后我想谈谈意识形态论的问题。关于意识形态或“主义”的研究在学术界曾经盛极一时,几乎泛滥成灾,但如今,一方面被意识及行动调查,另一方面被政治过程论及传播理论抢了风头,而退出了前台。正面谈及意识形态的问题被视为老土的工作,或者是“19世纪的”学术形态,在年轻研究者中间甚至出现了敬而远之的倾向。在日本的知识社会,意识形态的氛围——与实质上左翼势力的弱小形成对照——如同农田施肥的臭气一样不管不顾地弥漫,而且实际上思想和主义只是作为行动的“大道理”和事后的合理化而被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试图确保实证性和科学性的研究,而且就是作为政治的科学,有充分的理由警惕切勿被所有高级低级的意识形态噪音所扰乱。保持距离地观察(detachment)与袖手旁观的区别,即使在学

术界也没有成为常识,醉后胡言被误解为“实践”性观点,在党派性动辄趋于感伤情调的精神风土中,将意识形态问题作为政治学之研究对象,无论如何慎重处之都不为过。

但是,政治学,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学,将意识形态问题完全加上括弧,或者舍弃其实质价值和历史意义,完全相对化为记号或象征,这可能吗?纵然可能,会具有超乎学者的知识兴趣之上的意义吗?我表示怀疑。即使在“民主”和“西方文明”的合理性作为国民感情几乎从未遭受重大挑战的美国,最近,比如 D. 伊斯顿<sup>①</sup>和 E. 沃格林<sup>②</sup>从各自不同的方向,挖掘出作为现代政治学实证研究之前提的价值结构和意识形态背景,提倡确立重新结合思想原则的历史评价与现实的经验考察的一种“新政治学”<sup>③</sup>。总之,完全抛舍政治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和实质价值,完全否定政治理念对政策的指导性,就很难识别革命的政治过程与反革命的政治过程,革命过程也难以脱出打倒“现状”的形式性规定。事实上,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持不可知论,把政治理念都消解于权力的乔装改扮或象征的所谓“实证”立场,完全与法西斯推行的强制性同化,与革命权力尤其是在国际国内的恶劣条件下迅速推行的同质化可以说等量齐观。当然,如前所述,设定这种共同的维度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效用,在实践上也有意义。很多实例都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会怎样微妙地相互转换。我在本文中力陈了那种将一切都还原

① 大卫·伊斯顿(David Easton, 1917—2014年),美国政治学家。——译者

②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年),美国政治哲学家。——译者

③ 参照 D. Es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1953; E. Voegelin,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1952。

于目的和理念之正统性以及意识形态之正当性的危险一面。但是尽管如此,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不是等价的,而且其差异对于现实政治过程而言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在 D. 雷斯曼<sup>①</sup>所谓的内部指向性(inner-directed type)类型的人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政治原理的重要性并非是什么特殊现象。相反,大众社会的所谓“原理”向“传播效率”的转化,这才是现代的特殊历史断面的一个抽象,而且,其中潜藏着的颓废性比起教条的危险性未必更值得欢迎。特别是像日本这样的地方,组织和制度连带着意识形态一起输入进来,而且政治体制没有自明性,自动恢复能力差,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联袂而出,可以说是具有结构的必然性。在这个国家,一方面意识形态论看似过剩,但另一方面,没有“思想”形态的思想在顽强地统治着,思想麻木症与漠不关心政治同时发酵,要想从学术研究中剔除意识形态的问题,实际上行不通,无法走向其所希望的科学分析的方向,反而会与“天涯共此清秋夕”的政治达观合流。因此,我们面临着的困难课题是,必须同时学会“不束缚于价值”的自由观察,和选择积极价值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对于意识形态介入政治之中并使之发生变化的力量与程度,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地评价。为了正确认识这点,也为了从真理和伦理正当性的角度辨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史和理论政治学的领域(在不被混淆的同时),两者处于一方不能完全离开另一方而“一骑绝尘”的关系。这也许应该是在第三卷涉及的问题,为方便起见,附记于此。

---

<sup>①</sup> 大卫·雷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年),美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孤独的群众》(1950年)、《群众的脸》(1952年)、《重新探讨个人主义》(1954年)等。——译者

## 第三卷

# “政治性的内容”及其界限





# 第一章 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

## ——回顾和展望

### 1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此为转机，学术自由才同其他各种自由一起得到公开认可。长期为“时局”所困而萎靡不振的学术精神，终于克服了物质条件方面的重重障碍开始活跃于各个领域，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而在社会科学方面，其复苏表现得尤为耀眼夺目。那些多数曾因强势阻挠被迫停止的活动，犹如长期郁积的能量在瞬间爆发一般，霎时云烟升腾，蔚为壮观。然而，就在这曾被强权势力所压制的社会科学重新崛起之时，恐怕唯有政治学依然还在踌躇不前、举步维艰地苦苦思索寻找出路。特别是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在国内外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政治学的落后状态已成为越来越无法隐藏的事实。诸如“政治学这门学问在日本最无活力”“在日本能被称为政治学家的到底有几人？”这类说法，在二战后仍不绝于耳。

每当我听到这类带有几分嘲笑的批判时，刚开始大概会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抗做出种种辩解，但最终却每每在这些批评所指

出的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变得缄口无言。从日本宣布投降的八一五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的、有史以来的变革——被统称为所谓的民主革命——本来就不仅仅局限于过去那种狭义的政治变革,而是包括跨越社会、经济、文化等整个生活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众所周知,这种巨大的变革首先是以最为重要的政治变革为起点的,而推动这种变革的主体也正是“政治的”力量。如今,没有哪位国民不切身感受到“政治”所发挥的巨大力量,以及“政治”所吐露出的粗犷气息。在今天,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知道大洋彼岸的杜鲁门总统的一个演说会直接关系到她家明晚饭桌上的菜谱。无论多么偏僻的乡村,农民们也会亲身体验到一纸法令即可让他一生积蓄的私房钱瞬间化为“米达斯之金”<sup>①</sup>的神奇力量。在看似包罗万象的当今政治的急剧变动中,人们纷纷以不安的目光询问着:能够发挥如此巨大力量的政治实体到底是什么?它来自何方,又将走向何处?

于是,人们期待和关心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上。但是从这个领域里,人们却看不见也听不到所期望的回应。不仅如此,当我们重新审视之时才发觉,政治学这门学问甚至处于混沌不清尚未成熟的阶段。现实中的政治支配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与政治学的发育不良形成的反差,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鲜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我国,与其他发展迅速的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甚至谈不上

---

<sup>①</sup> 源于希腊神话,米达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传说他有点石成金之能力。此处喻为毫无实用价值。——译者

具有什么能够“复兴”的传统，一切都只能寄托在今后的发展之上。当然，其他的社会科学也在二战后的一年半时间内，随着当初的兴奋激动逐渐平息，开始全面反思：如果只按以往的问题意识不去批判、修改迄今为止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怎么能在当今的现实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呢？各个领域都已经注意到，如果把这十几年的战争期间当作所谓历史的真空期来看的话，一味地怀念那之前的美好时光是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在其他领域，比如法律和经济，都还可以用以往的方法来处理现实问题，也就是说旧瓶未必不能装新酒。但是轮到政治学，情况则迥然不同。旧的政治体系及其关注的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对当今的政治现实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如曾经在政治学界一直引起争论的话题：是政治概念领先还是国家概念领先？从这种议论出发怎么能对现实政治给予实质性的贡献呢？

政治学虚弱无力的现象并非始于今日。实际上法律学、经济学也有其问题所在，曾适用于一定历史阶段的概念和方法，在当今历史剧变的时期反倒开始显得有些不太适应了。而政治学呢？至少从我国的例子来看，还从未出现过“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相互推动的局面<sup>①</sup>。

我国学界的通病是，不从本国的现实中提出问题，而是一味地

---

<sup>①</sup> 日本过去的政治学家给予时代以最大影响的当然首推吉野作造博士，大正时代的民主运动离开吉野博士的名字是无法想象的。但吉野博士的有关民本主义的几篇论文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性的指导，莫如说是趋于启蒙性的，他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政治史，特别是日本政治史方面。总之，不容否定的是在上述方面吉野博士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追随欧洲学界的潮流和方法。虽然也会萌发些学术观点的胚芽，但其后果是导致了学术与现实的严重脱节。政治学正是最集中地表现出这种宿命性弱点的领域。可以说，学术与现实的脱离在我国的政治学领域已经达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 2

像我国这样，政治学难以成熟发展，与其单纯地把责任归咎于政治学家的怠惰和无能，不如说从根本上是受明治以后的政治结构所制约的结果。一般来说，在没有市民言论自由的地方就无法产生真正的社会科学。这种现象在政治学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毋庸置疑，作为本学科鼻祖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所以得以发展，正是因为希腊民主政治的蓬勃展开为其理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素材。像柏拉图这样，一般可以把他定位为反民主的思想家，然而他思想深处的支柱归根结底还是希腊的政治自由。众所周知，马其顿的霸权使得城邦国家一旦丧失自由，理论上的追求便迅速远离政治现实。正如斯多亚与伊壁鸠鲁学派<sup>①</sup>那样，只关注于个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和发展《国家论》和《政治学》了。再比如，当意大利文艺复兴冲破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这一屏障，绽放出鲜花般勃勃生机之时，在开其先河的自由都市佛罗伦萨那种活泼的氛围里，才会有马基雅维利

---

<sup>①</sup>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 年)，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译者

的《君主论》和《政略论》的诞生,由此奠定了近代政治学的基础。然而,当意大利的近代发展迷失了前途之后,他的业绩却后继无人。于是我们看到,随后政治学作为经验科学<sup>①</sup>在英美(作为 political science)和法国(作为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sup>②</sup>)等所谓西欧民主主义国家得以发展,至今已取得丰硕成果。而与之相反,如我们后面所要谈到的那样,在德国,政治学基本上是作为国家学(Staatslehre)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国法学(Staatsrechtslehre)及行政学的强势发展中几被吞没。这也反映出普鲁士王国及德意志帝国市民的自由程度较低,以及官僚机构对其构成的坚如磐石般的控制力<sup>③</sup>。所以,一般可以这样说,“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自由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正是测试这个国家学术自由程度的一个试金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于政治权力来说,它们最不愿意、最惧怕的便是将自己赤身裸体地、一览无余地、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吧!相反,如果政治权力具备那种宽容学术自由的肚量的话,势必会允许对任何对象进行科学的分析。因而,能否对其进行政治上的考察,是受时代和地方所制约的,学术思维经常呈现出临界状况。可以说,所谓政治学,正处于政治与学术、从广

---

① “理论科学”的对称。指偏重于经验事实的描述和明确具体的实用性的科学,一般较少抽象的理论概括性。在研究方法上,以归纳法为主,带有较多盲目性的观测和实验。——译者

② 众所周知 political science 和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具有非常宽泛的意思,未必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学,这里不去作细微的界定,总之,重要的是实质上在这一名称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的优秀著作。

③ 就此,特别是就官僚对政治的看法,参看曼海姆(K. Mannheim, 1893—1947年), *Ideologie und Utopie*, 1929, S. 77f.

义上说是处于政治与文化这两种人类生活形态紧张对峙的临界点上。这样看的话,在八一五之前的日本,究竟是否存在政治学赖以生长的土壤,也就不言自明了吧。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的过程中造就了绝对主义势力的主导权地位,明治十年代,当自由民权运动经不住来自上面的高压并因其内部的脆弱而土崩瓦解时,可以说日本政治的近代化轨道已基本定型。在这种情况下,明治宪法所标榜的“不朽”的国家体制至此已不能成为自由议论的对象了,追究政治权力的最终根源成了最大的禁忌。人们一般是这样理解的:国家权力正统性的唯一依据在于拥有统治权的天皇身上,而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统帅权等全都是从这唯一绝对的“大权”中派生出来的,因而任何政治权力都不可能与“大权”相提并论。所以,像西欧近代国家那样,各种社会集团为了掌握其本身的“中性的”国家权力而公开地进行斗争,这一意义上的“政治”可以说在当时的日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议会也不是像西欧那样通过辩论来创造统一国家意志的机关,自创立之始它就未被赋予强有力的地位来发挥政治统合的作用。其结果,有关国家意志的重大决策都是由处于议会之外的、合法的或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势力之间通过幕后妥协和交易来制定的。于是,在议会上的“政治辩论”便失去了政治本应具备的真正意义。特别是民党与藩阀之间迅速妥协之后,人们已经见不到像欧洲议会那样明确为国民各阶层所做的辩论,甚至都看不到为追求最基本的价值观、世界观所做的努力。所呈现的只是围绕政权所产生的种种利益分配和个人争斗,且争斗得越激烈,其丑恶性越发明显。这样的“政治争斗”自然无法给真正的学术研究带来

任何刺激。于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正统主体——天皇——以及围绕国家权力的实质上的政治权利则被搁置于一切学术分析之外,而如果把议会的政治争斗弄得像演戏一般,说到底,在日本的政治现实上,能留下什么值得政治学来研究的呢?那些包括政治权利的发生、构造及合理依据等构成欧洲政治学和国家学的根本问题,至少具体到日本这一国家来说,完全没能被真正科学地对待过。如此看来,那些不希望给“国体”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稍有点良心公道的政治学家们,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在方法论上展开讨论,即为了方法论而研究,或围绕政治概念的注释绞尽脑汁,或仅满足于学习欧洲的政治学教科书,对国家及政治现象只做抽象的解释,有意避开与具体政治相关连的问题<sup>①</sup>。

欧洲的政治学概论看上去描述得很抽象,实则其背后蕴含有欧洲数百年来的政治历史脉络,哪怕只是其中某一个命题,也是在

---

① 在我国,可以说是小野冢喜平次博士树立了作为科学的政治学,他在《政治学大纲》(1903年)序言的结尾处所说的下面一段话似乎扼要地预言到了其后日本政治学的一贯特征:“对于内外时事不是没有多少意见和感慨,但鄙人学殖尚浅、孤陋寡闻,不愿轻易立足于政论之坛,倒欲逍遥于思想之自由境界,盘坐于群书之间触摸古今的诸贤。此书完全是学术性的,丝毫没有所谓政谈议论。”

另外,我国国家学方面的划时代名著,尾高朝雄教授的《国家构造论》(1936年)中也感慨现代国家中“行动和思想的跛行”,“为实际把握国家的命脉”立志“作为一小兵来加入科学者的一线活动”。尽管有这么高昂的热情,但还是在书中加上了“在实践意义上彰显我大日本帝国的特殊国家构造,这一立场与本书的论述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序第2页)。联想该书所著的时代,不禁感到在旧体制下学者们是如何为保持国家学、政治学的学术性所做的苦斗。

但是,尽管是在我国的这种制约下,论及政治学的发展与政治自由如何关联的著作却大多出版在大正七年至昭和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运动新兴的时期。现在活跃在学界的政治学家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起步的。



其现实的变化波动中孕育而成的。所以不管针对哪个范畴或者就某个命题进行解析时,最终都会具体体现到欧洲活生生的政治现实中去。然而谈到日本政治,因为国家构造和历史都与欧洲有着根本上的区别,虽然存在像立宪制这样与欧洲相似的政治制度,但是支配这种制度的精神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所以欧洲政治学的这种抽象的讨论方法,对于分析和理解日本的现实政治动向是基本起不上作用的。因此,有些理解这种抽象议论并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的政治学家一旦对现实政治问题展开评论,其见解往往停留在一般常识上,跟对此一窍不通的政治记者相差无几。这与其说是学者能力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因为日本政治动态本身的不合理性所致。正如前所述,政治的统合与重组不是通过全民投票和公开讨论这样合理的方式来决定的,换言之,并非经过一个可以预测(berechenbar)的过程,而是依循陋习,完全依靠一种偶然的人际关系来处理。比如说:来自元老重臣们的压力;党派之间势力关系的变化;“黑幕”以及“掌权者”之间的交易(政治交易!)等等。正因为如此,以合理的组织过程为前提的政治学分析,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基本上是不可能起作用的。所以有人说,“想理解我国的现实政治,读一百卷政治学概论也不如跟政治高层的人搞好内部关系”,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其见解往往不如一个新闻记者更为透彻。(当然,其他的领域,比如经济学方面一定程度上也会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说到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恐怕没有什么能和政治学相比了。)

日中战争爆发以后,面临着国家危机,一些政治学者不堪忍受

自己的学问与现实对象之间的落差之巨,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到现实的政治世界中去。可最终,这些人无一不是跟有实力的政治家甚至军人建立起了个人关系,任何事都在利用这种私人关系,绞尽脑汁使政治向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看到这些我不得不认为,在这个国家,政治学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 3

如上所述,这就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因为上文中需要展开宏观的论述,可能会使人感到我在片面地一味指出政治学界的弊病。但实际上,我既不是随便批评至今为止的政治学界一无是处,更不是要漠视政治学方面诸多值得推崇的专著。如果有人认为我自视清高,甚至有意贬低其他权威的话,那就更背离了我的本意。我不过是认为过去的政治学比法律学、经济学之类的其他相邻学科略显乏力罢了,它对现实社会没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作为政治学界的晚辈,对这一现状感到遗憾,为此,首先想就自己的治学方法进行彻底的反思,由此入手来好好思考一下迄今为止的政治学难以成熟发展的根本原因。

以八一五战败为转机,日本的国家机构逐步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之前一直被神秘面纱所笼罩的国家权力的中枢也开始成为合理批判的对象。旧制度下的各种政治势力得以解体,以前暗箱操作下的错综复杂的国家意志的决策过程,现在被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所包揽,现行的议院内阁制使这一决策过程变得更为透明。天皇失去实权而仅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获得保留,这

使得国家权力凸显出中性化、形式化的特征,为掌握实质权力而进行的真正的政治斗争终于出现在了民众面前,政治的现实在科学的批评面前才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至此,日本才具备了政治学发展的真正空间,从今以后政治学家再无理由把政治学研究萎靡不振的原因轻易地归结为客观的束缚了。政治学必须处理眼前大量的活生生的素材,正如过去亚里士多德直面古代城邦国家一般;马基雅维利研究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般;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研究17世纪的英国一般;马克思研究二月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一般;詹姆斯·布赖斯研究各国民主政治制度一般;或是现代的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政治学家梅里亚姆、英国的政治学者拉斯基、法国的西格弗里德<sup>①</sup>等所做的研究那样,通过研究错综复杂的日本现实政治的动向,来洞察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的规律,并要把这种确切获得的命题与范畴不断地在现实政治中加以验证,使之发展下去。当然,方法论的探求与概念的厘定对“作为科学的政治学”来说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但是,如德国的政治学家齐格勒所说,政治概念的理论分析宛如X光透视一般,“充其量只能看到清晰的骨架,而无法理解活生生的、血液流动着的温暖的躯体,我们内心倘若没有一种政治精神的话,无论做出多么缜密的概念分析也没有用”。<sup>②</sup> 不仅如此,如后所述,方法问题与对象问题的相互牵连是政治思维的特点之一,纯粹的、超越对象的先验论式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是行不通的。另外,对照其他各国的政治组织,进行

---

① 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年),法国政治学家,著有《政治学理论》等。——译者

② W. Z. Ziegler,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k*, S. 1.

比较政治学研究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如果这种研究最终不归结到如何直面我国的、我们自身的政治的话,那无疑是等于闲人自娱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是我国的政治学理论能否正确地分析日本与世界的现状,以及能否为科学地展望其发展方向给予具体的坐标。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能向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中彷徨的国民大众证明: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是有其存在理由的,也就是要求政治学首先是一门“现实科学”。

但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虽然必须依附于具体的政治现实,但并不是说必须直接拉扯上某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众所周知,现代的政治斗争带有很强的思想斗争的倾向,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政党之间的争斗,意识形态上的武装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学者的政治理论难免会被斗争中的某一党派当作武器来利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空泛的、不值一顾的理论。然而,当学者把现实的政治或现存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素材时,在其内心引导他的必须是真理价值才行。而事实上,政治家总是倾向于从对大众的动员效果上来衡量理论的价值,主导其判断的标准往往是宣传价值或煽动价值。虽然同是直面政治现实,但两者之间的态度(Stellungnahme)截然不同。当然,学者一方面也是市民,不得不关心自己的学说被什么样的政治势力所利用,甚至有义务搞清楚自己的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但是这与其思维的内在动力不是同一问题,哪怕他属于相对立的党派一方,而且日夜为那一党派的政治理念在奋斗,一旦要对政治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时候,他就必须

将所有的政治热情、希望、好恶置于纯粹的认识之下，不贯彻这种“禁欲”精神的话，他所写的“理论”大作与政党的宣传小册子之间就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差异，当政治学迫不及待地要作为政治的科学服务于现实时，一方面就有可能丧失政治的科学性沦为政党势力的奴隶，这正是其前途上设置的第二个陷阱。

如果单纯地只想避免政治学与特定的政治势力结成隶属关系的话，问题倒比较简单；但在认识某一政治现象时，想要排除一切主观判断的干扰，往往是知易行难。因为政治本身就具有唤起人们内在激情和本能的力量，所以，当人们在认识政治现象的时候，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掺入了一些自己骨子里所存的善意的、不合理的主观判断。不光如此，进一步考虑的话，在政治思维的层面，想要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得到透明的、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不论愿意与否，都必须面对政治思维的这一特征，以及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要想把指导现实的政治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确立的话，这一难点是难以回避的。

## 4

俾斯麦曾经将政治称为“可能驾驭一切事物的法术”(kunst des Moglichen)。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政治思维的特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衍生出新的内容。从这一意义上讲，或许是以包含未知动态、可变事物为对象而产生的。前面已经讲过，随着19世纪德国国家学的发展，有关政治的理论部分逐渐从国家理论中被排除出去，成了一味地逐渐完善国法学的历程（最终将该传

统推向极致的是凯尔森<sup>①</sup>的纯粹法学)。因此,将政治学考察与法律上的分析进行区分时,共同的认识还是趋于将政治与国家的“动态”结合起来加以归纳。<sup>②</sup>

谢夫勒<sup>③</sup>将日常的国家生活(laufendes Staatsleben)与政治区别开来,把“行政”这一依据已有法规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国家行为(Verwaltung)作为前者的典型,反之,通过个别决策而重新形成的内容称为“政治”。另外,布伦奇利<sup>④</sup>认为理论性国家学是以静态的国家秩序(ruhende Staatsordnung)为对象,而政治学的任务则是把握“国家生活中各个潮流乃至各种倾向”的方法。再有,耶利内克<sup>⑤</sup>认为,针对将对象限于国家现象的过去和现在的纯粹国家学,那种作为应用的(实践性)的国家学的政治学,从本质上看是开拓未来的一种权术学(Kunstlehre)。以上各种理论虽各有差异,但在赋予政治以可塑性与未来性特征这一观点上没有什么区别。就像耶利内克所讲的那样,政治学并不是纯粹“存在”(Das Seiende)的学问,而是包含本质上的价值判断,论及应发生的事物

---

①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年),奥地利法律学家。他继承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法学,并彻底排除一切外在于法律的因素,试图建立关于法律的“纯粹”之学,即不依赖法律以外任何因素的法的独立性理论。——译者

② 同样的例子,作为法哲学家的见解,可以举尾高朝雄教授的《国家构造论》,第75页。

③ 谢夫勒(1831—1903年),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世纪后半叶德国财政学三大巨星之一。在其《赋税政策原理》及《赋税论》等书中,根据国家有机体学说,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译者

④ 布伦奇利(Bluntschli Johann Kaspar, 1808—1881年),瑞士法学家、政治家。——译者

⑤ 耶利内克(Jellinek, 1851—1911年),德国法学家。——译者

(Das Sein-Sollende)的学问。<sup>①</sup> 在此不去赘述德国国家学中这两种分类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与德国官僚国家相关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中确实潜在着与政治性内容相对应的厌恶乃至回避的情绪,那么他们对于政治性思维的特征所秉持的那些直观就并不一定是错误的。

如此一来,如果借用兰茨胡特的说法,政治学的宿命就是应该在“位于其可能性、可变性的观点之下”(Unter dem Aspekt ihrer möglichen Veränderbarkeit)来认识政治现实。<sup>②</sup> 因此,在这里,进行主体认识作用之前,对象并不是以事先凝固的形象存在,而是通过认识作用本身赋予客观现实以一定的方向。主体和对象之间产生不断的交流作用,研究人员以“实际存在的全部思考和全部感情”<sup>③</sup>投身于政治现实中,当然,这样的事实不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思维,也适用于以社会、经济现实为对象的一般学问,可以说是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宿命。而在要把为实现未来而行动、斗争的人员乃至全人类当作直接对象的政治思维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将达到极度白炽化的程度,这一事实是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问题的设定方法乃至一个范畴的提出,其本身就已对客观现实中相应的各种活动势力带有一种评价。

也有对此表示怀疑的,比如就现代日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危机,对问题所在的认识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分歧。有人以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为出发点;也有人归结为计划统筹还是自

---

① G.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dritte Aufl. S. 13f.

② Landshut, *Kritik der Soziologie*, S. 67.

③ H. Heiier, *Staatslehre*, herausg. v. G. Niemeyer, S. 53.

由竞争的问题。对有些人来说议会主义还是直接行动是最大的论点(issue),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如何建立民主战线才是核心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不是拍脑袋随意想出来的,也不是可以任意无限列举的。这种分歧是在实际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变革以及各个社会阶层对其适应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是与所提出问题的各个社会阶层的根本利益息息相关的。

所以,对于提出是计划统筹还是自由竞争问题的人来说,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不是现实存在的,可以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而后者也会坚决否认前者提出的问题,因为承认问题本身,就相当于承认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的必然性。这点也同样适用于现在所用的种种政治概念上。

什么民主主义啦,什么反动啦,这些词自然依附于使用者的世界观判断。诸如“秩序与道义”“排除少数人的独裁”“民族要独立”等等,每一条本身都是正经八百的标语,都是在某种极为具体的政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它们都将现实努力定位于为了一定的政治势力,或面对一定的政治势力。所以,学者在这一范畴内去认识政治现实时,无论自己是否能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就现存政治的各种动向做出了选择性评价。

政治学家首先必须坦率承认自己学术中存在的这一认识和对象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换言之,就是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政治思维的存在制约性<sup>①</sup>。在政治舞台上不可能存在不当演员的观

---

<sup>①</sup> 一般就社会思维的存在制约性(Seinsgebundenheit)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无疑是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我从他那儿学的不多,只是对他所谓的相关主义(Relationismus)概念以及在社会自由浮动的知识层中寻找其实体的担当者这点表示怀疑,但这改日再说,在此暂不去涉及。



众。在这里，“严守中立”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在这一意义上，学者对政治现实构筑某种理论，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

通过这一意义上的实践，学者也会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现实中去，面对着无法回避的事实，闭目养神，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唯一观众的样子。这不仅是自欺欺人，甚至会贻害众人。他起到的作用不过是用貌似“客观”态度时常散播些诸如“成者王侯败者寇”式的机会主义。面对一切关于世界观的政治斗争，单是把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话，仅这一点就表明他没有资格作为一名政治的科学家。<sup>①</sup>

我上面说过，政治学者应和其他学者一样，根据真理价值来进行自己的思索，在这一意义上有必要坚持“禁欲”的态度。但是，禁欲也只有以欲望的存在为前提才有其意义。它与欲望的格斗越激烈，其伦理价值才愈发增大。一开始就缺乏欲望是生理上的缺陷者，与伦理一样，在政治上也不足为道。

政治学不能成为政治势力的奴婢，这并不是给那些回避明确政治决定的“清心寡欲”的“客观”主义者的献词。政治思维既被其考察对象所约束，反过来又约束其对象，其结果是政治理论中往往

---

<sup>①</sup> 在我国，马克斯·韦伯的价值判断排除论很容易成为这些旁观的实证主义者的挡箭牌，韦伯自身认为：理论性的价值关系与实践性的价值判断的相互分离是“研究者的理想”，而要完全实现之反倒与人格的统一性相矛盾。（Vgl. 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 S. 330.）他在《社会科学的认识的客观性》和《学术作为一种职业》中都尖锐地指出：其学说不能混同于对世界观的价值判断所持的旁观态度，乃至对左右两边所取的“中间派”立场，他要求学者作为市民的义务应该明确地表明各自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韦伯本人正是付诸火热行动的实践者，这一点其遗孀玛丽安娜和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都一致认为。正是这样，他的价值判断排除论才愈发弥足珍贵。

附带着明显的主观性,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报应”。既然是报应,那对于真理价值来说一定是不利的。要信奉学术的自主性,我们就必须贯彻客观性,努力排除由意识形态引起的歪曲。但是,我们不能无视思维的存在制约性这一严峻的事实,和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他人和自身的存在制约性,这两方面究竟哪一种能更好地达到其目的呢?厌恶价值判断、标榜“客观”立场的倨傲的实证主义者们一方面炫耀自己对价值的“寡欲”,而实际上又容易陷入另一种结果:即在他们的“实证”认识中时不时地会潜入某种价值判断。对此,出于一定的世界观的理念,对现实政治的各种动向抱有强烈关心和愿望的人,通过自身的反省,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承认政治思维的存在制约性。因而在认识政治现实时,不断戒备那种因希望和意愿造成的认识上的隔膜,反而可能直逼事态的内幕真相。<sup>①</sup>恶人比善人更接近弥陀的救赎,类似亲鸾<sup>②</sup>所说的这种反话的关系在此也能成立。

总之,在追求客观性方面,对于立志于现实科学的政治学者来说绝非易事。他必须在内心不断克服作为理念的客观性和作为事实的存在制约性的二元之争,这种紧张感将随着他的学问在政治现实中扎根越深而变得越发剧烈。他到底会因不堪忍受这一紧张感,在现实政治中随波逐流,直至堕落到将自己的学术作为特定政治势力的手段、纯粹的“意识形态”呢,还是相反,对所有一切具体

---

① 当然这只是抱有学术热情的人之间的事,那种只会马车式的冲撞型的“政治上的肉食动物”(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语)在这里不去论及。

② 亲鸾(1173—1262年),公元12世纪(日本镰仓时代)净土真宗始创人,著有《叹异抄》等。——译者

的政治现状熟视无睹,索性回到过去那种抽象的书斋政治学上呢?不管选择哪条道路,我国的政治学依然苟存于社会科学中的不起眼的地位之中。但是,如果他能锲而不舍地挑战这一相辅相成的难题,在苦难的历程中寻求到一线新的解决问题的希望之光,也许到那时才可以说,日本终于有了扎根于自身地盘的政治学,而非来自哪个国家的舶来之物。

(1946年)

### 追记:

本文刊登在文部省人文科学委员会编辑发行的杂志《人文》第2号(1947年)上,该期主要是为了概观我国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现状和动向,我执笔的是政治学方面。对于当时日本政治学的贫乏和落后,我焦躁不安的心情与战后的那种解放感——这当然并非我一个人,而是充满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由此流露出来一种悲壮的语调。经过十年,重读这篇文章,说实话有点不大自在。尽管如此,当时凭着年轻气盛在该文里就过去日本政治学的方法和定位展开了“清算主义式”的批判,这着实地刺激了老一辈政治学学者,不久便有蜡山政道的《日本近代政治学的发展》这一优秀作品的诞生,我真没想到这篇论文的意外“贡献”竟还有这一机缘。

当然,十年的岁月已大大改观了学术的状况,在社会科学里过去基本没什么市民权的政治学今天已经成长为一门令人瞩目的学问,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甚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著名领袖们都开始警告我们注意“现代政治的界限”。社会心理学及文化人类学那种

进到日本的时间尚浅的学术领域,战后涌现出众多的研究人员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学领域,研究人员的剧增真有恍如隔世之感。而且年轻有为的研究人员仍在不断出现,充满干劲和学术热情,在各个领域广泛地开拓新的处女地。其领域和课题方向纵横交错,亦加深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理解,像我这样兼搞日本思想史的人,想要综观学界的前沿研究动向也颇感费劲了。而且国际交流也频繁地开展起来。

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篇论文作为引发议论的一个起点正成为日本政治学界的一种“记忆”。但另一方面,因循守旧的那一套还在继续,而且这一领域又出现新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就政治学家自己来说,那种在为方法论的方法论和为定义的定义上浪费时光的倾向明显凋落,尽管立场方法不同都开始直面日本的现实的政治问题,而且都是带着具体的问题意识来进行研究,或就外国的制度或就一般理论,这一研究态度已大为改观。但是,在研究如何与政治现实相互呼应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在某种层面上,两者的鸿沟甚至比战争刚结束那时更大。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研究条件的地域差和职场差甚为严重,研究人员的分布情况也有显著的偏颇,特别是地方的年轻学者缺少交流,孤军奋斗;而中央大城市则通过各种研究会和集体调查等,许多事项已经作为共同认识互为通晓了。这里潜在的问题是,实际上所有领域都是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今天也不见任何改善的迹象。像政治学这门还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或不能不去吸收的学问,这种地域不均衡的发展就容易产生一种病理现象:中央是中央的,地方是地方的。

与其他学术领域,特别是传统的相关领域(法学、经济学、历史学)之间几乎没有相互交流,更有甚者,随着政治学的发展反倒有种倾向是更不去交流了。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最为关键的是日本社会科学的历史起的作用极大。政治学的学术独立基本都是从法学的方法论上的自立,也就是从国家学向着政治学的方向转变;而在西欧,从法学的独立则反映为强化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地盘。可是在日本经济学也好,历史学也好,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传统的德国学派占据主流,政治学想要有其独自の开拓,总不免孤立于其他相邻学科。最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学术语上,像芝加哥学派的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的术语,在美国都有不少人看不懂,别说是日本了。这如果是太“出格”的话,那么欧洲那些并不罕见的范畴和词语,在日本的社会科学领域尚有不少还很生疏。于是,用这些术语来做分析研究的政治学家往往会招来相邻学科领域的批评:爱用难懂的汉语词或外语用得太多。(政治学领域里比较传统的如政治制度论还相对好些,当然也看用什么研究方法来研究)当然有必要警惕那种新领域里常见的炫耀学问和知识上的虚荣心,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且,学科的孤立化和语言的“隐语”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事实。只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另一个事实:当今日本,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当特殊的范畴及用词法中用的也是难解的汉语词,而且能堂堂公开通用,且已通俗化了。这当然既不是主张政治学术语的抢占地盘,也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要靠边站,只是一种呼吁,希望对现在政治学者的苦境多一点宽容度。虽然到时候“时间”会解决问题的,但眼下作为政治学者只有将下面两种办

法并同使用：第一要“从下至上”地将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加以锤炼上升到学术用语里；第二又要“自上而下”地将学术术语在具体分析中验证其实效性，对那些实效性较高的术语要致力于普及。（顺便提一句，邻接领域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用“现代政治”(Modern Politics)一词时，总是设定为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版上。而且不光是现代经济学，包括社会心理学和语义学，如果要抽出其共同的认识论的特色的话，将当今有力的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做一对比，也可以归入前者的流派之中去。但是我的想法是，政治学这门学问不管从历史上看也好，或从方法论上看也好，都不像现代经济学那样有着所谓的自我完结性，而另外，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与经济学同一意义上来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至少在今天还无法做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单一的方法基础上，再从其综合社会科学观点来看，政治学的多种多样的研究看似一种色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当然的，拿美国政治学中的一个方法倾向来推测一切，不光是我，其他多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都会感到困惑的吧。）

当然，要进一步就“政治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及其方法的多样性意义，与相邻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不同及关联，政治学的主要领域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不光政治学本身，就连以现代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本书，从性质上说也是不适当的，这里不去涉及。我对政治学总体的想法在《社会学入门》<sup>①</sup>中的“政治学”一条里有过阐述，对政治学的思考方法是什么样的，在本书各处也有所言及。而

---

① 美玲书房，旧版 1949 年，新版 1956 年。

且,在本文中我特别强调的政治学中的针对“政治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种倾向的批判,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或者到底我自己在后来是否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是发展了还是修正了还是退步了?就这些问题还是交给读者自己去讨论、判断和批评。

本书旧版以后,就政治学概述的还有“政治学研究入门”(《经济研究》,1960年5月号),特附记于此。

## 第二章 人与政治

### 1

敢于直面政治的思想家无一不提及人的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霍布思、洛克、边沁、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他们总是把人、人性问题置于考察政治的前提，其中当然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政治的契机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一部分人指挥管理另一部分人的组织性行为。所谓管理也好，组织化也好，都是现实中如何指挥人，而促使人付出具体的实际行动，政治行为方可成立。所以，无论个人的主观愿望与否，政治必须全面地通晓人之存在的原理以及构造。比如，道德与宗教旨在作用于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其结果是否能够成为现实，或者说是否能够表现于外部，对此我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漠不关心，但这并非具有本质上的决定意义，而其内在性或动机才是它至关重要的生命所在。所以表面上即使有人做了好事，但是这一行为若出于伪善之心或惧怕惩罚之心，那便将失去其原本的意义了。政治的作用在于它必须使人们实实在在地按照政治主体的目的有所行动才具其生命力。例如，对共产主义的宣传



来说,尽管许多人内心承认共产主义是真理,然而若仅仅存于内心,也就是说不付诸行动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让这些人真正加入共产主义的阵营实施行动,才可以说他们的政治宣传成功了。实际上通过动员人,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朝着共同理想的方向改变乃是政治运动的关键所在。

为了达到动员人们行动起来这一至上的目标,政治要全面掌握人的各个方面。比如,知识、学术对人的影响主要是以人的理性部分为对象,所以在学术上要使人认可,要以理性来说服对方。如果对方只是佩服你的能说善辩,或被你哄住,或因你所具备某种魅力而承认你的学说,那都谈不上是学术上的认同。又比如谈恋爱,可以说其很大的部分是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情感(所谓动之以情)。而商业上的经济交际活动则主要是唤起人的物质欲望。与此相对,政治的作用不论是理性,或是情绪,或是欲望,都必须将人的各个方面动员起来回应并解决问题。总之,政治把实际行动作为其目的,而如何作用则是没有固定套数的。不管是宗教还是学术或经济,只要有利于动员政治对象,都可以为自己的目的所利用。所以反过来说,宗教也好,学术也好,恋爱也好,如果失去了手段与其目的之间的单纯关联,只是为了最终让对方顺从依靠自己的话,那么这本身就已经转变为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了。

对于政治来说,最重要的是现实按照政治目的在运动,所以实际上政治家总是在预想着他的一言一行所带来的“效果”如何。与其说他坚持什么真理,或忠诚于自己的良心,不如说一定的言行或事件会怎样影响拥护自己的一派,或是怎样有利于反对派了,这才是他无时不加考虑的行动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每星期收音机

播放的各党派代表的座谈会最典型地显示了政治本身的特点,这样去听是相当有趣的。)

因此判断一个政治家的功与罪最终应看他的政策实际上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关于他的动机之善恶至少不应成为首要问题。政治家的责任是彻头彻尾的只看结果的责任。例如有些人面对站在市谷法庭<sup>①</sup>上的战犯,怀着不少同情之感,认为“他们也都是为了这个国家才这么做的啊”。其实,这些人并不知道应如何来判断一个政治家的行为。

总而言之,政治家的行为准则是以实际效果而决定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舞台演员很相似。比如,善于煽动的政治家,他在讲演时从不忽略去研究每一个动作与每个发音会带来怎样的效果。结果背后存在的真实的自我与追求眼前效果的“演技”之间总是游离不定的,由此产生政治上的逢场作戏。所以有人说“搞政治的得与恶魔携手”(韦伯),“政治使人走向堕落”(俾斯麦)等。人们总以为政治必然要与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连起来,其实不然,最大的原因在于政治本身是实际作用于人,本质上是要确保某种结果的。所以,与其说政治肮脏,不如说现实的人天生就没有天使那般纯洁完美。

## 2

政治对人的预想似乎向来不是那么完美,卡尔·施密特甚至说:“真正的政治理论一定是基于性恶论的”。的确,从正面阐述政

---

<sup>①</sup> 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译者

治的思想家都是主张“性恶论”的。在东方,虽然儒家主张性善论,把政治(治国平天下)归属于个人道德(修身),而荀子和韩非子等法家则强调法与政治的固有意义,多少都是性恶论者。在欧洲,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学的先驱们都是彻底的悲观人性论者。马基雅维里在著名的《君主论》中如此说道:

人,一般是忘恩负义,善变且阴险,遇险必逃,追逐利益的。若给了好处就会跟你,而需要付出牺牲时,立即逃避、背弃了你。

霍布斯的名言“人是吃人的狼”,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在没有政治社会之前的人的状态(自然状态)必然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斗争状态,由此才逐渐建筑了强大的专制权力。

人们一直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性恶论。道学家更是视之为眼中钉。其实原因之一是,与道学家们相比,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他们没有给人的现实政治蒙上一层面纱,他们只是拥有一点直面现实的勇气而已。此外,另一原因是人们对性恶论也存在不少误解。霍布斯对那些一谈起性恶便极为愤慨的人回应道:

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出去旅行的时候你要携带武器,愿意尽量找一个同伴;睡觉的时候你要锁上门,在自己家里不是还要给箱子上锁吗?而且这还是在有法律的情况下,知道如果有人要侵犯你的权力或给你带来危害时,全副武装的警

察会来惩罚他们的。<sup>①</sup>

而且,索雷尔<sup>②</sup>在《暴力论》中也尖锐地指出了善与恶的相悖:那些信奉朴素的性善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一旦要付诸实际行动时,就会压抑住那个万人都信奉的“善”,反而在客观上会导致非常残酷的非人的结果,此种情况并不少见。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搞清楚政治为什么要以性恶为前提的意义。其实性恶这一说法严格地讲并没有准确地表达其含义。正如卡尔·施密特所说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带着诸多问题(problematisch)的存在。如前所述,如果要真正有效地实施统治行为,把人组织起来,并最终作为结果得以确保的话政治才具活力,那么政治针对的是人这个特殊的存在,自然要探讨人的问题。所谓性恶论就是在这个特殊存在上贴的一张要特别给予注意的“红牌”。如果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做出“恶”举,事情倒很简单,也就不需要政治介入了。正是因为人有时偏向善,有时偏向恶,根据情况不同既会变成天使,又会变成恶魔,这才有以统治技术为基础的政治产生的余地。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这一观念,其意思也并不是说因为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要在现实生活中一直无止无休地争吵。对此,他亲自做了如下说明:

战争不仅仅是指格斗与争斗行为,它还意味着在诉诸争

① 利维坦(Leviathan)第八章。

② 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年),法国思想家,一位从马克思主义转而信仰普鲁东式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哲学家。1906年出版《暴力论》。——译者

斗之前不断显示自己的斗争意志,要为人所知。……正如所谓恶劣的天气,不是因为下了一两次骤雨,而是指接连好几天没完没了地像是要下雨的天气。战争的本质也不是指眼前的战斗,而是在于和平没有得到确实保证的整个期间随时都处在可能发生争斗的倾向之中。

政治把人作为前提,而人又是如“谜”一般的存在。对于神学来说人的原罪是拯救的前提。同样,人所存在的这种“危险性”,必然需要政治才能全面地加以把握。

## 3

政治只要是组织人的行为,那就意味着政治的对象不是个人,它所涉及的几乎都是群体的人。要使群体的人而不是个人在一定的期间为一定的目的行动起来,就要比个人更要多加注意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政治家要动员一个群体行动起来,往往不能超过这一群体内部成员的教养及精神素质的平均水平,他得先放下身段才行。如果他的领导能力过强的话,就会游离于他自己率领的集团。相反地,如果缺乏领导能力,他又会像卷入漩涡的一片树叶,有被拖到集团底层而沉没的可能,成为群体半盲目性的擅自行动的俘虏,即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俾斯麦曾哀叹的“政治使人堕落”的原因之一就是来自这种政治的群体性。

领导或指挥别人所需要的政治权力的强弱,无疑与其领导的

对象,也就是群体的自愿服从的程度成反比。自愿服从的因素越少,亦即政治团体成员的离心力倾向越强,那么组织领导就需要实施更强大的权力。不过更多的场合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彼此具有相互作用,对成员的强制性组织活动的依赖越大,成员的自发性活动因素也就越薄弱,离心的倾向就越强。这完全是一种悖论,极端的无政府状态与极端的专制其实彼此相去无几。换言之,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必然招致否定自我的强大专制,反过来看,专制政治走到尽头,必然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来否定自我。梅列日科夫斯基以俄罗斯革命为例,尖锐地指出这一辩证法则:

革命不过是专制的反面,专制不过是革命的另一面。无政府状态与君主政体是同一素材(*prima materia*)的两个不同状态。一个人对万人的强制是君主政体,万人对一个人的强制是无政府状态。(中略)冻结的无政府状态是君主政体,融化的君主政体是无政府状态。<sup>①</sup>

诚然,以上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站在反对俄国革命与沙皇专制的立场上所言。虽然我们必须注意其政治含义,但是这里所论述的无限的权力与无限放任这一否定辩证法的统一关系,其中含有不争的真理,这也是霍布斯早就指出过的问题。当固有的权威崩溃,完全丧失个人行动的可测性,即万人都各自存在着突变的危险性的话,相互的恐惧感会达到极点。处于这种情况,便会出现任何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革命的预言者”文艺论集》。

秩序都聊胜于无秩序的这一真理,随之招致强大的权力统一。由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到出现拿破仑的独裁专制虽然有各种历史条件做背景,但作为政治状况转换的典型,即是上述法则的显著例子。

与以上转换法则相反,政治团体内部的组织化中每个成员自发性的协作精神达到最高点时,就完全不需要行使权力。如果不行使权力的状态长期持续下去,根据物质退化原理,权力本身也会衰亡。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后追求的都是这种状态。但是无政府主义把国家权力本身看作是阻碍社会自主协作的最大原因,主张一举废除国家权力。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认为直到权力衰亡之前,都需要集中权力。所以就人性论上看,无政府主义是彻底的性善论,而社会主义则是站在比较悲观的立场。

## 4

政治是以动用物理性强制手段为最终保证的。这种强制手段是政治活动的一张王牌,然而,多次打这张王牌,政治也就走到尽头了。因为,当政治不得不举出这张王牌驱使群体行动时,它便意味着公开承认放弃了对人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的信任。物理性强制手段虽有立竿见影之效,然而却无法保证被强制的对象具有自发的忠诚,故反倒没有持续性。因此,自古以来统治者也都是尽可能巧妙地把权力的强制性掩盖起来,对政治统治加以各种粉饰,尽力深入到被统治者的心灵内部;尽量不制造强力统治的契机,以获取更多的出自内心的赞同者。

美国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安把唤起被统治者的内心同感的手段称作“米兰达”(miranda),<sup>①</sup>它一般是指能唤醒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或领导者的崇拜与崇敬心情。比如说,君主是上帝所派,天旱时能招风唤雨等神话,或显示君主权威的各种仪式,都可以称作“米兰达”。因为社会的进步,普通民众也开始科学理性地思考问题,魔术性的因素逐渐消失,旧的“米兰达”渐渐行不通了,尽管如此,它也还会不断重新粉墨登场。国家举行的各种仪式,或者节日、国旗这些要素,对今天的政治统治者来说依然是重要的“米兰达”。

但是以纯粹理性的形式来看现代国家,统治者不再需要那些宣扬统治权威的道具了,作为单纯的法的执行者,从形式上来看,统治者与实际利益基本无关,是在法的形式的基础上来进行政治统治。国家的权力以法的权力出现,它一开始就不再去干涉个人的内心世界。于是,思想、学术、宗教的自由,这类“个人自治的原理”得以承认。至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这些都是属于个人自治的领域,不应由国家权力来决定。这样一来,法与政治就只关系到个人内心世界以外的方面,而宗教、思想才是涉及个人内部的范畴。这至少是现代国家标榜的理念。

## 5

现代国家的这个理念较适用于立宪国家的阶段,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大众民主后,情况又有了大的改变。“大众”在各

---

<sup>①</sup> 《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第102页前。



个领域里登场出现。18世纪时被埃德蒙·伯克称为一群猪的大众现在不再是猪了,他们有了强大的发言权。这一现象出现于工业革命的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后,通讯交通的迅速发展,新闻、报道、电影等在传播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时,其手段和方式不断扩大。这种通讯交通工具的发达和民众大规模的登场又一次产生了新时代的“米兰达”。

巨大的广场上可以容纳数万人的民众聚会或游行,可以说是最新形式的“米兰达”。这本来是与大众民主主义的登场同时兴起的现象,但是,现代的独裁者为了夸耀自己的统治是基于人民大众的,或是为了向国内外的政治反对派炫耀自己的权威以压倒对方,就反复将这种新的方式作为“米兰达”来加以利用。电影中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面,在纳粹德国,青少年儿童列队行进,一起举手向希特勒敬礼。人们看到这个情景会感到希特勒的权力威信已在人民大众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梅里安说:“碰到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反的游行队伍时,不管有多么坚强的意志,也会意识到自己处于极度的孤立状态。”<sup>①</sup>所以,为了夸耀自己的政治权力,组织民众游行是最好的手段。

这样一来,被现代国家一旦分离开的外部与内部、公共与个人、法律政治与文化,再次变得难以区别开了。政治权力驱使广播电影这些高度现代化的技术,不分昼夜地向人民灌输自己的主义和政治观点。另一方面,与现统治权力相对抗的势力也会利用各

---

<sup>①</sup> 《政治权力》,第109页。

种宣传手段散布自己的意识形态。激烈的宣传战是现代政治的一大特点。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苏维埃联邦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对立,而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到了快与资本主义势力相抗衡的阶段,国内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斗争同时表现为国际上的对立。现在不仅是个人的外部物质生活,甚至连个人的内部精神领域政治的介入也无处不在。打开收音机会听到一种政治宣传,翻开报纸,报纸也是根据特定的政治观点写就的。政治在今天就是这样利用一切手段把人们铸入政治的模型。而且这绝不是所谓极权专制国家独有的现象。民主主义国家也逐渐变得如此。所不同的仅仅是,在极权专制国家这种思想灌输是公然推行的而已。可以说,在古典意义上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日趋狭窄,现代的自由主义自由自在地操作报纸、广播、电影等宣传机构,它与诞生初期的洛克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完全改变其面貌了。古典的自由主义为了确保个人的自由,不得不将政治性的介入允许到最低限度。而今天来看,它作为西欧文明的拥护者出现,极具积极的意义,而且其本身就显示出巨大的政治势力,对于敌对自己的原理,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组织扩大自己的力量。所以,现在的被统治者也没有像以前那样享受“自然”的自由。岂止如此,可以说个人的全部生活都被卷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里。这就是现代国家个人的精神世界发生危机的原因。本来宗教是最能容纳人的内心世界的,而现在,特别是西欧国家,宗教与政治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向政治化倾斜”,这一倾向要把个人的所有内心生活都包括进去的。比如,英国的天主教思想

家道森<sup>①</sup>在其近著《宗教与现代国家》中说道：

我们遭遇的最大危机不是由暴力带来的迫害，而是由于受到国家公共舆论的重压，以及在纯粹世俗的基础上大量地组织社会力量，宗教将被挤压，而从现代生活中消失。这种事态是不曾发生过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国家没有过那么强大的力量可以统管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门。

也就是说，道森激烈地抨击现代政治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围，侵害到了个人生活的内部。这一倾向达到顶峰的将是共产主义。道森说：

新兴国家与基督教之间潜在的对立在现代社会意识中得以充分显示的是共产主义。在世界史上共产主义首次获得了与基督教匹敌的国家政治形态，……它把基督教会作为对立面，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能量，它高举着独自の道德标准，由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各级组织掌握，以征服世界的意志作动力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等于说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抗衡才是当今世界人类面对的最大

---

<sup>①</sup> 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 1889—1970年)，20世纪重要的文化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也有人称他为社会学家和宗教哲学家，甚至把他与E. 日尔松和J. 马里坦等并列为“新时代的先知”。他曾被誉爲“当代第一流的文化大师”。代表作有《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译者

问题。然而,事实上数百年间以完整的一套教会组织严密管理着人们的精神与实际生活的天主教是没有什么资格大声宣扬这一点的。相对于中世纪教皇制是宗教的政治化,现代的意识形态国家则成了政治(国家)的宗教化、教会化而已。所以,从对“善”的强制性组织化的意义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天主教主义的直系,反而道出某种真实。恐怕从人性的心灵内部进行最彻底抵抗的是激进的基督教新教徒,比如那些无教会主义者。

针对靠意识形态加强组织化的危险性,道森是作为所谓极权主义国家的问题来提出的。一般从传统意义上看,已经长期获得统治权的政治体制所做的宣传,人们并不特别意识到,反倒是对之进行挑战的宣传格外引人注目。一眼看上去,好像只是新兴势力的宣传威胁人的内心世界,其实这是片面的看法。如前所述,在典型的民主国家,民众面对大量的宣传以及媒体报道的泛滥,无意识间已经受到一定的思考方式的约束。在洪水般的宣传网中,真正自由自主的思考能有多少呢?嘴上说出来要比实际上困难得多。我们自以为是自主判断的事情,其实也有不少是自欺其人。我们对表面上的宣传很敏感,但实际上最巧妙的宣传绝不会直接从正面作宣传。比如报纸对一起事件大写特写,而对另一起事件则尽量少写,甚至完全抹杀,这种操作方法才最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宣传。而读者几乎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宣传。在某一地方同样的事件即使屡屡发生,但不加报道漠然无视,就可以将事件对民众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说的所谓“舆论”,就是这样一天天被报纸广播培养出来的。利用这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心理进行宣传,从

中保护我们自己的自主性判断是极为困难的。“以前不能自由思考的问题,现在允许了。然而被允许的时候,其实也就意味着已经不能自由地思考问题了。”<sup>①</sup>

## 6

总而言之,面对现代如此庞大的政治化以及集团组织化趋势,就不难理解据守个人内心世界的学术、艺术及宗教几乎都会条件反射性地做出警惕与反抗的姿态。如果把这种态度简单地归于知识分子的特权意识或本能的保身之术,恐怕尚没有触及问题的所在。不管是任何政治权力,只要是政治权力,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践踏个人的出自良心的自由判断,不可避免地要抹平多元化的价值观,强制性地将其编入到体制内来。权力运用的技术手段越高明,其肢解人格的统一性使之仅发挥机械机能的危险性就越大。对权力的乐观估计要比对人的乐观论危险大得多。然而同时我们不能无视现实:我们不是生活在古典的近代国家里,不是那个个人内在的世界与外界公共领域划分明确的时代。政治化的现象如上所示,它不单纯是共产主义这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依据的个人内在的立场本身,为了对抗一切违心的政治组织,坚守自我,只能把自己也从政治上组织起来。我们面临的是这一尴尬窘困的二律背反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把自己嵌入一定的政治范式中,或注重效果,或简单的敌我对立。

---

<sup>①</sup> 斯宾格勒(O. Spengler, *Der Staat*), S. 176。

如果惧怕这个考验,企图逃离所有的政治动向,那结果反倒是给自己头上招致最恶劣的政治统治。殷鉴不远矣。

一切事物生来具有其丰富多彩的内涵,但现在的时代无情地按粗暴的政治对立把它划分开来,其实这样的时代在过去也不是不曾有过。比如斯蒂芬·茨威格在《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辉煌与悲情》中描述伊拉斯谟与马丁·路德两人对立时,饶有趣味地这样说道:

在那个世纪中虽然往往会出现极为罕见的事件,但整个世界却像被一股旋风把手巾撕作两半一样互相倾轧相克。这股旋风把农村、城市、家庭、人心切割成两段。那个时候大众的优势从四面八方以巨大的压力,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而且个人无法抵挡众人的疯狂痴想,保护不了自己。席卷而来的澎湃怒涛,不允许有人站在任何安定的立场旁观。

与宗教改革的时代一样,现代也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大变革的时代。而且由于机械、技术文明的惊人发展,这种分化也在无限地扩大,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现实。我们如果能经受得住这个政治化的火炉的考验后,是不是能够迎来一个新世界?权力的强制被人类社会所废弃,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完全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正如别尔嘉耶夫<sup>①</sup>所忧虑的,抑或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讽刺性地描绘的乌托邦社会的到来?即通过权力使

---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1874—1948年),俄罗斯思想家,20世纪俄国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以理论体系庞杂、思想精深宏富享誉西方世界。——译者

人的科学组织化达到极点,每个人都完全成为高度机械化社会中的一个零件。究竟哪个世界来临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万一这个《美丽新世界》真成了现实,那时候恐怕学术和宗教也无法谴责政治有违约之过。我们只有哀叹自己的软弱无能:本来我们人类就是标有要予以注意的“红牌”的,却未能摈斥这种政治。

(1946年)

### 追记:

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末,当时在京华学园的友人猪野谦二和田宫虎彦两位精心准备了一场文化讲座,此篇“人与政治”本来就是以这次讲演速记为基础的,然后登载在翌年2月号的《朝日评论》(已停刊)上。与第一卷第二章不同的是,好歹已经形成了文章体,但在收录到此书时,还是改动了不少语词字句等,使它略像一篇论文了。从理论上讲,这里说的大众民主中的象征作用,媒体的政治及思想机能等,在现在看来都已经通俗到了常识的地步,莫不如说,某种意义上看,其相反的一面更应当作问题来探讨。但此卷第一章的论文已经侧重政治学方法论上的反省,相对之下,本篇则是将现代政治的问题置于更为宽泛的范围内来加以考察,两者相辅相成,好坏都忠实地反映了战后不久我对“政治性事物”的看法。我那个时候,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思考着如何将政治学朝着“现实科学”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另一方面,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我又模仿汉斯·凯尔森<sup>①</sup>的纯粹法学,不断在摸索是否能建构一

---

<sup>①</sup>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 1881—1973年), 20世纪著名奥地利裔犹太人法学家,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个“纯粹政治学”之类的。其中与之相关的一个原因是前面提到过的政治学作为一门学问要求有其自律性,但同时,战后的政治,不仅仅是本来的政治,所有文化领域也都像决堤之水般地浸透了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这种分化一方面作为一种倾向其本身就伴随着所有政治的紧张感,亦即通过激情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特殊的日本式的(所谓感情用事)道德主义而表现出来,作为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反倒明显地丧失,这对于日本的民主主义势力的发展来说,处处起着消极的作用。我个人也正是出于这种现实的关心来考虑的。是否我们在这时就“政治性事物”应该超越党派的立场,或超越历史阶段,将潜伏的可能性,尽可能地剔除那些特殊条件来加以抽象,这样的话,就能防止意识形态和党派性的感情化,反倒能将真的问题点凸显出来。话虽这么说,可并不意味着这篇论文就是“纯粹政治学”对现代政治的一种适用。我本没有这么清晰的目的意识,首先,这样的体系化尚未在我脑中成型,只是此篇论述的背景有上述那种模糊的意向。其后,我的想法有所改变,认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学的本质也都是无法经过“纯粹化”而自我完结的。但是,就我来说,只要是关于上述所说的那种意向,其本身还是贯穿到今日的,这点只要通读本书,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尽管如此,这里所展现的“政治理论”绝不是包罗万象的,反倒莫不如说作为政治理论有点太过于单方面且趋于图示化了,这或许是我对人格特质理论认识得不足,另外一点是因为对于上述那种精神氛围中的“政治性事物”的某一层次,特别予以重视而已。(果然不出所料,本文发表后,立刻被《前卫》杂志的论坛时评介绍成是恶劣的反动论文。)但是,正如 J. P. 梅耶所说:“当今我们之间



的那种短浅的表层的政治思考,随着应付每天的目的而迷失自我,看似将政治学层次的人物论早已忘却,但实际上所有政治思考的出发点还是在追问人的本质。”<sup>①</sup>而且,人类本身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星霜仍旧持续,从这一侧面,再到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侧面,既然复合了所有可变性的因素,那么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政治学在观察人类行为时,肯定随时要因需要和状况所变,使用各种长短不一的尺度。仅此而言,将人类只视为历史社会条件之集合,这一想法就是将之置于“永远的时间轴上”的立场,同时又远离政治现实的认识。

这里所阐述的几点,其中有关政治责任即是结果责任这一点,我去年写给“思想的火花”(《思想》昭和三十一年三月)专栏中,谈到关于战争责任的问题,因而引起反响。这里,我想再就道德责任相关的问题谈几句。结果责任这一看法往往容易被误解,它与那种“胜者为王败为寇”的思想迥然不同。比如,这里指出的一级战犯的责任未必是指他们对战败的责任,当然也可以追究这种政治责任,但主要应该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以及他们决定实施的政策的结果:和平遭到破坏,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的丧失,国土的荒芜,贵重文物的损毁;这才是问题所在。当然说起结果,究竟哪种结果更为重大,这是因时代和国民的价值观以及世界观所决定的,在这一意义上,政治性的和伦理性的在广泛的整体状况下是契合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将政治评价从个人道德评价中区分开来予以

---

<sup>①</sup> J. P. 梅耶(J. P. Mayer),《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群众时代的预言家》(*Alexis de Tocqueville, Prophet des Massenzeitalter*), S. 136。

定义,前者因为关系到权力,而权力在极限状况下是包含着集体抹杀人的生命的,特别是对政治领导人要彻底追究其结果责任正是在于这点。“切萨雷·博尔贾是被人认为残酷的。尽管如此,他的残酷却给罗马尼阿带来了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恢复和平与忠诚。如果我们好好地考虑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博尔贾比佛罗伦萨的人们仁慈得多,因为后者为着避免残酷之名反而让皮斯托亚<sup>①</sup>被毁灭了。……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而君主执行刑罚不过损害个别人罢了。”(《君主论》第17章<sup>②</sup>)尼可罗·马基雅维里说这段话时,他正是通过强调政治世界中的道德主义和感伤主义,反过来将政治的伦理(virtu)凸显出来了。

---

① 皮斯托亚(Pistoia)在1501—1502年间由于坎切列里(C. Cancellieri)和潘恰蒂基(Panciaticchi)两派之争,佛罗伦萨的统治者采取容忍态度,最后酿成流血、掠夺与破坏的悲惨状态。——译者

② 此段译文据《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潘汉典译。——译者

### 第三章 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

A: 这里的环境真清静,工作进展得顺利吧。

B: 还可以。不过,初来乍到的,不可能像刚加足油的机器那样提高效率,好在不像东京那样,用不着担心随时被来客打搅。

A: 这不,你刚静下来,我又闯了进来。

B: 咳,人都很贱,明知谁也不会来这儿,心里反倒盼着有人来。

A: 听说这里常有一些作家来写作。

B: 可不,前一阵那位打伤了人的 T 氏也来这儿住过。听说在这儿还喝多了药大闹了一番。一块儿来的 S 氏领着他回东京的路上,在火车里也折腾得天翻地覆,真是受累不浅呀<sup>①</sup>。

A: 呵,那家伙来到这山里也不守规矩,执迷不悟啊。

B: 据说药性发起来就产生幻觉,那可不得了,连太宰治<sup>②</sup>呀、收电费的呀都出来和他对话。

A: 最近作家文人中,接二连三地出现麻药中毒患者,像我这种平凡的上班族简直不可理解。难道不过那种荒诞的生活就

---

① T 当是指田村泰次郎,S 当指坂口安吾,两人同属一个文艺结社,都就“肉体文学”有所贡献。——译者

② 太宰治(1906—1948年),本名津岛修治,日本小说家,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丸山写此文时,太宰刚去世不久,故有此说。——译者

写不出好作品吗？我真是怀疑那种不去作践好端端的生理机制就干不出来的工作到底有什么理由存在。唉，在我们看来，你的工作跟那些人不也是很接近的嘛，或许更应该同情他们才是。

B：这就错了，就我的专业来说，在枯燥乏味这点上，一点也不逊于你的工作。我反倒觉得像你说的这种问题，应该在社会上由更多的人不断向作家们提出来才好。社会上似乎有一种倾向，压根儿就把作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人种，这对作家有反作用，使得他们心安理得地过着那种不正常的生活。当然，作家中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概把他们视为药物中毒者未免太过分。不过，至少在日本，好像在普通市民的生活环境里很难从事创作一样。

A：当然是有诸如此类的外部环境的问题，但是，不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即普通的市民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而是刻意选择特殊的环境和异常的事例，正是这一心态的先天性所在，所以总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加入某种异常的“实验”。前些日子，我浏览了一遍某杂志上的小说特辑，令我惊讶的是总共七八篇作品，每篇都有描写和女人睡觉的场面。这样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专门分出一类所谓的“肉体文学”了。我自己当然并非清教徒，读到那种内容就感到恶心，也不会因有和女人睡觉的描写便认为作者是变态。但是，再怎么讲，也是够让人惊异的了，那些堂堂的纯文学作家们汇聚一堂，竟然淋漓尽致地描写起男女房事来了。我这么说，马上会遭到一种反驳，说战后日本人的性生活本身就乱七八糟的，文学仅仅

是对此加以表现而已。的确,如果仅看现代社会的一个侧面或许可以说是言之有理,但我们无法想象所有日本人在性生活方面都已变得如此堕落。何况所谓肉体文学的作品里所描写的都是些无节制的、荒诞的场面,这些究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多大的关联呢?然而未来的史学家们看到这些小说后,难免会将其视为战后日本社会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因为那些描写并不仅限于“黄色杂志”里,至少几十年或几百年后,当人们读到那本小说特辑时,恐怕都会以为1949年前后的日本人整天想的都是性交的事。

- B: 总不至于如此吧,一般说来,肉体文学以及言情文学之类,首先作者执笔时很明白那不是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原型的,而读者一方则因为其中所描写的是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完全脱离的情景,才备感吸引的吧。那毕竟是一种“憧憬”。
- A: 不过,想想看,我们的日常现实生活确实枯燥乏味,没有诗也没有梦,当然难以成为小说的题材了。大概是物质材料方面太贫乏的缘故吧。
- B: 这其实是带有社会性的问题,不是光靠作家的愿望或者能力就能解决的。但是话虽如此,并不是说只要物质材料方面充足完备,我们生活的精神方面就会自动地丰富起来。能证明这一点的实例俯拾皆是。如果没有想从生活中创造出“诗”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那么无论到何时都是老样子。外国人经常说日本人不懂社交。这里所谓的社交精神我想并非指聚集会餐或跳舞什么的,而是每个人经常具备的、尽量想法子让彼此的对话更加具有普遍性、更加丰富充实的一种念头。

从这种意义上看欧洲的小说或电影,就会发现他们无论怎样低等的下层社会中也都有“社交”。前不久看了一部电影,是科克托的《可怕的大人们》。片中父母与其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对话,哪怕极其简单、琐碎的问答,每一句都生动有趣充满活力,让我十分佩服。要是法语懂得再多些,我想看起来一定会更有意思。如果说那是戏中的台词,跟现实不同,那么再看日本的戏剧、电影中出现的家人之间的对话,哪里有这种炽热的情感呢?归根结底还是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这就是他们和我们在精神生活上的落差所致。说得极端一点,在他们那边,人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已经是某种程度的“作品”,素材本身或许就已经形象化了。而在日本,正因为没有这些,所以作家们势必要到与普通民众生活相悖的特殊环境或异常事件中去猎取素材。

- A: 如果是这样,那么众所周知的日本最传统的私小说应该怎样理解呢?我想这不仅跟你刚才的议论有关,反过来看,在拘泥于小市民式的日常生活体验这一意义上,又正好跟野上弥生子的作品、战争文学所追求的那种非常环境完全相反。你怎么看?
- B: 光就思想底子来看,我认为这两种倾向没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创作不管是非常题材还是正常题材,在日本最多只是在题材“环境”和技巧上有些不同,起感光板作用的作家的精神结构本身则大体相似,我这样说也许不过分。肉体文学、战争文学虽说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环境相距很远,但这与私小说表现出来的日常性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它无非是我们的感

觉经验中最低级最不好的那部分从数量上被肆意夸张扩大了而已。被表现的形象看似奔放无羁，实际上其活动总逃不出平凡生活的范围。同样是对异常性、非常性的关心，欧洲文学或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出来的魔鬼形象才算是与日常经验性完全不同的层次吧。说起来同样是描写肉欲的文学，读后印象却跟日本小说迥然不同，其原因我以为不单单在于处理素材的技巧问题上。话说白了，就是他们那边有专门创作色情文艺的“专家”，这类作者与文学家、作家不但被完全区分开来，而且他们的作品一般也被社会的常识观念排除在艺术作品之外。可是在日本，从以前的为永春水直到永井荷风先生这一代，其作品神韵始终不减，色情与艺术的界线难以划分。所以反过来可以说，仅就色情文艺而言，日本的作品要“艺术”得多。再比如浮世绘也同样。由此可见，问题还是在于技巧背后的某种差异上。

从这层意思上看，无视私小说迄今为止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将它与今天的“肉体文学”混为一谈，难免有些不够严谨。然而再看看作家们的精神像牡蛎一样只是仅仅附着在感性的（自然的）所与物上，想象力缺少真正的自由的飞翔，这一点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他们其实都是“肉体”文学。

A：这可不得了。这么说，就是我也觉得，像志贺直哉那一类被称作最高峰的私小说，作为小说那可一点儿不有趣，却都一味地被誉为了不起的杰作。我没你那么胆大，担心说了这样的话会遭人嘲笑，只好将真实的印象偷偷地掩藏起来了。但话又说回来，人们不是把那样的描写叫作现实主义么？你怎

么会净搬出大量的概念性术语来分析,什么精神的不同层次呀,形象等等……

B: 想象当然也有它的存在基础的。如果想象排除了即物性,只是类似羽化登仙的话,那么去精神病院,就能随手拈来最高水平的艺术和学问。不过,如今再提此话也许不那么合适,所谓现实主义其实是创作手法的一种,现实主义恐怕并非指如实描摹感性事物及对象。通过人的精神的积极参与,现实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某种媒介作用重建后才呈现出来时,它才成为“作品”(fiction)。因此,还是人的精神的统合力起了决定性作用。可是像日本这种情形,精神不能从感性自然——这自然中当然也包括人的身体——中分化独立出来的情形下,精神的媒介力相对较弱,其结果就是作品自身不具备内部统一性,而是被彼此独立的单个感觉经验牵得团团转。读者又有读者的问题,由于他们不能将 fiction 当作 fiction 来欣赏,于是猜测故事背后的原型,便时时使问题复杂化。有人说看编造出来的故事心里不踏实,这种心理结果就助长了如今“真实故事”报道的泛滥。那才是日本式现实主义的极致呢。

A: 你的这种议论方式真像以前遭受空袭时常见到的一种什么燃烧弹,刚刚落到这边吧那火花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又飞到那边去了,叫人摸不着头脑。你想说的内容大致也能察知一二,不过你刚刚谈到的精神与自然的游离,让我无法理解。现实中恐怕没有游离在自然之外的精神吧。

B: 我一会儿谈到精神上的独立,一会儿又谈到从感性自然的分



离,说到底都围绕着机能性独立的问题,而并没有论及精神是否作为独立实体存在于自然界这一形而上学的理论。相反,在我们国家,只要一提到精神、价值,就会马上想到实体,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产生了那些一听到精神独立之类的言论就耸肩不屑的“唯物论者”,另一方面又涌现出不少言必称虚无、绝望,将精神当作“物体”来把玩的“实存主义者”。

- A: 你这番话又是在随便迁怒于人了。莫不是你心中有什么不满?话又说回到前面提到的日本人的态度,即有些人感觉面对虚构的故事心里不踏实,而企图将它推回到感性的现实中去的问题。如果借用你的话来作一般阐释,它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尚处在未能从自然中获得机能性的独立状态,说到底还是与日本社会的封建性有关吧。
- B: 封建一词近来几乎成了谈及“日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修饰词一样,甚至有一种倾向,仿佛只要这么一讲,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似的。不过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孕育了这种精神的社会基础确实是近代以前的产物。
- A: 这一点也请讲得具体一些。
- B: 你可真不好对付。那可实在是个大问题。要是认真来讲,首先要综述一下近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然后还应对日本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即天皇制、家族制度加以说明,这些都是规模巨大的工作,非我能力所及。再说,即便在这里能做到简单归纳,那明摆地顶多也只是老一套的公式化论调。
- A: 我并没有想在这里听你谈论什么深奥的话题,可是你每次谈到自己专业以外的文学之类时,总那么气势汹汹天下无敌的

样子,一等问题接近专业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我听说真正的学者应该对专业口若悬河,而对专业以外则三缄其口才是呀。我只不过感觉到前面谈到的日本人心理状态与当今的日本政治动态似乎有些关联,才提了那样的问题。

B: 又吃了你一记厉害的反击。那好吧,如果有以最低限度议论政治问题为前提,且仅限思想史范围的条件,不妨就快速简洁地讲一讲这个问题。第一点首先是,为什么非近代的社会意识会对“fiction”感到不安,反过来说,为什么近代精神就相信“fiction”的价值、效用,并不断将其作为再生产的精神体现出来呢?这个问题也是一展开就收不拢的,这里姑且图示之。你翻开词典查查“fiction”这个词,它是从拉丁语 *fictio* 过来的,本来只是指造型、构思,后来转而演变成想象、展示等意思。也就是说,本来是从广义上指人们为某种目的或在某种构想基础上创作出某种事物。因此,信奉 *fiction* 精神的最重要根基可以说是对人的智力创作活动及其创作结果给予比自然存在更高评价的态度。所谓创作就是将素材按照某种构想进行加工,所以创作过程从素材的角度看是由“质量”变成“形象”的过程,而从创作主体来看则是将“质量”做成“形象”的过程。因此即使同样的创作作品,其质量性越浓厚,作为“fiction”的性质就越淡薄;反之想象性越浓厚,作为“fiction”的性质就越强烈。完全不具备自然感性或实在性,而完全是人根据某种目的意识,从纯观念里构想出来的东西最能体现 *fiction* 特征。由此便产生了拟制资本等概念中的“拟制”“虚构”等意思。“编造”就是指“现实中不存在”,这一逻辑

遂使得 fiction 上面附着了一层“谎言”的负面意思。然而如果说谎言和真实分别代表着与自然直接赋与的不等距离,那么近代精神毋宁是尊重谎言胜于真实的精神。其实更准确地说是高度评价经媒介加工过的现实胜于直接的现实的精神……

A: 我好像在被灌输谎言的哲学似的,那么它跟近代社会的形成这一重要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B: 你先听着别插嘴。如果事先不对 fiction 做这些说明,接下来的内容就不好明白了。那么至于近代社会的形成当然包括对中世纪秩序的破坏和在其废墟上逐步建立新市民社会的两个方面。但是,最要紧的则是要产生一种自觉,即认识到作为实现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前提,社会秩序、制度和习惯、亦即所有环绕在人们周围的社会环境都是人的产物,都是凭人的智慧能力可以改变的。

A: 这难道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

B: 但实际上这还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比如在中世,人一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了身份地位,社会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像这样的人类社会环境正如山星海月一样带着自然的实在性环绕在人们的身边。连本来具有特定目的的制度,如果在此环境中沉淀越久,人们就越来越意识不到它是被人为制定的,相反则把它当成一种天然形成的自然赋予物,从而再也不过问这种制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一般说来,这样的社会是不太需要明确的“制度”——这一点稍后再讲……所以,像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当然不会产生 fiction 的思维,即便产生也不会成为支配力量。

A: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这种思维方式是什么时期开始以明确的姿态出现的呢?

B: 是呀,我想大概是从被称作后经院哲学的邓斯·司各脱或者威廉·奥卡姆的时期吧。你可能听说过唯名论吧。针对圣托马斯等人提出的普遍概念都实际存在的正统理论,唯名论者们则提出普遍概念都是人们为便于使用制作出来的,实际存在的只是个别事物。否定社会规范和秩序的先天约束力,只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制作的一种理念,这一认识早见于希腊的诡辩派,唯名论与存在论的争议在中世初期也已出现,但是问题牵涉到中世秩序解体这一历史社会基础时,我还是认为后期经院派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A: 文艺复兴以后它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B: 这个问题如果细说,也没个完了。比如十七八世纪盛行一时的社会契约论,实际就是唯名论的嫡系子孙。社会契约的思维方式虽然也有多种类型,但最终把近世的社会契约论跟中世以及古代东洋思想中的君民契约论严格区分开来这一点,大概是基于视个人为唯一的自然存在,将社会关系全部归为个人目的及意志产物的理解之上的。原子论式的思维要么被指责为非历史的,要么被视作机械性的,总之在后世的评价不太高。不过正是它将人和环境分割得如此彻底,才会产生一种主观能动性来截断根深蒂固的因循旧习和历史性习惯例。当然,反之可以说,产生这种思考方式的现象本身,正是封建的社会关系走向解体的表征,所以它应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等各种各样的要素结合起来考虑。只是,社会契约

论中的“契约”原本就是高度的 fiction(拟制),这一点只有到了卢梭和康德的契约论以后才被清楚地认识到。在此之前有种很强的倾向,就是把原始契约看成是过去的历史事实来加以肯定。就凭这点,可以判断出当时的契约制作的立场并不彻底。

- A: 等一等,这里就有点儿疑问了。以前读过一本讲东洋思想的,我记得里面说,欧洲政治思想的思维方式中制度比人优先,相反在东洋的思维中首先是人要优先于制度或机构。这一点乍听跟你刚才说的欧洲近代精神似乎有点儿矛盾。按照你的逻辑,好像是说只有否定制度的自然赋与性,同时对人,即制度的制作主体进行强调方能成为近代精神……
- B: 其实我正要谈到这个问题呢。确实如你所言,东洋古来的思想中有一种人本主义。“总之这不是组织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在今天的日本也能时不时地入耳。首先你只要看看东洋的政治思想立刻就会明白,其中几乎找不到像欧洲政治思想中所有的组织论、机构论之类的内容。大部分是以锤炼统治者“人格”为目的的理论,不然就是有关统治手段方式的理论。就古典来说,四书五经属于前者的典型,《韩非子》《战国策》则为后者的最佳例子了。不管怎样,在那里只有人与人之间直接发生的感性关系才被当作问题来对待。组织也好,机构也好,本来只有当社会关系不放任自流为感性的直接的人际关系时才粉墨登场的。从这层意思上可以推知,在欧洲像这种“组织”以及“制度”真正发达起来也是到了近代以后,因此看中世的政治思想,虽然程

度远不及东洋,它的组织结构也是比较薄弱的。既然这样,可能有人 would 问,那么所谓前近代的个性主义与近代社会的“人性认识”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前者所尊重的“人”是指从最初即包含某种关系的人,是需要将其周围环境和人一一起来考察的人。关于这种“人本主义”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现象,比如类似道德、社会规范等只在已知关系之间通用,已知关系中的守约承诺与未知关系中不顾廉耻的行为可以同时存在,某个人对于其他人的支配力影响力等是依靠地位、身份、门户、“脸面”等等,总之是依靠被传统神圣化了的某种权威。在这里真正的统治者不是君主,不是领主,也不是家长,实际上就是传统这东西。在那样的社会中每个圈子的领导者作为个体的人是多么地不自由,他的行住坐卧没有一样不受礼仪习惯的束缚,这一点我想无须再举例说明了。然而,正因为人从一开始只能作为“关系中的人”来生存,其关系并没有采用一般关系的客观表现。法和习俗的不分离导致了习惯法在实际上的优势地位。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规范的媒介,不存在任何烦琐的规章或组织的媒介,从而表面上显现出一种“直接”的水乳交融的交往关系,实际上则不过是因为压制和暴力已成为传统而不再被意识到了而已……进入近代社会后,人们逐渐从那种固定环境中脱离出来,未知的人们之间也逐渐形成数不清的相互交往关系,于是,以已知关系为前提的传统或“脸面”渐渐不再管用。所以,客观的组织和规则取代“脸面”,人们相互之间那种直接的感性关系越来越向经过媒介作用的关系转化,从这

个方面来看,近代化可以说是一个人格关系逐渐非人格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想方设法制定各种规定或组织的主体由因袭的迷梦中觉醒,开始发现自我的角度来看,那反过来又是一个非人格关系的人格化过程。不过这两方面本来是并不相矛盾的。

- A: 但是,传统和习惯行为不也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吗?如此下去,所谓的近代式的制度或规章自身说不定过不了多久也会像传统一样反过来成为人们的绝对约束呢。
- B: 确实是这样,刚才也稍稍提到,也就是说由人为制定出来的东西才刚一出现,就会立刻被当作既成的东西编入到人们的环境中去。而且该环境越是稳定,其实质性也相应地越强,越发接近自然实际存在的地位。所谓的传统和习惯其源头恐怕就能追溯到“fiction”,但是,它们可以说是最接近自然的实际存在,从而丧失了作为虚构的意义。Fiction并非原本就包含有先天价值的绝对存在,说到底它只是为了某种方便才发挥作用的相对存在,这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如果制度或者机构不再参照它所服务的目的经常进行反思的话,那它就会凝固,趋向习俗化。相信 fiction 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要不断防止 fiction 本身的自我目的化,而要将之相对化,这是与那种一旦形成 fiction 就急于将它绝对化的做法正相反的精神。“谎言”正因为是“谎言”,这才显示出它的意义。如果将它与“事实”混淆起来,那么作为“谎言”的功能便得不到发挥了。我们若不经常保持高度的清醒,“谎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装扮成“事实”了。

- A: 这一点跟你以前说过的日本人的实体化思维倾向好像有点瓜葛么。
- B: 那是大有关系的。当人们倾向于把社会环境作为自然赋予物来理解时, fiction 也就相对容易凝固, 于是本来为了某种目的才设立的制度、组织, 却脱离其原本的作用而变得实体化。由于目的和手段之间缺乏不断的媒介交流, 手段便很快将自己目的化了。具有漫长传统且不容人们质问其存在理由的天皇制作为一切社会价值的根源, 毋庸赘言它的实体性是最牢固的。可是实际上甚至连近代制度在国民眼中都不具有虚构性, 国民毋宁倾向于在传统统治关系的同一地平线上将之实体化, 因为近代制度并非是通过斗争而争取到的, 而是被上层当作既成品移植过来的缘故。比如议会制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按说议会制是一种将多种多样的国民利益组织起来, 在民众与国家意志的沟通中充当媒介的制度, 它一旦偏离了上述机能价值便无法存在的; 然而日本的政党和议会未必历来如此, 它们与军部、官僚、重臣等比肩而立, 其自身几乎就是一种具有实体的政治势力, 否则也就不会有大政翼赞会这种劳什子大言不惭地打着“国民重组”的旗号粉墨登场了。帝国议会从一开始就被明治宪法的大权主义削弱了地位, 这首先是个不利条件; 而后又不能像新宪法那样贯彻议院内阁制的原则立场, 并充分行使调节社会利益的功能。这样一来, 国会本身就难说不会蜕化成一个庞大的权力实体。
- A: 同时, 正如管道上部堵塞的抽水泵在水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会爆炸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泛滥局面一样,不受议会领导管辖的那部分力量也随时有突发性爆发的危险性吧。

B: 这不单单是议会的问题,在其他民主组织,比如对工会来说也同样存在。一般说来,随着近代国家内部社会分化的进展,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人们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失去直接性,取代它的是组织的介入,各种利益集团、社团、力量牵制关系(pressure groups)错综复杂地相互竞争,按照各自的意志十分活跃地开展组织化活动;与此同时,各集团内部也出现职能分工——比如建立书记处、涉外处等部门。可是,在这些过程中,只要制度的表面合理化与意识构造的能动化之间产生齟齬,每一个组织也好部门也好就不再发挥其社会分工上的重要作用,而是一下子变得实体化了。一旦这样,分工就成了割据,专业就成了独占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社会上任何一个领域的技术官僚化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实质官僚化的。一个姑且称得上近代化的国家,在外表上越是完备,其内部势必越有可能为纷纷扰扰举步艰难的无政府状态埋下种子。即便不出现这种情况,像现在这样各种组织一味庞大膨胀,最终都会摆脱人们的控制发展成怪物……

A: 这不越发叫人毛骨悚然了。德国的魏玛时期大概就出现了类似现象吧。

B: 对,是相类似的。某位学者指出由多党制国家起步的魏玛共和国因每个政党本身以国家自居,结果产生许多个国中之国,使政治丧失了统一性。但实际上不仅限于政党,而且社会所有层面上的动脉硬化都为纳粹称霸提供了重要条件。纳粹势力

一上台掌权,立刻就以所谓的言论管制(Gleichschaltung)来代替民主统一,从上至下实行权力均一化。当然,这些政策的成功是有许多复杂因素影响的,但如果当时那些政党以及工会等组织很好地发挥了主动积极的媒介作用,恐怕就不会发生后来那样的事态了。

- A: 这么说来,法西斯这东西可以说是在近代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们渐渐变得不相信近代 fiction 的时代中才应运而生的吧。
- B: 是这样的。而且生来就是个畸形儿。这就是说,它企图通过回归到文化形成之前的那种直接的自然性中——即血缘与土地——来克服近代社会组织分化过程中产生的病理现象。纳粹的御用学者们猛烈攻击近代民主的核心理论,即“代表制”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们认为这些理论全部都是虚构(fiction)而并非真正的民意显示,与这类充满欺骗性的制度相反,领导人希特勒才真正代表了德意志的国民意志。他们大肆宣扬希特勒与国民的关系在感情方面是一种紧密的有机结合,而并非是那种通过选票来点人头数式的“机械性”方法而沟通的冰冷联结;它充分地表现在大众的喝彩声(acclamation)中,其效果远远胜于选举之类的把戏。事实上,迫于经济危机、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逐渐丧失了精神安定、对议会政治的软弱无能已经绝望了的民众——特别是未经组织的民众已不再信任常规的民主决策过程,他们要为自己的愿望以及未能满足的要求找一个直接的发泄口,从而便转向崇拜绝对权威与非理性的结合。我记得齐美尔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曾在了一本叫《近代文化的摩擦》的小册子中说道：每个历史的过渡期，“生命”总要抛弃再也装不下自己的那一套形式，去产生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形式；而现代这个时代，“生命”不光不甘于受旧形式的束缚，大凡形式它都要加以反对，并企图直接地不通过媒介来表露自己；这正是现代社会的最深刻的危机。这种见解与上面提到的纳粹学者的主张相比较，十分发人深思。如此看来，确实也有人曾指出希特勒具有“憎恶形式”的一面。纳粹的兴起应当是有相当深厚的精神史上的背景的。

A： 不过，你说纳粹反对近代社会分化下的机能性集中统一，可是像纳粹建立的这样庞大的组织网以及将近代科学技术动员起来组织大众的体制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呢。

B： 这里就很具讽刺意味了。不管纳粹如何向往日耳曼森林中的生活，不管如何提倡按血缘及土地实现原始统一，一旦具体到建立政治统治机构这一现实时，就全不管用了。更何况纳粹国家是这样一个武装到头顶的国家……因此，实际上纳粹所做的也无非是解散自发组织或团体，将民众重新编组到庞大的政权领导组织之下而已。为了遮蔽这一矛盾，他们打出了神话。也就是说在打破近代的虚构后出现的是神话。而且这所谓的“20 世纪的”神话与原始神话不同，它是专门为政治宣传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恐怕再没有比它更加拙劣的“作品”了。

A： 听起来还并非尽是别人家的事。不满足于通过媒介的现实，而妄图沉浸到直接现场体验的感觉中去，崇尚这种“事实”精

神的国家可得小心一点啊。

B: 日本的情况较德国还要复杂呢。这是因为,纳粹的出现不管怎么说是在近代的社会分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而在当时的日本,前近代的社会关系还盘根错节地残留着,所以,近代组织或制度本来就因此无法发挥正常机能而容易出现僵硬化的危险性。此外还有一点,即在日本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广阔的“土壤”可供社会关系不经组织媒介就能得到协调。从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恐吓到由老板、后台、掌门人、头面人物等在幕后操纵的黑势力,无一不是建立在直接的人际关系之上的问题处理方法。这些力量还十分顽固地牵制着社会的组织分化。一等到将来法西斯式的权力在这块地基上稍加动员并且取得成功时,政党也好工会也好各种结社等等——本来就弱不禁风的——自主组织们就会被之以不费吹灰之力挤垮。说到底,因为这些团体的成员本身当中有不少是属于“僧徒谤佛”的,他们宁可诉诸快速“直接”的行动而不愿采取烦琐的组织交涉的形式。像这种国家的工会等组织便一刻也不可放松一种自觉意识,那就是自己正在沿着唯一的一条小路跋涉在前近代式社会关系的沼泽地中。如果觉得这条路有点绕远而想径直穿过沼泽,那就惨了,等待他的就是进退维谷的结果。

A: 如果按你所说的,精神尚未从感性自然中分离开来,那么政治精神也脱不了与暴力、“脸面”“心腹”之类的政治肉体的直接依存的干系吧。在此之前,你提到了日本人生活中缺少“社交”的问题,不过私生活方面的“社交”精神或者就相应地

反映出公共生活方面的“会议”精神吧。你看，就拿国会为例，那么容易一下子就热情高涨起来，简直叫人难以想象。

B：热情高涨起来的与其说是政治的肉体，不如看作单纯的肉体，比方议员对选民进行宣传时承诺会直接满足某些个别的、私人的利益，或者直接代表某家企业或地方有权势力的利害关系进行活动，这些都表明了其政治精神在本质上尚未独立。人们说政党要代表着阶级利益，你若去探听一下日本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的内幕，就会发现党员们其实各自受特殊的人际关系或幕后金钱关系的牵制，各行其道，根本没有什么作为政党的统一性。从缺乏领导作用这点来看，那还处在资产阶级政党以前呢。

A：这种现象正好与日本私小说相照应吧，那种虚构作品缺乏内部统一性，只是将个人的每一感觉体验统统汇拢起来了事。

B：看来你也受我的传染，尽做些燃烧弹式的跳跃联想了。

A：如果你想听，那我再发挥一点儿吧。给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前近代政治家分类的话，我想大概可分为老板型和侠客型或走江湖型吧。这两种类型都没有独立的政治精神，通常都直接依附于某种特殊利益，从这点来看两者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是有区别的。老板型政治家的根基置于一般通常的小市民生活，他们主要依靠日常经验“踏踏实实”地行动；后一种类型则将根基置于反社会团体的异常生活环境中，行动放任旁若无人。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老板型正好比作所谓的私小说派，而侠客型则就是肉体文学派呢？进而言之，肉体文学的“异常性”归根结底与私小说式的日常性

一样,立足点都在同一层次上,只不过它将“耻部”描写不成比例地夸大了而已。与此相同,侠客型政治家的根基——反社会团体——的发生源泉与我们的生活基盘也绝非有什么质的不同,毋宁说它是日本社会本身的“耻部”——家族制度的一种戏剧式的表现。

B: 就说到这里打住吧。要再发挥下去,把议员和流行作家全给惹怒了可招架不住。但是,总之对“肉体”文学也好,“肉体”政治也好,如果不把它们收拾干净,什么民主主义、什么文化国家等都是空话。

A: 说是收拾干净,你到底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肉体文学姑且不提,而肉体政治可不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让你讲了那么多以后又这样说是否有点儿那个,不过你也是的,你既然有闲暇跑到乡下对我这样的人讲上一课,何不将范围扩大一些,当此之秋号召天下的知识分子聚集起来呢? 这样也好大大地发挥你所擅长的近代精神的主体性嘛。

B: 这一记致命的反击终于来了。受你这么一击,我根本就无话可说了。只是这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聚集,其实已经被大肆宣扬提倡,并且还组织了各式各样的集会,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会不见成效呢? 当然知识分子自身的怯懦和麻木不仁也是一个原因。但好像不仅如此,这个问题其实跟今天谈到的精神是否独立也不无关系。不过要深究这个问题,又说来话长,还是等下次有机会再让我一抒己见吧。

(1949年)

**追记：**

此文原登载于日本《展望》杂志(已停刊)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10月号上。就内容来看,该文是取日本文化形态的一个层面放到政治领域里来论述的,而它又涉及人们对于制度的思考这一抽象的问题。一开始话锋有点偏向文学论,当然它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学论,也不是谈“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只是文章的深层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精神的独立性,它在最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团结部分稍稍露了一脸之后就结束了,不过这个问题如果仔细追究下去,势必会涉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而要正面论述这样的大问题现在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能力,不过要问文章的最后我到底想说明什么问题,可以从与作家高见顺的对谈、有关《知识分子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引用若干内容来补充一二。

所谓象牙塔、脱离实际的学问之类,经常要遭人批判。但我还是觉得学问这种东西与生活需要保持一定的紧张关系,再通过分离——不是脱离——最有效地服务于生活,可以说它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如若不然,学问就会被大众文明时代的日常现象始终牵着鼻子走,不是被时事问题纠缠就是受狭义上的政治要求牵掣,最终导致学问本身的社会使命无法得以发挥。学问毕竟还是有其各自固有的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或者时代的要求,学问本身是有发展的系列的。我以为追索这一系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今天的日本人似乎对这一意义不够重视,总以为在当今这样的变革时期再悠闲地搞学问到底有什么作用?这种外部压力其实是

很大的。然而学问毕竟还是一个具有漫长延续性的过程，其中涉及的问题又具有连续性；某个人将研究推进到一定地步，而后来者会在此基础上向着更深一步前进；更何况在同一时代、同一问题领域内还有细致的分工呢。看看日本的学界，比如明治维新的革命性在历史学界自然会构成一个问题，可现在看来张三李四一拥而上全去研究这个问题了。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其他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重要空白需要填补，却无人着手，大伙都只围着同一个问题在吵吵嚷嚷。总让人觉得人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职守自觉性还不十分足。不过反过来，不加反省、没有任何问题意识、光作惰性学习而自以为那就是“职守范围”的学院派人士也绝不在少数……但不管怎样，我以为学问内部还是非常需要一种钻研自己的独有问题的态度。

也就是说，有的学者无视学问的内在要求或没有职守范围的自觉性就进行政治团结，或者还没充分认识这一点就想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些倾向当中，“精神上的独立性”的欠缺便凸显出来。为消除这些倾向，我才提出了“打破一刀切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在判断艺术作品或学问的价值时，我们经常说它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所谓进步与反动，可以说是线性的把握方式。先进的事物，落后的事物，在这一条线上所有的价值都被排了座次。进步与反动的确是一种价值标准，但它往往会抹杀其他的衡量尺度。比如举个最基本的例子，艺术作品也好，或者



看学问上的成就，要判断它的价值时，我们知道有不少优秀作品却具有反动的政治倾向；同时进步的作品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否也全都是出色的呢？其实也不尽然。这在学问上也是同样。

从现在日本的政治状况来看，比如什么思想自由啦，艺术自由啦……为了保证之，广大的知识分子要尽可能地团结起来，不是说什么大众运动，至少知识分子之间要更为团结，不要像过去那样，被野蛮的政治势力所各个击破，我想这点今后极为重要……正是为此，我们自己要打破一列纵队式的想法。为什么至今为止我们那么高喊要结成广泛的民主阵线，实际上却不如人意呢？其中原因之一正在于此。那些家伙们动不动就评论说：嗯，是这条线的人。或说：不，也许更远一些。全是这类评价。结果还是以自己所处的立场，或按距离自己阵营一方的远近来看人，这成了所有评价的基准。所以，从被评价的一方来看，一点也没抓住每个人自身的个性，只是被视作这条线上的一个点了。……不应该凭着经验按距离某一事物的远近来做评价，——过去说如果是按距天皇的远近来决定价值的话，今天则不应该拿与占领军司令部(G. H. Q)或与共产党的距离来决定评价。真理也好，美也好，这才是客观评价，它超越那种始终凭经验而存在的个人或集团。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会产生一种态度：无论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也好，只要其中存在着真理，那就应该承认之。知识情报在既受个人立场的约束又超越之处才具有其积极的意义，只有承认这种知识层面的独自意义，知识分子的大同团结才有可能，才

能一致将包括共产主义的思想学术的自由捍卫到底。担心会不会被政治利用,这种不安总也是抹不去的,当然知识分子一方也有问题,但我想根本的问题还是有种倾向:政治的维度压倒其他标准。

幸好,现在进步阵营中实际也在反省这一倾向,所以没有必要说得这么啰里啰嗦了。但愿这不是一时的政治形势下的现象。我也不是说要大家学习这篇论文或上述发言中所表示的我的想法,只是觉得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一下其问题中潜在的思想意义。

## 第四章 权力与道德

——以思想史为前提探讨近代国家的成立

### 引 言

关于权力与道德这个问题,我想首先阐明其各自的定义,即所谓权力是什么,其次是道德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考察这两者的关系。但这个方法对解决具体问题未必就能立竿见影,弄得不好,会一头钻进去而难以拔出,仅仅停留在原地踏步。所以,我先梳理一些常识性的概念,然后就权力与道德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简述一下其历史概况,并由此而切入问题之真正所在。在此之前还有一点需要申明一下,这里的权力是指“公共的权力”,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政治权力。按照韦伯的定义,权力即是“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sup>①</sup>就广义来说,的确也有必要如此考察这个问题。不过,因其问题涉及的毕竟太宽,而我个人还是感到有些棘手,恐怕力所不及,同时也觉得如此短篇的文章不太合适。所以我暂且就当下的具体问题,也就是围绕政

---

<sup>①</sup>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 Teil, S. 28.

治与道德这个自古以来最常见的论题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里的权力仅限于一般的权力现象,即集中表现于“政治上”的各种问题。所以政治权力的魔性与道德规范的合一、分离或逆反的诸种关系便构成了本文的基本观点。

## 1

如同道德与宗教、法与习俗、政治与经济这些人类的主要文化活动一样,权力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追溯其历史一直可上溯到难以分辨两者关系的上古时代。那个时代政治权力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外部的强制力,不如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约束,反之,道德并非纯粹的心灵深处或精神上的规范,而是具有实体的、感到实存的一种规范。我们也可把它称为道德与权力是直接的统一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权力并不以道德的价值为准总是“善”的权力。它不可能自身形成抽象的价值判断,道德只在权力的强制之下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从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的一个体系彰显自己的。尽管那个时代各种文化活动还没有完全分化,但与统治形象本身还未成立的氏族社会是有区别的。在氏族共同体的内部,劳动生产促进社会分工,处理氏族共同体的事务逐渐集中到氏族的首领身上,进入统治机能专门归属到首领的阶段。诚然这个阶段的实际确定用语言明确地表达出来还比较困难。但它至少是我们考察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有关权力与道德的关联的所有历史形态的一个基准点,通过它我们来测定与其之间的距离。

初期的政治权力不论在哪个地域通常都表现为祭祀、司祭的权力。在权力与道德直接统一的背后多多少少都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威。

众所周知,本来原始社会的集团统治在其成员之间几乎都要依靠宗教的强制力。最初僧侣的身份与一般人也没有明确的区分,即便出现了专门负责某些仪式或礼拜的执行者,集团的权力统治机能也未必就直接归属于他身上。当然,在古代人的生活中与意识上,持有咒术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它与经济生产结合以后,其结果,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作为通道乃至媒介者的地位不断增大,并使得他们的权威在集团内部阶级分化中通常发展为持久性的权力体系。政治团体的起源大概都有祭祀者的权威的一面,还有通过与其他部落之间争斗而确立的军师的权力的一面,建立在这两者统合之处,所以政治权力在最初的阶段就带有伦理与实力相结合的命运。

当然,在统合的方式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形态,有些司祭阶级渗透到世俗权力中,从而支配世俗;也有些军师权力控制礼拜,把司祭阶层编入到行政组织内部;也有像回教那样纯粹的预言家把自己抬到最高的政治统治地位上的例子。不管怎么说,在古代国家,一般来说,最高行政长官与最高的祭祀者或预言家都集中于同一人格身上。在那些地方,权力阶层与道德规范的阶层大抵相互持平,平行发展。全体社会成员被编入到这个社会秩序的价值体系中。而对这一价值体系进行反抗的仅仅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事实,反叛本身得不到伦理意义上的认同。

更大规模地实现这种神权政治体系的有巴比伦、阿摩利、埃

及、波斯、中国等古代帝国。皇帝乃至国王不仅是礼拜祭祀的最高执行者,而且他们本身也具有神性,或是活着的神,或是降在人世的神之代表,所以在权力集中于皇帝的同时还意味着一切伦理价值也集中于其身。各地方的习俗道德或者被编入到这种中央集权的统治组织里,或者受到压迫而丧失其独自的规范能力。但是,政治社会的组织化这种高度化的过程,也是权力与道德的直接统一逐渐呈现出意识形态特征之过程。也就是说,氏族酋长的权力道德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掌握实权的基础上,它与权力的集中同步,其“虚伪意识”的特征也随之愈加浓厚。统治领域越大,权力之下的行政机构就越需要完善,意识形态与实际的统治之间的距离就越大。就这个意义上说,实际上楔入权力与道德的原始统一的最重要的契机就是政治权利中的法制的形成,自不待言,法又是产生于习俗的,而凡是属于法的它至少是带有某种目的的产物(习惯法也是与习惯不同,是人为制定的)。与此相反,道德并非是人造的,因为有其规范的制约力为基础。这一矛盾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罗马帝国。被神化的罗马帝国皇帝身上集中了所有公共的规范的最高权力,具体表现在罗马法的强大的形式统治上;它是从民众的个人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有目的的合理的产物。在权力与人伦道德的直接统合化为最空虚的虚伪意识的时候,由其内部诞生了具有最纯粹的内心伦理的基督教,从其成长的事实来看,这绝非是偶然的,它具有世界史的深远意义。

但是权力与道德的直接统一在现实中被解体之后,并不意味着两者因此在原理上完全独立。而且并不像古代帝国那样政治权力集中于神圣的君主一手之上,即使在分为“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

的情况下,只要其社会道德在本质上带有集体道德(Kollektivmoral)的性质,即使出现对政治权力的忠诚与道德义务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在同一社会的平面之上,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到底是一种例外的事态,基本上很快又会找到新的平衡。它并不会损坏最高的政治价值与道德准则之间在原理上相互依存的关系。与东方帝国那样有着强大的君主统治不同,这一点只要看看希腊这些城邦国家完成了古典的民主政治就可知道。众所周知,希腊市民的自由最终意味着参与城邦国家的建设,每个市民的身心所有一切皆隶属于城邦国家,伦理道德体系是对城邦国家的忠诚,所信仰的是城邦国家的宗教,而教育不外乎是对城邦国家每个公民的教育。尽管发生了苏格拉底的悲剧,但它恰恰证明了当时的希腊合法性(Legalitat)与正当性(Legitimitat)还尚未区分开来。黑格尔指出希腊的个性基本上是一种美的个体,而并非伦理的个体。<sup>①</sup>当然我们不是说希腊人就不存在个人道德,但它处于这个道德金字塔的最下层,当个人优先城邦国家道德之时,希腊的政治统一体已近乎崩溃,开始进入人们为脱离现实追求个人道德的时代。于是,在此之后马其顿建立起君主独裁统治,亚历山大大王又在此之上与东方帝国一样集权力于一身,作为降天于世的神出现。在原理上可以拒绝与政治权力一统化的道德,只有作为人格性道德才有可能,它既不同于集体道德,也不同于个人道德。而这种人格性道德正是所有古代社会所没有的。作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正是立足于信仰人的终极价值而直接对罗马的崇拜皇帝的道德价值进

---

<sup>①</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Lasson Ausg. S. 599 f.

行全面挑战的。权力与道德的问题至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 2

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在原则上虽然是拒绝与政治权力混为一体而登场的,但它并不意味着对政治权力总是采取批判态度乃至会作为革命的契机发挥作用。仅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基督教教会不管是旧教还是新教,都在教导人们绝对服从政治权力,或在更多场合下扮演着积极维护政治权力的角色。尽管如此,基督教的出现之所以对当前的问题也具有世界史的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社会乃至政治层面上解决不了的人格这一层次的问题。由此,一方面它永远拒绝“恺撒-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化,同时另一方面与其说它是单纯地逃避现实,倒不如看作是一种理想的精神活动,也就是通过作为政治社会内在的能量运动,在权力与道德之间总是制造出一种紧张关系,其结果是这种关系不断得以再生产。若我们认识不到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就会看不清西欧与其他地区在历史发展的形式上存在的截然不同之处。

当然希伯来预言家与罗马教皇的距离实际上相差很远,基督教历史本身包含着宗教社会所有的类型。宗教权威建立的庞大组织确立了它对世俗社会的统治地位,就其规模而言,在历史上堪与中世纪天主教可比的也不多。尽管如此,重要的是它具有始终听从神灵的教会这一超越现实的带有使命的独立组织。也正因为如此,它没有像古代祭祀执行者那样完全转化为掌握世俗统治的权



力组织,同时也未与统治权力结为一体,从而造成了国家与教会这一贯穿欧洲历史的二元关系。其实宗教改革正是针对罗马教皇权力堕落到世俗统治而进行的“激烈抗议”才发生的。从伦理上说,作为中世阶层社会秩序的支柱的基督教伦理过于客观化、过于集体道德化,而这场宗教改革就是将基督教伦理重新拉回到人性内部的运动。以悖论而言,宗教改革的根源乃出自基督教本身,它既是罗马教会的政治化的结果,同时也证明教会的政治化最终是具有本质上的限度的。

中世的天主教在政治权力制约道德上为后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自然法思想的产生就是一例。发端于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如何被中世世界所接受,如何体系化,有着怎样的机能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法思想史专家去论述。实际上教权也是一种权力,它比世俗权力优越,起着调整统治关系的作用,整体上看,应该承认它支撑着中世纪政治体系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对法的政治秩序的服从也绝不是无条件或无限制的,在某种场合下抵抗政治秩序才正是伦理上的义务。由于包含这一命题,因此它对近世的革命权乃至抵抗权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中世纪的政治权力不仅在其对内统治时受到自然法的制约,而且在对外行使权力时也受到普遍的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力约束。这种基督教共同体(*corpus christianum*)的理念,在将之实体化的两大权威——罗马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衰败乃至最后灭亡的今天,依然作为处理欧洲国家国际关系的规范理念存续下来。

## 3

总而言之,基督教的人性伦理与现实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的内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由于中世纪天主教会的世俗性,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宗教性而得以保持着一定的平衡。但这种协调关系因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而彻底解体。在教皇与神圣罗马皇帝双重的神权政治体制崩溃之时,诞生了近代国民国家。各国的专制君主对外面向教皇乃至罗马皇帝,对内则面向封建诸侯、行会、自治城市等各方面的势力,极力强调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绝对性,继而完成了权力的统一。如此,使近代国家的集权可行的原因有二,间接的原因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落伍纷纷垮台,被解放的生产关系以及交通等技术不断得以发展;直接的原因乃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政机构与常备的军队组织。总而言之,政治的统一不但不需要像古代帝国或中世王国那样的宗教权威,反而要不断反抗宗教的约束。当然,在近代初期,也有把王权神授说之类作为拥护绝对君主的理论,但那毕竟是过渡期的一种现象,而神权说本身也逐渐完成了其内在的质变。一言以蔽之,国王并不是因他神圣伟大而拥有最高的权力,相反地倒是因其拥有最高的权力而变得神圣(这一转换在思想史上是由霍布斯<sup>①</sup>完成的)。路易十四世说“朕即国家”时,同时意味着他既不是“神之子”也不是“国之

---

①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他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机器;反对君权神授,主张君主专制。——译者

父”(Pater Patriae)<sup>①</sup>。国家权力从宗教的、道德的、习俗的制约，简言之，是从政治以外的制约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独立，自觉到自己固有存在的理由与行动准则，这就是近代的国家理性的意识形态。宗教改革反对教权的世俗统治，强调基督教信仰的理想与内在性，其当下的结果便表现为世俗权力大张旗鼓地公然主张开来。

如果说近代国家权力已经与一切伦理规范毫无关系，那倒也未必。首先第一，国家理性的意识形态往往被看作是肯定无限制的或盲目的扩张权力，而这样的理解完全违背了最初大胆提出国家理性的马基雅维里的原意。那是具体针对教皇把基督教伦理作为统治国家的武器而提出的反对命题，他企图通过批判探讨制定政治权力特有的行动准则。换言之，从排斥外部制约政治到建立来自内部的伦理准则才是他的本意。当然由于他极力主张的命题过于偏激，并没有成功地建设起积极的伦理体系，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也的确与他的本质相去甚远。卡尔·施密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问题所在之处：“如果马基雅维里是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的话，他不会去写那本臭名昭著的《君主论》，而是站在一般的人性，即君主们的特别的善性立场上撰写一本令人感动的著作。”<sup>②</sup>关于政治上内在的行动规范究竟应该是什么，我们将另作论述。在此仅想指出一点，近代国家理性的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肯定权力欲望的。

第二，近代觉醒的国家理性必须通过宗教改革与内在化的基督教伦理展开新的局面的决斗。世俗的统治权有了其独自的意

---

① 威廉·冯特：《从民族心理看政治社会》，日译本，第372页。

②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Ders, *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1936, S. 47。

义,在此之上直接约束它的宗教及道德的权威业已不存,而基督教伦理与政治权力的内部相克越加深刻。宗教改革强调恩典优于律法,强调个人良心在道德上的优越性,因此,不管最初倡导人的意图如何,其结果是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批判精神。新教被年轻的产业资产阶级所继承,不待赘言,他们为了获得思想、信仰、言论的自由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血战。中世的自然法,通过暴君放伐论(monarchomachia)展现为基于人民主权论的自然法启蒙活动。在18世纪以后,特别是在欧洲大陆逐渐洗刷了基督教的宗教色彩,发展为所谓世俗的自然法(Das profane Naturrecht)。众所周知,契约论通过洛克注入美国独立宣言且成为清教徒信仰的基础。被剥夺申述手段的殖民地人民可通过革命获得向神申述的手段。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而自发结社(voluntary association)的教会组织与作为权力及其强制服从组织(compulsory organization)的国家有着严格的区别,罗杰把国家看作是不得不承认的恶,主张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不断地控制权力,其思想正是构成自由主义国家观的雏形。<sup>①</sup>

近代社会得到解放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绝对的国家主权,另一个同样是不可剥夺的个人的基本人权。这两者的对立统一,几乎是目前所有近代国家的宿命。在意识形态方面,表现为国家理性的思想与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冲突。这一冲突基本上是整个欧洲都存在的现象,但总的说来,在西欧自然法思想占优势;反之,德国

---

<sup>①</sup> 参照 A. 林赛(A. Lindsay),《现代世界的宗教、科学与社会》(*Relig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the modern world*),第16页。

在 19 世纪以后国家理性的思想迅速扩大并走向成熟。其结果是，在英美两国国家权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受到限制，即受制于一定的法律，这种法律的约束最终是基于普遍的伦理、宗教的价值观，也就是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而在德国，国家是最高的价值判断，为了国家的存亡，须无视国际法以及个人道德的基准，这一思想从黑格尔到俾斯麦直到杜来奇科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正是臭名远扬、倍受世人谴责的德国传统的军国主义极权国家思想之所在。我们不能忽视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两者（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人所共知，无须在此赘言。西欧诸国在面临激烈的国际政治权力争夺之时，并不是说他们绝对不依照国家理性。其实，他们应该算德国的老前辈了。英国自由党的领袖人物乔治早在 1911 年，面临阿加迪尔危机<sup>①</sup>之时，曾发表演说<sup>②</sup>：

如果英国放弃了几百年以来我们的英雄伟绩，我们赢得的崇高地位，或是在我们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之时，为了选择保持和平的道路，我们被迫在国际会议上忍受不当的裁决。此时，我要断然宣布：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换来的和平，是我们这样伟大的国家根本无法忍受的耻辱。

---

① 阿加迪尔，摩洛哥西南部港口城市。1911 年发生的阿加迪尔事件是一宗国际危机。德国玩弄炮艇外交，但在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戴维·劳埃德·乔治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之后被迫退却。——译者

② R. 尼布尔 (R. Niebuhr)《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the immoral society*)，第 92—93 页。

这段话难道不是恰恰表明了国家理性的真髓又是什么呢？

诚然，像英国这样最早完成中央集权统一，最先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产业革命且拥有强大的海军势力，国家独立的问题相对来说，无须怀着重大的危机感且在政治、经济以及国际社会上一直保持优越地位的国家，在近代国家的向心离心的两个要素里，从离心的一面来强调意识形态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国家权力受到威胁的实际经验很少，这种意识自然也不多。美国和法国也大都如此。然而，德国却不同：19世纪初，不要说中产阶级革命，甚至连民族国家的统一尚未完成；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内要顶住强大的封建贵族势力，对外面临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他们肩负着国家的统一与自由主义革命的双重重任，每向前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德国为了民族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由主义革命，最终推行的是贵族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这与马基雅维里的时代，即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情况很相似。费希特与黑格尔在拿破仑铁蹄的蹂躏下才开始强调马基雅维里的积极意义，阐述“权力中的真理性”<sup>①</sup>，其后，国家权力的思想就像恶魔一般始终纠缠着德国的知识分子而无法脱身。其实，德国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对国家权力思想非常淡薄，众所周知，雷兴和歌德都嘲讽爱国心，以做世界公民为荣。国家理性的思想是从法国学来的。但是一旦觉醒，德国就开始彻底追求权力的问题了。而且在观念的世界远比现实的世界更为激烈。

---

<sup>①</sup> Die Wahrheit, die in der Macht liegt—黑格尔(Hegel),《论德意志宪法》(Die Verfassung Deutschlands, 1802)。

迈内克<sup>①</sup>就腓特烈大帝直至杜来奇科的国家理性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正如他所说,(德国人)自始至终与基督教普遍人性的理念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思想代言人的杜来奇科,虽遭到联合国阵营猛烈的攻击,但他决不主张“强者的正义”,而是极力排斥文化上毫无内容的权力国家<sup>②</sup>。面对国家发动的、他本人并不承认的战争,个人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就这一问题,他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能对非人性的战争担负责任的。但此时,我对祖国依然有应尽的义务。个人乃是属于国家的一成员,所以,我们应该有勇气承担国家的错误。”<sup>③</sup>这一结论固然有很多问题,尽管如此,难道我们不能由此看到他内在的人性理念与政治义务之间所展开的一场悲剧性的纠葛吗?而且韦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也经历过同样的二律背反<sup>④</sup>的痛苦。黑格尔、杜来奇科皆以基督教共同体(*corpus christianum*)的普遍性理念作为前提,可与其后纳粹的道德虚无主义截然区别开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德国近代思想史,自从号召“正义要伸张!即使世界毁灭”(Fiat iustitia, pereat mundus)这一绝对的道德律后,再经过国家与道德的统一(但已经不是古代那种

---

①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年)又译梅尼克,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译者

② 迈内克: *Die Idee der Staatsra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S. 493 f.

③ O. 鲍姆嘉通(O. Baumgarten),《政治与道德》(*Politik und Moral*), 1916, S. 169.

④ 二律背反(*antinomies*)是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的哲学基本概念。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为正确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康德认为,由于人类理性认识的辩证性力图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去认识物自体,误把宇宙理念当作认识对象,用说明现象的东西去说明它,这就必然产生二律背反。——译者

直接的统一),直至最终把雅利安人种绝对化,可以看到德国人走过的惨痛的足迹,他们因无法承受权力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试图从这一端不顾一切地跳跃到另一端。

因而,在近代德国的诸种问题中,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是两个开放的纪念碑,即国家权力的自主性与内在的道德的二元相悖被压缩性地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也是近代欧洲共同面临的课题。德国的悲剧在于:在过度强调纯粹的伦理道德的同时,又过于肯定国家权力,从而使两者之间失去平衡。其结果造成德国国家思想里总是飘荡着一抹犬儒主义。尼采乃是全面发展德国式犬儒主义的“不幸的”哲学家。他把“客观性”“批判精神”“献身”“爱”“人性”这些欧洲精神最核心的诸种道德统统称作“对权力的无力”,一直嘲笑其虚伪和狡猾的一面。但是在另一面,尼采的犬儒主义对俾斯麦的权力国家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他把国家称为“有组织的非道德性”(Die organisierte Unmoralitat),自问自答道:“国家是用什么方法干出那些无数可怕的、令个人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呢?是根据责任、命令、分工,通过服从、义务、爱国、忠君等等道德,保存矜持、严厉、强大、憎恶、复仇这些与英雄主义矛盾的所有一切的特征。”<sup>①</sup>仅在这一点上,尼采的犬儒主义对所有的为政治权力外层所包装的道德衣钵具有强烈的漂白作用。然而,如果不是像尼采一样属于“不合时节的”观察者,而是感染上实际权力的执行者,那就很容易发生转变,会肯定政治权力的无限制实施,也就是相信国家的“神圣的利己主义”(sacro egoismo)是无可抵挡的。“伟大

<sup>①</sup> Material zum,“Willen zur Macht”,S. 717.



的国民如果面对这样的选择：是要国家的存亡还是去遵守条约时，必然会落入舍此丢彼的尴尬境地，但国家不会牺牲前者以此来动员国民遵守条约的。”<sup>①</sup>俾斯麦的这一原则立场不久就具体地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他悍然宣布“条约不过是一张纸片而已”，其后，德国所采取的具体行动便是入侵中立国的瑞士。英国的学者认为世界大战的特征在于法的统治原则与国家理性的思想之争，而德国人却加以反驳：“对英国人来说，法的统治即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当比利时列日市的一个僧侣控诉德国士兵的暴力时，冯德戈尔兹元帅说：“我们要征服比利时，胜利的荣光将决定一切。”<sup>②</sup>就是这样，德国的犬儒主义完全超出其应对美化权力所起到的解毒剂作用，进而逐渐侵蚀到了国家的中枢神经。纳粹成功地进行了 A. 罗森堡<sup>③</sup>所谓的“本能的革命”，只是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而已。希特勒在进攻波兰时，告示道：

让我把宣布开战的理由交给宣传家们吧！开战的理由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面对胜利者谁也不会过问他当时说的是否真假。开战、打仗，最重要的不是正义与否，而是最后的胜利！

希特勒的党卫队队长希姆莱更是大放厥词：

① 鲍姆嘉通：《政治与道德》，S. 131。

② 法国公法学家狄骥：《法律与国家》，岩波文库版，第 156 页。

③ 阿尔弗雷德·罗森保 (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 年) 纳粹德国中的一名重要成员，为纳粹党党内的思想领袖，曾担任纳粹刊物主编和德国在苏联的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经常对党内成员发表演说，内容包括种族清洗、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和纳粹主义。他的理论导致德军对俄国的战略进攻。1946 年 10 月被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一个俄罗斯人或一个捷克人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出现什么问题,我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我之所以要关心其他民族的繁荣或饥荒,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德国的文化需要他们做奴隶的时候。<sup>①</sup>

至此,德国的犬儒主义已经完全成为毫无廉耻地滥用权力之上的无赖了。但是,正如犬儒主义产生于“山上宝训”<sup>②</sup>的伦理与权力之间必然存在的紧张意识一样,在调和两者关系的意识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其他颓废的现象,堕落到伪善乃至自我欺骗。如果说德国正是为前者提供了丰富的例证的话,那么,在英美法等自然法思想占优势的国家则有诸多后者的例证。在强烈追求权力与要求人道主义之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上对操纵两者平衡一贯驾轻就熟,而对此德国人也一向称其为伪善者,我们不能否认这出自于德国人政治尚未成熟的劣势心理,但他们的批评也不总是完全无的放矢。比如国际关系方面,在帝国主义向亚洲和非洲扩张的时代,普及西欧文明,表现为所谓“白人承担”(white man's burden)的意识形态,而当白人确保了世界优势的地位以后,又以“尊重国际秩序”的面目出现。在国内,超越历史地把资产阶级民主绝对化,由此又暴露了其解放界限的盲目性。即便对常见的公然基于权力之争的行动,也不乏韦伯所说的那种“令人作呕

---

① 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审判记录。

② 山上宝训指的是《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里,由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话。山上宝训当中最著名的是“八种福气”,这一段话被认为是基督教徒言行的准则。——译者

的道德化”<sup>①</sup>。对于西欧国家政治权力的伪善性乃至自我欺骗性，众所周知，近来以尖锐著称、自封为“被驯化的犬儒”的美国神学家 R. 尼布尔执意要揭穿这点。<sup>②</sup>

以上大致地从历史上梳理了欧洲古代社会共同存在的权力与道德的即自性统一在分化以后两者相悖的状况以及贯穿近代国家思想的过程。总而言之，欧洲世界的特点在于，政治权力所固有存在的依据与基督教人格伦理之间展开的二元的价值纠葛。两者之间不论如何互相纠合，但终究并没有合二为一，相互之间一直维持着一定距离，从而产生新的紧张关系。倒向犬儒主义或堕落为伪善，根本上是其内在的道德性具有看不见的，但又以强烈的控制力为前提的一种沉论和堕落。要终结近代国家理性荆棘丛生的发展道路时，迈尼克说：“国家永远不会停止其犯罪行为”。<sup>③</sup>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欧洲近代国家共同的二律背反的宿命。

(1950年)

### 追记：

“权力与道德”一文是写给《思想》杂志（昭和二十五年三月）“权力的问题”专刊的。这篇论文如“前言”所叙，有关权力和道德的意识形态关系，也仅就其历史做了一个展望就完了，几乎没有涉及“问题的理论焦点”。这是因为自不量力地接受了这么一个难

① 玛利亚娜·韦伯（Marianne Weber），《马克斯·韦伯传》（*Max Weber. Ein Lebensbild*），S. 615。

② R. 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第八章。

③ a. a. O. S. 538.

题,折腾了半天,刚梳理完历史背景就已经接不上气了。为了不要在内容理解上有什么误解,特意新加了一个副标题。当初的构想十分宏大,思想史的部分里,后面还要接着叙述基督教的国家与教会的二元性传统,而作为一个巨大的例外,又想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为主描述俄罗斯帝国的情况,顺便再举出另一个世界史的类型,即儒教的有德君主思想和由此归结出来的易姓革命的思想,这之后才准备就日本,特别是围绕明治维新以后的“国是”观念,将其存在理由的思想与上述思想做一比较。开头的部分当时写的原稿(半页张)约三十张左右,为了收入本书,起初也考虑将其后续写完,但那就太偏于思想史了,且大大脱离了本书后记所说的收录准则,所以,仅限于已经发表的部分,完全出自我个人的要求,期望不要把它当作思想史的论文,而是作为与第一卷、第二卷中论述的日本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相关联的问题来看。

对于这一问题的切入方法可以有很多,除了像本篇这样,从国家权力和“伦理性”的历史关联来切入以外,比如,首先就不把道德置于笼统的伦理性之中,而是将之具体化(个别化)到各种德性(virtues)上,可以分为朝着维护权利方向的德(例如秩序的德)、妨碍权利的德(例如所谓的宋襄之仁),还有要打破权利的德(革命的道德),阐明其相互间的关联也是可能的。不管怎样,就此课题不应单纯止于历史的或政治哲学的考察,而是要作为经验性的政治课题来处理,必须要改换视角,从权利与道德这一层面更换到权利的道德这一层面上来。权利与道德这一问题,正如在本篇里所暗示的那样,包含着永远的二律背反,如果丧失了这一自觉,就难以避免两种方向的同时封闭:一是保持道德的内面性的方向;另一方

向是避免权力的即自性(an sich)的伦理化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本来就与伦理无关,或具体的权力实施总是反伦理的。倒不如说,前面第二章追记里提到的那样,两者各自有其固有的平面,因为都要与人相关,所以必然要相互交错。那么,要想清晰地浮现出这两者的交错点,就要暂时先彻底地站在权力主体的视点<sub>上</sub>(也就是要将来自外在的或更高一级的对权力的规范性制约都框在括弧内后),将那种有可能危害维护权利的各种德行一一排除才行。那样的话,就会找到任何权力不去拥有之便会必然地丧失权力本身的那种德。以古代罗马和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政治为素材,有意识地或彻底地实施这一操作的无疑是马基雅维里。比如,他在《君主论》中说:“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这里的“贤明”正是从权力的立场作为可能选择各种德行的德来提出的。肖尔茨(Scholz, Heinrich)也说:“贤明对于肩负着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来说不单是智慧的德行,也是伦理的德行。”它无疑是所有政治领导人的最起码的德行(Grundtugend)<sup>①</sup>。这样,出自权力与伦理的最小限度的媒介,马基雅维里及埃德蒙·伯克所举出的慎重(prudence)也好,抑制盲目的支配欲望也好,排除自我陶醉及虚荣心也好,或者如马克思·韦伯作为要区分“一心要向上爬的政治家”的真正政治家的指标,“灵魂的制御”以及“和原来的人之间拉开距离观察的精神”等能够引发出一系列的德(参照“作为职业的

---

① 《政治与道德》,S. 146。

政治”)。这些都是个人伦理,同时也是对于权力的现实所必须的伦理。罗曼·罗兰说的“煽动仇恨的人的脸上必将被仇恨的火焰所吞噬”(“超越混战之上”)也是政治过程中绝不稀罕的一种动态。政治的现实主义不是与所谓的“现实政策”同一语词,倒是仅仅只追求“现实政策”常常会在结果上并不现实。这一问题通过历史过程来加以证实,解明权力的道德,便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之前要从政治观察和实践中排除那种二者择一式的思维,即第二卷第五章已经涉及的,道德的伤感主义和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 第五章 支配与服从

### 1

甲这个人或团体对乙这个人或团体多少处于持续性优越地位,因此同样持续地制约着乙的行为模式(pattern of conduct)的话,甲和乙之间便会产生出某种客观认可的从属关系。支配与服从关系正是这种一般隶属关系中的特殊形态。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但是如果要问及区别支配关系与其他一般的从属关系的基准如何,那就不容易找出简单的答案了。我们知道,所有社会的结合模式都具有相互交叉的可能性,其界线总是模糊不清的。因此,谈到支配与服从的关系也一样,与其首先就设定一个绝对的决疑论,莫不如在现实的广泛从属关系中抽出明显带有支配关系特征的和怎么看也不像这种关系的,在其间找出支配关系的相对位置,这可能是比较妥当的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学生要服从老师,这样说好像并不奇怪,但反过来说老师支配学生可就听起来不那么自然了。学生或多或少受老师的影响(influence),老师对学生也有一定的权威(authority)。只有学生承认老师的精神价值(知识,

人格)的优越性,教育机能才得以生效。不仅如此,通常其中甚至不能不存在某种权利关系(power relation)。教师命令学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学习义务),或禁止一定的行为,并对这一义务的怠慢或违反禁令给予一定的制裁(留级、退学、罚站(有无效果另当别论))。这种制裁的行使如果成为教育的常态的话,那无疑是教育的自杀行为,但这种权利关系的存在本身一开始与教育目的并不矛盾。尽管这样,一般来说并不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支配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另一种与之对照的从属关系: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谁都会毫不犹豫地将之认定为最具有支配特征的关系。(奴隶严格地说是“物品”,是属于主人的所有权对象内的,所以也有人认为两者之间不属于人与人的关系,但在这里我们先不去考虑这点。)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sup>①</sup>这里指的正是雅典的奴隶关系。主人对奴隶不单是一种权力关系,主人将奴隶的全部人格隶属于己,运用一切可能的物理上的强制来奴役之。奴隶对于主人奉献的劳动量本是无止境的,只不过对他肉体的榨取如果到了不可再生的程度,那等于是招来不可持续榨取的后果,奴隶主的这点儿算盘实际上赋予了榨取的上限。所以,反过来说,人这一劳动力从生产出自己肉体再生产所必需的限度以上的生产资料的瞬间始,奴隶关系就变得可行。这就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大规模的阶级对立首先是出现在奴隶制这一形态中的。我们可以在这些奴

---

① 《政治学》卷一。



隶身上找出支配形象的原型(Urtypus)。

将主人-奴隶这一关系与前面提到的教师-学生相比较,其中最显著的相对点在哪儿呢?一眼可知,当然是利益取向的同一性和对立性。教师和学生是朝向同一方向的,教师希望培养出人才,学生也愿意如此。(当然这里说的是社会结合的类型问题,各自现实的偏差不去涉及。)学生成绩提高同时意味着老师的成功,学生的失败也就是老师的失败。对学生来说,老师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模范(Vorbild)的意思。对老师来说,学生在所有精神水准上接近自己,最后超过自己才是教育的理想。教师的惩罚只要是朝着这个方向,是可以允许的。而主人与奴隶则在任何方面都是处于相反的关系,两者的利害关系是正面冲突的。主人本来是要尽量役使奴隶,而奴隶则尽可能地逃避之。主人与奴隶不具有共同的目标,不处于共同的命运下。奴隶非但不可接近主人,永远保持与主人的距离才是主人的愿望。对奴隶来说,主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模范,而只是憎恶、恐惧,至多算为羡慕的对象。奴隶要想获得人的自由和幸福,留给他的路只有逃亡或反叛。只有赤裸裸的物理上的强制(鞭子、锁链)才是他和主人联结的关系。

现实社会的从属关系存在于这两极间的广大的领域,越是接近第二种类型,支配关系的色彩就越发浓厚;越是接近第一种类型,则带有(精神上的)权威关系的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它不同于支配关系。

如果在一定的区域生活的人们因切实的强制为背景,组织为一般的而且持续的从属关系,在最广义上将这一社会称为政治社会的话,古代这种政治社会逐步或突然出现的过程正是向我们展

现出上述由一极转向他极的进行过程中的各种变体。氏族共同体中其内部社会分工尚未引发阶级对立,在没有其他集团的征服的情况下,族长或酋长及其他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基本纯粹表现为上述意义上的权威关系。汉斯·弗莱尔<sup>①</sup>将其族长的作用表述为:“别人不完全有的他都拥有,别人表达欠缺的他完全能表达。对这种个性化形式我们称之为权威。……因此,权威就是从共同社会中将之分离出来,并不是与之对立或对抗,而是将之置于中央的位置。于是,其他人亦崇尚拥有权威,以他为榜样或基准。”<sup>②</sup>也就是说,这里的族长完全是个“教育者”。柏拉图的“理想国”以来,所谓最高的教育者都是贯穿任何时代的政治领导人的某种化身。同时,至今为止也从未存在过某种政治权力能完全摆脱将人民奴役般地压迫这一指责和攻击。因为这种氏族共同体崩溃以来,政治社会已经无法作为纯粹的权威关系存在,换言之,支配形象已经完全介入其中了。这种介入,究竟是亚当·斯密说的由畜牧的私有而引起的呢?<sup>③</sup>还是甘普为兹、奥本海默等奥地利社会学家指出的更应看重种族间的征服这一因素呢?(前者如甘普为兹《种族争斗论》(*Rassenkampf*)或《社会学的国家观》(*Die soziologische Staatsidee*),后者如奥本海默《国家论》(*Die Staat*)),或者像恩格斯那样将两者视为相关现象来把握呢?(《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

---

① 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 1887—1969年),德国文化社会学者、社会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1930年)。——译者

② 弗莱尔:《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日译本,第298页。

③ 《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坎南编著(ed. By Cannan),1896。

起源》(*Die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 及《反杜林论》(*Anti-Duhing*)), 还有更多的学者从家长制权力的增长来寻求决定性因素, 这些都不胜枚举。另外这种政治支配结构, 如西洋及日本封建制度那样, 贯彻的原则是行政管理者 (*Verwaltungsstab*) 私自拥有行政手段 (*Verwaltungsmittel*), 也就是采纳支配与服从的这一身份阶层制, 还是像古代亚洲帝国和近代国家那样将行政手段集于最高主权者, 而以官僚机构来服务之, 这些问题马克思·韦伯已经有了精辟的分析。<sup>①</sup> 这里只需要注意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害对立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是所有支配形象的决定性因素, 而且至今所存的任何政治社会里或多或少都有其因素。

因而, 支配关系中必然伴随的要素是, 统治者占有其社会的精神物质价值, 而被统治者则尽可能地排除在外。为了有效地实施之, 统治者要组织切实的强制手段(军备, 警察等)。但与之同时, 统治者要发明许多办法将被统治者隔离于这些价值之外。最为频频使用的是与被统治者之间设一空间距离(从两者的居住地隔离到餐桌的区别(德国有句成语: *Am Tisch scheiden sich die Llassen*)), 禁止不同身份人之间的往来。于是, 为了切断两者的“往来”, 要区别信仰、礼仪, 统治者独占道德名誉观念(山鹿素行曰: 士为义所立, 农工商为利所立), 更有甚者连语言也要完全不同。凭借这种隔离维持统治的封闭性,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众人皆知的印度的种

---

<sup>①</sup> 参照马克思·韦伯《政治论文集》(*Gesammelte politische*) 及《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 u. 3. Teil。

姓制度。

## 2

然而,支配形象正是如弗莱尔所说:“要从统治者的精神世界将被统治者排除在重大事项之外”<sup>①</sup>,尽管这是其本质所在,但现实政治的支配关系并非仅归结于纯粹的支配关系(上述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奴隶对于主人的服从,其自发性接近或等于零,所以与其说有什么出自本来愿望的服务行为(Unterwerfungsakt),莫如说只有屈从服务这一事实状态(Unterworfenheit)。随着主人停下鞭子,或放松锁链的次数,奴隶的怠工程度也必然增大。所以从劳动的生产性这点来看,再没有比奴隶劳动效率更低的了。正因为此,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放弃奴隶制这一社会统治的生产方式,转移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归属关系更为客观的形态:采用赋役交租形式也好,实物交租也好。更何况政治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之间只有这种关系存在的话,为了压迫被统治者,统治者必须维持的权力机构不仅庞大无比,而且与对内关系一样,在国防这一所有政治及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方面也蕴含着显著的脆弱性和危险性。因此,至今为止任何统治关系一方面设置物质机构,将权力、财富、名誉、知识、技能等价值在不同程度及样式上分配给被统治者,以中和减弱本来的统治关系;同时,另一方面发展强化精神装置,将统治者内在于被统治者心中,以唤起服从的自发性。如

---

<sup>①</sup> 弗莱尔:《社会学作为现实科学》,日译本,第299页。

果我们认定被统治者对这种社会价值的参与以及其政治服从的精神上的自发性可以算作民主的决定性特征的话(这话也许听上去有点离奇),一切政治社会在制度上作为精神结构若没有这种最小限度的“民主”则不会存续下去的。休谟<sup>①</sup>说过:“政府只是建立在意见的基础之上,这一准则既适用于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同时也适用最专制最军政的政府。埃及的国王和罗马的皇帝对他们的臣下或许可以像畜生一样随意驱使,但他至少把自己的骑兵队和近卫军当人看,必须听他们的意见指挥。”<sup>②</sup>

这段话正是指出了统治关系中的心理侧面。马克斯·韦伯按照被统治者容忍统治者的正当性依据(Legitimitatsgrunde),将其支配形式分为三种类型:“传统的”“有魄力的”“合法的”;以及梅里亚姆在政治权力的信条(credenda)名义下,考察权力在心理上的合法性模式(Political power; Systematic politics 等),最终都是关系到这一问题的。

当然,要想缓和支配关系这一政治社会的主要部分,并唤起被统治者的自发的服从,作为物质精神的装置却未必能理性地自觉到这点。反倒现实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下意识”层次的事由。而且对被统治者来说也同样,对统治者来说也如此。可以说现实的历史正是这种非合理的“民主”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立场上逐步理性地自觉到、有意识地形成的过程。其结果会怎么样了呢?过去大多数人民当然不会有什么自觉,尽管休谟说:一切政治统治

① 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年),苏格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被称为近代最有影响的怀疑论者。他认为知识的范围仅限于感官所获得的经验范围。——译者

② 休谟:《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 1753。

最终要听从人民的“意见”(opinion)。但同时,统治者一方既没有这一意识,也没有其技术手段。比如他们没有把统治是源自神这类信条以今天想象的这么强烈的目的意识作为统治手段来加以利用。统治者通过明确的法律形式不为被统治者的“意见”所掌制,相反,却受到一种无形的制约,即难以捕捉的被统治者的模糊气氛(民心所归)和传统的约束。他们将这一实感借用“天道”或自然法之类的语词来说明。现在,被统治者通过宪法明确规定的制度性保障来参与统治者的权力,其“意见”被统计测定以致可能促使政府的交替。但同时如果广泛利用通讯交通报道等手段事先左右被统治者的“意见”的话,再通过投票这一“客观”形式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之后,统治者就可肆无忌惮地挥舞起权力的大棒了。民意流失这一明确的鸿沟形成反倒使统治者更容易操纵民意了。一方面被统治者对社会价值的参与和政治服从的自发性,将其自觉地组织化的过程也就是民众获得政治、社会的市民权利以及提高其主体意识的历史。但是,反过来看,这种物质和精神的装置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亦即将现实政治社会中确实存在的支配关系加以精练、抽象化,将实际情况从被统治者的眼里加以屏障。统治者也越发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作用,而且基于此目的意识开始大规模地驱动这种装置,这也是历史的一面。韦伯及梅里亚姆所举的正当性依据和信条在这两个方面都经过了合理化的过程。这一点上,建立在《二十世纪的神话》(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纳粹的有魄力的统治者也正是基于“人民的同意”的,再没有比这一事实更能说明以上两个方面的合理化所内在的巨大矛盾和惨痛的悲剧了吧。

只要存在这一矛盾,现代的各种“信条”多少都难免带有些“虚伪意识”。一是将现实存在的支配关系表现为其他别的关系;二是将支配的主体转移到其他别的东西上(仍然是在观念的范围)。比如将支配关系特意描写为指导关系(leadership principle; Führerprinzip)属于前者的范畴。指导不同于支配,按理查德·施密特的说法,是“在某种共同利益上构筑的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其特征有两点:一是个人凭自由意志追随,不靠命令和强迫;二是并非作为盲目的推进作用的反应,而是多少基于合理的根据来追随(“leadership”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对应领导者的是追随者(follower),不是服从者和臣下。毋庸赘言,将这种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适用于现在政治社会结构会滋长出强烈的意识形态机能,我们知道纳粹德国有过其典型的例证。然而,将统治者描写成经理或乐团指挥之类的是现代国家广为见之的现象。第二种范畴里有各种变体。但总的来说,可分为超人格化方向和非人格化方向。所谓超人格化指的是一种虚像:或是将人的支配往上转移到神的支配,或是往下转移到人民的支配。特别是现代所有政治意识形态都好将统治的主体转移到作为集合概念的“人民”身上,由此掩盖一切统治所共通的少数统治多数的本质。统治的非人格化的意识形态的最大表现就是“法的支配”。“不要人治要法治才有自由”,康德的定论无疑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大原则。当然这一理念所起的历史作用巨大,至今仍未失去其效。但

是现实中总是人在解释或适用法律,不可能由抽象的法规自动地得出一定的具体判决,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自明之理,国家权力的现实行使牢牢地保卫着支配关系的基础,不容他人挑战。尽管有这一至高无上的目的所制约,但通过僭称国家及法律的中立性特征来起相反作用的事例也存在,比如拉斯基曾尖锐地指出过的美国大法院的历史。<sup>①</sup>再有,国民共同体的理念或所谓国家法人说之类的都可编入支配的非人格化范畴。

现代社会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信条”不单停留在“虚伪意识”上,而且扎根于现实政治社会之中,究竟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更为确实地担负起表达而不是隐蔽这一意思呢?刚才谈到过,支配形象之所以能成立,是胚胎于社会不同集团间的利益取向的对立关系之中,至少其前提必须是社会建立在普遍的同类等级的阶级基础之上,排除一小部分人垄断物质及精神价值,不断更新 H. 海勒倡导的所谓意志及价值共同体(参照“Staatslehre”)。但是,这种社会更新是物质装置的问题,同时也是精神层面的问题。霍布斯曾对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说的先天的统治者和先天的被统治者的区别加以反驳说:“这不仅违反理性,也违反经验。因为没有那么些傻瓜愿意被他人所统治,都想自己统治别人。”<sup>②</sup>霍布斯的断言哪些是对的?或要使之正确该如何是好?这才是我们现代最大的课题之一。

(1950年)

---

① 参照拉斯基《论当代革命》(*Reflex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论美国的民主》(*American democracy*)等。

② 霍布斯(Hobbs):《利维坦》第15章。



**追记：**

此文是昭和二十五年末为弘文堂发行的《社会学讲座》执笔的论文，登载在该讲座的第三卷上，收入本书时仅做了些字句上的改动。不管是这篇论文也好，还是下一篇也好，都是以历史上的复合体的社会体制作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并非就其实际状况加以分析，而只是一种范畴论，只是将之与历史对象相关联，试图做一动向分析。本书中各处反复在说，这种范畴论和定义正如拉斯韦尔所说：“只要不作为系统考察和解释政治过程的工具，就只是会助长语词上的烦琐诠释之风气”<sup>①</sup>；更为极端的场合是在就定义尚未达到一致时，会招来的结果只是寸步不前。C. H. 泰克斯将学者们就国家的定义就收集了 145 种！<sup>②</sup> 如果将这些定义不视为试验性的，从中找出唯一的定义作为“真理”，其他统统作为“谬论”的话，将会是什么结果呢？但是，另一方面，权威、权力、支配、指导这类概念在用于日本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时，的确又很模糊，不仅会常常招来议论的混乱，而且不少情况下还无法梳理出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捕捉其相互移动的特性。结果是就这些概念界定也只是避开单纯的教条主义和单纯的经验主义，类似从某一角度加以照射的话，对象的某一侧面，或者某一历史动向得以反映出来这种方法，我们只能将这种范畴使用和对象的具体关联，作为问题常加以探讨。

---

① H. D. 拉斯韦尔(H. D. Lasswell)《权力与社会》(*Power and society*)，Intro. XIX。

② 参照 D. 伊斯顿(D. Easton)《政治系统》(*The political system*)，第 107 页。

## 第六章 有关政治权力的几个问题

权力对于政治学来说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如果追溯政治权力所包含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要涉及政治学的所有领域和所有课题。这种囊括性的权力论述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主要是围绕现代政治学中的重要论点,梳理一下如何把握政治权力的多样性,并由此概括性地提出我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重点放在阐明照射问题的视角上,所以难免会出现分析上的片面性和抽象性,期望能帮助非专业的读者多少理解问题的所在就很荣幸了。

### 社会权力与物理法则

政治权力毋庸说是社会权力的一种,社会权力因为存在于人类行为之间,必须与物理学上的盲动之力(physical power)加以区别,但我们要大量观察人的行为中什么样的力量关系在起作用,因而适用物理学的力学法则(当然是盖然性)并非全无意义。下班高峰时,从丸内大楼吐出的浩荡人流分别被东京站的几个检票口所吸进去的过程,可以用无数个弹子球来“实验”。亦即物理学的力的函数关系在考察社会的力的作用时时时会给我们以启发。力有抵抗惯性的作用,可以驱动静止的事物,亦可以改变运动的速度及

方向。对于社会的停滞不前,有进步的势力作用之,或对社会的剧变,亦有可抑制之的力量起作用,所以,这一惯性法则忽视不得。社会的力量也是社会的质量与加速度的和,遵循这一定律,比如为了避免对某一对象的剧烈的力的作用,采用各种弹簧和垫片是有效的。这一点自古以来的政治领导人都心领神会。力量的均衡和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各项法则也基本适用于社会力量。力量越是趋于两极分化则越是难以保持平衡,故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则高涨;一旦保持平衡则安定性极高。与此相反,力量多元化地交错在一起,相互杀戮则容易保持平衡。反之,微妙的力量关系的变化马上会失去平衡,也即安定度很低。这些“法则”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主体于同一平面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甚为适用。上个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与法国大革命后急剧的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兴起的社会物理学将这种自然与社会的一元化法则推导到极致。但是,今天这种一元化中存在着本质上的局限,是我们社会科学者的共同常识,所以要将“力学定律”类比社会现象的话,已经没有必要喋喋不休地议论社会权力与物理力学的不同。比如说“物理的强制手段”是由社会关系做媒介的概念(与自然相区别),这当然是前提。

### 权力的实体概念与机能概念

如果视权力为人或集团所拥有的,亦即具体的权力行使的背后总有一定不变的权力实体,我们称之为实体概念的权力的话,对此,如果将权力置于具体情况下的人(或集团)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的话,我们可称之为关系概念或函数概念的权力。思想家和学者

迄今为止就权力的定义无非是向某一方倾斜,将之纯粹分为上述两个范畴是困难的。比如,卡尔·约希姆·弗里德里克就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概念作为实体概念的一个典型(*Der Verfassungsstaat der Neuzeit*, 1953, S. 24),但如后所述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法实际上是倾向于实体的掌握,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在具体的政治分析中却不乏以权力的关系概念为前提来展开议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抽象地认定这两种看法的是非好坏而只偏袒于一方,实体概念也好关系概念也好,从中就权力现象的把握会产生什么样的思考方法上的特色及倾向性,或从历史上看是和哪种政治意识形态结合而来的,这些我们都应该根据实际例子来调查。这样才能明显看出各自取向的优点和缺点,根据具体情况,用相对有效的方法来分析,同时才有可能保持清醒的认识来对待由此易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归结。比如历史上看,一般体制稳定阶级或社会流动性低的国家乃至时代,实体的权力概念占支配地位,而作为意识形态强调政治权力的专制与暴力(不管是拥护还是反对)是与实体概念连在一起的。对此,政治权力导致的社会价值的垄断相对薄弱,交流传播的各种形态发达,社会集团的自发形成与其间(国家与各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不断相互制约的作用,这一国家或时代就会兴起相互关系的函数性的权力概念。因为关系概念在权力关系中重视服从的心理机制或对服从者行为样式的指导者(或支配者)的逆反作用,所以一般与立宪主义及自由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发展为这一思想传统坚实的西欧国家。从认识论上展示“力”的关系概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便是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参照其第二卷第二十一章),它的出现绝不

是偶然的。

由于人的行为方式被社会化,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亦被分离出来,疏通为一定的客观形态,实体的权力概念的长处就在于捕捉这种必然性。社会分工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必然会组织化,而组织化越是进展,人际关系的把握便通过个别的社会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制度”来推进。社会权力的发生与这种人格管控的抽象化和制度化是同步的,且正是人类自我异化的最为原始的形态。原始共同体的权威转换为支配关系,就公权产生的历史过程,恩格斯有过经典的论述——虽有个别具体实证之处要有不少修正,但其至今仍保持学术生命的缘由在于将这一权力的异化因素从历史上厘清并加以定位。组织化的权力标志是:(1)权力行使方式及被行使者的行为方式的框架至少有章法明确规定;(2)分担权力的各种职能机关及组织比较完善。但是,这种章法也好组织也好,随着年代经久或规模扩大,会趋于僵硬化,在这一意义上会加深权力作为“实体”的特征。权力制度化的典型当然是国家,但其他经济、宗教、宣传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当今越发庞大臃肿,不管其机构如何民主化,或社会价值如何多样化,其中的权力关系不断呈现出一种趋势是个别的相互作用关系被抽象化并且加以凝固。无视这一方面的关系概念也就会转化为虚伪意识,(在隐蔽现实的意义上)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将权力视为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或为其本质“属性”的。但这一观点在具体考察权力动态方面含有很多困难。权力,无论其行使的对象是谁,也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它

都不会均等地展示其能量的,只要看看国际政治和小集团的权力关系就比较容易认可这一点。但在论及政府及巨大社会集团内部的权力时,则往往被忘却。指导和支配,如果没有服从就无从而谈,而且服从者是积极协助,还是消极抵抗,抑或默认随大流,这些行为模式对权力关系来说,不是外在的力矩,而是具有左右其本质的意义。崇尚武力的对手与更重视金钱(或知识)的对手,权力行使中的组织暴力所占的有效比重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也就是说,权力与对手(服从者或其他权力主体)所具有的价值幅度是相关的,前者会随后者变动而变动。另外,比如在国际政治或国内政治中,对手眼中所映现的权力状况,即便是没能正确反映现实权力,其本身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重要因素<sup>①</sup>。因此,权力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即使不变,但威信(*prestige*)的降低往往也会给权力带来致命的打击。如果我们微观地看具体的权力关系的话,那么,其中包括着人和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的自我评估和他人评估的无限往返的过程,而且对其影响的社会因素随着通讯的发达和社会集团间相互关系的增大变得多样复杂起来,所以权力主体没法稳坐在制度及组织的自我认同上。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政府这类一级政治权力,而且也适用于政党、工会、企业等的内部权力关系及对外力量。无疑与此关联的是,广泛的社会控制及指导层面上的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等社会意义日趋重大。社会学家大卫·理

---

<sup>①</sup> cf. H.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 50—51.

斯曼<sup>①</sup>将美国现代的权力的无定形状况比喻为不可能同时确定电子的位置及速度的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说:“这里的问题是权力不是上了锁就能管住的物品,它广泛依存于人的相互期待和态度。经营者(对工会而言)如果感到自己的弱点和依赖性的话,不管他有多强的财力,他们实际上(在工会面前)都显得软弱,想依赖之。”(《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将权力的函数性认识提到这一步是否合适也不是没有疑问,但不能否定的是理斯曼的这一观察基于政治、实业、军事等各领域的实际调查,尖锐地反映出高度大众社会中的权力的某一侧面。当然问题是从这一现状中能够提炼出什么意义来,比如,着重面放在大众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广泛参与上呢?还是强调 C. 赖特·米尔斯<sup>②</sup>所指出的随着权力归属的不明确性而带来的“组织化的不负责”的倾向呢<sup>③</sup>?到了这一步,意识形态或党派性就要介入进来。

作为相关的方法论,权力的实体性掌控容易归结于机构及制度等方面,而机能的把握则容易直接着眼于领导人的政治过程、组

---

① 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 1909—2002年)在其《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中,对群体行为及大众社会进行了研究。理斯曼在书中指出,二战后美国人的社会心理从“内在导向”转变为“他人导向”,最明显的例子是,小区居民人人都寻求邻居的赞同,害怕被社群抛弃。这形成了每一群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却不能满足个人对友谊的渴望。该书被认为是研究美国人性格的里程碑。理斯曼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译者

② 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 1916—1962年),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译著和著作有:《韦伯社会学文选》(与格斯合译, 1946)、《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 1953)、《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3)、《权力精英》(1956)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等。——译者

③ *The power elite*, p. 342.

组织的战略管理、个性及行为模式。传统的国家论是以法制为主的，其机能活动亦可用法学术语来阐述，故而实体论的看法自然优先，所以在考察政府活动以外的政治过程时，也是将重点放在政党及工会这类公开组织的社会集团上。而且，后者自认为是“小国家”，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可类推为法律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是要谋求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动态关联以及阶级构造与阶级斗争的统一掌控，在这一点上是超越了前述的单纯实体论的立场，但是政治制度本身的理解方式却明显近于传统的公式制度为主的做法——至少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是这么阐述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结果，不是简单能回答的问题，但我想恐怕要考虑以下几点因素吧：

(1) 马克思主义形成的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和 20 世纪初将之发展为列宁主义的俄国，其时代伴随着贵族政体的崩溃，导致“阶级层出不穷”，迄今未曾经历过的大众社会也给思考框架打下一定的烙印。

(2) 国家机制基本限定于以组织性暴力为中心的治安维护和对外防卫（警察与军队），很少与其他社会集团的运作相互沟通且相互移动。

(3) 从意识形态上讲，为明确打倒国家权力或夺取政治权力这一革命目标所需，原则上要将所有权力统统归于敌对一方的“所有”，这样设想才说得通。

(4) 在革命政党取得政权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之处，其国家机构的内部统一是大前提，排除了权力过程的力学考



察,其结果自然变成以法律制度为主的叙述。(维辛斯基<sup>①</sup>的国家论是其典型例子)

但另一方面,革命实践中的组织建设的问题无疑关注着指导和被指导的上下机关关系和相互制约的一面,而且,还不能不考虑由体制方向所引导的大众行为方式是否会转化为反体制的方向。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到处可见对权力过程的动态的敏锐洞察,只是所论及的都是专门作为战略战术所关注的具体情况。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国家论和政治过程论尚未统合,所以就权力论也是如此,基于历史阶段来宏观把握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尚未抽象到理论层面的政治技术的观点并存,并未经过充分的整合。

上面所说的所谓制度机构等也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连锁和反应上,只不过它是作为一个循环过程被加以类别梳理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极端的唯名论:只有个人是具体的存在,制度与机构都是抽象的;也不意味着“国家对个人”这种图式的正当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被组织化,权力关系介入其中的过

---

<sup>①</sup> 安德烈·雅奴阿列维奇·维辛斯基(Andrey Januaryevich Vyshinsky, 1883—1954年),苏联法学家、外交家。1935年被任命为新的检察总长,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人民委员,外交部长。著有《刑事诉讼教程》《苏联法院组织》《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等著作,对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学影响极为深远。他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口供是证据之王。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称他为邪恶天才,英国学者克兰萧指责他陶醉在邪恶中不能自拔,时代杂志在其讣告中送其“魔鬼的辩护士”的谥号。美国法学家富勒批判他学术上惯于回避实质问题,以恶言谩骂取代理性分析。而同期英国思想家拉斯基对其更多同情的理解,美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特拉更称赞他的法理学不啻为马克思主义法理论的简化版。——译者

程是多层面的,各个组织层次必然带来其意义和作用的本质上的差异。尽管我们可以“提取”和“分离”各个层面所追求的价值(后述)之差,小圈子内的权力关系与大集团的、部落的权力关系与国家的在结构上不同正是源于这种组织化程度的差异。只是公式化加以类别的制度和机构上再捆绑上认识的话,为了甄别其制度的“内”“外”,反倒容易迷失在这两方面相互间的往来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非公式的组织化过程,以至于会带来致命的错误,无法切实把握现代这种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为了避免这一点就要将权力构造不断地展现在权力过程中,并在组织关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将这一过程暂且分解开来进行考察。这一做法无论如何是必要且有效的。当然要将之与把整个权力视为人际相互作用能量的总和这一看法加以明确区分。对于组织中的整体与个人的机制问题,我想赫尔曼·黑勒<sup>①</sup>所说的系统理论(*staatslehre*, S. 63)会给我们不少启示的。

### 权力状况的先决条件

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来分析权力,其优点在于能够理清广泛的人际关系在转入权力关系时的巨大能量,它当然与所谓人类社会权力的历史起源和发生有关,但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前者的直接目的是阐明现代社会公开或非公开的所有集团关系的权力过程和其相互关联。政治统治与非政治(经济·宗教等)统治的界限很

---

<sup>①</sup> 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 1891—1933年),犹太裔德国国家法学者。一生短暂,留于后世的著作不多,代表性的有《论主权》《国家学》。他认为国家是“运行于社会现实中的统一体”。——译者

微妙,在当今这种非政治行为的政治机制下越发显著,这一工作更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一般的权力关系的介入及其相互关联的前提事实(理论上是一种假设)是,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是多样的,而且在一定的时空内相对人们的需求而言,其数量又是稀少的。以这一基本事实为前提,以价值的追求、获取、维持、增多、分配为目的来掌控人际关系,而且当这种掌控的最终手段是剥夺(制裁)对方所拥有或追求的基本利益时,权力就必然要介入进来。前面说过,权力的施展是与对方价值的规模相关的。古人以“生杀予夺权”简明地表达了这个道理。肉体的生命安全在任何时代都是人所拥有的最起码的价值,因而,对人最为有效的掌控最终就是以剥夺这一基本价值(全部或部分)为武器,包括杀害、肉刑、流放、投狱、肃清等。也就是为何物理的强制手段(暴力)的组织化会呈现出所有权力潜在的倾向。尽管这样,对于那些坚信“不自由,毋宁死”的人,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没有组织的,所有暴力会显得无力。同样,最小限度的财富是维持肉体生命及获得其他社会利益的最基本因素,故经济利益的“与夺”也是自古以来作为权力掌控的目的及手段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只要经济利益的生产不是像空气那样无穷无限,今后依然如此。但是,物质褒赏及剥夺对人的行为有效控制的程度当然较之肉体生命来说没法比,但因其个人、阶级、民族和时代的不同,具有很大的偏差。对天主教徒来说,被罗马教皇宣告破门之罪,或对共产党员来说被党中央宣布开除出党,各自都意味着剥夺尊敬、爱情、名誉、势力等重大价值,能够掌控这些价值的人(或组织)较之那些能够控制他们的财富,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人,在对他们实施权力上实际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以

这种价值多样性为前提,拉斯韦尔<sup>①</sup>按价值种类的各种组合对权力形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sup>②</sup>,其中虽然也有些只是知识游戏而已,但不可否定的是仍然反映了社会分化和传播的高速化带给人们的价值观的多样化。他把权力的基本价值和权力本身的价值区分开来,比如,工会势力强大,虽自己并不拥有“财富”,但有权力分配之;赞助商和导演虽不提高自己的名声,但有能力掌控他人的名声等。或者广泛存在着一种重叠关系:针对 A 这同一个人,B 在知识信息上,C 在财富上,D 在获得尊敬上各自都有自己的权力去影响之。这些都给我们展现了现代错综复杂的社会权力。针对政府权力(governmental power)的行使,所谓强化立宪制度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扩大人们的自由,反倒是显露出基于财富的权力关系。历史上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按上述观点来看,没能认清各种权力的重叠关系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显著的失误,他们过于乐观了。

获得或增大价值一般来说无疑是集团组织要比个人更容易些。围绕价值的争斗是因为价值的稀少,人们对之有强烈的需求,故而愈发带有集团凝聚性。而权力本身也是资本,而且它掌控着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剥夺他人(或集团)的各种价值,所以权力作为掠夺价值的基本手段效率很高。于是对相关各方来说,围绕重大的价值纷争无论是在集团之间还是在集团内部,都容易迅速转化为权力斗争。由此产生一种内在倾向:在权力的管辖下人与人的

---

①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 1902—1978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译者

② 日文版《权力与人》,第287页。

组织关系不断扩大规模,将权力关系的最高点愈发纳入自己的内部。这并非是因为领导人及统治者的邪恶本质,而是基于权力本身的特性,正如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明察秋毫地指出:“不是他不满足一定的权力,而是不去追求更大的权力,则连现在的也保不住。”<sup>①</sup>于是,本来是为追求别的价值而在的权力关系转化到为自己的目的上来。当然这种倾向根据什么状况、什么文化、什么性质的权力、什么种类的集团会在发展的速度和形态上有所不同。处于紧张的国际关系和长期的内乱状况下,这一权力扩大的自我目的化会强烈反映出来的。这种紧张和不安的情况下凡属重大利益(生命安全及国民基本权益)受到威胁时,人们对价值的关心会单一化,都集中在一点上,所以这时候权力容易集中在能够掌控之的人手中。与此同时,历史上常见的是邪恶势力或领导人也会反过来利用这一事态,人为地煽动对外紧张关系,或者将集团成员的重大利益不断置于危险状态用以保持扩大自己的权力。

要想把握权力的动态,不能仅注意已经制度化的社会各利益分配形式,还必须考虑到价值关注的方向和力度后的潜在势力(potential power),即关系到上述权力的互动。权力安于“现状”则往往会忘记对之维护,转为关注别的价值,从而导致权力地位的丧失,这种情况不少(所谓创业后第三代的悲剧)。与此相反,如果民众、阶级或民族到了丧失的只是锁链的时候,他们或是完全逃避权力过程,否则就有可能要为“获得整个世界”而奋起。“世人只知财富之势力,全不顾及欲获得财富之势力,只知权力之势力而不顾

---

<sup>①</sup> 《利维坦》,第8章。

欲获取权力之势力……地位即势力，而无地位也是势力，不管干什么即使失败也所损于自身，他们岂能不勇往直前。我们在政治上要承认与财富、力量、学问，权力相勾结的资本，同时也必须承认那些没资本的人更有资本。所谓来去无一物恰似无尽藏，对青年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之友》第6号）苏峰年轻时说的上述一段话，贴切地表达了这种权力过程的法则。

我们上面论述了一般个人统制关系中的权力势态，而没有抽出权力运作过程中的特殊的政治性的部分，因为原因之一在于政治团体、经济团体、文化团体这一固定区分对考察现实政治过程往往起着副作用。那么，非政治的权力过程的政治化条件是什么呢？到这一步，政策（policy）因素才开始登场。所谓政策是利益的生产、获取、维持、分配等目标，以及为实现之的方法。这种利益与财富相关时是经济政策，与知识相关时是教育文化政策，那么以权力取向为目标的政策就可称为政治政策或权力政策。政治过程在广义上说就是政策实施，狭义上说就是政治政策通过权力关系——也就是以剥夺利益为手段的人际关系的统制——形成并实现的过程。政治权力因为属于公权，所以，尽管权力加以组织化以追求利益为目的也只是直接服务于（个人或自己所属的最基本集团的）个别的利害关系，这种情况说不上是公权。从这一意义上讲，政策给人的印象倒像是超越个人或集团的总措施。这也意味着政治权力当然也不是客观地服务于“整体”利益的。即便权力加以组织化为榨取经济利益而服务，但领导人又被赋予的职责是超越个人、派系的利害关系，不遵守这一职责的权力行使要受到监察，否则连阶级的统治作用都无法完善。只要是政治权力就必须在政策中包含诸

多关照,将何种利益分配到何种程度:不仅是自己的属下,而且还有被统治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当然,全面整体本来就是一个相对范畴,自然因历史阶段、资讯的发展而异,比如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权力是公权,但到了近世统一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便丧失了其公权性质。判断其是否具有全面整体观的另一有力标志是看是否注重调整(公关)对其他公权之间的利益分配。然而毋庸置疑,国家仍是当今最高权力机构,在一定领域内垄断正统性及合法性暴力,以其行使来剥夺利益为最终手段(*ultima ratio*)掌控着次一级权力关系。因而国家权力的掌控越成功,就在其领土内决定利益分配上越处于有利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何现代国际国内政治斗争说到底就是围绕国家权力的获得、维持、分配、变革等展开的。因当今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对国家利己主义及战争祸害的统一认识以及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增大,一体化的意向逐渐超越国际关系呈现出扩大到全人类的动向。但是,只要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不进一步发展的话,就难以摆脱走向国粹的倾向。所以,政治权力的过程几乎都是在与国家的关系上进行的。然而所谓政府的工作并非构成所有的政治过程,其中包含着议会及行政首脑的有限活动,他们可以自主地决定权力价值的增大和分配。“不是行使(*ausfuhrend*)权力,而只有指挥(*fuhrend*)权力才是政治权力。”<sup>①</sup>但是有些情况下,军人和行政官僚的作为超出法规所赋予的权限,强势参与权力及其他利益分配的决定,便会出现军阀政治或官僚政治。工会组织虽然在其内部含有权力关系,但主要活动模式集中在维护提高

---

① H. Heller, *Staatslehre*, S. 204.

工作条件时,并不直接被政治过程所包管。工会组织选举是支持特定的政党,那是政治政策,且仅限于作为经济团体介入政治过程。但是再进一步工会组织总罢工要打倒政府的话,那就是将全部工作投入到政治过程中去,也就是说已经变成一种政治团体。资方也有可能蜕变为政治团体,但一般情况下资方通过其固有机制对政府的政策决定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本来就处于推动国家权力的地位,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外,没有必要直接转换为政治团体。从这个例子可以明白,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这种常识上的区分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当然重要的是对于各自的社会集团在权力网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要因时因地观察其追求的利益。在一定的政治状况下,要认清任何机关或集团如何最根本地左右国家权力并非易事,从有关宪法的主权规定和机关权限的条文上看不明白。平常朦胧隐约的最高权力只有在紧急事态(肃清,政变,内乱等)突发之际才如电光雷闪般地映照出其所在。“主权就是例外情况下的决断”的命题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sup>①</sup>

### 政治权力的构成及其手段

我们将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日常地且主体地参与的主要组织集团称为该权力状况下的权力单位。首先是国家,还有其他是超国家组织(比如过去的共产国际),政党、政治性的秘密结社等都

---

<sup>①</sup> cf. F. Neumann,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50.



是权力单位。下面我们简单地描述一下这些权力单位的内部构成及组织手段。（政治团体或经济团体在社会上有其职能区分，但作为权力单位是以政治斗争的舞台为中心的，占其主要角色。因而在这里不去考虑上述非政治团体的政治化的可能性。）

有组织的权力单位一般在其内部包含着多层权力关系，毫无例外都是构成金字塔形式，按参与权力的程度及关注度来分，可以有以下四个阶段：

- (1) 领导核心(所谓权力核心, Machtkern)。
- (2) 围绕核心并直接辅助之的精英或先锋。
- (3) 跟随精英日常从事的活动, 或为 A. Glazier 所说的 politest。
- (4) 非日常的, 比如仅出席一年一度的大会, 或在选举投票时, 作为参加权力的一员。

当然这种区分不是一成不变的, 反倒是其僵硬化程度愈深, 组织效率则愈低。在权力机构内部或从机构外不断地网罗人才(从政治意义上)提升其地位是持续维持权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 不管是民主集团也好, 非民主集团也好, 都如此。

政治权力的构成可以从职能分工上分为几类。传统上以制定法律为主的立法部、司法部、行政部对政治动态的分析都不甚有效。我们可以按下面的权力掌控手段来分为几类：

- (1) 担任象征、神话、意识形态、政策的制作及立案的人；
- (2) 应对具体情况制定战略、战术的人；
- (3) 情报、宣传、煽动方面的专家；
- (4) 负责筹款及开发财源的人；
- (5) 外事负责人；

## (6) 负责暴力的专家；

当然这种区分是流动的，越是接近权力核心，这些职能越被统一调配。而且各种职能越是配合完美保持均衡，则权力发挥的能量就越大。这些职能的运作固然要广泛依赖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各种条件，难以测定政治权力的强度和大小正是基于这点。权力基础的综合性在国家权力上更为显著，忽视这一点，仅依靠其中某一个因素——比如物理上的暴力（军备和警力）或财政状况等，来比较判断自他权力的优劣，和前面讲到的权力的实体化思维一样，也是政治家最容易陷入的误谬，以至成为国际国内的权力斗争中挫败的主要原因。

政治权力统治其对象，即人或其他权力单位，所用的方法与一般社会的控制手段相重复。如前所述，政治权力特有的手段就是驱动暴力组织，军警的动用是政治权力行使的极限状况，并非其常态。“人用刀剑可做任何事，只是不能坐在上面。”（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从这一意义上说，投狱与战争倒是反映了政治权力已别无良策。从“权力的经济效果”上看，实施现实的暴力莫如威吓（如国际政治所讲的动员军队或集结到一定区域）；与其直接地暴力威吓，莫如经济封锁或剥夺名誉这类间接的强制手段；再进一步，与其强制，莫如说服（persuasion）和达成一致（consent）更为有效。服从权力的动机只在于恐惧利益被剥夺，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与单纯的物理上的暴力加以区别，称之为赤裸裸的权力（naked power）的话，在这一权力下萌发最起码的自发性（但这里还轮不到马克斯·韦伯说的权力正当性根据的问题），在理性的协商下达到最高点。但是，另一方面，权力的统制

是针对非权力的统制,这一特性是以剥夺某种利益为背景的,所以纯粹的说服和协商在权力关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靠政治权力来说服或“协商一致的政治”这些话多多少少有些神话一般。奖赏、提拔、经济援助等物质上精神上的利益提供,如前所述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掌控手段,届时也不乏以“如果不答应的话”作威胁。没有纯粹依靠“鞭子”的政治权力,同样也不会有光使用“糖果”的权力。

一般来说,掌控人的活动方式有两种:直接指使命令一定的活动形式;并不直接明示之,只在结果上看得出是被唆使的——也称操纵(manipulation),大众民主化时代显著发达的是后者的技巧。权力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必须唤起广大群众的忠诚观念及感情,他们或是利用传统的象征,或是创造新的象征。旗帜、制服、歌曲、仪式、祭祀、集会、示威游行、神话、意识形态等都是为这种象征所用,其广泛的普及借助于传媒得以大幅度实现。这些手段的使用说极端点儿就等于“褻渎灵魂的暴力”(皮埃尔·让内<sup>①</sup>),而说服及协议完全成了空洞无效的。但是政治权力的这种控制手段易陷入窘境:就是它越成功,大众的服从就越“自动地”变为一成不变的,但同时服从的惰惰性又使得自发的主动性逐渐减退,对公众事务的关注会被个人的情念特别是消费生活的享受所替代。而且,现代技术的各种条件下,除了战时非常时期以外,无论多么独裁的权力,信息为权力一方单方面地限定已不大可能,所以,在大众面前开展的对抗象征期间的露骨的叫卖,只会是相互消减其效果,使

---

<sup>①</sup> 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 1859—1947年),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译者

得人们不再去对政治关心。政治权力也是适用于“收获递减法则”的。

### 政治权力的发展趋势

#### (1) 政治权力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

将近代社会与之前的社会加以区别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权力从其他各种社会权力分化独立出来,比如封建社会领主与农民之间的经济上的收取关系直接表现为一种政治权力关系,广袤的土地所有者按其地位当然是政治权力的主体。但随着近代国家的发展,政治统治从经济生产中抽象分离出来,政治权力具有其独自の组织和构造。但是,也因此前近代社会那种极为清楚明确的统治关系,特别是政治权力与经济支配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意向中政治权力已经神化为国家权力,其他社会势力都化解在市民社会的“私自”相互作用(如自由市场中的交换关系)中去。于是,统治形象只残留在政治领域,其他领域业已消失,这种看法成为近代自由主义的神话,从而制衡政治权力及扩大选举权便被视为民主化的尺标和最终目标。然而在现实中 19 世纪末以后,尽管政治权力在这一意义上取得了民主化的进展,但依然基于私自利润原理的资本的社会压力增大,而且进入垄断时代,生产关系的基本构造愈发呈现出寡头趋势。这两方面的紧张与矛盾成为本世纪政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挽救这一分裂的根本途径最终只有两条:或是将民主化扩大到生产关系的内部,或是顺应经济寡头统治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说得彻底一点,朝着前者的方向解决即是各种形态的社会主义;而后者的最终归结则是法西斯主义。

## (2) 政治权力的集中与其倾向

但是,上述事态由于政治权力趋于集中而变得更为复杂。尽管大众对政治权力的参与逐步扩大,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科技的发展和社会职能的多样化反倒使各自权力单位机构臃肿,更为官僚化,顶点与底边的差距愈发扩大了。“选举权愈发扩大,每个选举人的力度也随之减少。”奥斯瓦德·施本格勒的这一公式(Der Staat, S. 116)适用于此。权力在其容纳的人员上,在权力管辖的利益范围(经济、教育等)上,或在其机动力上都已臃肿庞大,而且最为显著的是在国家权力方面倾向于将基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集中于核心层面,特别反映在总统和首相的权力扩大上,但其他权力单位,比如政党也呈现出少数实权派支配的倾向。而且作为现代民主化的尖兵,依靠大众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也将权力高度集中在领导手中,这一点真是被罗伯特·米歇尔斯<sup>①</sup>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所验证了。于是,这种集中倾向由于以下几种原因,使其生理与病理之差只是一纸之隔:

(1) 由现代文明的各种条件(特别是传媒)加快了组织底层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权力集中与之容易引起恶性循环;

(2) 位于顶点的权力核心跳过比较高度关心政治的少数“活动”,或者排除之,直接向底层大众宣传,在其情感上的支持下强化权力(人民投票的独裁倾向);

(3) 权力单位之间的相互竞争和斗争越激烈,就越有必要保

---

<sup>①</sup> 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 1876—1936年),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生于科隆,提出后来成为政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性分析原理。——译者

持政策及战术面的机密，“少数有利的原则”为权力集中唱双簧。

而且更为棘手的是，上述问题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曾清楚地认识到其内在的危机，并摸索过种种积极解决的办法，但在今天却被掩饰，甚至失去真正的焦点。前面提到过的现代权力的无定形化所涉及的事态正是如此。比如，现代美国正如海军少将扎卡里埃斯所说：“影响我国将来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大门紧闭的外交的会客厅和陆海军司令部内，由各负其责的人们来决定。”<sup>①</sup>不仅如此，构成权力核心，并能基本左右之的位子都陆续被米尔斯所说的“政治上的外部人”（特别是军队、财界首脑）所占有，本来的议会政治，抑或议会本身的实际参与决定已经不是最高层次的权力机构，反而降低到中间水平了。尽管这样，也可以说正因为此，“牵制与平衡”的观念才在统治阶层到一般国民之间广为渗透。从体制的整体结构和机制来看，这简直是一个“神话”，但在国民日常生活中，体制的中间及底层有各式各样集团相互牵制，再加上国民也同样以各种形式参与之，当然会有很多实际感受。亦即说这种大众社会的状况下，借用尼采的用语就是大政治与小政治尖锐对立分化，大政治愈发向顶点集中，而小政治则相反，愈发分散得无边无际，由此，才将权力利益的社会分配不断地加以再生产。它几乎与经济利益和势力配置情况相辅相成。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特别是消费生活的多样化结果反而导致了对体制的不关心，为了让关心政治根植于中下层的次一级权力状况，整体权力机制的现实认识（抑或对其认识的热情）反倒减弱，这一现象在西欧“福利国家”虽有程度

---

<sup>①</sup> H. H. Wilson, *The problem of power*, *Monthly review*, June, 1953.

之差,但基本是相通的。而且,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的机构增大,上层人士之间的相互交流加深,权力的高度集中越发在公开的制度背后进行,与法律上有一定地位的人的权力感觉也出现鸿沟,且统治阶层的行动模式也近于大众化,使得连有权人本身都无法自觉到权力的寡头倾向。第一卷里谈到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不负责体系”就可以看作这种先进国家共通的大众社会状况与日本特殊的权力构造相互交融下的结果。

由列宁发起的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全面积极肯定现代政治权力的集中和其社会的必然性,一方面将之与先锋政党的目的意识相结合,另一方面又要用所谓“群众路线”或民主集中制来操控之。在体制化的苏联大政治和小政治的分化实际上是以合作社、工会、地方苏维埃等在与国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层面上的广泛参与,和最高领导层的共产党独占这一形式出现的。因此,经济机构及各社会领域规划整齐,在一贯的目的下接受指导,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掌权者的自我欺骗及“有组织的不负责”弊病。最高领导人容易由大众化转变为“伟人(具有综合认识能力)化”。但其反面,我们通过最近的事态已经看到,这种“先锋”的指导目的意识一旦坠落,权力核心便会分化为社会集团的代表,导致庞大的官僚体制和专制主义。而且,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论述过,科学技术对社会进程的反映也使我们发现这种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状况之中,存在着与普遍大众社会共通的能量。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所有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如果绝对权力是指权力的集中,那这句话会遭到反驳的,历史上有不少权力集中而不腐败的例

子(F. Neumann,前引书)。特别是现代,单靠分散权力相制衡的方式无法解决复杂的课题,如同企业凭借排除集中无法解决垄断资本的矛盾一样。今后的课题反倒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技术合理化必然出现的权力集中,如何与大众的福利自发地结合在一起,如何防止官僚化带来的社会渠道的堵塞。尽管如此,现代的权力集中产生出上述种种形态的病理现象,而且其病理中,既然有不少共同的危险性超越社会体制的不同,那么,阿克顿的话里就包含着真理,不仅限于自由主义历史史观的期盼。要认清权力的实际状况,不管是什么世道,都必须要有恬静的勇气和清澈的目光去认识没穿衣服的皇帝,这样,想逃离“政治性的东西”也好,或反过来向其密切靠近也好,才不会产生这一病理。

(1957年)

### 追记:

本稿的原型是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写给《政治学辞典》(平凡社)的条目之一“政治权力”,形式上大体照旧,内容上则大加改动,比原来超出了一倍以上,实质上等于是接近新稿了。只是量上增加了不少,可就这一题目还是写得匆忙,留下不少课题,而且让人担心的是压缩了叙述后抽象程度则更高了。我个人也想把散见在本书中的看法拢在一起做一个归纳。另外作为参考,还可以看看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我的其他论述,比如《政治的世界》(御茶水书房)和《政治学辞典》中的“政治”“政治的冷漠”“领导力”,同样,《社会学辞典》(有斐阁)中的“政治”“政治认识”等。千万不要以为政治学所说的政治权力的问题都已网罗在此,以及这就是权力的政治学的典型或代表等。



## 第七章 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

### 我们不回避表明态度

最近,我所属的一个团体要求署名反对批准新安保条约。事先声明一下,我说的这个团体当然不是这个宪法问题研究会。在这次署名过程中我倒是长了不少见识,其中之一就是有人提出了下列意见:作为个人我是反对批准新安保条约的,但这类问题在小圈子内征集署名,类似一种思想调查,在这一意义上我没法赞成。

我想这个意见倒是含有很发人深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见里确实包含某种真实,当然就具体的运动来说,参与这一运动的人也好,征集署名的范围也好,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比如我们请某人当发起人当然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发的意志,我不参加,或不署名,作为其个人的意见是应该尊重的。马上就给人家扣帽子说那人倾向保守、反动等,这类常见的贴标签式的气氛,我想在这个团体里还没有。但是尽管如此,公平地想想,这种署名运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多少都带有一些思想调查的意味,这点我还是无法否定。像安保问题这类现在尖锐对立的政治问题,无论定什么调子,什么内容,总之是要有一个结论,就此表态回答是或不是,不

管你再尊重对方的自发性,再努力勉为其难,作为结果,仍是无法避免被问者对现实的政治问题的一定的态度表明。

原则上说,就某一具体问题,回答是否赞成当然如此,就连要不要回答本身都应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决定。谁也没权利说非回答不可。然而,越是在这种小团体做这事,不管出自什么善意,里面难免都有一种强制心理在起作用。仅看这一点就不能不坦率地承认这类运动中总是伴随着一种侵害良心与思想自由的危险。

但是,再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上述的意见都对吗?我想未必。至少遗漏了问题的一个重大侧面。

归根结底,我们要碰到的根本问题是,现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从结论上来说,通过我们每天的言行,在单位也好在地区也好,我们始终处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调查的网络之中,这就是当今的现状。决不是说我们的内心世界、良心世界在平稳的环境中得以安宁,而只有署名运动才会激起波澜。思想调查这个说法如果有太强烈的旧帝国治安维持法的色彩,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叫忠诚审查或诚实测试(royalty-test),后者在美国,麦卡锡主义<sup>①</sup>的狂风席卷时非常有名,在西欧的民主里,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以各种形式加以制度化。另一方面,在中国说得最多的是思想改造,其中也是含有对良心的心理强制问题。现在的日本,很幸运还没有

---

<sup>①</sup> 麦卡锡主义是1950—1954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反民主的典型代表,它恶意诽谤、肆意迫害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有不同意见的人。从1950年初麦卡锡主义开始泛滥,到1954年底彻底破产的前后五年里,它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麦卡锡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也成为政治迫害的同义词。——译者

什么忠诚审查法之类的特别法,但大家都知道公安调查厅实质上是在搞思想调查,而且企业的进公司考试和工会对策也都通过警察搞思想调查。只不过不管好坏,行为的主体及目的也都很清楚。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光在这种现行制度下接受思想审查,在任何单位、任何集会,当今不经过明确的手续,而且也不清楚谁是行为的主体,我们不都在不断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思想调查和忠诚审查吗?这当然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但我们没法否定这一现实。那些主要是通过我们自己构成的一种意象,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要动辄就说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就连单位里发生那些问题,你的发言你的意见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给周围人传递自己的看法或倾向,这种印象是无法回避的。围绕相互之间的言行可以有无数往来,但其中还是比较强的印象沉淀下来,加以充实和固定。对这种观念的塑成起最大作用的因素可以说是你对该集团迄今持有的对事物的看法和感受,也可以说是对其价值体系的赞同程度。

比如在日本,无论是地区还是工作单位,传统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你要是所作所为与其精神风土不符,那就会被视为“赤色”,这一印象并不意味着你信奉共产主义,比起这种深奥的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更多的是意味着你有反抗精神,缺乏协调性。再举一个别的例子,比如某团体是倡导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你要是不与周围的主流动向和想法靠近,那就会给你扣上别的帽子,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托派啦……当然这种情况好坏还有一个理论或思想准则,不同于前面那种莫名其妙的非合理的“赤色”形象,但实际观察一下就知道,意识形态没有比自己想象的那么合理,总之,我们是处在形形色色的漩涡之中,不管你是否喜欢,每天都被看不见的匿

名的影子审查着你的忠诚,调查着你的思想,这就是现今的状况。

这一事态,我们刚才用思想调查或忠诚审查这一被动态来表述,同样的事如果用能动态来表述会是怎么样呢?我们认为每一个社会行动都具有参与一定倾向的意思,这里的行动也包括静观,也就是不作为。比如某一团体或区域,大凡对于社会上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习惯于不做积极的表态或不采取行动。但这种积极表态特别具有敏锐参与政治的意义。相反,在那些对政治问题当然要采取共同步骤的区域或团体里,这一气氛笼罩之下,你保持沉默、不作为,这本身就明显是某种政治态度的反映。但是我们如果超越其团体或特殊的区域,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语境中来看的话,那么,你做也是参与,不做也是参与,没有单方面的参与。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团体的一般倾向采取相同的步调,本人或他人都不会强烈意识到这种参与。而且在现代社会我们所属的团体是多层面的,问题就越发复杂些。比如,知识界的一些小团体中,有的人不愿意协调一致,认为自己独立思考行动;但在别的更大的社会语境中,他又很少与广泛的社会趋势唱反调。这类例子很多,一方面警惕来自正面的忠诚审查的倾向,为避免之所采取的行动却把我们拖进另一种来自背后的更大的忠诚审查的网中,而且本人常常不会意识到这点。所谓出身也好,同流合污也好,脱离了针对什么问题,针对任何势力或倾向,一般就很难断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天天,不,时时刻刻要在众多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方向性中选取一项。所以,回到刚才的署名问题上,如果仅对这种“倾向性”做出敏感反应的话,那么那个人下次对别的潮流也会有反应。而且,对于政治的焦点问题,回避选择与决断的态度正是日本精神风土中的

传统行为,是与之步调一致的行为。

### 不偏不倚意味着什么?

现在逼着我们表态的问题堆积如山,而且这些问题与过去不同,十分巨大同时又很复杂,想要认识清楚问题的全貌并非容易。我们作为研究者主要要保持客观的头脑,在具体问题上当然尽可能做到全面丰富的认识。而且在另一方面我们时时刻刻都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也就是对一定的动向有所参与。认识事物是个无限的过程,看上去很简单的社会现象和政治问题,如果要将其所有构成因素都提炼出来,从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再穷尽其动态的所有可能性,那几乎是永远的课题。只想想这点就知道无论多么完美的理论和学说,其自身是没有完结的。所以,不是说学术分析没有意义,反倒是没有完结之处才有学术的进步。正因为认识是假设和验证的无限重复的过程,所以,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学说、自己的理论不断地怀疑,是做学问不可缺少的精神。要区别学术态度与教条的态度,首先就要有这种怀疑精神,不断地检讨自己内藏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自己的理论也总是持有保留余地。

但是,另一方面,该做出决断就是将这无限的认识过程在某一时段切断,只有这样决断才能产生出行动来。当然决断、选择的结果又放回认识过程中去,从而进一步丰富认识。但在每一决断的时刻,都要放弃更完美、更丰富的认识。就是说这里面永远存在矛盾或二律背反。认识当然是尽可能越充分越好,但决断就是将之切下一面。比如,对政治上争论的问题做出的决断,不仅只是基

于不完全的认识的一个层面,而且其价值判断也只能是单方面的。人说小偷也有三分理,在认识层面上要承认一方的三分之理,但作为决断还是要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否则就没法做出决断。

歌德说过:“行动的人从来就是残酷无情的,除了旁观者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良心。”(Der Handelnde ist immer gewissenlos)我们只要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这句话永远是真实的。把没有完全弄懂的当作懂了的来付诸行动,或对立的双方各有优点和缺点,但决断时要倒向一方时,都是没有良心的。尽管这样,我们只要生存下去,每天对无数的问题要做出决断,或不得不这么做。能站在纯粹的旁观者立场的只有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神才是完全有良心的。

我们的社会是由无数个行动的网络或行动的组合形成的。只要社会是由我们的行动关联所构成的话,我们通过行动或非行动对他人也就是对社会负责。在这一意义上,纯粹“旁观”的立场,歌德所说的有良心的立场,实际上是完全不负责的立场,所以在这一点上神也是最不负责的,生活在认识与决断的矛盾之中才是我们人类的宿命,而不是神的。我们作为人生存下去就要积极地接受这一宿命,就要对其结果负责。在行动关联越发复杂的现代,才越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自觉到这种宿命。

世上总有些独断主义者,他们自己蒙上眼睛不愿看到认识过程的无限性,忘记理论的假设性;还有一些肉体行动主义者,他们压根儿就蔑视认识的意义。但反过来看,事物又不是凭简单的是或不是决定得了。一般认为学者的态度总是回避下决断,美其名曰:再好好研究一下否则说不准。或是对于互相对立的政治论点,

认为这也对那也对；再不然就是正相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结果就具体的论点所采取的态度始终是回避给出明确的方向。不少评论家或新闻工作者还认为那些人是有学识的，不偏不倚。我们再引歌德的一段话：“我能保证做到诚实无欺，但不能保证不偏不倚。”刚才说的世上所谓的有学识的人是不是将对他的公平公正混同于哪边都不靠了呢？

话讲得有些抽象生硬了，我们来扯点闲话。有本叫《世界政治手册》的政治年鉴，非常方便，我也常用，里面按国别标注出元首的姓名、政治制度的概要、内阁阁僚、政党种类及势力、议会的构成及势力分布等，一目了然。而且其中还收录有各国主要报纸的名字，旁边还有发行数量和政治色彩的栏目，即保守的，进步的，还是偏颇的。那么日本的报纸是怎么写着的呢？每年都不变：朝日，独立；每日，独立；读卖，独立；产经，独立；等等，连主要地方报纸的名字都列举出来，全都是清一色的“独立系”，很少见所有的报纸都是同一倾向的。我真是感到奇怪：这么多独立的报纸汇集在日本，怎么就不见日本的外交政策打出独自的方向来呢？我倒是衷心期望日本报纸的这种独立性可不要成为刚才那种结果：哪边都不靠，回避决断，尽量逃避参与，将政治责任搪塞一净。

我们的认识不是从无开始的，我们事先在旁边准备着一个整理对象的抽屉或者盒子。一边用它一边增强认识。概念和定义就是这类抽屉的一种。而且这些抽屉未必经过合理的反思，社会上蓄积起来的形形色色的观念几乎不加咀嚼地进入到我的体内。人们常说要正视现实，但现实这东西不管我们意识与否都通过观念这一厚厚的滤纸重新整理，以选择的方式成为我们的意识，问题只

是我们要不要重新设定一下自己的过滤纸。有些人认为只有自己可以不直接用抽屉就能看清事物,但那往往是不加反省地依赖于其社会通行的成见。而且我们都处在行动关联的网中,我们看对象不是从空中看地图那样,也不是从观众席看舞台那样,而是站在舞台上一边演出,一边从自己的位置上按远近透视法去观看。由此,我们的认识总是伴随着一定的偏向,毋宁说不经过偏向就无法认识一切社会现象。这里的问题不是带不带偏向,而是多大程度上能自觉到自己的偏向,并将之理性地控制在内。

我自己是学政治思想史的,看看西欧优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著者在分析批判对象时都要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自己是奉信自由主义的,自己偏好休谟的经验论等等,也就是自己通过这一偏向或喜好来认识事物的,认识的结果和批评的方法受此影响,所以读者要注意。我自己也是自觉之并试图尽量达到客观,这才是对社会现象真正公正而诚实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反倒更应注意那些标榜“排除左右偏向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的看法,现实中其实是常常隐瞒自己的偏向,或者就是作为回避社会责任的借口。

### 不作为的责任

前几天看了一个意大利电影,叫《罗维雷将军》<sup>①</sup>,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讲的是二战时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的抵抗运动的故事,我

---

① 《罗维雷将军》(*Il generale Della Rovere*)1959年制作于意大利,同年9月在第2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金狮奖,其后获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1962年)。——译者



在这里就不详细讲解剧情了。其中有一个场面印象最深。监狱里关押了不少人，有战争中的黑市商人、抵抗运动者、犹太人等，马上就要判刑了，或是死刑，或是劳改，或是送回德国。就在这紧要关头，那商人对着同室的犯人愤愤不平地说：我什么也没干反遭这般罪，既不是犹太人，也没从事过抵抗运动，为什么要遭这等罪？我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干。他只是一个劲儿歇斯底里地喊叫。这时，原来是银行员的抵抗运动领导人平静地对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但什么也没干才正是你的罪，为什么你什么也没干呢？战争都打了五年了，你竟然什么也没做。那商人反问道：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位抵抗运动者说：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想尽点义务，如果大家都各自尽了自己的义务的话，恐怕我们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这里面的内容虽短，却尖锐地触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的核心，也就是不作为的责任问题。不干什么仍然意味着朝一定方向推动现实。因为不作为，那个商人排除某一方向选择了另一方向。我对两人的对话感触极深的是，银行员出身的抵抗运动者对于自己豁出命来的行为，一点儿没有陷入那种英雄陶醉之中，只是淡淡地说：自己只做了些琐事，平凡人不过履行了平凡的社会义务而已。

今天当然不是那个电影背景的时代，我们所处的环境跟那时简直没法比，但我简单谈的话题对生活在当下的所有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些每天都面临死亡的抵抗运动者，都要履行平凡的社会义务，而我们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每天所做的决断和行动，渺小得连几万分之一都抵不上，如果我们连这点社会

义务都不去尽的话,那不作为的结果就会越积越厚,很难说不会出现比那个电影更惨的悲剧。

比如说最近的请愿活动。我总听人说,单个人的请愿怎么也成不了事,那样做根本推动不了现代的政治巨澜。的确,单个人的请愿其自身的比重或许很轻,但如果认为那样做也没意义,结果大家都不去做的话,那么,这一什么也不做的现实会越积越多,其本身就会将社会推向一定的方向。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每个人的行动,对于巨大的国际规模的当今政治现实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不管看上去多么细微琐碎的小事,尽可能多数人的做与不做,会产生极大的差别。习惯的力量就是如此。

大家不要以为政治行动这种说法,好像是在普通人够不着的云彩上的特殊组织内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所做的工作,也不要以为我们放弃了平凡的日常生活完全跳进了一个别的世界。我们在极为平凡的每天的工作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持续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也就是习惯将它看作极为平凡微小的社会义务履行的一个部分,这才是民主的基础,它比多么强大的意识形态、多么形式具备的制度都要重要。希腊的城堡国家的直接民主制的传统或许是我们国家欠缺的。但我们的思想传统里有“在家佛教”这一想法,把它翻版一下就是一种非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政治行动并非不“出家”到政治领域就干不了的,如果将政治活动仅限于直接以政治为目的的人,或政党那种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团体,那么即刻民主就死掉了。就像宗教只是和尚的事的话,也就失去了其生命力。民主的发展从这一观点来看,就是由职业政治家构成的特殊世界,通俗地讲就是由政界垄断的政治状态下逐步解放出来

的过程。因为民主含着自相矛盾。亦即本来应该是通过不以政治为职业,或不以政治为目的的人的政治活动,民主才能保持新鲜的生命力。议会政治也决不例外。议会政治绝不意味着议员政治,更何况国会大厦巍然耸立并不证明议会政治的健全。战争期间没有民主,国会不照样每次都开成了翼赞议会。

大家可能知道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吧,他是英国典型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我没弄错,是保守主义的哲学家、政治家。他说:

如果这些议员通过什么臭名昭著的法令或重大的改革来践踏法律的栅栏,并肆意行使权力的话,无论何时,人民这一团体(The body of the people itself)自身就应该介入。除此之外我找不出什么方法能让议员们始终对公共利益予以关注。人民的直接介入其实是最不愉快的救济法,但是,除此之外,显然不能保证宪法的真正原则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之。

这就是奠定了英国议会政治基础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说的话,也就是议会政治的常识。人民“任何时候”都可采取行动并不是突然就能实行的,人民要每天不惜寸暇地监督自己的代表们的行动,只有这样才可做到。打个比方来说,只有到了葬礼时才想起的宗教是死去的宗教,他们的庙宇是在与民众生活相隔离的特殊地带。

今天是宪法纪念日,说是拥护宪法,并不是说崇拜其中的文字。为何说拥护宪法属于政治活动,这时候我们应做出什么样的态度呢?拥护宪法不是只认为宪法崇高,而是要生活在其中。反

过来说,改正宪法(常说改恶,法律上并不认为正就是对的,这里用之)并不是从政府正式发表宪法改正案,或将之交付国会审议那天开始的,如同日本国宪法也不是自成立的瞬间就起作用一样,修改宪法是每天已经开始的过程,在这一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为了能够切实地生活在宪法保护的我们的权力之中,是否每天都做出行动,这才是拥护宪法的实际行动。

我们应该站在哪边? 宪法九十七条是大家知道的:

本宪法对日本国民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是人类为争取自由经过多年努力的结果,这种权利已于过去几经考验,被确认为现在及将来国民之不可侵犯之永久权利。

今天我们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这些规定是多少无名的不在历史舞台登场的人们努力的结果,在身后留下了他们漫漫的足迹。我们只是沿着这一足迹昂首挺胸迈步向前而已。

时间短暂,意犹未尽,但就此打住。

(1960年)

## 第八章 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

### 1

卓别林的电影《独裁者》里有句台词：“What time is it?”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一名叫修尔兹的负伤军官在卓别林扮演的炮兵帮助下乘飞机脱险的场面。这时飞机正倒飞着，两人都处在云海里全然不知。卓别林从怀里拿出表来，忽然表链在眼前竖起来反把他吓了一跳。第二次是在犹太人街上要将理发师（同为卓别林扮演）抓走的党卫军被哈娜用铁锅猛然一击，晕倒后再站起来说的也是这句话。我刚开始时还只是咯咯一笑，再次出现时，心里为之一颤。“现在几点了？”这句最为常见的日常问话在同一电影里出现两次并不足为奇，但考虑到使用的场景，而且理发师丧失时间感觉是贯穿该电影的主要情节，好像不单单是句台词。随后也读了几篇专家影评，并没把这句台词当回事，或许我感到诧异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意识过剩的表现。这里当然不是评介电影《独裁者》的地方，所以允许我自己发挥想象：这里的“时间”不是几点几分，应该是更大的单位。也就是说，这里问的应该是“时代”，是直接和《摩登时代》或更早的《淘金潮》相衔接的。

用这种眼光来看，卓别林其实一直在追问，现在是什么时代？

反复用同一命题来试图回答之,那就是“时代的颠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到处可见与常识相悖的事,可不是那种一时一地的人们的癫狂和胡言,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根本颠倒的时代,甚至这种颠倒已经成了社会的组成部分。《摩登时代》刚开始的镜头很形象:圈在栏内的羊群,与被工厂吸进去的上班工人对比,不正也暗示着这种结构的倒错吗?卓别林在此讽刺的不仅是马克思百年前就赋予的经典定义,即在劳动过程中机器与人的颠倒关系,而且在规模和程度上远远超出19世纪预言家们的想象,比如举一个靠科技来开发和操纵深层心理的例子就足矣,他要讽刺的就是渗透到现代生活中的“人的自我疏远”的种种局面,连吃饭这一人类最为原始的“自然”欲求都可因崇尚效率而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见《摩登时代》)。甚至连剥夺自由选择这个阶段都跳过去,现在从商品的购买到领导人的选出,“自由选择”本身就是由宣传和广告打造出来的。从前我们还称之为“再创造”的娱乐即体育等都可以成为巨大的装置将民众吸引进去,然后将之格式化。在希特勒面前齐举右手的群众(见《独裁者》)和大银幕前随剧情一齐摆动脑袋的观众(《纽约王》)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别也开始倒错,男的发出女的声音,而女的则用低哑的声音来回应(同上)。导演在现代不是价值的生产,更应该是价值的展示。

正是这一浑身装扮着神话与科学的20世纪的独裁者才是现代世界的最大的“展示”者,电影最高潮时描写的将政治权力化为自我目的也就是现代文明中手段和目的的颠倒。以牙还牙,以假对假,于是小贫民的理发师卓别林居然将帝国缜密布置的政治表演完全反过来加以利用,报了独裁者的一箭之仇。

但是,“What time is it?”这一问题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并不

只是简单地提出现代是颠倒的世界这一事实命题,特别是两人在飞机上的场面具有重要的暗示:对于居住在“颠倒的世界”的人来说,并不会意识到世界的颠倒。在颠倒的世界里理性和感觉被封杀,这种颠倒黑白成为日常的话,正常的反倒成为倒错;非正常却视为常识通用,而正常人要被作为疯子来看待;正是怀表的表链反倒直立起来,水壶里居然喷出水来。这就是等待理发师回家的命运,他压根不知道在自己意识丧失期间世界的巨变。

他因为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按一般的常识极为平常地行事:党卫军在犹太人店前玻璃上肆意刷上“犹太人”的字样,这本身就是极不讲理的事,他当然会在党卫军的眼前毫不犹豫地擦掉之;成群结伙欺负市民和妇女当然是地痞流氓的所为,他感到愤懑要站出来制止;他以为跑过来的党卫军是警察,要他们去管管那些捣乱的,他的判断和行为无一不是自然而然的,但每一举止在那个世界上都显得那么鲁莽,那么需要勇气,无论怎么看都极不自然。这种逆差让我们感到滑稽。用柏格森的理论分析,这种滑稽感的产生在于对于理发师的周围,即犹太人街上的事,我们没有什么情绪和共感,我们作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才能“纯粹理性”地泰然处之。日常生活的倒错较之自然的言行呈现出一种“僵硬”感,所以很容易用作戏剧的题材,而角色的替换及各自的关联对观众来说又是自明的,所以更像日本的狂言剧<sup>①</sup>。但在《独裁者》中的倒错略显

---

<sup>①</sup> 狂言是一种即兴简短的笑剧。狂言与能一样,同属于日本四大古典戏剧。因为狂言属于喜剧型科白剧,所以相对于典型的悲剧型歌舞剧及能剧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通过在现实世界中取材的人物或事件,用幽默的方式给武士和其他贵族阶级以辛辣的讽刺。因为其作品都是从庶民的生活中取材,再以当时的口语演出,所以比起能剧更能被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成为一种最为典型的平民艺术形式。——译者

复杂。如果按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的日常性来看,那理发师的言行无疑是颠倒的,但实际上其日常性本身如果是处在“颠倒的世界”的话,那么颠倒的就是其整个国家,而真正直立的是理发师及其周围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到底是从哪种日常性的一方来笑哪种倒错行为呢?无论是《独裁者》还是《摩登时代》,正是将现代日常感觉的分裂问题活生生地摆在眼前,其中的滑稽感才会伴随着痛苦与我们共存。

当然,从60年代“富裕的社会”和享受休闲时代的实感来看,那种显而易见的正常和疯狂的颠倒只是纳粹最盛时的一场噩梦。经常听见有人说: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与那个时代大为不同,对于所有事物的反应不要总是联想起三十年代的黑暗面,也该到了与之诀别的时候了。不仅是日本,西欧的知识界几年前就唱起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大合唱。就此我们后面再谈。总之在60年代我们的政治良知是否已经恢复到自知自明的程度,就连以良知的“祖宗”自称的英国不是也没有确立牢固的基础彻底清算正常与癫狂吗?大家通过多次的报道知道,针对美国“北极星”核潜艇基地的租借协定,英国以CND<sup>①</sup>为主的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运动到今年2月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抗议集会,游行队伍从特拉法加广场行进到国防部前静坐,有数百人被逮捕。始终站在这场运动最前面的是已经88岁的伯特兰·罗素,他采取的“异常”行动是不顾

---

① 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是一个倡导单方面进行核裁军的英国反核运动组织。该组织也倡导并开展国际核裁军运动,并通过协议加强国际武器控制,如著名的核不扩散条约。它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使用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军事行动,并反对在英国境内修建核电站。——译者



老躯坐在冰冷的街道上。据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所说：比如日报里面算是最公平的某报的工党方面的通讯员写文章说什么反对那种单方面废除核武器主张的才是“正常的声音”。罗素写信反驳他说，不对，正常的是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主张，而反对派才显得歇斯底里。该报拒绝登他的信。而且其他主张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这就是说，在言论自由的祖国，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主张只能通过一种癫狂的形象来传入大多数国民的耳目，甚至不允许进入大众视野。美国也是，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克劳德·伊特里出于罪恶感开始反对核武器，他的行动亦被某些人视为狂人，并由医生诊断书证明而被送到精神病院。据罗素所说，伊特里说明自己动机的几个声明完全处于正常状态，至少比那个自始至终为投下原子弹辩护的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托尔曼要正常得多。罗素以其独有的老练诙谐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并质问这个世界：

在今天这颠倒黑白的世界里，面对着名义上享受着出版和宣传的自由国度的所有住民，那些手握全人类的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们，有能力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不管是谁，只要认为捍卫人类生活是有价值的人都必须是疯子。我对我晚年会被送进精神病院一点儿也不奇怪，在那儿我会作为一个人愿意与所有具有感情的人们交流。<sup>①</sup>

---

<sup>①</sup>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1961年2月17日, 第246页。《世界》四月号译载。

尽管有这些批评的声音,但另一方面还是在所谓“有识之士”之间煞有介事地议论下述“现实的”问题:“CBR(大规模杀伤武器)最大的优点是专挑居民杀害,而不会同时摧毁大城市及工业设施”<sup>①</sup>。看样子,载着理发师和军官的倒飞着的飞机好像今天仍在漫无边际地在云海里飞行。

## 2

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有关纳粹的残暴行径:称作“Gleichschaltung”(一体化)的彻底的权力管制、残酷的镇压和暴行、网络般的秘密警察和令人窒息的市民相互监视组织,还有集中营里那令人发指的虐待……但在看过这些书刊报告和影像后,总会涌起挥之不去的疑问:德国人民,至少除了纳粹党员以外的,大多数的一般国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度过了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呢?他们是如何看待其间诸多的荒唐行径呢?比如,已有很多德国人说:一点儿也不知道奥斯威辛和贝尔森集中营里具体都干了些什么,战后得知自己的同胞能干出那种事,真是震撼不已。这恐怕也未必是他们的遁词和辩解吧。事实上他们战后才知道的纳粹行径的确不少。宛如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战后才知道“皇军”在占领地的所作所为(至少其程度和规模)一样。但与此同时,就在德国国内,普通的市民在街头目击到的,或通过报道可以知道的事件也应该非常多。纳粹推行“Gleichschaltung”的过程中所遇的障碍和抵抗之大可不是日本

---

<sup>①</sup> 《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1960年7月23日,第38页。

的翼赞体制所能比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中犹太人所占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长期传统及广泛的社会基础、基督教会特别是具有“文化斗争”经验的天主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的各州割据及地方自主性意识，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面，都不难想象戈培尔的“宣传”组织和希姆莱以及胡斯的“暴力”组织不断面临的课题是多么巨大。也因此这些组织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各地横行霸道，他们打砸的噪音与民众逃离的悲鸣和被欺负的呻吟，一般国民总是有机会听到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保持沉默，是被恐惧所吓到了吗？但是无论何人，一两个月可以想象，十年以上的恐怖中生活能够持续下来吗？是宣传的效果？当然其因素很大。但不管纳粹要求整个生活的政治化多么成功，一般工作的普通市民的生活和感触不可能与身穿制服的党卫军成员完全相同。他们每一个人不会同纳粹党员的思想与性格完全相同。只是他们住的地方处于纳粹的统治下，而且对于这世界的变化，他们毫无办法只是顺从而已。

我们通常认为纳粹“革命”的急进性与其他国家——不仅是日本，还有法西斯的“元祖”意大利——法西斯化过程的缓慢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我们过度强调这种对比，似乎纳粹革命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一蹴而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将历史简单化了。这样的观点，或反过来说，当我们以纳粹主义的先决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得到了完全的发展为理由，并因此而否定1933年的质的变化时的看法一样，都是对历史的简单化。从外边看起来是一系列戏剧化的打击，而对那些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人来说，可能并不特别值得注意，而只是一步步地被接受为场景中的变化罢了。比

如,弥尔顿·迈尔(Milton Mayer)在《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They Thought They Were Free*, 1955)一书中用许多例证来说明这点。为什么德国人对这样疯狂的统治闭眼不见呢?作为一个已经颠倒黑白的社会公民,他们怎么能如此“沉得住气”呢?在迈尔的书中至少可以找到解答这些疑问的一个线索,这里我们从书中采访的德国人中,选取一个语言学家的“告白”做些介绍。

他不停地说不在那个时候要觉察纳粹“革命”的整个过程必须要有高不可企的政治自觉,无法期待为日常工作所奔忙的普通市民能有这样的意识。这种说法本身在作者迈尔听来有点像自我辩护,有些焦虑,其潜台词是反正不会轻易得到理解……

“每一措施都是如此之小,都得到了如此完善的解释,而且有些场合下还会表示些‘遗憾’,以至于,除非你从一开始就保持一定的距离观察整个过程,你如果不理解这些微小的措施在原理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看见的就跟农民看农作物在自家地里生长一样,某一天突然发现它已经长得没过了头。”

“请相信我,这是真的。真是看不出会走向何处,该如何行动。每一行为,每个事件,确实都比上一次更糟,但只糟一点儿。于是你会等下一次和再下一次。你会等待一个大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那时候或许会有其他人来和你一起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抵抗。”

可是……

“你走到外边,在街上,人们聚集的地方,大家看上去都很

幸福。听不到什么抗议，当然什么也见不到。……在大学里，你会在私下对你的同事说，当然他应该和你感觉一样；但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世道还没那么糟糕’或‘你危言耸听’。

是的，的确是危言耸听。为什么？你说这事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可你又不能证明它。是的，这些只是开始，但你在不知道结局的时候怎么会确知这点呢。”

于是，为避免被称作危言耸听者或捣乱分子，咳，这节骨眼上，还是静观事态如何发展为好。

“但那个令人震惊的大事件决不会来，那个几十、几百、成千上万人和自己一起站起来反抗的时刻一直没有来。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整个纳粹体制最后的最卑劣的行动在第一个最小的行动之后立刻到来的话，那么，那时会有数百万人惊愕失色，感到无法忍耐。——如果，1933年在非犹太人商店的橱窗贴上‘德国商店’标签之后，立刻就有1943年对犹太人的毒气屠杀的话……但当然了，事实并非如此。”

然后有一天，太迟了些，他所说的“各种原理”一齐涌现在他心头。

“你生活的世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你会发现已经变得不是你出生时面对的那个世界了。各种形式都原封不动在那儿，房屋、商店、工作、吃饭时间、来客、音乐会、电影、假期等。但精神，彻底变了。尽管这样，你因为犯了一辈子把精神等同于形式的错误，而不会注意到的。如今自己生活在一个憎恨与恐惧的世界之中，而且处在憎恨与恐惧中的

人们甚至还不自知。你也变，他也变，在一切人都变了的时候，就谁也没变。”（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我认为这些话相当真实地描绘了由纳粹内部所窥见的市民形象。我们应该为这个语言学家对“原则性”“认识之低”而谴责他么？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现代政治中盲目遵从在市民的日常生活感受中同步而进的一个典型例子来看待？为了避免被社会认为是一个危言耸听者，人们调整自己以适应其环境，与此同时，先前他认为不能苟同的那些场景也变得习惯了，当他突然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远离了最初所站的地点。这种情景难道就是因为德国才发生的么？还是说，问题在于甚至在一个像纳粹那样的戏剧性的过程中，人们日常生活感受就是这样反映的？至少，采访者迈尔在听完这段冗长的告白之后，大为震惊以至于“一言不发，想不到该说些什么”。

## 3

纳粹的“极权主义革命”如上所述，不仅在其过程发生的急速方面，而且在它渗透公民生活的彻底方面——从上到下的生活、文化的组织化上，都是引人注目的。然而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也许我们有必要深入聆听那些生活在内部的人的经验。正如外国经常揣测以及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普遍猜测的那样，就好像在他们个人生活的口腔里被塞进“政治”这么一个倒刺，总在刺激撕裂柔软的黏膜。真是这样的感觉吗？我认为未必如此。从上文提到的

语言学家的陈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暗示,但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提供的例证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回忆录。

作为纳粹法律界众所周知的人物,施密特在战后便受到同盟国的审判而入狱。他获释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从囹圄中获救》(*Ex Captivitate Salus*, 1950),谈到了纳粹治下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知识氛围,而对理解他的近况而言,也是很有趣的。简言之,据施密特说,备受吹捧的一体化最终未能打破德国精神的“双重结构”。就表面而言,纳粹世界观犹如洪水从广播、报纸和路边的扩音器中无休止地喷涌;公告和法令亦如暴雨般地泛滥;再加上人民像鹦鹉一样重复口号齐声呼应地大合唱。但在这个乏味得可怕的噪音和规训的社会中,德国的精神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对自己传统的骄傲和自己不可退让的自由,甚至成为自己的“守护天使”的教养及内心世界。实际上那些敲锣打鼓与当权者步伐保持一致的人,至少在学者、艺术家和作家中,只是三流或四流的家伙;稍微明智的知识分子,都过着双重生活:一种内在的和一种外在的生活。纳粹统治的十二年,因为它是一个如此彻底地组织起来的体系,完全操纵着致命的恐怖和庞大的技术方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实验:即,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在控制整个国民的精神生产力到了不再有任何思想任何保留存在的程度上还能做到哪一步?这样,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受一种在那些外部人看来不可想象的体验,那种体验证明对一个政权来说,控制精神自由和创造性存在某种实质性的界限。这就是施密特所描绘的图景。与那个语言学家的忧闷告白形成令人震惊的反差,施密特说话的口气被指责为厚颜无耻的顽固。(平心而论我必须补充,施密特也经受了来自党卫

军报纸和纳粹统治期间更加正统的御用学者的严厉的攻击,他的理论并不像海外想的那样始终代表纳粹的正统地位。)

然而撇开所有这些姿态不论,施密特对德国精神境况的描述从其他文档证据来看并没有很大的扭曲。问题在于,从中可以吸取怎样的意义和教训?施密特声称“根深蒂固”的德国个人主义强力地植根于欧洲理性主义的漫长传统中,不是某种可以被如此轻易地、通过十几年的压迫就能够抹除掉的东西。但这个事实,即德国知识分子能够在外部的风暴下,在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中保持一种平和的自由本身就告诉我们,在现代世界中,“私人的内在”作为评价我们生活的社会的标准,是多么地不可靠。因此施密特继续说道:

德国人那么轻而易举地被组织起来,这实际上只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德国式的自我武装的门面。甚至在愿意对当时的合法政府的命令顺从协作的态度最大程度上得到展示的时候,退入“私人的内面”这个自古以来就一直保存下来的恬静的传统,依然原封不动。……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中,这种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区分,都不像在德国那样进行得如此彻底,在这里,二者已经变得完全无关了。因为这种教养层次外的世界观散布得如此顺利而容易,要从内心世界使他们完全划一化也就变得越发困难了。<sup>①</sup>

---

① 《从图囿中获救》第18—19页。

中译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冯克利、李秋零、朱雁冰译。



因此极权主义的“界限”，反过来说也就是那个所谓的“内在自由的世界”的界限，而这仅仅证明了二者基于一种互不可侵的事实上的承认，能够在同一社会中共存。所以，施密特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在内面性的名义下将“外部”，亦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社会），全面屈服于政治的世界，以致把对外部世界的选择从他们的个人责任中解脱出来。这是“精神”的荣耀吗？还是说根本就是一种不幸？

尽管我们常说从经验中学习，学习的方式却很多。比如说，同样在纳粹时代，著名的路德宗牧师马丁·尼莫拉(Niemoller)基于他自己的实际生活感觉和在他内在的个人生活的经验的反思中，得出了比那个语言学家更为积极的、与卡尔·施密特截然相反的教训。考虑到这两个人的经验——抵抗者尼莫拉，协作者施密特，即便后者不是机会主义者——这个对比几乎是太过于极端，当然以至看起来似乎不够贴切了。事实上，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人在实际政治的维度中站在对立的两极上——即在尼莫拉刚从纳粹囚犯集中营中放出来之后不久，施密特就开始了他的狱中生活。但这种从结果论来回顾性地切入，未必能够从内部说明这种情景。至少在纳粹统治的初期，尼莫拉和施密特之间的精神距离是如此惊人地细小，以至于难以想象 1945 年他们各自发现自己所处地点的距离之遥远。（当然，这里不去考虑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因为他们各自的职业和专业领域不同，关注的对象也相当不同。）如果尼莫拉和施密特是这样的话，那么更何况尼莫拉和那个无意识的遵从者——语言学家之间的距离，也就一步之差。听听尼莫拉的这些告白吧：

当纳粹攻击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有些不安,但是,毕竟自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什么也没做;接着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者,我更感不安了,但是我也不是社会主义者,照旧什么也没做。接着,是学校、媒体、犹太人等等被攻击,我总是变得更加不安,但依然什么也没做。接着他们攻击教会了,而我自己正是教会的人,于是我开始行动了——但这时已经太迟了。<sup>①</sup>

从这一痛苦的经验中尼莫拉抽出了两个原则：“抵抗不好的开端”(Principiis obsta)和“考虑结局”(Finem respice)。尼莫拉在这里描述的希特勒的攻击顺序今天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他的两个原则,与施密特讽刺性的“界限”理论相比,语言上已经重复了足够多的次数,听起来有些陈腐了。但这里重要的是连那个知名的勇敢的抵抗者尼莫拉,实际上在火没烧到他自己跟前时,仍是寓居在“里面”的人;而如果正如那个语言学家说的那样,在每个人都一点点变了的情况下就谁也没变的话,那么,必须抵抗“开端”的决定,以及在历史关联中对“结局”的预测,除非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外面”,否则是太困难了。而且,那些从一开始就在外面的人,正因为他们在外面,就必然会与在里面的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实际感受大不相同。

---

<sup>①</sup> 迈尔,前引著作,第168—169页。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即同一个社会中持不同见解的人的问题。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从那个社会“里面”的居民来看政治同质化和划一化的进展情况，——不是从领导人和他们的副官们，而是从普通公民的日常感觉来看。——当然，身处这同一个社会，对那些在原则上批判整个纳粹政权的人，或那些像犹太人那样从一开始就有可能被置于法律的保护之外的群体，以及那些随着世界观的挺进从里面被驱逐到外面的人。也就是对那些身为纳粹迫害的直接对象的人来说，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场景：那根本不是一个“人人幸福”的社会，反倒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凄惨的社会，到处充满憎恨与恐惧，为怀疑和不信任的风暴所吹打。一个接一个的“临时措施”对他们来说怎么能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对他们的伙伴中的许多人来说，甚至一个细小的变化也会马上掀起巨大的波澜，每个人的全部神经都会由一个事件、一条见闻，或一则流言每每受到电流一般的冲击。日常生活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连续；难以预料邻居何时会变成告密者、朋友何时会被告发，或同志何时会变成叛徒。在这里你想想，就宛如正午耀眼的太阳照射下须臾眼前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反之，无论你所在的房间多么隐秘，好像总是有一双冷酷地闪光的眼睛正透过墙壁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甚至你内心最为细微的活动。无论是自己设想的还是外部强加的，处在为权力所监视的位置上的许多人多少都有这样共同的心像。于是，对于纳粹德国，我们一般的常识也就更接近

这种心像。

不仅在纳粹德国如此。我们还会想到其他的例子：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乃至东欧各国，战时苦难的“黑暗峡谷”中的日本帝国等。这种集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留给读者的印象，通常是由来自外部的报告或由后来历史的“客观”观察所创造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类观察的信息的来源通常是体系的受害者、政治难民和异见分子。对这些受害者或抵抗者来说上述生活情景是“真实”的。同样，对那些前面提到的体制的协作者和消极的追随者来说“真实”又是一个根本不同的情景。简言之，在纳粹德国有两个被分裂开的“真实”情景。如果你从一个版本的“真实”来观察，那么看到的是人和事物一天天都保持着协调和统一，于是，对那些来自内外的、针对自己社会的一切“原则性的”批判，就当然视为吃饱了撑的危言耸听或恶意夸大的谎言。但如果你从另一个版本的“真实”来观察这同一个场景，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要奇怪，他们怎么能够若无其事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荒唐的世界或震惊于他们在道德上的冷漠了。如果在人们的意象之中，这两个版本的“真实”有机会交流的话，那么，不必等待尼莫拉痛苦的体验，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有可能去“抵抗恶的开端”或至少还来得及的时候就采取行动，会更加容易得多。实际上，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交流机会，“抵抗恶的开端”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强制性同化，一方面意味着正统的集中，另一方面又意指一种强暴的、对异端的集中。（“Konzentrationslager”（集中营）这个德语术语是多么地具有象征意味啊！）随着这种强制性同化成功的程度，上面提到的两种意象之间的交流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

种情况下,原本的正统世界和原本的异端世界,也就是离这两个世界的中心越近,其各自意象的自我积累而造成的那种僵硬程度则越大。反过来说,越是两个世界交接的边界领域,情景也就变得越可流动。这里对统治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根据权力的经济原则,分离暴露在意象的混合之下的、这两个外围区域的居民,如何在边界上立起一道高且厚的墙,从物质和精神上把这两个世界分开。强制性同化的成否也就依赖于此。

因此,统治者一方面筑起高墙封锁异端;另一方面使靠近墙的边界区的居民“逐渐”向中心部移动,和墙保持一段距离,这两个世界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也就被遮断。如果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点,那么,发生在墙对面的事件就很难会冲击影响到墙的这边。异端者即便没有被收留进字面意义上的“集中营”,也会“自觉地”集中到社会的某一角落。这样,他们和大多数公民之间的间隔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不仅在他们总体的世界观方面如此,就他们日常生活和感受性而言也如此,注定要加速孤立化。纳粹化的过程更多地是这样一种螺旋上升的运动而不是直接的“暴力”的增加。来自外国的反纳粹的宣传,很大程度上基于异见分子和政治难民的报告,而正因为如此,其预先构想的意象——即德国人民在压迫下窒息的意象——与德国公民自己所怀有的实际意象相差得太远,因而反倒经常会产生支持独裁者宣传的效果。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曾从事过地下活动的伊尼阿齐奥·西洛内(Ignacio Silone)在他的小说《面包和酒》中让主人公发出的感叹中也呈现了这同一个问题。

那个人向百叶窗外望去，口袋里装着一本外国护照，他可以认为宣传是虚伪的，那些威望依赖于一种不可抵抗的催眠力量使穷人眼中分不清黑白。但穷人并没有像他这样躲在楼上的百叶窗后，而是站在街头。而且在底下的街头事态看上去有些异样：如果一个人叫喊，那么所有其他人都会跟着叫喊。如果一个人举起手行罗马式的致意礼，那么他旁边的人会更踊跃地超出他一步举起双手致意。处在宣传大网内的每个人都想为自己谋得一些安全。每个人都要求推荐，要求袒护，而重要的就这些。宣传所呼的口号只不过具有次等的重要性罢了。因此，反驳宣传也是无用的。<sup>①</sup>（着重点为丸山所加）

西洛内的话在两个意义上说具有启发意义。首先，在那些生活在正统世界的人（街头的人）和异端或者说精神上处在“外面”的人（地下活动者）之间存在一种尖锐的分裂，这导致了二者不可能沟通。第二个启发意义与先前施密特的引文相关，那就是，在表层的宣传世界和“只是为了自己谋一些安全”的民众日常生活的底层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分明的线。如果说前者代表了极权主义下精神状态的横断面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其纵断面。现在如果你从意识形态——在这里即纳粹主义——的分布方面来看这两个截面的关系的话，那么越是从那些精神上属“外面”的人的观点来看，就越会看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纳粹主义；如果离那些“内部”核

---

<sup>①</sup> *Bread and Wine*, tr. 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37. p. 204.

心越近,也就越会看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亲纳粹主义。当然,越是表层的宣传,意识形态的色调也就越是浓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异端和来自国外的批评和里面的表层的宣传同属一个层次,只不过其矢量的方向相反罢了。施密特看到极权主义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的“界限”,而地下工作者则感到透过百叶窗发出呼吁也无望。那些生活在内部的大多数人对政府的宣传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就成为了纳粹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个人安全”的考虑:知识分子们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躲在他们自己的“内面”中避难,大众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的感觉。正因为有这种实感,即便是来自异端或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进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也只会感到不大对劲,觉得那些人吃饱撑得没事干,在平地上(!)掀起波涛。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观察意识形态与意象之间的关系的话,也许我们会意识到这点,即无论纳粹的正统和异端是否集中或隔离,无论强制性同化多么彻底,为一般所接受的解释,往往太过于倾向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层面来观望其所在的世界。因此人们可能会忽视了真正可怕的问题,反倒夸大现实中有“界限”的东西。这样,纳粹及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问题就会被仅仅局限于特定的国家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而丧失掷向当代人的普遍性的挑战意义。

所以,前面引用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的作者迈尔说:

有两个真相,它们并不是互相矛盾的:纳粹分子幸福的真相,和反纳粹人士痛苦的真相……那些不持异见或者说不与

异见者往来的人并没有看到除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所抱有的对异见分子的不信任和怀疑之外的任何不信或猜疑,而另一方面,那些持异见的或相信有权利持异见的人也是除了不信和猜疑之外,什么也没看到。<sup>①</sup>

这一结论是他从许许多多的访谈中得出的,如果你把“纳粹”和“反纳粹”表达只看作是对一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的分布的话,那就会错失他的真正意图。因为他紧接着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就像有两个美国那样,当时也有两个德国处于一种更为尖锐的区分之中”<sup>②</sup>,在作者的脑海里是他自己的祖国盛行麦卡锡之风时的双重意象。上面所说的要点在于他对“除了这个巨大的社会所抱有的对异见分子的不信任和怀疑之外”这一限定。德国和美国,从它们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以及它们的政治传统来看,几乎是在对立的极点上的两个社会,要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德国和50年代的美国之间指出其不同之处要比指出相似之处容易得多。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迈尔还是公正地展示了这同一个世界的意象是如何被分裂和隔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共享异端意象并没必要非得依据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观。因此卓别林离开了美国,而同是逃离纳粹的托马斯·曼,战后也迁移到了瑞士。到那里后不久就去世的托马斯·曼留下的一段回忆,作为我们刚才的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听上去实在太过于悲哀。

---

① 迈尔,前引著作,第52—53页。

② 同上书,第52页。



我回来了。尽管 78 岁,我还是又一次改换了我生活的地盘。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年纪,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像在 1933 年那样,这一决定有政治的参与。由于不幸的世界形势,使内心窒息、激起不安的变化已经降临到这样一个天佑的巨大的强国之上,在忠诚名义下强制让人遵从,对良心的刺探,教育朝向诽谤、不信,拒绝发给那些不受欢迎的学者护照,哪怕他再有能力。……毫无仁慈地把异端者从经济上推向毁灭。遗憾的是这些都成了每天发生的事。总之,对自由的保障出现了问题,不少人在担心自由正处在毁灭的边缘。<sup>①</sup>

但那些感到世态“使内心窒息、激起不安的变化”的人仍然只是少数而已,托马斯·曼的警告也好,卓别林的讽刺也好,对大多数公民来说听起来正是“危言耸听”,或者更糟糕地当作“赤党”一伙加以诽谤。在大恐慌中诞生的纳粹统治之下,甚至民众日常生活的实感从一天天的场景中都看不到任何的变化,那么在繁荣时期的美国,麦卡锡旋风更是如此。然而对公开的和潜在的异见者来说,不能一概说那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舒适的社会;也并不是他们被憎恨被怀疑,受到的恐惧和猜疑的程度更少。而是在占压倒多数的“认为他们还是自由”的人中,亦即那些甚至没有自觉到自己随大流的势态广泛而又深入的展开之中,异见者们所感到的孤立感和压迫感甚至更大。

---

① 托马斯·曼:《理解》(Comprendre),1953。

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 初版于1921年)一书,为现代信息理论开辟了道路。在这本书中他说道:“在任何民族共同体中,形成对外界事态的公共舆论的,主要是少数模式化的见解。”因而,“当一个模式化的体系变得相当稳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引向那些支持它的事实,而偏离那些与之相悖的事实”。<sup>①</sup> 由于有这种趋势的存在,一种模式化的见解通过“事实”来证明的时候,已经在事实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李普曼用许多例证来分析了这一事实,这部在一战后写就的今天已成为经典的研究,出版在通信网得到最高的发展、社会流动性一直较高的美国,正是象征着现代的悖论。而内部的人(正统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成员各自自我积累起来的对这“社会”的意象更是加深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这一恶性循环其实正是发生在一种一般的倾向之中的问题。纳粹们并没有发明之,仅仅是对它加以利用,当然他们的手段十分巧妙。现代政治权力通过操纵大规模的大众媒体来统一“民意”的趋势已经被指出过多次,但那些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宣传,作为一种积极促成人们意象的推动力,也有它的“局限性”,其意图和效果都在于封杀反面宣传或阻断来自某不利方向的新闻,也就是切断“杂音”的干扰。另一方

---

<sup>①</sup>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Macmillan, 1922;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5, p. 119.

面,甚至在那些当权者并没有像极权主义那样牢牢控制着大众媒体的社会中,内部和外部意象之间的这种分裂也是存在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而且,统治阶级和那些控制大众媒体的人之间的利益同盟的理论,以及媒体特权理论,都不能告诉我们关于模式化的见解形成的全部真相。所谓“社会上”的意象正是一种化合物,它是由来自“上面”的有目的意识的定调,和人们的“自我”自发酝酿出的李普曼所谓的“模拟环境”(pseudo-environment)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成的。对于周围的“社会上”的变化,直到其与过去的形式完全颠倒过来都还没有意识到,在这一悲剧或喜剧中,那种“自我”抑或所谓的“自我利益”的现代性构造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那些戳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虚构性”的痛处还不怀疑自我意识与利害之明证性的人,和那些仰赖意识形态的“客观”正当性,揭发内部人意象之“虚假意识”的人,在上述模式化的见解形成过程中,都将来自自我的干预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一点上,二者都展示出一种奇妙的两极对立的一致。

前一个群体高唱的主题歌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在战后繁荣时期的西方或者西方化了的世界特别高涨,那些“从噩梦中醒来”的进步主义者已经接过指挥棒,而享受着战后消费文化的年轻一代附和着这一曲调,成了一幅国际上的景观。这一“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大合唱是不是像 C. 怀特·米尔斯说的那种“终结的意识形态”暂且不论,就我们当前的主题而言,看看在这一大合唱中针对已经成为替罪羊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批评和嘲笑的调子正如何在国际上变得类型化,这本身就很有趣。比如说,诗人金斯雷·艾米斯(Kinsley Amis)在《社会主义与知识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1957)中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具有“一种非理性的能力,即热衷于自己之外的、外在于自我的利益和理念”。再有,针对英国新左派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9),安东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书评中,忠告“威廉斯先生和其他任何,总的来说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停止夜不能寐地为你们自己、社会和民主所做的担忧,在你们自己的工作<sub>上</sub>再加把劲吧”(着重点为丸山所加)<sup>①</sup>。日本这边的同类也一样,这里,指控和攻击也是个人的自我还是“伟大理念”、“自己的工作”还是意识形态之间的二者择其一的问题。的确,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意识形态对抗至少就西欧世界,而且是就其“内部”而言,已经让位给了福利国家和休闲的心态。所以,“意识形态之终结”这一“社会上”的意象得以传播的条件也就相对得到了增强。可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对于这类知识分子来说,尽管意识形态是一种虚构,但“意识形态的终结”却不是一种意象,而是一种现实,就像他们说的自我和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是一种关于自我和自利的意象,而毋宁说被构想为一种“内在”的实体,它与“外界”环境从领域上说是可以清晰地区分开的。问题也就在于人们想当然地接受了这种区分并对它不加质疑。

为某个政治事件而愤怒而狂热的自我,与厌倦意识形态的“过剩”而躲进“自己的工作”的自我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这样的差异?无疑施密特说的“退进私人的内在”是属于德国的思想传统的,但

---

① 以上引自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出于冷漠》(*Out of Apathy*)。

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眼光,不仅仅“纵向地”,也即历史地,而同时也要“横向地”,把它当作一种国际上共通的精神状况的德国版变种来看待。早在一百多年前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中,法国历史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就指出“民主社会”<sup>①</sup>中均等化的过程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的“狭隘的个人主义”的蔓延。他尖锐地指出了一种趋势:个人一旦失去诸如行会和自治体那种中间团体的保护,并被抛进一个强有活力的社会中,便会将自己的生活领域局限于日常身边的生计或娱乐之中并切断他对公共事务积极参与的意愿。到了现在,特别是在战后,当人际关系和通信的手段变得远比当时复杂的时代中,托克维尔过于早熟的洞察的意义才得到重新的认识。这样,托克维尔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不过同时也就是美国社会学家莱斯曼(David Riesman)所说的“他者志向型”的个体罢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对世间的事件是如此地敏感,尽管他们“关注”这些事件,同时却又完全当作是“别人”的事。因此,它可以是让你为之而狂热、愤怒或附和的对象,但却不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来处理的事。纳粹统治下的知识分子所过的内在与外在的双重生活难道不正是这种所谓的“他人引导型的利己主义”为适应知识分子而合理化的另一种形式吗?因此这种自我对政治的关注,并不是把政治当作个人的事来参与,而只是一种对时兴的话题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关注的热度就低,毋宁说,对现代的“政治上”的狂热与

---

<sup>①</sup> 当然他说的 la société démocratique 这一范畴较之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主义”社会要广,这里不去细论。

体育和戏剧观众的狂热有一脉相通之处，二者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反过来说，不去关注也并不是说，一个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情”对其他则毫无兴趣（比如那个只专注于他的天体望远镜以至于不知道日俄战争的“学者”的故事所象征的那样），它经常是一种意识到他者而摆出的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所以表面冷漠的背后内藏着不安和怨恨。正如现代型政治关注与其说是出自自我的选择莫如说是对自我的投影那样，现代型的“冷漠”也只是一种对政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己对政治意象的一种反应而已。这里重要的不是政治关注还是冷漠，而是政治关注的结构本身。

“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大合唱虽说是从“极权主义”的经验中习得的，但实际上至多只学到了一半。那是因为无论从纵向的渗透过程或横向的扩张的过程来看强制性同化的进展，我们总是停留在把它看作一种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这一观点上，并没有从生活在那个世界中的人们的日常情感出发往深处挖掘这个问题。所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战从来就不是万能的，过去不是今天也不是。莫如说，它在激起民众对意识形态的倾销的逆反心理——即一种抵抗倾销扩大的意义上具有两面性，“意识形态的终结”本身就是其一个面向的展示。但是，不管我们多么地厌倦那些来自“外部”的意识形态的洪流，并对之漠然不问，我们都不可能从对虚构的符咒中摆脱出来并找回自我。尽管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面临“抵抗倾销”的增多而消磨其宣传的效果，但接替它们位置的是一种作为我们的“模拟环境”已经固定的、自我难以分割的一个部分的意象。抵抗一种新商品的广告战，消费者并不是放弃一般的购买，而只是几乎在无意识之下，把手伸向了过去熟悉的商品。现代社会中的

选择不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和一个“真实”的环境之间的选择，只能在形形色色的“虚构”和形形色色的“设计”中生活是我们的宿命。除非我们意识到这种宿命，否则，我们注定要丧失一种途径去磨炼在那些“虚构”中的选择能力，其结果反倒是为“在一个每个人都变了的世界中谁也没变”的意向“法则”所动，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就随波逐流了。要不然就成为那些渗透在我们内部的习俗、制度和人际关系的奴隶。只有这两个方向可走。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强制性同化的主题上来，不过这一次我们说的不是它的完成阶段，而是它的形成阶段。即便在纳粹那里，意识形态的分布甚至在内部的（或者说正统的）世界中，中心部和边缘地区也不均等，与异端在精神上接触的交界区域往往是相对可变的。换言之，在意识形态上明显属于纳粹党派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并不多。离中心越远，意象的交汇也就越发频繁，因而意象的自我积累的功能也就容易受到阻碍。对强制性同化来说，问题在于要在边界上竖起一堵高墙并把异端锁在外边，然后，缓慢地且审慎地，把那些附近的人移向里面的中心部，并切断与异端世界的交通。

但是，前面说过的那个语言学家也好，尼莫拉也好，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生活在正统世界或者异端世界的中心，而是生活在边缘的区域上，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在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任何社会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生活在这样的区域里，因而一般被认为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如果我们用“自由主义”来意谓一个人的心智态度乐于接受来自其外部世界的形形色色的信息，并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宽容的”的话，那几乎是所有生活在边缘的区域上

的那些人的自然的心理状态了。但一旦某个“自由主义者”主动意识到生活在这样一个区域的意味,并积极地抗议为任何阻断意象之间的交流而设置的障碍的话,那么,在纳粹那样的权力眼中,他从一开始就会被看作一个比异见者还要危险的存在。这并不仅限于纳粹。所有正统社会(包括那些将自由主义“正统化”的社会)对“自由主义的倾向”所抱的怀疑之根源正是出自于此。事实上,那些当权者的核心关注,或者说那些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主要方向,总是被导向到这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自由主义”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意义才成其为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先前的定义,即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一个对各种各样的交流持开放态度的人的话,那么,可以推测,一个更强的电波传送的信息会对他的意象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或者哪怕是某种信息被切断,而看似形形色色的信息实质上被划一化,由于他对这些每个时段出现的信息保持开放的态度,也会继续相信他自己还是自由主义者,也就是他的“社会上”的意象可能根本就没有变。而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前面讨论的那种模式化见解会无意识地只选择那些对自己好的信息;反而相信自己做出了公正的决断。这样一来,甚至在来自权力镇压的恐惧的情况下,他也可能朝中心移动。

即便向中心移动,只要不对中心部的“伟大理念”全面参与又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说那代表真理和正义的话,这种思考很可能源于根据意识形态的客观合法性来制裁谴责形形色色的“虚假意识”这一立场。从这一立场来看,“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大合唱也很可能会被当作反动阵营特意所做的宣传,或至少被当作人为地巧妙设计出的“对抗意识形态”的问题来处理。当然就“意识形态的终



结”而言,其出现的背景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因为第二次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还有按字面意义来说的对“外在的”苏联阵营的冷战的半永久化这一背景也不容否定。然而,第一,西方社会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中意识形态的时代已经结束,只要有这一意象传播的社会条件存在,那么把所有这一切都看成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外在的批评,是很难被内部的大多数人接受的,我们从以上的描述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推论出这点。不仅如此,在一个立足于正确的意识形态的体制或组织中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个观念本身,不正是斯大林主义常见的自我中毒的一株强有力的细菌体吗?要深入探讨社会主义体制或政党内的边缘领域的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还是想稍微涉及其中一点,以此来确认我在本文开头关于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中的现代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当马克思把扬弃人的异化的课题交给无产阶级的时候,无产阶级作为总体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居民,而且这个阶级与其说代表了人类的高贵和尊严,莫如说是汇集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非人性的面向。要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导致出解放全人类这一理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前定和谐”理论——即从个人的非道德性中看到了所有人的福利——正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其骨髓里灌注着一种颠倒的生活形式和价值感,改变整个世界革命的激情也就根植于此。如果认为“颠倒的世界”指的只是敌对阶级、所统治的地区的问题,那么“改变整个世界”就意味着将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尽管不完全,已经代表的自己的阶级,去压倒作为他者的“颠倒的世界”的一种单方面的过程的话,那么这就很清楚

是严重扭曲了马克思提出问题的基始处所存在的理论和世界观。即通过改变他者也改变我们自己——这一痛苦的自我认识，取而代之的只是一种廉价的自我正义感，亦即现实政治中的那种古老而陈腐的善恶两分论。将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运动发展到今天，并以此为人类祝福的人，也正因为此，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其外边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并由此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再怎么敏锐地警惕注意，或者说再怎么周密地观察之也不为过。

生活在边缘区域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与内部的人共享一种生活的“实感”，同时也会试图保持与外部的持续交流，并因此而不断主动地打破为来自内部意象的自我积累所导致的固定化趋势。强调中心与边缘之问题的现代性和普遍性决不意味着对各种思想和信念不加区别地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说怀疑，那应该是对把一切都托付给意识形态的“伟大理念”和自我“常识”的那种导向懒惰思维的怀疑，而不是把现代的政治判断当作处理我们每天面对的新问题的选择和决断来对待。同样，如果说信念的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一切缺乏来自边缘的反向交流之回馈的所有体系、所有组织都会腐败的。由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规模上和实质上均如此——这种怀疑和这种信念，适用于各个层次，也必须适用。甚至“反主流的”或“反体制的”的群体也会有中心和边缘区域之分，也抱有源自这一事实的问题。总而言之，那些处在边缘地带的人的言论和行为会被那些接近中心的人看作“不负责任的批判”；反倒容易被那些彻底在外边的人批评为对内部的参与。但批判是否负

责,若不去追问是对什么负责的问题,则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来自中心区域的意象中,总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有一种想要基本维持内部的结构和势力分布的要求存在。至于所谓参与,只要停留在墙内,不管是多么边境的区域,一切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内部的规则与各种关系之中。如前所示,这是我们从现代经验中学习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即无论来自外面的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多么正确,都仅仅因为是来自于外面的声音,游离于内部人民的实际感受之外,缺乏力量改变他们的意象。而且,前面说过,一切社会的人民,甚至包括那些自我声称的异端,实际上都不可能避免出自内在和外在的问题。不用说,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当今知识分子的艰难而又光荣的任务,不在于避免这个悖论,而是要站在彻底参与和彻底“不负责”之间,为做出通过内部而超越内部的展望而努力。因而,这不是那种被称作“自由主义”的特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意味着,无论一个人代表何种信念、为何种信念而战斗,他都凭着智识来为之奉献。因为智识的功能也就在于,在任何时代,都把他者作为他者,置于外在来理解的。

(1961年)

### 追记:

第七章和第八章都是为增补版新加的稿子,也都是已经发表过的。“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原本是一个讲演稿,在我所属的“宪法问题研究会”于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五月三日举办的宪法纪念讲演会上讲过,修改后与其他讲演一并收录在该研究

会编辑的《发挥宪法的作用》(岩波书店,1961年刊行)一书里。而本篇“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则作为“人的研究”丛书中(有斐阁)的一册,收录在我主编的《人与政治》(1961年)之中,收入本书时仅做了一些字句的修订。这里要感谢宪法问题研究会、岩波书店以及有斐阁慷慨同意转载。

正好夹在这两篇稿子之间,是安保斗争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上述宪法纪念讲演会刚开过半个月后,岸信介内阁和执政党就在众议院单方面地中止审议新安保条约,并一夜之间强行投票通过,将全国卷入骚乱的事态之中。针对安保条约的改定问题,在这之前我也参加过各种集会和研究会,也在自己居住的地区集会上做过不大擅长的演说。强行表决通过后的一段日子里,的确是忙得无暖席之暇。当然与始终热心参与安保问题的人们相比,我的忙碌算不上什么。但是,自己生性懒惰,不甚愿意动弹,而且身体也有障碍,只有半片肺叶在工作。就我来说,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像奇迹般,居然扛过来了这段紧张生活。其间,我活动的场所,虽然大部分是大小新闻机关所报道的集会、游行、杂志上的发言等这类活动以外的地方,但仅仅是看看这些浮出表面的言行也能知道,在短时间内从未留有这么集中的谈话和文章。这次出版本书的增补版时,对于如何处理有关安保斗争的数量相当庞大的文字,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考虑到本书的厚度,按照本书的选择基准只收录了一篇“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问题”。这是所谓五一九以前的讲演,而且并不是直接针对安保斗争的。但也正因为此,我觉得从原则上,而且不必冒着事后合理化这一危险,展示了我自己在那场运动漩涡之中的行为动机。

我在五一九之后的那段沸腾的日子里说过：“今后大的趋势是，在统治阶层中会发生一种前瞻危险的分解，由此事态得以平静下来，这是现在最能设想的可能。无论怎么变动都会如此。”“从瞻望前景来说，我觉得最终这次事件也会随着时间逐渐恢复正常。只是即便恢复正常，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经验，必将会成为一种资产。绝不是原来的意图，但是现实仍然是带有连续性的一面，反而会实际感受到马克思所说的‘兴奋至极的革命精神之后，会有一段漫长的陶醉’。”（5月27日与竹内好、开高健的讨论，《中央公论》杂志，昭和三十一年7月）尽管我自己抱有这种展望，但从这短时期的激烈运动中，还是想尽量提炼出对于我们今后能成为“资产”的部分，这正是那段时期潜流在我的各种言行深处的愿望。对议会制的“议院内主义”的批判，或者对“建筑自然主义”的批判，以及强调“在家佛教”的政治活动，都是出自期望积攒这种长期“资产”而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些活动一点点积累得多了，哪怕那个时候没能阻止安保条约的“自然成立”，也可以将条约的效果抑制到最小限度，进而形成持久的力量以废除之。但是，“事态一旦平静”下来，却只见“高涨的革命精神”澎湃激昂，之后的酒醉未醒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只要具备最小限度的政治现实主义，都会知道那个时候无论怎么折腾也不会“成功”的，但有人却描绘“革命”的幻影，对“领导权”异常关心却未能满足，将这种挫折感投影于那场斗争整体的客观意义上，反复渲染运动的“失败”，这和那些标榜良心的评论家——他们是用冷笑来搪塞运动高涨后的内心焦躁的人——的见解相“一致”，这类奇观到处可见。结果呈现出的怪现象是全世界只有我们日本的这一群人对安保斗争的评价最低。我对这场

斗争,作为一个市民参加至今一点也不后悔,但对上述酒醉未醒的现象多少感到失望。同时,我也体验到内心的温暖,有那么多人不为各种误解和中伤所动,在底下始终诚实地尽着自己的义务,默默地发挥着作用,这也是事实。

这一期间内我的言行,亦即通过大小的“通讯”归属于我的名下的“思想与行动”,其后受到左右两派的各式各样的批判。在此,并没有想对这些一一辩论,就某些问题,这第七章和第八章的两篇稿子实质上已经做了回答。只是在关系到如何探讨贯穿本书的政治研究方法上,就一两个问题我想做一下一般形式的补充(另外,在《现代的意识形态》第一卷(三一书房发行)中我和佐藤升的对谈里也涉及这个时候的批评)。

安保斗争时我的发言,有时是对特定的人的呼唤,他们至此无论出于什么意义尚没有付诸行动。在这一意义上,既有以组织化理论为基础的,也有在运动的漩涡中,阐述事态的经过和前景的,不同于期望,还有事后尝试着对事件的解释和定位等的。我丝毫不否认,通过这些,我个人的政治评价或偏向多少留下了印记。但是,政治性判断中总是含有一些要求的,比如,针对特定状况下的特定个人的组织化理论,当然不是与我的想法相违背的,但是把它当作我个人的政治思想的吐露未免有些不对劲儿。比如,某一事情是否满足议会制民主主义的机能条件,就这一问题,认识的层次,亦即对于议会制民主主义,离开“终极”的价值判断是可以考察的问题。如果因此得出否定的结论,那至少具有实践性意义,从那一事情的主动者身上,剥夺其议会主义大名下将自己合理化的资格。这也伴随着对那些人的组织论效果吧。那种情况下,驱使这

一理论和利用议会制民主主义采取最终最好的政治体制的立场显然不是一回事。

就我自身来说,凡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采用“最终”或“最好”这种绝对价值判断,我是反对的。(这一点,请参照本书第一卷第四章“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在该文中“至少在政治判断的范围内我想做一个高度的实用主义者。”我也是特意加上着重点说这话的,可是却时时听到一些批评,断定丸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定位为实用主义者。我自己未必是哲学上的实用主义者。顺便说一句,有些人是带着一种身体趣味,动辄就说什么“推心置腹”啦,“肝胆相照”啦;还有一种精神风土,好像皈依某种既成的主义就以为自己持有了某种“世界观”。从这两种背景来看,很多“喜好思想”的人都有一种倾向,逢事就要求别人坦白自己的信仰:“你的立场究竟如何?”对于这类提问,不管别人认为我多么傲慢,我总是回答道:“我是丸山主义。”有关人生终极问题的信条,用“我的思想是什么”这一形式本来是无法表达的。一个人的思想究竟是否在理论上能贯穿一致到什么地步,这是要通过缜密地验证他的所有著作后才能厘清的事。而且,他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其思想的支配,说到底是一个“盖棺定论”的问题。)我绝不认为议会制民主主义是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但反过来说,为了未来的制度,或不设制度,就主张抽象地“否认”现在的议会制民主主义,基本上是个没头脑的一派胡言乱语。我们很难认同其政治意义,不仅仅是就议会政治。

无论议会制也好,宪法也好,不去享受现制度提供的机会,亦没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活用其可能性的人,我们凭什么期待他们有

能力承担、运用未来的制度呢？说什么现制度没有给自己提供任何机会的人，这种怨言正是等于在坦白自己的想象力的极度贫乏。更何况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着现制度和组织赋予的机会，另一方面却意识不到这点，总以为自己处在“外面”，爱到处张扬一种被人“疏外”的受虐意识。一看到这些人，就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在电车里扭着身子大声哭泣令父母不知所措的那些孩子。因为两者都在“反抗”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期盼”。毋庸置疑，民主主义并非只终结于议会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主主义在某种制度上的表现而已。但是，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会看到一个完全体现民主主义的制度，人们至多只能谈论某种程度的民主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不断革命”才是真正符合民主主义这个词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主义思想本来就是从本质上内含着“人民做主”这一逆说的。卢梭说过：“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受统治是不自然的。”所以，民主主义在现实中只是作为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存在，没有被任何制度完全吸收，反而是作为制约制度的一种运动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而且，这种情况下，“人民”在水平面上总是一个集合体，它蕴含着个人和多数的紧张感，并不具有“即自性”的一体性。作为即自性的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正如历史上屡屡出现的一般，容易与国家或者领导人化为一体。专从权力和人民这一纵向关系来把握民主主义，无视或者轻视个体对于多数这一层次的话，“全体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危险性就会从中胚胎出来。因此，民主主义这一政体的假说是否具有社会契约和统治契约这一纵横两重的构造，现在我们必须再次思考这一问题。



具有了这一基本骨架的民主主义,作为思想也好制度也好,都比近代资本主义要悠久,而且也比任何社会主义要新颖。只有将之作为超越特定体制的一种“永久”的运动来看,才能成为现在日常的政治创新的课题。不这样的话,只是将民主主义作为历史上的体制的一个概念术语来用,就会陷入一种看似“历史的”眼光而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思考。即不是将现实特定的“体制”作为民主主义的体现来加以美化,就是将日常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行使民主的反馈功能这一课题统统都搁置于“扬弃异化”这一未来的目标之上。

同样,什么“为废除政治的政治”或“为消灭权力的集权”这类看似辩证法的思考实际上也是一种目的思考,或者只突出宏大的历史阶段论(消灭阶级社会到达无阶级社会),只要不展示出各个日常过程的理论,就很难作为准则在具体情况下发挥其作用来识别更为恶劣的危害。

我不得不相信：人们称作不可或缺的制度，通常只不过是习惯了的制度；在社会体制的领域里，可探讨的范围之广泛，要超出生活在该社会集团中的所有人的想象。

——《托克维尔回忆录》

## 原版后记

说起来本书实在是有些奇特，首先，自己给自己写的论文一一加以注释，这种例子不多，更何况就相关的问题，又适当地插入些过去座谈会上的发言；如果是就别人的稿子或为某一故人编集子倒也罢了，作者自己来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显得太过于傲慢了些，就好像教主让自己的信徒一字一句地聆听自己的宣拓一般。

为了让大家明白为什么会弄成这样的呢，我要简单写一下这本书问世的过程。一句话，这本书是各种动机和当时的情况纠缠在一起后才逐步形成了这么一个样子，并非作者凭借着某种目的意识所能控制的产物。

第一卷的追记里已经写过，本书原来打算主要讨论日本法西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也是西谷能雄创办未来社时就约好的内容。但是也正是那个时候，我反倒因病卧床不起，其后虽然稍稍有所康复，但这种需要查资料的活儿总是要走动才行，到何时才能杀青真没个准头。同时，东大出版会也准备在我出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之后，继续出版一本政治学方面的论文集。对此，我重读了自己的几篇文章，觉得尚有不足，也就不甚上劲。加上疗养期间与学界和教研室的接触少了些，愈发没有信心，便任由其去

了。正是在这种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从前年末到去年初舆论界再次提起知识分子与战争责任的问题,我在第一卷第七章(新版为第六章)中也谈到过,不光是知识分子,日本的政界以及舆论界,最后一直到学界都蔓延着一种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任的趋向,昨天刚说过的事今天就面不改色地幡然转变,我对这种情形早就觉得不对劲,故而引起我的注意。而且战争责任的问题对我来说不仅是个人的思想态度的问题,也是与我的研究对象密切关联。我不赞成某些人说的: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怎么还又提起战争责任问题;但同时我觉得到了现在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一问题本身,不正是说明这是所有知识分子应该反省的问题吗?也就是说,在这一意义上,战争责任问题没有与战后责任问题切割开来,是我最初的感觉。去年忘了不知何时,与住在附近的畏友竹内好聊起来,他说:“我们现在正是应该把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写的东西统统公诸于世,什么惭愧啦,时至如今不合时宜啦,抛弃这一切顾虑,然后重新起步才是。”这番话一瞬间深深地刺痛我的心。什么事情可能都是有缘分的,到了夏天,未来社可能有什么打算,突然加强了攻势,要求我履行稿约。为此,我决定把本来准备交给东大出版会的几篇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汇总为一本书(这一点要深深感谢东大出版会的好意)。当然,那之后的道路也并非一马平川,从自己心中的那点学术的羞耻感解放出来,心情虽然松快了不少,但其他问题仍不断涌现。我本来就笔耕不勤,可有时也在杂志和大学报纸及读书报上写过些短文和书评。遗憾的是从不留心将这些一一保存下来。而且,生病之前倒是常常被拉去开座谈会,谁又会想到要把它全部收藏下来呢?到日本战败为止

倒是有一些未发表的东西,但都是有关日本思想史方面的或是海外政治学界的动向以及介绍外国书刊等,没有什么像样的文章。考虑到整体的内容,即便是有自己满意的文章,但作为一本著作如果太缺乏统一的话,还是不想出版。这样翻过来倒过去左思右想,逐渐确定了以下方针:

- (1) 将文章限定为战后发表的论文;
- (2) 以现代政治问题相关联的论文为主;<sup>①</sup>
- (3) 过于短小或入门类的不予收录;

(4) 就现代政治问题加上一两篇新稿,而且用追记的形式加以补充,尽量更新为最新知识。

这样一来,可以尽可能向广大读者清晰地展示出战后我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以及走过来的道路,同时又展现政治学是如何应对现代政治的各种问题的。在第三卷追记里提到的日本政治学的“内”与“外”的交流甚为隔阂,本书编辑过程中又跃跃欲试想多少起到桥梁作用来联系两者。结果是典型的学术论文与写给报刊杂志的文章并举,加上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也编在里面,追记里补写的内容也多少不一,并非完满匀称,这反倒是印证了追二兔(或数兔)不得其一的失败,但已经走到这一步,只好闭上眼睛,听候方家的严峻批评了。尽管如此,要向世人披露我自己的思想旅程、困惑和体验等,应该是要先阐述到开战时的自己的脚步,在这本书里没有余地来叙述之,只好期待他日的机会了。

在汇总这本论文集时,眼前不断浮现出很多先学和朋友的面

---

<sup>①</sup> 以上两点都不包括日本和欧洲思想史的专业论文。

容,他们在战前或战后对我的学术及想法给予了许多珍贵的启示,我也从其他学术方法及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这里不去一一列举其名。如果没有这些来自各方面各领域的人们的教诲,恐怕不会在政治学的道路上走到今天,因为“每件事都知道一点,但有一件事知道得多一些”(约翰·密尔),政治学所伴随着的某种宿命恐怕就是这种艰辛努力。

最后,要感谢出版社社长、友人西谷能雄,他为本书问世整整耐心地等待了六年。也感谢最后成书阶段松本昌次颇费心血的努力及未来社各位的辛苦。

1957年3月于本乡

丸山真男

## 增补版后记

几年前出版社就提出，希望将分为上下两册的旧版合为一册出版，我因为出国和其他原因一直拖延至今，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虽说是改为增补版，我本身却没有想将旧版全面改订重新问世的意思。只是想，既然重新排制版面，借此机会除了订正一些技术性问题外，追加两三篇旧版出版以后写就的文章，只要与本书内容相符的就行。但是，在追记里已经说过，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已经转变，实际上自从身体康复以后，能够追加的论文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结果就是如本书所展示的那样，第一卷里追加了一篇；第三卷里追加了两篇，然后又在追记的地方补写了一些内容。本来旧版是按我的要求装订为简装本的，出版社方面起初并不愿意，这次改为合订本时，封面也改为硬皮精装本了，这或许算是最大的“改变”了。

本书的标题“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就是在快要成书时，万般无奈之下起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以后，现代什么什么的思想啦、行动啦这类语词和标题不时映入眼帘，最近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厌烦这一书名了。那倒不是说因为这一表达有些陈腐。去年什么时候，偶尔看见某学生报上有“大凡要考察现代政治或思想云云”的句子，“政治或思想”到底是什么？政

治是政治,思想是思想。可以说政治的思想,那只不过是政治这一复合体的一个侧面。当然也可以论述思想的政治特性或政治作用。因为任何思想在政治场合下都带有一定的色彩,扮演一定的角色。尽管如此,思想的意义并不会因这种政治作用而化解,或可以化解。我也并不是想要拿报纸上的一段话来说事,只是对那种将政治和思想简单地用“或”来连接,用以对等之处所象征的某种气氛,觉得有些问题。照这个样子下去,刚才说的书名,把其中的虚词部分全部拿掉,岂不成了现代等于政治,政治等于思想,思想等于行动了。事实上,最近这些语词常常如糖葫芦一般串在一起,给人的感觉是其中似乎蕴藏着“灵性”而后又“发飙”起来,甚至有时将之错觉为一种思想的激进主义,我对本书书名略感忧郁的便是因为这点。

但是,书名本来无所谓。作为学术“研究”,其后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领域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故而本书愈发显得古色古香了。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对旧版部分几乎不加修订而出增补版,这当然有我自己的少许愉悦之感,同时也不是说没有点儿“较劲”之处。大家可见,本书所收的论文大半都不是登在写给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杂志上的,倒莫如说是为学者以外的读者而写的。但我自己却又从来没有预先设想这些论文作为面向大众媒体的“启蒙”读物来执笔。我本人没那么灵巧,事先就能区别写出“学术论文”和“启蒙论文”,反而是我在本书的各篇论文中有意识地避开这种区分。所以,这些论文的形式,从学界的常识来看有点太接近媒体的文章,而从媒体来看却又过于“专业”或“深奥”了。对这类指责我当然是有心理准备的。因而,当本书意外地获得广大读者的



关注,特别是拥有与学界和舆论界无缘的各个阶层的热心的读者,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更能鼓舞我的内心的了,对作者来说这才是我的“本愿”。我在书中将市民日常的政治关心和行动的意义比喻为“在家佛教”主义,同一比喻也可以用于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我时常在想,包括我在内的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研究者都是所谓学术界的“和尚”,要想高度发展学术,和尚就要不断地修行。但是,与宗教相同,担负一国学术的力量、赋予学术以活力的难道不正是那些不以学术为职业的“俗人”们的学术好奇心吗?我个人学识浅陋,本书论文企求的并不是人们所误解的那样,要去承担学界和媒体间的某种“桥梁”作用,而是在于将学术的思考多少从“和尚”的专职中解放出来。在这一意义上,我今后还是特别期望热爱学术的非职业学者给予鞭策和坦率的批评。

话虽这么说,当然并不是意味着我对同行学者或评论家不当回事。针对本书的旧版,不仅受到来自政治学界,而且也受到来自广大的社会科学家和评论家的恳切评价和批评,这些都令我受益匪浅。然后,我想就这些批评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一一以追记的形式做一答复,但一旦着手,才明白在本书各篇论文的范围内回答这些批评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正面的批评大多都是涉及本书以外的其他著作,追问的也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立场等。而且,去年秋天本书的英文版<sup>①</sup>出版后,海外已经有四、五篇书评出来,今后还会有一些,所以,我打算将这种海外的反响和国内的批评综合在一起,

---

<sup>①</sup> *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ed. By Ivan Morris with Author's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但其中只翻译了旧版中的九篇论文。

找个适当的机会重新再做回应。因此，追加的补记里虽然也含有一部分对批评的反驳，但作为总体的方针，还是将这本书的原型作为战后史的一份资料提供给读者，这一意图愈发强烈起来。我再次重申，以这种形式再版，并不是说作者无视至今提出的各种批评，或觉得不值得学习。

对于研究者和评论家来说，将这本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莫如说作为战后日本思想史，说得更宽泛些，作为战后思想史的一份资料，我想再次出版它的意义其实与本书编辑的目的相关联，也就是在旧版后记中写到过的：“尽可能向广大读者清晰地展示出战后我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以及走过来的道路。”特别是最近的某些论调，让我觉得担忧的是，无论是故意歪曲还是无知，针对战后复杂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及每个人各自走过的不同道路，动不动就粗暴地用阶段区分或“动向”之名来笼统概括之，从这类“战后思想”论出发，对战后的印象不经过充分的梳理便会沉淀下来，不知不觉地作为新的“战后神话”诞生。从政界、财界、官界到舆论界，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们，或靠忘却来获得利益的人们爱放出这类神话（比如将战后民主主义置于“占领军民主主义”的名下一概称为“虚妄”的言说），随着新的一辈逐步增加——他们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和战争刚结束后的那种精神空气——很有可能会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为了防止这种立足于忘却过去的战后思想史的神话化，一个办法就是战后在各个领域里发言的知识分子应该尽可能多地将自己过去的言说以资料的形式提供给社会，让人们都能看到。这不仅是旧版后记中提到的战后责任这一道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的学术课题：建构更为缜密的实证性的战后史。本

书在这一意义上,作为资料能够起些作用就很荣幸了。

当然,战后民主主义是否视为“虚妄”最终不是凭借经验来验证的问题,而是和论者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于是,就政治的任何科学认识,只要都是以无法验证的“公理”为基础,那么这种“虚妄”观上也有可能会有学术的大作开花结果,这点我不否认。我说的神话化是指出从这一观点的历史抽象中,并不意识到其抽象性和片面性,而直接作为现实的历史来通用。就我自身的选择来说,比起大日本帝国的“实际存在”,我倒愿意下赌相信战后民主主义的“虚妄”。本书各篇论文的执笔时期横跨战后 16 年,其间的概念用语虽有所变化,但不变的是上述的赌注作为公理或偏向一直潜流在基底,我将继续注重这种偏向,出版增补版时,我所“较劲”的也正是这点。

最后,感谢未来社的松本昌木、小箕俊介、田口英治各位为校正所付出的辛劳。

1964 年 5 月上旬

丸山真男

## 译 后 记

本书作者丸山真男，1914年生于大阪，父亲丸山干治是著名的政论记者，他的兄弟亦是新闻记者。1937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本来也想做记者，至今我们从他的文章风格中仍能够看出这种家传，后因大学期间写的一篇论文“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受到恩师南原繁的赏识，留校任助教，1940年升为副教授。其间发表了不少有关日本近世政治思想史的论文。1944年应征入伍去朝鲜，于出发当日清晨，将刚写完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三章交给赶来送行的同事。短短几个月的军队体验加深了他对这一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大学，1950年升任东大教授，亲身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的与同盟国讲和论争，以及60年代初的反《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写下许多时事评论，在理论上指导这些运动，成为领导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亦被誉为战后最著名的政治学家、思想家。1996年8月15日去世，当天正值日本二战结束的纪念日，终年82岁。我手头留有1996年8月19日的《朝日新闻》，在头版、2版、12版、14版上均对丸山去世作了报道和评价，当天的晚报文化栏里还登有鹤见俊辅的悼文，称他为“洞察时局”，绝不“轻信”的人。

丸山的主要著作是上面提到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

年),中文版由王中江于2000年翻译出版,另一本《日本的思想》(1961年),由区建英、刘岳兵在2009年翻译为中文,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区建英还将丸山散见于期刊、专著等以福泽谕吉为主题的文字,整理成集编译出版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是译自丸山《读〈文明论之概略〉》(1986年)的。丸山的著作还有《忠诚与反叛——转型期日本的精神状态》(1992年)和去世后才出齐的《丸山真男集》(全16卷、别卷1,1995—1997年)等。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初版是1957年分为上下两册由未来社出版的,其中收录了1946—1956年十年中执笔的19篇文章,其中“闲想恐怖时代”和“就讲和问题”两篇短文在1964年5月增补版时被删去(后又收录于《战时与战后之间1936—1957》(1976年)一书),代之以“战前日本的右翼运动”,第三卷增加了最后两章,并在旧版追记上又增添了新的注解后,将两册合二为一作为增补版出版,其过程详见作者的增补版后记。该版至今共重印了160余次,成为经久不衰的名著,这次中文版翻译亦以之为依据。该书曾先后译成英文<sup>①</sup>和韩文等。2006年9月未来社又将该书版面焕然一新以“新装版”的形式出版,至2010年年初也已经重印了5次。

本书收录了作者第二次大战后发表的有关政治学及现代政治

---

<sup>①</sup> 英文版是由A. M编辑,从旧版中选出八篇译成英文,1969年又加上两篇,也成了增补版,而且1982年又将英文版的作者序和日文版未收的1965年发表的“围绕宪法第九条的若干考察”及1977年发表的“近现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合为一册出版。

问题的主要论文,其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卷“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从日本民族主义精神开刀,对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及心理,以及军国主义形成的精神背景做了透彻的剖析,指出日本右翼运动的精神支柱是“天皇制”,而其制度本身又存在着掩盖责任、推诿责任的通病。

第二卷“意识形态的政治学”,从拉斯基的思想转变谈到欧洲知识分子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极权主义、个人崇拜的精神背景做了细致的分析。在对共产圈内的“自由化”的考察中特别提及了中国的“百家争鸣”,并予以评价(这一点当然在后来也遭到不少质疑)。

第三卷“‘政治性的内容’及其局限性”是讲如何以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政治学。在反省了以往的政治学方法论后,主张建立新的、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强调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关联,并以“权力与道德”“支配与服从”为题对政治权力的种种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丸山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基本构成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也由此而诞生出“丸山学派”。本书论文的背景分析详见佐佐木毅写的《现代政治学的名著》(中公新书,1989)一书。作者丸山在增补版后记中称本书是自己思想史的一部分,可为“战后日本政治学史或广义的战后思想史提供一种资料”,故除了本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外,作为印证战后日本的思想转变的一部分,其资料价值亦是不可或缺的。

比如,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成特征,而该书第一篇“极端

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中就明确指出：日本走向近代国家时，天皇制的确利用“忠孝”观念封杀了个人主体的自由，根本的“国体”独占了所有真善美的内容，学术和艺术只能依附于这一价值体系才得以存在。了解这一点才能解释清楚日本一些政治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那种回归“国体”的冲动和愿望。

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第一篇译稿到出版整整花了近十六年时间，其间的辛酸苦辣只有自己最清楚。

早在2000年夏天，与商务印书馆编辑、老同学王仲涛先生谈起应该翻译些日本的学术名著，他首举的便是这本书。我因为当时已在日本的大学任教，学校有门课希望学生们读点名著，便选了和辻哲郎的《风土》，一边讲课一边将之译成了中文。正好紧随其后，便开始着手翻译本书的第一篇“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其后陆续挑选着将第一卷的几篇文章译完，从现在留下的全是手写的稿子上看，可知还是中文电脑输入不甚普及的年代。后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孙歌研究员，她写过“文学的位置——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问我要第三卷的“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一文，我也马上将此篇译稿交给了她；现在看看那一篇的后面，写的是“2002年盛夏于东京·新宿”。2005年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书正式列入“日本学术文库”丛书的出版计划。后来在为《南方周末》“秘密书架”栏目（2008.11.19）推荐的《几本日文书》里，首举的也是这一本，称“我在翻译其第一卷时，曾用热血沸腾四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不管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还是对军国主义下的天皇制问

题,作者透彻严谨的分析,让人由衷感佩,获益匪浅,深深感到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思想的力量。”

其实后来翻译进行得断断续续,其中一个原因是版权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2005年后这个问题突出起来。我先找坂元弘子先生商量,她是我留学日本后就认识的老朋友,当时跟她谈到版权交涉之难时,她通过当时任教的系主任,联系上了丸山真男的高足,也和几位大先生通过几次信进行交涉,但都遭到拒绝,理由似乎很简单,就是专业不对口。我当时学的专业是国语学(即日本语学),不是政治学专业出身,而英文及韩文本都是由政治学专业的教授翻译的等。这盆冷水泼下来,令人多少心灰意冷。于是,翻译工作也就留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大半部分而停了下来。

转机出现在2008年年底。当时在爱知教育大学任教的前田勉先生邀我去京都国际高等研究所做一报告,本来是吉田忠先生主持的一个项目“19世纪东亚国际秩序观的比较研究”,邀我去讲《万国公报》的,我却听成《万国公法》(两者日语发音完全相同),于是便报上“《万国公法》的翻译问题——从汉译到和译”这一题目。没想到,当天来听报告的人还有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的佐藤慎一先生(写过几篇有关《万国公法》的论文)和刚从东京大学法学部退休的平石直昭(丸山真男的弟子)先生,报告会后几人在会场附近喝酒聊天,不知怎的,话题又扯到丸山的翻译上,我当然发了一通牢骚,讲到了目前的窘状。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翌年2009年夏,平石先生通过孙歌来信,问我要了一篇译稿,我将第一篇传去,他看后说同意帮助交涉版权,这才也有了实质性突破。后来版权交涉的具体步骤和进展情况在网上公开的未来社西谷社长



的“目录”(2010年1月15日)上都可以看到。

这本书本来已有中文译本,是由林明德翻译,台北联经1984年出版的繁体字竖排本。“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潘光哲先生不光将此书借给我,而且将我初稿阶段的译稿都扫描保存在硬盘中。版权问题解决后,第一件事便是将翻译手稿交给北京的友人帮忙一一打字成文。

为了对付第二卷的翻译,先请信州大学阎小妹教授帮着翻译了部分初稿,又专门下载和购买了一些拉斯基中文译著,因为到底是政治学的外行,对政治思想史的把握不够,特别是对西方部分简直可以说是空白。好在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恩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先去网上搜索调查一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译稿拖至今日,也有其好的一面。特别是所涉及已经有中文译本的著作,尽量查找到该书,尽力做到用已有的中译文。但实际上,在核对中文时也有不少困难,有的译得太简略,有的则干脆找不到相对应的地方。比如,本书第三卷第八章中引有意大利小说《面包和酒》的一段,我从网上下载了中译本(袁华清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后,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对应的段落,没办法又从图书馆借出日译本,按日译本的所在逐一对照,好不容易找到中文应该所在的地方,才发现丸山引用的这一段正好被略去,我当然不由地佩服丸山引用这一段的眼光。

2013年,有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去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开始着手将最后几篇翻译完,并逐步做起修改工作。其中最后一篇,在翻译过程中偶然发现有王立秋从英文转译的全文,译文通顺易懂,着实不同于自己的风格。但因转译英文,必然也出现不少误

解,于是便以其为底稿加以修订重译,形成最终定稿。有愿意研究翻译比较者,可以对照两个文本,找出翻译学上英译汉和日译汉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初稿译成之后,按惯例应该写一篇导读,但考虑到自己的能力,觉得很难写出一篇能撑得起本书内容的导读,一时也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夏天,与南开大学刘岳兵先生在早稻田大学附近喝酒时,谈到此事,他劝我可以另请高人,这也正中吾意,可三番五次想来想后仍拿不定主意。今年5月适逢清华大学汪晖先生来访东京,又聊起此事,他提议可否请柄谷行人先生来写,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与柄谷先生沟通后,先生竟爽快答应了。两个多月后,接到柄谷先生写的序文,一读之下,豁然开朗。马上将之翻译成中文,同时转给了汪晖先生,又经文字修订,作为本书的序。

翻译是件苦差事,出力不讨好,特别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苦苦挣扎,总盼着一种解脱。好在翻译丸山的著作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学习,除了对战后思想脉络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外,也对西方的各种思潮重新梳理了一遍。最重要的是学到了如何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我由衷感谢为翻译和出版这本书做过贡献的各位朋友、老师和亲人,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援是完不成这本译作的。当然更应该感谢商务印书馆编辑卢煜女士,没有她的敬业精神和不断催促,这本书的出版还不知要再拖几年。

写完这篇译后记,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陈力卫

2016年初秋于东京神乐坂